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警惕日本——昨日的侵略与今日的扩张

 **EBOOK**
网络资源 中英双语

前言

作为研究日本问题的学者和以日本及国际关系为题材写作的作家，我越来越对日本的前途焦虑不安，越来越感到中国人民对日本右翼分子的所作所为极为不满，也发现亚洲国家和欧美非澳人民越来越对日本很不信任，因为日本在全世界的形象欠佳。因此，在这本书里，我针对日本没有把握住199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这个良机感到惋惜。6月9日众议院通过的《以历史为教训重申和平决心的决议》，只不痛不痒地提到：

“考虑到世界近代史上诸多殖民统治和侵略行为，认识到我国过去的那种行为以及给别国国民，尤其是对亚洲各国国民造成的痛苦，表示深刻的反省。”这个决议使中国和世界人民大失所望，一致认为日本的历史反省不及格，因为其要害是避开正面承认日本帝国主义灭绝人性的殖民统治和肆无忌惮的野蛮侵略。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这个决议是日本为政者“精心设计的暧昧之作”，日本由此失去了一个对侵略和殖民统治谢罪的极好机会。

在目前的世纪交替之际，日本再次处于一个历史转折时期，因此，作者在这本书里，努力表达12亿中国人民的心声，忠告日本吸取两次重大选择的经验教训，不要在第三个十字路口作出错误的抉择。明治维新后，日本选择了军国主义道路，悍然对中国、亚洲及美英诸国发动侵略战争，结果遭到彻底失败，只得接受无条件投降。

日本投降后，日本在美国占领状态下，选择了基本上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结果很快成为经济大国。日本目前面临着第三次历史性选择。要作出正确的抉择，就要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有正确的认识，老老实实道歉认罪，并为表示真诚而作出适当的赔偿，这大概不仅是笔者本人，也是发自12亿中国人心灵深处的强烈呼声。

江泽民主席1995年8月12日会见日本《朝日新闻》社长时明确指出：“正确对待中日关系史上那段不幸的历史，既是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两国面向未来，发展世代友好的重要条件。”笔者越来越感到江泽民主席这段话具有特殊的份量。在世纪交替之际，日本只有正确认识近代中日关系，才能在第三个十字路口避免走历史老路，真正与中国及亚洲人民保持友好关系；只有真诚地作出反省，才能抚平中国和亚洲人民心头的创伤，取得信任，从而减少不必要的摩擦，这是日本最明智的选择，也是笔者编著此书的最大愿望。

为澄清事实，驳斥日本右翼分子散布的种种谬论，笔者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记述日本右翼分子散布的种种掩饰军国主义战争罪恶的奇谈怪论，开列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和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制造的一系列争端，描绘一幅日本的外在形象，描写了一些反映中日间重大问题的事件，引读者读下去。这些大都选自作者自己和与人合写的著作，也引用了著名中日问题专家的一些精辟论述，有些未一一列明出处，在此一并表示感谢，请予指正。

作者1996年10月于北京

第一章关于侵华纲领的争论

亚洲各国及中国，对日本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对外进行扩张，向日本政府频频发出警告，这绝不是耸人听闻。

当日本追随美国抛出所谓"中国威胁论"，意在挑拨中国同友邻国家关系，企图孤立中国，遏制中国的时候，殊不知，早在70年前一个侵略中国和东南亚的蓝图和实施纲领--《田中奏折》就已策划好了。这个野心勃勃的侵略阴谋被披露后，立即震惊了整个世界。

为了获得这一绝密文件，苏联克格勃出价30万日元；美国出价25万美元。

然而，日本一直否认它的存在。但，历史是不容篡改的。……在中外历史上，从未有任何国主义的侵华纲领--《田中奏折》那样，引起全世界范围内的激烈争论，70年来一直引起人们的强烈兴趣。

使人感到吃惊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竟把其侵略中国和世界的纲领说得如此露骨：如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以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

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和日本官方及他们的御用文人，一提到《田中奏折》就气急败坏，如同挖了他们的祖坟，调动一切宣传工具宣称绝无此一奏折，挖空心思否认它的存在，硬说这是"膺品"、"伪物"。一份文件使人们惊奇地发现，世界各大情报集团都对这一文件趋之若鹜，苏联克格勃拿出30万日元（编者注：当时日元和美元之比为2：1强），通过日本外务省高级官员高价求购，美国情报机构也愿出25万美元势在必得。

一份文件能在国际范围内引出如此惊心动魄的故事，引起如此激烈长期的争论。在中外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我衷心叹服，爱国华侨蔡智堪奉张学良将军和他的外事办公室主任王家桢之命，潜入日本皇宫天皇御书库偷抄出《田中奏折》的义举，本身就是20世纪30年代世界情报史上的杰出篇章，充满了东方谍报战的鲜明特色，堪称中华男儿的情报杰作。

这个《田中奏折》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东南亚、打败美国 and 苏联等世界强国，称霸全世界的侵略蓝图和实施纲领，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命根子。因此它被中国公开披露后，就引起日本政府的极大震动，竭力否认《田中奏折》的存在。

几十年来，日本右翼都断然否定它的真实性。现在，日本右翼势力仍编造种种理由，否定日本军国主义这个侵略纲领。

那么，《田中奏折》能否定得了吗？

一、家仇国恨

——关东军设阴谋炸死张作霖，企图乘乱出兵占领东三省，张学良化装潜回奉天，含悲愤与杀父仇人巧周旋，心下已定易帜归顺中华民国政府。

1928年8月5日，北国奉天大帅府，哭声震天，丧幢铺天盖地，青砖黑瓦、朱门红柱的古朴典雅的大青楼变成了充满哭声的白色世界。

张作霖的灵堂正中摆着长条供桌。供桌上，燃烧的白蜡烛流着愤怒哀悼的眼泪，袅袅的轻烟自一个个香炉冒出，慢慢汇成团团烟雾，在灵堂内盘旋上升，更增加了灵堂的悲痛气氛，压得人们简直喘不过气来。

主祭人张学良身穿脏得变成灰色的孝衣，双手拜"父亲，您老人家死得好惨啊！不报父仇，学良誓不为人！"张学良猛一抬头，突然看见站在一旁的大帅府顾问土肥原贤二和町野武马的脸上，挂着滴滴泪珠，充满忧愁的神色，心里不由犯开了嘀咕，觉得与他匆匆自华北赶回东北后得到的情报不符。

张学良回奉天后，看了他的外交秘书主任王家桢送来的一份审讯记录，就明白了谁是他的杀父仇人：我们数人在南满站做小工，因吸食白面，被日本警察抓走，拘留在一处，也没有审问。先给我们剃头洗澡，然后换上我们穿着的这身新衣和新鞋，并且给我们吃好的，喝好的。住了几天以后，昨天半夜忽然把我们几个人叫出来，带到南满铁路桥的地方，对我们说：“你们随便走吧。”当时我觉得莫名其妙，可是我准知道日本小鬼子没安好心眼，我早就提防上了。果然，这时过来几个日本兵，一语未发，用枪刺向头先的几个人就刺。我一看不好，撒腿就跑，拚命逃进城来，那几个人死活不知。不久，大帅的专列就被炸翻在这座桥下。

张学良由父亲被炸死之事，自然想起张作霖第一次被日本人谋杀的情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策划"宗社党"搞的两次"满蒙独立运动"，都因张作霖的武装震慑而流产。1916年5月，裕仁天皇的叔叔闲院宫便令土井少将除掉新上任的威武将军张作霖。

土井少将接到密令，马上来到奉天满铁附属地，纠集日本浪人伊达顺之助、三村丰等组成"满蒙决死团"伺机行动。

1916年5月27日，驻旅顺的关东军都督中村雄次郎到奉天活动，张作霖乘俄式马车前往奉天车站迎接。归途经过小西便门时，日本陆军少尉三村丰等从临街窗口突然向俄式马车投了一颗炸弹。

张作霖急中生智，在混乱中，他像灵敏的猴子一般骑车乘马，改换奉军士兵服装，绕道奔回威武将军署。日本阴谋家不知详情，马上派日本的奉天铁道守备队长和驻奉天总领事以慰问为名，来探听虚实。

张作霖气得大发雷霆：“他妈拉巴子的，小鬼子真不是东西！要是再骑着脖子上拉屎，老子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日本站（沈阳南满铁路附属地）屠了，所有男女老小鬼子，一个也别想活！”那时，王家桢又向张学良提供了日本关东军借张作霖被炸之机，蠢蠢欲动的秘密情报：以大帅府顾问为伪装的日本侵华间谍土肥原贤二、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板垣征四郎企图以炸死张作霖为契机，出动关东军，趁东三省治安混乱之际，一举解决"满蒙"问题，夺取我东三省大好河山。但因张学良及时赶回奉天，采取慎重态度迅速做好秘不发表的应变准备，日本侵略者不知张作霖生死详情，加之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已做好向京奉铁路沿线出动准备的关东军，才一时未敢贸然行动！

张学良还从张作霖被炸前后的复杂事件中，发现了杨宇霆、常荫槐勾结日本军国主义者图谋不轨的可疑现象：1928年6月4日，张学良最早得到父亲负伤的消息时，还在邯郸北临洛关车站督师。他的参谋长杨宇霆旋风般冲进司令部，递给他一份电报。

张学良接过电报一看，是日本人说奉天炸车案是杨宇霆密谋推翻张学良的行动，猜测张学良要将杨宇霆处决。

张学良看罢，只微微一笑，未置可否，就随手划火柴烧掉，命卫兵拿来茅台酒，两人各怀心事对饮起来。

酒过三巡，杨宇霆又从口袋中掏出一份长电，往张学良面前一掷。张

学良强压着怒火，拿起电文一看，原来是日本军方的公开声明：当张作霖返回奉天之际，中国方面于6月3日提出，拟在京奉、满铁两铁路交叉点和满铁沿线配置中国宪兵以资警戒的要求。日本守备队虽接受了在京奉、满铁交叉点配置宪兵的要求，然而拒绝了在满铁线路上配置宪兵的要求。

因而，桥梁系由日本守备队警戒。4日上午3时左右，有3个行踪可疑的中国人企图爬上满铁线的堤岸。日方监视兵走近，问他们是谁。他们却要向日本士兵投掷炸弹，因此，日军当即击毙其中两人，另一人逃走。

检查尸体时发现炸弹两枚、书信3封。其中一为国民军关东招抚使信件之断片，当系南方之便衣队员无疑。4日拂晓，日方警戒士兵执行勤务时发现，当京奉线东行列车驶至交叉点时，随着一声爆炸巨响，桥梁附近黑烟与灰尘冲天而起。

杨宇霆等张学良看罢电文，端起一杯茅台酒，边喝边别有用心地为日本人开脱：“大帅离开北京的时间和车次都属高级机密，日本人哪能那么快就了如指掌？大帅通知日本人说2日走，日本人还认为列车早已在3日深夜到奉天了！”张学良由此对杨宇霆与日本的关系有所怀疑，因此在保定见到奉天省省长刘尚清派来的心腹密使吴德明时，就对杨宇霆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

当张学良从刘尚清的信中，知道张作霖已被炸身亡时，顿时面色苍白，浑身乱抖，吴德明的轻声劝告和请求又使张学良大吃一惊：“少帅，务必保重--请将我枪毙了吧！”“为什么？有这个必要吗？”“我出不去了，杨总参谋长早派人盯上了我，已为我准备了许多子弹！只有我死，少帅才能平安返回奉天城啊！”“你是我的恩人哪。……”“这是关系到日本吞并东三省的大事，我为东三省父老不受日本人欺侮而死，值得！”吴德明说着，猛然举起酒杯用劲向张学良背后的墙上摔去，口中大叫：“我和你这个无情无义的东西拚了！”随着“哗啦”一声脆响，站在门外的卫兵一拥而入，见吴德明正抡起椅子向张学良砸去，便一齐开火，将吴德明击毙。

张学良当夜给杨宇霆留下一张纸条：“我已动身回奉，请杨总长按计划撤军。”然后剃光胡须，换上灰色士兵服装，悄悄乘火车返回奉天，才又给杨宇霆发去四字电文：“学良到奉。”杨宇霆看罢，气得咬牙切齿，但又无可奈何。

最近的“大帅遗嘱风波”，更使张学良感到头痛：1928年6月24日，东北保安委员会就要开始选举总司令时，常荫槐突然跳将出来，当众宣读了他和杨宇霆合谋伪造的《大元帅遗嘱》：余不幸归途遇难，今病势已笃，殆朝暮人间矣！

余自束发从军，早自誓以身报国，生死置之度外。现年已五十有四，死亦非夭，唯是救国之志未遂，不免耿耿耳。今以奉天重任，付之学良，望汝善为料理。……杨宇霆听到这里，迫不及待地鼓起掌来。他的几个追随者马上跟着也拍起手来。

杨宇霆、常荫槐的如意算盘，是假造遗嘱让张学良就任奉天省长，把老好人张作相暂时捧上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宝座，再伺机取而代之。杨宇霆循此计谋，骄横地以父执口气施加压力道：“学良，遵照大元帅遗嘱，你担起奉天省的重任吧！”张学良听了微微一笑，从西服口袋里从容掏出一页纸高声宣告：“刚才念的《大元帅遗嘱》纯属伪造，真正的大帅遗嘱在这里，这才是真正的大帅手令，请诸位听清了：‘我不幸被炸，在我养伤期间，一

切职务交张学良代理。张作霖。"张学良读罢，随手递给亲信秘书王家桢，传给众人阅览。

原来，这是前一天晚上，经王家桢提醒，张学良模仿父亲的笔迹写就的，真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连王家桢都深感惊讶，何况他人？恰在此时，张作相及时赶到。只见这位老把叔双手高托重有千斤的保安总司令军服，双膝跪倒尘埃，声泪俱下地坚辞不就，才把张学良推到了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交椅上。

"这些东洋鬼子，我恨不得吃他们的肉，抽他们的筋……"张学良跪在父亲的灵位前暗暗发誓。深重的国仇家恨使27岁的少帅头脑顿时冷静下来。他慢慢用孝衣袖口擦把眼泪，双手支地站了起来，缓缓走向灵堂右侧的主祭人位置。

这时，灵堂里突然响起一阵骚动声，身旁传来阵阵耳语："小鬼子真不是东西，怎么抢到了前面？"张学良抬起泪眼一看，心里很不高兴，就要厉声痛加指责。

原来，町野武马双手捧香跪在张作霖的灵前，两行眼泪也不知从何而来，竟然哗哗直流，少帅心里不禁暗自思忖："按东北风俗，我敬完香后，应该学铭弟敬香，你町野武马再与父亲有交情，也不该抢在学铭弟之前。……"张学良又转念一想："町野顾问常说与父亲有生死之交，看他如丧考妣的样子，好像也真动了感情！小鬼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张学良心里正在七上八下乱猜疑，由于连日操劳，加上晚上着凉，突然要打喷嚏，但马上觉得在父亲葬礼上万不能如此放肆，就强把喷嚏压了回去，满脸憋得通红，重重地咳嗽了一声。

"张将军，请节哀！"町野武马一句话，把张学良从沉思中唤回，见町野武马满面泪痕，只得敷衍道："町野顾问，请对我多加帮助。我父亲的财产也要分些给你。跟过去一样，银行里的钱你随使用好了！"町野武马见张学良头发蓬乱，脸色苍白，双眼凹陷，腮帮塌落，觉得此"阿斗"软弱可欺，暗想：我町野武马早年受帝国参谋本部派遣，以顾问身份控制张作霖；现在这位"胡帅"成了帝国夺取满洲的绊脚石，才被帝国谋略机关一脚踢开！试看今日之奉天，还不是很快变成日本的天下！你张学良这个"阿斗"，还不是我掌中之物？町野武马用眼的余光瞥一眼泪流满面、神情憔悴的张学良，将仁丹胡子一擦，道："本顾问早与先大帅约定共生死、取天下，帮他从一个马上英雄爬上东北王的宝座。当年先大帅亲口对我言讲：'你归化中国好了，我给你当督军！'今天，我对张总司令的回答，仍和当年一模一样--"身材矮小的土肥原贤二往大个子町野武马跟前凑问道："请问町野顾问，你作何回答？""一分钱不要！如果你做了满洲土皇帝，要把满洲给我，那还差不多！"说得好，我们就是要满洲！"土肥原贤二神气地凑上去说起了双簧，又回过头问身边的杨宇霆："邻葛先生有何高见？"张作霖被炸死后，杨宇霆暗中与日本军国主义者勾结，正以关东军为靠山，夺取东北军政大权。此时，他两边都不得罪，只彬彬有礼地回答："本人才疏学浅，愿听两位顾问高论！"土肥原和町野正要大发议论，突然响起洪钟般的斥责之声："此话怎么味道不对？请问你是哪国人士？"土肥原、町野、杨宇霆如听到晴天霹雳，突然惊得目瞪口呆，张口结舌，顿时语塞，还是土肥原狡黠异常，马上镇静下来，对来人深鞠一躬，满面笑容地问："请问你是什么人？""中国人！"只见一个身穿鱼白色翻领西装的高个子中年人堂堂正正站在众人面前，扬起的眉宇

间透出一股浩然正气，不慌不忙地捧着三炷檀香，朝着张作霖的灵位深鞠一躬，虔诚地恭表悼念之情，然后斜退一步，从西服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恭恭敬敬递给张学良。

众人齐把目光转了过来，好奇地猜测这位神秘人物到底是谁？张学良见此人举止文雅，沉着老练，一双浓眉大眼在金丝脚的茶色墨镜后面炯炯有神，先对此人有了几分敬意，遂低头看手中的名片：派方本仁，请接洽。

兄蒋中正张学良知道此人就是蒋介石派来和他进行秘密谈判的代表方本仁，心中大喜，正要启齿说话，却见方本仁微微一笑，抢先自我介绍道：“本人行不改名，坐不改姓，走到哪里都姓刘名光！怎么样，老朋友，几年不见，不认识了？”张学良忙接过话茬儿，顺手推舟介绍：“这是我的朋友刘光！”“刘光？他是哪一路神仙？”土肥原贤二心中生疑，见张学良对他执礼甚恭，晓得此人颇有来头，而张学良刚才收到的名片肯定大有名堂，就对身旁的彭汉贞笑道：“彭老四，你不是最善于交朋友么？刘先生这样的朋友真是难得！”浓妆艳抹的彭汉贞一直担任大帅府和日本方面的联系人，是个可与川岛芳子并列的女汉奸。她早年被张作霖送到日本留学，早就投靠了日本军部，又在几个关键问题上帮过张作霖的忙，可以自由出入大帅府。

彭汉贞听到土肥原一声吩咐，忙扭动腰肢，凑到方本仁面前笑嘻嘻地主动握手道：“刘先生英气勃勃，鹏程万里，跟你交个朋友好吗？”方本仁见面前突然跳出个漂亮女人，情知此人必然大有来头，只得勉强虚与周旋。

张学良见方本仁被彭汉贞缠得无计脱身，就匆匆走到彭汉贞面前，以十分厌恶的口吻为方本仁解围：“彭老四，别缠住刘先生不放，我还与刘先生有急事要谈呢！”张学良说着，走上前拉住方本仁的手并肩而行，离开灵堂。

两人来到陪灵客厅旁的一间密室里，张学良先请客人落座，转身把密室内扩音喇叭的电源插销拔下来，再仔细关好房门，才气冲冲地说：“方先生，你都看见了，我实在受够了日本顾问和那些吃里扒外的坏东西的气，我决心已定，非易帜不可！”方本仁信心十足地笑道：“知学良弟者，介石兄也。所以介石兄让南京政府方面给大帅送了这样一幅挽联：噩耗惊传，几使山河变色；兴邦多难，应怜风雨同舟。”张学良在孤立无援的困境中听到这番话，心里顿时生出一种说不出的感激之情，目光炯炯地向蒋介石的谈判代表表态：“请相信我张学良，决不会甘当亡国奴！”方本仁上前一步，紧紧握住张学良的手，极其热诚地说：“学良弟有胆有识，毅然决心易帜，确实令人敬佩！东北易帜非同小可，对南京政府将是莫大支持，介石兄已把你视为天然盟友；介石兄答应任命学良弟为东北边防军总司令长官、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张学良和方本仁在密室里越谈越投机，兴奋得共同举杯祝贺。为防止日本人捣乱，分别时，张学良让方本仁换了一身佩有上校军阶的保安军官服装，但还是没有逃脱豆腐西施彭汉贞的耳目，彭汉贞又马上报告了她的日本主子。

张学良刚送走方本仁还未来得及喘口气，就见秘书主任王家桢进来报告：“大日本帝国特使林劝助一行前来吊唁！”张学良一听“啪”地将桌子一拍，大声吼道：“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我不见！”王家桢轻声劝道：“目前我们力量不足，还不能与日本人硬拚；再说人家是来吊唁的，你这个主祭人不见不合适啊！还是见见吧，看小鬼子能玩什么新鲜花招儿！”王家桢说着，像劝小弟弟那样把张学良扶出密室，来到灵堂。只见林劝助在关东

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和豆腐西施彭老四陪同下，带着随行人员陆军参谋次长南次郎中将、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外交顾问佐藤安之助中将等人，匆匆忙忙地走进灵堂，微微向张学良点一下头，算是打了招呼，径自走向张作霖的灵位，献上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银质花圈。

张学良正要表示感谢，豆腐西施彭汉贞却早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一把香，首先凑近林劝助，奴气十足地递上一炷，然后又给每个随员一炷，带他们到灵堂前虚情假义地敬香悼念。

盛大仪式还未搞完，彭汉贞又一阵风似地飞到张学良面前指使道：“汉卿，还不快把大日本帝国吊唁特使林男爵请进客厅，好生招待！”张学良厌恶地瞪彭汉贞一眼，勉强地将林劝助一行让进灵堂旁边的客厅。林劝助屁股还未坐稳，就从随行人员手中接过一枚勋章，眉开眼笑道：“帝国政府深知张总司令有志于日中亲善，田中首相特命我把这枚金光闪闪的一等旭日大勋章授给张将军！这是帝国政府的最高奖赏，张将军能得到它，应感到无与伦比的荣耀！”张学良见不共戴天的敌人竟授给自己一等旭日大勋章，像吃下一只苍蝇那样觉得恶心，胸中怒火烈焰般腾腾燃烧，恨不得一手夺过来抛到九霄云外，幸亏心腹秘书王家桢捅了他一把予以提醒，才强压怒火，面带怒容伸手去接。

林劝助将此情景尽收眼底，见张学良随随便便地伸手要接，从鼻孔里冷笑一声，突然把拿勋章的手缩了回去。张学良稍一吃惊，林劝助大卖狗皮膏药道：“在大日本帝国，授予一等旭日大勋章，要举行极其隆重的典礼仪式，最起码要有西洋乐队伴奏！”“那是日本的做法。”张学良剑眉一挑，朗声回答：“按照中国风俗，在父母大丧期间，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大元帅灵柩就在后面，我岂能做不孝之人？学良宁肯不要贵国的一等旭日大勋章，也不能在父亲灵堂使用西洋乐队！”“授天皇陛下的一等旭日大勋章，必须按帝国的做法办！”“岂有此理！”王家桢见双方剑拔弩张，坚持己见，互不相让，怕把事情弄僵贻误大局，建议采取折中的办法，改用留声机放送日本歌曲，林劝助和张学良才勉强同意。

于是，在日本歌曲声中，林劝助亲手把一枚一等旭日大勋章，挂在张学良的胸前。金光闪闪的日本皇家勋章和又脏又破的素缟孝服、满脸不乐意的张学良和盛气凌人的林劝助，都显得极不协调。

林劝助见张学良戴上了皇家的一等旭日大勋章，便想起了他7月21日由东京出发前，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指示：如共产分子进入满洲，帝国的经济基础将遭破坏，且危及帝国对朝鲜的统治，故须彻底防止。为促进中国之统一而牺牲我对满洲之信念，断无必要。

盖多年来协助中国之统一，同时亦即在于实现我对满洲之所欲。有人认为实行三民主义，悬挂青天白日旗，亦无所谓，但我则认为决不可行。如将满洲之事与南方政府交涉，则可能成为国际问题，应坚决避免！

林劝助深知田中义一指示的基本精神，是“协助中国统一的目的完全在于使日本为所欲为地统治满洲”，便抓紧时机把谈话转入正题：“据日本方面情报，张总司令已向刘尚清省长秘密下达手令，命小津桥被服厂和小南门里被服厂日夜加班，赶制青天白日旗。请问张总司令，这是何道理？”张学良正要开口据理驳斥，突然一个秘书手持一份文件匆匆推门进来，神色紧张地递到王家桢手中。王家桢飞速一览，迅速双手递到张学良手中：“汉卿，急电！”张学良一看，原来是王家桢设在东京的谍报组成员蔡智堪发来的急电，

便匆忙看了下去。张学良看罢勃然大怒，随即把电报第一页的情报来源部分交给王家桢，又把电报其他部分气哼哼地塞给林劝助，辛辣地讽刺道：“林男爵，这就是你此次来华的真正使命！你口口声声为家父吊唁的善意在哪里？你对此作何解释？”林劝助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忙接过电报看道：吊唁特使林劝助已派往奉天，如果张学良仍然不能领会日本政府的善意，日本政府将被迫采取积极手段，以保护日本在满洲的权利，帝国政府已做好了应付重大突然事变的准备。……张学良不等林劝助看完，就怒火满腔地高声指责：“林男爵，你还有什么话说？”这林劝助曾两次担任驻中国公使，是个老奸巨滑的“中国通”。他深知自己的身份很微妙：不是日本政府的特使，而是首相田中义一的个人代表或特使。知道这是出于田中义一的惯技，可以由田中义一和森恪根据形势发展，而随时通权达变，纵横捭阖。他面对张学良义正辞严的指责，脸不发红心不跳，只轻轻向他的随员佐藤安之助使了个眼色。

佐藤安之助是田中义一的亲信，田中派他来监督林劝助，更坚决地贯彻军部的意图，林劝助则利用他当枪使。因为佐藤安之助早年长期在奉天供职于满铁机关，是日本有名的“中国通”。特别是此人才高气锐，暴虐残忍，做事不计后果，常常肆意损伤他人的感情，连日本军部方面对他也素有恶感，日本外交官员对他更惧怕三分。

佐藤安之助见张学良如此威武不屈，便摆出堂堂日本陆军中将的威风，目露凶光，不可一世地给张学良来个“下马威”：“张总司令，你如果没有耳背之疾，请听听外面的响声！”听佐藤安之助一说，客厅里马上安静下来，人们都侧耳倾听。

此时，轰隆隆的大炮声如响雷震天，不绝于耳。

佐藤安之助冷笑两声，将大嘴巴上的仁丹胡子一撇，盛气凌人地高声大叫：“诸位都听到了吗？那不是你们支那人过年过节放的鞭炮声，那是关东军在浑河两岸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的大炮声！本中将在此敬告诸位：在奉天国际大马路和南满铁路各火车站，关东军都设置了刺网和障碍物；奉天城里的各家日本人医院，都插起了伤兵站的十字旗！几十万关东军兵精粮足，士气高昂，正愁没有用武之地，你们想尝尝关东军的厉害吗？”年轻气盛的张学良将军听了佐藤安之助充满火药味的威胁之辞，气得脸发青，手颤抖，好半天说不出话来。佐藤安之助以为张学良已屈服于他的淫威之下，得意地纵声大笑：“哈哈，不愧是聪明绝顶的张少帅！本将军早知道你是识时务的俊杰，只要与大日本帝国乖乖合作，保证少帅前途无量。……”“一派胡言！”张学良正要借机大发雷霆，把这帮可恶的日本强盗轰走，却见王家桢给他送来阻止的目光，知道要适可而止，不把事情做绝，便不理佐藤安之助，转身厉声质问佐藤身旁的林劝助：“林特使，这就是你讲的中日亲善？”林劝助见用佐藤安之助这张牌没吓住张学良，只好连声陪笑，亲自出马来战：“本特使的使命只是代表帝国政府和田中首相参加张作霖大元帅的葬礼，并向张学良将军表示同情和慰问，并未带有其他任何正式的任务！”“既然如此，林特使的使命已经完成，可以回东京复命去了！”林劝助见张学良公然下达了逐客令，并亲自拉开了客厅门，气得面红耳赤，但他毕竟是老资格外交官，很快把无名怒火强行压下，面带微笑说：“本特使从东京出发之前，田中首相亲自委托我与张总司令会见时，除表示吊唁哀悼外，还要我特地向张将军表明：帝国政府将以诚意支持张少帅。

为在东三省改善日中关系，帝国政府已有在必要时废除领事裁判权的

准备。所有这一切，帝国政府都将以林久治郎总领事为唯一代表，与贵方进行友好商谈。希望张总司令能对林总领事予以充分的信赖！”张学良并未被这一番甜言蜜语迷惑住，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促使他精神抖擞地乘胜追击：“尊敬的特使先生，请回答我刚才的问题，关于你来华使命的电报是真是假？”林劝助淡淡一笑，暗使缓兵之计：“对这个电报的真实性，本特使不敢马上妄加断言，还有待我和田中首相通过电话之后才能证实！”林劝助挂出免战牌后，像条老泥鳅一般向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身后一钻，把林久治郎推上了第一线。

林久治郎清了清嗓音，想在林劝助面前表现一番，便皮笑肉不笑地提出核心问题：“张总司令，我来奉天上任后，多次拜见将军，我们已是老朋友了。关于在东三省改挂青天白日旗一事，你已同意同林男爵会晤之后再作决定。向南方妥协之事是否已停止进行？”张学良见林久治郎直接提出了核心问题，为不让日本方面纠缠不休，干脆痛快地回答：“此事准备近期内抓紧办理，希望日本方面多加关照，日本的正当权益一定充分照顾！”日本方面对这样明确的回答都大吃一惊：林劝助惊得目瞪口呆，林久治郎摇头不止，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和佐藤安之助直着脖子哇哇怪叫，还是林劝助狡猾异常，很快镇定下来，示意林久治郎继续进攻，他在一旁冷眼旁观。

林久治郎见林劝助如此看重自己，使邪劲十足地重新攻了上来：“向南方妥协与帝国权益不能两立，东三省的主政者要想与帝国亲善，无论如何不能搞南北妥协！”“学良既要与国民政府合作，也要同日本保持亲善关系！”“这是不可能的，二者必居其一！”对此，张学良不屑置理。

林久治郎气得嘴唇上的小嘎巴胡子猛烈颤动，咆哮如雷：“如果实行南北妥协，就等于无视大日本帝国的权益，也就是对大日本帝国的抗拒！”“那也没有办法！”张学良铁口钢牙，蹦出这六个字来，就再也默默无语，毫不理睬了！

会客室里出现了窒人气息的短暂沉默，林久治郎暴跳如雷，土肥原贤二、町野武马、林冈长太郎等人眼里射出逼人的寒光，林劝助万般无奈，只得又披挂上阵：“本特使是奉田中首相的命令，提出东北易帜问题的。帝国政府认为，满蒙是日本付出重大牺牲才获得特殊权益的地方，它是大和民族的生命线。为了日本的命运，不得不时刻关心东三省的前途！”张学良虽对林劝助以教师爷口吻教训自己，感到很不是滋味，但考虑到父亲死后的困难处境，只得以婉转的方式，表达自己义愤填膺的心情：“日本在东北的利益一定注意保护，但易帜问题纯属中国内政，贵特使不会肆意干涉吧？”林劝助被驳得理屈辞穷，终于凶相毕露，咬牙切齿地吼道：“大日本帝国不许你擅自易帜，不准在东北挂青天白日旗！帝国政府有此坚定决心，即使被指责为干涉内政，也在所不惜！”张学良见林劝助终于露出了狰狞面目，苍白的脸上不由露出会心的笑容，更义正辞严地庄重宣告：“作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我不能违背东三省几百万父老乡亲的意志。东三省民心倾向中国统一，谁也无法阻挡！”女汉奸彭汉贞见双方唇枪舌剑，战得难解难分，便适时跳了出来，恬不知耻地指着张学良和林劝助笑弯了腰：“二位都是我的好朋友，有我彭老四在，还有什么解不开的扣儿？看我彭汉贞的面子，双方握手言和吧！”林劝助见动硬的压不服张学良，又想到首相田中义一的临别指示：“对张学良必须软硬兼施，不要把他逼得心倾南方！”便趁着彭汉贞的话就坡下驴：“本特使多年在支那供职，结交了许多支那朋友，与先大帅就是好朋友！”

论辈份，你是侄子！先大帅不幸归天，我做为幸存者，有责任不使你这个侄子落入危险的泥潭！”张学良见杀父仇敌装作慈善长者，在自己面前摆起臭架子，感到人格受到莫大污辱，不由怒火升腾，机智地站在上风头，从他们最崇敬的“活人神”裕仁天皇身上开刀还击：“真是上帝的巧妙安排，使我与贵国裕仁天皇陛下同庚。

因此，你们应该像启奏天皇那样跟我讲话！”佐藤安之助、土肥原之流见张学良以他们的最高统治者天皇自况，恨不得一口把张学良吞到嘴里，嚼成肉末以解胸中之气。

林劝助怕武士道军人把局面搅得一塌糊涂，影响他的首要使命，便威严地摆手制止军国主义分子的蛮横叫嚣，尽量将恶意化作微笑，往皱皱巴巴的老脸上堆：“本特使的比喻虽可能有令总司令误解之处，但本特使的本意是诚恳地提出劝告。蒋介石是何等货色，张总司令想必比我更为清楚，你投降一个青红帮头子，能捞到好果子吃？我这样做，既是为了保护大日本帝国的利益，也是出于对张总司令的友谊！”“贵国的友谊，本人早已领教过了！”张学良冷笑一声，机智地软中带硬地回答。“我既与贵国裕仁天皇同庚，就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裕仁天皇能统治日本岛国，我也有自信治理好东三省，更不容外国人干涉我们的内政！”

张学良怒火满腔，说出的话，字字句句犹如射出的重磅炸弹，把一个个日本强盗炸得焦头烂额，纷纷撕破吊唁特使、外交官和顾问的华丽外衣，野兽般疯狂叫喊：“当面污蔑万世一系的天皇，真是大逆不道！”“竟敢向堂堂关东军挑战，让他们尝尝关东军的铁拳！”张学良看自己把一个个日本侵略者整得原形毕露，丑态百出，心中隐隐升起一种从未有过的快感。为不把事情弄僵，便只含笑倾听静观，再不发一言。

林劝助看他这一班人马被张学良杀得丢盔卸甲，狼狈不堪，色厉内荏地说了句：“张总司令，莫把大日本帝国的警告当作儿戏！”便带领一千兵将，愤愤拂袖而去。……一连几天，大帅府顾问町野武马、土肥原贤二、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日本政府吊唁特使林劝助、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走马灯般把大帅府的门槛都踢烂了，对张学良实施轮番轰炸，威逼他放弃东北易帜的打算；张学良的顾问端纳、蒋介石的谈判代表方本仁、白崇禧的代表何千里，频频催他早日易帜；与张家素有交往的豆腐西施彭汉贞更凭着特殊灵敏的嗅觉，不时出现在张学良面前，替日本人向张学良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在频繁的内外交攻之下，年轻的少帅陷入了极度苦闷之中。不几天，就累得塌了腮帮。

一天，他正在办公室批阅文件，蓦然之间，他看到那本令人讨厌的《日本外史》又摆在办公桌前。

原来，这是大帅府顾问土肥原送来的“特殊礼物”--那天，张学良正在埋头办公，突然，日文翻译陶尚铭引土肥原贤二向他走来了。

土肥原贤二边向前走，边摇头晃脑、有板有眼地哼着谭派京剧唱腔：“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忽只见司马懿他发来了大兵。……”土肥原手中挥舞着一本书，故意把“发来了大兵”五个字唱得山响，借此向张学良施加压力。军国主义狂热使他把矮小粗壮的身躯跳到张学良面前，在张学良面前耀武扬威开言道：“张总司令，我送你一本《日本外史》，这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赖山阳的大作。他把年轻的丰臣秀赖的可怜处境描写得活灵活现。因为不听他岳父德川家康的摆布，结果被德川家康无情杀害，葬送了父亲丰臣秀吉打下的江

山。今天东三省的实际情况，和我们日本当年德川幕府初期何其相似乃尔！"陶尚铭秉承日本主子的旨意，也以"日本通"身份敲边鼓："那丰臣秀赖虽年少英俊，聪明机智，但他父亲丰臣秀吉死后，顿时失去靠山，结果被德川家康发动政变杀害，德川幕府由此诞生！张总司令，你可别做第二个丰臣秀赖啊！"土肥原贤二见张学良沉默不语，以为他害怕了，更加趾高气扬地威逼利诱："我已把这本书的重要段落用红笔特意标出，请张总司令阅读时悉心体味，我以老朋友的身份奉劝张将军，还是搞东北独立，当满洲王好。你也不必费劲儿办什么东北大学，工科人才由我们的旅顺工大代你培养，文科和法科人材可送留学生到日本免费留洋，由日本帝国代为栽培。如果和大日本帝国作对，恐怕。……"“恐怕什么？”“恐怕逃不脱做丰臣秀赖第二的下场！”张学良真想跳脚大骂土肥原欺人太甚，但想到东北军溃退回来后元气大伤，只得暂时忍下这口气，不冷不热地回答："感谢土肥原君的美意，你的意见我一定慎重考虑！"张学良想到这里，恨得咬牙切齿，跳起来，一把抓起土肥原送给他的那本《日本外史》，狠狠地朝门外摔去，开口大骂："真他妈欺人太甚！"恰在此时，张学良的心腹秘书主任王家桢手提黑色公文包走了过来，《日本外史》正好摔在他面前。

王家桢弯下高大的身躯，伸手拾起落在地上的书一看，便全然明白了少帅发火的原委。

他一边回身把《日本外史》放回书架上，一边思考怎样使少帅平息雷霆之怒。

张学良余怒未息，苍白的脸上滚下几珠受辱的眼泪，气愤地骂道："生为堂堂须眉男子，杀父之仇不但不能痛痛快快地去报，却还要在不共戴天的仇人面前低声下气，我当成什么鸟总司令了！"“汉卿，请息怒。”王家桢递上一杯热茶，婉言相劝。

"王处长，你是最了解我的了。"张学良推心置腹地说，"自大帅归天，我已认定日本鬼子为杀父仇人，因而冷落了通敌的陶尚铭、彭汉贞一伙汉奸，决心起用以你为首的青年班底。我相信，你是不会使我失望的。我坚信，我们年轻人干得比谁都不赖！"“感谢总司令的信任！为今之计，我有四字方略！”“哪四字方略？”张学良精神为之一振，眼角更尖，眼皮更薄了。

“韬光养晦！”“韬光养晦？请道其详！”“就是要沉着应付，能忍辱负重，凡事收敛锋芒，隐藏才能行迹。……”“等到条件成熟时，再一举报仇雪恨！”

“小不忍，则乱大谋！”两个年轻人的四只大手有力地握在一起，共同筹划韬光养晦的大计。临了，张学良胸有成竹地说："对，我们目前既不能屈从于有杀父之仇的敌国，又没有足够的本钱同日本人硬拚，只能靠国家统一谋求出路。在易帜之前，必须以灵活的外交同日本周旋！"“为摆脱困境，必须加强驻日本办事处的工作，搞清日本侵略中国的新阴谋、新动向！”“好！干这件事，花钱再多也值得！我完全支持！”张学良"啪"地将桌子一拍，痛下了最大决心。

王家桢听了欣慰地一笑，"啪"的一声打开公文包，从中抽出厚厚一叠文件，双手递给张学良："蔡智堪他们真能干，凭着一颗炎黄赤子之心，很快搞到了日本田中内阁召开东方会议的秘密情报，请总司令审阅！"张学良郑重接过，立即像被强有力的磁石吸引住了，边看边赞不绝口："真是雪中送炭，真有传奇色彩--"于是，张学良、王家桢向东京下达了指令。蔡智堪接到指令时，却有日本外务省次官森恪等人在场，引起了森恪的疑心。……

二、“东方会议”

——田中义一召开雄心勃勃拟定侵略方策，日本天皇颌首笑肯《田中奏折》，战争“精英”会聚东京樱花树下，一面向中国东三省举起屠刀，一面向蒋介石放下鱼钩。

四月的东京，正是色彩绚丽的大好时节，杜鹃盛开，玫瑰待放，那绯红的轻云般的樱花，更使人流连忘返，心旷神怡！

日本退役大将、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的心情此时和东京的天气一样好。他听了铃木贞一关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屠杀和4月18日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的报告，立刻把他的密友森恪请来，商量推翻若槻内阁的方策。

田中义一晃动日本人少有的高大身躯鼓动说：“蒋介石有手腕，有胆量，我们要借他的东风，把权夺过来！”田中义一借日本发生金融危机之机，集中攻击若槻内阁的对华政策，终于在1927年4月20日推翻了若槻内阁，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狂热叫嚷声中登上日本首相宝座。当晚在东京豪华气派的“满清酒楼”举行盛大宴会，招待日本军政财界要人、皇室权贵和黑龙会、犹存社等黑社会巨头。田中义一胸前挂满皇室勋章，得意洋洋发表讲话说：“本大将，本总裁，本首相奉陛下大命组阁，将善体圣意，着重解决财界和外交问题。

本首相将亲自兼任外务大臣，并请森恪君出任外务次官！”这森恪有“东亚新体制先驱”之称，主张向外侵略，一直与军部密切勾结，是推行大陆政策的急先锋。军国主义分子们一听说由他担任事实上的外务大臣，都一起欢呼起来：“森恪君出山，进军满洲！”粗壮敦实的森恪受到军国主义狂热的强烈感染，当众发出誓言：“帝国的出路在满洲，抓住时机一举解决满洲问题！”森恪的表态引起各界权贵的一片称赞声，田中义一深受启发，又向他的支持者保证：“本首相矢志改变软弱无能的币原外交，担负起全面更新帝国对华外交政策的使命，重建新的外交机制，打开对华新天地！”宴会后，田中义一把森恪和铃木贞一请到首相府客厅，向铃木贞一询问道：“你是蒋介石的老同学，又长年委身于多事之秋的中国，以过人的间谍才能周旋于蒋介石近侧，为帝国征服中国立下汗马功劳，依你之见，蒋介石在短期内能统一中国吗？”铃木贞一微微摇摇头说：“我接受东久迩亲王殿下钧旨，和几个帝国陆军军官组织了个研究会，成员有石原莞尔，他足智多谋，聪明能干，还有天皇陛下的侍从官町尻量基子爵和战略奇才阿南惟几！”田中义一看铃木贞一来头不小，不禁肃然起敬，老老实实问道：“你们对蒋介石有何看法？”铃木贞一稍作沉思，侃侃而谈：“蒋介石是中国目前最有希望的人物，但他还不能在短期内统一中国！”“这是为什么？”森恪厉声问道。

“起码有三个原因：第一，中国军阀、土匪各霸一方，张作霖、阎锡山都不会向蒋介石俯首称臣！”“对，张作霖就是东北土霸王！”田中义一与张作霖早有勾结，对这个东北王颇有了解。

“第二，中国的军阀都有外国人作靠山，列强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决不允许其他势力插手！”森恪用力将胖头一点道：“不错，就说我们日本帝国吧，绝不会坐视蒋介石驱兵进入长城以北，染指东三省！”“第三，孙中山各怀异

志的弟子，绝对不会全心全意地臣服蒋介石。蒋介石手下大将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都不是省油的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向蒋介石背后戳上一刀！”田中义一忽然又想起一个问题：“你们铃木研究会，对中国共产党有何高见！”铃木贞一对此早有调查研究，以轻蔑的口气说：“中国共产党这次被蒋介石大开杀戒，元气大伤，暂时成不了主宰当今中国的政治力量，但任其发展下去，大日本帝国在中国的头号敌人，势必是新兴的共产党！”田中义一见到铃木贞一说得头头是道，心悦诚服请教道：“依你之见，我们应采取何种对华政策？”“我们要脚踩南京、北京、奉天三只船，重点拉拢蒋介石，对付中国共产党！”田中义一杀气腾腾说：“是啊，倘若共产党一旦在中国活跃起来，不论其结果如何，从直接最受其影响的日本立场出发，就帝国对维护东亚全局所负的责任来说，都不能完全置之不理！”这时，外务省官员送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上报的第三六七号机密谍报，森恪浏览一遍说：“矢田说上海清党后的形势比较平静，看来蒋介石已初步控制了局面！”田中义一从森恪手中接过矢田七太郎的电报，如饥似渴看下去：“因为多数罢工的工人们，本来只是出于一部分纠察队的暴力恐怖，不得已而盲从；现在鉴于军方严厉取缔，稳健势力渐增，罢工命令已经完全不能实行。和总工会所预期的情况相反，其威令丝毫不能发挥作用。……”田中义一看罢，当即吩咐森恪：“本首相决定，马上派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松井石根到南京会见蒋介石，对蒋介石表示支持！”森恪对田中义一这样支配他办事很不服气，又给外务省官员下达命令：“特派驻华公使芳泽廉吉到南京观察风向，可以视情况带头把驻华公使馆迁往南京！”田中义一刚把松井石根派往南京，蒋介石的代表蒋方震就于5月12日到了东京。田中义一和森恪赶忙派日本侵华谋略魁坂早八郎中将，与蒋方震会见。

松井石根和坂西利八郎都向蒋介石表示，支持他大规模开展“清党运动”，毫不留情地镇压共产党。坂西利八郎得意地私下说：“扶蒋反共可以说是一箭双雕：消灭共产党，解决满蒙问题于谈笑之中。”田中内阁对蒋介石是打拉兼施，视蒋介石的对日态度而有所变化。

松井石根和黄郭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前后同学，松井石根在南京私下拜访黄郭时亮出了田中内阁支持蒋介石的底牌：“日本支持蒋总司令压迫武汉政府，但反对他北进。蒋总司令必须与北军以徐州为界，不得越过雷池！”黄郭为难地两手一摊说：“我们北伐，就是要统一中国，以徐州为界，怕不妥吧？”松井石根把长脸一拉威胁道：“日本决不惜以武力保护其在东三省及蒙古之利益。日本的武力，已全盘调动，待时势一至，即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施行之！”松井石根的话不完全是威胁之词，田中内阁见蒋介石在南京发表的《国民政府宣言》仍声称：“务使一切帝国主义、残余军阀及一切反革命派断绝根株”，听蒋介石不断高喊“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甚至宣称“清党之目的，为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特别是蒋介石1927年5月1日制定了三路北伐计划，5月下旬宁方北伐军渡过长江，先后夺取江夏、全椒、滁州、丹埠、淮关、蚌埠，逼近徐州，张宗昌、孙传芳的部队迅速溃退。5月27日，蒋介石亲自赴津浦沿线视察督战。

田中内阁原打算利用蒋介石叛变革命之机，加紧对中国进行武装侵略，在东北和山东攫取更大权益，没想到日本支持的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的部队都狼狈败退，田中义一便在5月24日召开内阁会议商议对策。

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当年40岁，依仗近卫公爵的权势已有10年之

久，这次当上事实上的外务大臣，此时正是春风得意之时，鲁莽地大声嚷道：“蒋介石这家伙太不识相，竟敢与大日本帝国作对，搞什么北伐，张宗昌、孙传芳被蒋介石穷追猛打，败退到山东、江苏省境，战争波及山东仅是时间问题！”田中义一理理考究的镶边制服，讲起在山东省的青岛、济南及胶济铁路沿线大约有17000名日侨，日本在山东的投资额约1亿5千万日元。未了，这个谈吐粗鲁的首相为抬高身价，也故作斯文之态：“蒋介石势必很快攻入山东，对帝国来讲，山东省的意义决不只限于山东一省，它与满蒙的安定具有密切关系。帝国如何处置，本首相、本大将愿听诸位高见！”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强烈主张出兵山东，财政大臣等提出大规模出兵在财政上有困难而且有刺激中国之虞。这一下可惹恼了森恪和白川义则，气势汹汹叫嚷不休。田中义一见到争吵激烈，便提出把驻中国东北的步兵第10师团之第33旅团调往青岛，以此做出日本第一次出兵山东的内阁决定。

蒋介石在南京接到日本出兵山东的报告，急忙找张静江商议。张静江拍着残腿说：“我保举一人，速速前往日本，与田中义一首相讲明我们的真意！”“谁可担当此一重任？”“隐身仙人！”“膺白兄认识田中义一，足可担当此一重任，但我这位盟兄狡诈异常，恐怕为难的事，他不愿出头吧！”“把球踢给他，他不去，就让他再推荐合适的人选--总司令，您再给他写封信吧！”蒋介石稍加考虑，提笔写道：二兄大鉴：今日静（江）兄回沪，特请其面陈一切。长期人选甚难，皆以兄全权代表一切为宜。惟与某方说明，如有泄漏兄前往消息，即认为其有意泄漏也。如兄不便，则请兄代荐一人。

黄郛接到张静江捎来的蒋介石的亲笔信，和夫人沈亦云仔细商议，认为黄郛此时不宜出面，应推荐南京政府外交部官员袁良代黄郛赴日交涉，自己保持较大回旋余地。黄郛打定主意后，向蒋介石发电称：蒋总司令：最近所得日本方面报告已托岳弟代陈。现袁文钦准予13日起程赴青岛，渠意欲得一军事外交代表名义以便接洽。此次日本出兵侵我主权，我无力制止，不得已而筹此救济，然总部方面如果正式派员与之接洽，是无异默认出兵。兄意表面只能以袁个人在鲁实业上之关系，驻彼处接洽，实际仍履行前在沪之预定方针。即日方岩松赴我前方，过宁时亦只能用一普通外国观战员资格招待。然仍请以真实作用之所在，密告前方可以信托之将士，默为接洽，庶免流弊，而重国体。此事已明告袁君接洽矣。云蒸。

蒋介石接到黄郛的信，当即决定派袁良赴日，叮嘱他务必谋求田中内阁的谅解。袁良在段祺瑞时期曾任国务院参议和农事试验场场长，曾帮安福系向日本借款，本人在济南办有糖厂。

袁良奉蒋介石之命来到东京霞关的日本外务省，受到外务省事务次官出渊胜次、亚洲局长木村锐市的接见。

袁良先代黄郛向出渊胜次问好，说黄郛希望以友好精神解决中日冲突事件。出渊胜次微微一笑说：“黄郛君的精神我们都很了解，请代转达对黄君感谢！”袁良及时把话拉入正题道：“我认为，日本出兵山东对日本有害无利！”出渊胜次深感惊诧，急忙问道：“为什么？”袁良理直气壮阐明中国立场说：“中国本来想诚心诚意解决南京事件，已经草拟出解决方案，却因日本出兵风潮，使南京政府陷入困境。日本有识之士认为英美制造南京事件是东亚之隐忧，但日本出兵山东甚于英美挑起的南京惨案。日本当局常说愿在国际上援助中国，今却开此恶劣先例，不独中国国民误会不易解除，万一系列援例武力来临，岂不是东亚的祸害？务望切实磋商，设法转圜，勿使吾

辈多年辛苦所筑成两国间好感之基础，归于泡影！”出渊胜次敷衍说：“帝国现在青岛的军队决不进入济南，如果万不得已要进济南，必定先通知阁下。”几天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接见蒋介石的特使袁良，煞有介事信誓旦旦保证说：“帝国在青岛的驻兵非万不得已不进入济南，即使到济南也不干涉一切，南军一到济南，日军就撤退。只希望南军得徐州后不再猛进，而把徐州北部地区交给冯玉祥、阎锡山。

蒋总司令要刷新政治，树立大计，才能得到国际信赖，日本必定倾力相助！”袁良听田中义一说得比唱得还好，就揭他的老底说：“据说张作霖派人正与首相阁下联系，同蒋总司令为敌！”田中义一阵慌乱，又马上镇静下来辩解道：“奉张派人前来挑拨离间，但我确信蒋介石为收拾中国的唯一人物，已严词拒斥，请放心！”分别时，田中义一特意告诉袁良：“希望你暂时不要离开日本，以便随时联系！”田中义一在与袁良、蒋方震会谈掩盖下，不断向山东增兵。日本侵略山东引起中国各地的抵制日货运动，中国的南京、武汉、北京三个政府都向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日本人民也组织起“对华不干涉全国同盟”，反对田中内阁出兵山东，使田中内阁的对华政策遭受沉重打击。

田中义一陷入深重的苦恼之中，忙把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亚洲局长木村锐市、军部红人铃木贞一召到霞关外务省大臣办公室说：“目前形势极为严峻，蒋介石的北伐进展顺利，帝国出兵山东阻力重重，本首相打算筹备有陆海军首脑、驻华使领馆、关东军司令官参加的东方会议，交流情况，制定有别于币原外交的积极的对华政策，诸位以为如何？”亚洲局长木村锐市把八字胡一捋，从他最熟悉的张作霖谈起，回答田中义一的质询说：“张作霖这个绿林草莽在中国根本无人支持，如果始终以张作霖为唯一目标，凡事取决于此，乃极为短见，且属极不得计，必须把张作霖一人之兴衰与维护帝国在满蒙特殊地位截然分开。”森恪不耐烦地训斥说：“别绕圈子，你对打开对华政策僵局，有何高论？”木村锐市看不惯森恪的霸道作风，却又惹不起，只好提高声音强调说：“我建议，挑选适当人物代替张作霖，以东三省人的东三省主义来对抗北伐！”森恪气势汹汹地质问：“挑选适当人物，你说挑选谁？”木村锐市低头无语，日本驻华公使芳泽廉吉唉声叹气说：“我断定，内战对奉军不利，但无人可取代张作霖为奉系统帅。

即使奉军败退之后，也只能依然推举张作霖为满洲的当权者，除此之外，别无他策！”森恪气恼地口吐不逊之辞：“都是废话！”他看一眼一身戎装、杀气腾腾的斋藤恒少将说：“你是关东军参谋长，还搞了个《关于对满政策的意见》，你说该怎么办？”斋藤恒以武士道军官的狂妄劲头大讲特讲，日本此刻必须以扶植在东三省和热河特别区的实力人物为对华政策的基点，将其变成设有日本行政、财政及军事顾问的自治地区，主张如果张作霖不接受这种设想，就让日本帝国认为适当的人物来实行，即使诉诸武力，也在所不惜。

森恪站起来指着斋藤恒的鼻子质问说：“你说适当的人物是谁？”斋藤恒像斗败的公鸡，手托军帽低下了头，顿时大臣室里鸦雀无声，森恪气得放声大叫：“你们说，谁是适当人物？”在场的军政要员面面相觑，都束手无策，突然，大臣室里响起宏亮的声音：“蒋介石！”此话立刻引起所有人的注意，都将目光转了过去：“啊，是铃木君！”田中义一大声笑了起来，粗鲁地说：“他妈的，怎么一时把你忘了呢！快说，你有什么办法？”铃木贞一温文尔

雅地像大学教授一般发表演讲：“东方会议的目的应在于，就日本在大陆应遵循的方针统一思想，应当把满洲从中国分离出来，置于日本政治统治之下，这就要求日本的全部政策，包括国内政策、外交政策和军事政策集中一致，通过稳健分子，促其全部实现！”“稳健分子是谁？”众人异口同声发问。

“蒋介石！”铃木贞一毫不含糊地回答。

“何为稳健分子？”“就是反共的国民党人，以蒋介石为首。帝国应支持蒋介石，共同对付不逞之徒！”森恪对此更感兴趣：“请问，这不逞之徒又指哪些人？”铃木贞一屈指而数：“不逞之徒指共产主义者鼓动的排外分子，包括中国共产党，苏联共产党和左倾分子！蒋介石已挥动屠刀，把共产党杀于血泊之中，此时正是支持他统一关内中国本土、夺取满蒙的大好时机！”森恪带头叫好，田中义一拳头一挥当场拍板决定：“不管是蒋介石，还是张作霖，只要能使日本帝国称雄大陆，我们都不惜一切坚决支持，就以此为指导思想，准备召开东方会议！”经过紧锣密鼓的周密准备，日本的东方会议于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在东京外务省隆重举行。

在东方会议的开幕式上，田中义一以首相兼外相身份致开幕词说：目前中国政局纷乱已极，我政府在对华政策的推行上，必须慎加考虑。趁此中国战局稍形平稳之际，特约集我驻中国各方面之各位代表齐聚一堂，就中国政局问题开诚布公，各陈所见，以供参考；同时，就政府之方针政策，亦希各位充分理解，并统一贯彻执行。这就是召开此次会议的用意所在。在探讨政府的政策运筹当中，有些细节问题，随着会议的进展，或将组成特别小组委员会进行专题研究。

对此，亦希各位予以谅解。

东方会议讨论、分析了中国的政治形势，认为蒋介石有可能统一“中国本土”而寄予希望。最后，田中义一以“训示”的形式提出了《对华政策纲领》，会后田中义一于7月25日向裕仁天皇奏了一份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文件，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日本侵华纲领《田中奏折》，提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总战略：将来欲制支那，必以打倒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以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

东方会议是日本帝国主义决定大规模侵华政策的会议。会后，田中内阁马上沿着东方会议确定的轨道行动魄来：进一步扩大对山东的侵略，攫取“满蒙新五路”。激其中国风起云涌的抵制日货运动，也引起日本各阶层人士的强烈反对，把田中义一搞得焦头烂额。

三、特殊战斗

——王家桢对内忠于张学良两肋插刀，易帜工作有条不紊，对外明察日本侵华野心，搜集情报勤勉不担旅日华侨蔡智堪周旋于人妖之间。

旅日爱国华侨蔡智堪接到王家桢的指示，立即着手搜集日本当局召开的东方会议的情报。

时光荏苒，转眼进入七月中旬。

这一天，蔡智堪又邀请几个日本高级官员来家聚会，正喝得都有醉意之时，日本在野党首领床次竹二郎忽见蔡智堪家的下女江子送来一个用盘子盛着的东西，马上借机转移话题：“蔡先生，你的家宴丰盛得很，喝得真是痛快淋漓。我正要起身告辞，却又上来一道佳肴，我只好留下再享口福了！”蔡智堪听床次竹二郎这么一说，急忙迎上前去，从江子手中接过盘一看，见是奉天寄来的小包邮件，其中肯定有襄助张学良办理对日交涉事宜的王家桢的指示，心里不由“格登”一响，随即镇定下来，吩咐下女：“这是朋友寄来的邮件，送给夫人收下不就行了？没看见我这里正有贵客吗？”“是！”江子听到吩咐，扭头要走。

“且慢！”床次竹二郎像条狡猾的狐狸，把老花眼一眨巴问：“什么好东西？让咱们开开眼界好吗？”“那--好吧！”蔡智堪暗骂一声，但只得把盘子上盖的红布揭开，笑呵呵地说：“这是朋友寄来的邮件，床次先生也想欣赏吗？”床次竹二郎弯下修长的身躯，伸出大长脖子一看，见盘子里果然放着一小捆邮件，早就如泄了气的皮球一般，讪讪地笑道：“老朋友之间开个玩笑嘛，通信自由，强行检查，是侵犯人权的！快拿走吧，咱们说正经话要紧！”下女江子见床次这么一说，端起盘子就要转身退出--“且慢！”森恪微微一笑道：“床次先生的玩笑还没开完呢--请问，这是哪里来的邮件？”“中国奉天！”下女看着邮包上的地址说。

“蔡先生神通广大，不知从奉天城寄来什么宝物，何不打开来看看，给咱们饮酒助兴嘛！”日本外务省次官森恪狡猾刁钻，又抛出厉害的招数来探听虚实。

要打开看？王家桢的指示肯定就在里面。万一露出破绽，岂不误了大事？但稍有犹豫，更令森恠床次竹二郎生疑，再说王家桢的指示一般都藏在极其隐蔽的地方。……蔡智堪飞速想至此处，微笑着回身拿起剪子，咔咔几下将绳子剪断，打开包裹一看：“噢，奉天点心！”

“几个人都围在下女身边，伸长脖子异口同声叫道。

森恪见是奉天邮来的东西，早就疑心生暗鬼，此时更步步紧逼：“中华点心，世界闻名，咱们真有口福，有幸亲尝美味了！”“对，咱们都来尝尝新！”床次竹二郎在推行大陆政策上从来与森恪等政友会分子毫无分别，此时也赶上来凑热闹。

蔡智堪见森恪眯着双眼，微笑着无语等待，知道在这些老狐狸面前不能“欲盖弥彰”，就痛下决心以进为退，对下女喊道：“江子，拿刀来！”下女江子赶快到厨房取来一把明晃晃的水果刀，蔡智堪伸手接过，装出兴冲冲的样子说：“森恪次官，好多年没有吃到奉天点心了吧？今天请你这个美食家来品尝一下！”“好啊，我们也一饱口福！”蔡智堪见床次一伙人跟着瞎起哄，知道再无退路，只好边切边相机行事了。于是，他笑咪咪地右手举起明光耀眼的水果刀，左手按住松脆芬芳的奉天点心，慢慢挥刀切了下去。

就在闪着寒光的水果刀接触奉天点心的时候，突然传来森恪得意的发话声：“停下，不用切了！”蔡智堪暗中徐徐出了一口长期，轻轻将水果刀放在几案上，故作惊讶地问：“怎么，不想起尝这名世点心了？”“好了，今天酒足饭饱，恐怕品不出这名世点心的特殊美味了，以后再来自扰吧！”森恪

尴尬地笑着站起身来，就要告辞，床次竹二郎等人也离席欲去，蔡智堪都不强留，怀着大战一场取胜后的特有愉快心情，把几个“特殊客人”送了出去。

蔡智堪送走客人，急忙拿上点心回到密室，用水果刀将点心切开一看，竟然什么东西也没有发现。他暗暗佩服王家桢胆大心细，足智多谋，为遇到这样的好伙伴而感到万分骄傲。

一时间，蔡智堪兴趣盎然，抱着当年小孩子猜谜语般的好奇心情，又似进入深山探宝寻求奇情异景般仔细琢磨，怎么也找不到珍藏指令的秘密所在。最后，只好把点心一块块掰开捻碎，才发现了一个极小的纸团，急忙打开看道：据来自英美方面的可靠情报，田中内阁已召开研究侵华方策的东方会议，宜速搞到核心情报。

蔡智堪看罢指令，细心复阅一遍，牢记心间，然后将纸团吞进肚里，一口咽下，随即陷入沉思之中：“应从哪里着手，搜集东方会议的情报呢？”1938年2月的北国沈阳，依然北风呼啸，春寒料峭，但王家桢接到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的外事通报，得知小日向白朗已被驱逐归国，想到东北易帜后取得的一连串胜利，就像看到万紫千红的春天，心情格外开朗。

恰在此时，秘书送来他驻东京办事处人员蔡智堪发来的一件密报，急忙打开展读。看罢，立即呈送张学良。

张学良接过一看，英俊而宽阔的额头顿时出现几条皱纹，又再次从头细看：田中内阁强行阻止南北妥协失败后，不仅对满洲政策遭受挫折，关税交涉完全陷于孤立，出兵济南泥足深陷，而且因炸死大帅的交叉点事件在国会被穷追猛打，裕仁天皇也动怒追问，以床次竹二郎为首的在野党指责田中义一挥舞战刀早已丧失威力，日本的威信急剧下降，遂使田中内阁陷于绝望状态。为坐稳首相宝座，田中内阁正变本加厉推行《田中奏折》确定的侵略中国的计划，企图加快夺取满蒙的步伐，从而跳出四面楚歌的困境。

张学良再次看蔡智堪送来的情报，急切地问王家桢道：“这《田中奏折》，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只知道《田中奏折》是东方会议后，田中义一给裕仁天皇的奏章，具体内容还不太清楚？”“赶快指示蔡智堪，尽快搞到《田中奏折》！”“蔡智堪是个有强烈祖国感的旅日华侨，我相信他正在全力以赴，搜集这方面的情报，但看来困难不小，我们怎样帮助他呢？”张学良点头沉思良久，忽然似有所悟，拍着宽阔的前额道：“瞧我的记性！放着现成的人不用，不是白花钱了吗？”“汉卿，你有什么好主意？”张学良离座而起，抡着手兴致勃勃地挥舞道：“政友本党总裁床次竹二郎就是可以利用的人，我怎么忽然把他忘得一干二净呢？”“对！他确实是田中义一的死对头！没有田中义一，说不定他早就登上日本首相的宝座了！--哎呀，我们恐怕指望不上床次竹二郎了吧？”张学良正在兴头上，不想被王家桢兜头皮了盆凉水，不解地问：“怎么指望不上床次先生了？”王家桢便给张学良讲起，床次竹二郎是杨宇霆的好朋友，去年年底来沈阳时，还当面劝张学良和“杨宇霆”和衷共济，顾全大局，但杨宇霆却在1929年年初被杀，恐怕床次竹二郎生气不肯帮忙。因此，应派我们外事办公室善办外交的胡俊到东京联络床次，共图大计。

张学良连声说好，立即修书一封，然后让王家桢把胡俊找来，详细向他交代任务说：“前番床次竹二郎来沈阳时，曾吐露他所领导的政友本党，因欲打倒田中义一的军阀内阁，已经与民政党联络妥当，约定把田中内阁打倒以后，由政友本党与民政党组织两党的联合内阁，床次竹二郎出任总理大

臣。床次希望与中国合作，互相支援，当面又劝我与杨宇霆务要和衷共济，顾全大局。现在，杨宇霆因勾结白崇禧、李宗仁等图谋不轨，已被制裁。若不把这个事件的内情说给床次，取得他的谅解，不但要影响中日合作、共同打倒田中内阁的密约，而且必然会发生误会，将来若是出现床次内阁时，我们的对日外交将更加棘手，所以我现在写好亲笔信一封，派你带去。”张学良说着，从写字台上的文件夹中拿出亲笔信，郑重地交给胡俊，还特别叮嘱说：“你到东京见着床次竹二郎，务必要把杨宇霆、常荫槐的罪行以及我不得已才把他们制裁的苦衷，说给床次等人知道，以便取得他们的谅解！--王处长，你还有什么吩咐？”王家桢作为胡俊的顶头上司，也极其郑重地交代道：“你到东京悄悄向蔡智堪传达张总司令的密令，命他尽快搞到《田中奏折》，也请床次先生对此事助一臂之力！”“是，保证不辱使命！”胡俊转身要走，王家桢又交给他一包东西，神秘地嘱咐道：“你到日本若遇到重大难关而又无计可施时，就打开这包东西，其中自有锦囊妙计！”胡俊高兴地接过小包仔细放好，然后到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军需处领了出差旅费，回到家里，请爱人高宝笙把张学良的亲笔信和王家桢的锦囊密包缝在西服上衣衬肩里。

第二天早晨，胡俊告别家人，故意买了一张二等车票，登上沈阳至釜山的火车，混在老百姓之中，乘车前往东京。

火车到达新义州的时候，胡俊正与一个朝鲜族老汉聊天，突然，车厢门被一脚踢开，一个日本尖嘴巴警察气势汹汹地冲到胡俊面前，指着他的鼻子喝问：“你叫什么名字？”“胡俊！”“干什么的？”“东北法学研究会的研究员。”胡俊早有准备，按编好的身份回答。

“每天为什么总出入大帅府？”胡俊知道日本驻沈阳的特务机关每天都派特务，严密监视大帅府的动向，但却未想到连自己这样的人也早被盯上了，便轻蔑地嘿嘿一笑，按事先准备的词搪塞道：“东北法学研究会是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的直属机构，我当然要出入大帅府联系公务，不信，你去问我们所长赵欣伯，去问我的同事翟苍陆、王玉生！”胡俊到东京见到床次竹二郎，转告张学良的话说：“日本政界斗争复杂，风云变幻莫测，将来遇有必要时，可以派人到中国，与张学良将军接头！”翌日晨，胡俊悄悄搭快车离开日本回国，到沈阳后向张学良和王家桢汇报了他具有传奇色彩的日本之行，从而在张学良和床次竹二郎等日本在野党之间，建立和巩固了一个神秘的联系网，从而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写出了威武壮观的有趣篇章！

四、间谍大战

——群魔共舞于樱花节，同为《田中奏折》，英、德、美间谍垂涎三尺，土肥原老谋深算重金收买法国女郎，借用涂满唇膏的嘴放出烟雾。

1929年的春天，在世界情报史上是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季节。

当神奇的樱花公主从日本列岛南端开始跳着轻盈的欢快舞步，一路以魔术般的纤手把娇嫩碧绿的樱蕾化作绚丽多彩的樱花，经九州、京都、名古屋，姗姗到达东京时，世界上最美丽、最欢乐的樱花节就被人们盼来了。

今年的樱花节虽仍然红火热闹，一个个主人照样慷慨好客，一群群艺妓依旧花枝招展，但细心的人们却可以发现，整座东京市却阴影憧憧，平添了浓厚的紧张气氛。据说至少有来自世界各地的2000多名情报人员一下涌进东京，都绞尽脑汁，想把世界情报史上罕见的《田中奏折》搞到手。

这可忙坏了日本警察。东京警视厅紧急征调3000名外事警察，对皇宫、总理府和外务省等重要部门加强了重点警卫，这就和樱花节的欢乐气氛显得有点不那么协调。

但大多数日本人对此似乎并不理会，他们从四面八方潮水般涌向满城的樱花树林，看罢绯红的片片轻云，再观似一夜之间纷飞飘垂的红雾，离开粉红明丽的八重樱，驻足雪白氤氲的雨宿樱前，又流连忘返于淡黄而带有绿意的御衣黄樱之间，人们载歌载舞，如醉如痴，使花事更加热闹非凡。

繁花似火的樱花树下，花枝招展的阿香绯红的脸上泛着春姑娘的喜悦，仿佛要和千姿百态的樱花比美。她轻启朱唇，亮开柔和甜嫩的歌喉欢唱：快来啊，快来啊，大家都来看美樱。

天上仙子齐下凡，流连忘返乐无穷。

人间美景属樱花，不胜娇羞笑脸红。

“哈哈，唱得美极了！为帝国拿下满洲，干杯！”“干杯！”樱花树下，永田铁山、土肥原贤二、石原莞尔、铃木贞一这一伙纵酒狂欢，浪语冲天。他们都是日本法西斯组织双叶会、火曜会的重要成员，他们于5月19日将两组织合并，正式成立了一夕会，实现了以尉级军官为主的陆军中央幕僚军官的横向联合，决心“重点解决满洲问题”。

有“天不怕、地不怕”之称的日本少壮派战略家石原莞尔撇着齐刷刷的小胡子说：“根据满洲圣地传说，满洲早就该是大和民族的乐土！何况我们已为南满权益耗费了十亿国币，流尽了20万人的鲜血！勿失满洲，是我们理所当然的口号！”身材粗壮的永田铁山伸手推推滑下鼻梁的眼镜说：“张学良不听劝告，顽固易帜，又以反对易帜为借口，枪杀了对帝国友好的杨宇霆、常荫槐。他对大日本帝国的极端仇视态度，使满洲形势更为紧张。为破坏帝国在满洲的权益，又公然计划兴建以葫芦岛为起点，经绥远、黑河、多伦的三大干线！为与满铁相抗衡，还妄想与荷兰公司订立借款契约，筹划葫芦岛开港计划！这就使帝国在满洲受到空前严重的挑战，面临严重的危机！我们的神圣任务，就是执行东方会议精神，按《田中奏折》的战略部署，迅速拿下满洲！”性格暴躁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早已气急败坏，大手摇着他在当日本驻华使馆武官时写的《对支作战在何种动机下发动之研究》，大言不惭地说：“大日本帝国的出路就是满洲！最坏的打算也是经由朝鲜半岛、日本海，与支那大陆连接，这一切要以满蒙为中心。因为满蒙及华北一带的物资，是大日本帝国国防上唯一的粮源。”

开发满蒙大地，提高其经济价值，使之无论平时或战时都能达到足以提供帝国需要的程度，这实为保障帝国及日本人永远生存唯一紧要之方策，且为帝国存亡攸关之重大关键！”石原莞尔激动得摩拳擦掌，蠢蠢欲动：“国策问题不解决，如何改革军队就不能决定，研究国策就必须解决满蒙问题。我根据关东军拟定的对满洲武力计划，最近到满洲各地进行参谋旅行，考察各地军事地形后起草了《关东军满蒙占领计划》、《满洲占领地行政之研究》，计划以1万皇军战胜20万支那军队，由关东军司令官实行军事统治！--土肥原君，你怎么不说话？你有何高见？”土肥原贤二正要大发宏论，突然看

见一个身材魁梧的蓝眼珠、高鼻子大汉，穿过错落交叉、开满鲜花的樱树枝条编织成的瑰丽的粉红色通道慢慢走来，那熟悉的翻领大衣，微微翘起的旅行帽，嘴上叼着的那根短短的精致烟斗，那特别令人瞩目的外出时才戴的单片眼镜，土肥原一跃而起，惊喜地高声喊道：“端纳先生，久违了！”端纳是受聘于英国情报部门的高级谋略间谍，曾在中国政坛活跃20多年，以情报灵通、才能横溢名声大噪，先后当过两广总督岑春煊、中国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和张作霖、蒋介石、张学良的顾问和座上客，是多年来代表英美利益，充分揭露日本侵华阴谋的谋略家和刀笔吏，这次专为探听《田中奏折》的虚实，自南京短期赴日本而来。

端纳正站在一株盛开的古樱树前，欣赏宛如古松的粗壮樱树上绚烂的樱花，忽听有人呼喊自己，一看来人那短小身材上的宽额大耳，那令人极不舒服的蒜头鼻子，就像老朋友似地上前拉住小个子的手摇晃不停：“哎呀，土肥原君，真是幸会！”“何时来到东京？”“昨天刚到！”“来，你我找地方痛饮一杯！”端纳从嘴中取下精致的烟斗，说声“不忙”，回身喊道：“韦斯帕，快来见老朋友！”阿梅莘托·韦斯帕是意大利著名情报专家，早年当过墨西哥富有冒险精神的雇佣兵，后加入协约国谍报部门，曾随着日本军队入侵西伯利亚，后来与端纳、土肥原成为张作霖的三大顾问。此次受英、意、德等国情报部门的委托，为西方的利益来搞日本独霸满洲的情报。

细高挑儿美男子韦斯帕正在欣赏似云彩低垂、红艳欲流的樱花。他手摸骤然发亮的红色樱花，任凭三月的香风把柔若飞絮的瓣瓣落英吹落到乌黑的头发上，洒满宽阔的肩头，丝毫无意抖落脚下。他忽然觉得自己也变成了日本人，对樱花充满了如醉如痴的神情。

韦斯帕猛听到端纳的呼喊，一看站在十几步外的光头小个子，就哈哈笑着几步上前一把将土肥原搂了过来，但立刻被土肥原胸前佩前的瑞宝、猛虎、金@、旭日双辉勋章硌得肚子生痛，忙开玩笑说：“几时不见，土肥原又赚了那么多大勋章，可别把你压垮了！”“多谢，承蒙夸奖--二位到东京有何公干？”“特为赶贵国的樱花节，果然名不虚传！”“走，咱们三人顾问找个地方叙叙别后之情！”土肥原想搞清这两个西方著名间谍的来日目的，主动提出请求。

“我倒有个好主意！”端纳为打开搞到《田中奏折》的突破口，笑容满面地提议。

“愿闻其详！”土肥原赶紧提议。

“你那里人多，不如就到我俩的樱花树下，开怀畅饮，你看如何？”“好，好主意！”于是，张学良的三个昔日顾问一同来到端纳和韦斯帕占的樱花树下，在落英缤纷的地上席地而坐。韦斯帕又拿出一份酒具，在三个酒杯里斟满酒，端纳举杯开言道：“来，为我们三个顾问异地重逢，干杯！”“干杯！”这杯酒干罢，三人竟一时语塞。

这是因为自日俄战争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围绕我国东北的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斗争形态由日俄矛头发展为美苏英共同对付日本独霸满洲。西方列强共同向日本施加压力，迫使日本人山东退兵就是明显的例证。这就使日本与美英诸国的政治和经济矛盾日趋尖锐。

现在张学良的三个昔日顾问从各国的立场出发，真可以说是同床异梦，自然话不投机半句多了。

为人奸猾狡诈的土肥原不愧号称“东方的劳伦斯”，首先打破沉默，以

攻为守，把矛盾指向端纳：“端纳先生，咱们三人都已离开张学良和满蒙，站在异国观察满洲，你对满洲有何高论？”年过半百的端纳挺直高大魁伟的身躯，将长臂一挥，胸有成竹地说：“满洲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可以说是亚洲的宝库，也堪称世界的谷仓，真是肥美的宝地呀！”“是啊，怪不得欧美对满洲垂涎欲滴，野心勃勃啊！”土肥原以为抓住了可靠证据，竭力揶揄攻击。

端纳将宽阔的智慧前额一纵，以幽默的口吻反戈一击道：“英美都发表声明，主张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承认满洲是中国的领土，支持张学良毅然易帜，否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权益！”“请问，日本在满洲有什么特殊权益？”“贵国一直把满洲当作雄飞海外的基石，视为建立远东霸业，当世界盟主的桥梁！”韦斯帕抢着回答。

“何以见得？”“贵国被称为天才谋略家的石原莞尔公开承认：‘满蒙的农产足以解决日本的粮食问题，鞍山之铁，抚顺之煤足以确立日本重工业的基础，满蒙的各种企业可以救济日本的失业者，并可开拓景气，满蒙的资源足以支持日本作为东方的代表，雄飞世界！’”土肥原巧舞如簧之舌，竭力巧辩道：“这正证明大日本帝国与满洲联系之密切，帝国上下对满洲极为关心，不也是当然之事吗？”“不，日本对满洲的图谋绝不止满洲本身，而是把满洲当作争霸亚洲和世界的桥梁和基地！”“端纳先生，不要对敝国存在偏见嘛！敝国与满洲人民有着传统的友谊！”“这绝不是什么偏见，贵国的东方会议和《田中奏折》早已臭名远扬，贵国公然叫嚣：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要征服满蒙必先变朝鲜为日本的殖民地。世界各国都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日本对中国而言没有友谊，只有强权凌辱和战争蹂躏！”端纳言之凿凿地讲到这里，双眼放出灼热的光芒，伸开细长手指着土肥原的鼻子质问：“土肥原君，《田中奏折》上是不是这样写的？”土肥原顿时冷汗淋漓，张口结舌否认：“《田中奏折》。……根本不存在。……纯粹是子虚乌有之事！”端纳和韦斯帕看一贯骄横恣肆的土肥原这时一副狼狈相，一起开心地笑了起来。土肥原贤二以间谍老手的非凡才能很快镇定下来，为解脱困境主动提议：“老朋友，别开玩笑，走，咱们去参加陆军士官学校的庆祝活动，会会各方面的著名人物如何？”“好，去开开眼界！”端纳和韦斯帕欣然同意，立即动手收拾行装，离开樱花林。

土肥原把端纳和韦斯帕领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庆祝会上，将两人介绍给身为校长的老将军和缀满勋章的日本高级将官，正要坐下饮酒，却见德国驻日本官员奥特领着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向他走来，边走边叫：“土肥原君，我给你介绍一位新朋友！”奥特说着走到土肥原面前，热情地介绍说：“这位是德意志粮食报、法兰克福报驻上海记者佐尔格，可以说是堪与你媲美的当代奇才！”德国共产党员、苏联侦察英雄里哈尔德·佐尔格1929年被派往上海，很快与美国著名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东京《朝日新闻》记者尾崎秀实成为好朋友，在流亡中国的白俄首领谢荔诺夫的帮助下，搞到了许多有用情报。凭着间谍工作的灵敏嗅觉，他们也挤时间赶到东京，参加了争夺《田中奏折》的间谍大战。

在自上海驶往日本的轮船密室里，佐尔格瞪着他那双聪敏而明亮的眼睛，给伙伴们分析道：“只有了解日本近代史，才能了解日本今天的大陆政策。

明治天皇早在50年前就宣称要播皇威于外洋波涛，声称只有实现三

个阶段的皇道计划，也就是说第一步割取台湾，第二步占据朝鲜，第三步夺取满蒙，然后才能征服中国和全世界。

经过甲午战争，台湾已被日本霸占；通过日韩合邦，朝鲜也已到手；根据东方会议和《田中奏折》策划的阴谋，现已进入第三个阶段，轮到夺取满洲了！"尾崎秀实浓密的朝后梳得整整齐齐的黑发下，一双大兵似的眼睛炯炯有神，不由击节赞叹：“佐尔格，你分析得太精辟了！土肥原之流正在极为否认有《田中奏折》之事，我是相信确有其事的！”史沫特莱在佐尔格还不熟悉中国和日本情况时，以丰富的东方阅历给了佐尔格犹似黑夜指路灯的帮助。此时，在《田中奏折》问题上，他一反清高孤傲的性格，精力充沛地头一偏询问道：“尾崎君，请讲讲你的根据！”“目前，外国对满洲的投资几乎全部被日本垄断，”尾崎秀实直率坦荡地分析道，“但今年开始的经济危机把日本拖进去了！田中和森恪为摆脱困境，企图从占领满洲事件中寻求出路！日本军阀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对日本也是场浩劫，太可怕了！他们的梦想能实现吗？”白俄首领谢苗诺夫伸直微微弯曲的双腿，蒙古型嘴巴下部两撇小胡子一撇，问道：“一旦需要，我那一万五千骑兵可以重返疆场！”“归根结底，我们的任务只有一个！”佐尔格大手一挥，斩钉截铁地做出结论。

“什么任务？”众人齐声问道。

“尽快把《田中奏折》拿到手，搞清日本的侵略部署，才能决定下一步行动方案！”“对！”“同意！”佐尔格见众人异口同声表示赞成，以深思熟虑的逻辑和坚定的乐观主义精神鼓舞众人道：“今天，日本制定政策的权力几乎全部落入法西斯分子手中，被田中义一、森恪掌握，他们把‘八纮一宇’奉为至高无上的信条，叫嚷什么‘世界皆我家，我将统一之’，我们要解救满洲，维护世界和平，就要同他们斗，揭露《田中奏折》的狂妄阴谋！”德国驻日本使馆官员奥特又把土肥原介绍给佐尔格道：“这是日本谍报奇才，当今的东方劳伦斯土肥原贤二！”佐尔格伸出大手握着土肥原毛茸茸的小手，口里勉强道出敷衍之辞：“久仰大名，今日一见，万分荣幸！”土肥厚对佐尔格的真正身份虽然还不十分清楚，但一看那威武高大的身躯，明亮聪慧的眼睛，熟练漂亮的外交风度，就知道站在面前的绝非寻常之辈，说不定也和端纳、韦斯帕一样，都为《田中奏折》而来，心中先有了几分警惕，便言不由衷地笑着道出自谦之语：“哪里，哪里，听奥特先生说，佐尔格才是当代间谍大师呢！”佐尔格看土肥原身材短小，面目可憎，不由暗自思忖：“真没有想到，号称东方劳伦斯的土肥原贤二竟是这么一副尊荣！论个子，我一个顶他俩！”“但看到土肥原胸前闪闪发光，叮咚作响的菊花勋章，佐尔格又马上想到：“决不能以貌取人，我要刺探的军事机密就掌握在他的手中，我将与他比个高低！别看此人其貌不扬，可能还真不好斗呢！”土肥原马上占据上风头，主动发起进攻：“萨因，拜因鲁！”佐尔格大吃一惊，没想到土肥原竟劈头用蒙语问“您好”，就赶忙亦用蒙语回答：“萨因，拜因鲁！”土肥原见佐尔格也懂蒙语，又皮笑肉不笑地冷笑两声，仍首先想从语言上将对方压倒：“我在中国住了15年，会讲13种语言，用哪种语言交谈，我都可以奉陪！”佐尔格冷漠地一笑，未再和土肥原纠缠，便拉着奥特去与日本著名间谍石原莞尔、河本大作、板垣征四郎等会见。

土肥原贤二看着佐尔格离他而去的高大身影，想到几天来云集东京的端纳、韦斯帕、徐恩曾等成百上千名世界著名间谍，都为同一个《田中奏折》而来，若不制造轰动一时的间谍事件，将使日本吞并满洲的计划处于极其艰

难的境地。

土肥原想到这里，像上紧了劲儿的弹簧般一跃而起，匆匆来到纵情狂欢的舞会上。

此时，舞会达到高潮。陆军士官学校军乐团团员拚命吹打，乐声发疯般震天巨响，大鼓像开机关枪似地拚命敲打，五彩纸屑似投出的照明弹一样发出耀眼的光芒。

土肥原向舞场一看，只见人们正狂欢纵舞；系绶带、佩勋章的日本法西斯军官搂着身穿鲜艳和服的艺妓发疯般旋转；日本政界要人对摇动着翡翠耳环、身穿旗袍的中国姑娘特感兴趣；日本财界大亨对发髻上插着带香味的白兰花、隐隐露出亡命之忧的俄国姑娘爱不释手；豪华晚礼服裹着丰满腰肢的法国女郎则被霞关高级官员带着满场飞，使这个舞会又充满了强烈的异国情调。

舞场上，美貌风骚的两面间谍丽莎被黑龙会头目田原天牛紧紧抱着，用尽力气也无法挣脱。丽莎被田原天牛的满嘴臭气熏得呲牙咧嘴，怒火中烧。一曲终了，丽莎如获大赦就要逃跑，又被田原天牛死死缠住，干瘪的马车夫脸上露出狰狞的阴笑：“丽莎，不要跑，今晚就陪我一个人玩吧！”“讨厌，滚开！”“放聪明点儿，谁敢惹黑龙会的大爷！”丽莎瞅个空子扭头就跑，田原天牛在后面追，丽莎眼尖，见一个胸佩三枚菊花勋章的军官迎面走来，急中生智，忙躲到那个威风凛凛的军官后面。

田原天牛仗着黑龙会的万丈凶焰，在后紧紧追赶，正好和那个日本军官撞个满怀。那军官怒火满腔，抡圆手掌一个耳光打去，只听“啪”地一声脆响！田原天牛哪里吃过这个亏？顿时破口大骂，就要还手打人，却被对方又一耳光打得双眼直冒金星。心想：这是谁吃了豹子胆，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他斜眼一看，举在半空的手闪电般下垂，干瘪的马车夫脸上立刻堆满了下贱的奉承巴结神情：“土肥原大校，是您？对不起。……”“滚开，我找丽莎小姐。……”“是，我滚！”丽莎心想找韦斯帕、端纳之类的魁梧英雄男人跳个痛快，但万没想到，刚赶走一个“干瘪的马车夫”，又来了一个“干瘦的小瘪三”！听说土肥原要找她，以为是来邀他跳舞，便将弯弯曲曲的长卷发一甩，娇嫩红润的美丽脸庞上流露出厌恶的神情，鲜红的樱桃小口撅得老高。

土肥原斜眼一瞧，什么都明白了，便微笑着口吐极富诱惑力之言：“我今天不请丽莎姑娘跳舞，只想用你几分钟时间，给丽莎一个发大财的机会！”丽莎听了，顿时喜上眉梢，跳着轻盈的舞步上前，伸出染着蔻丹指甲的手挽往土肥原的胳膊，来到一个平静的角落坐下。

丽莎将一杯日本青酒递给土肥原，自己也端起一杯主动一碰道：“土肥原大校，你给我什么发财机会？”土肥原陪丽莎干完一杯，又端起酒瓶给丽莎斟上一杯青酒递过去说：“我要你悄悄对人们讲：丽莎已经通过特殊途径，把《田中奏折》搞到手了！”“啊？这。……”丽莎大吃一惊，竟将土肥原递过来的那杯日本青酒洒了大半，朱红嘴唇张得小碗口大，半天收不回来。

土肥原贤二津津有味地欣赏着丽莎吃惊的神情，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一大叠钞票塞到丽莎的红酥手中，颇具吸引力地说：“为你放这个口风，我再给你3万日元！”丽莎又吃一惊，心中暗想，“我的妈呀，3万元日元可不是小数目，我要发大财啦！”但她很快以两面间谍的特有本领安定下来，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说：“土肥原大校既然肯出这个大价钱，就说明值，自己也肯定不会蚀本，我就收下了--你要我对外怎么讲？”“就说你已从日本某位

外务省高级官员手中，用30万日元取得了《田中奏折》！”“我用什么来当《田中奏折》！”“我早已准备好了代用品，请拿去！”丽莎将文件接过看了一眼再交给土肥原，又侧头询问：“你把它放在哪里？”“存在东京的维也纳洋行，交给威利董事长，他会将文件锁在最保险的柜子里！”“好，一言为定！”丽莎兴冲冲离开土肥原贤二，来到灯火辉煌的舞厅中心，正好碰上大和文艺社主编井上文一，见他不仅身材魁梧，风度翩翩，而且知道他是擅写恋爱和凶杀侦探题材小说的著名作家，在日本新闻界和文艺界很有影响，正是理想的放火对象，于是便像一只花蝴蝶一般，飘然飞到井上文一面前，嫣然一笑道：“井上先生，想请你跳舞可以吗？”井上文一见丽莎是一位风韵十足的欧洲窈窕女郎，其美貌简直令人神魂颠倒：她的肌肤就像中国的杭州绸缎那样光滑滋润，微启的嘴唇犹如刚刚绽开的花瓣，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顾盼有神，香气四溢的披肩长发在灯光下秀美诱人，宛如一位西方天使从天而降。

好色之徒井上文一见如此漂亮的西方女子请自己跳舞，马上像被磁石吸住一般，乐得合不扰嘴，拉住丽莎跳起舞来，边跳边尽拣好听的话说：“姑娘，你人漂亮，舞跳得更好，真希望一晚上都和你共舞！”“真的吗？听到什么消息也不走吗？”“那当然！谁肯离开这么富有诱惑力的姑娘呢？”“好，我丽莎姑娘就告诉你一件头号新闻！”“太好了，讲请！”“本姑娘丽莎，用30万日元搞到了《田中奏折》！”“搞到了什么？”“《田中奏折》！”“啊？用30万日元。……从哪里搞到的？”“从外务省一位高级官员那里搞到的！”“能让我看看吗？”“对不起，哪能随便给别人看？”“那也得谢谢你向我提供了头号新闻，我井上文一可要大出风头，又赚大钱啦！”井上文一说着，一把将丽莎从怀中推开，扭头就走，丽莎故意追上去，拉住井上文一不放，将小嘴一撇假装生气道：“井上先生说话不算数，刚才还说人漂亮，舞跳得更好，要和我跳一晚舞呢！怎么说走就走！”井上文一被缠得哭笑不得，难以脱身，只好笑脸相陪说：“今天我真有急事，明天一定奉陪！”

“井上文一越是想走，丽莎越故意缠住不放，怎奈井上文一发财出名的劲儿大，气得一把将丽莎推倒在地，急匆匆要扬长而去，丽莎故意上前拉住井上文一，呼天抢地哭叫：“这个没良心的，一听说我搞到了《田中奏折》，就扔下我要跑呀！”一石激起千层浪，丽莎的一句话立刻掀起轩然大波。舞场上的人个个目瞪口呆，使争夺《田中奏折》的间谍大战进入白热化阶段。

东京维也纳商行自然成为众矢之的，商行董事长维利和他的秘书玛丽特小姐更成了“东京明星”，转眼间便被人刮目相看了。

在东京维也纳商行举办的豪华舞会上，玛丽特小姐身穿气派的裘皮大衣，外罩雪白的薄纱，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楚楚动人，花一样的红唇和高高的鼻梁显得与众不同，但她却是那么不高兴，原来她是被黑龙会头目田原天牛死死缠住了。因为田原天牛缠不住美女丽莎，又盯上了聪明、标致的绝代佳人玛丽特小姐。

欢快的乐曲一停，玛丽特似漏网之鱼急忙逃跑，田原天牛在后面拼命追赶，正好与对面来人撞个满怀。

田原天牛气急败坏正想发火，却见来人派头更大，以不可抗拒之势发话道：“田原君，请你冷静冷静，知趣些！”田原天牛将干瘪的马车夫眼一斜，见来者是个精明强悍的小伙子，便拿出黑社会头目的蛮横劲愤怒地问：“你是什么人？”“你喝醉了吗？不认识我徐祖华啦？大家都是熟人，你这样干，不觉得难为情吗？”田原天牛借着酒劲儿，耍黑龙会的威风，举拳便朝徐祖

华的胸口打来，岂知徐祖华轻轻抬手一拨拉，田原天牛便像肥猪一样笨拙地倒在地上。田原天牛看自己不是徐祖华的对手，只好夹着尾巴狼狈而去。

“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请你跳舞好吗？”玛丽特见徐祖华聪明漂亮，一表人才，为表示感谢而提出要求。

徐祖华奉蔡智堪之命，为搞到《田中奏折》而接近玛丽特，正愁无处下手，没想到田原天牛提供了绝好机会。

徐祖华携玛丽特返回舞厅，使出浑身解数陪玛丽特跳舞，他体态修长，仪表堂堂，又曲意逢迎，很快讨得了玛丽特的欢心。两人由此结为朋友，来往密切起来。

一天晚上，两人跳完舞后，到一家小酒馆吃夜宵。几杯酒下肚，两人身上发热，便都把外衣脱掉。徐祖华忽然看到玛丽特脖子上挂着一个金质纪念章，便问道：“玛丽特小姐随身佩带的心爱宝物，肯定有什么特殊意义吧？”玛丽特莞尔一笑，用双手托起金质纪念章，以带伤感的声调讲起了她的传奇家世。

原来，玛丽特的父亲奥古斯特·鲍梅尔特是虔诚的奥地利基督教徒，早年从欧洲历史名城维也纳来到日本传教。在舞鹤的维也纳基督教学校任教时，与同校老师水木康子相爱。

两人不顾亲人和同事的反对，毅然结婚，出于对日本军阀的憎恨又与英国间谍机构发生了联系。日本警察发现蛛丝马迹后将奥古斯特驱逐出境。母亲水木康子生下玛丽特后耻于间谍骗子的恶名投河自荆玛丽特被外祖父、外祖母抚养成人，先在神户舞厅工作，后来到东京维也纳商行当秘书。

徐祖华听玛丽特讲到这里，吃惊地指着纪念章上风度翩翩的一对夫妻问道：“这就是你的双亲？”“是的，是我的父亲奥古斯特·鲍梅尔特和母亲水木康子！”

五、潜入皇宫

——蔡智堪巧妙利用长州藩和萨摩藩的矛盾，持内大臣牧野伸显提供的“皇居临时通行牌”，两次潜入皇宫，历尽风险抄出《田中奏折》樱花盛开的5月，波涛汹涌的日本兴津海滨，苍松翠柏掩映的坐渔山庄内，两个日本老人正就日本的命运问题低声交谈。

79岁的西园寺公望现已老态龙钟，显然失去了当年的奋发英姿。他18岁时，就头饰绿色羽毛，身穿本质金属肋架的铠甲，外披绿色锦缎风衣，威风凛凛地率领一支票兵冲杀疆场，为建立明治政权立下汗马功劳。如今已两鬓苍白，步履蹒跚了。不仅如此，他也失去了作为明治天皇外交大臣的文雅而豪爽的绅士风度，但他仍拥有仅次于皇族亲王的权威，几乎具有与天皇一样的神的地位。作为日本元老和首相的推荐人，仍有巨大的政治能量。

坐在西园寺公望对面的瘦高挑儿，是65岁的前外务大臣、现内大臣牧野伸显。

牧野1861年生于日本萨摩藩的根据地鹿儿岛市下加治屋町。原为明治维新元勋大久保利通之子，后过继给牧野家族。他政治上主张同英美协调，与西园寺公望形成半公开政治联盟。1913年任外务大臣，1921

年晋升内大臣，成为萨摩集团的核心人物，因而被田中义一的长州藩集团视为眼中钉。

他作为裕仁天皇的政治秘书和顾问，掌管着御玺和国玺，负责天皇的法律咨询、颁发诏书和敕书的工作。他的办公室和裕仁天皇的办公室只一墙之隔，更象征着牧野伸显在日本政坛上具有神奇的权力。

这时，只听牧野伸显启动薄嘴唇，愤愤不平地发泄不满道：“田中义一这家伙还真不好斗，几个回合，就把中野正刚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了！”“怎么？凭你我的半公开政治联盟，还斗不过田中义一？”“长州藩的势力仍非同小可啊。……”原来，在日本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政治舞台上，一直存在着长州藩和萨摩藩的激烈争斗。西园寺公望和牧野伸显依靠在日本皇室和政界的特殊地位，支持近卫文磨、吉田茂、床次竹二郎等与田中义一斗法，仍不能取胜。

西园寺公望沉思良久，忧心忡忡地说：“我已是近80岁的老翁了，活在世上的时日恐怕不太多了，但若听任手握军刀的陆军长州藩在满洲推行过于露骨的积极政策，导致陆军和长州藩势力恶性膨胀，进而建立军部专制政权，就会危及万世一系的皇室！”“我们一定要利用咱们政治联盟的有利地位，有力地掣肘田中义一，抑制陆军过份地飞扬跋扈！”西园寺公望因为年老体衰，加之情妇花子的背叛，使他的性格更加孤独苦闷。他轻轻叹口气，点燃一支最爱抽的帕尔美尔牌进口香烟，深吸一口，再慢慢吐出一圈一圈的烟雾，然后将手中的拐杖一挥道：“就没有制服田中义一的办法？”牧野伸显微微一笑，以柔和的声调彬彬有礼地回答：“床次竹二郎推荐了一个人，说他有制服田中义一的锦囊妙计！”“谁？”“蔡智堪！”“他是什么人？怎么如此神通广大？”“他是加入了日本籍的中国台湾人，腰缠万贯，足智多谋！”“他在哪里？”“就在兴津的坐渔寺院，等候拜见公爵。公爵若有兴趣，我立即派人去传他来这里晋见公爵！”“不，不能如此怠慢能人！”西园寺公望具有优秀政治家的宽阔胸怀和远见卓识，皱纹纵横的脸上立刻绽开近来难见的笑容，手扶拐杖吃力地从沙发上站起，“走，咱们学学刘玄德三顾茅庐，去会会当今的诸葛孔明！”西园寺公望没走两步，就立刻气喘吁吁，咳嗽不止。牧野伸显见状，忙上前扶西园寺公望坐下，笑嘻嘻地劝道：“公爵，不要着急，等你身体好些再说吧！”“不，勤于皇事，哪能稍怠偷安？你作为今上陛下的主要文官顾问、内大臣，完全可以代表我去见蔡智堪！”“是，有事再来当面请教！”“不要客气，人们说你狡猾机敏，足智多谋，毫不为过。

想当年，大概是大正七年（1918年），你作为先帝大正天皇的外交咨询委员会秘书，为日本干涉西伯利亚出过锦囊妙计，促使内阁与元老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出兵西伯利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你我作为大日本帝国正副代表出席巴黎和会，我不太爱抛头露面，你代理首席代表在巴黎和会上发言，博得各国外交家的一致高度称赞；你当内大臣将近十年，发挥了陛下身边第一人的作用，这都有目共睹，有口皆碑嘛！”“多蒙公爵提拔栽培！”“休要多言，你竭诚忠于皇室，天日可鉴！为了皇运长久，有临时见机处置之权，快快去吧！”牧野伸显得到元老西园寺公望的委托和支持，兴冲冲离开坐渔山庄。他在侍从引导下，登上傍海的兴津小山。举目四望，只见远处的大海浩渺无际，近处的海口巨浪冲天，兴津湾的海水似钻石般晶莹闪亮，清澈照人。

牧野伸显迈着轻盈的脚步，穿过像血染过一般火红的松树林，拐弯抹

角，来到兴津渔村背后，不觉峰回路转，走到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寺院前。

牧野伸显纵目观望，只见这兴津寺院掩映在一片万紫千红的樱树林中，四周苍松翠柏，鲜花盛开。侧耳细听，寺院深处传来连续不断的诵经声，不由得啧啧称赞：“果然名不虚传，真是颇负盛名的寺院圣山啊！”侍卫正要上前叩门，忽听“吱呀”一声，兴津寺院的大门被轻轻打开。寺门开处，体态修长的日本政友本党总裁床次竹二郎走出寺院，躬身施礼道：“给内大臣请安！床次竹二郎已在此恭候多时！”牧野伸显从心里瞧不起床次竹二郎，认为他只不过是善于投机钻营的无耻政客，但今天用得着他去引见能帮助自己斗败长州藩集团的重要人物，便违心地朝床次竹二郎点点头，似施加无与伦比的恩惠般问道：“床次先生红光满面，可见是一路顺风啊！”床次竹二郎生平第一次与贵为伯爵、内大臣的牧野伸显交谈，觉得立时身价倍增，忙驱动如簧之舌逢迎巴结说：“多蒙牧野伯爵提携！政友本党如能和西园寺、牧野联盟同舟共济，联合行动，就能任意驰骋帝国政坛，随心所欲地横行天下，小小的田中义一又何足挂齿，何足道哉？”牧野伸显鼻孔里冷笑一声，心中暗骂：“你床次竹二郎算是什么货色？竟敢大言不惭，要与我堂堂内大臣相提并论，同舟共济？你低声下气投靠我，给我牧野伯爵效犬马之劳，本大臣还不屑一顾呢！”床次竹二郎是个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老练政客，见牧野伸显保养得极好的长脸上流露出一不悦之色，知道自己刚才的话说得不得体了，忙随机应变，改善自己的尴尬处境说：“这里不是说话之地，伯爵大人，里面请！”牧野伸显不理睬床次竹二郎，径直便往里走。床次竹二郎见状，赶快迈动长腿，跑到牧野伸显前面，亮开洪亮嗓门向里面通禀：“蔡先生，牧野伯爵到！”床次竹二郎话音未落，从寺院里面大步走出一个中年男人。牧野伸显看此人中等身材，平凡中露出英气勃勃的气概，猜想必定是所求之人，便有意仿效刘玄德求贤若渴的样子躬身施礼道：“我料定阁下必是蔡先生！”“本人就是蔡智堪！”“久仰大名，今日一见，三生有幸！”“牧野伯爵过奖了，实在不敢当！”“蔡先生，请先行！”“牧野伯爵，请先行！”牧野伸显见蔡智堪如此谦恭有礼，乐得大长脸上绽开了笑容，彬彬有礼地伸右手拉住蔡智堪的左手，面呈礼贤下士的微笑道：“不必客气，你我携手同行！”牧野伸显和蔡智堪携手走进兴津寺院客厅，分别在主、客位上坐下。

为进行重要会谈，床次竹二郎已事前把来招待客人的和尚打发走。这时，他亲自端起茶壶，为牧野伸显和蔡智堪斟上芳香扑鼻的龙井茶，挖空心思口吐奉迎巴结之言：“我毫不夸张地说，本人今天导演的兴津寺院会谈，将是对帝国前途有重大影响的会谈，望牧野伯爵和蔡先生开怀畅谈，携手合作！”牧野伸显对床次竹二郎借机抬高自己的作法极为反感，但他不愧是久经风霜的皇室政治家，理智地压下心头的不快，从大局着眼，开门见山询问道：“蔡先生，我知道你已加入日本国籍，我们今天就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好好谈谈！”“牧野伯爵，我虽已加入日本国籍，但仍不忘是中国人。

可以说我既是日本人，又是中国人！”“不，你是台湾人！日清甲午战争后，台湾已割归帝国，你就成了不折不扣的大日本帝国的伟大公民！”蔡智堪不想在此问题上多作纠缠，便微微一笑扭转话题道：“牧野伯爵，不知阁下烦床次竹二郎先生将我请到兴津寺院，有何赐教？”牧野伸显看床次竹二郎频频向他暗递眼色，谨慎地扭头四顾，坚信确实无人后，才彬彬有礼地开言道：“西园寺公爵和我们大久保、牧野家族，都世受万世一系的日本皇室浩荡之恩，九死一生也难报答于万一！本伯爵的唯一心愿，就是祈祝皇运长

久，连绵不绝！因此，对于威胁皇室扬威的一切势力，都要毫不留情地声讨、诛灭之！”床次竹二郎见牧野伸显碍于内大臣地位，说得太隐晦，便秉承牧野伸显意志，直截了当地说：“牧野伯爵想向蔡先生求教，怎样才能彻底战胜长州藩，将田中义一拉下马！”蔡智堪对此早有准备，头一扬侃侃而谈东亚和世界形势道：“纵观世界及东亚形势，和平友好如东风浩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者，必将被碰得头破血流，甚至国破家亡，死无葬身之地！”“这与我的一贯主张相同！”牧野伸显对这大道理丝毫不感兴趣，但出于礼节，只得耐心敷衍。

“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虽已国富兵强，但却走上了极其危险的发展道路，若不悬崖勒马，难免落个国破家亡之可悲下场！”蔡智堪这番话犹如平地卷起狂风，一下子把牧野伸显的心掀动了，又似磁石般将其吸引住了，牧野伸显不由自主地将瘦高身材倾向蔡智堪称赞道：“蔡先生果然非比寻常，几句话就抓住了关键所在，请详加阐述！”“陆军长州派手握军刀，穷兵黩武，为所欲为，他们运用政府权力召开东方会议，制定《田中奏折》，阴谋首先夺取满洲，进而侵占整个中国，最后称霸亚洲和全世界，但以区区日本四岛弹丸之地，欲与全中国、全世界作对，岂非以卵击石，螳臂挡车，蚍蜉撼树，可笑不自量吗？”“依你之见，日本出路何在？”“必须压制长州藩的嚣张气焰，给田中义一毁灭性一击！”牧野伸显听着蔡智堪平静而舒缓的分析，心中不由掀起汹涌澎湃的万丈浪涛，一反说话柔声细语的常规，突然将声调提高八度，以颤抖的声音问道：“怎样给田中义一毁灭性一击？”“将《田中奏折》透露给中国，利用中国的力量压倒田中义一！”牧野伸显听了顿吃一惊，低头暗想，《田中奏折》是田中内阁的最高机密，怎么会让他知道呢？于是就以哈哈大笑来掩饰内心的危惧，笑过之后故意说：“《田中奏折》？有这个奏章吗？我怎么没有听说？”蔡智堪见牧野伸显故意否认，便冷冷一笑，转身对床次竹二郎说：“床次先生，我估计得不错吧？我这里诚心诚意想方设法帮助你们萨摩藩战胜长州藩，人家却毫不领情！我这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床次竹二郎见蔡智堪真的生气了，忙走上前去，悄悄对牧野伸显耳语道：“伯爵大人，你让我把菩萨请来了，可不能轻易打烂啊！”牧野伸显离座而起，背着手在兴津寺院客厅里似老驴拉磨般转开了圈子。转到蔡智堪面前时，突然站住问道：“蔡先生，你说，我们有彻底打垮田中义一的优势吗？”“有！”虽只一个字，但蔡智堪却回答得斩钉截铁。

“有几大优势？”“托今上陛下的福，我们有战胜田中义一的三大优势！”床次竹二郎一听马上来了精气神儿，一下跳到蔡智堪面前，活像掉到大河中心的“旱鸭子”好不容易捞到了救命稻草，迫不及待地问：“你说的第一个大优势是……”“我们的第一个优势是在昭和初年的新天皇之争中，萨摩藩集团已经基本上控制了新天皇和日本皇室。只要请裕仁天皇陛下说一句不信任田中义一的话，田中义一就会轻而易举地从首相宝座上被踢翻在地！”牧野伸显听罢面露骄矜之色，傲慢地问：“第二个大优势是什么？”“牧野伯爵和西园寺公爵的联盟有很大力量，萨摩藩势力仍不可小视，常使田中义一、森恪之流感到头痛！”床次竹二郎听了喜形于色，真感到自己抱牧野伸显的粗腿抱对了！有这样直通天皇的强大靠山，还用怕田中义一吗？为拍牧野伸显的马屁，又极尽逢迎巴结之能事：“与牧野伯爵相比，田中义一已远非昔日可比！想当年，他执掌帝国陆军大权，脚一跺，连皇宫都颤抖，但现在离开了陆军中枢，那些少壮派军人就不买他的帐了！”牧野伸显对此嗤之以鼻，

因为田中义一不得不决心按军法惩办炸死张作霖的陆军少壮派，已使土肥原贤二、永田铁山等少壮派军人最近加入了反田中义一的行列，主动找牧野伸显想说而尚未说出口的话：“蔡先生，快请讲第三大优势！”牧野伸显见床次竹二郎脑袋瓜转得如此之快，觉得他确实是日本政治舞台上不可多得的一个奇才，若能将其收归门下，便多了一个办事干练的帮手，就露出微笑向他点一下头，算作极大的褒奖。

床次竹二郎得到如此“优厚礼遇”，更乐得眉开眼笑，殷勤地代牧野催促道：“蔡先生，牧野伯爵正洗耳恭听呢！”蔡智堪用犀利的目光扫视全场一周，滔滔不绝地讲道：“我们有黑社会天皇头山满等右翼势力当打手和别动队，内田良平、大川周明、北一辉、西田税等右翼头子都有巨大的活动能量，牧野伯爵已将他们从长州藩影响下争取过来，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牧野伸显被蔡智堪讲的三大优势搞得晕晕乎乎，面露不可一世之色。善于揣摩上峰意图的床次竹二郎立刻拍案叫绝，张开伶俐之口说出牧野伸显心中的话：“凭牧野伯爵的势力，定能驰骋天下无敌手！”蔡智堪看牧野伸显和床次竹二郎一唱一和，那样骄横恣肆，马上兜头皮去一盆冷水：“这三大优势如不借重一种强大势力，则将毫无作用，一事无成！”“啊？”两位日本政客遭此突然一击，都一时回不过味来，还是床次竹二郎头脑灵敏，迅速做出反应：“这是何意？”“事情很明显，日本要干大事，必须借重中国的力量！”“借重支那？开玩笑！”床次竹二郎嗤之以鼻，似乎在听天方夜谭。

“东亚病夫，一盘散沙！”牧野伸显挺着肚子肆意讥笑。

“二位大错特错了！”“错在何处？”牧野伸显和床次竹二郎异口同声诘问。

“我们虽有三方面的优势，但日本帝国的军权和行政大权现在却掌握在田中义一手里。

他召开东方会议，炮制《田中奏折》，制造炸死张作霖的‘满洲重大事件’，侵略野心恶性膨胀，进而将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出兵攻占满洲，侵略全中国，与英、美列强和全世界为敌，最后必然招致日本皇室和帝国彻底灭亡的危险下场！请问，你牧野伯爵虽坚决主张与英、美西方强国协调，但能阻止田中义一和日本军阀的侵略行径吗？能使日本皇室绵延持久，万世一系吗？”“这。……这。……”牧野伸显被问得张口结舌，无言答对，但碍于内大臣和天皇首席文官顾问的显赫地位，怎好不耻下问？遂把命令的目光投向床次竹二郎。

床次竹二郎看到牧野伸显斜眼投来的目光，仗着和蔡智堪较为熟悉，斗胆质问道：“支那是东亚病夫，早已百孔千疮，几乎被西方列强瓜分完毕，何来那么神奇的力量？蔡先生有点儿言过其实了吧？”“此言差矣！”“差在何处？”“中国虽遭受列强欺凌，百病缠身，但却具有惊人的凝聚力！不久前，张学良将军毅然在东三省改旗易帜，使蒋介石重新统一了中国！无论哪个列强，若想一口吞下全中国，都会被撑破肚皮！”“言之有理！”床次竹二郎似墙头之草，忙点头称是。

“当今之计，要救大和皇室与日本帝国，都必须借重中国的力量！”“蔡先生此话，难免有偏颇之嫌吧？”牧野伸显频频摇头，根本不相信有此一说。

蔡智堪见自己的一番宏论已打乱了牧野伸显的阵脚，更抖擞精神，铿锵有力地深入分析道：“只有借重中国的力量，才能使我们的三大优势真正发挥作用！”牧野伸显是个皇室至上主义者，又从骨子里瞧不其中国，但由

于礼貌，只不失身分地缓缓摇头，床次竹二郎则将修长的身躯凑近蔡智堪，轻声说道：“蔡先生，请你再说详细点儿！”“二位想必比我更清楚，日本帝国的实权操在田中义一和军阀的手中，无论是日本皇室，还是西园寺、牧野的半公开联盟，抑或是黑社会和右翼势力，都只能对田中义一和军阀有所掣肘，对其飞扬跋扈有所抑制，但都无力与其抗衡，不能予以毁灭性打击！”“有道理！有道理！”床次竹二郎连连击节赞叹。

“还有比这更严重的问题！搞不好泄露了秘密，很容易使军阀和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发动政变，或被他们派来的刺客、杀手干掉，性命难保！”几句话吓得牧野和床次胆战心惊，忙异口同声问道：“我们的出路何在？”“我们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把《田中奏折》透露给中国，造成强大的国际舆论和外交事件，动员中日两国的反军阀对外侵略力量内外夹攻，才能给田中义一毁灭性一击，把田中义一从首相宝座上拉下来，再踏上一只脚！”牧野伸显嘿嘿一笑，闭上眼睛静静养神。外表看去极为平静，内心里却似海中巨浪激烈奔腾。俄顷，他突然睁大双眼，以利电般的目光射向蔡智堪问：“蔡先生，你对制服田中义一有何具体设想？”“我们可以在炸死张作霖事件上大作文章，如不出意外，定能使田中义一走上绝路，再加上天皇的神威，就能置田中义一于死地！”牧野伸显精神大振，饶有兴味地请教道：“你看我们怎样行动？”蔡智堪暗想：要逮住狐狸，就要比狐狸还狡猾！于是，他有意“拿一把”说：“大主意还要你们自己来拿，我就管不着了！”牧野伸显狡诈刁钻，当然知道蔡智堪故意“拿大”的用意，便被迫做出让步道：“如果蔡先生的办法能马到成功，可以考虑透露《田中奏折》问题！”蔡智堪见牧野伸显已答应做出让步，就坦诚地一笑道：“两位请附耳上来！”牧野伸显和床次竹二郎听蔡智堪这么一说，立刻伸长脖子听取锦囊妙计。等蔡智堪如此这般一讲，两人都一起伸出大拇指，连声称赞“好计，好计”！然后欢天喜地而去。

床次竹二郎兴冲冲从依山傍海的兴津山庄赶回东京，未回家就直接前往他最熟悉的新桥山口饭店。

新桥是对床次竹二郎步入日本政坛有重要作用的地方，因而他对新桥有着特殊的感情。

他知道，新桥最初是东京夕留川上的一座桥名。明治维新之后，在新桥周围盖起了许多高级饭店。这些高级饭店又大都有年轻漂亮的艺妓作陪侍宴，因而日本大部分政客、财阀巨头都爱往这里跑，山口饭店简直成了议员和外务省官员的安乐窝。床次竹二郎同女掌柜很投缘，花柳场中的事情，两人都是行家里手。

床次竹二郎一走进山口饭店，风韵犹存的女掌柜立刻迎上前去，满面春风地热情问候：“床次先生，这几天到哪儿去了？怎么老看不见你？”“到兴津山庄去拜见西园寺公爵，耽误了几天。几日不见女掌柜，还真怪想念的！”“去你的吧，你一见兴津茶馆的艺妓，早把我忘到九霄云外了！”“别多心，我最多到兴津茶馆喝杯茶，歇歇脚！”“别欺人了！藏在樱花树丛深处的兴津茶馆，实际上是个高等妓院。那些精于茶道的艺妓，就是高等妓女，专门勾引像床次先生这样有钱有势有地位的达官贵人！床次先生一见如花似玉的美人，就走不动路了，不上钩才是咄咄怪事呢！”“别开玩笑，我一回东京，不就先来找你了么。……”两人正在说笑，忽然听见从山口饭店里面传来激烈的争吵声，赶紧跑过去一看，只见众议员中野正刚正和土肥原贤二争吵不休——中野正刚自早稻田大学新闻系毕业后，从当东京《朝日新闻》记者起

家，当过东方时论社主笔、社长，后进入政界，曾八次当选众议员，又慢慢走上法西斯侵略道路。此时，中野正刚施展斐声政界的卓越辩才，大声指责土肥原贤二说：“你土肥原是下流胚，无耻之徒！你为了寻找进身之阶，竟以一个名贵宝石为代价，偷偷拍下亲妹妹的裸体照片，把胞妹送给皇亲达官做小老婆，才换了个陆军大尉的军阶，到北京坂西公馆任武官助理，你威风什么，谁还不知道你这段丑恶历史？”土肥原贤二被中野正刚当众揭丑，顿时恼羞成怒，将短小身躯蹦到空中，跳着脚揭开了对方的老底儿：“你当选八次议员有什么了不起！要不是赔上老婆，你一次议员也当不上！你还怕别人不知道你的丑事，要我替你宣传宣传吗？”中野正刚见土肥原贤二当众揭了他老婆的短，真比打他一个耳光还难受，也恼羞成怒，欺负土肥原贤二人小体弱，抡起拳头就朝土肥原打去。

土肥原贤二虽人小体弱，但却经过专门训练，也动手还击，两人立刻扭打在一起，把长条小桌上的杯盘茶壶掀翻在地，乱作一团。

床次竹二郎见两个将来用得着的人正打得难解难分，忙上前去拉。谁知他是个文弱书生，架没拉开，反倒挨了几拳，痛得他直呲牙咧嘴，哇哇乱叫！

在场的民政党议员永井柳太郎、山道襄一、工藤铁男等见状，都一七上前拉架，但因都是读书人，架不但没有拉开，反而都被卷了进去，更使山口饭店乱到了极点！

“休得无礼，都停手！”随着洪钟般一声断喝，一个身材健壮的中年男人一跃跳入众人之中，只轻轻举动双手拨拉几下，就将众人驱向四处。

工藤铁男仗着是浪人出身，会一手好拳脚，好不服气，爬起来挥拳向拉架者打去，没想到就如同打在石头上一般，疼得他哇哇吼叫，众人这才对拉架者刮目相看。床次竹二郎首先吃惊地喊道：“哎呀，我道是谁，竟有这等本领--原来是蔡先生，你怎么来到这里？”“我暗中助你一臂之力嘛！好了，我帮你打开了场子，你英雄大有用武之地了，我有事告辞！”蔡智堪说罢，纵身飘然而去。

床次竹二郎见无法挽留蔡智堪，就回头以阔老身份招呼众位道：“诸位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今天请客，请各位赏光如何？”众人见有此美事，焉有不欢迎之理？床次竹二郎忙掏出一把钱，扔给山口饭店女掌柜。女掌柜马上命人在小长桌上摆满酒肉，众人一起吃喝起来。

酒过三巡，床次竹二郎特地把土肥原贤二邀至山口饭店的一间密室里，极其神秘地说：“土肥原君，我有件消息奉告。田中义一为给贯彻执行东方会议精神和《田中奏折》扫清障碍，已决定借口处分炸死张作霖事件的责任者，按帝国军法会议条规，严厉惩办陆军少壮派。据我所知，土肥原君和河本大作首当其冲啊！若被田中义一首相一巴掌打下去，你们就很难再有出头之日了！”土肥原贤二因为参与皇姑屯事件被调回国，虽担任了陆军新潟县高田步兵第三十三联队队长之职，但开始坐开了冷板凳。他很清楚，田中义一和长州藩集团的阴谋若得逞，他将永远从日本陆军中清除出去，他和同伙策划的入侵中国的野心勃勃的阴谋计划也将付之东流。

想到这里，土肥原贤二冷汗淋漓，手摸齐刷刷的小胡子求计于床次竹二郎道：“床次先生，我在满洲如鱼得水，纵横驰骋，但对国内政治斗争，却很不精通，还望先生赐教！”“土肥原君过谦了！”床次竹二郎见大名鼎鼎的土肥原贤二居然向他请教，暗暗佩服蔡智堪手腕高超，不觉喜形于色，侃

侃而谈，“土肥原君智谋过人，对此还不清楚？”“愿听先生高见！”“替土肥原君考虑，必须设法抨击田中义一，推翻田中内阁！”“我们能斗得过田中义一和长州藩？”“凭阁下的才智和关系网，田中义一哪是你的对手？”“过奖了，过奖了！”“本人从不言过其实，阁下的妹妹贵为皇族贵人，在皇族中具有巨大权势，再加上阁下胸藏谋略家的超人本领，只要你八方游说，就能组织强大的反田势力，与我们政友本党、民政党及陆军中的激进派联手行动，简直可以翻天覆地，扭转乾坤啊！”床次竹二郎说罢，两人同时纵声大笑。

在哈哈大笑声中，床次竹二郎和土肥原贤二满面春风走出山口饭店密室。中野正刚立刻以记者的特有敏感问道：“二位有何喜事，乐得合不拢嘴？”床次竹二郎避而不答，只将狡诈刁钻的目光投向土肥原。

“中野君，我们俩是不打不成交，现在共同的利益把咱们拴在了一起，想分也分不开了！”“这是。……这是什么意思？”中野正刚本来极讨厌土肥原贤二，现在见土肥原如此主动交好，慑于土肥原的大名和皇室背景，他也只得有礼相待。

只是被土肥原贤二突如其来起的话搞得迷惑不解，又不好意思直接问土肥原，而将探询的目光投向床次竹二郎。

床次竹二郎明察秋毫，笑容可掬地将土肥原贤二推到前面说：“请东方劳伦斯回答！”众人一起将惊奇的目光射向土肥原贤二，这位“东方劳伦斯”以当仁不让之势，向众人发出入席邀请：“请入席，边喝边谈！”于是，在杯盘交错声中，土肥原贤二施展出谋略家的全部解数，动员朝野反田中势力和陆军“激进派”，掀起抨击田中义一的高潮。……在第二天的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民政党议员中野正刚发挥超人的辩才，理直气壮地向首相田中义一质询道：“关于炸死张作霖的满洲交叉点事件，我们民政党议员已多次进行质询，田中首相总是以‘正在进行调查’进行搪塞，但是，这一牵涉到对大日本帝国有巨大嫌疑的重大事件，必须彻底予以澄清！请问田中首相，你接到的第一份报告内容如何？”田中义一晃动一下日本人特有的粗笨身躯，装腔作势以掩盖内心的慌乱，故意慢条斯理地回答质询说：“关于日本军人似乎与炸死张作霖事件有牵连的第一份报告，是陆军贵志弥次郎中将送到首相府，交给本首相的。他受张作霖之托，照看着他的二儿子张学铭，因而在交叉点事件发生后不久就视察了现常结果，他发现了引爆电线的痕迹。根据炸弹的性能和重量，他断定这决不是便衣队所能干得了的！”“第二份报告呢？”“第二份报告，是由住在辽宁大石桥的日本浪人工藤铁太郎，带给小川铁道大臣的。该报告说，有人委托陆军预备役少尉荒木五郎，如果炸弹不能按时引爆，就要荒木五郎袭击张作霖乘坐的列车！”“对荒木五郎下达命令的是谁？”田中义一对关东军在他离开陆军中枢后，不买他的帐极其不满，决心采取杀鸡给猴看的策略，因而故意显得略有迟疑的样子说：“据说是关东军的骨干军官！”“调查的结果如何？”中野正刚紧追不舍。

“本首相命令外务盛陆军和关东厅共同进行调查，又指示白川陆军大臣派峰幸松宪兵司令官去做现场调查！”“调查结果如何？”对此，田中义一显出极其为难的样子回答说：“调查结果尚未最后定论，本首相将亲自研究这一案件，尽快拿出可靠的结论！”田中义一说罢，气势凌人地环视国会会场一周，再重重地咳嗽一声，其潜台词是：“我已查清炸死张作霖事件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策划的，由独立守备队、日本驻朝鲜军部分工兵和日本浪人执行！你们少壮派军人若不听从本首相指挥，我就先拿你们开刀，用你

们的脑袋整顿军纪！”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永田铁山等少壮派军人在旁听席，恨得咬牙切齿。板垣征四郎像一头海豹一样低声嚷道：“不推翻田中义一，我们看来就要做他的刀下鬼了！”土肥原贤二急忙以手推板垣征四郎一把，让他先听民政党众议员工藤铁男的有力质询：“请问首相，政府打算如何处理有关人员？”田中义一从森恪向他提供的情报获悉，西园寺公望和内大臣牧野伸显及床次竹二郎正进行倒阁活动，暗中咬牙切齿地说声：“你不仁，也别怪我不义！”便施展以毒攻毒的计谋道：“本首相和元老西园寺公爵的意见完全一致！”“首相和西园寺公爵的意见怎样？”“西园寺公爵说得好极了！公爵极力劝我说：‘一旦最后查清是日本军人干的，就一定断然处置，以加强我军的纪律。

日本陆军的信誉固不待言，就是从国家的名声来说，也必须严肃处理！纵然暂时使帝国对支那的感情恶化，但却能维护帝国的国际声望！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帝国陆军恢复昔日的崇高声誉！”“首相有何高见？”田中义一鼻孔里冷笑一声，心中暗想：我才不讲自己的意见呢？一不作，二不休，再把西园寺公望往火坑里推吧！于是，田中义一又振振有辞地说：“西园寺公爵坚持主张：‘对内而言，一方面田中总理是军部出身，可以控制军部；另一方面，又有政友会那样强大的政党，可以下定决心去干。因此，无论对政党也好，对田中本人也好，坚定地维护日本军队的纪律，岂会带来非常好的影响吗？请务必下决心干。而且，一旦调查清楚确实是日本军人干的，就应立即惩办！’”中野正刚听到这里，再次站起来杀了个回马枪：“请问首相，关于‘满洲交叉点事件’，你如何向陛下启奏？”“我于去年12月24日谒见天皇陛下，上奏说：‘关于炸死张作霖事件，在我帝国陆军中，确有一些人被认为是首犯嫌疑。因此，已责成陆军大臣进行调查。调查后，将由陆军大臣奏报详细情况。

’”“白川陆军大臣上奏的结果如何？”“后来，白川陆军大臣谒见天皇陛下，上奏了调查情况，陛下对此发出圣旨说：‘要严格维持帝国军队的军纪！’”“感谢田中首相今天对议会的充分合作，请问其后情况如何？”田中义一暗中冷笑：本首相哪里是对议会进行充分合作，你们哪里知道，这是对政敌和少壮派军人的沉重打击！

借回答质询给政敌以足够教训后，田中义一便摆出首相盛气凌人的架势，无论议员们再怎样激烈质询，他便再也“无可奉告”，不发一言了。

议长无奈，只好宣布暂时休会。

这样，田中义一就凭借首相大权，把炸死张作霖事件暂时压下去了。

床次竹二郎似泄气的皮球离开国会，忙跑到内大臣府向牧野伸显汇报完情况，又奉命去找蔡智堪问计求援。

一进蔡智堪家门，屁股还未坐稳，床次竹二郎气冲冲地朝着蔡智堪叫嚷：“都是你出的好主意！鸡未偷成反蚀了一把米，不但没把田中义一打倒，反而叫他把罪名都推给了西园寺公爵和牧野伯爵，两位爵爷都很生气呢！”

“生气？他们应该高兴啊！”“高兴？他们急得愁眉苦脸，茶饭不香啊！”

“不，应该向他们表示祝贺！为此，他们该请我的客了！”“这是为什么？”

“田中义一自作聪明，自以为既出了两位爵爷的丑，又给陆军少壮派军人来了个下马威，殊不知他自掘坟墓，自寻绝路！”“先生的意思是。……”“中国有句话叫黔驴技穷，就是田中义一当前的绝妙写照！”“田中义一威风凛凛，不可一世，不太好惹呀！”“别看他气势汹汹，气壮如牛，实际上外强中

干，末日将临！”“蔡先生，莫开玩笑！”“蔡先生，说话留神点儿！”床次竹二郎怕蔡智堪给他惹下通天大祸，慌忙伸手劝阻。

蔡智堪不慌不忙，把床次竹二郎的手往外一推，反而把刺激牧野伸显的话说得更厉害：“那是因为牧野伯爵未接受本人的意见！”这话更使床次竹二郎惶恐不安，忙用手去拉蔡智堪，但牧野伸显不愧是久经沙场的政治家，他看出蔡智堪胆略过人，绝非逢迎巴结的等闲之辈，认定推倒田中义一的钥匙就掌握在蔡智堪手中，便拿出内大臣的威严大声吩咐：“床次竹二郎，不要这样纠缠蔡先生！”“是！”床次竹二郎听到内大臣的厉声斥责，老老实实坐在一旁，不发一言了。

“蔡先生，”牧野伸显从容摆出礼贤下士之态，彬彬有礼地倾身询问，“本大臣没接受你哪些意见？”“我早已讲明，若不借重中国的力量，日本的内政更会困难重重，要办成大事就不那么容易了！”“我怎样借重支那的力量？”“把《田中奏折》透露给中国！”“找谁交涉？”“蔡某人愿为牧野伯爵两肋插刀！”“找你？”牧野伸显和床次竹二郎又吃一惊，对蔡智堪的真正身分感到神秘莫测。

“不错！我老蔡受牧野伯爵和床次先生知遇之恩，见老朋友们有困难，怎能不两肋插刀，挺身解救？”“你有什么具体要求？”牧野伸显极其冷静地问道。

“请你让我阅读《田中奏折》的原件！”“看《田中奏折》？这谈何容易？”床次竹二郎瞠目结舌，说话声音都变了。

“不要大惊小怪！”牧野伸显愤怒地瞪床次竹二郎一眼，厉声斥责。

“是！”床次竹二郎吓得冷汗淋漓，规规矩矩坐在一边。

牧野伸显倏地站起，按老习惯背起双手，在山口饭店密室里又慢步转开了圈子。

密室里静极了，蔡智堪可以清楚地听到床次竹二郎心脏激烈的跳动声。

蔡智堪稳坐钓鱼船，冷静地观察牧野伸显异乎寻常的举止。待牧野伸显转到他面前时，忽见这位内大臣蓦然止步，一双老眼射出咄咄逼人的光芒。

蔡智堪情知到了关键时刻，更稳坐一旁一言不发。俄顷，果然听到牧野伸显以低沉而骄横的声音问道：“本大臣、本伯爵原交你这个当代的诸葛孔明，可以把《田中奏折》原件给你看，但你有把田中义一拉下马的万全之策吗？”“中国有句古语说得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蔡智堪回答得不卑不亢，又给自己留有回旋余地。

“这。……这。……”牧野伸显终于在关键时刻下了决心，“好，你有什么妙计？”“狠婆娘毒打丑媳妇！”“利用枢密院？”“牧野伯爵高见！”原来，日本枢密院是1888年成立的为天皇咨询而审议国务的机关，由议长、副议长和枢密顾问官组成。因其是直接给天皇咨询的机构，因而常能利用其特殊地位，左右内阁的施政方针，成为日本军阀藩阀政治的堡垒，所以被不少内阁成员称为“狠婆娘”，而内阁成员则把自己视为受气的“丑媳妇”。

牧野伸显听蔡智堪提出了“狠婆娘毒打丑媳妇”的妙计，忙极感兴趣地问：“我们在枢密院怎样充当‘狠婆娘’？”蔡智堪见牧野伸显绝口不提《田中奏折》之事，便有意“拿”他一把道：“仓促之间，我也没想好！”床次竹二郎见蔡智堪向自己暗递眼色，很明白其意图，加之想到前一天蔡智堪又送给他10万日元的竞选经费，便暗中朝蔡智堪点一点头，站起身轻轻走到牧野伸显面前推心置腹地悄悄说：“牧野伯爵，蔡先生帮咱们出了不少绝妙主意，

真够朋友，但看《田中奏折》的事却毫无踪影，他也学乖了，如今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你看。……”“噢--本伯爵知道了，但这可非同儿戏啊，开不得玩笑！”“那是当然，但除此之外，我们斗不过田中义一呀！”牧野伸显仍频频摇头，口中念念有辞：“此事若被泄露出去，我们会被骂为卖国贼的！”床次竹二郎轻轻笑道：“牧野伯爵不必为此担忧，在掩盖事实真相方面，我是行家里手，谁不知道本人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本领？”“你有什么高招儿？”“我们对此矢口否认，硬说根本不存在什么《田中奏折》，让它成为千古不解之谜！”“这谈何容易！简直是异想天开，搞不好会毁了我一生英名！”蔡智堪一直在一旁静听床次竹二郎代他力劝牧野伸显，暗笑金钱在日本确实能使鬼推磨。见这位内大臣仍不为所动，便适时张口说话了：“是一生虚名要紧，还是身家性命重要？”牧野伸显听了乐得哈哈大笑道：“在大日本帝国，本伯爵贵为内大臣兼今上天皇的首席文官顾问，脚一跺，整个东京都颤抖，谁胆大包天，敢动我一根毫毛！”“牧野伯爵此言差矣！”“何以见得？”“伯爵请坐稳，听我设身处地替你分析：自古至今，政界和皇室斗争从来都刀光剑影，血迹斑斑！多少达官显贵，哪个不有权有势，还不照样死于非命？更何况如今的陆军少壮派无法无天，樱会、一夕会活动猖獗，右翼和黑社会组织玄洋社、黑龙会、行地社、天剑党等更如雨后毒菌，遍地丛生，其党徒都是些杀人不眨眼的家伙，专门找达官贵人开刀！”“不见得吧？”“不见得？山县有朋被称为‘帝国陆军之父’，身为长州藩首领，又多次组阁出任首相，地位肯定在牧野伯爵之上吧？但在反对今上天皇和皇后陛下的婚事时，头山满还不是照样派党徒，大摇大摆进入山县有朋府上，仗着皇室的势力，公然持刀威胁说：‘本人如能领受尊夫人的性命，将不胜荣幸之至！’到头来，山县有朋还不是向皇室和黑社会势力屈服了吗？”“这。……这。……”“远的咱不说，就说你的盟友西园寺公望贵为公爵，他的儿子西园寺八郎，还不是照样被黑龙会暴徒打得遍体鳞伤？打伤还不算，又公然在西园寺八郎身上留下一卷二尺长的字条，骂他是卖国贼！贵如帝国最后一个元老，西园寺公望到头来不也和山头满互相道歉完事吗？”“这。……”“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请问，你牧野伯爵得罪了日本军阀和黑社会势力，他们会对你特别仁慈手软吗？”“嘿嘿。……哈哈。……”蔡智堪见牧野伸显仍哼哼哈哈不肯在《田中奏折》问题上表态，便以攻为守，站起身抱拳打恭道：“既然牧野伯爵这样为难，老蔡决不为难朋友，恕不奉陪，后会有期！”牧野伸显见蔡智堪真生气要走，想起他们与田中义一和长州藩的生死较量，考虑到性命难保的凶险前途，忙从怀中掏出一枚圆形的金质小牌，在空中一挥道：“蔡先生请留步，请看这件东西！”“这是什么？”“皇居临时通行牌！”“它有何用？”“有了它，就可随时出入皇宫！”蔡智堪见此喜出望外，忙上前接过金色通行牌仔细观看，牌上的几个汉字赫然映入眼帘：皇居临时通行牌72号！

蔡智堪接过收好，笑容满面地称赞道：“牧野伯爵果然深谋远虑，处事果决，见识超群，佩服，佩服！”“蔡先生才是盖世奇才，智勇双全，可敬，可敬！”床次竹二郎见他撮合斡旋的私下会晤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也沾沾自喜地拍两人的马屁道：“两位都是当代奇人！两位奇才握手，才真是可喜可贺！”蔡智堪兴致勃勃，也不忘给床次竹二郎一些甜头：“床次先生不愧是日本著名政治家，门路众多，八面玲珑！”

你为中日两国友谊做了好事，是永远不会被遗忘的！”“承蒙夸奖，不

胜荣幸！来，让我们共同策划大事！”“好，我告诉你怎样凭牌潜入皇宫御文库！”“高，我奉告如何使狠婆娘毒打丑媳妇！”“妙，为我们的密切合作干杯！”“干杯！”1929年的东京之夏，炎热来得特别早，刚到6月26日，就已热得人头晕目眩，汗水淋漓了！幸亏随着傍晚的来临，徐徐吹来阵阵凉爽的微风，才使人感到舒服多了，东京的大街小巷上出现了熙熙攘攘的消暑人群。

宽阔的皇宫护城河边，树林茂密，郁郁葱葱，景色秀丽，游人如织。

这时，迎着艳丽的晚霞，从远处走来一对颇具魅力的男女。只见男的中等身材，刚健英武；女的是典型的欧洲窈窕女郎，肌肤似中国杭州绸缎般光滑湿润，微启的嘴唇犹如刚刚绽开的花瓣。

蔡智堪在俄国姑娘丽莎的掩护下，扮作情侣在护城河旁，与牧野伸显的妾弟山下勇接上了关系。

山下勇带蔡智堪跨过拱桥，越过红叶山，穿过弯弯曲曲的亭堂，走过黑漆漆的松树林，再向南经过宫内神社、明治天皇的旧时寝宫，约十分钟后，拐弯抹角来到裕仁天皇生活和工作的御文库。沿途，奇特的弯曲幽径，使蔡智堪迷离恍惚，幽静秀丽的景色令人赞叹不已。

山下勇让蔡智堪在一棵大树阴影里隐蔽等待，他一人进御文库去看有无妨碍之人。

蔡智堪背靠大树暗中观察，只见这御文库是一座长方形混凝土低矮建筑，坐落在内宫的边缘，就像一座水泥碉堡，掩映在黑森森的树林和初夏盛开的美丽花卉丛中。

不一会儿，山下勇急步跑回大树下，惊慌地低声说：“蔡先生，大事不好！”“别慌，出了什么事儿？慢慢说！”“有五个宫中侍卫，在御文库门口站着不走！不知他们要干什么？”“他们平时也这样吗？”“不，平日只定时巡逻，到御文库门口看看就过去了，并不停留！”“走，咱们到前面看看再说！”山下勇和蔡智堪在大树和花丛掩护下，悄悄走近御文库门口，只听五个宫中侍卫正站在门口发牢骚：“侍从武官长发什么神经病，非说这几天有人要来偷什么《田中奏折》，非要我们加强御文库的警卫，定期巡逻！”“都是森恪那家伙搞鬼，非说他得到了可靠情报！”“我看都是瞎胡扯，皇宫警卫森严，没有皇居通行证，什么人也别想进来！”“小心点儿吧，别出事砸了咱们的饭碗！”“真倒霉，耽误了我和杏子的幽会！”蔡智堪听到这里猛吃一惊，正在狐疑之际，忽听山下勇焦急地问道：“蔡先生，莫非泄露了机密？”“莫惊慌，等会儿再说！”蔡智堪和山下勇在树荫花丛中，静听御文库和皇宫四周的动静，只听见五个宫中侍卫在御文库门口闲扯一些无关紧要的闲话，只好耐着性子静听等待。从夜里9时直到半夜子时，五个宫中侍卫才打着哈欠起身离去。

山下勇看五个宫中侍卫走远了，才领着蔡智堪悄悄来到御文库门口，掏出钥匙轻轻打开门锁，摸进门去，打开一个小灯，向里走去。

蔡智堪对皇宫特别是御文库充满好奇心理，见御文库既摆着富有东洋风格的高大的中国箱子，也有充满西洋风味的法兰西第一帝国式沙发和维多利亚式餐具橱，而连通着各个房间的拉门则纯粹是日本式的。

山下勇把蔡智堪引到一个二十七方英尺的大办公室里。

只见这间皇宫办公室果然与众不同：墙上挂着裕仁作为皇太子访问欧洲诸国时，分别和法国贝当元帅、威尔斯亲王和比利时王储利奥波德的合影。

办公室最显眼处，摆着一张法国式写字台，一把高背靠椅立在写字台前。在神龛两旁，放置着拿破仑和达尔文的两座半身塑像。在这大办公室的另一端，推开花鸟屏风，便可通向阳台，俯视名闻遐迩的吹上御苑。

蔡智堪正好奇地观察皇宫御文库气派非凡的办公室的情景，忽见山下勇匆匆走来，把一个文件夹递到自己手中。

蔡智堪急忙打开文件夹一看，只见田中首相奏章六个大字赫然跃入眼帘，不由暗自兴叹：“终于看到这份神秘的奏章了！”他拿起《田中奏折》一看，见此奏章用日本内阁奏章专用的“西内纸”精缮而成，虽只七八十页，但却觉有千斤之重。蔡智堪立即像被巨大磁石紧紧吸引住了，不由自主地瞪大双眼，手颤抖着将奏章粗翻几眼，《田中奏折》中的几句话马上使他瞠目结舌：将来欲制支那，必以打倒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以我日本帝国之存在上必要之事也。

蔡智堪看到这里，狠狠骂道：“小日本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蔡智堪深知时间宝贵，又抓紧时间浏览，翻过几页，看到更令人惊心动魄的部分：我对满蒙权利如可其真实的到我手，则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之假面目而风靡支那四百余州，再则以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及欧罗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大关键也。

山下勇见蔡智堪只顾埋头翻阅《田中奏折》，便焦急地步过来小声提醒说：“蔡先生，时间紧迫，别只顾看了，快些抄吧，我替你望风！”山下勇的一句话提醒了蔡智堪，忙弯腰拎起工具袋，从袋中取出准备好的碳酸纸--系床次竹二郎提供的民政党总裁专用的薄质原稿纸，然后将碳酸纸片在《田中奏折》原件上，用铅笔照猫描虎地抄了起来：田中密摺田中首相致宫内大臣一木喜德请代奏明积极政策函昭和二年7月25日内阁总理大臣田中义一署名外务大臣田中义一副名铁道大臣、大藏大臣副名宫内大臣一木喜德对满蒙积极政策执奏之件欧战而后，我大日本帝国之政治及经济，皆受莫大不安。揆其原因，无不因我对满蒙之特权及确得之实利不能挥发所致。因此，其烦陛下圣虑，罪大莫逃。然臣拜受大命之时，特赐对支那及满蒙之行动须坚确保我国权利，以谋进展之机会云云。圣旨所在，臣等不胜感激之至。然臣自在野时即主张对满蒙积极政策，早极力欲使其实现，故为东方拓开新局面，造就我国新大陆，而其颁布昭和新政计，自6月27日至7月7日共11日间，召集满蒙关系之文武百官，开催东方会议，对于满蒙积极政策议定如左，烦其执奏，谨此依赖。

蔡智堪正在灯下备笔疾抄，山下勇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跳起，将御文库的电灯关掉，御文库里顿时期黑一团。蔡智堪神情紧张地急忙问道：“山下君，出了什么事？”“有一个黑影正向这里走来！”蔡智堪在黑暗中急步摸到门前，借着门口的灯光向外看去，见一个黑影越来越近。不一会儿，那个人来到御文库门前，蔡智堪低声问山下勇：“这是谁？他来干什么？”“看样子是宫内侍从黑木正光。这家伙正被他表妹田中杏子搞得神魂颠倒--天快亮了，又黑灯瞎火跑出来干什么？”蔡智堪和山下勇气息观察，看见黑木正光好像丢失了什么东西，在御文库门口仔细寻找，忽然弯下腰，在台阶

下捡起一团纸，欣喜地失声大叫：“我的妈呀，可找到了！丢了表妹的情书，杏子就再不理我了！”黑木正光手捧表妹情书，欢天喜地边走边哼着爱情歌曲。

蔡智堪和山下勇见黑木正光愉快地哼着爱情歌曲走远了，才徐徐出了一口长期，把悬在半空的心放下来。山下勇又轻轻打开一个小灯，怀着惊魂未定的神情骂道：“这个黑木，真把我吓得灵魂出窍！”“幸好虚惊一场，没出事就好！你还辛苦望风，我抓紧时间干活儿！”

“蔡智堪说着，又利索地将一张碳酸纸片在《田中奏折》原件上，手握铅笔继续匆匆抄描：按明治大帝之遗策，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等皆已实现，唯第三期灭亡满蒙以作征服支那全土，则异服之南洋及亚细亚全带，无不畏我服我而仰我鼻息云云之大业，尚未能实现，此皆臣等之罪也。

山下勇见东方的天空中出现了鱼肚白色，满天的繁星也慢慢逝去诱人神往的力量，便果断地提醒道：“蔡先生，天快亮了，今天先抄到这里吧，另找时间再来！”蔡智堪抬头望望窗外，赶快将《田中奏折》原件整理好，交给山下勇，再将誊抄的材料仔细揣入怀中，把碳酸纸和铅笔收进工具袋里，趁着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匆匆从原路走出日本皇宫。

这一晚，徐祖华、丽莎、玛丽特一直在皇宫外面接应等待。

为打发难捱的时光，为掩饰心中的惊恐，玛丽特满含深情地唱起了徐祖华教给她的《无题》爱情长歌：相逢日益稀，相思日日驰，此身常郁郁，云天无情时。

.....在黎明前的微光中，丽莎手抚垂在胸前的暗绿宝石，看玛丽特含情脉脉地依偎在徐祖华身上，动情地唱着日本情歌，不由触景生情，想起了自己的坎坷经历--丽莎原是一个俄罗斯贵族的天真烂漫的女儿，后来嫁了个沙皇军队的团长。那时，她犹如一只美丽的小鸟，面对新房中娇艳芬芳的白花，用着高贵精致的梳妆台，睡着高雅雪白的软床，整天翻阅天鹅绒烫金封面的神奇画册，阅读把人带往天国迷宫的小人书。

丽莎做梦也没有想到，十月革命犹如西伯利亚六月的暴风雨，一下子打碎了她虚无缥缈的美梦，将她卷回冷酷现实的人生之世，使她从此失去了温柔馨香的新房、豪华丰盛的宴席、气派贵重的财物，她再不能悠闲自在地倾听伏尔加河上优雅动听的歌声，再不能吃饱喝足后随心所欲地欣赏冰清玉洁的北国夜景，再无钱漫游清雅的瑞士、金色的意大利，而告别风帆往来如画的俄罗斯，经西伯利亚、中国东北，流浪到东方的巴黎--上海，沦落为舞女、卖淫妇，甚至得了可怕的梅毒！

丽莎痛不欲生，就要跳黄浦江自尽时，端纳救了她的命，治好了她的梅毒，从此跟端纳走上国际间谍之路。

丽莎对新生的苏维埃怀有刻骨的仇恨，企图用西方的力量打败苏联，重返她日思夜想的俄罗斯。她积极协助蔡智堪搞《田中奏折》的目的，是把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矛头，重新指向苏联！

丽莎看着徐祖华和玛丽特相亲相爱的情景，不由想起了她的新婚之夜，想起了洞房中温柔甜蜜的气氛，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当年丈夫白根与她热恋时唱给她的情歌：姑娘啊，你爱我吧！

我付给你纯洁的心灵。

姑娘啊，你应当知道，爱情比黄金还要神圣徐祖华正陶醉在优美动听的俄罗斯情歌之中，突然看到蔡智堪和山下勇从皇宫里匆匆走出，便和两位

女郎一起迎上前去。

两伙人碰面后正要重新组合，忽见一队日本巡警沿着护城河，耀武扬威走了过来。微暗中，只见巡警皮带上的金属扣闪闪发光。

带队警官恶狠狠地瞪着众人怒吼道：“天快亮了，还不快回家睡觉，小心把你们当成共产党抓起来！”丽莎和玛丽特向巡警做个鬼脸，分别拉上山下勇和徐祖华，嬉闹着钻进昏暗的松树林中，警官吐口唾沫，骂声“下流胚”！便带部下沿护城河巡查而去。

蔡智堪见巡警转过护城河的拐角处，看了一眼宽阔的护城河中一群群自由自在游动的白鲤鱼，拨开垂到脸上和肩头的柳枝，往相反的方向来到一条大街上找饭馆慢慢吃饭消磨时间，然后到邮局中，把抄来的几十页《田中奏折》分装四个信封，寄给中国沈阳的王家桢收。

从邮局出来，蔡智堪不顾一夜的劳累，又迈着轻盈的脚步，返回来向位于皇宫附近的枢密院走去，兴致勃勃地去观看“狠婆娘毒打丑媳妇”的闹剧。

蔡智堪深知枢密院在日本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负责就重要国务和皇室重大问题向天皇提出咨询建议；拥有草拟宪法和解释宪法疑义权；担负天皇宣布戒严令及签订对外条约等重要问题的咨询；负责咨询皇室重大问题，对解决皇室问题有决定权；议会通过的决议，必须取得枢密院的同意才能生效。因此，日本政治家把枢密院、议会、内阁称为支撑日本近代天皇制的三根支柱。枢密院被明治宪法规定为天皇的最高顾问府，亦被称为天皇的最高参谋部。谁都知道，枢密院秉承天皇意志办事，枢密院通过的决议，事实上就是天皇的意旨！这样，在枢密院就有好戏看了！

蔡智堪正沿着宽阔的护城河前行，忽然听到急切的呼喊声：“蔡先生，请留步！”蔡智堪抬头一看，见是老相识床次竹二郎，忙上前问道：“床次先生，你从何处来？”“枢密院！”“情况如何？”“蔡先生请猜！”“我猜？看床次先生满面春风，肯定有好消息！”“蔡先生高见！”“床次先生请讲！”“田中义一已焦头烂额，四面楚歌！”“请道其详！”“在内阁和议会，田中义一还可依靠森恪一伙垂死挣扎，绕过急流险滩，但一到枢密院，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伊东已代治、金子坚太郎、平沼骐一郎执枢密院牛耳，就由不得田中义一了！”“这三个人不是子爵，就是伯爵，都与政友会是一伙的呀！”“他们听说天皇陛下对田中义一大发雷霆，就在《非战公约》和炸死张作霖问题上，要借机清算老账，以儆将来了！”“天皇陛下对田中义一大发雷霆？”蔡智堪犹如听到晴天霹雳，但随即镇定下来，若无其事地问道。

床次竹二郎神秘地微微一笑：“这里不是说话之地，走，到寒舍痛饮，举杯庆祝天大的好事！”床次竹二郎说罢，拉了蔡智堪便走。

两人来到床次家，床次命欺人在客厅里摆上酒宴，盛情招待蔡智堪。

还未等蔡智堪发问，床次竹二郎早就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作为张学良提供大笔竞选经费的回报，对蔡智堪和盘托出日本政界的绝密情报——“我们萨摩藩都是天皇陛下的亲兵，把效忠天皇看得高于一切！长州藩和田中义一却肆意推行武力吞并满蒙政策，终将引起美欧诸国和中国的反对，也会深化国内矛盾，少壮派军人又一味地轻举妄动，把日本帝国推上危险的战争道路，危及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度，还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天照大神也会暗中保佑我们，破坏田中义一的危险政策，从而使天皇制世代相传，万年不绝！”蔡智堪听罢，脸上露出欣喜的神情，更自觉地利用民政党和政友会的矛盾，

便举杯向床次竹二郎祝贺：“床次先生和萨摩藩忠于皇室的行动终于感动了天照大神！我衷心祝贺你们在萨摩藩与长州藩的争斗中占了上风，很快会取得全胜！”床次先生刚才说，天皇陛下对田中义一大发雷霆，究竟是怎么回事？”床次竹二郎见蔡智堪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不紧不慢地端起一杯日本青酒缓缓饮下，又有滋有味地吃一口鲜嫩脆香的生鱼片，才故弄玄虚地讲起--1929年6月下旬，民政党纠集以头山满为首的日本右翼团体，在炸死张作霖事件和签定《非战公约》两条战线上，对田中内阁发动猛烈进攻。攻击田中内阁批准《非战公约》违反大日本帝国宪法，因为该宪法第十三条规定，与外国缔结条约的权力属于天皇，因而“以人民的名义”这句话侵犯了天皇大权。头山满还特别上奏天皇，指责田中义一大逆不道。

枢密院也改变支持田中内阁的态度，起劲地反对批准《非战公约》！

这一下，田中义一慌了手脚，拚命纠集东京大学教授立作太郎、高木八尺、美浓部达吉及《朝日新闻》拚命抵抗，但明显处于下风，不得不发表屈服于枢密院的声明：“从帝国宪法的条款来看，意识到‘以人民的名义’这句话是不适用于日本的！”6月26日，《非战公约》在附以有保留声明的情况下，通过了日本枢密院的咨询关，但让该条约的日本国签字者内田康哉做替罪羊宣布辞职。在炸死张作霖事件上，田中义一也企图以给河本大作行政处分的方式蒙混过关。

两天后，床次竹二郎又向蔡智堪提供了出人预料的情报--6月28日上午，在内阁会议上，田中义一以为已侥幸过关，喜滋滋地说：“关于交叉点事件，已决定对有关人员给予严厉的行政处分。本案的处理，由于遇到意外的障碍而迟迟未决，这次总算决定下来，估计白川陆相今天就会向天皇陛下奏报！”田中义一不等内阁会议结束，就命陆军大臣白川义则上午11时进宫上奏称：“张作霖被炸虽非我军所为，但此事发生在我附属地内，因此，应该处分负责警卫的人员！”白川义则奏毕，向裕仁天皇呈上一个从轻处理河本大作等三人的方案。

裕仁天皇接过侍卫呈上的处理方案，越看脸色越难看，终于似火山爆发，怒不可遏的斥责道：“不管张作霖是什么样的人，他那时是东三省的统治者，陆军暗中下手将他杀害，太无道理，必须严惩，以戒将来！”--让田中义一下午见我！”当日下午一时半，田中义一怀着惊恐不安的心情，晋谒裕仁天皇，上奏说“将不得不按陆军大臣白川义则上午上奏的方案处理交叉点事件”。裕仁天皇勃然大怒，厉声斥责道：“这么说来，不是跟以往所奏相矛盾吗？”“圣上息怒，请听我慢慢说明情由！”“没有必要听你的说明了！”裕仁天皇说罢，转身进后宫而去。

田中义一看裕仁天皇盛怒而去，惊得张口结舌，呆若木鸡。

皇宫侍从武官长铃木贯太郎忙将裕仁天皇迎进内室，扶裕仁坐下，又转身从侍从手中接过香茶献上，裕仁天皇带着气愤的神情说：“田中义一所奏，根本没法理解，我讨厌再听田中的解释！”铃木贯太郎诚惶诚恐地退下，马上跑到首相府，把裕仁天皇的话源源本本告诉了田中义一。

田中义一听罢，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般，凄然而惶恐地流下眼泪，只得按着元老西园寺公望的暗示，当即决心总辞职。

床次竹二郎眉飞色舞地讲到这里，端起酒杯提议：“来，为田中义一下台，干杯！”“干杯！”“《田中奏折》搞到了吗？”“已搞到一半！”“事不宜迟，快快动手！”当天傍晚，当红彤彤的晚霞幻化出五光十色的轻纱，把日本皇

宫和护城河打扮得绚丽多彩时，蔡智堪和他的密友们又出现在护城河漫步。他们扮作一对对情侣，时而望望挂在苍穹中的弯弯月牙，时而凝视倒映在护城河中的灯光夜景，监视着从日比谷那边走来的皇室巡警。……直到夜深人静，蔡智堪才和山下勇背着工具袋，装作进宫补册的装订工，凭皇居临时通行牌，从红叶山下的宫门进入皇宫，拐弯抹角来到御文库。山下勇掏出钥匙打开门，带蔡智堪再次进入皇宫御文库。

蔡智堪刚到办公桌前坐下，山下勇就麻利地把盛着《田中奏折》的文件夹，放到蔡智堪的面前说：“蔡先生，你抓紧时间干，我还去门口望风报信！”“那好，麻烦你了！”蔡智堪见山下勇向门口走去，忙打开文件夹，找到上次抄写的“此皆臣等之罪也”处，从工具袋中取出碳酸纸和铅笔，将碳酸纸片在《田中奏折》原件上，手握铅笔飞快描抄：按吉林省合奉天及黑龙江一部分，我古代历史称为“肃慎”民族，今则繁殖于沿海洲，黑龙江畔图们江流域等者是也。其民族之沿革，古称为古来“肃慎”、移狍、把娄、沃沮、扶余、契丹、渤海、女真等，其兴废多种多样，良莠不齐，我国清正公进击会宁及间岛，其爱新觉罗亦起于宁安附近，先平定敦化、间岛、琿春地方为起源，遂定大清天下三百年之基矗蔡智堪抄到这里，一张纸恰好抄满，迅速换上一张碳酸纸，又急急忙忙地抄描下去：吉林历史如此，故欲造成我新大陆以开极新之面目者，我如不先造势力于吉林地方，必不能征服满蒙，从而不能征服世界。故吉会路之完成，即我昭和新政之完成，新大陆之成功，即征服亚细亚全洲之成功！

不啻我国政策上最重大之路线，是亦国益产生之重要路线也。

蔡智堪在对日本军国主义猖狂侵华的激愤中飞速描抄，不觉时光飞逝，已到夜半子时，看到《田中奏折》中下面一段话，对日本在东北修建吉会铁路的狼子野心，更加昭然若揭：如吉会铁路可成，在南满、北满与朝鲜成为大循环路线，其长春至兆南到大赉至兆南为成小循环路线，可以四通八达，利我军旅有食料运输之便，是北满富源之征服，亦可确实矣。且其北满之富源，经吉会路越海而运至我敦贺、新潟等港者。敌潜水艇必无有力能侵入我朝鲜及日本海峡，从而战时之交通，经济中自由及独立。所论日本海为中心之国策者，此也。夫如是，战时之食料及原料可足，则美国虽有雄大之海军，支那虽有多众之陆军，亦俄虽有众多之官兵，终必无如我何！

蔡智堪正在埋头拚命抄写，突然灯光熄灭，山下勇仗着地形熟悉，摸黑走到蔡智堪面前，悄声说道：“不好，有人来了！”到门口一看，蔡智堪不由低声叫苦：“坏了，出不去了！”山下勇拉了蔡智堪便往回走，刚钻到墙角的一架屏风后面，就见御文库的门被打开，皇室侍从武官长铃木贯太郎带领一伙侍卫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随手拉开电灯开关，挥手厉声命令道：“搜，我远远看见这里有灯光，肯定有坏人！这几天内阁更迭，要特别小心坏人混水摸鱼捣乱！”众侍从答应一声，立即分头搜查。

蔡智堪在屏风后面冷汗淋漓，见山下勇吓得面如土色，忙小声劝道：“山下君，别害怕，我决不葬送你的锦绣前程--你藏好，实在不行，我就一个人冲出去！”山下勇见蔡智堪如此仗义，也颇为感动，忙拉住蔡智堪的手说：“别慌，看看再说，我们见机行事！”这时，屏风外面传来咚咚咚的脚步声，蔡智堪和山下勇都把心提到嗓子眼儿，握紧拳头，拉开架势，准备必要时拚命一搏！

突然，一个40多岁的中年侍卫转入屏风后面，蔡智堪猛虎下山般一

跃跳到山下勇前面，将其挡住，抡拳便要与人动手拚命，那中年侍卫却故意大声嚷道：“别神经过敏，连个人影也没有！”山下勇听声音好熟，忙上前一看，竟是自己的好朋友石川忠雄，忙喜出望外地小声打招呼说：“喂，石川君，我是山下勇！”蔡智堪见这个侍卫面对他这个大活人，竟说“连个人影也没有”，又是山下勇的好朋友，极度紧张的心才稍微放松了一点儿，正要上前打招呼，只听那中年侍卫低声对蔡智堪说：“蔡先生，我们在东京帝大后房见过面，我们是志同道合者！”蔡智堪觉得这个中年侍卫有些面熟，但却记不清到底是谁，经他说明，这才知道他原来是日本共产党东京帝大细胞组织负责人，忙上前紧紧握住石川忠雄的手，激动地说声：“谢谢！”“石川侍卫，发现可疑分子没有？”石川忠雄正要与蔡智堪说话，忽然听到皇室侍从武官长铃木贯太郎的喊声，忙从口袋中掏出两根蜡烛交给山下勇说：“别开电灯了，用蜡烛吧！小心点儿，我在外面照顾，你们赶快干！”石川忠雄说罢，匆匆与蔡智堪握了握手，迅即迈步走到屏风外面，故意大声嚷道：“堂堂皇宫，警备森严，一只小鸟也别想飞进，几百年没出过一次差错，怎么会有坏人混进宫来？”这时，十几个侍卫也纷纷报告没有发现可疑现象，石川忠雄上前对铃木贯太郎道：“请侍从武官长回府安歇，我留下在御文库周围巡逻，请放心！”“那好，就烦劳你了！”铃木贯太郎说罢，带众侍从离御文库而去。

等御文库又复归安静之后，山下勇麻利地划火柴点燃蜡烛，拉严窗帘，蔡智堪把工具袋中的东西全倒在桌子上，拿起《田中奏折》的十几页原件递给山下勇提议说：“外面有石川忠雄张罗，我们两人分头抄吧。这样快一点儿，你看如何？”“好！”蔡智堪把袖子一捋，趴在桌子上又紧张地飞描起来：殊如我国之对满蒙，此后必须变更其主义，以其勇往迈进，是故措施为之中心点，必须集中于东京，第一可以保守其秘密，第二可杜绝支那政府采探我国之进行，第三可避事前各国之嫉视，第四可以收束满蒙四头政治为统一，第五可保内阁与满蒙关系官厅之接近，及可合治于一炉，以便全力对待支那。因有此种种之利害起见，仍依伊藤及桂太郎合并朝鲜之主旨，设立拓植省以专管满蒙进取之事务，特以台湾及朝鲜、桦太等殖民地，付之管掌为题，实务仍以满蒙进出为目的，以其混淆世界聪明，亦可防遏国内不统一之暴露。

蔡智堪正在奋笔疾书，山下勇拿着抄好的十几页文件走过来说：“你分给我的欢迎《第三国际投资于满蒙》、《南满铁道公司必要变更其经营》、《钢铁问题》、《煤油问题》等部分都抄完了！你进展如何？”“不太多了--给你再抄《对支那移民侵入之防御》部分！”“好，我们拚命干！”于是，两人会心地一笑，都趴在桌上奋笔疾书。

蔡智堪活动一下酸痛的手指，将手指放在唇边吸了几口气，赶忙抄写他所分的最后一段文件：更驱使朝鲜民再开拓生地原野，以备我国民移住之便利，此乃水田及豆类开拓之积极政策，而对于畜牧政策，一则另以劝业公司为专门畜牧机关，以便得寸进尺，收集其畜产而供我国之自给自足。他如军马之放牧及播殖，则仍以劝业公司，抑或另设别动队，进入内外蒙古，大力播殖，以充我国防用马之完备。

蔡智堪刚抄完最后的“完备”两字，搓搓酸痛的右手，站起来一看，见山下勇也面露笑容，手拿抄写工具和文件向他走来，急忙问道：“山下君，你抄完了？”“大功告成，你呢？”“我也完成了任务--你还回文件，我收拾抄件和工具，快！”两人利索地一起动手，不一时收拾完毕，装好抄好的文

件，再动手熄灭蜡烛，将两截残烛用纸一包，也塞进工具袋中，然后摸黑来到御文库门口，山下勇掏出钥匙从里面打开门，两人偷偷溜出。山下勇返回门锁上门，见石川忠雄早已在门外等候。

“蔡先生，搞完了？”“全部抄完了，谢谢你！”两个志同道合者的四只大手紧紧握在一起，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天不早了，快送蔡先生出宫吧！”一句话提醒了石川忠雄，忙把一套皇宫侍从服装交给蔡智堪说：“蔡先生，快换上，千万莫大意！”蔡智堪忙将皇宫侍卫服穿在外面，再次向石川忠雄和山下勇致谢，石川忠雄急切地说：“现在尚不忙谢，你还处在危险之中--山下勇，你带蔡先生出宫，我在暗中保护，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蔡智堪再次和石川忠雄亲切握手，然后随山下勇从原路返回，匆匆走出皇宫。

徐祖华等人一直在红叶山下的皇宫门外附近接应，见蔡智堪和山下勇从皇宫走出，众人才如释重负，在后面悄悄掩护。

蔡智堪和山下勇沿着皇宫的护城河缓缓前行，来到护城河转弯处的柳树丛中。蔡智堪四顾无可疑人注意，先将皇宫侍卫服脱下，迅速交给山下勇，看山下勇仔细收入空包中装好，又从口袋中掏出金质圆形的第72号“皇居临时通行牌”，郑重地还给山下勇，真诚地鞠躬致谢说：“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你，中国人民永远不忘你的深情！”“不必客气，就此作别，请蔡先生好自为之，珍重，珍重！”山下勇说罢，匆匆返回皇宫，蔡智堪则在徐祖华等爱国侨胞和外国友人帮助下，回家将几十页文件分装在几个信封里，然后连同自己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把《田中奏折》寄回沈阳，寄回灾难深重的祖国！

六、美国为什么怕追查《田中奏折》

当事人蔡智堪、王家桢终于站出来讲话，遂使《田中奏折》真相大白于天下，但日本当局和某些学者仍矢口否认。

被世人喻为靠打嘴巴练出来的“武士道”精神，说起谎来脸不红心不跳当属自然，而美国出于战后冷战政策需要，以“真伪莫辨”为由，也否认《田中奏折》的存在。

《田中奏折》一出日本皇宫，就在中国和日本引起轩然大波，成为近代中日关系史和世界近代史上的一桩公案，70多年欲罢不能，至今仍争论不休。

首先接到《田中奏折》抄件的自然是卓越外交家王家桢。

1929年6月下旬的一天，王家桢正在“东北边防长官公署”外交秘书主任办公室里处理公务，突然，豆腐西施彭汉贞像一只花蝴蝶，随一阵风飞到王家桢面前，扭动着杨柳蛇腰，嗲声嗲气地嚷道：“王处长，真是个大忙人，在忙什么呀？”王家桢对这个亲日派非常反感，特别对她在田中义一和杨宇霆之间穿针引线极不为不满。他知道，1928年12月，张学良一答应向床次竹二郎提供50-100万日元竞选经费，彭汉贞获悉后就马上报告了杨宇霆，又帮助杨宇霆和田中义一重温旧情。杨宇霆对他早年留学日

本时的军校教官、现任日本首相崇拜得五体投地，田中义一对他的昔日学生备加欣赏，两人遂暗中联系频繁。

田中义一见了张学良不听他摆布，便暗中通过彭汉贞策动杨宇霆干掉张学良并取而代之，后来张学良发现了杨宇霆的阴谋而果断地将他杀掉。

王家桢想起这段往事，心不在焉地敷衍道：“你还不知道，我们这个小小的外交秘书办公室能干什么大事？一方面办理对日本的交涉工作，一方面翻译有关资料，对日本问题做些研究！哪像你彭二小姐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哪！”“得得得！谁不知道你王家桢才智非凡，能力超群，是张总司令手下的大红人！昨天林久治郎总领事还亲自在我面前夸你呢！”“他夸我什么？”王家桢闻此一愕，稍有警惕，举起手中的毛笔问道。

彭汉贞见她说的话引起王家桢的极大兴趣，忙凑到前面夸夸其谈：“林久治郎总领事对我说，他从最近与张总司令的交涉中感到，汉卿似乎非常了解日本国内的政治情况，对林久治郎的激烈言辞也不肯多言，只是用淡淡的苦笑和温和的话语同日本人周旋。林久治郎对此很感纳闷，后来才发现了这一奥秘所在！”“他发现了什么奥秘？”“奥秘就在你大名鼎鼎的王家桢身上！”

“此话怎讲？”“林久治郎发现汉卿为研究日本政情下了很大本钱。发现他派出不少下属到日本搜集情报，自己也尽量多同日本人接触。林久治郎说汉卿身边的秘书人员中有很多人才，你王家桢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你是日本庆应大学的高材生，精通日本政界情况！”“彭二小姐过奖了！”“不，林总领事夸你能熟练地阅读日本报刊，善于从日本的外事消息中研究日本政情，甚至能揣度哪些消息是外务省亚洲局发出的，哪些出自日本情报部门！你经常向张总司令提供大体无误的情报，使张总司令对日本政治局势做出准确判断。……”王家桢见彭汉贞那副轻狂神态，早就腻歪透了，皱着眉打断她的话道：“今天彭二小姐屈驾前来，有何贵干？”“哈哈，王家桢果然料事如神，我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本姑娘要做大媒，给你提一桩亲事！”“别开玩笑，谁能看上我这个穷小子？”“不，她与你一见钟情，说你仪表堂堂，气概非凡，学贯中西，人才难得！”“噢？她倒抬举我了！她是谁？”“川岛芳子！”“川岛芳子？”“对，中国名字叫金璧辉！你们前几天在北京六国饭店一见面，她就看上你了！她是肃亲王的十四格格，又是川岛浪速的养女，对你这个日本通是再合适不过了！”“去，告诉她：我王家桢宁肯打一辈子光棍，也不找那种风骚女人！”“王处长，你听我说。……”“我公事多着呢？恕不奉陪了！”王家桢没好气地说完，就埋头处理公务，不理睬彭汉贞了！

彭汉贞被“晾”在一旁失了面子，撅着小嘴嘟囔道：“你有眼不识金香玉，给你介绍如花似玉的美人，你不要，这个宝贝要不要？”王家桢抬头一看，见彭汉贞手里拿着一封信，挑逗性地向他摇摆：“哈哈，东京来信！川岛芳子这个假日本姑娘你不要，原来有真的日本花姑娘在勾引你，哈哈！”王家桢估计是蔡智堪来信，可能有重要事情，忙站起接过信，好言好语打发走彭汉贞，拿起剪刀打开信一看，果然是蔡智堪的来信：王家桢先生：这是绝对秘密的文件，是我的朋友在某政党干事长的家里当书记，抄写得来的，只能分批寄来。

此致敬礼蔡智堪 6月25日王家桢刚看完蔡智堪的来信，收发室老张头送来两个邮件。王家桢见是东京邮件，想起彭汉贞借机利用信件的事，忙吩咐道：“张大爷，凡是我的信和邮件，今后谁都不准拿，请你亲自带给我！”老张头走后，王家桢迅速打开一个邮件，见有十几页信纸，拿起一看，见

是铅笔抄写的文件，日文字母潦草难认，但其中一段话却使王家桢触目惊心：故历代内阁之施政于满蒙者，无不依明治大帝之遗训，扩展其规模，完成新大陆政策，以保皇祚无穷，国家昌盛。无如欧战以后外交内治多有变化，东三省当局亦日就觉醒，频而步我后尘，得寸进尺之势而谋建设其产业之隆盛，进行之迅速，实令人惊异，因而我国势力之侵入遽受莫大影响，惹出许多不利，以致历代内阁对满蒙之交涉，皆不能成功……王家桢看到这里大吃一惊，马上意识到这不是寻常文件，是在讲日本当局入侵东三省和内外蒙古的谋略，要把满蒙变成日本的新大陆！忙接着往下看，下面的话更使王家桢看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真面目：益以华盛顿会议成立九国条约，我之满蒙特权及利益，概被限制不能自由行动，我国之存立随亦感受动遥此种难关如非极力打开，则我国之存立既不能坚固，国力自难发展矣！

“啊？这是日本政府的内部文件，太重要了！”王家桢看完第一包邮件的十几页文件，急忙打开第二包邮件，“田中密折”四个格外引人注目的大字，立刻引起他的警觉，便悄悄看完，将文件存入保险柜中。

其后陆续收到蔡智堪的邮件，到1929年9月传来田中义一下台并很快死于他所宠幸的艺妓之怀时，王家桢已收到了蔡智堪寄来的《田中奏折》的全部日文抄稿。

于是，王家桢将抄稿交给外交秘书办公室人员分段译出，然后再将意思不明或脱字脱句的地方加以添补改正，订成一个完整的文件时，已经是1929年的秋天了。

沐浴着初秋凉爽的金风，王家桢手拿翻译成中文的《田中奏折》，兴冲冲来到设在大帅府的东北边防长官公署总司令办公室报告：“汉卿，这是蔡智堪通过牧野伸显的妻弟山下勇，潜入日本皇宫御文库抄来的珍本，我已反复校阅，可以肯定是日本推行侵化政策的总方针，”王家桢说到这里，走上前去，伸手把桌上的文件翻过几页，“我们把蒙古图什业图王爷抓来审问，便可做一个有力的验证！”张学良未置可否，低头看王家桢手指的《田中奏折》的这一部分：对内外蒙古的积极政策满蒙既为旧王公所有，日本将来之进出，必须以旧王公为对手，方可以扶持气势力。依福岛开东长官之长女，因献身于皇国旗见，以金枝玉叶之质而就未开化民族之困什业图王府为顾问。加之图什业图王之妃乃肃亲王之侄女，因此关系，图什业图王府与日本颇为接近。我特以意外之利益及保护而笼络之。在内外蒙古各王府等处，无不以诚意尊我敬我。现在图什业图王府内之日本退伍军人，共有19人在矣。

张学良神情转趋严肃，大声传令：“谭海，你和警务处人员马上出发，迅即把图什业图王爷缉拿归案！”副官谭海领命转身要走，王家桢忙上前吩咐：“先给当地驻军打电话，将图什业图王爷就地缉捕，速送沈阳！”谭海走后，张学良又把《田中奏折》拿在手中，继续持下去：而向王府收买土地及羊毛特买权或矿权，均被我先取定其特权矣。此外继续分派多数退伍军人密入其地，命其常穿支那衣服以避奉天政府嫌疑，散在该王府管内。实行垦植畜牧羊毛买收等权。按其他各王府，仍依对图什业图王府方法而进入，到处安置我国退伍军人，以便操纵其旧王公。……待时期一到，则内外蒙古均为我有。

张学良看到这里，拍着桌子气愤地说：“小日本胃口真大，不仅想霸占我东三省，对内外蒙古也早有侵占的狼子野心了，真是可恨！”王家桢频频点头：“汉卿，更可恨的还在后头呢！”张学良听了，更急切地看下去：因乘

其领土权未甚明了之时，且支那政府及赤俄尚未注意及此之时，日本预先密植势力于其地，如其内外蒙古之土地多数被我买存之时，斯时也，是蒙古人之蒙古欵，抑或日本人之蒙古欵？使之无可辩白，日本借国力以扶持我国主权而实行我积极政策也。日本对于蒙古之施为，因欲实行如上之政策，按本年期由陆军秘密费项下，抽出100万元以内，急派官佐400名，化装为教师或支那人，潜入内外蒙古，与各旧王公实行握手，收来其地之牧畜矿山等权，为国家而造成百年大计！

张学良刚刚看完《田中奏折》中有关侵略内外蒙古部分，就见副官谭海兴冲冲引警务处长高纪毅进来报告说：“张总司令，高处长把图什业图王爷抓来了！”“高处长真是年轻能干，手到擒来！”张学良欣喜地连声夸奖。

高纪毅连连摆手道：“我哪有这么大的本事？我们警务处早就发现图什业图王爷和日本人行行动可疑，就派人把这个王爷抓了起来，正好谭副官来传达总司令的命令，我们。……”“好，这个蒙古王爷现在在哪里？”“已押在老虎厅外听候处置！”“速速押来见我！”不一会儿，谭海和高纪毅把图什业图王爷带到。这个蒙古王爷身穿绛紫色团花锦袍，外套黑缎马褂，一到老虎厅，早吓得魂飞天外，只单腿一蹲，行了个蒙古流行的屈膝礼，就一下瘫倒在地。张学良怒目呵斥道：“你叫什么名字？”“叶喜海顺！”“你和金璧辉，也就是川岛芳子，是什么关系？”“我是金璧辉的姑父！”“你和日本人是怎样勾搭上的？”“川岛浪速打着继承清朝肃亲王遗志的旗号，宣扬佛教是日本和蒙古文化、宗教的共同纽带，仍用前些年建立的名叫‘汗山所’的秘密团体的名义活动！”“要搞什么名堂？”“川岛浪速说要帮我们建立一个满、蒙联合的国家，在日本人的监护下，由我出任国家元首，起码让我当兴安北省省长！”“你有哪些卖国行动？”“我。……我同日本人签订了一个条约，规定日本派出农业顾问并提供粮食，从我的王府收买羊毛和矿产品，我给日本人行行政监督权和通商特别优惠权。我让人开垦水田为日本人种植水稻，发展牧场向日本提供军马！”“还有什么？”“日本人还经朝鲜向满洲和蒙古运送军火！”王家桢见这家伙如此无耻地出卖国家利益。气得满脸通红，从桌子上拿起《田中奏折》，厉声训斥说：“日本人早把你的叛国罪行写入了《田中奏折》之中：‘其土地所有权先用十把一束之贱价而买定之，然后将可垦为水田者种植食米，以济我食料不足之用。不能垦为水田者盛设牧场，养殖军马及牛畜，以充我军用及食用。剩余之额制造罐头食品运贩欧美，其皮毛亦可供我不足之用。’日本人已写得明明白白，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图什业图王爷叶喜海顺吓得爬在地上磕头不止：“本王爷被日本人所迫，身不由己，请张总司令饶命！”张学良将桌子一拍，厉声喝问：“要想活命，就老老实实回答：你的王府里窝藏了多少日本人？”“19个！”“那19人是日本军官，还有什么人？”“再没有了！”“他不老实交代，拉出去枪毙！”张学良一声令下，谭海和高纪毅上前，架起叶喜海顺就走。这个蒙古王爷吓得屁滚尿流，哭着哀求：“我该死！最后又来了400多个日本人！”王家桢冷笑一声，拿起《田中奏折》说：“《田中奏折》上写得明明白白：‘日本对于蒙古之施为，因欲实行如上之政策，将从本年度起由陆军秘密费项下，抽出100万元以内，急派官佐400名，化装为教师或支那人潜入内外蒙古，与各旧王公实行握手！’”图什业图王爷听了，气得咬牙切齿：“小日本真不是东西，把我们干的事全写出来了！”“这就是卖国贼的可耻下场！”张学良庄重警告，“叶喜海顺，你要想活命，就带警察捉拿日本人归案！短一个，唯你是问！”“小王不敢再拿生

命开玩笑，一定带罪立功！”警务处长高纪毅把图什业图王爷押走后，张学良仍余怒未息，王家桢趁机献策道：“汉卿，《田中奏折》是关系祖国命运的秘密文件，内容很多，最重要的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方针大计。除政治部分外，关于满蒙经济的策划很值得我们参考，特别是日本对于东北管辖下的盟旗所联系的王公名人与采取行动的具体方针，都有较详尽的记载！”“对，这个文件非同小可，你有何高见？”“建议将它作为机密文件印刷，只发给东北政治上的负责官员，让他们了解日本人的阴谋，作为采取对策时的参考！”张学良沉思良久，深感日本军阀霸占东三省进而灭亡中国的野心极其嚣张，觉得日本侵略者就像卧在他睡榻之旁的恶虎，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张口咬人；又如安置在他身旁的定时炸弹，说不定何时突然爆炸，于是毅然下定决心说：“《田中奏折》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东北形势因而严峻而又急迫！为提醒本部官兵对日本军阀亡我华夏的认识，让他们认清日本的国策和战略方针，你马上到官银钱号印刷所，用上等宣纸印200本，发给东北官员并呈送南京国民政府！”《田中奏折》经王家桢主持翻译、张学良批准印刷后，1929年末几乎同时在南京、北京披露于世。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1929年10月，日本为解决发动大规模侵华侵苏战争的军事运输问题，反复令其驻吉林特务机关兼吉林督军顾问林大八，催逼张学良批准修筑由吉林敦化到图们江的敦图铁路。

张学良便派吉林交涉署署长钟毓和该署第二科长罗靖寰赴南京请示。

钟、罗临行前，张学良把印好的《田中奏折》交给罗靖寰，精心将文件缝在罗的西服背心内，秘密带到南京，交给外交部长王正廷。张学良还指示北宁铁路局，将《田中奏折》译成英文，准备向国外散发。

中国外交部对《田中奏折》非常重视，认为可以在适当时机，以非政府立场予以公布，揭露并遏止日本的侵略野心。

恰在此时，“泛太平洋会议”在日本京都召开。日本代表、外务省亚洲局长有田八郎利用东道国地位，在11月4日讨论“满洲问题”的大会上放厥辞：“日本在满洲所处之地位，类乎英国之在印度，美国之在海地！”出席“泛太平洋会议”的中国代表徐淑希、余日章对此义愤填膺，在会议休息时秘密商议，以突然公布《田中奏折》的方式，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谁知竟被暗中监视的日本特工人员侦知，马上报告了有田八郎。

有田八郎闻报吓了一跳，立即向日本外务省请示处置办法，回来后就主动打上门去手举早准备好的长期文章与中国代表辩论，攻击中国代表所说的《田中奏折》纯属伪造，还气势汹汹地质问：中国方面是通过什么途径得到的？当事人是谁？主要内容又是什么？中国代表因未得到公布《田中奏折》的指示，觉得在日本不便公开起来源和途径，更不好涉及当事人，只公布了该文件的主要内容。

有田八郎抓住中国代表不敢公布《田中奏折》全文的弱点，利用控制舆论的有力地位，大肆宣传《田中奏折》是中国的伪造，日本根本不存在这个文件！

余日章回国后，11月19日在上海报告参加“泛太平洋会议”的经过，特别提到日本代表《田中奏折》真实性的攻击。

一位爱国将军听了非常气愤，便把他手中的一份《田中奏折》捅给了南京《时事月报》，该报于1929年12月初全文刊出，这是《田中奏折》

在中国首次正式披露！

几乎与此同时，纪清漪女士在北京也将《田中奏折》公诸于世。

纪清漪是清朝《四库全书》总编纪晓岚的直系七世孙女。

她虽出生在河北献县，但却在东北长大，自幼目睹日、俄帝国主义侵略东三省的种种罪行，形成了强烈的爱国思想。她1925年北京大学政治系毕业后，即留北京大学主编《新东北》半月刊，并利用《华北日报》副刊成员身份，频频著文宣传爱国思想。

一天傍晚，纪清漪到《华北日报》送稿。见编辑部人员都已下班，只有总编安怀音趴在桌上聚精会神地看一个文件。

纪清漪和他一打招呼，安怀音就指着手中文件气愤地说：“多令人气愤！这是日本要征服全中国、全世界的计划。

你是研究东北问题的，应当看看，也应当知道！”纪清漪接过文件刚要浏览，安怀音马上补充说：“对不起，这是内部密件，不能拿走，只能在这儿看一看！”纪清漪见安怀音讲得如此郑重其事，忙低头翻阅，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材料，需要仔细研究，不顾对方刚才的认真说明，直率地提出要求说：“能不能拿回去看一看，明天7点钟以前保证送回来！”安怀音犹豫半天，才同意借一晚上，临走再三叮嘱说：“这是密件，不能给第三人看见！”纪清漪回到北大宿舍，立刻把志同道合的岑日初、马醴馨、余耀华等人找来，分头连夜抄写了一份，第二天7点钟准时把文件交还了安怀音。纪清漪回来和朋友分手时，约定每人各写一篇序言，讲明此事之目的和经过。

第二天，纪清漪与朋友们仔细商议，都同意将文件印成书广为散发，以惊醒国人，奋起救国。只是觉得对不平安怀音，纪清漪说：“为了国家，也顾不得个人恩怨了，不过要在书上向他致歉！”于是，她提起笔在扉页上写道：首先，我要向借给我《田中奏折》的人表示歉意。我违背了诺言，但这是关系到中国存亡的大事，我只能失信于朋友，不能对不起国家。读者啊，如果你的心还在跳，如果你的血还在流，你就应该把这个小册子一字一句地读完。你就应该想一想：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有什么责任，你应该做些什么事情？纪清漪意犹未尽，又在她的序言中写道：这本书的材料本是极秘密的，我们从朋友处间接得来。先是M君得自日本，节译出来，自己把它印成一种本子，送给他的几个至好的朋友，封七上写着：“极秘，因某种关系，不必公开发表。”后来经过几度转折，到了我的手里，于是我和那位供给我这本书的朋友计划把它重印出几千份，分赠国人。

在M君的原序里说：“本报告不论何人，皆不能抄录持出，因交情关系，故特许之，请阅者切勿将此报告由任何方面抄出，而公表于世界，以免害及涉有嫌疑之人。”纪清漪接着把她的长期序文读给朋友听，最后，更动情地读道：我们读完这本书，应该知道日本的侵略东北，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千辛万苦也要达到的。中国当局、民众应该醒觉了，利刃当头，还在瞌睡吗？众人听了连连称赞，纪清漪却喟然长叹：“本人空有报国之心，但没有这笔印刷经费，怎不难煞人也！”岑日初手抚银须笑道：“这有何难，这点儿钱老夫全包了！”

我在本人写的序言中已表明了决心！”于是掏出他写的序言读道：其老矣，海外归来，愧无补于国家，但爱国心长，与日俱进。用敢不揣绵薄，量力斥资，将此密折，付诸铅槧，公布于世，俾咸知日本谋灭中国之毒计有如若是者，群起而拯救之。庶乎吾辈之子若孙，不致沦为亡国之奴，吾亦何敢吝

此区区之印刷费哉？余耀华听了大笑不止，众人忙问其故。余耀华笑道：“我看咱们四人之中，只有岑君能拿得起这笔钱，我相信他有一颗赤诚爱国之心，肯定会慷慨解囊，因此早准备好了褒奖他的序文，诸位请看！”马醮馨抢过读道：岑君日初，字福元，余挚友也，热心爱国，故对于社会公益事，靡不慷慨捐输，助成美举，而报效于党国者尤巨。迩来因日人谋我，得寸进尺，愈益凶狠，乃奋然而兴，语于余曰：“日人之举动，无非秉承明治皇帝所遗之‘满蒙积极政策’以进行，倘吾国民众不急起而谋所以应付之，则吾国必终为日本所亡，吾之子孙，必沦为日人之奴隶！吾纵有财产，将亦有何颜面以享受之乎。……”余敬岑君之能自爱其国，而有慨乎近代富人，不独不爱其国，甚或利所私而害及其国，亦不之恤，故乐为述其颠末，以视岑君，当亦有愧色矣。

岑日初听了，摆手连说：“不敢当，不敢当，但不知老马有何高论？”马醮馨掏出自己的序文，郑重地说：“我想指出我们刊出《田中奏折》的重大意义，不知提法如何，请诸位指教！”岑日初伸手拿过来读道：今何幸田中之密折竟为我国人所探得。同时复有热心爱国之士，出力以翻译之，捐资以印刷之，分赠国人，俾咸知日本亡我中国，设计至毒，若不急起以防御之，将终不免为高丽、台湾之续也。岂不哀哉！则是书之刊行，谓关于中国之存亡之巨，亦无不可，幸我四万万同胞注意及之。

于是，纪清漪在朋友们的大力支持下，把抄来的《田中奏折》送到北京和平里新华印刷厂印了5000份，分头寄给全国各地的朋友和记得起来的机关、团体、学校、图书馆，还特别在书背后封七上写道：阅毕之后，请转别人。

日人毒计，全国周知。

利刃当头，群起拯之。

就这样，《田中奏折》震惊了全中国，轰动了全世界！

“九·一八”事变后，我爱国志士通过种种关系，于1931年9月底在日本东京的《中央公论》和《中外商业》上，登出了令人瞩目的消息：在由关系机关提供给政府之文件中，有田中内阁时代满蒙积极政策秘密上奏文，其中一节内记有：在满蒙之韩人，倘加至250万人以上，则一旦有事之际，可以韩人为原子，而作军事行动，借取缔之名义，而援助其行动。

日本当局大吃一惊，做梦也未想到在对日本出版物严格检查的情况下，竟有两家有很影响的报刊把承认有《田中奏折》存在的文章登了出来！日本最高当局气急败坏，下令严格新闻检查，并出动警察、宪兵阻止《田中奏折》和有关出版物进口，禁止其在日本传播。若发现传播上述报刊者，一律按危险的“思想犯”论处。日本当局很快从攻占沈阳所获文件中获悉，床次竹二郎和蔡智堪有牵连，便开动宣传机器，骂床次为卖国贼，将蔡智堪逮捕入狱，200万美元的财产被全部没收。

1931年10月，国际联盟在日内瓦召开第六十五届理事会，中国代表颜惠庆就《田中奏折》问题向大会提出控告：自1922年至1927年，日本侵略态度稍见减缓。

顾自1928年田中男爵重握政权以来，日本又进行其不惜代价惟求得到之积极政策。

此项政策，详备说明于一种公文之中，即报纸所载1927年7月25日田中上呈日皇之奏章是也。《田中奏章》之真伪，曾有辩论，然自其披

露后发生之事故，与该奏章所载之次第计划，若合符节，故不能不以该奏章为日本对华真正之具体表现也。兹录该奏章一段如下：“九国条约削减日本在满蒙权利特权之处，致使日本毫无自由。日本之生存，已遭危害。……日本如不采取铁血政策，则不能解除其在东亚之困难。……若日本欲管理中国，必先击碎美国。正如往昔日本不得不对俄作战也。但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则其余亚洲各国与南洋各国，必惧而降服。然后世界各国乃晓然于东亚之属日本，不敢侵犯日本之权利矣。此为明治天皇之遗谋，其成功也，日本之生存系焉。”此次日本轰毁上海闸北吴淞及邻近村落，显示所谓铁血政策者，必以名实相符出之也。

出席国际联盟理事会大会的日本代表松冈洋佑早有准备，鼓动如簧之舌，矢口否认存在《田中奏折》，说该奏章是中国捏造的产物，说起“语气与格式不对”，“将田中访问菲律宾误为该问欧美”，“把已经去世的山县有朋等重臣仍写为健在”，“所提蒙古王爷之事并不存在”等等。

在国际联盟理事会上，中日双方唇枪舌剑，争论激烈，《田中奏折》问题一时成为国际间的热门话题。

对当时的情景，当事人、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其回忆录中称：日本新任代表松冈洋佑又代表日方发言。据我回忆，他的确是个对手。他以政治敏锐、能言善辩和主张日本对华采取不妥协政策而闻名。他夸夸其谈，在为日本的不妥协立场辩护时，极尽玩弄辞藻之能事。

我在下午的会议上为中国辩护，以一个半小时发言进行还击。……我详细申述了日本的大陆政策，强调这是对世界和平的真正威胁。……国联会议一直延续多日，其中心是松冈洋佑与我不断的辩论。

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个记者针锋相对地问道：“一个岛国，怎么能有与其国力不相符合的野心呢？”对此，中国代表颜惠庆并不慌张，因为他已早有准备，请王家桢起草好了发言稿，因而当即回答道：“当您去马戏团或戏院观赏时，有人在入口处交给您一张节目单，上面印的节目是意大利的欧贝拉（歌剧）、俄罗斯的芭蕾舞、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您看了这张节目单，一定颇疑惑，不相信这个节目单是真的。您或许会觉得这样一个小戏院，怎能演出这样的大节目呢？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幕拉开了，演出的正是节目单上的第一个节目，那么，你对节目单上以后的节目，还有怀疑的余地吗？”颜惠庆巧妙而形象地把《田中奏折》比作节目单，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喻为第一个节目，博得了在场记者和各国代表的热烈掌声！这是中国代表首次在国际会议上证明《田中奏折》的真实性，立即引起强烈的国际反响！

张学良得此消息深受鼓舞，为报国耻家仇，他以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身分下达命令，大量印发《田中奏折》的中文和英文译本，分发所属各部官兵和有关方面，提高东北军将士的抗日热情，随时准备打回老家去，但蒋介石一味执行不抵抗政策，害怕传播《田中奏折》触怒日本侵略者，得知上述情况后马上来电严令禁止散发《田中奏折》，胡说“万不可为宣传而予日方以口实”。张学良无奈，只好忍痛把已经印好的《田中奏折》付之一炬。

其后，日本帝国主义按照《田中奏折》确定的侵华步骤，于1937年7月发动“七·七事变”，将侵略矛头指向华北。应日寇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的邀请，日本军部同意把川岛芳子派到天津从事汉奸特务活动。行前，

日本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和土肥贤二把川岛芳子请到陆军省，白川义则交代任务时特别叮嘱道：“芳子，我认为你去的正是时候。现在，‘满洲国’已渐渐趋于稳定。按照田中义一奏折制定的计划，下一个战略进攻要点，当然是中国的华北了。你知道，现在大日本皇军已突破了中国的长城各口，我们大日本必须趁着英美无暇顾及，蒋介石又热衷于剿共的有利空隙，像插进一块肥肉的尖刀那样，大大地楔进我们的军队。天津是我们帝国苦心经营多年的一个桥头堡，又是中国的重要港口和海上门户，当年八国联军就是从天津口岸的大沽口打进去的。天津又住着中国朝野的许多官吏、富贾和军阀。这些人多年来操纵着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命脉，特别是日本在这座城市里还拥有一块租界地，作为凭依，是可以干出许多大事的！芳子，多田将军既然叫你协助他，我相信你到那里一定会如鱼得水，大有作为的！”

希望你好好干吧！”于是，川岛芳子带着土肥原贤二的介绍信，偕其“夫人”仙鹤子来到天津，创建起东兴楼，与三野公馆勾结起来，死心塌地为贯彻《田中奏折》而效犬马之劳！

由于日本侵华步骤与《田中奏折》极为合拍，国际舆论对《田中奏折》渐趋肯定，日本当局对皇宫泄密事件严厉追查，御文库书库28名管理人员全被免职，又诬称《田中奏折》是中国辽宁国民外交协会，根据关东军制定的《关于满蒙政策的意见》加工炮制的，但也无济于事，只得动用日本宪兵和警察，企图将所有的《田中奏折》统统收缴销毁。为追踪《田中奏折》的一个节录本，日寇1939年在哈尔滨大肆搜捕“思想犯”，一次就逮捕200多人！

二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1946年5月3日开始在东京前陆军省大厅，对日本战犯进行严正审判，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

审判庭位于东京被废墟包围的小山上。那里曾是侵略战争的大本营，日本军国主义者按照《田中奏折》，在那里炮制过侵华和侵略亚洲的狂妄战争计划，指挥几百万日本军队屠杀成千上万的中国和亚洲同胞！更具有莫大讽刺意味的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庭长室就恰恰是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的办公室！

参加诉讼的各大国联合公诉代表达西手举一份编号为169的重要文件--《田中奏折》，控告东条英机等被告犯有破坏和平的罪行，即犯有准备、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的罪行。

接着，达西援引《田中奏折》中最典型的几段文字来揭露战犯们的罪行：日本若不施行铁血政策，则不能消除东亚的困厄；但若施行铁血政策，则必将与美国相抗衡。……若要掌握控制中国的权柄，则必须击败美国。……然而，为征服中国，则必先征服满洲和蒙古；为征服世界，则必先征服中国。倘若能征服中国，则其余亚洲国家和南洋诸国均将畏我并向我投降。……我们如能掌握中国的全部资源，即能转而征服印度、南洋诸国、小亚、中亚，甚至欧洲。假若大和民族愿意在亚洲大陆有突出作为，则夺取对满洲和蒙古的控制权乃是第一步。

达西巡视审判厅一周，又振振有辞地指出：“总之，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制定的计划，规定了循序的分阶段的侵略活动，以便按日本帝国的需要完全重新瓜分世界。

踏上这条道路的第一步就是占领满洲、外蒙和内蒙。这些地区是日本进一步侵略扩张的跳板与基地！”公诉人达西又举起放在法官席上的《田在

奏折》说：“田中将军也没放过苏联问题，在奏折中公然说：‘为夺取北满的财富，日本看来还必须在蒙古大地上再次同俄国交锋，这一点也列入了日本的发展规划。’田中义一虽在两年后辞职，但他的计划却继续由日本历届政府始终不懈地推行着，而且这份凶恶之极、厚颜无耻的文件，还被伪善的日本统治集团誉为‘田中之积极政策’。”公诉人达西接着揭露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和内外蒙古的原因：日本一旦占领东北，向北可对毗邻的苏联领土实施突袭，将苏联滨海地区同苏联本土分割开，并通过外蒙夺取苏联的远东地区；向南可以东北为跳板，挥师进入长城地区，直逼古都北京。达西讲到这里，以更洪亮的嗓门做出结论：“总之，《田中计划（奏折）》的宗旨是极其明显的，是日本侵略野心的大暴露！”接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通过对冈田启介、田中隆吉等人的传讯，证明炸死张作霖、发动“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都是按照《田中奏折》确定的既定方针实施的，并间接承认《田中奏折》是根据日本法西斯理论家大川周明的“思想鼓吹出来的”！

特别是曾任田中内阁书记官长的鸠山一郎，向国际检察局提交了一系列关于“田中内阁即将辞职时的满洲事变的文件”，承认有田中义一呈交裕仁天皇的《内奏抄本》，使东京审判逐步向纵深发展。

日本右翼和保皇派见中国代表将裕仁天皇列入战犯名单，并将《田中奏折》列为战犯罪证，又见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步步深入，忙通过各种渠道与美国方面疏通关系。恰好美国出于战后冷战政策的需要，转而采取利用日本和天皇的政策。美国深恐一味追查《田中奏折》会危及天皇制，引起日本社会动乱，因而决定以“真伪莫辨”为由，否认《田中奏折》的存在，并不拟起诉天皇，正如日本研究东京审判问题的专家粟屋宪太郎的《东京审判秘史》一书所精辟分析的那样：鸠山一郎虽然摆出了一副协助检察活动的姿态，但为了辨明田中内阁的对华政策，他耍了一个小花招。他提供的资料本身都是第一级政治资料，如田中首相呈交给天皇的《内奏抄文》，其中说炸死张作霖的主谋是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等人，但是检察局并没有把这些资料作为法庭证据使用。这是因为检察局已经决定了免究天皇责任的方针，而鸠山提供的资料如果使用不好，会是一柄‘两刃剑’，成为重新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材料。在田中首相的奏折中，清楚地表明天皇完全知道炸死张作霖的凶手是日本军人。可见，鸠山提供的资料和吉田茂提供的文件不同，并没有被当作法庭资料加以灵活运用，只是隐藏在历史的阴影里。

在20世纪50和60年代，日本右翼势力活动猖獗，再次挑起关于《田中奏折》的大争论，触怒了两个当事人蔡智堪和王家楨，他俩终于站出来讲话了！

二战结束后，蔡智堪到台湾居住，出于民族大义，在1953年8月28日的香港《自由人》刊物上，发表了《我怎样取得田中奏章》的文章，全文如下：我怎样取得田中奏章蔡智堪田中以卖木炭出身素志武力吞并我国日本田中义一大将，是长州军阀最后的巨魁。幼年家贫，买卖木炭为生。稍长，在元老山县有朋家执茶房役，受业桦山老将，读破曾文正公全集和清一统志，成为日本军阀里第一个“中国通”。他继承山县大将和福岛大将的衣钵，以吞并我国为素志。

当民国16年时，田中任政友会总裁。时日本有两大政党，一即政友会，一为民政党。

民政党总裁若槻礼次郎先任首相，主张用经济方式侵略东北满蒙。民

国十六年四月（1927年）政友会组阁，田中任首相，目视本党北伐，主张强占东北。6月27日，田中内阁召集“东方会议”，至7月7日止，先后集会10天。凡日本派驻我东北、北平、天津、上海、汉口等使领，驻蒙古的特务人员、关东军长官、南满铁道总裁等，都齐集东京，密议占领东北后，在政治经济方面如何施設；大要为对抗中国国民党，在东北组织“协和会”；怀柔国民党的要员；强擒张学良，黄袍加身，其他称帝或称“满洲国大总统”等等。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至8月16日，田中又召集驻我东北的外交和军事人员，举行“大连会议”，研究“东方会议”未决定的问题。大连会议后某一天（约为8月25日至29日），田中将两次会议的结果，即所谓田中奏章，上奏天皇，并向世界宣言说：“中国内乱能波及满蒙紊乱治安。帝国内有特殊地位与权益，不论乱自何方，帝国决予以适当之处理。”各国争欲取得密奏美国开价廿五万美元世界各国对这晴天霹雳的最后宣言，颇为震惊，预料日本行将占领东北，然后用“以战养战”方式，征服我国和南洋。因之各国情报人员到达东京一地者即达二千余名之多，企图侦察“东方会议”及“大连会议”的真实内容；东京警视厅为此增加外事警察三千名，严密监视，邮局税关添派员千余名，检查邮件，并在当地海军部内新设间谍速成学校，招募学生九百名，实施训练。

这时驻上海的英国记者已探知田中首相业已密奏天皇，决心用武力吞并东北。世人对于田中密奏内容如何？又成为追求对象。其后外电又传田中密奏已经苏俄由日本外务省某高官手中取得，代价三十万日元云云。

当时我外交部长王正廷博士对于田中密奏当然也亟欲一知，秘密派员专赴东北哈尔滨欲截取苏俄买去之件，闻准备出价五十万现洋云云。又传美国也愿出款二十五万美元，势在必得。但结果都成泡影：田中密奏截至本人亲见抄出之前（民国17年6月间），并没有落入英美俄任何人的手中。

王家桢寄来邮包大饼一枚传密信民国17年6月的一个星期天，正值本人宴请中野正刚、出云代义士和金森贵族议员，在东京私寓的三楼大饮“五加皮”。下女送上潘阳寄来小包邮件一件，打开一看，乃系大饼（点心）一枚，中野正刚说：“中国大饼转赠与我如何？”本人答以：“饼非煎过，食之有害。”散席后，剖饼视之，得王家桢手书，（水笔写成，置于饼内）云：“英美方面传说，田中首相奏章，对我颇有利害，宜速图谋人手，用费多少不计。树人”。

树人乃王家桢先生之大号。在此我先稍稍说明我和王家桢的关系，我自清末亲奉总理孙公指示，在日本办理国民外交。十三年我和李烈钧先生合作，迎接总理赴大阪，完成某项外交工作。以后李先生嘱我多多为“满蒙问题”尽力。张大元帅作霖被日本炸死后，我向王树人先生（时任东北外交委员会委员，主持东北对日外交）提供炸弹破片。多年以来，经常把所知日本内幕政情，纯义务地供给张学良将军，都由王先生经手。王先生每到东京，都下榻本人经营的蔡丰源行内。

不采间谍手段利用国民外交接到饼信之后，很是惊愧。我虽然知道田中决定武力吞并东北，但并未注意外面所传田中秘密奏章上给天皇。这是日本最高机密，绝对不容易拿到的。万一事败，在日本法律立场（我系日本臣民，时台湾已归日据），我非牺牲生命不可。

经过仔细考虑，我认定不可使用“间谍手段”，因为这不单性命危险，万无一成，而且空费金钱；必须运用国民外交，利用民政党和政友会的矛盾，

使民政党拿出政友会（田中）的秘密文件来。

办法决定后，我私人分别宴请前内务大臣属于民政党的床次竹二郎和田中内阁的外相永井柳太郎。床次和永井都是本人多年的老朋友，在金钱上颇有往来。原来日本改革首领都是很穷的，对外又不能不讲排场，开销很大。尤其床次、永井和下文将要谈到的内大臣牧野伸显伯爵等人，都有鸦片烟和五加皮酒的嗜好，这是中国式玩意，只有我能源源供给，所以大家相处得很好。此嗜好皆由近卫及犬养老传授的。

日本政界矛盾促成任务完成我先向永井提议，要他拿出田中奏章，在我主持的《日华》杂志上发表，藉以“发动舆论，一心向满蒙跃进。”永井立地谢绝。我又要求床次，为了民政党要打倒政友会，应该揭发田中奏章所持武力占领满蒙政策，必将招致中日绝交，两败俱伤。床次说：“田中奏章对满蒙虽然利害，无如国民舆论不容何？你如果必要，我当为你打听线索。”不出数日，床次来说：“保皇党（皇道派）元老级认为田中武力吞并满蒙政策，终将激起军人革命，危及天皇万世一系，正急于破坏田中的政策。但由天皇或元老直接干涉田中，必要引起少壮军人革命。”

元老中现正在进退两难阶段。我可利用这个机会以谋取田中奏章，岂有成功的可能性。

请你准备高等中国菜和五加皮酒，作为宴请元老之用”。我即约请梅兰芳的旧厨师崔某，给以五千日金，预备最上等菜，在床次邸内开席。席上床次致词云：“田中武力吞并满蒙，终必惹起国内革命，危及天皇。”我的演说也和床次呼应，以敷衍之。

六七日后，床次来说：“牧野伸显伯爵称：中国政府如敢将田中奏章公表国际，保皇党方可利用英美舆论，阻止田中发动武力政策。中国如能承允这一点，牧野密许你去抄写”。

我接到床次传达来的牧野所提条件后，立即利用东京每夕新闻纸，硃点要字，把这条件秘密函告王树人先生。

又过四五日，王先生以“王川”名义电汇五千元来，并有一电文曰：“病床费五千元奉返（按此指床次宴客费）。其病如要至欧美医治者，余担保负责。”其余是答复牧野所提的条件。我和床次持电往谒牧野伯爵。伯爵见电大喜，拍髀言曰：“皇位可保全，我的老命又可延长了。”当即命令其妻弟山下勇，约妥日皇室书库官，布置本人夜间入内，抄取田中奏章。

偷渡断足桥涉入日禁宫日本皇宫有大门二十四，偏门三十六，皇警多名，穿长衫，持长刀，日夜守望。各门前设有长桥，日本人呼为“断足桥”，如有人潜渡门桥，皇警必挥长刀，砍断其足，然后再处以不敬之罪（死刑）。

民国17年6月某日的一个夜间，11点50分钟，我携带皇室书库专用的黄色册片大小型三四十张，绿色绣线数圆，银锥三支，大小针一包，扮作一个补册工人，携带牧野伯爵交来的金盾圆形的“皇居临时通行牌”（号码72号），由山下勇领路，到达皇城。原来预定从“西丸大手门”入营，因皇室书库便在这个门内，后来决定由“红叶山下御门”进入，因为“西丸大手门”外“断足桥”很长，四面树木不足遮掩。“红叶山下御门”入门后，距皇室书库约走五六分钟。我进入书库的时间是零时50分。

田中奏章采用日本内外奏章专用的“西内纸”精制而成，共六七十张，标签“田中首相奏章”。我将炭酸纸装铺原件中，用铅笔以描写。所用炭酸纸系民政党总裁专用的薄质原纸。

费时两夜，细心抄观。

抄出田中奏章后，欢天喜地，致电王家桢先生曰：“我务既果，明去赔罪。”我把奏章密藏在皮箱夹底里面，亲往沈阳。到小西关外王公馆，交王先生手收，王先生大喜，无暇招待本人，立即亲送给张学良将军，回来方为我洗尘。次日王先生便去南京，我也返回东京。

二十八宿归天两百万美元没收以后，田中奏章成国际联盟座上中日代表舌战的大问题。日本代表松冈洋右指陈田中奏章系由我国伪造，我代表竟也泄漏田中奏章系由皇室书库抄出。松冈代表电之日本政府追究责任，结果皇室书库官山下勇等全体二十七人一律免官，当时日本报纸大字标题云：“蒋介石驻日二十八宿归天！”我当时幸逃法网。但山下勇等免官以后，生活费二万五千日元由我私人拿出，不久又强行占去我的私宅，至今仍然未能索回，迁延许久，我也入狱，在日本的全部产业约值二百万美元也被没收。

重述这段历史不胜感慨之至事隔20余年，重述这段历史，不胜感慨之至！

田中奏章是日本军阀断送日本，断送自身，也断送中国的疯狂政策的结晶；若不是我蒋总统极力主张战后保持日本天皇制度，这一文件也便断送了天皇。

牧野和床次先见及此。藉我国之手泄之于外，原为打倒田中政策。从一切断送之后的今天看来，牧野和床次应该是见谅于日本君民的。我为此件遭受的产业牺牲，固然很大，和牧野床次名声牺牲似乎不同。牧野床次因安定天皇，不惜泄漏机密！我则是为了中日和平共存共荣才从事国民外交，日本朋友应知道，我蔡某不是“间谍”，而是一个九分爱国民之中国却也一分爱日本的人。但他们却连十分之一的产业也没有给我留下。

1955年9月29日，68岁的蔡智堪在台北病逝前，仍不忘向亲友讲自己从日本皇宫获取日本侵华机密的经历，驳斥日本当局否认《田中奏折》的言论。

1960年11月，王家桢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中，发表了题为《日本两机密文件中译本的来历》，叙述了《田中奏折》的背景及翻译、公布的经过：这年年尾前后，我们的驻东京办事人蔡智堪（日籍台湾人，在日本出生，但祖国观念很强），分批给我寄来一些文件。另外来信说，这是绝对秘密的文件，是他的朋友在某政党干事长的家里当书记抄写来的，只能分批寄来。原来这个文件，就是由政友会新选出来的总裁田中义一大将在大连召开的东方会议的一部分会议秘密记录，经整理后以奏折形式呈奏日本天皇的，我就给它起名为《田中奏折》。这个文件，大概是分十余次寄来的，每次的相距时间是两个星期左右。因为稿件抄得非常潦草，错字错句很多，念起来也不顺口，不易阅读，而且语气夸诞。……但是后来才逐渐觉察到，这个文件不是个寻常的伪制品，因为内容所提到的好些具体事实，以及为了推行它的侵略政策所采取的措施，都是合乎逻辑的发展，特别是关于满蒙的经济开发，全是用严格的科学方法加以阐述的；对于某某蒙古王爷的密契也全是事实。我这才将寄来的稿件交给办公室分段先行译出，然后再将意义不明或是脱字脱句的地方，逐一经过研究，加以添补。……这次我将原稿面呈张学良，说明了它的内容和它的重要性，就请他当时批准了。因为是机密文件，特在官银钱号印刷所印刷，用上等宣纸六开大本装订，共只印200本，发给在东北范围内简任级有实职的人员每人一本，送给南京国民政府4

本（当时共发出120本，其余存在我家）。

蔡智堪、王家桢两位重要当事人的文章的发表引起各国的广泛关注，《田中奏折》的真相至此大白于天下！

日本当局大为恐慌，下令开动庞大宣传机器，抓住蔡智堪、王家桢文章中的某些细节差异，极力否认《田中奏折》的真实性。日本学者江口圭一、桥川文三于1965年分别在《人物往来》、《中国》等杂志上发表文章，介绍日本各派对《田中奏折》的观点，分析《田中奏折》存在的种种矛盾和问题。

我国学者章伯锋、培棫、高殿芳、赵连泰、俞辛、沈予、甄容、师堪等，也纷纷发表有分量的文章，证明《田中奏折》的真实性。

《田中奏折》中译本的组织者王家桢生前对此问题极为重视，从1983年到1984年逝世，曾5次与研究《田中奏折》的学者高殿芳谈此问题：由于我与《田中奏折》结下不解之缘，所以我很关心它，也有责任尽我所能给予协助。国内外的文章，我都阅读，访问我的人也不少。谈的还是一些老问题：真假问题、呈奏方式、非田中手迹等等。

我知道的有关《田中奏折》的基本事实都写在《两个机密文件中译本的来历》那篇文章里，对这个历史事实，不能轻易地无根据地否定，《田中奏折》是确实确实存在的，既不是臆说也不是伪造。公布以后引起国人和世界舆论如此强烈反响，对日本当局震动如此之大，对日本侵略者打击如此之重，更是我所没有预料到的。《田中奏折》公布于世，确实确实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也确实确实博得了全世界舆论对我国的深切同情。日本的一些当权人物极力否认它，还硬说是中国人伪造，是我王家桢伪造，真是岂有此理！这是日本人惯用的手法，是欲盖弥彰！

王家桢说到这里非常气愤，然后又很有远见地说：“我们中国人研究它的目的是设法解释它存在的矛盾，发现新材料，去科学地论证它。研究这个问题不能舍本求末。要看日本对我国进行侵略的史实。他们进行侵略的实际步骤，完全与《田中奏折》的主张相吻合。再说《田中奏折》是一个未公布的绝密文件，侵略意图很露骨，如果不是蔡智堪秘密抄到手，中国不予公布，日本是绝不会公布于世的。我国公布以后，中日两国哗然，全世界哗然。日本统治当局矢口否认，这是自然的！”时至今日，仍未发现《田中奏折》的原件，中外学者对此一般有两种看法：一是毁于战火。1945年3月9-10日，5月24-25日，美军对东京发动两次大规模空袭，共出动B-29轰炸机1328架次，投下五六千吨燃烧弹，在东京引起冲天大火，皇宫作为重要轰炸目标也烧起大火，灭火时被烧死50余人，文书典章损失无数。《田中奏折》原件很可能便毁于两次大火之中！

二是日本统治当局为销赃灭证秘密烧毁。苏联学者A·H斯米尔诺夫、E·B·扎伊采夫在所著《东京审判》一书中，对此有如下看法：日本于1945年8月14日同意无条件投降，但直到8月30日美国第一批空降部队才开始在东京着陆。在这16天内，东京保全下来的政府大厦顶上浓烟滚滚，这是在烧毁无数的、各种各样的绝密文件，因为那些文件能暴露日本帝国首脑们破坏和平、违反人道、践踏进行战争的法规和惯例的滔天罪行。

不仅首都销毁秘密文件，而且外地，凡是有日本陆海空军兵团与部队司令部的地方都在销毁文件。各战俘营、监狱、省府、警察厅、宪兵厅都把文件烧毁了。因此，被告人和证人自然就是异口同声地断言政府根本没指示

过要销毁国际军事法庭需要的文件。

但这只是托词，目的是为被告人开脱对这一事实应负的责任。极端中央集权化和官僚化的日本政府机关（第二次大战时尤甚）一向等待上边指示，下边从来没有主动性，在对待销毁事关国家且属绝密的文件这类重要问题上，尤其如此。

第二章

审判日本战犯是中国人民在艰苦卓绝的14年抗日战争中，伤亡3500多万人，经济损失多达6000多亿美元，以无数的辛酸血泪、生命财产的巨大牺牲，同美国、苏联等联合国各国共同浴血奋战，历尽艰难曲折，战胜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取得辉煌胜利的标志，是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巨大胜利的必然结果，可谓二次大战后的一个重大国际事件。

审判日本战犯是正义与邪恶的大较量，可谓惊心动魄的伟大斗争，它成为战后世界格局的坚实基矗然而，日本国内总有人跳出来为甲级战犯翻案，树碑立传。……一．三座战犯牌位的阴魂众所周知，战后日本走上和平轨道以及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之一是，日本政府接受了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否定了战前的军国主义。正确对待历史已成为关系到日本发展方向和中日关系前途的原则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在这一问题上不时地受到一股逆流的冲击，日本少数军国主义同情分子和侵略战争否定论者，念念不忘抹杀日本对外战争的侵略性质。

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一结束，日本右翼势力就猖狂地为东条英机等核处死的甲级战犯鸣冤叫屈，为他们收集遗骨，评价功摆好，为其翻案，并为之树碑立传。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三座战犯碑的出现。

第一座是1960年出现的兴亚观音“殉国旗士墓”。1948年12月23日，在东京巢鸭监狱刑场，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武藤章、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等七名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次日拂晓，驻日美军用汽车将七名战犯的尸体运往横滨市久保山火葬场火化。获得这一消息的日本律师三文字正平、兴禅寺住持市川伊雄、军人火葬场场长飞田美善等，趁美军疏忽的机会，把七名战犯的骨灰偷出来，分别装在七个小坛子里，偷偷跑到火葬场一角烧香祀奉，没想到被美军发现，骨灰坛被收回，放在火葬场后院的“供养塚”中。三文字等并不死心，又乘圣诞节前夕美军戒备松弛之机，悄悄潜入火葬场，从“供养塚”中偷出骨灰坛，然后设法运到东京以南约50英里的热海伊豆山兴亚观音里，那里也是甲级战犯松井石根的故乡。1958年，在爱知县前县议员三浦公山和该县幡豆町町长牧野健吉等支持下，于幡豆町三根山选定了建碑地址；次年9月，清漱一郎、三文字正平、菅原裕，林逸郎等联名发出修碑倡议；1960年7月17日，在兴亚观音塑像背后的矮树丛中建起一座高4米的墓碑，碑上刻有“殉国旗士墓”等五个大字，墓志由甲级战犯、前陆相荒木贞夫书写。“殉国旗士奉赞会”印发的小册子说，这块纪念碑是在日本自卫队和当地人士协助下修建的。

第二座碑于1980年出现。东条英机等七名战犯1948年在东京

巢鸭监狱里的5个绞刑架上被处死之后，前陆军少将福岛久作、津田耕重等人，在1951年就制订了保存刑场“史迹”的计划，要求把刑场遗址从监狱里划分出来，作为让“国民自由参拜”的“圣地”，并请一流的设计师和技术人员修建石碑。计划经巢鸭监狱负责人川上悍同意后，很快修起了五座坟墓，并从1955年4月开始参拜。1959年2月至1979年10月，以贺屋兴宣为会长的“日本遗族会”、“刑场遗址保存会”等反复向日本政府提出修墓建碑要求。1979年10月16日，东京丰岛区议会建设委员会根据日本内阁会议的批示，公布了官方决定，终于在1980年6月17日，在刑场遗址建起高2米的石碑。日本进步人士指出，这是一块“战犯纪念碑”，已向日本法院起诉。

第三座是1982年5月30日在九州出现的“大东亚战争阵亡者之碑”，它建在福冈中央区，高7.3米、重130吨，耗资6600万日元，碑上刻着全面肯定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碑文：“1945年8月15日，遵为万世谋太平之诏书，吞饮万斛泪水迎终战。尔后，孜孜不倦三十六载、致力于祖国之再建，今已成为世界大国。此次大战乃一场为自存自立不顾日本国之存亡，为解放受虐待之民众、谋救万邦共荣之圣战。虽沉沦于败战悲境，然亚洲民众相继赢得独立与自由之荣光，此乃世界史上未曾有之庄严历史事实。……我们要把对英灵的崇高精神与伟大业绩抱有的无限敬慕和感谢之情，永远传祭下去。……”这是一座要为侵略战争彻底翻案的罪证，也是一座要亚洲人提高警惕的石碑。

接着，日本右翼分子就公开叫嚷东京审判是胜者对弱者、败者的不公正审判，明目张胆地推翻对日本战犯的正义审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一小撮右翼分子先是提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紧接着又叫嚷东京审判不公平，日日夜夜都在为处以绞刑的甲级战犯招魂，妄图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

日本前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这方面的主张在日本右翼界很有代表性，他因公开否定日本侵略战争的性质，于1988年5月被其辞职，不但不知悔过，活动却更猖狂，在同年7月号的《文艺春秋》上又发表了题为《关于“侵略问题的发言“有什么不好》的文章。

奥野写道：“我多年来一直主张，我们要从被歪曲的东京审判史的观念中挣脱出来。”“因为”今天的国际法学界一般认为东京审判是违法的。联合国在东京审判之后，以对和平犯下罪行为理由进行裁决，判定日本是侵略国家，并将几个人送上了绞架。东京审判是胜者对败者的惩罚。在1952年旧金山和约生效之前，可以说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所以，我认为在战争时期的法庭上被处以绞刑的人，从国际法来说，应该看作是相当于战死。”“说起来，追究甲级战犯的‘责任’，并没有明确是追究战败的责任，还是追究开战的责任。如果说是战败的责任，那是全体国民的责任，如果说是开战责任，那当时煽动得最厉害的是宣传工具。”“作过东条英机辩护人的清濑一郎（后来当过众议院议长）写道：‘东京法庭所说的有一半是谎话，但我们没有任何办法与之对抗。谎话不仅扩及日本全国，而且扩散到全世界。

审判虽然结束了，但是不消除这种误解就不能够除我的责任。”“‘错误百出的东京审判，规定了战后的价值观和战前的历史观，我们必须尽早从这种状态中摆脱出来。’在这里，奥野诚亮完全不谈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性质，反而颠倒是非，把给中国和亚洲国家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侵略战争吹得

天花乱坠，竟说：“大东亚战争对建立亚洲人的亚洲做出了贡献。”奥野在东京审判问题上的言论，可谓集右翼论调之大成。

所以深受右翼之推崇。

二、痛斥日本的“翻案论”

面对日本右翼分子公然为日本战犯翻案、推翻对日本战犯的正义审判，世界各国正义之士纷纷起来驳斥日本右翼分子的倒行逆施。中国著名日本问题专家刘江永先生在《跨世纪的日本--政治、经济、新趋势》一书中，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对此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他们重点拿“东京审判”开刀，做翻案文章。“东京审判”如被否定，甲级战犯便不存在，参拜靖国神社正当化自不待言。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痛斥一：不足为据的“国家责任”说所谓“国家责任”说，是一种把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责完全说成是“国家责任”，使之抽象化，借此为日本战犯开脱罪责的诡辩。其主张是：战争的行为主体是国家，责任应由国家承担，而不应对个人判罪。藤尾正行在《文艺春秋》杂志中便称：“究竟何为战犯？国家进行战争，故罪在国家。把国家干的事都推到七八个被处绞刑的甲级战犯身上能行吗？”“这显然超越了国际法，东京审判法庭无权审判。”诚然，日本侵略战争的国家责任难逃，但举世皆知，1945年8月8日苏美英法在伦敦签署了《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并附有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其中第六条明确规定：“下列各种行为，或其中任何一种行为，皆属于本法庭裁判权内之犯罪；对此等犯罪，犯人应负起个人责任：1. 违反和平罪（亦称破坏和平罪）：即计划、准备、发动或从事一种侵略战争或一种违反国际条约、协定和保证之战争，或参加完成上述任何一种战争之共同计划或阴谋。

2. 战争罪：即违反战争法规或惯例。……3. 违反人道罪：即在战前或战时，对平民施行谋杀、歼灭、奴役、放逐及其他任何非人道行为；或基于政治的、种族的或宗教的理由，而为执行或有关本法庭裁判权内之任何犯罪而作出的迫害行为，至于是否违反犯罪之国内法则在所不问”。

据此，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军事法庭曾分别对纳粹德国和日本的主要战犯进行了审判。在纽伦堡审判时，个别律师曾依据所谓“国家行为理论”，企图证明法庭无权审判希特勒等战争罪魁的罪行。他们主张纳粹德国的刑事责任不应由法西斯头子承担，而应由国家承担。在东京审判时也有少数人以同样理由，企图否定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这些观点当时就遭到法庭的批驳。

纽伦堡判决书严正指出：“犯有违反国际法罪行的是人，而不是抽象的范畴，只有通过惩罚犯有这类罪行的个人，才能使国际法的规则得到遵守。”“断言国际法只审理主权国家的行为，不规定对个人进行惩罚；甚至断言因为受审理的行为是国家，实际执行的人不负个人责任，而应受到国家主权学说的保护，法庭认为这两种说法都必须予以摒弃。像对国家一样，国际法同样为个人设定义务和责任，这一点申请已得到公认。”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期间，由于军国主义德国的侵略罪行，各国便提出审判、惩处德皇威廉二世的要求。战后的凡尔赛和约第227条中规定把威廉二世作为主要战犯交付国际法庭审判，追究个人刑事责任。这项要求虽因荷兰政府拒绝引渡威廉二世而未能实现，但个人应负战争责任的国际规范的存在却不容否认。

1946年12月11日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决议，肯定了纽伦堡法庭审判所体现的原理为国际法准则。1950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又作出原则规定，“从事构成违反国际法犯罪行为者承担个人责任，并因而应受惩罚”。这样，凡属联合国成员国都有义务遵守这些规范和原则。

就日本而言，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表示接受的《波茨坦公告》第10条明确规定，“对于战争罪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者在内，将处以法律之严厉制裁”。《波茨坦公告》是日本无条件投降并放弃军国主义的最基本的国际法文献。然而，时至今日，藤尾等人仍把自己置于与现代国际公法相对立的位置。藤尾认为东京审判驳回了“国家责任”说，因而是“黑暗的审判”。按照他的逻辑，《波茨坦公告》岂不将被否定，而且纽伦堡审判也是一样，对纳粹战犯的审判也是“非法的”。不过即使是像藤尾正行这样的“炮筒子”也不敢公开承认此点。他闪烁其词地提出：“希特勒的战争很明显地有以灭绝犹太人为目的的种族战争的一面。就审判这一点而言，与东京审判根本不同。现在，在历史上将二者同等对待，我认为有问题。”试问，发动灭绝种族战争的国家，其发动者是否应负个人刑事责任呢？如果说不的话，藤尾正行便等于承认了他否定纽伦堡法庭对纳粹战犯的审判；如果说是的话，藤尾正行否认个人应承担战争责任的所有“雄辩”又均将不攻自破，看来藤尾正行的选择余地是不大的，更何况日本军国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纳粹德国结盟，在全面侵华战争中实行极端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用中国人作细菌武器实验，制造南京大屠杀事件，使2000多万中国人丧生。这些残暴的侵略罪行与德国法西斯没有什么两样。

痛斥二：纯系诡辩的“事后立法”说所谓“事后立法”说，也是当年个别人在法庭上为法西斯战犯开脱罪责的遁词。近年来，原侵华分子田中正明起劲地以此为由，散布“东京审判是无效的”。他在1986年第11期日本《全貌》月刊上称，“东京审判”是“按国际法和习惯法中都没有的‘破坏和平罪’及‘违反人道罪’等事后法进行的”；“是无视‘无法则无罪，无法则无惩’的罪行法定主义的暴举”。

在现代社会，关于禁止战争，无疑包括禁止侵略战争、破坏和平的国际法早已有之。在1923年的《互助条约》和1924年《日内瓦议定书》及1928年国联第六届大会9月25日决议中都曾指出：侵略战争构成国际罪行。1928年12月27日在巴黎签署的《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简称《非战公约》）明确规定：“缔约各方以它们各国人民的名义郑重声明它们斥责用战争来解决国际纠纷，并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上废弃战争作为实行国家政策的工具。”各国如果发生争端，不论系何性质，因何发端，必须用和平方法来解决。”日本是这一公约最早的签字国之一，中国也加入了这一公约，但这一公约正式生效才一年，日本军部便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公开践踏了国际法。

《国际法院规约》规定，审判应“确立争端当事国明白承认之规条的一般或特别国际条约”；按“文明各国承认的一般法律原则”等司法审判准则进行。战后对德日法西斯战犯的审判完全符合上述准则。纽伦堡判决书曾表示

如下见解：《非战公约》签字后，"任何国家凭借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就是违反这个条约"；"凡是从事计划和实行这类产生不可避免的可怕结果的战争者，都应该被视为从事于犯罪行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战争狂制造了桩桩骇人听闻的惨案，犯下无数令人发指的罪行。早在1941年6月22日，即德国进攻苏联的当天，苏联政府便宣布："德国法西斯统治者要对强盗式地入侵苏联负全部的责任。"1943年10月30日苏美英三国外长公报和三国关于德国暴行的宣言都宣布，将依法对法西斯分子的罪行加以审判，1945年7月26日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明确提出："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欲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

盖吾人坚持非将滥不负责之黠武主义驱出世界，则和平安全及正义之新秩序势不可能……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者在内，将处以法律之严厉制裁。"1945年9月2日，日本天皇及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中表示接受包括上述条款在内的《波茨坦公告》。

远东军事法庭正是依据上述国际法程序和规约，于1946年5月3日正式开庭的。这怎么能被说成是事后立法呢？国际法本身是用于调整和规范国家间关系的法规。它是随着国际关系的演进而发展，随着世界局势的变迁而变化的。

人类进入20世纪以来历经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波及30个国家，造成4000多万人伤亡和2700亿美元的物质损失。空前的战争灾难促成世界上第一次出现要求惩处战争罪魁的条约，第一次订立了《非战公约》。第二次世界大战更造成了人类社会空前的浩劫。先后有约60个国家卷入，仅死亡人数就达5000万之多，物质损失4万亿美元，国际公法面对这一严酷现实能无所作为吗？"破坏和平罪"和"违反人道罪"的提出，正是人类维系和平和生存秩序的客观需要；是对以往人类现代社会反对侵略战争等国际法规约的集中、概括与发展。

田中正明等人把东京审判说成是"事后立法"，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痛斥三：强词夺理的"战胜国审判"说所谓"战胜国审判"说，是日本少数人否定东京审判的又一"根据"。他们称"东京审判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没有中立国参加"，"战犯罪名是战胜国任意强加给东条等日本政治和战争领导人的"，故不合法。

这个问题的提出不仅涉及对东京审判的评价，也直接涉及到对纽伦堡审判的评价。众所周知，法西斯德国和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大策源地。法西斯军队以最惨无人道的战争手段肆意侵略别国，战火烧遍近40个国家的国土。当时，世界上平均每5人中就有4人被卷入战争的苦难。侵略者给全人类带来巨大灾难，成为世界公敌。截至1945年5月1日，加入1942年《联合国宣言》，对德日意轴心国宣战的国家就有47个，遍布五大洲，，这意味着，除去轴心国及其仆从国以外，当时世界上70%以上的主权国家都行动魄来，反对侵略。正是由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投身于这反法西斯战争，才保证了正义最后战胜邪恶。

战后，对罪大恶极的侵略战犯进行国际审判是天经地义的。它不仅是战胜国对战败投降者的审判，而更本质的是国际正义对侵略罪行的审判。战争战犯只有当侵略国家彻底战败后才能被送上历史的审判台。远东国际军事

法庭虽然由11国法官代表组成，但它是代表所有受害国立场，代表除轴心国以外全世界人民进行审判的。在法庭宪章中规定了公平审判的法律原则与程序。在法庭上，受理证据约4300余件，先后有419名证人出庭作证，有779人书面作证。经过长达两年零七个月、818次开庭的认真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列举了详细的判罪理由，才做出最后的判决。判决书长达1213项，其正义性、合法性与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

解决国际争端的国际裁判，一般分为国际仲裁与国际司法审判两种。国际仲裁需要当事国双方以协定方式选择第三者作仲裁人。它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法律方式。对于业已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来说，国际仲裁已不能阻止其战争行为，等待着它的只能是国际法庭的司法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不是仲裁法庭，而是代表世界人民的国际审判法庭。造成战胜国对战败国审判局面的不是别人，正是日本军国主义本身。

是他们丧心病狂地对几乎所有邻国发动战争，与全人类为敌。

因此，他们失败后遭到受害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审判是理所应当，势所必至的。这一审判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

与此相关联，日本少数人认为，东京审判实为美国所控，“是占领政策的一部分”，是“政治措施，而非法律措施”。的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根据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特别宣言设立的。从东京审判到“冷战”政策的出笼，美国一直企图利用其对日本单独占领的特殊地位，贯彻其政治意图。但这主要表现在美国对惩处战犯和在日本铲除军国主义的不彻底性上。例如，1948年12月24日处死东条英机后，美国便宣布释放19名甲级战犯，不再审判。1950年3月7日，盟军最高司令部颁布第5号指令，规定在刑期终了前释放所有日本国内在押战犯。这完全是出于美国“冷战”政策的需要，破坏了东京审判应达到的效果。由于美国的一些消极作用，东京审判不能说是十全十美的。但是，不能据此否定东京审判本身的法律地位。因为东京审判绝非只是按美国特定的政治意图，而是根据世界反法西斯各国的意志和国际公法开庭的。

在驱逐法西斯势力的过程中，作为政治性行政措施，日本褫夺了军国主义分子的公职和“解散了财阀”，而东京审判则是法律措施。这一点在日本学术界也已得到公认。

痛斥四：牵强附会的“和约生效无战犯”说所谓“和约生效无战犯”说，更是偷换概念的无稽之谈。

1986年9月号日本《民族与政治》月刊登载日本青山学院教授佐藤和男文章：《从国际法角度批判中国干涉内政》。文中称：“按惯例，一般审判战犯的判决在和平条约生效的同时便失去其效力。国际法上战争被作为合法手段，只是在违反战争法规者被战时的对方交战国俘获时，才作为战犯交军事法庭审判，并科以刑罚，但当交战国之间旨在恢复‘和平状态’的和约生效后，对战犯的审判便告失效才是合理的。”其根据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交战各国在和平条约中设有‘解除违反交战法规者责任的规定’是惯例”。据此，佐藤和男主张：对日本所有战犯的判决“本来也应随着1952年旧金山和约的生效而告失效”，“恢复了独立权的日本政府，根据国际惯例当然可以期待立即释放作为战犯审判结果被迫服役之人，而（对日和约）第11条正是为了阻止这一点而设立的”，但它“绝没有要求恢复独立权的日本政府承担继续承认东京审判或判决理由正当性的义务”。

关于对战犯的判决何时失效，这首先涉及到惩办战犯的时效问题。1968年11月2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战争罪犯和破坏和平罪不适用“法定时效”的决议（第2391××111号决议）。该决议于1970年11月11日生效。根据该决议，纽伦堡和东京审判所判决的战犯均不适用法定失效。不论犯罪日期，有关罪犯都须承担责任。1965年9月3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对纳粹战犯，无论犯罪时间过去多久，都须受到审判与惩罚。欧洲各国至今仍在追寻漏网的法西斯战犯，并有权予以判决。这与国家间是否缔结和约没有关联。

从历史上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要求审判德皇威廉二世的规定，恰好是在凡尔赛和约中做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旧金山对日和约也是以日本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为一前提的。由此可见，佐藤和男的说法不仅与现代国际法原则相悖，而且与史实也相去甚远，无论从法规条文或实际案例上都缺乏根据。权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交战国之间经常在和约中“规定解除违反交战法规者责任”为依据，很难说明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和约以及和约生效后的结果也应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法体系属于近代国际法。最初，战争在国际法上曾被作为国家的政策手段得到承认；而第一次大战后，特别是《非战公约》签订后，战争作为国家政策手段便不再被国际法所承认。这是现代国际法的重要内容。在现代，仍然套用近代国际法的过时定义，从方法上讲便是错误的。更何况即使在近代，也同样是，如果和约中规定了解除战犯责任，那么和约生效后。战时违反交战法规的责任才能得到解除，否则便不行。这才是真正的国际法惯例。

战后日本与外国的所有和约中根本没有解除战犯责任的规定。和约生效后谈何免去战犯罪责呢？相反，《旧金山和约》第11条明文规定：“日本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其在日本境内或境外之盟国战罪法庭之判决，并将执行各该法庭所科予现被监禁于日本境内之日本国民之处刑。对此等人犯赦免、减刑与假释之权，除由每一案件科刑之一政府或数个政府之决定并由日本之建议外，不得行使。如该项人犯系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判决，该项权利除由参加该法庭之多数政府之决定并由日本之建议外，不得行使。”日本政府签署这一和约，已表明其向其他缔约国承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并接受其判决。不言而喻，日本必须对此承担国际义务。因为国际公法和日本宪法都明确规定：缔约国须忠实履行其缔结的国际条约。

而且国际法庭审判本身，对当事国也具有约束力，这是国际法的基本常识。

痛斥五：难卸罪责的“侵略定义未定”说所谓“侵略定义未定”说，是藤尾正行、田中正明等人大加宣扬的又一谬说。田中正明在1986年9月号日本《民族与政治》月刊上发表题为《东京审判史观的虚实与毒害》一文。文中“引用”美国学者的观点说：“东条和其他人在东京审判错误地受到审判……连侵略战争的定义都没有，是否构成犯罪尚属未定，但却把东条等人作为侵略者审判。”田中在1986年11期日本《全貌》月刊上还称，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自己是侵略”，“侵略定义可由各国自行解释”。

按日本《广辞源》等辞典中的解释：“所谓侵略，即侵入别国，并夺取其土地。”日本国际法学会所编《国际法辞典》中指出：“侵略，通常是指一国为实现对别国的要求而试图以使用武力的手段来达到改变事态的目的行为。”且不论有关侵略的定义在国际上是否完全一致，即便根据日本本国对

侵略所下的定义，也足以证明日本对华战争是地地道道的侵略。

在国际上，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关于侵略，便已成为非法使用武力的法律概念。1923年国联大会第三委员会起草的《互助条约草案》的附件是《关于侵略定义的注释》。

1924年《日内瓦议定书》、1928年《布拉格备忘录》和同年的《非战公约》都直接或间接地规定了侵略的定义。1933年7月苏联与其周围12个邻国缔结了《关于侵略定义条约》。当时，“虽未经宣战而以武装力量侵入他国领土者”已被认定是侵略。即便依据这些当时国际上公认的侵略定义来衡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日本侵华战争判为侵略也是准确无疑的。

当然，如同国际法本身一样，侵略的定义要想概括国际冲突中所有复杂情况是困难的，它自然要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各国的要求得到充实和发展。所以，1945年旧金山会议上又提出给侵略下定义的提案，并授权安理会自由裁决，而不是由当事国“自行解释”。1974年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了《关于侵略定义的决议》。其中第1条规定：“侵略是指国家用武力侵犯别国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或以本《定义》所宣示的与联合国宪章不符的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武力。”这与历史上关于侵略的定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而且概括的面更广了。可以预言，今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关于侵略的定义还会有所发展，但是，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在20世纪所犯下的侵略罪行是永远也无法开脱的。

痛斥六：不打自招的“国家意志矛盾”说所谓“国家意志矛盾”说，是前几年日本少数军国主义同情分子提出的一个新论点。它的提出有这样一个背景：1986年8月19日日本官房长官在众议院内阁委员会答辩时说，日本“根据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第11条，在国与国关系上，接受审判是事实”，作为政府统一见解承认了东京审判的正当性。1986年以后，中曾根前首相也中止参拜合祀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并明确表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能否认”，又罢了文相藤尾正行的官。迄今，日本少数军国主义同情分子总以为中曾根的“战后政治总决算”的主张在思想上与他们是一致的，认为中曾根可以代表他们说话。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事态发展却相反。这令他们大失所望，于是又开始说中曾根内阁的坏话了。“国家意志矛盾”说便是其中之一。

其主要意思是说，战后历届日本政府都未公开承认侵略，而是把战犯作为战争“牺牲者”。这代表了日本的国家意志，而现在政府的统一见解则与之相抵触，故须“收回或搁置”。

曾与甲级战犯、日本右翼运动头子大川周明关系密切的中谷武世等人便持此主张。这位《民族与政治》月刊的编辑发行人列举了下述事例，说明日本的国家意志：（1）日本政府、国会于1953年第16次国会通过决议，修改对战争伤亡者遗属援助法，支给其养老金；1954年修改“恩给法”，给以战犯名义在拘禁中死于狱中或被处死者的遗属发放扶助金；1955年再度修改该法，对受刑者本人，将拘禁期间也作为在职期计算在内，发给抚恤金。这等于日本政府和国会正式否认了“战争犯罪”的存在，而都作为“战争牺牲者”对待。

所以日本今天“根本没有战犯”，靖国神社中合祀的“都是战争牺牲者”。（2）1957年5月，岸信介任首相出访印度时表示：“作为日本首相，

对印度政府及国民从内心感谢的有两件事”。

其中之一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印度法官帕尔是在11国法官中唯一宣布日本无罪的这一事实”。此后，“佐藤荣作内阁还曾授予帕尔二等勋章。这是政府或政治家谈及东京审判时必须考虑的史实”。

这里暂且认为中谷武世说的均为事实，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造成日本“国家意志矛盾”的究竟是谁？那恐怕并非是中曾根内阁，反而是吉田茂、岸信介和佐藤荣作内阁。而且，与一国在国际上正式签署的条约和该国国内宪法相比，任何政府或国会的本质上与其相左的决定，任何首脑的个别言行都不能代表国家意志，1946年日本国宪法第98年规定：“日本国缔结之条约及确立之国际法规，必须忠实遵守之”。国际条约是国际法的重要渊源，它规定了签字国应负的国际义务。

鉴此可以认为，作为日本政府及其成员，任何违反国际条约的言行不仅谈不上代表国家意志，而且是违反日本宪法的。

中谷武世的一番话倒是告诉了人们：现在日本出现的“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问题”和“藤尾发言”都不是偶然的，这股逆流是有它的源头的。

痛斥七：反咬一口的“干涉内政”说所谓“干涉内政”说，是日本少数人拒绝邻国及亚洲人民忠告的借口。自从中国对日本教科书中歪曲历史及日本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提出忠告后，日本少数便开始攻击中国“干涉内政”。80年代，日本一些“少壮议员”还组成了所谓“国家基本问题同志会”，要求当时的中曾根首相坚持“不许干涉内政，尊重独立自主”，意在敦促日本政府在“教科书问题”和参拜靖国神社一事上我行我素。

要求“不干涉内政”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这些要求是针对中国及亚洲人民批评日本有关方面而做出伤害别国人民感情的事，那就大错特错了。这里首先必须澄清一些基本概念与认识。

第一，什么叫“内政”？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款规定：“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为内政。一般认为，按其本质而言，凡属国内管辖的事务，如确立政治和经济体制、立法、社会文化发展等都是内政问题。但“内政”不是一种纯地域的概念。一个国家在本国国内的行为也可能是破坏国际法的行为，例如，前南非当局的种族主义统治便是违反国际法的。因此，凡属践踏国际法准则的行为都是违反国际法的，都不能解释为“内政”。再有，提到内政就不能不涉及“国际关心事项”(matter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日文称“国际关系事项”)。这是由联合国提出，并得到各国普遍承认的国际法概念。日本《国际法辞典》在“国际关心事项”辞条中也明确指出：虽属一国国内管辖权内的事项，但根据条约该事项成为国际法的限制对象而国家对此负有法律义务时，不言而喻，该事项便成为该国不能自由决定的问题”。日本国际法学界也认为：“达成国际协议，该事项即不再是国内问题”，“不产生违反不干涉义务的问题”。

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各项条款”；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又写明“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这些国际条约和声明都构成了日本政府在承认发动侵略战争的错误、放弃军国主义问题上所须承担的国际义务。1986年7月7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指出：“就教科书问题而言，日本选用什么教科书，以及怎样编写、审定教科书，完全是日本自己的事。但是，当日本的某些教科书涉及对别国关系的记述，甚至肆意歪曲日本向外扩张的历史事实时，这就

超出了日本'内政'的范围”。这即是说，它已构成"国际关心事项"，自然不再受国际法上"不干涉内政"原则的任何保护。

第二，什么叫干涉？这里权且引用由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寺泽一主编的《国际法基捶一书中的定义：“干涉是以行使武力、断绝外交关系及其威胁等强制执行为背景，把本国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的行为。因为干涉是强制的，所以提出建议、斡旋或调停等不是干涉。”中国政府对日本某些教科书歪曲日本侵略历史的错误记述和有违中日联合声明之举提出忠告，完全是出于旨在建立中日两国真正相互信赖、世代友好关系的真诚善意，这怎么能被称为"干涉"呢？针对"国际关心事项“，提出本国的正确主张，这完全是国际法赋予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

第三，日本政府阁僚参拜靖国神社为何会引起亚洲各国警惕，对此有些日本人表示不解，认为人已故去，参拜一下又有何妨，况且其中不仅有战犯，还有战争期间其他的死难者。笔者认为，日本国民确有祭祖习俗，但靖国神社与其他社神或庙宇不同，其性质不容模糊。靖国神社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一直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的工具。明治12年（即1879年），该神社由东京招魂社改为靖国神社后，日本先后对外进行了侵朝战争、甲午战争及日俄战争。此后日本又在全国各地修建了许多忠魂碑、护国神社等，专门祭祀对外侵略的战死者，宣扬出征战死者可成为靖国、护国之神，从而使靖国神社成为日本军阀强制国民“忠君爱国”的又一精神支柱。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大举全面侵华招兵买马，曾以"富国强兵保险相互会社"社长根津嘉一郎的名义在靖国神社正门外两侧立碑。两碑各有6幅浮雕，颂扬日本军人的勇武。其中一幅刻写着：“上海事变爆发，昭和元年一月二十八日，我海军陆战队击败八十倍于我之敌人，发扬了武威。”这些浮雕至今仍完好地保留着。那些既是日本侵略历史的见证，也是靖国神社性质的写照。靖国神社内供奉的牌位分为"维新前后殉难者"、"幕末殉难者"和"昭和殉难者"等几类，包括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等14名战犯均被作为殉国的"昭和殉难者"于1978年起合祀在其中。所谓"上海事变"，即日本侵略军侵占上海的"一·二八事变"，日军对上海的狂轰滥炸，造成中国军民几万人牺牲，约60万人无家可归。凡是了解一点日本侵华历史中血腥罪行的中国人或日本人，凡是有良知的中国人或日本人，都有权对靖国神社、对这段历史发出正义之声。

日本人对死都是有区分的，那种称凡是死都不分好坏，可一同祭祀的说法难以成立。日本人受佛教影响很深，对死者有特殊的观念。日本家庭中大多设有佛坛，纪念去世的父辈，甚至连上野动物园也为死去的动物修墓纪念。然而，日本人对死都并非不分界线。靖国神社最初便是明治政府为了祭祀为明治维新建功立业而死的人所修建的，而当时叛军死者的亡灵是被绝对排斥在外的。他们被单独收放在上野动物园附近很不起眼的永宽寺内，作为历史遗物保存。与气势庞大的靖国神社相比，那只不过是一个不大有人问津的小舍。现在日本将东条英机等大小战犯放置靖国神社供奉，从观念上讲，显然是将战犯列入为国牺牲的靖国神之列。这直接涉及如何评价、对待过去战争历史的问题。

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历次侵略战争中，日本国民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在相当多的日本人家庭中都有在战争中被抓去当兵而客死他乡者。他们父辈的亡灵有些也奠于靖国神社之中。作为遗属，他们希望国家的政府要员

参拜靖国神社，以慰亡灵兼慰自己。一些日本政客为争取更多选票，也坚持每年参拜靖国神社，只有作了首相或外相之后才“为照顾亚洲各国的感情”而暂时停止参拜。

在一部分人中，战前教育遗留的旧思想仍然很深。一些人至今仍否认日本在历史上的侵略事实。有些人虽然勉强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侵略了中国，但仍认为在那之前日本没有侵略别国，第二次大战中南进是为从英法殖民统治下解放东南亚等。因此，他们才把明治以来的战死者当作“为保卫国家和同胞而牺牲”的人来参拜、追悼，并借以振奋当代日本人的“爱国心”与“国家意识”。

1985年，中曾根康弘带头以总理大臣身份参拜靖国神社，还说“对于那些为国捐躯的人，国家应有个感谢的场所。”

这是天经地义的，否则还有谁来为国家奉献生命呢？”事后，笔者曾与一位日本前驻华大使谈及此事，他对我说，“中曾根首相当时并不知道靖国神社中有甲级战犯。”然而，在此事已引起亚洲各国人民不满并公诸于众后，1988年奥野诚亮仍以国土厅长官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并为侵略罪行进行掩盖和辩解说，“日本一直不是一个侵略国家”，“日本是为保卫自己的安全而发动战争的”。在受到日本国内外强烈批评后，他还说“我毫不认为我说过不正确的话”，并叫嚷“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是想建立亚洲人的亚洲，解放东亚”，“大东亚战争对建立亚洲人的亚洲作了贡献”；“日本当局是迎合中国的主张，轻易使用‘侵略’一词”，“使用掠夺土地这一说法，便对不起日本先辈和后代”。他攻击“中国不断干涉日本内政”，鼓吹“摆脱东京审判史观”，“不能让外国歪曲的历史流传于世”。据日本友人指出，像这类思想并非只是少数政客持有，一些人只是没说出口罢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受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毒害的人都难以转变其历史观。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已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还有一些人在挖空心思为侵略历史翻案。1993年2月8日，日本《产经新闻》在其头版头条登载了这样一则消息：东京大学教授小堀一郎等人，收集了大量“东京审判”时被驳回的有关资料，并拟公开出版发行，为重新改写历史做准备。其中涉及卢沟桥事变而被驳回的有：1937年5月5日驻华大使川越致佐藤外相的电报“中共对日战争准备”、同年3月13日日本驻汉口总领事三浦致佐藤外相的电报“中共的反日计划”等。这些史料的发掘绝非旨在纯史学的研究。《产经新闻》的评论一语道破其用心，即“重新修改东京审判史观”。该评论称：“东京审判就日中战争发端的卢沟桥事件的原因也采用了证明是‘日军挑起’的证据”，但“最先开枪的‘是中国军队’，南京大屠杀的数字也是‘夸大’的。”“东京审判是胜者对败者的政治色彩很浓的审判，与历史事实不符”，“希望通过这次律师方面史料的挖掘”，使日本近现代史“更客观真实”。

1994年第5期日本《正论》月刊（《产经新闻》系统）发表“特集”——《“侵略战争”论争》，由上智大学教授流部升一等5人分别撰文，针对细川首相承认侵略战争的言论进行攻击，公开美化或否认日本侵略历史，宣称“日本解放了殖民地”等谬论。1995年是日本战败投降50周年，日本国内围绕在国会通过“不战决议”和如何正确认识历史问题斗争激烈。1995年3月3日社会党在众议院“战后50周年特别委员会”，提出了“不战决议”草案。其主旨是就日本的对朝殖民统治、侵华行为及对其他邻国的侵略

行为等表示"遗憾和反省"。尽管在此问题上执政三党领导人曾基本达成协议，但遭到自民党内不少人反对。1994年12月，自民党以奥野诚亮为会长，成立了有200人参加的"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森喜朗干事长及部分阁僚也参与其中，反对"不战决议"，主张删除"我国侵略行为和殖民统治给许多人带来难以忍受的苦难和悲痛"等字样。新进党也于1995年2月成立了小泽辰男为会长、约30人参加的所谓"正确传授历史国会议员联盟"，与自民党反对派一起开会反对"不战决议"。自民党部分议员反对"不战决议"的目的之一，是为在选举时捞选票而讨好其支持团体"日本遗族会"等组织。

据报道，日本已有12个县议会通过了"对战争死难者追悼致谢决议"。日本右翼还策划利用战后50周年在日本大造翻案舆论、游行。这表明日本坚持错误历史观的势力依然强大。1996年是东京审判50周年，日本否认当年侵略亚洲史实的各种势力还将跳出来做新的表演。这股为东京审判翻案的思潮还将再度抬头。

在德国，否认纳粹德国战争罪行已被从法律上排除在言论自由之外。根据1994年修订的德国刑法，对否认纳粹屠杀犹太人的言论可判5年徒刑。由此可见日德两国对侵略战争的认罪态度是何等不同。

在日本走向21世纪的时候，日本如何正确认识历史，并作为前车之鉴，仍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它不仅关系到日本的政治发展方向，而且直接影响日本与亚洲邻国的关系。随着日本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明显变化，人们将更为敏感地注意日本在历史问题上是否能保持清醒头脑。

在这一重要原则问题上，中国的立场是十分鲜明的。早在1985年10月18日，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便在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结束时的会见中，就发展中日友好关系发表了四点意见，当时笔者作为该委员会中方专家出席了这次会议，认为这四点意见全面地阐述了中方的原则立场和诚恳愿望，现将其主要内容摘录如下：（一）巩固和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关系到中日两国人民长期的根本利益的大事，是关系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大事。我们两国都把中日友好奉为本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完全正确的。任何轻视和低估中日长期友好事业的想法和做法都是没有远见的，也是错误的。我希望我们两国政府和人民都要继续努力提高珍惜中日友好的自觉性。

（二）为了发展中日友好，我们两国政府和人民都要正确对待两国严重对抗的历史。两国长达半个世纪的对立，是由日本极少数军国主义头子造成的，不应由日本人民和现在的广大朝野人士负责。日本极少数军国主义头子一手制造的侵华战争，给中国和亚洲、太平洋地区各国带来极大的灾难，对此，我们两国人民和后代子孙都要作为严重的历史教训，引为鉴戒，但这些战争制造者本人有的早已世，有的已经受到了国际公法的正当制裁，他们的子女和后代并没有受到连累。

总之，当我们努力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时，一方面不要使历史上发生的对抗影响今天的合作，另一方面也不应对制造中日对抗的罪魁祸首寄以同情，更不应纵容极少数人进行妄图复活军国主义的活动。否则，就将不可避免地使中日友好蒙上阴影，甚至带来严重后果。

（三）实现中日长期友好的庄严任务，需要我们两国政府和人民作坚韧不拔的努力。我们两国上上下下都要认真对待和严格遵守两国政府签署的

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坚持双方确认的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相互信赖、长期稳定的四项原则。两国的历史、现状、利益和观点都有所不同，当交往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双方都应顾全大局，谨慎从事，认真体察对方的友好建议和合理要求，力求避免做任何伤害对方人民感情的事。我们认为，只要我们双方都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中日长期友好的前景就将是光明的。

（四）中日友好的最高目标是实现世世代代的友好。为了这个崇高的目标，我们首先要努力发展有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积极因素，妥善处理不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消极因素，争取实现二十一世纪中日继续友好。这样，就为世世代代友好奠定了牢固的基矗那么，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是否公正呢？下面我们简要地看看二次大战后对日本战犯的最有代表性的七大审判情况，用事实来驳斥日本右翼势力否定对日本战犯严正审判的无理与可耻的行径：

三、马尼拉大审判

——马尼拉审判是远东盟军总部（联合国军菲律宾战区司令官特别军事法庭）对日本侵略东南亚战犯的庄严审判，是二战结束后对日本战犯的首次审判，处死了日本侵略菲律宾方面军的号称“马来亚之虎”的司令官山下奉文、第十四方面军司令官本间雅晴，虽失之粗糙，却为设在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积累了经验。

一、绞死“马来虎”山下奉文 1945年9月16日，根据中国和英国政府的要求，马尼拉军事法庭在庄重的气氛中开庭。审讯的第一个战犯是号称“马来亚之虎”的侵占马来亚、新加坡日寇司令官山下奉文将军。

山下奉文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后赴伯尔尼进行谍报活动。在日军内部北进派与南进派的争斗中，他巧妙派部下——善搞阴谋、狂热活跃的迂政信打入北进派内部，搞到了北进派首领荒木贞夫企图搞政变的核心情报，使裕仁天皇得以采取措施打击北进派，从而为南进派立下汗马功劳。在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中，他又先做间谍在叛乱分子中刺探情报，又受命传达宫廷指示，与叛乱分子谈判，为镇压叛乱出了大力，因而受到裕仁天皇重用，先担任驻朝鲜日军旅团长，1938年又升任侵华日军派遣军参谋长。曾率军对我华北反复“扫荡”，多次对我抗日军民进行报复性大屠杀。他在蠡县制造“王辛庄惨案”，使用毒瓦斯一次杀害抗日群众70多人；在廊房制造“韩村镇惨案”，以刀劈、机枪扫射等方式杀害无辜百姓68人，烧毁民房300余间；他又指挥所属部队制造“大曹村惨案”，以刀劈、火烧等凶残方法杀死抗日群众73人，烧毁民房2300余间。在对冀中军区的五次围攻中，山下奉文指挥日伪军屠杀了数以万计抗日军民。1941年在我东北负责训练准备入侵马来亚、菲律宾、印尼的南进特别机动部队，并奉调回国参预策划日本侵略东南亚的阴谋。

1941年12月5日，山下指挥的日本特混舰队从海南岛的三亚港出发，采取轻装猛进、近战夜战、穿插迂回等多种战术，在武士道精神煽动下，54天攻下马来亚，又乘胜夺取新加坡，迫使英守军司令白西华举手投降，生俘13万人，也逼得驻菲美军司令麦克阿瑟狼狈外逃。

5位美国将军担任马尼拉军事法庭的法官。他们命人将山下奉文押上法庭。昔日杀人成性的山下在法庭明亮的灯光照耀下，仍想摆出他“马来亚之虎”的威风，但成千上万在日寇铁蹄下侥幸活下来的人，纷纷来到军事法庭前游行，高呼严惩杀人凶手山下奉文的口号，吓得山下胆战心惊。一些小姑娘在法庭上当众脱开上衣，让法官察看她们受山下的部属刺刀杀伤的痕迹。年岁大一些的姑娘向法庭呈上受日本兵强奸的证词。她们一个个义愤填膺，恨不得冲上去活活把山下咬死。在群情愤怒声讨之下，山下奉文才闭着眼睛低下了头。

法庭指控山下奉文对洗劫马尼拉和新加坡负有不可推卸的刑事责任，应对1944年12月在菲帕拉万岛烧死150名美国战俘负有指挥责任，对同年在菲八打雁省对无辜村民进行一系列屠杀也罪责难逃！

接着，美国海军陆战队队长陶格拉斯·威廉·波格出庭作证：“我们150名美国战俘被关在菲律宾帕拉万岛的一座集中营里。那天，我们刚进入防空洞里，便听到一声爆炸和不断的凄厉叫喊声，也夹杂着日军官兵的大笑声和机关枪声。我看到一股黑烟从A连的防空壕入口处喷出来。有50多个日本兵拿着步枪、手榴弹、轻机关枪、火把，推着一桶桶汽油冲来。他们把汽油从门口倒进去，又抛出一个火把引着汽油。

俘虏们冲出逃命时，不是被刺刀捅死，就是被棍子打死，或者被开枪打死！……后来，我们5个人侥幸逃出来参加了游击队。”轮到山下奉文为自己辩护时，他狡猾地眨眨眼，花言巧语地为自己开脱罪行：“每次事件发生，我都没有得到报告，而事前我也不知道它可能发生。……我没有下令进行屠杀。……我做出最大的努力来控制我的军队。”美国法官针对山下奉文上述辩解严肃指出：“新加坡于1942年2月15日投降日本后，你率军占领新加坡全岛。你当天即向你所属四个司令官下令，必须将新加坡全部华侨男子集中到指定的地点调查身份，有抗日情绪的人和政府人员都要处死。你还规定，这项工作必须在2月23日完成。根据这一命令，大批新加坡华侨惨遭屠杀，按你们日本人自己统计的数字也不下5000人！”接着，军事法庭又传被迫参加屠杀的马来亚丹戎巴呀警署的警察亚瑟·约翰和汤玛斯·伊萨克出庭作证。约翰说：“日本人命令我们把本区内700多名华侨带到警署禁闭起来，问问姓名，就用汽车把他们运到丹戎巴呀码头全部枪杀。”此后，军事法庭传目睹日寇在新加坡田峇路附近海滩上屠杀5000名无辜华侨的李秀国出庭作证：“1944年2月23日下午，我看见3辆满载中国人的汽车从我家门口开过。汽车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停下来。日本强盗将3个人为一组绑在一起，经过华人游泳会旁边的一条小巷，将他们押到海滩上。日本鬼子让华侨面向大海跪下，只见一个日本军官挥动红旗，日本兵就一起开枪射击，之后又举起军刀砍死了那些受伤者！”最后，法官义正词严地质问山下奉文：“根据你的命令屠杀了无数华侨，还能说你没有下过命令也不知道发生过屠杀菲律宾、马来西、新加坡人和华侨的事件吗？”在大量人证物证面前，骄横不可一世的“马来亚之虎”也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垂头丧气地低下了头。忽又高声大叫：“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山下奉文不甘心失败，又提出让他的参谋长武藤章和副参谋长宇都宫做助理辩护人，美国检察官严辞拒绝让两个战犯做辩护人，当即驳回他的要求道：“检察官不承认被告提出的两个人为他的参谋长和副参谋长，山下拥有参谋长和副参谋长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经过一个多月的审理，1945年12月8日下午，

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四周年之际，马尼拉军事法庭对山下奉文做出最后判决。法庭庭长雷诺鲁兹少校庄重宣告，判处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山下奉文绞刑。

1946年2月23日2时10分，按照麦克阿瑟的命令，把山下奉文押进马尼拉市南郊罗斯·巴尼约斯刑常临刑前，山下奉文发表“悔罪演讲”说：“由于我的不注意和天性昏庸的缘故，贻误了全军的指挥和统率。……曾经是诸位官兵的指挥官的山下奉文，受严峻的法律制裁，就要登上死刑台了。……”山下奉文至死顽固不化，1946年2月23日3时02分，被押上绞架，3时27分气绝毙命。

二、宰掉“红鼻子”！

马尼拉军事法庭审判的第二个战犯，是侵菲日军总司令本间雅晴。

这位有“红鼻子语言学家”之称的本间雅晴是个狡猾而极残暴的法西斯军官。他年轻时当过7年负责日本同英国陆军联系的情报联络军官，又给裕仁天皇的弟弟秩父宫当过6年侍从官，还在1932年一夜之间给裕仁天皇讲解并翻译过400页的李顿致国联的报告书。他参加过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

军事法庭指控他任侵菲日军总司令时，在1942年4月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导致一万余人死亡的巴丹死亡行军。

美国陆军士兵D·E·英格尔作为巴丹死亡行军的幸存者出作证：“水潭和小溪的水脏得不堪入口，喝下肚去危险万分。土井里的水也少得可怜。当战俘抢着取水解渴时，日本兵就举枪射击。等到烟尘消散之后，你就会觉得污水固然会使人死亡，清水也会使人死亡。

“路上，菲律宾人多次设法接济我们食物。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丢给我们食物时，日本兵也开枪向其射击。此外，偶然看到路边有一点儿甘蔗，设法去取的人，也大多丧命于日本兵的刺刀之下！”本间雅晴拚命为自己辩解，说他没有下达过任何有关进行死亡行军的命令，并说这一事件不是长期策划的阴谋行动，而是由日本士兵的报复情绪引起的。本回的辩护律师也说本间雅晴不是巴丹死亡行军的主谋，该事件是由来自东京和新加坡的日本参谋军官蓄谋制造的，还胡说死亡行军的严酷性同日本兵在新兵训练营的严酷性没有什么差别。

主持审讯的美国将军认为这是极其无力的辩解，并拿出当时美菲联军司令官金少将的证词，指出巴丹死亡行军是由本间雅晴的参谋长迁政信一手策划的，而且1942年2月奉东条英机之命到菲律宾担任民政顾问的村田，也和本间雅晴谈过巴丹死亡行军问题。所以，本间雅晴诿称不知此事纯属谎言。不仅如此，本间雅晴还亲自下达了死亡行军的口头命令，也知道持续一周之久的行军队伍就在离他的司令部不远的地方通过。因此，本间雅晴妄想推卸罪责是徒劳的。大量事实证明，本间雅晴有罪，应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三、麦克阿瑟发表执行判决声明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接到马尼拉军事法庭关于处死山下奉文和本间雅晴的判决，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滋味。

因为山下奉文和本间雅晴是他的老对手。麦克阿瑟当时任驻菲美军司令官，负责指挥盟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争。他那时掌管十几万美菲部队，山下等人只有6万余人。但麦克阿瑟未及时接受其空军司令刘易斯·布里尔

顿关于袭击驻台湾的日本机场的建议，想等到有足够说明日本进攻意图的明显迹象后再进行空袭，结果被山下和本间打得大败，不得不带着夫人和4岁的儿子，搭乘一条鱼雷艇，冒着生命危险，乘夜幕逃出被日军包围的飞地巴丹和雷吉多尔。不仅自己遭受奇耻大辱，而且使大批美军将士沦为战俘，惨死在日本的屠刀之下。

1946年2月，麦克阿瑟针对山下奉文案件的种种分歧意见，明确发表如下声明：“我重新研究了山下案件的诉讼程序，以便寻找某些可以减轻他的罪责的事实，但是我徒劳，我没有找到任何事实。

……”“诉讼程序是在一切司法宗旨的主要理论基础指导下进行的。……审判的结果是无可挑剔的。”“我批准军事委员会的审理结果和判决，并指示西太平洋陆军司令官执行对被告的判决，剥夺他的制服、勋章和其他表明他任军职的标志。”山下奉文的律师又向白宫上诉，但美国总统杜鲁门立即将其驳回。

1946年2月23日清晨3时27分，山下奉文的末日到了，他就着龙须菜吃下最后一片面包，喝完最后一口气酒，又装模作样地睡了一会儿之后，终于被架上马尼拉郊外新建的比利比德监狱的绞刑架。他作为法西斯强硬派，又朝北向远在天边的天皇皇宫鞠躬遥拜，但天皇也救不了他的性命，无情而正义的套绳慢慢拉起，战犯山下奉文被永远吊在了历史的绞刑架上。

1946年3月21日，麦克阿瑟不顾本间雅晴的律师要他宽判的呼吁，坚持正义，发表了要执行判决的长期声明：“我再次面临对从前在一次重大战役中的敌人宣布终判的令人厌恶的任务。对他的审讯过程表明。……对本间的审讯是空前公正的。……以军事授权或军事需要为借口，大规模毁灭手无寸铁、孤立无援的人，还有比这滔天罪行更大、更危险的吗？”1946年4月3日，本间雅晴罪有应得地倒在美国行刑队的枪口下。

由此观之，马尼拉审判作为二次大战后对日本战犯的较早的历史性审判，虽有因时间短促而稍显草率的缺憾，但它仍不失为一次大快人心的正义审判，也为其后的东京大审判积累了经验。从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审判执行直至今日，都有不少人以种种借口为山下奉文和本间雅晴鸣屈叫冤，想为这两个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翻案，企图否定马尼拉审判的正义性质，把它说成是狭隘的私人报复性的审判，但历史终将证明，一切企图为日本战犯翻案的活动都是徒劳的！

四、东京大审判

——东京审判与纽伦堡审判七名，是二次大战后对日本甲级战犯的最重要审判，被称为东西审判双璧之一。它以极大的权威处死了前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

这次审判中，除处死了前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同时处死的还有广田弘毅，侵华派遣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侵华特务巨头土肥原贤二，南京大屠杀元凶松井石根，侵缅日军司令官木村兵太郎，驻苏门答腊与菲律宾占领军高级指挥官武藤章等7人，判处木户幸一、平沼骐一郎、贺屋兴宣、嶋田敏太

郎、白鸟繁夫、大岛浩、荒木贞夫、星野直树、小矶国昭、畑俊六、梅津美治郎、南次郎、铃木贞一、佐藤贤二、桥本欣五郎、冈敬纯等16人终身监禁；判处东乡茂德20年徒刑，重光葵7年徒刑。东京审判影响巨大，但却受到50年代初冷战格局影响，包庇、释放了大批日本战犯。

1、开庭审判大较量在国际舆论强烈要求尽快审判日本战犯的压力下，麦克阿瑟和盟军总部见诸项准备基本就绪，就命东京国际法庭开始审判。

正式开庭的前一天，基南命特选的膀大腰粗的美国宪兵将26名被告（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尚在押解途中），带到巢鸭监狱尽头的一间大办公室内，在几位美军将校指挥下站好队形，由国际检察局官员威风凛凛宣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局，业已将诸位列为甲级战犯提起公诉，并已决定于1946年5月3日开庭审判，现在就当面把起诉书交给各位被告。”日本外务省参事官把国际检察局官员的话译成日文，战犯们听了脸上露出沮丧的神情，然后按被告顺序叫名，把起诉书分别交给各被告本人。

刹那间，不可一世的昔日战争贩子都呆若木鸡，一起瞪大眼睛看起诉书的序言：“于本起诉书下面所言及之时间，日本之对内对外政策，均受穷兵黩武之军阀之支配与指导。此种政策不特为造成世界重大纠纷与侵略战争之原因，同时摧毁爱好和平各国人民之利益与日本国民自身之利益。……”接着，起诉书控诉日本1928年东方会议至1945年9月2日无条件投降期间犯下的国际性非道义残暴罪状。

起诉书揭露：“日本自诩为比亚洲甚至全世界任何民族都优越的民族，采用与希特勒纳粹党、墨索里尼法西斯党完全相同的议会制度。这28名被告都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元凶，他们与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狼狈为奸，闯下了奴役和榨取他国的反和平之罪、发动战争之罪、反人道之罪的弥天大祸。

尤其是这28名被告利用职务上的权力和个人的声望，对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破坏国际法以及神圣条约上之誓言，为发动侵略战争而做计划、准备、开战之种种努力。他们虐待俘虏，实施非人道的强制劳动，对被占领国人民施展大屠杀、凌辱、掠夺、抢劫等野蛮暴行。同时在国内更对日本政府与官员强制实行陆海空军的威令与压制，又组织翼赞会，引导舆论走向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进而更在各被占领国树立傀儡政权，作为日本侵略战争之政治工具。……”战犯们正在埋头阅读对他们的起诉书，只听“扑腾”一声作响，众人急忙一看，只见法西斯评论家大川周明昏倒在地，口吐白沫，痉挛不止，一时秩序大乱，维持秩序的美国宪兵急忙七手八脚把大川周明抬走抢救。

战犯们见此情景，都借机起哄闹事，松井石根想到他作为南京大屠杀的主犯罪责难逃，奇丑的右脸和右臂的习惯性痉挛症不由自主发作起来，脑际间闪现出被判处绞刑时的痛苦情景，全身大出冷汗，折腾一阵，恢复正常后叹口气说：“我梦里都在想南京大屠杀事件，它已经成为帝国不可洗刷的耻辱，本人身为华中派遣军总司令，更难逃刑责，岂知我是天大的冤枉，今天不必再说谎话，本人实在是无辜的！”站在一旁的广田弘毅与松井同病相怜，假装同情之态说“大将阁下，我相信你的话，只怕世人却不相信！”松井石根受到强烈刺激，神思恍惚中突然想起当年受黑社会鼻祖头山满派遣，在孙中山周围施展阴谋之事，突然像打一针吗啡，鼓动如簧之舌为自己脸上贴金道：“在日本军人中，谁不说我是亲支将军？我当年亲自接待过支那革命之父孙逸仙，孙先生把我和山田良政、宫崎滔天同样看待，做梦也未想到有

一天我会变成屠杀支那人的元凶，我难逃一死，只怕死后没脸去见孙先生。"广田弘毅以谎话外交著称于世，没想到松井此项功夫比自己还大，就冷嘲热讽说："我记得当年近卫公爵派你担任中支派遣军司令官，天皇陛下临行特意接见你，就是因为你对支那有丰富的经历，以为可以和平解决战争，谁知道鬼使神差，让你把事情弄得如此糟糕，也是天意！"松井石根可不爱听这话，嘴一撇把南京大屠杀的责任往部下身上推："我当时在苏州养病，岂知手下两个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与谷寿夫胆大包天下令大屠杀，等我赶到南京，惨案已经发生，亏我出面挽救，不然南京城将被屠光！"东条英机听松井石根谎话连篇，连声冷笑说："也算是老天有眼，中岛病死，谷寿夫被支那逮捕，你也跑不了！"松井石根阴阳怪气道："这是报应，中岛已死，谷寿夫也活不成，只是我太冤枉了！"松井石根的话引起战犯被告强烈共鸣，都声嘶力竭大叫冤枉，声称自己无罪。美国检察官见此情景大吼一声："不许喧闹，不得叫嚷！"众战犯被告遭此训斥，都面面相觑，不敢再公开闹事，只有松冈洋右还在嘟嘟囔囔不知说些什么，美国军官大手一挥，26个被告便带着木然的表情拿着自己的那份起诉书，再排成两队被押回牢房。

1946年5月3日，举世瞩目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正式开庭，这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国际审判。

麦克阿瑟和基南为选择东京审判法庭地点而煞费苦心，选来挑去，终于选定了东京市谷山的前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大厅，也是前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校址，一座钢筋水泥构筑的积木式高地楼群。

不明真相的人对此感到大惑不解，因为外表看来，这座古旧建筑位于东京废墟包围中的小山之上，很不起眼，四周到处断壁残房，一片残破景象。

有人问起此事的奥妙，基南笑称，麦克阿瑟亲自选定此一地点，就是要向日本和全世界民众显示，日本侵略者多行不义必自毙，显示出明显的因果报应味道。更有讽刺意义的是这里曾是日本军阀首脑阴谋策划侵略战争的"神经中枢"，正是在这里，日本军阀不可一世，发号施令，派大军侵略中国，发密令进攻东南亚，施阴谋袭击珍珠港，而今换了人间，偏要把魔鬼的巢穴变成审判、清算日本甲级战犯的法庭！更有讽刺意味的是东京审判法庭韦勃庭长的办公室，就是战争狂人东条英机当年滥施淫威、发号施令的办公室，真是历史的绝妙滑稽讽刺。

你别看此法庭外表破旧，里面却华丽而现代化，加之其大厅本来就是西式建筑结构，宽敞高大，盟军总部又拨出大笔日元按美国标准连续整修几个月，就更显得富丽堂皇，气度不凡！

1946年5月3日上午11时30分，东京审判法庭宣布开庭审判。

对东京法庭的内部结构，苏联学者拉金斯基、罗森布立特在所著《日本首要战犯的国际审判》一书中，有全面介绍：前陆军省的会堂布置为审判厅。在靠厅壁的高台上是长长的法官席，后面摆着供法官坐用的沙发椅11张。在沙发椅的后墙上悬挂着参加组织法庭的11国国旗。

在法官台前设有斜面站台，以供检察官和辩护人发言之用。斜面站台上装有扩音机。斜面站台右侧为辩护人主席团席，左侧为检察官席。在法官台左端前面为证人席，也装有扩音机。

斜面站台和证人席都装有灯光信号，以便在当事人发言及证人陈述证言时借以调度停息时间。在证人席和检察官席之间为法庭翻译官席，速记席就设在它后面。

靠着法官台对面的厅壁设有半圆形的被告席及辩护人席。审判厅的右侧有池座和楼厢。

池座用不高的栅栏和大厅的其余部分隔开，作为新闻记者席。

楼厢是旁听席，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日本听众席，而另一部分则为美国听众席，同时军事警察还严格监视不使日本人和美国人坐在一起。旁听者持有特许通行证就可听审。

与审判厅相毗连的有如下几个办公室：宽大的会议室，法庭的裁决处分会议也在这里举行；证人室；被告与律师会谈室，等等。

东京审判法庭布置得肃穆庄严。苏、美、中、英、法、澳、荷、英加拿大、新西兰、菲律宾 11 国法官身着崭新的法官服，心怀深重的责任感，迎着 11 国国旗鱼贯而入预备会议室，端坐在会议室座位上，准备行使庄严的使命，一个个脸上显出激动而自豪的神情。

外人哪里知道，刚才为法官座次发生过激烈争执，中国法官几乎要退出审判。原来，各国约定法官座次按投降书上各受降国签字顺序决定，岂料英、荷等国帝国主义劣根性作祟，竟要都排到中国前面。中国法官梅汝璈觉得这不是他个人的座次问题，关系到泱泱大国中国的尊严，就滔滔不绝讲述中国在二战中的巨大贡献，不允许一次大战后凡尔赛和会上列强欺辱中国事件重演，又操一口流利的英语据理力争，迫使西方法官对中国法官刮目相看，只得让梅汝璈坐到显著的位置上。消息传回中国，上上下下均受鼓舞。

这时，审判厅内热闹非凡，200 个记者席上挤满了各国记者，一个个手举照相机像打仗一般冲锋陷阵，捕捉富有历史意义的镜头：300 名盟国席、200 名日本席上座无虚席，各种语言在大厅里嗡嗡作响。

8 时 50 分，一辆美式军用大型汽车由军警开道开了过来，车窗上贴着青色纸，使大平车犹如闷罐车一般，战犯们像一群瞎子一样不知被军警押向何方。

不一时，押解被告的囚车在黑压压的人群围观中开到审判大楼前，军警打开这座老式建筑的大门，把囚车放了进来。

刹那间，囚车中间那道铁门缓缓开启，东京法庭的宪兵队长坎瓦兹中校首先跳下车来，跟着又跳下几个头戴白盔、腿套白色护套的身强力壮的美国宪兵。坎瓦兹布置好警戒，又让摄影师站好位置，才命被告们下车。美国宪兵的认真负责态度，得到各国记者的一致好评。

众目睽睽之下，曾经惊动世界、作恶多端的被告出现在眼前。

头戴日本战时流行的国民帽、身着国民服、须发斑白的村翁般的人物缓步步下踏板，"这是陆军元老南次郎！"眼尖的人大声叫道。

紧跟其后的是眼眶凹陷的前首相广田弘毅，他故作害羞之态，完全失去往昔发表"广田三原则"、起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的狂妄劲头。后面是骨瘦如柴的畑俊六，依旧西装革履的土肥原贤二，矮个秃头将军梅津美治郎，垂头丧气的小矶国昭，步履艰难的桥本欣五郎。……最引起人们惊奇的是法西斯评论家大川周明，他穿着和服睡衣，脚踏木屐，戴着罗克式眼镜，头发散乱，活像个疯子。

突然，响起一片怒吼："杀人犯，东条英机！"东条英机自知罪孽深重，故作沉着之态，将右手轻按背上，缓步进入预备室。

上午 10 时，美第八军长艾克尔伯格中将和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中将出现在来宾席上，代表美中两国要与战犯算总帐。接着，辩护律师团

入庭，清濑一郎、德积重威神气活现，摆出挑战姿态，颇引人注目。

这时，高踞审判厅中央的法官团席空无一人，但高挂中、苏、美、英等11国国旗，给人庄重威严之感。

原定10时开庭，但时间已过，仍不见法官入庭，人们纷纷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有的说是法官团与辩护团意见不一，有的猜测是在等待坂垣征四郎和木村兵太郎。……等到11时14分，才见检察长基南率领各国法官进入审判庭，在辩护团对面就席。

11时15分，法庭宪兵队长坎瓦兹中校带美国宪兵押被告从右方入口处进场，一下子把人们的视线都吸引了过去，无论是法官、检察官、翻译人员，还是记者、旁听者，眼光都紧跟着被告沿着狭长通道，来到被告席上。都想看看这些曾在太平洋地区呼风唤雨、涂炭生灵的"大人物"今天成了什么模样。

被告们脸色苍白，神情沮丧。当年仪表堂堂、颐指迫使的松冈洋右如今又瘦又老，被罪行和肺结核折磨得脸色发绿，半截胡子业已灰白，走路摇摇晃晃，是被美国宪兵扶着走进被告席的。前首相广田弘毅不敢抬头，眼睛半闭，精神萎顿。

梅津美治郎戴着眼镜，低头盯着起诉书，暗想与检察官软磨硬抗之计。大胖子贺屋兴宣，明显消瘦下来，一脸懊丧神色，呆若木鸡。

最引人注目的是头号战犯东条英机。陆军省本部原是他的指挥机关，曾是他发号施令的王国，他曾在这里把亿万人民玩弄于掌股之上，今天却成了审判自己的法庭。他撇着小胡子想假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显出一副尴尬的苦相。

东条英机毕竟是条老狐狸，是个久经磨练的大军阀、老政客。他早知道，清濑一郎已与许多美国法官暗中勾结，密订奸计，要与检察团方面、同世界进步势力进行史无前例的正邪大斗法！了解内幕的日本记者大肆制造紧张空气，阴阳怪气地带讽刺口吻说：“看吧，有好戏，每一幕都恰似观看莎士比亚的名剧！”1946年5月3日上午11时17分，东京法庭执行官美塔大尉威风凛凛宣布开庭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开始，将审理上诉于本法庭的任何案件。”随着东京法庭执行官宣布开庭，所有的人一起站起，都将目光投向法官团席。只见身材伟岸的东京法庭庭长韦勃率领8名审判官，穿着庄严肃穆的丽色法衣，精神抖擞地分别坐在审判官席上，他们将代表8国人民和亿万受侵略蹂躏的人民，行使正义的审判权，全世界人民都会永远记得他们的名字：中国代表梅汝璈，美国代表J·席金斯，英国代表L·帕特立克，苏联代表I·扎里雅诺夫，法国代表H·贝尔纳尔，加拿大代表E·诺斯库夫特，荷兰代表B·洛林。

审判长韦勃端坐法官席中央，格外引人注目，美国作家截维·贝尔加米尼以生花妙笔刻划其神态如下：他是澳大利亚北部广阔的昆士兰州的首席法官。他差不多已经有了两年在新几内亚和拉包尔审讯日本战犯的经验，对日本人在那个地区犯下的暴行了解甚多。

法庭庭长韦勃身躯伟岸，勤奋不倦，嫉恶如仇，思想敏锐。浓重的眉毛下，他的碧眼闪着锐利的光芒，两边嘴角各有一条深深的皱纹，像是一对唬他的鼻子高大。他有丘吉尔那样的口才。他有强烈的自尊心，刚正不阿，他的职权是凛然不可侵犯的。如果吉汽车没有按时把他的秘书送来上班，如果美国宪兵给韦勃的司机送了一张可疑的交通违章通知书，那么，盟军最高

统帅部就不得不处理一份措词尖利、援引法律的备忘录。如果法庭上的空调设备或耳机线路出了毛病，也会成为韦勃打官司的主题。

在偌大的东京，几乎没有供麦克阿瑟和韦勃这负有声望而风格各异的人共存的余地。

这时，大名鼎鼎的东京法庭审判长大步走到麦克风前，以凛然不可侵犯之势庄重读开庭词说：“今天集合在这个法庭之前，我们既无所恐惧，也无所仗恃，更不敢有感情上的偏私，因为我们曾签署共同宣言，必须遵守法理，进行公平的审判。”韦勃庭长的话字字似有千斤之重。被告们木然呆坐，预感到末日即将来临；英美记者嚼口香糖，喜形于色；受法西斯思想影响深重的日本记者感到悲哀：“受审判的岂只28名被告，也包括我们自己。……”韦勃庭长见他的话产生了巨大效果，看一眼坐在被告席中央的东条英机，见这家伙正以挑衅的眼光左顾右盼，蓄意负隅顽抗，就怀着强烈的愤怒之情提高声调说：“像这次重要的刑事诉讼，在世界上空前未有，因为这次被控告出庭的各被告，都不是平凡人物，不是县长、州长之类的小小地方官，而是包括了以前的日本首相、参谋总长、军令部长及王公大臣，他们在过去几十年间，曾旋转日本的国运……。……就因为如此，他们已经丧失了要求接受较好待遇的理由，他们的生活将不如一贫穷的日本兵和一个朝鲜兵。……”这时的被告们，服装各异，有的披着撕掉阶衔标志的军服，有的穿国民服，有的着西装，听到韦勃辛辣的讽刺，都受到强烈的刺激，思前想后，羞辱难堪，无地自容！

韦勃庭长碧眼闪出锐利的光芒，俄顷以柔和的声调宣布东京审判之目的与任务说：“这次审判的最大任务，就是在事实与法理两者之间，保持虚心、坦诚、公平的态度。……本法庭所拟定的条例，就是督促我们进行公正而迅速的审判。因此，我们对于各被告，将以尽量大的努力做到公正迅速的审判为宗旨。……”韦勃审判长致开庭词既毕，检察长基南起立，逐一介绍各国检察官。接着，法庭书记官和翻译官宣誓就职，11时40分法庭休息。

下午2时30分东京法庭再次开庭，人们发现上午没见面的坂垣征四郎和木村兵太郎出现在被告席上，被告排列次序也发生变化，坂垣征四郎排在第一排第一个，旁边是东条英机，身后是大川周明。……有的梗着脖子死不悔改，有的耷拉着脑袋暗想奸计，有的歪扭着脑袋想玩花招，有的呲牙咧嘴出洋相。……真是一幅绝妙的群丑图。

检察长基南朗声宣布公布起诉书，法庭执行官美塔大尉拿着一大摞文件站在麦克风前，以标准的英语朗读经精心准备、长达42页的起诉书。

起诉书代表联合国各国，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在1928年1月1日到1945年9月2日长达20年的时间里，“被犯罪的军阀所控制和指导，这种政策就是重大的世界纠纷和侵略战争的原因。同时也是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利益和日本人民本身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原因”。

这些被告可不是一般的刑事犯，而是多年来官居要职的军阀、政客、阴谋家，一群诡计多端的老狐狸，决不甘做丧家之犬，早就跟日本、美国的反动律师暗中勾结，蓄谋捣乱。

法庭执行官刚读完起诉书的前言，日本律师高柳贤三就站起嚷道：“审判长，日语翻译有错，必须纠正！”全法庭人员都在聚精会神倾听起诉书，大厅里鸦雀无声，只偶尔有人发出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犯下的罪行谴责声，忽见高柳贤三公然出面捣乱，与被告早就勾结的日美律师一起起来起哄，法

庭秩序顿时大乱，立即遭到各方面人士的愤怒声讨：“不准搅乱公堂，不许干扰审判！”在正义力量支持下，审判长韦勃对高柳贤三发出警告：“未获批准，不得发言，如再干扰审判，定严惩不饶！”高柳贤三慑于正义力量的压力和审判长韦勃的权威，不敢再次捣乱，头一缩坐了下去。法庭执行官开始宣读日本帝国主义所犯55条罪状中的第一条：“控告全体被告，在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这一期间，以领导者、组织者或同盟者的资格，参与共同计划或阴谋，欲为日本取得东亚、太平洋、印度洋及其接壤各国或邻近岛屿之军事、政治、经济的控制地位。为达到此一目的，使日本单独或与其他国家合作，对任何一个或一个以上之反对此项目的国家从事侵略战争。”这第一条话虽不多，却是28名被告无可开脱的罪责。这时，日本律师大原信一跳出来嚷道：“审判长，请考虑大川被告昨天晚上提出的申请书！”原来，大川周明作为法西斯理论家早就为日本军国主义设计了对外扩张战略：“把日本、满洲、中国本土共同划为广阔的经济圈加以巩固，以此为基础而实现从东南亚开始到印度、中亚的解放。”他要日本在占领中国后与英美决斗，最后称霸世界，他声泪俱下地催促日本尽快发动侵略战争：“日本啊，是一年后，10年后，还是30年后争雄世界？那只有天知道！说不定什么时候，天将命你赴战，要一刻也不能大意地充分做好准备。”今天受审的另27个罪犯都听过他的法西斯歇斯底里的演讲，几十年来在他的法西斯理论指导下冲杀疆场，肆虐亚太各国，心悦诚服地送他一个美称：“大东亚的论客”。

这次审判，被告们都对大川周明寄予很大平望，妄想用大川周明的理论和如簧之舌来使他们死里求生。

大川周明也真不辜负被告们的期望，他早就为大闹审判第一日而煞费苦心：挑了件破西服穿在身上，再披件宽大的西服外衣，使又瘦又高的怪物更像个日本的堂·吉诃德。为增加戏剧效果，他特意蹬了双木屐，“嘎吱嘎吱”响着走进法庭被告席。

被告们一看大川周明这身打扮，就知道他们的“理论家”要闹恶作剧，悄悄等着要看大川周明演出滑稽戏。

只见大川周明嘿嘿笑着坐在东条英机身后，故意把木屐踢在一边，又脱下宽大的西服外衣挂在椅背上，只剩下黑乎乎、皱巴巴的“白衬衣”，再解开衬衣扣子，露出胸前的串串长毛，伸出鹅一般的细长脖颈，东张西望，进而摆弄那副又破又脏的深色大眼镜，在窥测时机，寻找机会闹事。

恰在这时，大川周明听日本律师大原信一先于他发难：“审判长，请考虑大川被告昨天晚上提出的申请书！”大川周明噌地蹿了起来，与大原信一呼应喊道：“我有精神分裂症，申请住院治疗！”审判长韦勃厉声制止，大川周明还想再闹，韦勃立即命令法庭宪兵前去干涉，大川不吃眼前亏，马上老实下来。

等美国宪兵一走开，大川周明又开始折腾：先是故意在椅子上扭来扭去，把椅子扭得“嘎吱嘎吱”乱响，又将长腿盘在椅子之上，解开上衣纽扣，在排骨似的胸脯上捉虱子，又故意把衬衣慢慢脱到腰部，露出大半个光膀子，看上去活像个幽灵，引起人们轻声哄笑。

法庭庭长韦勃发现大川周明有意搅乱公堂，便命法庭宪兵队长坎瓦兹中校前去制止。

坎瓦兹中校气势汹汹地过来，命令美国宪兵给他把上衣拉上穿好；美

国宪兵一扭头，大川周明又露出了光膀子，美国宪兵气坏了，上去想给大川周明个耳光子，大川周明慌忙自己穿好上衣；美国宪兵一扭头，大川周明又挑衅性地拉下衬衣。

美国宪兵火了，伸出大手给大川穿好上衣，死命摁住不放，大川周明吃不消了，不得不暂时停止恶作剧，法庭重又恢复了平静，只听起诉书控诉日本侵略中国、偷袭珍珠港，最后读到第55条罪状：“控告以上被告，因其官职负有采取适当方法确实遵守及防止违反战争法规和惯例之法律上的义务，而竟完全漠视和蔑视起法律上的义务。”突然，又传来“啪啪”作响的动静，众人一看，又是大川周明故意捣乱。

原来，控诉书打疼了法西斯被告，大川周明知道要追究被告的刑事责任了，就把控诉书卷成筒状猛击东条英机的秃脑袋，被告席上立刻乱成一团。

庭长韦勃勃然大怒，命令法庭宪兵队长坎瓦兹中校过来干涉。大川周明嘿嘿一笑，急忙把衬衫的半面衣襟塞在又短又孝极不合体的裤子里，双肩高耸，正襟危坐，若无其事，两眼直视法官席，法庭重又恢复平静。

不到一分钟，大川周明又冷不防抄起笔记本，朝东条英机头发少得可怜的脑袋上打去，战犯们被他逗得吃吃发笑。韦勃庭长勃然而起，挥手发令：“把搅乱法庭的被告押出去！”大川周明突然用德语高喊：“德国人过来，其他人滚蛋！”谁也不明白大川周明此时喊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法庭宪兵队长坎瓦兹带几个膀大腰粗的美国宪兵冲过来，架起大川周明就走，“嗒嗒嗒”的木屐声听来特别刺耳。

大川周明边挣扎边叫嚷：“放开我，我比你们都正常！”大川周明被带到被告预备室，发疯一般用英语喊道：“东条这个大笨蛋，我真应该打死他！我是最伟大的人，我一生气命干的事，败于东条之手，东条该受惩罚。我真赞成民主。……我72天不吃不喝了，我不需要食物，我只要空气！”看守大川周明的美国宪兵告诉法庭宪兵队长坎瓦兹中校：大川一个多月不怎么吃饭了，在囚室里随地便溺，还故意向别人碗里吐唾沫，他60多岁了，却胡说要去看他母亲，据调查，他母亲早就死了！

基南和韦勃研究了这些情况，认为大川周明疯了，便派车把他送到东京国立松泽医院，诊断结果断定他有脑梅毒病到达夸大型，患了“进行性神经麻痹症”。当即有人揭露大川周明是装疯卖傻，企图蒙混过关。盟军司令部下令美军医院用精密仪器反复测试，又请精神病专家做严格的精神鉴定，美国军医认定大川周明确实发疯了，东京法庭便决定对他免于起诉。

令人奇怪的是东京军事审判法庭一结束，大川周明的疯病奇迹般地好了起来，一直从事《古兰经》的翻译工作，死前才向记者透露秘密说：“我善于从空气中吸取营养，所以身体非常健康。”日本记者仍不相信，问他是如何骗过拥有先进科学技术装备的美国医生的，他自鸣得意地说：“我怎么能让美国人看出破绽呢？我是以嘲弄正常人的心理，按照疯人的逻辑伪装自己，美国军医才被我骗过的。”日本辩护团副团长清濑一郎见法庭上少了大川周明，无法捣乱，便借取证机会去找前首相广田弘毅，岂知广田弘毅看破红尘，比谁都悲观，他认为审判第一周难以逃脱，就冷淡地说：“我准备认罪。”清濑一郎大吃一惊，仔细上下打量一番才满腹怀疑地问：“首相，你和大川博士一样，也疯了？”广田弘毅半闭双眼精神萎靡，叹口气说：“我没有发疯，很正常。”日本律师气急败坏地说：“首相，你一认罪就无可救药了！”广田弘毅以老前辈教训晚生后辈的口吻说：“你懂什么？你要知道，认不认

罪都已无可救药！你们太看不透形势，须知日本挑起有史以来的大战，最后总要找一部分人治罪，像我这样的人，难逃处置。你们律师的嘴巴再厉害，也不能扭转大局。”清濑一郎也觉得广田弘毅的话有些道理，但还是要想法开脱，便请求说：“无论如何，首相不能认罪。

你一认罪，不仅误了自己，也害了其他元老。我们有美国律师帮助，争取让全体被告无罪开释，务请在法庭上略施小技，像大川博士那样，给他们些厉害尝尝！”广田仍半闭双眼频频摇头，最后才做出让步说：“好吧，我跟你们合作，第一堂不认罪，以后看情形而定，但我可不在法庭上丢那份老脸，被人耻笑！”清濑一郎再找不到在法庭上公开捣乱的被告，只好自己上阵，提出更换审判长韦勃，理由是韦勃是澳大利亚最反日的法官，曾调查过日军暴行，连澳大利亚也有人提出异议，让韦勃任法庭庭长有欠公平，一些美国律师也跟着兴风作浪，一时东京法庭又起烟云。

基南检察长拍案而起，怒斥这是诋毁法庭的阴谋，毫无事实根据，盟军总部决不允许这样胡作非为，当即将清濑一郎的要求驳回。清濑一郎无奈，见无法直接破坏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只好另打主意从辩护方面再施毒计。

东京法庭赶走大川周明，挫败清濑一郎，被告席上顿时安静了许多，日本《朝日新闻》将这时的被告情况描述如下：东条坐在韦勃的对面，埋首，常以手帕抹鼻子，听到揭露他发动侵略战争罪行的地方，就用铅笔记下，此后瞑目。松冈洋右以竹杖支持头部，似不胜贫苦。木户幸一热心倾听。坂垣征四郎穿着大将军服，毫无表情。荒木贞夫默然凝视前方，如老僧入定。松井石根因与大岛浩的喁语，引起美国宪兵的注意。土肥原贤二等人，表现出满不在乎的神气。重光葵憔悴不堪，似大有感慨（他为侵略战争，被炸掉一条腿）。大岛浩呈现疲劳与苦恼之态。永野修身则精神饱满，时时望着楼上的旁听席。

旁听席上的人，不少是犯人的家属，如贺屋兴宣的夫人春子，铃木贞一的夫人松子，荒木贞夫的夫人锦子。只有东条英机的夫人胜子不在场，她早已避到乡下去了，因为恐怕引起日本人的愤怒。

接着，各大国的联合诉讼代表达西等人以充足的证据控诉被告人的滔天罪行。

5月6日开庭时，松冈洋右病情突然恶化站立不起，经美国医生鉴定属实，准许他退庭。6月27日，松冈洋右以肺结核兼慢性肾脏炎死亡，死前受洗教名“约瑟”。算他死得巧，躲过了东京法庭的审判。

审判长准许松冈洋右因病退庭后，按英美法律程序，录取被告自己陈述有罪或无罪的口供。韦勃审判长首先询问荒木贞夫是否承认自己有罪。

荒木贞夫紧张地回答说：“此事，由辩护人答复。”审判长严词拒绝，一定要本人亲口回答并记录在案，荒木贞夫语无伦次地回答：“起诉书已见过了--和平、战争、人道的犯罪已见过了，荒木70年的生活。……不能承认。”审判长对荒木贞夫的回答很不满意，一定要他亲口简单地回答有罪或无罪，荒木被逼无奈，才回答说：“无罪。”东条英机口气最硬：“对一切诉因，我声明无罪。”总之，27个被告中没有一个人自己承认有罪，日本报纸将此情形以显著地位刊登出来，引起各方面的极大注意。丙级战犯儿玉誉士夫系浪人出身，曾在上海组织特务活动，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儿玉机关，他勾结中国流氓地痞，搜集情报，搜刮地痞，为日本海军侵华出了大力，个人也发了30亿日元的大财，他用这些钱支持右翼分子组织政党，对战后日本

右翼政党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当然这是后话。

儿玉誉士夫回到日本，被盟军总部逮捕，被作为丙级战犯起诉。他对被告们推托责任的做法不以为然，摆出浪人"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派头振振有辞说：“假如东条大将能够说'全部责任都在我'而承认有罪，那么他至少可以博得日本人的赞赏，而且英名永留日本人的心中。现在还在法庭上辩论什么是非，一切只不过是写在纸上的历史空谈而已。”儿玉誉士夫慨叹日本人在惨败中丝毫没表现出足以向世界夸耀的武士道精神，摇头感叹说：“超越生死，置生死于度外，发扬大和民族灵魂的最高美德，在这些领导者之中荡然无存。”从此，这些战犯被告在日本更臭不可闻。

1946年5月13日东京法庭再次开庭，日本辩护团副团长清濑一郎又跳了出来，把一支密谋多时的毒箭射了出来：“审判长，我控告东京法庭超越职权行事，无权审理日本的反对和平罪与违反人道罪。”审判长韦勃和清濑一郎是老对手了，他明白这家伙又要新花招儿了，就不慌不忙让对方讲清控告内容，清濑清清喉咙说：“根据《波茨坦宣言》关于惩罚战犯的条款规定，战争罪应仅限于违反战争法规上。要知道日本与德国不同，是有条件投降，不应受到相同于纽伦堡的审判。我还要请审判长注意《波茨坦宣言》只针对太平洋战争，因而东京法庭不能审判在此之前的日本对华战争和对苏蒙的进攻；日本的战争罪只适用于对战胜国，东京法庭无权审理对其盟国的侵略。

清濑基于对《波茨坦宣言》的恣意曲解，讲了这些似是而非的歪理，显出不可一世之态，被告大受鼓舞，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清濑讲得头头是道，法庭上一时呈现出紧张气氛。

审判长韦勃不愧是个有经验又嫉恶如仇的大法官，他首先运用丘吉尔式的辩才反问道：“请问，占世界人口半数甚至达三分之二的11个国家，因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蒙受了巨大的资源和人员损失，难道不能对这种野蛮行为和掠夺行为的责任进行惩罚吗？”义正词严的质问自有千钧之力，又似万炮齐放，一下子把清濑一郎打得瞠目结舌，哑口无言，韦勃接着碧眼闪出愤怒的光芒，以凛然不可侵犯之势对清濑进行严厉的驳斥，指出不准曲解《波茨坦公告》，又引用大量文献和一系列国际条约，论证日本是无条件投降，说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构成了国际犯罪，对侵略战争责任者的审判是理所当然的，为战犯辩解是徒劳的。

日本辩护团理屈词穷，清濑一郎又生一计，企图以查并治病及现役军官应以战俘论处，不应在东京法庭审判，妄图把一些罪大恶极的战犯从东京审判中解脱出来，但其阴谋很快就被国际检察团揭露而可耻破产。

从1946年6月4日起，东京审判进入检察方面的立证阶段。韦勃检察长怀着满腔愤怒，首先揭露被告进行军国主义宣传和教育、准备侵略战争的罪行，着重进行日本侵略中国的立证，接着进行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立证，从1947年2月进入辩护团的反证阶段。

日本辩护团颠倒黑白，把“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珍珠港事件的责任推给中国和美国，被告也拚命为自己开脱罪责，检察方面传419名证人出庭作证，779名证人提出书面证词，法庭认定4336件证据成立，正义终于战胜邪恶，1948年11月4日审判长宣读判决书，宣布判处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等7人绞首刑，木户幸一等16人终身监禁，东乡茂

德 20 年徒刑，重光葵 7 年徒刑。

1948 年 12 月 23 日，对东条第 7 人执行绞刑，作恶多端的战犯终于受到应得的惩罚。

东京审判中，审判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智斗土肥原、坂垣、东条，都有极生动的故事，这里只以审判松井为例说明 2、制服屠夫--松井石根！

从 1947 年 5 月 5 日开始，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着手审判“南京大屠杀”一案，这是东京审判的重头戏，双方都派出精兵强将，法庭内外展开激烈斗争。

公诉人莫罗上校曾亲自到南京调查日寇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无数令人发指的兽行使这位素来稳重老练的上校怒火满腔，完全被残酷的血腥事实所激怒，因而在揭露日本 1937 年 12 月 13 日攻占南京发生的事件时，他显得是那样激动而愤慨，完全显示出盎格鲁撒克逊族人的正义性格：“上海和南京一带的中国心脏地区，土地肥沃，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它在一场违反国际法和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全部战争法规的不宣而战的军事侵略中沦陷了，被洗劫、炸毁和烧光了。中国战俘成群地被绑起来，然后进行大屠杀。松井和畑俊六将军以及其他入并没有停止军事行动。……当这场不宣而战的侵略战争达到高峰时，两亿五千万中国人已沦陷于日本陆海军的铁蹄之下。”莫罗以血淋淋的例证，控告松井石根使南京居民深陷极大的痛苦和暴力之中，南京人民遭到抢劫杀戮，妇女遭到野兽般的奸淫，一群群日军暴徒用枪炮、刺刀不停地制造举世罕见的死亡和恐怖。

松井石根的日本辩护律师伊藤清按捺不住心头的恐惧，跳起来打断莫罗法官的发言，要求把所有概括和带结论性的言词从庭审笔录中删去。

检察长基南严词驳斥伊藤清的辩解，以充分的理由有力地断言：“无可否认的是，南京沦陷后，紧接着是一连串对数万名战俘、和平居民和妇女儿童的杀戮、欺凌和严刑拷打，是对毫无军事意义的众多房屋的破坏。这些事件被称之为现代战争史上独一无二的南京大屠杀！”身材矮孝形销骨立的松井石根也跳了出来，忍受着右脸和右臂的习惯性痉挛，把他在中国的活动百般美化，做了田园诗情调般的虚假描绘：“我任军职期间，在华北和华南呆了近 12 年。我在这整个时期，为中日合作做了可能做的一切。……我始终坚信，日中之间的斗争是所谓‘亚洲大家庭’中兄弟之间的争吵，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动用武力，以拯救旅居中国的日本侨民和保护我们的权益，这同哥哥经过长期忍耐后赶走不听话的弟弟没有什么两样。

采取这一行动的目的旨在促使中国回心转意。

驱使这一行动的动机不是仇恨而是爱怜。……所以我要求我的军官们要把这次派遣作战的意义向每个士兵讲清楚。我的守则可归结为，在上海地区的斗争目的仅仅是征服反对我们的中国军队，至于中国的官员和国民，根据可能则应得到安抚和保护。”审判长韦勃、检察长基南见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松井石根把自己打扮成和平天使，正要严厉申斥，法官莫罗抢先辛辣地讽刺问道：“请问，‘弟弟’对‘哥哥’的‘爱’反应如何？”松井石根右脸的习惯性痉挛由于作贼心虚而发作，抽搐几下才恬不知耻地回答：“‘弟弟’没有理解这一点，对‘哥哥’的‘爱’一点儿也不感到高兴。……经过两个多月的激战，派遣军才得以把中国军队从上海排挤出去。……引起我特别关注的是上海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异常强烈。……”莫罗法官见松井石根离题太远，又恶毒

地把大屠杀的原因归因于中国民众的抗日斗争，便提醒他交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罪行。

松井石根脸上掠过几丝阴影，这才不得不把话拉入正题：“1937年11月5日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组成华中派遣军，我被任命为该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阴险地一笑，又鼓动如簧之舌为自己奇丑无比的脸上猛劲儿贴金：“由于我多年的宿愿乃是使日本和中国共存共荣，因此在占领南京时采取了种种防御措施，以避免这一战事成为全体中国居民遭受苦难的原因。……”这时，法庭上传来“嗤嗤”的讥笑声，松井石根也不免心虚起来。他知道东京法庭已掌握了南京大屠杀的许多罪证，再否认也无济于事，就狡猾地轻描淡写地承认一些事实，以蒙混通过难以逾越的审判难关：“虽然我采取一切预防措施，但在攻占南京时，在一片慌乱的情况下，还是能够找到一些激动魄来的士兵和军官干出胡作非为的事情来的。

十分遗憾，我是后来才听到这种过失的。”莫罗法官愤怒地质问：“你作为进攻南京的最高指挥官，怎么能说后来才听说发生这种‘过失’呢？”松井石根这下抓到了稻草，急忙为自己辩解说：“攻打南京的当时，我正在距该城140公里的苏州卧床养病，而且并不知道他们违抗我的命令竟干出这般暴行来。12月17日我到达南京后，从宪兵司令部那里第一次听到这种意外事件，我立刻下达了命令，敦促各部队调查此事件并严惩肇事者，因此，把全部罪责都加在日本军官和士兵头上是不公正的，我是在日本投降后才第一次听到南京惨案的。……”松井石根的无耻狡辩引起各方面的强烈谴责，他厚颜无耻地自圆其说道：“我声明，我是在战争刚一结束从广播中第一次听到这件事的。当时美国人宣布有过南京大屠杀，公诉方在这里就此提出了证据。当时我听了这番广播后，曾试图调查我军在南京市的活动，但是，对此负有责任的人，此时不是已经去世，就是在关押中，而有关文件又在一场火灾中烧掉了。”松井石根耍无赖硬说此事现在已死无对证，然后又伪善地把好话说尽：“我认为，中国国民和日本国民理应像兄弟一样相互合作，因此，我们之间发生的付出巨大牺牲的战争是一场真正的灾难。因此，我感到十分遗憾。我曾希望这一事件会向两国国民提供在和平与和谐中生活的可能，那些曾贡献出自己生命的人们会奠定新亚洲的基石，所以，在我回国后，就在热海附近的伊豆山上修建了一座神殿，以纪念战死的两国军人并为其灵魂安息而祈祷。我还在这座神殿塑了一尊观音菩萨的全身像，在神像的基座上撒有我亲自从长江盆地战场上带来的黄土。我曾在这尊神像前昼夜祈祷，祝愿牺牲军人之灵魂得到安息，祝愿世界和气得以确立！”松井石根的花言巧语激起法庭旁听人员和工作人员的极大愤怒。公诉人诺兰准将拍案而起，主动出击，他胸有韬略，先不动声色旁敲侧击问道：“您的书面供词中提到，一些激昂的和被激动魄来的青年军官和士兵在南京犯有暴行，是吧？”松井石根眨巴眨巴小眼，闪烁其词回答说：“是的，我这样说过，但我本人没有看过，只得到过这方面的消息。”诺兰将军不紧不慢追问：“消息里讲了什么行为？”松井石根避重就轻：“抢劫居民，侵占财物。”诺兰准将以漫不经心的方式提出要害问题：“还有杀戮？”松井石根无法否认：“对，还有杀戮。”诺兰准将进一步扩大战果：“您是从哪里得到这些消息的？”“从我们的宪兵队那里。”“您说过，您说到的罪行是在您1937年12月17日进入南京后从宪兵司令部那里听到的，您还从别的什么人那里听到过这种消息吧？”松井石根不知是计，夸夸其谈道：“当我在南京的日本领事那里做客时，也

从他那里听到过同样的消息。”“您听到的是什么？”“我从日本驻南京领事日高信六那里听到一些日军士兵和军官确实犯有罪行，这可有日高总领事做证。”日本律师团马上起哄，要求日高出庭做证。日高信六早已在一旁等候多时，这时在法庭上滔滔不绝讲起日军攻陷南京之后，他特意从上海赶来参加松井石根的入城式，接着3次访问南京。他摆出见证人身份做证说：“据我那时的所见所闻，松井在将攻略南京时，在战略战术上都非常慎重。当时，一般中国军民反日情绪高昂，就连老弱妇孺都参加谍报和反抗行列，因此就增加了日本的警戒心和敌忾心。至于说到日军的大屠杀暴行，当昭和13年（1938年）元旦我去给松井大将拜年时，才听到松井慨叹‘我的部下有胡搞的’，此外我又从侨居在南京的外国人那里听到一些风声。”公诉人诺兰准将抓住日本证人为南京大屠杀辩护中的漏洞，申明任何人都不可改变大屠杀的事实。他质问松井石根说：“你在书面供词中说过，得知这一暴行后即刻命令各部队查明事实真相并要严惩犯罪分子，调查结果向你报告了没有？”松井奇丑无比的脸上显出慌乱神色，支支吾吾说：“到次年2月我离开上海前，一直没有得到有关这次调查的任何消息。……”公诉人诺兰准将强调松井石根一贯主张办事要快而有效，以讽刺的口吻继续对松井石根施加压力说：“你要求过部下把事情真相报告你吗？他们向你回答了些什么？”“他们向我报告说，‘我们正在进行调查，一俟调查完毕即刻回复’。”“你在1938年2月离开中国前，一直没有得到回答吗？”松井无可奈何回答：“是的，是这样的。”公诉人诺兰得到了松井放纵部下进行南京大屠杀的证据，又乘胜追击：“1937年12月17日，你都召见了哪些军官？”松井石根玩弄花招儿说：“我下令召集全体军官。我要求全体军官，至少联队以上指挥官都要到常”诺兰准将仍想打开一个突破口：“谁负责处理暴行问题？”松井石根摸着秃头寻思半天，突然装模作样双手一拍暗说可找到了既言之成理又能为他辩解的人：“第十军军法处长冢本浩次大佐。”日本律师团早已和松井商量好让冢本作伪证，冢本便来到证人席上一本正经谎话连篇：“我特别奉松井大将的命令，调查日军的残暴事件，结果只发现四、五个日本将校犯抢劫与强奸罪，一般士兵很少有伤害和偷窃事件；至于杀人事件，仅仅两起而已，放火罪和集体屠杀罪根本没有。”冢本的伪证激起有正义感的人们的满腔怒火，检察官沙顿怒不可遏质问冢本：“你当时知不知道屠城事件？”冢本脖子一梗矢口抵赖说：“不知道，记不清了！”沙顿是个很有经验的检察官，怀着满腔义愤，熟练运用一种叫作“笔录方式”的审理技巧，一件件摆出确凿的证据，攻破对方耍赖否认的壁垒，使辩方的异议声明无效，给人一种罪行证据充分的成功之感。

冢本的伪证失灵使被告和日本辩护团狼狈不堪，检察官和法官乘胜追击，传讯日军的南京警备总司令中岛今朝吾。

中岛今朝吾是日寇第16师团长，为进攻南京的主将，这次未被作为甲级战犯起诉暗叫菩萨保佑，恐怕中国政府对他提出控诉，追究战犯罪责，又见冢本浩次做伪证当庭受辱，就讲了一些实话：“松井大将确曾命令第16师团，对中国军队进行残酷的扫射，而部分日军官兵在南京城内的奸淫烧杀自然难免。南京城破之后，中国军队官兵纷纷换穿便衣混入平民之中，南京城里的一般妇人女子，也表现出极强烈的抗日精神，与分散的中国军队一起游击抵抗，于是日军就不分男女老弱，不论军民，凡是看起来有反抗可能的一律加以围捕。到15日深夜为止，光是下关码头一地就杀死中国军民两

万之多。此外，还有13师团的山田支队，更把在幕府山俘虏的两万多中国军民，以补给困难为由，通通枪杀。"中岛今朝吾的证词虽大大缩小了南京大屠杀的数字，但却使日本被告和辩护团狼狈不堪，清濑一郎大骂中岛是叛徒，但也无可奈何，只得又找人再做伪证。挑来挑去，挑中了日寇华中侵略军参谋中山宁人大佐出庭做证。

中山宁人一出庭就拍着胸脯保证："松井大将并无故意违法之嫌，而且特别注意日军的军容风纪。"中山宁人的谎言立即遭到各方面的讥笑，他却胡说："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还有检讨整个内容的必要。"中山宁人摆出权威架势，为松井在南京的暴行辩解，但铁证如山，松井终于被送上断头台。

五、苏联-伯力审判

——伯力审判即哈巴罗夫斯克审判是苏联对日本战犯的严正审判，它以追究日本进行细菌战的鲜明特色载入战犯审判史册，判处原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等12名战犯以2至25年徒刑，弥补了东京审判的明显缺陷，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支持和赞扬。

1、提审山田乙三 1949年12月6日，苏联远东最东部的伯力城，这座位于黑龙江、乌苏里江会合口东岸的中等城市，狂风怒号，雪地冰封，20多万人怒火满腔，强烈要求严厉审判侵略中国和远东的日本战犯。

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首先被押上伯力预审法庭。

审判长期尔特科夫少将端然稳坐在审判席中央，上校法官毕列五夫斯基、检察官巴真科中校、内务部驻伯力边区办事处工作人员哥赫曼大尉、释译茨菲洛夫、辩护律师（莫斯科律师公会会员）柏洛夫、苏联医学科学院大学士茹科夫--费勒什尼科夫、军医上校克拉斯诺夫、伯力医学研究院微生物学主任科萨列夫教授、兽医中校亚历山大洛夫、寄生虫学家科兹洛福斯卡平等，威风凛凛分坐两旁，对山田乙三进行预审。

1949年12月25日，伯力法庭正式开庭审判。

苏联少将审判长期尔特科夫一声令下，苏联法警把山田乙三押上法庭受审席。众人仔细冷眼观瞧这个关东军司令官，只见这位日本陆军大将身材矮小，身穿整洁的军服，但却失去了腰间的指挥刀，胸前也没有了常挂的长串的战功勋章，昔日的关东军司令官威风早已荡然无存，少将审判长不禁想起了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和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转来的山田乙三材料所云："这是个只想停战不想投降的狡猾将军。"原来，日本关东军是一个很特别的兵种，不但以闪电战术攻陷中国东北，用刺刀大炮制出伪满洲国，而且在日本军队中号称"独立军"，自成系统，目空一切，甚至有时不服从调遣，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作为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也牛气十足，骄横跋扈。

1944年7月，山田乙三从前任梅津美治郎手里接手指挥关东军时，大本营交给山田乙三的任务是把东北变成日本永久性战略基地，准备对付中、美、苏和东南亚国家，以挽救日本即将衰败之命运。

山田乙三上任后，疯狂镇压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命令日伪宪兵、特

务、警察依据《思想矫正法》、《保安矫正法》，对东北人民进行丧心病狂的法西斯统治，抓捕15000名劳工修建兴安岭王爷庙等军事工程，使成千上万的东北人民惨遭毒手，还大肆掠夺东北人民的财物。1944年8月至日本投降，他从东北向日本运走粮食300万吨；他不准东北人民吃大米，有31万多人因吃大米被当作“经济犯罪”惨遭毒打，不少人被迫害致死。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山田乙三率领关东军拚命抵抗，但很快就被苏联红军打得落花流水，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8月9日山田乙三就下令把日本在东北进行细菌试验的贵重仪器和机密资料撤往朝鲜，销毁所有可能暴露侵华日军进行细菌战的罪证。

在苏联红军沉重打击下，山田乙三留下部分人员看守长春，自己率领关东军机关从长春退往通化、沈阳方向。日本宣布投降后，他仍顽固拒降，指挥关东军拚命反扑，又遭到毁灭性打击，才于1945年8月17日发出同苏联远东军指挥部进行投降谈判的命令：“为了尽快执行停止军事行动的命令，我们关东军长官今晨颁布命令，以便日方代表乘坐的飞机能在8月17日10点至14点之间飞往下列城市：牡丹江、密山、穆棱，同红军当局建立接触。关东军司令部希望这一措施不致引起任何误会。”苏军将领立刻看穿了山田乙三的诡计，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明确指出：“我认为，这是山田的拖延战术。他只是把我们当作一个平等的对手，通篇没用一个投降的字眼，这是不允许的。他说了那么多，我看都是废话，其实有一个词就够了，那就是无条件投降！”山田乙三见苏联红军拒绝了他的停战要求，又派飞机向苏方投下两个信筒，华西列夫斯基旋即命令发电谴责山田乙三。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虽发报发信给苏联远东军司令部提议停止军事行动，但只字不提满洲的日本武装部队投降问题。

同时，日军在苏日战场的许多地区还转入反攻。兹向关东军司令提出：从8月20日12点起在全线停止对苏军采取任何战斗行动并缴械投降。提出上述期限，是为了使关东军司令部能将停止抵抗和投降就俘的命令下达到自己的一切部队。

一旦日军开始缴械，苏军将停止战斗行动。”山田乙三走投无路，8月18日通过电台答复苏联远东红军指挥部，准备履行一切投降条件。8月22日，山田乙三率领关东军97名将领，1500余名校佐，按照苏军的命令，在长春的关东军演习场排列成整齐的方阵，等苏联国旗在其国歌声中徐徐升起，山田乙三将关东军的编制、武器、人员名单和序列列表呈送给华西列夫斯基元帅。

华西列夫斯基在阅兵台上发表威严的讲话，强调日军是无条件投降，又充满诱惑力地说：“作为参加这场战争的大多数的官兵，也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除罪大恶极的战争策划者和两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外，你们都将获得释放。你们同妻子、儿女、父母、兄弟团聚的日子很快就会到来。我只希望你们能深刻地反思这场战争，永远不再拿起武器，成为人类和平的使者。……”审判长期尔特科夫将华西列夫斯基的这段话有针对性地重复一遍，又以富于诱惑力的语言说：“被告山田乙三，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话是算数的，只要你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同样可以得到宽大处理。”审判长的话深深触动了山田乙三，这可能与他在伯力和沈阳审判后的改造中表现较好，最后被中国特赦释放不无关系。当然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接着，苏联检察官斯米尔诺夫开始宣读《起诉书》：“本案预审结果业

已查明，日本帝国主义者在策划和准备其反苏和反其他国家的侵略战争时，为达到其目的，曾策划大规模地使用并且在局部上已经使用过细菌战武器这种大批歼灭人命的罪恶工具。”《起诉书》揭露日本关东军建立特种部队准备和进行细菌战，在活人身上进行罪恶实验，在侵华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加紧准备对苏联的细菌战等罪行。然后，检察官斯米尔诺夫起诉山田乙三犯有如下罪行：“山田乙三，自1944年至日军投降时止，以日本关东军总司令资格领导过第七三一和第一两个特种部队准备细菌战争的活动。

“在此期间，山田本人或委托司令部负责军官巡视过各该部队，多次听取各该部队的报告，极力设法使此种部队经常处以备战状态。

“被告山田由亲身视察及由细菌部队指挥官报告中，熟知对活人进行罪恶实验的情形，并且鼓励过此种暴行。因此，山田应对用传染致命细菌残杀成千人的野蛮屠杀行为负责。

“审判长讯问山田乙三的经历，山田乙三说1881年生于日本长野县，1902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12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历任陆军第二十六骑兵联队联队长、陆军大学教官、陆军骑兵学校教务部长、骑兵第四旅团旅团长、陆军交通学校校长、陆军士官学校校长、关东军第十二师团师团长、关东军第三方面军司令官。1938年晋升陆军大将，任侵略华中部队司令官，后被提升为军事教育总监和日本防卫司令官。1944年7月出任关东军司令官，1945年8月作为苏联红军的战俘被押解到伯力，关进伯力俘虏收容所。

山田乙三供认，日本为扩大侵略战争而密谋实施细菌战，早在他出任关东军司令官之前的1935年至1936年，就在关东军石井四郎部队的基础上，建立了两个秘密进行细菌战的部队，一个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代号为七三一部队；另一个是“关东军兽疫预防部”，代号为第一部队，两个部队的总称是关东军第六五九部队。

山田乙三明确承认：“第七三一部队是直接由我以关东军总司令资格来管辖的。对第七三一部队的战术领导，即解决一切有关细菌武器生产和使用方面的问题，都是由我负责的。

这就是说，若一旦必须使用细菌武器去反对敌军，那时关于此种行动的命令就只能由我发出，因为第七三一部队是受我管辖的一个特种部队。”审判长要山田乙三交代自己的罪行，山田乙三说：“我首先承认我所犯的罪行是，我从1944年到投降那天止，始终以关东军总司令资格直接领导过我所管辖的第七三一部队和第一细菌部队，为了供作战需要来研究细菌武器的最有效使用方法及大批生产细菌武器的工作。换句话说，我承认我所犯的罪行是，我直接领导过准备细菌战去反对苏联、中国、蒙古人民共和国、英国、美国及其他国家。”苏联公诉人在伯力法庭上指控山田乙三批准用活人进行细菌试验，山田乙三对此供认不讳，他说：“在活人身上进行实验一举，原是由我的前任人梅津将军或植田将军批准的。在这一点上，我承认我的罪过是，我明知道有对活人进行实验，因而我在事实上也就是批准了强行杀害那些都是由我所管辖的关东宪兵队机关和各日本军事团送去实验的中国人、俄国人和满洲本地人。”苏联公诉人指控山田乙三在中国各地抓捕无辜百姓和俘虏，“特殊输送”到七三一部队做细菌试验，山田乙三供认说：“把被监禁的人送去受实验，或者说‘特殊输送’一举，也是由我的前任人植田或梅津批准的。这个批准令，我也没有废除，所以原定的‘特殊输送’手续在我

任职期间也继续发生效力。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因受此种实验被害死了，因为那时我没有查问过这一点。”苏联公诉人指控山田乙三1945年重新起用石井四郎为第七三一部队长，追问这是出于什么目的？山田乙三供认说：“第七三一部队是石井一手创立的，所以1945年间他又被任命为该部队队长。我个人认为，任命石井为第七三一部队长，这是与当时必须加紧各细菌部队工作的任务有直接联系的，并且是由于必须执行陆军省发布的要扩大细菌武器生产的训令有关的。”苏联检察官巴真科中校质问，1945年日本的细菌武器加紧生产，究竟是由于什么原因呢？山田乙三供称：“那时第七三一部队和第一部队细菌武器加紧生产，是由于实验最有效细菌武器的准备时期已经终结。我所指的是使用‘石井式’细菌弹，用飞机散布鼠疫跳蚤以及在地面上进行细菌破坏活动的方式。关于这些情形，我是从北野将军、高桥将军及其他人的相当报告中知道的。1945年，由于改善最有效细菌武器使用法的一切准备工作已顺利完成，于是开始大量生产细菌武器，以便一旦奉到帝国大本营命令时，就能在任何方面实际运用这种武器。……1945年春季，我便颁发了一道命令，要第七三一部队和第一部队扩大细菌武器的生产，并因而要设法增加和完善设备以及为第七三一部队补足必需的给养。除此之外，我个人认为在1945年间扩大细菌武器生产，是由于各战场上军事情况恶化。”苏联公诉人控诉山田乙三：“曾经是满洲国及盘踞在该领土上的日军的全权主人，他是那里的独裁者”，“所有该占领区内的全体日军部队和一切管理机关，都曾经受关东军司令部管辖，其中凡负责对满洲居民实施残暴恐怖手段的日本宪兵机关、侦探和反侦探机关，亦均完全听从他指挥。据山田本人在庭审时供认，把人用所谓‘特殊输送’办法发遣到石井部队里去一举，只有关东军总司令批准了这一在日本人看来是惩治那些不良分子的万恶手续后，才能实行。”苏联公诉人严正指出，山田乙三在伯力法庭上企图减轻自己在这一罪行中的作用，他借口“特殊输送”等办法是他的前任批准的来为自己开脱罪责，是非常可耻的，因为山田继梅津美治郎任关东军总司令时，比他的前任人更加热心地促进各细菌部队在实际使用最危险的细菌战武器方面的工作。在庭审上受过讯问的各被告和证人的一切供词都显然证明，自从山田乙三任日本关东军总司令一职时期，准备细菌战的紧张程度是急剧地增长了，牺牲在万恶的实验家手中的人数是大大增加了。充分证明山田乙三异常秘密地准备过细菌战，去反对各爱好和平国家的人民，他也就是反人类和平的日本阴谋家头子之一，理应受到严厉惩处。

在做最后陈述时，山田乙三说：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从幼年起就是在日本军队中生长和服务的，我历来受到的都是听从长官命令和恪守军人职责的教育。我被任命担任关东军总司令一职后，始终忠实一贯地执行了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一切命令和指示。我承认应对各部队在我任关东军总司令一职时期，为准备细菌战而干出的一切罪行负罪过责任。

我了解我应负罪过的全部深重性，我了解我所犯罪恶的全部深重性，所以我不去想法庭将来对我这种罪过判决的刑罚轻重如何的问题。

1949年12月30日，审判长期尔特科夫少将严肃地宣布对山田乙三的判决书，伯力军事法庭已查明山田乙三的罪恶行径：山田乙三从1944年至日本投降时止，任日本关东军总司令，曾领导其所辖第七三一部队和第一部队准备细菌战的罪恶活动，鼓励过该两部队在进行各种使用细菌武器试验时，蛮横地杀害成千入命的行为。山田采取过措施，使第七三一

部队和第一 部队能对细菌战有充分准备，使其生产能力能充分保证日军使用细菌武器，因此，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第一条，判决禁闭在劳动感化营内，期限25年。

山田乙三在伯力第45特别收容所的农场里服刑半年后，根据新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达成的协议，山田乙三被包括在移交给中国的969名战犯内，于1950年8月1日押到绥芬河，交给中国政府。

山田乙三被关进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始他很害怕，担心他曾在中国东北围剿东北抗日联军，准备和推行细菌战，欠下中国人民血债无数，作为关东军司令官会被杀头。

山田乙三万万没有想到，他来到中国不仅没有被杀头，而且作为将级战犯还受小灶待遇，在参观东北万人坑、听受害家属血泪控诉后，受到很大触动，在中国改造战犯政策感召下，开始接受中国的教育和改造。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山田乙三认罪态度良好，积极接受改造，1956年6月被中国政府特赦释放回国。

1965年7月18日，山田乙三病死于日本。

2、提审细菌生产部长--川岛清对七三一部队细菌生产部长川岛清的审判在伯力审判中极富戏剧性。

在伯力法庭上，日寇七三一部队卫生兵古都经苏联司法人员耐心教育，供述了他参加的用活人进行染菌饮食实验的罪行：“大约在1943年年初，七三一部队第一部长命我准备了一公升水，又令加进糖拌成甜水，他把伤寒病菌投进甜水中去，再用普通水冲淡，第一部长命我们分给50个中国犯人喝。

他选择其中几个人注射了防伤寒病菌。试验结果，没打防伤寒病菌的40多个人全被伤寒病菌折磨而死。第一部长又命我们把伤寒细菌注射到西瓜里去，分给五个中国人吃，这几个人也都被毒死，投入炼人炉里销赃灭迹。”审判长期尔特科夫恨得牙齿咬得咯嘣嘣直响，厉声喝问：“这可恶的第一部长是谁？”卫生兵古都吓得嗫嚅说：“我。……我不敢说。”契尔特科夫将军耐心地痞发说：“你揭发细菌战犯，是立功赎罪的表现，苏联法庭为你做主，你不要害怕，快说这个第一部长是谁？”古都胆子大了起来，鼓足勇气说：“他就是川岛清。”审判长期尔特科夫大吃一惊：“川岛清？他说他只是个勤杂工嘛，这个骗子--传川岛清出庭！”川岛清被押上法庭，审判长一看，只见这家伙是日本人少有的大块头，一脸横肉，以严厉的目光盯了古都一眼，意思是说：“闭紧你的嘴巴，不准供出我的真实身分！”

“川岛清低头站立，装出普通士兵的样子，审判长期尔特科夫大吼一声：“第一部长川岛清！”川岛清本能地立正敬礼“哈依”一声，随即发现失口，极力掩饰道：“我是勤杂工川岛清，不是第一部长！”契尔特科夫威严地质问：“你的士兵古都已经把你的真实面目揭露出来，你还不招认吗？”古都立功赎罪，大着胆子说：“我是部长手下的卫生兵古都，你不认识我了吗？不是你命令我进行染菌饮食试验吗？不招认不行了。……”川岛清大吼一声“八格牙鲁”，就要抬腿踢他昔日的部下，审判长急忙命人带走古都，厉声呵斥川岛清说：“被告川岛清，你的勤杂兵外衣被揭掉了，还想顽固坚持到底吗？”川岛清走投无路，只得老实招认：“我1893年生于日本千叶郡山武县莲沼村，医生兼细菌学家，军医少将，前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第一部长。”审判长严厉质问：“你为什么很久和极力隐瞒在七三一部队第一部工作

的事实？要等证人古都揭露？”川岛清只得低头供认：“因为七三一部队第一部罪孽最重，第一部所负的职能，是进行准备细菌战的各项主要研究工作。在实验室条件下用活人进行实验，是由第一部担任的。

七三一部队用来拘禁受试者的监狱，也是归第一部管辖的。”川岛清说七三一部队在哈尔滨平房站的驻屯地，遵照关东军总司令的命令宣布为关东军特殊军事地区，在8公里半径的范围内，禁止外人居住和行走，飞机不准在它的上空飞行，火车经过这里时在前一站就要放下窗帘，任何人不得窥视。中国人只要踏进这个禁区，马上就被抓进去当实验品断送生命，人们便把平房这块神秘和恐怖的地方叫作“六十里地国境线”。

审判长进一步追问：“第一部在用活人进行实验时多半是实验什么传染病菌？”“主要是试验鼠疫。”“在什么地方进行？”“在安达车站附近特设的打靶场上进行，用来进行试验的人每次15个，从部队内部监狱运到之后，就被绑到实验场上专门栽入地里的柱子上。

为使飞机容易发现目标，易于找到打靶场起见，就在打靶场上插有许多小旗并放起一簇乌烟。一架特备的飞机由平房站飞到靶场上空时，投入20枚炸弹。

这些炸弹在离地100至200公尺高的空中全部爆炸，于是装在炸弹里的鼠疫跳蚤就落到了地面上。等跳蚤爬到受试验的人身上后，再用飞机把他们运回平房站的内部监狱，观察他们的传染情况。此事由太田大佐负责。”见川岛清狡猾地把责任推到太田身上，审判长便质问川岛所犯罪行。川岛说：“1942年春季，我兼任第一部长职务一个多月，就负责执行研究细菌武器的任务。除了在第一部各实验室内用活人进行实验外，还在各打靶场上近于作战情况的环境中，参加对活人进行实验的工作，参加过在安达用活人检验细菌飞机炸弹的效能的行动。”川岛清的罪恶行动引起伯力法庭人员的强烈愤怒，在强大压力下，川岛清交代他还曾长期担任七三一部队的细菌生产部（第四部）部长，供认该部队有各种细菌生产设备，短短几天就可以制造和繁殖30公斤鼠疫菌，一个月就能培制出300公斤鼠疫菌，或600公斤炭疽热菌或1000公斤霍乱病菌。他根据关东军司令部在1943年3月12日下发的第120号文件，规定不仅所有“亲苏反日心理”的人都要作为“特别输送”的对象被送进“六十里地国境线”，即使被日本宪兵稍加怀疑为反对“日本帝国”和与关东军对抗的中国人，也会被送进七三一部队作为“马鲁他”的试验品被折磨死。

在伯力军事法庭法官严厉追究下，川岛清供认他还担任过七三一部队的总务部长、第三、第四部长，其中最重要的是第四部，他供称：“我于1941至1943年期间负责领导的第四部（生产部），实际上是七三一部队中制造传染病细菌的工厂。生产部内装备有培植细菌的良好仪器，每月能生产大量净鼠疫菌。总务部负责分发试验器材和活人，第三部负责制造石井式陶瓷炸弹的弹壳。”川岛清还供认派远征队到中国内地进行细菌战的罪行：“1942年间，第七三一部队奉关东军司令部命令，派了一个约100人的远征队，前往华中浙赣战区去使用细菌武器反对中国军队。我从生产部内派去了8个人。根据石井将军的命令，我叫生产部制备了约130公斤副伤寒菌和炭疽热菌供该远征队之用。此外，第一部人员还带有他们培制的若干罐霍乱菌和鼠疫菌，其必要数量则由他们在南京‘荣’字部队内就地培养，第二部人员携带有充分数量染有鼠疫的跳蚤。我知道，该远征队任务顺利完成。

此外，第七三一部队又于1941年间在常德城一带，使用过细菌武器去攻击中国军队。1940年间，该部队远征队在宁波地区也使用细菌武器攻击过中国军队，结果这些地区鼠疫流行，使许多人得传染病死去。"苏联公诉人指控川岛清担任过七三一部队各主要部门的领导职务，既参加过细菌战的准备工作，又参加过在活人身上进行惨无人道的实验，严重违反国际法规，犯有违犯人类罪，伯力法庭最后判处川岛清25年徒刑。

川岛清在做最后陈述时说：“来苏联以前，我对苏联曾抱有一种完全不正确的观念。这种观念只是由于不了解实际情形的结果，当我在日本投降时被苏军俘虏到苏联以后，才第一次了解到我原先的观点全属错误。我很清楚了解到我所犯的罪恶是危害人类的滔天罪恶，我甘愿接受法庭对我判定的最严厉的处分。”3、731部队与梶塚隆二关东军医务处长梶塚是日本推行细菌战的狂热分子。

梶塚隆二1888年生于日本田尻町城，因卖力推行细菌战被提升为关东军医务处长，晋升中将军衔。

苏联公诉人指控梶塚隆二是研究细菌武器使用法的发起人之一，是石井四郎细菌战理论和实战的积极拥护和推动者。

梶塚供认说：“我具体承认我所犯的罪行，是从1931年就赞成石井四郎关于日本必须准备细菌战的思想；1934年至1937年我主管日本陆军省军医署卫生科时，又积极参与了在关东军建制内成立一个专门研究细菌武器及防疫事宜的部门，即七三一部队，主张调拨相当的专家去配备这个部队，并促成任命一位细菌战思想家为七三一部队长。1939年12月至1945年8月，当我任关东军医务处长期间，我在总的方面领导了七三一部队内的科学研究工作，即在各方面研究和培养细菌，研究传染病的虫类，研究各种很少研究的传染病，探求医治和预防传染病的最有效手段与方法。”苏联公诉人谴责梶塚隆二美化七三一部队的行径，指出七三一部队根本不是搞什么纯粹的科学研究，而是制造细菌促使日本进行毁灭人类的细菌战。梶塚隆二又把推行细菌战的罪责推给七三一部队的两位部长石井四郎和北野政次，苏联法官就严厉地要他交代七三一部队和他的罪行，梶塚隆二鬼眼珠一转说：“日本陆军省和日军参谋本部对七三一部队的任务和孙吴、林口、海拉尔、牡丹江4个支队的建立时间、驻扎地点及规模都有具体规定，1941年8月，4个支队改为普通番号，分别改称六七三、一六二、五四三、六四三支队，各支队的主要任务是在战争中使用各种细菌武器，用时又把大连卫生研究所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名下，纳入第七三一部队的管辖之下，其主要任务是培植各类疫苗。”审判长期尔特科夫见这位陆军中将仍避而不谈自己的罪行，便追问他具体犯了什么罪？梶塚这才寻词择句避重就轻说：“关于细菌武器实验的结果及第七三一部队在1940年至1942年实际使用细菌武器反对中国军民的情形，都是由第七三一部队长北野和石井向我口头报告的。1940年我直接参加过在毗邻苏联边疆的海林、林口、海拉尔、孙吴4处成立七三一部队4个支队，保证该部队及其各支队的种种设备和其他技术资料及培养供进行细菌战用的人员等。同时我承认，日本准备细菌战是为了反对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中国及美国和英国。”苏联公诉人严肃指出，梶塚在预审和庭审中供述时，极力强调他从1939年12月担任关东军医务处长这一重要军职时，正是石井部队已充分展开其罪恶活动，并已在哈勒欣河地区初次用细菌攻击过苏蒙军队的时候，他在伯力法庭

上辩护的全部企图都是想证明，他只是在关东军内开始任职以后才知道石井部队的秘密工作，说他虽知悉石井部队所进行的这一工作，虽知道七三一部队在活人身上进行实验，但他没有积极参加过这种罪行，“这种说法全是撒谎，毫无根据”。

审判长质问梶塚与其三一部队进行细菌战的关系，梶塚信誓旦旦发誓说他没有参加过这种罪恶行动，只从石井和北野两人口中听过汇报，自己没有直接参加。

伯力法庭传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出庭与梶塚对质，山田乙三揭露说，还在梶塚受任关东军医务处长以前很久，即早在1936年，当梶塚还担任日本陆军省军医署卫生科长的时候，就积极协助成立特种秘密细菌部队以便准备细菌战。

山田乙三证明，由于梶塚隆二的推荐、同意和赞助，石井四郎才得以担任七三一部队长，石井关于准备和实施细菌战的罪恶思想，梶塚都曾表示赞成和同意，山田认为石井部队就是在梶塚积极参加下成立的，山田质问梶塚说：“任命石井为细菌战部队长的命令草案，不是由别人，而正是由你拟定并在上面签署上报再由陆相签字发表的，梶塚将军不致于如此健忘吧？”梶塚被揭露得面红耳赤，不得不承认他与石井四郎关系极为密切：“石井从国外考察回来后，自1931年起，就在军医学院同事（包括我在内）及有威望有信仰的人物和日军参谋本部工作人员中间开始进行宣传鼓动，说日本必须准备做细菌战。……当时我个人很同意石井的思想和理由。”山田乙三对梶塚把细菌战的责任都往他身上推心怀不满，气鼓鼓地质问说：“你是不熟悉七三一部队的秘密工作吗？”在山田乙三的质问下，梶塚不得不承认他几乎熟悉七三一部队所进行的全部“细菌工作”，很清楚在活人身上进行罪恶实验的事实，但鬼眼珠一转，又企图减轻自己的罪责，一口咬定他没有参加过这种试验，竭力把自己说成是虽了解情况却什么也没参加过的人。

审判长对梶塚的无耻狡辩义愤填膺，马上传七三一部队实验员濑越出庭作证，濑越说，“冻伤研究”是属于梶塚管辖范围内的事情，濑越等人进行的“冻伤研究”，都是按照梶塚的命令行事的，濑越的上司吉村就经常向梶塚送去“冻伤研究”的报告，濑越指着梶塚的鼻子质问说：“我们七三一部队所做的罪恶试验，都是遵照梶塚将军的直接命令进行的，因而你不是简单知道七三一部队的‘秘密的秘密’，即在活人身上进行试验，你乃是这种最残酷和最惨无人道的实验的发欺人和领导者。”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也作证说：“我来到关东军后，不是别人，正是梶塚在1944年7月末向我作过关于第七三一部队工作情形的详细报告，向我报告七三一部队正在从事研究和制造细菌武器的秘密工作情况。梶塚将军，你承认这一些事实吗？”梶塚大汗淋漓，瞠目不知所云。山田乙三又进一步揭露说：“军医中将梶塚曾实际领导过第七三一部队在研究和大批制造细菌武器方面的科学试验工作。你亲手建立了第七三一部队各支队，其直接任务就是要对苏联、中国进行细菌攻击。”在山田乙三、濑越两人对质与质问下，梶塚慌乱不堪，语无伦次：“实际上，我领导过第七三一部队那种在各方面研究和培养各种病菌的工作，而不管这种病菌将用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是我这个医务处长所不感兴趣的，但是，我知道第七三一部队所生产的是要用去对活人进行实验，用去做细菌武器，所以我就促进过第七三一部队来生产细菌武器。……”审判长威严地质问：“被告梶塚，具体交代你的罪行！”梶塚慌乱不堪，讲话自相矛盾，漏洞百

出：“我对第七三一部队工作的具体领导，就是监督该部队内一般研究和培养各种病菌所进行的工作。……在这方面，我给七三一部队长发出过一切有关上述问题的必要指令。……同时，我既是医务处长，我也收到过七三一部队长关于研究和培养各种病菌问题的报告。此外，我既是细菌学专家，所以我对于上述问题贡献过各种意见。”苏联国家公诉人、三级国家法律顾问斯米尔诺夫见这个关东军医务中将处长已得溃不成军，就郑重指出：“法庭知道，梶塚在供词中说，七三一部队的所有工作都归他管辖，都是用活人做实验对象来进行的。这确实证明，对七三一部队中所干出的一切万恶罪行，梶塚并不是一个消极的观察者，而是一个积极参加的人，何况这种罪行都是按梶塚的命令所做出的呢--你必须交代指挥七三一部队用细菌为武器攻击中国和平居民的罪行！”梶塚又摆出关东军中将处长的派头，蛮横地把对中国进行的细菌战说成不过是一种试验而已：“这种武器对中国说来是进攻武器，但对日本说来，我却认为它不过是带试验性的武器。”梶塚的猖狂言行激起旁听席上广大苏联听众的强烈愤怒，法庭上立刻响起一片谴责声，苏联国家公诉人斯米尔诺夫义正词严谴责说：“被告梶塚说对中国人民进行的细菌攻击是带试验性的行动，这种论调真是横蛮无耻，诡辩多端，只是又一次说明梶塚乃是一个残酷无情仇视人类的恶魔，他直到现在还认为石井部队远征中国之举，不过是细菌侵略战以前的一种试验。”

事实证明，梶塚与关东军司令部其他高级军官不同，他可以毫无限制地洞悉第七三一部队所进行的全部工作。充分的材料证明，从七三一部队成立之日起，直到日本投降时止，梶塚始终是细菌战准备中最积极的参加者之一。他参加过关东军司令部内，讨论在侵略战争中实际使用细菌武器问题的一切秘密军事会议，经常视察七三一部队，并且对该部队全部活动都了如指掌。关东军司令部正是经过梶塚来与其三一部队发生直接联络的。”经过艰苦的审判，梶塚隆二在大量事实面前不得不低头认罪，他在法庭最后陈述时说：“我承认我犯了向我提出的罪状，并甘愿承受任何严厉的处分。我研究医学原是为促进保健事业，是要造福人类。我是个医生，是一个从事人道主义职业的人，而我竟不去执行医学家的神圣天职，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即走上了准备利用细菌当作武器的细菌战的道路。这是我自己的奇耻大辱，是一个医生的奇耻大辱，我很懊悔我以前曾参加过这种罪恶行为，我因我犯过种种罪恶而感到在各国人民面前犯有罪过。”1949年12月31日，伯力法庭宣判梶塚隆二犯有如下罪行：“梶塚隆二从1931年就主张使用细菌武器，他在1936年任日本陆军省军医科长时，曾促成过建立和编成专门细菌部长一举，而石井四郎就是由他推荐委任为该部队长的。从1939年起，梶塚接任关东军医务处长而直接领导过第七三一部队的工作，给它以制造细菌所必需的一切物品。梶塚经常到第七三一部队去视察，洞悉其全部工作，曾知道用细菌传染活人进行实验时所做出的残暴罪行，并赞许过这种罪行。”伯力法庭判处梶塚隆二有期徒刑25年。

4、代号一 部队与高桥隆笃关东军兽医处长高桥隆笃是日本利用牲畜进行细菌战的重要战犯，他领导的“关东军兽疫预防部（代号第一部队）作恶多端，受到各国人民的强烈谴责。

高桥隆笃1888年生于日本秋田郡百合县本庄城，日本化学兼生物学家，“九·一八事变”后到长春宽城子建立号称高桥部队的“关东军马匹防疫厂”，1936年改为“关东军兽医预防部”，迁至长春市以南10公里的

孟家屯，1941年改称第一 部队。

高桥隆笃1941年3月就任关东军司令部中将医务处长，他以第七三一部队的研究实验为基地，以牧畜为媒介进行细菌战。

高桥亲手建立和指挥的第一 部队本部设有6个部，他亲自给各部分配任务：第一部主要负责研究关东军各作战部队所属的马匹和所拥有的各种动物的血液，确定鼻疽、炭疽、传染性贫血等病症。第二部主要负责各种细菌、病毒的研究和制造，第三至第六部是制造血清疫苗部、饲养动物部、训练教育部和总务部。他指挥第一 部队疯狂研究、实施细菌战，欠下中国人民许多血债。

在伯力军事法庭上，高桥装出一副可怜相，声称自幼家境贫寒，只为替弟弟缴纳学费不得不领取陆军省发给的津贴费，毕业后不得不到关东军服务。又声称自己是主张反对细菌战的，“但因为我仅是细菌学专家，所以人们未曾理会过我的意见，”还说自己不是第一 部队长，因而没有“直接责任”。

为揭穿高桥隆笃的谎言，第一 部队长若松等人被传来出庭作证，证明陆军中将高桥隆笃自1941年3月任关东军兽医处长时期，就管辖用以准备进行细菌战并从事细菌破坏活动的特种部队，即第一 部队。高桥一上任就立刻发挥巨大的积极性，并得以增大了第一 部队在培养兽类烈性传染病菌，如鼻疽菌、炭疽热菌以及培制谷类毒药和病菌方面的生产潜能。若松证明高桥隆笃直接发起，在第一 部队内成立六分部，即细菌研究分部，大量生产为进行细菌战和从事军事破坏用的细菌，同时在活人身上进行罪恶实验。

若松等人证明高桥在关东军各军团内都建立了第一 部队支队网，这些支队也进行过制造细菌武器的工作，其任务都是为要在作战时和在细菌破坏活动时，直接实施细菌攻击。揭露高桥曾亲身领导过细菌战武器研究工作，并为此建立过许多生产细菌和毒物的新分部，大大扩展了第一 部队的生产能力。

在证人提供的大量事实面前，高桥隆笃不得不承认：“我曾命令并亲身监督过第一 部队培养鼻疽菌、炭疽热菌、牛瘟菌和斑驳病菌等等的工作，目的是要用这些细菌去进行反苏反华活动。”苏联法官安东诺夫中校肯定他的态度有所进步，又问他什么时候、命令什么人去生产这些病菌，高桥隆笃说：“1941年9月，我命令第一 部队长若松大佐（后来升为兽医少将）开始生产鼻疽菌、炭疽热菌和锈菌。1944年3月，我又命令他开始生产牛瘟菌和斑驳病菌来代替锈菌。这是由于奉到帝国大本营参谋部给关东军总司令的训令，说要着手准备进行对苏联和中国的细菌战。”安东诺夫法官询问用什么方法，高桥隆笃回答说：“我们所拟定的传染牲畜的办法，是要用飞机散播传染牛类的炭疽热和牛瘟，还预定要传染属于当地居民的游牧场上的牲口。对马匹是预定要用飞机散布炭疽热菌的方法去传染。

绵羊是预定用注射法传染羊痘，然后就散放出去，又打算把采购的那批牛用注射法染上牛瘟。凡是受到了传染的牛羊马匹都预定要散放出去，好让他们失落到作战地区内。”法官安东诺夫质问第一 部队制造细菌的能力，高桥隆笃供称：“我曾向关东军总司令梅津美治郎报告，第一 部队在一年内能制造的细菌数量是：炭疽热细菌1000公斤，鼻疽细菌500公斤，锈菌100公斤。这是我当时（1943年）所报告的数字，后来从

1943年12月起，设备已开始运来而安置在第二部第六分部内，生产数量有所增加。"法官命高桥隆笃交代1944年派远征队到北兴安省进行细菌战的罪行，高桥供称："我遵照关东军总司令梅津的指示参加了北征北兴安省的行动，我们的任务是要考察河流、蓄水池、牧尝牲畜数量以及畜群季节迁移的条件。"法官追问这次远征的终极目的是什么？高桥供称："关东军总司令梅津将军曾对我说，在一旦对苏战争开始而日军退到大兴安岭一带进行防御战的时候，第一 部队就应把北兴安省内所有的牲畜一概染上流行病，或尽可能将其消灭掉，以使敌军不能使用。至于说到马匹，因为马岂能够迅速移动，所以决定将其赶到兴安岭以东地区去。"高桥在伯力法庭上极力为自己开脱罪责，声称用活人进行试验是未经他批准进行的，不能对此承担直接责任。苏联国家公诉人以充足的理由反驳说："日本宪兵机关把反抗日本侵略的爱国者送进第一 部队，被用来做罪恶的试验，高桥既是对第一 部队实施领导的人，他也应该负这种罪行的责任。高桥还领导过第一 部队所进行的军事破坏行动。该部队曾采办过大批牲畜，为准备进行破坏活动而用这些牲畜进行过从空中施放流行传染病的试验。为了研究在自然环境中细菌武器的效能，曾由被告高桥命令在安达站区域第七三一部队打靶场上用牲畜来进行过试验，方法是从飞机上把细菌撒到草料上来传染牲畜。"

此外，高桥在对北兴安省内邻近苏联边界的各区域进行过系统的侦察之后，曾就从第一 部队中派出过几个远征队去把边界额尔古纳河诸支流染上毒菌，以便检验借河流来进行细菌破坏活动的功效。"高桥在法庭最后陈述中说："我对于我所犯那些罪行深表悔悟。我了解了这些罪行的全部深度和全部沉重性，但是今天我想请求法庭对我从轻处罚。我请法庭对我做出公道的判决，好使我能把自己的力量贡献于人类有益的事业。"

伯力军事法庭判决高桥隆笃所犯罪行如下：高桥在任关东军医务处长时，曾是细菌武器制造工作的组织者之一，直接领导过第一 部队所进行的罪恶活动，因而应该对用各种烈性传染病菌传染对被拘禁者进行的残忍实验一举负责。

伯力军事法庭1949年12月30日判处高桥隆笃有期徒刑25年。

5、严审细菌制造者--柄泽十三夫日本第七三一部队生产部分部长柄泽十三夫是日本细菌武器制造工作的积极组织者之一，又是准备细菌战的参加者。

柄泽十三夫1911年生于日本长野郡小县县丰里村，陆军大学毕业后开始侵华生涯，其经历如在法庭所做供认："我在第七三一部队中服务是从1939年12月起，至1945年8月止，主要是在第四部即生产部担任职务，起初是当该部普通工作员，后来担负生产工作长职务，1942年底任生产分部长。"伯力法庭控诉柄泽十三夫是细菌武器生产的组织者、参加者，他自己也供认不讳："我开始领导的那个科和以后领导的那个分部，曾按需要程度大批培养过伤寒、副伤寒、霍乱、鼠疫及炭疽热等病菌，以供实际使用，就中即供第七三一部队在安达站附近、打靶场野外条件下进行细菌实验，同时也供战争中作为细菌武器去反对中国人民。"苏联法官质问柄泽，既然身为细菌科大夫，就应知道生产细菌武器的严重性，柄泽十三夫供称："我既是个细菌科医生，所以我在大量生产细菌时，知道这些细菌是用去消灭人命的，但当时我认为这种作法是身任日军军官者应尽的职责，所以"

我就尽力去执行上级长官命令我执行的任务。"苏联法官要柄泽交代生产细菌的罪行，柄泽十三夫说：“在我管辖下工作的有军官、士官及雇员共约50至70人，并且有大量培养细菌的一切必要设备。我所领导的那个分部，运用自己所具有的设备，每月内可培养如下数量的某一种细菌：鼠疫菌1000公斤，炭疽热菌200公斤，伤寒菌300公斤，副伤寒菌'A'300公斤，霍乱菌330公斤，赤痢菌300公斤。”苏联公诉人控诉柄泽参与活人进行细菌实验的罪行，在铁的事实面前，柄泽十三夫不得不招认：“我曾两次到安达站打靶场，亲身参加过在野外条件下用活人来实验细菌作用的行动。第一次是在1943年末，当时有10个人被押到打靶场上来，他们被绑在事先就栽在土里彼此相隔5公尺的柱子上，然后就在距他们50公尺以外的地方，借电流爆炸了一颗开花弹，结果有几个受实验的人被弹片炸伤，立刻（这点我事后才知道）就受到了炭疽热细菌的传染，因为这炸弹里面就装的是这种病菌。……”柄泽十三夫竭力装出悔悟样子说：“第二次我到打靶场上去参加实验，是在1944年春季。当时解来了十几个人，也和第一次一样，把他们都绑在柱子上，然后在距离受实验者约10公尺的地方，爆炸了一颗装有鼠疫细菌的炸弹，受试验者全都负了伤。……”苏联公诉人指控柄泽不仅亲自参加细菌武器试验，害死了许多被拘禁的中国和苏联公民，而且多次参加组织远征队对中国和平居民散布瘟疫病菌的罪恶行动，在事实面前，柄泽十三夫不得不供认：“1940年下半年，我奉直接长官铃木少佐的命令，要我准备70公斤伤寒菌和50公斤霍乱菌。当时铃木少佐向我解释说，准备细菌一事，是该部队长官石井将军命令他做的，因为石井将军正准备率领一个特别远征队去用细菌反对中国军队。……我执行了这个命令。同时，我从第二部人员方面听到，第二部内为石井将军的远征队培养了5公斤染有大量鼠疫的跳蚤，以便用来散布鼠疫。1940年9月，石井将军带了部队内其他一部分军官到汉口去，同年12月返回本部队。据那些随同石井将军到过汉口的军官转回来时说，使用染有鼠疫跳蚤一举，业已奏效。散布鼠疫的结果引起了鼠疫流行症。参加过那次远征队的野平少佐曾拿出一份中国报纸给我看，宁波一带发生了鼠疫。”伯力法庭追查柄泽参与第二次远征队的罪行，柄泽十三夫看罪行掩盖不住，只得招认说：“由石井将军率领而去反对中国军队的这次远征，是在1942年年中进行的。远征队出发前，我又按铃木少佐的命令，主持备办了130公斤副伤寒菌和炭疽热菌，供该远征队之用。

据我所知，在这次远征中也用过跳蚤作为传染病媒介物。……为了进行这次远征，石井将军率领一队人出发到当时日军正在撤退的华中地区去。远征队队员们乘日军退却之机，在行将放弃的区域内散布了细菌，好让进攻的中国军队染上传染玻”柄泽在法庭最后陈述时说：“还在1946年，即当东京国际法庭对主要战犯案进行预审的时候，我便以证人资格受过审讯。当时我把我个人和第七三一部队所犯的一切罪行都揭露了。现在，我了解我所犯罪恶的全部深重性，并对我犯的罪行完全悔悟。我将来一定要成为一个崭新的人，我请求法庭给我公正判决。”伯力军事法庭认为柄泽作为七三一部队生产部分部长，积极组织过大规模生产细菌武器的工作，1940年至1942年极力用细菌去供应特种远征队对中国进行细菌战，还直接参与过在被监禁者身上用致命细菌进行罪恶实验的勾当，因而判处有期徒刑20年。

6、严判西俊英对七三一部队训练部长西俊英的审判是伯力军事法庭

的另一场激烈斗争。

西俊英1904年生于日本鹿儿岛郡萨摩县樋胁村，虽是医生兼细菌学家，但却作为石井四郎的重要助手而作恶多端。

西俊英狡诈异常，说他只是作为军人奉命行事，毫无个人责任。针对西俊英的蛮横态度，伯力军事法庭首先追查他作为七三一部队所属孙吴支队长的罪行，在众人证物证面前，他不得不承认亲自参加过制造细菌武器的活动，但又避重就轻，只说亲眼见过摄有日本细菌部队攻击中国军队的秘密纪实新闻片，他故弄玄虚供述说：“……银幕上放映出如下几个镜头：把一些特种器皿挂在几架飞机下面，马上就说明这些器皿内装的是传染鼠疫的跳蚤，有架飞机是飞在敌区上空是被摄照的。那里地面上显现出有中国军队在移动，并且还有一个村庄。”西俊英眯着小眼环视法庭一周，仔细观察他这番供词产生的效果，见人们都静静听他讲，便绘声绘色讲下去：“那架飞机转回到飞机场，接着银幕上就现出了‘任务完成’字样。石井和碓常重敢死队长从飞机里走出来，接着便放映出‘结果’二字。银幕上照出一张中国报纸上的论文和日语译文。这张中国报纸上写道：宁波一带发生了强烈的鼠疫。”接着，西俊英又供述日本在希特勒德国进犯苏联之际对细菌战方面的准备情形：“当1941年希特勒德国进犯苏联，而驻满洲的关东军集中在苏联边境的时候，第七三一部队内为创造有效细菌攻击武器的科学研究工作，大体上已经解决。至于部队内往后的活动则是完善大量生产细菌过程和散布细菌的方法，当时已经确定鼠疫细菌是最有效的攻击武器。”西俊英又把责任全往石井四郎身上推，尽量洗刷自己的罪责说：“1945年5月，当我亲自向石井四郎将军做报告时，他向我特别强调说，必须加紧生产细菌材料，首先是要加紧培养鼠疫菌。据他说，照事变发展情形来看，随时都可能有用细菌去攻击敌人的必要。”审判长期尔特科夫指责西俊英逃避实质问题，专门指出要他交代在安达站参加罪恶实验的情况，西俊英才被迫供称：“安达站离哈尔滨146公里，该部队打靶场设在安达站附近。我遵照第七三一部队队长的命令，特于1945年1月到安达站去过。我在那里亲眼看见过第二部部长碓常重中佐协同该部工作员二木一起，在10个中国战俘身上进行坏疽病传染的试验。这些人被绑到木柱上。各犯人头部用铁帽盖住，躯体用铁板盖平，只有臀部光着。在约有100公尺远的地方，用电流把一颗瓷制弹炸裂去传染。所有这十个人光着的部分都受了伤，都染上坏疽病在一星期后死掉了。”西俊英1944年7月被任命为第七三一部队训练部部长，训练出许多从事细菌战的专门人才，供关东军各部队直属部队任用。

1949年12月31日，伯力军事法庭判处西俊英有期徒刑18年。

7、用活人试验的--三友一男三友一男虽只是日本细菌战部队普通成员，但罪行却令人发指。

三友一男1924年生于日本埼玉郡秩父县原野村，日本关东军第一部队上士工作员。

三友参加过制造细菌武器的罪恶勾当，他在法庭上供认说：“我承认我所犯的罪，是在1941年4月间自动投到专门培养炭疽热、鼻疽、牛瘟、羊痘等病菌的关东军第一部队内工作，并且我明知培养此病菌是专门为了进行反苏战争，但我仍积极参加了第一部队特别实验室内培养此种病菌的工作。我进入该部队后，参加过炭疽热菌和鼻疽菌培养法训练班，曾用专门由我看管的孵育器培育过此种病菌。当我在该部队工作期间，即从19

41年4月起至1944年10月止，我始终都是干这件事情。我担任的主要任务是繁殖鼻疽细菌。"苏联公诉人指控三友一男积极参加日本细菌部队的远征队，在中苏边境丧心病狂地散播传染病菌。三友一男对此供认不讳：“1942年7、8月间，我在第一 部队第一分部内服务时，参加过一次到结尔布勒河一带去行动的远征队。”法官质问：“以谁为首？共有多少人参加？”三友一男供认说：“领导这次远征的是第一 部队第二部长村本少佐，共20余人。”“这次远征的目的是什么？”“这次远征的目的是研究能否使用鼻疽及炭疽热细菌来对苏联和中国进行军事破坏，也到三河区行动过。当时我们把鼻疽菌投在结尔布勒河里，把炭疽热菌投到蓄水池内，这样来实验此种细菌的韧性。我在那里也亲自培养过鼻疽菌和炭疽热菌，供本班人员在结尔布勒河和各蓄水池内做试验之用，还用炭疽热细菌传染过几个死水泊。”苏联公诉人强烈指控三友一男用活人进行细菌试验的非人道罪行，在大量事实面前，三友一男不得不招认说：“用活人来作试验，是1944年8、9月间，进行的方法是用一种使受实验者觉察不到的方式发给他们一剂催眠药或毒药去吃。受实验的都是俄国人和中国内地人，共约七八人。实验时所用的药品有朝鲜'朝颜'、海洛英和蓖麻青，把这类毒品都掺进食物中去给中国和俄国人吃下去。在两个星期内，给每个受试验者吃五、六次。在菜汤里面主要是掺朝鲜'朝颜'，米饭里面大概是掺的海洛英，烟里面掺的是海洛英和'巴克塔尔'。受试验的人，在吃了掺有朝鲜'朝颜'的菜汤后经过30分钟或一小时，就一连睡眠5小时之久。所有受试验的人受试验后经过两个星期，就软弱得再不能使用了。”法庭上的法官和苏联听众都被日本法西斯军人的兽行激怒了，发出震天的怒吼声，法官挥手稳定住秩序，强抑住愤怒问道：“那时又怎样处置他们呢？”三友一男做贼心虚，低声回答：“为了保守秘密，所有这些受实验的活人都被害死了。”“用什么办法害死的呢？老实交代！”三友一男低头吭哧半天才说出口：“有一个俄国人是 由我们遵照科学工作员松井的命令，用注射十分之一氰化钾害死的。”苏联法官紧追不舍：“究竟是谁把他害死的呢？老实招认！”三友一男吓得大汗淋漓，伸出大手擦一把额头的汗水，低头压低声音说：“氰化钾是我给他注射的。”苏联听众听不清大喊大叫，法官重述一遍后追问：“你把这个被你害死的俄国人的尸体怎样处置了？老实招来！”“我在本部队牲畜掩埋所那里把这具尸体剖开了。”“你把尸体剖开后又怎处置了？”“我把尸体埋下去了。”“在什么地方挖的坑？”“在部队后面的牲畜掩埋所。”“就是在掩埋死牲畜的地方么？”“是在同一地方，不过是埋在另外一个坑里。”这时，旁听席上显现出惊动骚乱现象，愤怒的听众发出震耳欲聋的抗议谴责声，苏联法官凭借群众的强大威势穷追猛打：“我再问你，你究竟是用什么方法把这个人杀死的，你是怎样把他杀死的？快老实交代！”三友一男情知到了关键时刻，低头考虑半天不发一言，在旁听席上听众的谴责声中，在法官的一再催促之下，才招供说：“为了要给这个受实验者注射氰化钾，我曾遵照科学工作员松井的指示，设法使他泻起肚子来，而这就成了给他注射氰化钾的借口。”苏联法官辛辣地讽刺说：“由此可见，你原来是欺骗了这个人！你口里对他说是 要给他打针，给他治病，实际上却给他注射了氰化钾！对不对？”被告三友一男无力回答：“对的。”苏联法官进一步扩大战果，厉声质问道：“你只杀了这一个俄国人？还杀死了中国人吧？我们掌握了可靠证据，看你能不能老实交代，伯力法庭将根据你的态度判刑！”政策的威力是无穷的，三友一男在坦白从

宽政策感召开始交代尚不为人所知的罪行：“有一个受实验的中国人吃进了由我掺上毒药的米饭，也是在不省人事状态中度过几小时就死掉了。”苏联法官厉声喝问：“你向他的米饭里掺进了什么毒药？”三友一男嘬嚅道：“是一公分海洛英。”苏联法官质问道：“你知道你是把一剂致命毒药掺进米饭里去么？”“我知道这一点。”“由此可见，这原是你完全有意进行杀害？”“对的。”“被你杀害的这个人的尸体埋到了什么地方？”“同那个俄国人埋在一个地方。”“是埋在死牲畜掩埋所么？”“是的。”苏联法官气冲九斗喝问：“你还知道有其他杀害受实验者的事情发生吗？”三友一男拍着前额想了想说：“我还知道有一个中国人、两个俄国人被日本宪兵队枪毙了。”苏联法官追问说：“就是说，这三个人是直接死在死牲畜掩埋所那里被枪毙的吗？”三友一男点头哈腰：“是的。”“日本宪兵为什么枪毙他们呢？”“我想是为了保守秘密。”苏联法官高声做出论断：“由此可见，凡是被送到第一部队去受实验的人，都必须得杀害掉，是不是？”三友一男躬到地回答：“正是这样。”苏联公诉人义正辞严指出，三友一男虽是第一部队的普通实验员，可是他手上曾染遍了他所杀害的苏联和中国人民的鲜血，加之他的活动是自觉地为了准备细菌战，因而应该受到严厉惩处。

三友一男在法庭最后陈述中说：“以前，当我在第一部队中工作的时候，我没有了解我所干罪行的全部深度，然而当我在苏联这里住过4年以后，特别是近几日来在法庭受审以后，我已深刻感觉到我所犯罪恶的全部深重性了。我了解了我自己所应负的全部责任。我对于我曾参加过的罪恶行为表示忏悔。”苏联律师普罗科平为三友一男做辩护时说，对完全承认了自己罪过的三友一男，公诉方对他提出的罪名是沉重的。三友除制造致命细菌外，还不只用动物而且用活人进行试验。他曾遵照主人命令杀害过许多人命，然后就把死者尸首剖开，检查因中毒结果发生的变化，当时他并没有认为这是罪恶，因为军阀集团教导给小兵三友的思想原是如此。这是过去的事，但三友已痛斥自己过去所干的罪恶活动，并承认犯了严重罪行，希望对他从轻治罪。”伯力军事法庭认定三友一男以第一部队工作人员的资格直接参加过制造细菌武器的工作，并亲自对活人进行过检查各种细菌效力的试验，用此种手段害死这些受实验的活人。

三友参加过在三河区一带对苏联进行的细菌军事破坏活动，因而判处有期徒刑15年。

8、认罪轻判的--久留岛佑司久留岛佑司1923年生于日本香川郡小豆县苗羽村，受过八年级教育，再应征到关东军当兵，为第七三一部队担任第一六二支队实验员，1945年8月23日被苏军俘获。

伯力军事法庭考虑到久留岛佑司是年轻的日本士兵，就着力启发他的阶级觉悟，促使他认识到被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欺骗，他很快认识到自己的罪行，在法庭上说：“真的，当我被征入日军队伍，在第九十七步兵联队受过普通军训之后，就于1944年4月被派到林口第七三一部队第一六二支队服务。我进入这个支队不久，因亲身认识队内工作性质和听到关于第七三一部队活动秘密性的预告就了解到，虽然第七三一部队所担负正式任务是经管给水与防疫事宜，但其实它是在培养各种烈性传染病（伤寒、副伤寒、霍乱、鼠疫等等）细菌，养育跳蚤并用养育的跳蚤来繁殖鼠类。”久留岛佑司于1944年10月6日至30日参加了七三一部队在黑龙江平房站附近吴屯举行的实验细菌炸弹的“演习”，他在实验人员住宅外面担任警卫，保证细菌

战人员在中苏人员身上进行罪恶的实验，为查明用飞机散播跳蚤传染疾病的效能，他又负责计算落到摆在两平方公里地面上箱子里的跳蚤数量。

久留岛的第二个罪状是任第一六二支队实验室的实验员，负责把结核菌、伤寒菌和副伤寒菌放置到营养液中去、预备实验仪器、调试培养细菌时孵化器内的温度及其他工作，还捕了300只田鼠，用来生产传染性病菌。

久留岛认识到他在七三一部队任职所犯罪行的深重性，对把他卷入准备细菌战罪恶勾当中的日本军阀表示无限的痛恨。

伯力军事法庭认为久留岛佑司受过专门训练后在第七三一部队的一个支队担任实验员时，参加过培养霍乱病菌、伤寒病菌和其他各种传染病菌，参加过实验细菌炸弹的工作，因此判处他有期徒刑3年。服刑期满后于1953年回到日本。

六、中国大审判

1、南京审判在中华大地欢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锣鼓声中，从14年艰苦抗战中取得胜利的中国人民，将昔日横行中国的日本战犯迅速尽快逮捕，可谓扬眉吐气，大快人心！

从1945年8月到1947年5月，中国各地共逮捕日本战犯2357名，相继在北平、南京、上海、汉口、广州、太原、徐州、济南、台北、沈阳等地，设立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经过各地的紧张审判，35名战犯被执行死刑，遣返回日本者933名，引渡出国者27名，尚有在押战犯1137名，转移到司法机关者100名。

为统一审判在华日本战犯，中国于1946年2月15日正式成立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任命石美瑜为庭长，王家楣为主任检察官，任命李波、徐乃堃、高硕仁、施泳等为检察官，陆起、李元庆、林建鹏、叶在增、孙建中、龙钟煌、张体坤等为审判官，统一审判由中国驻日代表团引渡和从全国各地法庭移交的日本战犯。

这又是正义与邪恶的大较量。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呼声下，中国军事法庭对屠杀南京人民的刽子手谷寿夫、屠杀300多个中国人的乙级战犯田中军吉、在南京紫金山下进行“杀人比赛”的向井敏明和野田岩、侵华日军第23军司令官酒井垄侵华日军华南派遣军司令官田中久一等进行正义审判，并处以极刑，功不可没。

南京审判是一部威武雄壮又曲折多变的活剧，既有叶在增等爱国法官以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伸张人类正义、严惩侵华元凶的民族正气歌，又有侵华战犯无耻狡辩的群丑曲，更有蒋介石、何应钦为发动全面内战包庇侵华战犯的卖国戏，亦不乏中国法官在复杂条件下为完成艰巨任务而斗智斗勇的动人故事。

南京审判功过分明，但审判、枪毙了谷寿夫等罪大恶极的侵华战犯乃是主流，时光荏苒，虽过去50春秋，但重温这段历史，仍能告诉我们许多东西…… 审南京大屠杀要犯--谷寿夫南京军事法庭一开庭就碰上了硬钉子。

南京大屠杀的首恶、日寇第六师团中将师团长谷寿夫别看身材矮胖，貌不惊人，却骄横跋扈，刁钻狡诈。

谷寿夫1946年2月2日因战犯嫌疑在东京被驻日盟军总部逮捕，关押在巢鸭拘留所，因欠中国人民血债太多，中国点名要求引渡，于是在同年8月被引渡到中国，关押在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上海战犯拘留所。

国民党政府给谷寿夫下的断语是：“谷寿夫为侵华最重要战犯，尤为南京大屠杀之要犯，为便利侦讯起见，经提战犯处理委员会第三十八次常会决议：移本部军事法庭审判。”第一绥靖区司令部军事法庭接到命令，特派该法庭副官刘珊率特务营班长和6名士兵，将谷寿夫从上海押解到南京，关进国防部南京小营战犯拘留所。

谷寿夫自离开东京之日，眼望波涛滚滚的大海，观看中国的青山绿水，为不能征服中国而“愤愤不平”，为保住自己的性命，他冥思苦想出无理狡辩的“三部曲”：首先是矢口否认有南京大屠杀：“我在南京大街上连个死人也没有看到过，甚至连杀人的事都没有听说过，只是在战争结束后，从报纸上看到有南京大屠杀这回事。”以此掩盖罪行，企图逃脱惩罚。

其次是面对大量事实，把罪责推个一干二净。谷寿夫以退为进狡辩说：“南京不幸事件的中心点是在城内中央部以北，下关方面的扬子江沿岸及紫金山方面，在此等地方的主力为第十六、九、十一、一百一十、十三、三等各师团及重藤支队（旅团）等兵团之行政区，与我第六师团无关。”第三是“即行调转”不在现场说。这是谷寿夫在“陈述书”中拿出的自以为最厉害的一招：“我师团于入城未几，即行调转，故无任何关系。”面对态度嚣张而又阴险狡诈的谷寿夫，原来负责承办谷寿夫案件的法官借故推脱了，南京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对选任主审法官犯了难。想来想去，想到了年轻法官叶在增，便把他请来，指着办公桌上小山似的一堆案卷说：“由远东军事法庭押来的谷寿夫，检察官已侦察完毕，起诉书过来了，我想请你协助调查整理一下好吗？”叶在增马上预感到审判谷寿夫的重任可能落到自己肩上，一时有些紧张，因为这是影响巨大的国际案件，审判的是穷凶极恶的杀人魔王谷寿夫，有经验的老法官借故推脱不干，自己作为年轻法官能胜任吗？于是他对石美瑜说：“我年轻资浅，恐怕承担不了。”石美瑜鼓励他说：“在增，关键是你敢不敢为国雪耻、担此重任。现在首先把罪证理清楚，一定要做到真确、翔实，使人无懈可击。”叶在增说：“我深感责任十分重大，因为这是一起伸张人类正义、严惩国际凶恶敌人的巨大案件。对被告的犯罪事实，必须查得清清楚楚，罪证必须千真万确。”叶在增虚心向本案提起公诉的检察官陈光虞请教，因为陈光虞是南京检察处的检察长，有丰富的检察经验，已做过多方调查，掌握了大量材料，对审判谷寿夫有了大体轮廓。陈光虞便带石美瑜、叶在增等人请南京红十字会负责人和掩埋尸体的人陪同，到中华门外花神庙的万人坑实地视察，又从南京中山码头、草鞋峡、燕子矶、东岳庙、斩龙桥等地取回大量证据。

在紧张的3个月法庭准备时间里，中国法官开庭几十次，传讯了数以千计的中外证人，拿到了侵华日军为炫耀武功自己拍摄的电影、写的日记、报刊和中外有关书籍，写出了有份量的法庭判决书，对谷寿夫可能采取的狡辩战术进行了充分分析，制定了有针对性的审判方案。

石美瑜对年轻的中国法官叶在增刮目相看，胳膊有力地交插在胸前，脸上荡漾着满意的笑容，充满了必将战胜日本战犯的战斗豪情。

为发动南京市民行动晚来与谷寿夫做斗争，南京法庭1946年10月28日贴出一张惹人注目的大布告：“查本庭审理日本战犯谷寿夫一名，据供：前任柳川军第六师团长，由杭州进攻南京，于（民国）二十六年12月13日进城，所辖部队分驻中华门内外附近一带地方，至同月21日调往芜湖等语。查日军进城一周之内，为南京大屠杀最惨烈时期，该犯既身任中华门一带驻军之将领，关于该区域之犯罪事实与证据，自不能不切实调查，以明其责任。凡我军民人等在上述地带及时期内，曾遭日军烧杀奸掠及其它加害行为者，抑各被害人或遗族，或在场目睹之人，迅即详叙情形报告本庭，以资侦查，是为至要。切切，此布。

“这一布告威力无穷，立刻把受害人吸引过来，南京法庭又于1947年1月19日在中华门外区公所内设立临时法庭，张贴布告，传讯证人1000多人，搜集到更多的证据。

1946年12月31日，南京军事法庭检察官陈光虞以战犯谷寿夫破坏和平罪和违反人道罪正式起诉，并请科处极刑，以维护世界正义。

南京人民久已盼望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1947年2月6日，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南京黄浦路口的励志社（现在的南京市中山东路307号）大礼堂，对南京大屠杀首犯、侵华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开庭公审。

法庭布置得庄严肃穆：审判席设在令人瞩目的礼堂讲台上，以布覆盖着长桌，庭长石美瑜端坐审判席中央，法官叶在增、葛召荣、李元庆、宋书同和检察官陈光虞、书记官张体坤、指定辩护律师梅祖芳和张仁德等分坐石美瑜两侧，一个个精明强干，威风凛凛。

审判席的正中下面为翻译席，翻译席的前面为被告席，其余是律师和证人席，楼上楼下都是观审席。

令人注目的是在审判席上，放置着许多受害人的头颅骨，都是从被害人的丛葬坟墓中挖出来的，更激欺人们对南京大屠杀首犯谷寿夫的滔天深仇。

石美瑜庭长庄重地宣布公审开始，他威严地一声“带被告谷寿夫出庭”令下，谷寿夫被两名法警押上被告席。人们一起把愤怒的目光射向被告席，只见谷寿夫身材矮胖，穿着黄色短呢军服，蓄着东洋小胡子，是个典型的日本武士道军人模样，但在楼上楼下听众的一片愤怒谴责声中，漠然麻木的脸吓得像死人一样灰白。

首先由公诉人陈光虞严正地宣读起诉书：“被告谷寿夫，66岁，日本东京都中野区人，陆军中将师团长，曾先后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及陆军大学毕业，为日本侵略运动中之激进军人。一生充任军职。……”起诉书控诉谷寿夫1928年任第三师团长期间入侵山东济南等地，参与制造济南惨案；1937年率第六师团入侵华北，沿途纵部任意抢劫居民陈嗣哲家中衣服古玩28箱及红木家具，强迫中国妇女做肉体的慰劳，旋即直扑南京参加大屠杀，被害者几十万人。

谷寿夫似木桩一般站在被告席上听完起诉书，好像若无其事，当法庭宣布指定梅祖芳、张仁德两个律师为他辩护时，他傲慢无理地拒绝说：“我比律师先生更了解事实。”法官叶在增威严地质问说：“被告谷寿夫，你对检察官指控你在南京大肆屠杀无辜百姓的犯罪事实，还有什么话说？”谷寿夫按他的预定计划滔滔不绝地讲他的侵华经历说：“1937年8月1日，我

从熊本上船，经过朝鲜到华北。以后由大沽口登船，在杭州湾登陆，参加南京作战，后到芜湖，1938年1月9日离开中国芜湖，不久到大阪做防卫司令官。法官要谷寿夫交代在南京大屠杀的罪行，谷寿夫把早已准备好的开脱之词抛了出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奉天皇之命向中国作战，交战双方都要死人，我深表遗憾。”叶在增法官见谷寿夫寥寥数语将他的罪责推得干干净净，不由怒火中烧，霍然站起高声宣布：“请受害人提供证据！”中国法官一声宣布，证人席前立刻排起了受害者的长队，一个个怒火满腔，争先恐后上台做证。

白增荣、梁廷芳两人首先登上证人台，指着谷寿夫的鼻子揭露，在1937年12月16日下午6时，麇集在南京华侨招待所的5000余难民，被谷寿夫的部队押往中山码头，疯狂地用机枪扫射，然后把尸体弃往江中，白增荣、梁廷芳两人中弹受伤，也被日本兵投往长江，与尸体一同漂流，得以幸免。

南京市民姚加隆接着登台控诉说，12月14日他带领全家在中华门斩龙桥避难，被谷寿夫的部队发现，他的妻子被轮奸杀害，8岁的幼儿、3岁的幼女因在一旁哀求，被丧尽天良的谷寿夫部属用枪尖挑入火中，活活烧死。

一个个受害百姓陆续出庭做证，控诉谷寿夫部属杀人强奸的暴行，都恨不得把谷寿夫撕成碎片，踩成肉泥，多亏法警竭力阻拦，才暂时保住了谷寿夫的生命。

谷寿夫见此阵势真有点胆战心惊，但仍把粗短的脖子一梗矢口否认道：“我部是有文化有教养的军人。两军对垒造成的伤亡不可避免。至于百姓伤亡，可能是别的部队的士兵干的。”中国法官叶在增见这个凶恶的战犯气焰仍如此嚣张，便决定拿出他的有力武器：“请《陷都血泪录》的作者郭岐营长出庭作证！”郭岐原是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辎重营中校营长，南京沦陷时没有来得及逃出，在铁蹄下的南京停留3个月，根据他亲眼目睹的事实，写了一本《陷都血泪录》，成了审判谷寿夫的有力证词。

先由检察官宣读《陷都血泪录》，历时一小时才读完了重要章节，励志社楼上楼下的听众被激怒了，在法庭外面收听实况广播的人们，发出阵阵震天的怒吼声：“用不着再审判了，快把谷寿夫拖下去五马分尸，为死难军民报仇！”法庭内外，有的嚎啕大哭，有的掩面悲泣，有的冲上去要活扒谷寿夫的皮，吃谷寿夫的肉，幸亏有大批法警竭力劝阻，才没有当场要了谷寿夫的命。

审判长石美瑜被这种场面激动得热泪滚滚，他先介绍证人郭岐的生气，然后请郭岐出庭作证。郭岐怀着中国人的浩然正气与谷寿夫展开短兵相接的战争，他以标准的军人姿态屹立麦克风前，怀着悲愤的心情作证说：“谷寿夫率军侵占我国首都南京，他们的暴行史无前例，罄竹难书，本人提供的证词，不仅是亲眼目睹，而且事实可考。”然后，郭岐突然向谷寿夫发起猛攻：“请问，攻陷南京时，谷寿夫君的部队驻在何处？”谷寿夫在突如起来质问下应声而答：“我部驻在中华门。”郭岐见谷寿夫果然中计，就声若洪钟追击：“对了，我的《陷都血泪录》列举的惨案事实，都发生在中华门一带，正是你部残酷屠杀中国百姓的铁证！”谷寿夫的阵脚一下被打乱了，慌乱间以悲天悯人的口吻不得不承认铁的血腥事实：“恭聆郭先生所述供词，确实太残忍了。……”谷寿夫决不认输，话锋一转又狡辩说：“不过，我部进驻中

中华门时，该地居民已迁徙一空，早已没有屠杀对象。我曾一再教育部队严守纪律，不乱杀一人。……"谷寿夫"不乱杀一人"的狡辩激怒了法庭人员和旁听者，立时像火山爆发一般响起震耳欲聋的谴责声。石美瑜庭长怒不可遏，拍案而起厉声下令：“把中华门外万人坑内被害者的颅骨搬上来！”刹那间，只见一颗颗颅骨被搬到审判席上，由中国参加挖掘被害人尸骨的法医潘英才说明红十字会当时所埋尸骨及中华门外被谷寿夫部队屠杀的无数平民，大部分有被日军枪杀及被铁器打死的伤痕，从颅骨底部的切痕完全可以看出：全都是用刀砍下来的！

接着，当时的红十字会副会长许传音出庭作证，叙述他亲眼见日军到处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的罪行，证明当时红十字会曾掩埋被害人尸体4万余具。

谷寿夫面对此情此景，一时呆若木鸡，中国法官气愤地质问谷寿夫是否认罪，这个大屠杀的元凶仍说不知道这些情况。

白发苍苍的美籍金陵大学教授史密斯怀着一个知识分子的正义感走上证人席，怒不可遏地作证说：“南京安全区成立时，本人即为该区委员会之秘书。日本军队进城后，安全区之人民曾受非常之虐待，本人不得不向日本大使馆抗议。日本人曾要求以事实证明，乃开始做报告，并将每件事实付诸抗议书中。”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出庭作证说：“自1937年12月13日日本军队进入南京后，在广大范围内放火、抢劫、杀人、强奸平民，枪杀被认为是中国军人的非武装人民，情势万分严重，达三星期至七星期之久。前三星期内，尤其是前七天至十天内，对损害生命所犯之罪恶无可指数。本人曾亲见日本枪毙中国旗民，满城各街尽是死尸。”谷寿夫对四周深深鞠躬，装出十分沉痛的样子说：“恭聆诸位先生的证词，那些事实的确是太残忍了。不过，凡此种种我并不知情，我也没有下达过残害中国人的命令。”

"谷寿夫的狡辩又激起惊天动地的斥骂声，中国审判官又传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出庭作证，用他所著《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记录》里的铁的事实，揭露谷寿夫部队犯下的滔天罪行。接着，美国《纽约时报》驻南京特派记者出庭宣读《南京大屠杀的目睹记》。

对此，谷寿夫仍推说全然不知。

为制服谷寿夫，石庭长命令拉开银幕，先放映日军拍摄的新街口屠杀现场的纪录片，再放映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处拍摄的谷寿夫部队在中华门附近的暴行影片，当看到自己在屠杀现场指挥的镜头时，他一时瞠目结舌，如五雷轰顶，旋即又镇定下来，要求传证日本军官小笠原清出庭作证，石美瑜表示同意。

小笠原清登上证人席，说自己原是日本陆军大学学生，未参加进攻南京作战，但一直在研究南京战役，据他研究的结果，认为当时雨花台是中日双方激战的地方，中华门一带早就没有了居民，故无屠杀对象，因而断言谷寿夫部队没有暴力行动。

检察官陈光虞驳斥小笠原清的辩护之词说，谷寿夫部队会攻南京之时，证人小笠原清尚在日本求学，徒以臆测漫谓被告部队在南京并无暴行，这种脱离史实的唯心主义研究，必然得出违反事实的结论，自属无可采信。

在几千听众的一片责骂声中，小笠原清灰溜溜走下证人席。谷寿夫并不死心，又提出传第六师参谋团长下野一霍等3人出庭为他作证。

1947年2月25日再次开庭时，庭长石美瑜当庭通知谷寿夫：“被

告谷寿夫声请传会攻南京之将领柳川军参谋长田边盛武、第六师团参谋长下野一霍、坂井德太郎出庭作证。

本庭查田边盛武三人既参与会攻南京之战，他们对于南京大屠杀案均有共犯嫌疑。本庭正拟引渡办法，并无作证价值。应依刑事诉讼法第279条将被告之声请驳回。"2月28日，谷寿夫再次向法庭提出要求传讯田边盛武等人，以"明确事件的真相"。南京法庭再次予以拒绝："田边盛武等人均系参与会攻南京之高级军官及参谋长官，对于实施有计划之南京大屠杀事件，本有共犯嫌疑，纵使该嫌疑犯等到庭为被告所预期之陈述，亦不外瞻徇袒庇，自难据为被告有利之判决。兹被告犹斤斤请传该嫌疑犯等到庭作证，无非借端希图延宕。"1947年3月10日，南京法庭对谷寿夫进行最后一次公审，谷寿夫黔驴技穷，硬说南京法庭对他提出的证据都是假的，中国公诉人指出，对南京法庭提出的铁证，谷寿夫竟以空言抹煞，妄指为伪造，可谓毫无理由。综上各点抗辩，均属狡展图卸，殊无可采。

谷寿夫又臭又硬，蛮横地为自己辩解，反复叫嚷："我并没有下达过肆虐于华人的命令。"证人郭岐怒发冲冠登台质问："谷寿夫，我请问你，在日军攻陷南京以后，你是否曾经下达过命令，解散军纪三天？"谷寿夫遭此致命一击，被击中要害，瞠目结舌，无言以对，重重地低下了头。整个法庭鸦雀无声，都将愤怒的目光射向谷寿夫。

这时，南京法庭庭长石美瑜徐徐站起，威严地逼视着谷寿夫，以铿锵有力的声调，开始宣读《战犯谷寿夫判决正本》，根据《海牙陆战规例》、《战争罪犯审判条例》，作出庄严判决："谷寿夫在作战期间，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处死刑。"整个法庭立刻欢声雷动，几乎所有的人全都霍然起立，纵情欢呼，泪水横流，感激为中国人民和人类和平伸张正义的法官们，只有谷寿夫一人低下了头，俄顷又强作镇静，向审判席上鞠躬致意，法庭听众眼见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俯首认罪，真是人心大快，扬眉吐气。

1947年3月18日，南京军事法庭将对谷寿夫的判决书和他的"申请书"一并备文呈述国民政府主席及参谋总长审批。

4月25日，南京军事法庭接到国民党政府防字第1053号卯有代电批复："查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既据讯明确，原判依法从重处以死刑，尚无不当，应予照准。至被告声请复审之理由，核于陆海空军审判法第四十五之规定不合，应予驳回，希即遵照执行。"1947年4月26日中午，谷寿夫被从南京国防部军法看守所提出来，押往雨花台刑场，沿途10多万民众观看，无不拍手称快。

法警将谷寿夫押到雨花台刑场，法官高声点名，验明正身，检察官宣读行刑执行令，按行刑习惯做法询问："你还可以做最后陈述。"谷寿夫叹口气，想了想缓缓抬起戴镣铐的双手，吃力地从口袋里掏出事先缝好的一个白绸小口袋，递给检察官，低声请求说："袋里面装有我的头发、指甲和一首诗，请先生转寄东京都中野区富士町53号我的家属，让我的身体发肤回归故土。"中国检察官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接受了谷寿夫的小口袋和请求，然后递给他一管毛笔，让他在法庭笔录上签字。

谷寿夫顿觉这管毛笔有千钧之重，不由想起他当年率领日本侵略军进行南京大屠杀犯下的滔天大罪；想起被押到南京后他给石美瑜庭长呈送过"

愿书",要求对他"宽延公审",又向南京军事法庭呈送"申辩书",百般为自己的罪行辩解,又向国民政府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上书,请求"赐阅"他的"申辩书";想起在从山东中路到中华门、雨花台的刑场途中,道路两旁人山人海,观者如潮,几乎阻断了道路,如果没有数以千计的中国军警做疏导阻挡,他恐怕到不了刑场就会被愤怒的南京市民撕得粉碎。

谷寿夫想到这里,知道大势已去,必死无疑,就用颤抖的手握着那管给他送终的毛笔,无可奈何地在法庭笔录上签了字。

南京法庭庭长石美瑜见谷寿夫已在笔录上签字,有关手续均已完备,就威严地下达了行刑命令。两个宪兵冲上前来,将已带戴镣铐手的谷寿夫五花大绑,在背后插上一块木质斩标,上写"战犯谷寿夫"。

雨花台周围的山上,挤满了成千上万群众,挤在最前面的是被害人的家属和亲友,欢欣鼓舞,欢声雷动,都来观看屠杀南京人民的罪魁祸首谷寿夫应得的可耻下场。谷寿夫腿软脸白已不能举步,被法警拖着进入刑场,宪兵大喝跪下,谷寿夫吓得跪倒在地,宪兵怀着深仇大恨一枪击中后脑,已被吓瘫的谷寿夫应声倒地,终于在他屠杀南京人民的地方结束了他罪恶的生命,遭受大屠杀的南京人民终于报仇雪恨。

整个南京城沸腾了,到处都在观看南京军事法庭张贴的大快人心的布告:"查战犯谷寿夫。.....判处死刑。转奉国民政府主席本年4月25日防吕甚字第8375号卯有电核准执行,各在案。遵于本月26日上午10时由本庭检察官将该犯谷寿夫壹名提案,验明正身,押赴雨花台刑场,依法执行死刑。除呈报外,合亟布告周知。此布。" 杀人狂--酒井隆!

原侵华日军第二十三军司令官酒井隆是被中国军事法庭处以死刑的第二个高级将领。

酒井隆生于1887年,曾任日本驻中国公使馆副武官,驻济南武官、参谋本部作战部中国课课长、驻天津日军参谋长、参谋本部部附第14师团第28旅团长、张家口特务机关长、第23军司令官。日本投降后,酒井隆因战犯嫌疑被中国政府扣留。

1946年5月30日,南京军事法庭开始对酒井隆进行公开审判。酒井隆一开始就说他不像谷寿夫那样纵使部属杀害十几万中国人,他一直对中国"友好"。中国公诉人马上指出他在中国作恶的时间长,范围广。

公诉人首先指控酒井隆早年参与制造济南惨案的罪行。

1928年4月,北伐军进驻济南,当时任日本驻济南武官的酒井隆向日本陆军参谋总长铃木庄六发电,认为山东局势混乱,北伐军有可能退却,济南与青岛、天津的联系被切断,济南即将陷入孤立,日本出兵的时机已到,应以保护日侨为借口,要求日本政府第二次出兵山东。日本内阁会议根据酒井隆的请求,通过了日本第二次出兵山东的决定。4月25日,日军第六师团5000余人入侵青岛,酒井隆擅自要求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率军进入济南,与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形成对峙局面。

酒井隆通过日本浪人佃信夫获悉蒋介石请佃信夫与日军交涉,允以中国负担日方军费为条件,要侵略济南的日军撤回青岛,酒井隆便和福田师团长决定进攻中国军队。

为欺骗蒋介石,福田彦助派酒井隆等3人5月3日早上8时拜会蒋介石,诡称中国军队进入济南,"军纪风纪都很好,很守秩序",日军今天就要撤离济南,特来辞行。

酒井隆见蒋介石信以为真，回去后就下令日军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

酒井隆鉴于日本侵略济南兵力不足，5月3日给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拍发电报称，第六师团正在进行紧急部署，冲突事件正在交涉之中，请求日本政府“采取断然措施”，快快增兵。

5月4日，13名走私鸦片的日侨被依法处决，酒井隆向日本陆军省上报情况时竟说，“济南有300多名日本侨民遭杀害”，陆军省发布新闻时又将被杀日侨人数扩大了23倍。连日本外务省也认为酒井隆的报告不正确，反对接受酒井隆和福田彦助的增兵要求。

酒井隆蓄意挑起冲突，在法庭上却百般抵赖，中国公诉人在法庭上拿出一本日本历史文献记载当庭宣读：“（济南惨案）一说系由酒井武官密令特务机关之一员，在中日两军之间向双方射击而引起。”酒井隆蓄意挑起济南惨案，导致中国军民死亡6123人，伤1700多人，财产损失达2957万元。酒井隆的罪行引起法庭听众的强烈愤慨，呼喊口号要求严惩不贷！

接着，中国公诉人指控酒井隆1935年逼其中国签订《何梅协定》侵略华北。

原来，1935年5月，在天津主办亲日报纸的胡思溥、白逾醒相继被杀；在热河南部进行抗日活动的孙永勤部队在关东军追击下退入遵化县。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和日本驻北平公使馆副武官高桥坦密商，向日本参谋本部次长杉山元发电，借这两件事大做文章，要把东北军和国民党在华北的势力逐出华北。

得到日本参谋本部批准，酒井隆和高桥坦1935年5月29日会见北平军分会代理主席何应钦，声称胡思溥、白逾醒被杀和孙永勤部队进入遵化停战区活动，是中国方面扰乱日本的行动，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华北，“日军不仅有必要再次越过长城一线，而且实际上北平、天津两地，也有必要包括在停战地区之内”。

6月8日，酒井隆在天津召开驻天津日军、关东军及日本驻山海关、上海、北平等武官参加的会议，决定“以武力为后盾，采取强硬态度”。6月9日，酒井隆和高桥坦再次会见何应钦，要求撤换驻守河北的第51军军长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撤换天津市长张廷谔、罢免在天津的宪兵第三团长蒋孝先，等等。

为压何应钦让步，酒井隆亲自起草了《何梅协定》备忘录，逼何应钦签字，备忘录如下：“迳启者：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

此致，梅津司令官阁下。何应钦民国24年7月6日。”何应钦呈请蒋介石批准，签署了《何梅协定》，使酒井隆提出的侵略华北的要求全部得到实现，酒井隆因功被提升为参谋本部部附第28旅团旅团长，“七七事变”后率军入侵中国，在河北、山西、河南烧杀抢掠，无所不为。

夺取内蒙，使内蒙成为第二个“满州国”，是日本侵略华北的重要步骤。为此，酒井隆1938年6月，被任命为张家口特务机关长，当即赶往张家口组织伪政府。1939年3月，酒井隆被日本内阁中的专门处理中国问题的“兴亚院”任命为蒙疆联络部长官，将其晋升为陆军中将，1940年3月改任侵华日军驻蒙军军附。

酒井隆大量收集网罗内蒙、察哈尔、北平、绥远、山西等地的汉奸，拼凑了“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以云王为主席，德王为副主席，李守信为蒙

古军总司令。酒井隆指挥伪蒙军队向国民党军队进攻，他为伪蒙军打气说：“假若察蒙军队打了败仗，我就说服天津驻屯军田代司令官，调日本皇军参战，如若食言，叫我将来被支那军事法庭枪毙！”酒井隆鼓动伪察蒙军在红格尔图、百灵庙等地与中国部队作战，被汤恩伯部队打得落花流水。

酒井隆一面派侵华日军向绥远增兵，一面成立“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蒙疆电业株式会社”、“蒙疆电器通信设备株式会社”、“国际运输公司”、“东亚烟草公司”、“蒙疆造纸公司”、“蒙疆不动产株式会社”、“蒙疆兴业株式会社”等经济侵略机构，陆续强占了龙烟铁矿、大同煤矿、下花园煤矿，垄断了华北金融、烟草、电力、食盐等的开发、出售，进行殖民地剥削，用刺刀尖掠夺华北财富，用以支持日本的侵华战争。

1940年6月，酒井隆奉调回国，任留守近卫师团师团长；1941年11月再次返回中国，任驻广州的侵华第23军司令官。

1941年12月7日，酒井隆到广州赴任，恰在此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大本营在袭击珍珠港的同时，下达了攻占香港的命令，命酒井隆指挥其主力部队协同海军从陆地正面迅速攻占香港和九龙半岛。

酒井隆在进攻香港前，先在广东大开杀戒，恣恣、放纵部下毒打孕妇，轮奸妇女，然后用刺刀挑开中国少女腹部，用少女的鲜血喂酒井隆豢养的狼犬。

1941年12月8日凌晨4时，酒井隆作为日本进攻香港方面的最高指挥官发布进攻香港的命令。他首先命令日本航空兵消灭在香港的英国空军，夺取香港的制空权，然后令步兵占领广州沙面英租界地，再令日军第38师团从正面进攻香港。

中国将军陈策率部协助英军抵抗酒井隆的进攻，由于英军毫无斗志，日军12月13日占领九龙半岛。酒井隆对固守香港的英军两次提出劝降，又发出最后通牒，遭英军拒绝。从12月18日夜间开始，酒井隆命日军第51师团和第66联队在日本海军第二遣华支舰队和飞机、大炮支援下，向香港发动猛攻。酒井隆命日本飞机轰炸香港启德机场，强行在香港登陆，经7天激战，香港总督杨慕琦12月25日宣布投降，英军被击毙1500余人，15000余人被俘。

1941年12月25日下午，香港总督杨慕琦在香港半岛酒店向酒井隆献上降书。12月26日上午，酒井隆骑着高头大马在皇后大道举行入城式。在日本任命的香港“总督”矶谷廉介抵港赴任前，酒井隆作为“代理总督”，对香港进行了两个月血腥大屠杀。

为报复香港的中国人和英军对日军的抵抗，酒井隆命令日军官兵以搜捕反日分子为名，疯狂地进行大屠杀：凡是日本侵略者认为可疑的人，都开枪射杀；见妇女就强奸，遇财物就抢劫，很快便使香港、九龙尸体遍地，血流成河，根本不去掩埋，一任横尸通衢。

酒井隆的部队还肆意虐杀、侮辱俘虏。公诉人宣读英国、加拿大转来的控诉材料，指控日军官兵将英国炮手麦当诺、加拿大枪手麦克等俘虏，丧心病狂地挖眼睛，割石头，凌迟致死，特别控诉书说：“倒卧（香港）红十字医院病榻疗伤之英籍病俘，悉遭刺杀或枭首，刀剑砰轰与呻吟哀号齐鸣。红十字会英籍女护士戈登等并遭轮奸。”南京法庭庭长石美瑜命公诉人宣读原香港“副总督”平野茂的证词，平原茂称：“香港居民通过日中、日俄之战以及这次香港之战的亲身体会，充分了解日本军队是极其无人道的野蛮、残

忍的军队。

占领香港初期，家家紧闭双扉，一连多天路无行人。妇女害怕被强奸，雉发改扮男装以避凶险，许多妇女为了逃避被奸辱的厄运，穿上普通老百姓的衣服，加上补绽，脸上用墨或用泥涂黑，在天明前或深夜逃过日本警备部队的警戒线，陆续潜往广东腹地或向桂林、上海逃亡。逃亡的数字很大，我记得那时有名的中国女电影明星胡蝶就是逃出香港的。"公诉人又指控酒井隆指挥日本侵略军在广州汕头附近及海南岛北部，进行"治安作战"，为"警备主要交通运输线"，酒井隆指挥部属疯狂地屠杀百姓，犯下滔天罪行。

日本投降后，香港同胞强烈要求香港总督杨慕琦出面引渡酒井隆，还控诉酒井隆在九龙兽性大发，看见一对年轻夫妇在街上相偎而行，他抽出军刀在这对夫妻身上各刺一刀，又不将其杀死，眼睁睁看着这对恩爱夫妻在马路上痛苦挣扎，哀号而死，酒井隆在一旁哈哈大笑，以此取乐。

香港总督杨慕琦和他手下的重要官员作了日本的俘虏后，都曾被酒井隆关进集中营，受尽凌辱、折磨，无不对酒井隆恨之入骨，因而一致呈请英国政府，从中国引渡酒井隆中国国民党政府接到英国的请求书，也早想逮捕他。不知道酒井藏在何处，就命军统局在北方的负责人张家铨设法逮捕酒井。

张家铨动用军统局特务系统力量追查酒井隆下落，很快查到酒井 1943年3月调任参谋本部部附，日本投降前辞去军职，到北平经商，想利用北支派遣军司令官根本博是他的老部下的关系，利用日本侵华势力在北平搜刮一笔钱再远走高飞，岂知美梦未做完就赶上日本投降，酒井隆自知欠中国人血债太多，就在根本博庇护下躲藏起来。

张家铨先找到根本博的参谋长、日寇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渡边渡，编造理由说要从酒井隆那里搜集中国共产党的情报。酒井隆疑心疑鬼，又惹不起军统局特务，便让根本博和渡边渡陪他来见张家铨。

张家铨见鱼儿上钩，就借口要酒井隆详细提供中国共产党的情报，把根本博和渡边渡打发走，才命人将酒井隆逮捕，立即架上汽车，派早已准备好的飞机送往南京，交国民党陆军总部监狱收监待审。

英国得到酒井隆被捕的消息，再次通过外交途径要求引渡他到香港由英方审判，中国考虑到酒井隆固然在香港作恶多端，但他作为侵华巨魁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的上级长官，在中国大陆做了更多的坏事，应由南京军事法庭审判。

英国政府要求引渡酒井隆被拒绝，又退一步要求派法官参加审判，国民党政府仍然严词拒绝，因而审判酒井乃由中国单独进行，仍由国防部审判战犯法庭负责审理，审判长仍由石美瑜担任，审判地点仍选在南京。

1946年5月30日，南京军事法庭对战犯酒井隆开庭审判，8月20日进行第二次公审，一致认为他比谷寿夫罪恶更重，他不仅和谷寿夫一样纵兵杀人，而且亲自挥刀杀人，甚至从北伐战争起就参与制造济南惨案，中国外交交涉员蔡公时就是酒井隆带人杀害的，他在中国作恶时间之长，手段之恶劣，都超过土肥原和板垣，8月27日，正式判处酒井隆死刑。

9月30日下午3时，中国法警将酒井隆五花大绑，背上插着"战犯酒井隆"的醒目木牌，从监狱提出，押往雨花台刑常一路之上，许多南京市民早早等在预定经过的马路两旁，争睹这个日本侵华急先锋、杀人魔王的真面目。岂知这家伙早已吓得失去知觉，像烂泥一样瘫在汽车上。

雨花台周围的山上，早就沾满了对日本侵略者有深仇大恨的南京市民，

与酒井隆有血海深仇的许多香港同胞和英国受害者，也已久候多时，都要亲眼来看这个刽子手的可耻下场！

只见中国两名法警把早已吓得半死的酒井隆从汽车上拖下来，连架带拖拽到刑场，飞起一脚踢跪在地，射出复仇的子弹一枪毙命，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酒井隆被正法后，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索取酒井隆的判决副本，陈列在伦敦大英博物馆供英国人民翻阅，以慰被酒井隆和日本侵略者杀害的中英市民的冤魂，中国政府很快答应了英国的要求。

酒井隆被处决后，南京军事法庭通知日军善后联络部，冈村宁次、今井武天提出移交酒井隆遗体的要求，被拒绝。令人费解的是9月15日，中国国民党军队方面却为酒井隆举行正式葬礼，并让侵华日军高级将领参加，又把酒井隆的遗体葬在南京雨花台墓地，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

掠夺狂--矶谷廉介侵华日军第十师团长、香港"总督"矶谷廉介是经南京军事法庭审判、处死的又一个重要日本战犯。

中国公诉人首先控诉矶谷廉介作为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侵略华北的罪行。

矶谷廉介声称他继承其岳父、前日驻华武官青木宣纯的遗志致力于开发华北。公诉人揭露青木宣纯与坂西利八郎都是日本侵华特务巨魁，苦心培养了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等侵华巨头。

公诉人控诉矶谷廉介勾结土肥原贤二等策动华北“自治”活动，叫嚷中国政府若反对华北“自治”，“必将触犯关东军兵力”，迫使国民党政府改变华北行政体制，1935年12月18日设立了半独立性质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将华北危机推到极点。

为把华北变为日本的殖民地，矶谷廉介以日本驻华使馆武官身份向《读卖新闻》记者发表谈话，吹嘘日本军部的侵略华北方针，利用汉奸进行“经济开发”，促进“自治”分化华北，增加日本侵略华北兵力以显威势。

矶谷廉介利用日本浪人挤走中国缉私队，把日本的人造丝、布匹、糖、酒精、毛制品、胶鞋等商品潮水般涌进华北，让日本浪人四出兜售，又私运白银出口，使中国经济遭受沉重打击。

矶谷廉介命日本浪人在天津日本租界开办毒品工厂，制造吗啡、海洛英，通过中国地痞流氓销往中国各地，瓦解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削弱抗日力量，矶谷廉介叫嚷要用枪炮、鸦片一举灭亡中国。

公诉人指控矶谷廉介勾结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特务头目炮制华北傀儡政权。

土肥原、板垣征四郎企图让吴佩孚出来充当华北伪政权首领，遭到吴佩孚严词拒绝，土肥原和板垣向矶谷问计，矶谷廉介想出一个主意，他说：“我以前常听我岳父青木宣纯中将谈起支那政情，他特别强调，将来日本占领北平时，可以请满清遗老王士珍、江朝宗出面组织过渡政权，现在王士珍已死，仅剩江朝宗一人，何不请江朝宗出来，暂时维持秩序。”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人都赞成矶谷廉介的意见。矶谷又说：“江朝宗脾气很倔强，若由日本人去请，恐怕不会答应，最好鼓动中国商人出面，再配上几个市民代表，恳求他出来拯救全城生灵，他就不会推辞了。”土肥原和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德太郎按矶谷廉介的办法行事，终于策动江朝宗投敌，1937年7月出任北平治安维持会委员长兼北平市市长，同年12月北平治安维持会并入华北中华民国伪临时政府，江朝宗改任临时政府议政委员会委员，

都是矶谷廉介和土肥原在背后操纵。

北平临时伪政府建立后，土肥原和矶谷廉介为建立长期伪政权，让板垣征四郎去请吴佩孚出山，吴佩孚根本不与日本人见面。土肥原便命矶谷廉介去请前北洋政府总统曹锟出山。

矶谷廉介说：“新政权的首脑，原来就准备请曹锟和吴佩孚，吴佩孚既然不肯出山，只有去找曹锟。假若能把曹锟捧出来，吴佩孚最后还是会追随他的老师的。

矶谷廉介利用他岳父青木宣纯与曹锟的老关系，到天津去见曹锟，甜言蜜语拉拢说：“这次的日中战争完全出自偶然，敝方事先绝无计划，所以打到什么地方为止，要看大局的发展。至于平津的善后及整个华北的局势，应该怎么收拾，敝国当局很想听听总统的意见，所以特派晚辈来请示。”曹锟在民族大义面前保全晚节，严词拒绝了日本军方要他出山的请求。矶谷无奈，只得让王克敏就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和新民会会长。

1942年2月20日，日本的香港占领地总督部正式在香港建立，矶谷廉介因侵略华北有“功”，被任命为香港“总督”。

矶谷廉介走马上任时，日本首相东条英机通过香港副总督平野茂向矶谷廉介下达三点指示称：一、香港是英国国有大量物资的地方，但是英国人巧妙地收藏起来了，日军必须对这些物资进行彻底搜查，并立即运回日本；二、对于敌军不可宽容，不可给予良好食物，只能维持他们不死的待遇；三、对于收容集中营的外侨，不得让他们夫妇同居，应各别禁闭。”矶谷廉介把他的总督府设在香港原汇丰银行15楼，在大厦前悬挂着香港占领地总督部的招牌，还贴出矶谷廉介署名的一张布告：“香港乃日本的占领地，尔等香港居民须绝对服从总督，若有违反，定予严惩不贷。”矶谷廉介命令日本的香港副总督平野茂制定了血腥屠杀香港人民的法令，可以随心所欲地给香港居民扣上对敌提供情报的罪名，将无辜居民逮捕、拷打，把他们打成残废，甚至打死了事，或者以莫须有的罪名，将香港居民打个借口当作“地下工作者”送上军法会议处死。矶谷廉介纵使部下对中国人民施加的非人道的暴行层出不穷。日军攻占香港后很长时间内尸骸遍地，以后也经常屠杀无辜，使整个香港陷入极度恐怖之中。

矶谷廉介特别制定了《军法会议法令》，这是最惨无人道的杀人法令，只要认为任何香港居民“有阻碍军政法律实施的行为，有通敌或不稳的嫌疑或行为”，就严刑拷打，草菅人命。

为破坏香港经济，矶谷廉介下令制定进出香港规定，人员要经过3星期调查、商贩要办一个星期的手续，就使进入香港的人和货物大量减少，又制定通货法令，规定日本军票1元兑换港币8元，一夜之间就将香港人的财产夺去四分之三，把香港居民推入饥饿的边缘。

矶谷廉介下令，“凡在山林中砍折树枝者一律枪杀”，凡在黄昏后灯光外泄者，都要受严厉处分。为此，夺去了许多香港人的性命。

为提高日本侵略军士气，满足他手下士兵的性欲，矶谷廉介下令在香港傍海的湾仔一带建妓院，出动宪兵端着刺刀逼居民马上搬走。许多人来不及携带财物就拖儿带女被赶出家门，然后用铁马封锁街道，修设了500家军队妓院，供日本官兵玩乐。矶谷廉介则挥霍200万日元巨资修建豪华的香港总督官邸，把日本著名艺妓小松从东京接来玩弄，还把香港酒馆的女掌

柜和她的妹妹召进总督府供他侮辱。

为修建香港神社，矶谷廉介派日本士兵赶走2000户居民，拆毁400间房屋，向香港市民搜刮200万日元，逼得无数香港居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矶谷廉介疯狂地推行香港疏散政策，出动日本侵略军“围捕疏散者”，强行使香港人口从150万减少到70万人。他派出日本士兵开着军用卡车乱闯，见人就开枪逼着拉上汽车运走，并在临时修起的收容棚寮里，凑够2000人就装一机动帆船，运往中国大陆或东南亚，途中因风暴被风浪打翻惨死者不计其数。日本官兵借此公然白昼在大庭广众前强奸妇女，无恶不作。

矶谷廉介还命他的副总督制定仓库法，接受了英国多年来为在亚洲进行贸易修筑的巨大仓库，掠夺走英国从澳大利亚、中国和东南亚运来的大量商品、物资、器材，香港财务部长中村惊喜地向他报告说：“香港仓库区长达两公里，比东京--横滨间的仓库量还多5倍，物资数量多得惊人，非两年半时间不能整理清楚。”矶谷还将香港许多人的私有财产当作“敌产”任意没收，对前来要求发还个人财产的人都以“阻碍香港军政的执行”，格杀勿论。

矶谷廉介把从香港仓库中没收的大量鸦片，运到汇丰银行一楼亲自监管，然后秘密运往中国大陆出售，将其称为“用中国人愚化中国人的鸦片政策，既可麻痹中国人的抗日斗志，又能赚取大量金钱，再用于扩大侵华战争。

由于矶谷廉介在中国大肆屠杀无辜百姓，罪行累累，中国军事法庭判处他死刑，验明正身后拉到刑场枪决，为受害的中国人民报仇雪恨，无不拍手称快。

处决刽子手--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

南京军事法庭又对在南京进行“杀人比赛”的暴徒向井敏明、野田毅和一手屠杀我南京同胞300余名的刽子手田中军吉等3名战犯，进行审判并处决，奏响了庄严审判、处置日本战犯的又一曲正气歌。

战犯向井敏明是日本山口县人，日本高等商业学校毕业，20岁时任中岛师团（16师团）片桐部队富山大队副官。野田毅比他小一岁，1937年6月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任富山大队炮兵小队队长。

1937年9月，向井敏明、野田毅随中岛部队入侵天津、大沽，11月入侵白卯口，12月入侵南京，都是大屠杀的刽子手。

1947年5月8日，“中国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作出决议，对日军在南京进行杀人比赛的战犯要先行引渡审理。5月20日，中国外交部要求中国驻日代表团向驻日盟军总部接洽，请求引渡战犯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即野田岩。

经中国驻日代表交涉，向井敏明、野田毅分别于9月2日、8月20日在东京被驻日盟军派国际宪兵逮捕归案，交给中国驻日代表团。中国驻日代表团旋即派中国宪兵上尉骆炳钟押解这两名战犯，于1947年10月25日乘和顺轮抵达上海，关入上海战犯拘留所。

1947年11月6日，国民政府国防部上海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向井敏明、野田毅进行侦讯，两个战犯矢口抵赖。上海法庭正研究新的审判方案时，接到南京来电，即将这两个刽子手从上海押到南京，关押在南京小营战犯拘留所。

南京军事法庭法官龙钟煜等人立即对向井敏明、野田毅进行侦讯。两人供认同在侵华日军第十六师团任职，1937年12月中旬侵入南京市郊

麒麟门，翌年1月8日左右离开江苏省，参加侵略华北的作战。

这两个刽子手中失去杀人的武士刀，自然就失去了当年挥舞军刀进行大屠杀时的法西斯军威。35岁的野田岩个子虽小，但却狡诈异常，为逃避罪责，早就想好了狡辩之词，此时抢先为自己开脱罪责说：“日本随军记者浅海和我开玩笑说，‘已将你在南京杀了100多人的消息寄回日本，可以请奖’，我当时就告诉他这个玩笑开不得。”比野田毅大一岁的向井敏明更否认自己的罪行，一口咬定根本就没有进行过杀人比赛。

年轻法官龙钟煜感到这个案子很棘手。庭长石美瑜递过一张报纸，龙钟煜接过一看，见是一张日文报纸《东京日日新闻》，以醒目的位置刊登了这样一幅照片：两个高矮不同的日本军官一人举着一把日本武士刀，狰狞狂笑，标题是《超纪录的百人斩》，照片左侧有几行引人注目的注释：“百人斩竞争之两将校”，津津有味地报道：向井少尉与野田少尉举行杀人的友谊比赛，谁先杀死100个中国人，谁就算赢得了锦标。在他俩碰头的时候，向井已杀了106人，野田已杀了105人，两人拿着砍缺了口的军刀相对狂笑。他俩虽都超过了100人的记录，但无法断定谁是先杀够了100人的胜利者，两人同意不以百人为标准，而以150人为标准。

中国法官龙钟煜再看这张日文报纸是1937年12月的《东京日日新闻》，照七上挥舞屠刀的两个日本军官正是向井敏明、野田毅，而写此报道的日本记者正是浅海，惊喜地问这张报纸是从哪里搞到的？真不易呀！

石美瑜庭长说：“是中国驻口军事代表团和参加东京法庭的中国检察官，遍翻日本报纸找到的--怎么样，对审判这两个日本战犯有信心了吗？”龙钟煜脸上显出兴奋的笑容，一个新的侦讯方案迅速形成：“就从浅海着手。……”1947年11月15日，南京军事法庭再次侦讯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两人仍异口同声否认有杀人比赛，龙钟煜不慌不忙问道：“你们认识日本随军记者浅海吗？”矮个子野田毅马上回答：“浅海是认识的。”高个子向井敏明也再次招供认识浅海。

龙钟煜将大手一挥：“把战犯带走--认识浅海就好办了！”1947年12月4日，南京军事法庭正式对向井敏明、野田毅起诉，起诉书称：“七·七事变后，被告等随军来华，民国二十六年12月5日，于我江苏句容县入城时，向井杀我国人89名，野田杀78名。

同年12月11日，南京攻城战，该被告等复作杀150人之比赛于紫金山麓，向井杀106名，野田毅杀105名。胜利后，经东京盟军总司令部逮捕。……“右列事实，业经敌随军特派员浅海光本及浅海铃木等，先后将目睹情况电达东京各报纸连篇登载，万口争传，誉为勇壮，并经远东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办事处检获之东京日日新闻可资考查核对，该报所登载被告等之相片，亦属相符，证据确凿，自难任其空言狡展，免除刑责。核其所为，实不无构成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二条第二款、第三条第一款之罪之重大嫌疑。查该被告等共同实施犯罪行为，依法皆为正犯。又其以同意思连续而为同一行为，应从一重处断。”1947年12月18日，国防部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在南京励志社（今南京市中山东路307号）对战犯野田毅、向井敏明进行公审。

公开审判那天，励志社大礼堂布置一新，庭长石美瑜偕法官、检察官、书记官端坐审判席上，整个法庭内外座无虚席，人群仍像潮水般涌来，法庭又在庭外安装广播器材，以满足南京人民迫切要求观审日本刽子手的愿望。

在被告席上，向井敏明、野田毅竭力否认有杀人比赛之举。龙钟煜愤怒地出示浅海光本等人在《东京日日新闻》上的报道和照片，野田岩两个硬不认帐，龙钟煜又出示1937年12月英文《日本公告报》的文章，文章指出：“向井敏明少尉和野田毅少尉举行杀人友谊比赛，看谁能在完全占领南京之前，首先杀死100名中国人。现在他们的比赛要接近尾声。朝日新闻从前线发回的报道说，星期日，他们的比赛成绩如上：向井敏明少尉杀死89人，野田毅少尉杀死78人，目前胜负难以分清，比赛还在继续。”石美瑜庭长不给战犯喘息之机，又指示法官龙钟煜出示1937年12月《大美晚报》的文章有力控诉说：“（1937年）12月10日中午，两个日本军官各执已成缺口之刀，会聚一起。野田说：‘我已杀105人，你杀了多少？’向井说：‘我都已经杀106人了。’两人相视哈哈大笑，向井多杀了一个人，但无法确定谁先杀到100人。两个相约将比赛目标发展到150人。从昨日开始，他们已向杀150人的目标努力。”龙钟煜谴责两个战犯的杀人比赛受到日本军部的大力宣传，日本各地吹捧杀人精神的信件雪片般飞到中岛部队，许多日本青年受到蛊惑，挥舞起日本武士刀到中国进行丧心病狂的大屠杀。

公诉人又出示英国记者田伯烈所著《日军暴行事实》，有力地做出结论：综上参互以观，则被告向井敏明、野田毅系南京大屠案之共犯，实属毫无疑义。

被告向井敏明情知无可讳饰，掠着他那一撮浓密的八字胡子细思活命之计，他突然双眼一亮，硬着头皮竟然说：“《东京日日新闻》系虚伪登载，记者浅海专为我颂扬武力，以博日本女界之羡慕，希望能早日获得佳偶，因此毫不足信。”短个子野田岩暗暗对向井敏明的主意称奇叫绝，赶紧顺着杆子爬了上来：“对，我那时个单身汉，为了回国后好找老婆，所以找记者浅海虚构了这条消息。没想到这虚构的消息竟然传遍日本，传遍世界，今天反倒成了要我们命的证据，真是天大的冤枉，真后悔死了！”公诉人据理驳斥说：“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当局对于军事新闻之统制检查本极注重，而《东京日日新闻》系日本重要媒体，如果该被告等并无此杀人竞赛之事实，绝无故为虚构以巨大篇幅专为该两个被告等宣传之理。况该项新闻之登载，既经本庭引用上开各项确凿证据予以证实，即非通常传闻者可比，自得据为判决之基矗至谓以杀人为竞赛之凶残兽行，可作征婚广告，以博女性欢心，更为现代人类史上所未前闻。其抗辩各节，均属无可采龋”野田岩被驳得哑口无言，又要求调查事实证据。庭长石美瑜当即宣布：“本案被告等声请调查证据，延期审理一节，经法庭评议后，认为无再进行调查证据之必要，当庭裁定驳回。”1947年12月18日下午，南京军事审判法庭庭长石美瑜庄重地宣读对向井敏明、野田岩两个杀人魔王的判决书：“按被告等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系违反海牙陆战规例及战时俘虏待遇公约，应构成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其以屠戮平民，认为武功，并以杀人作竞赛娱乐，可谓穷凶极恶，蛮悍无与伦比，实为人类蠹贼，文明公敌，非予尽法严惩，将何以肃纪纲而维正义。”石美瑜庭长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华民族庄重宣告，将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向井敏明、野田岩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这时，整个法庭沸腾起来，有的鼓掌，有的欢呼，有的受害家属为自己的血海深仇终于伸冤雪耻，激动得失声痛哭：“苍天有眼，杀人魔王，你们也有今天哪！”被告席上，整整10年前肩膀并着肩膀，军刀挨着军刀的

两个杀人魔王，现在又肩并肩低下了头。……与此同时，另一杀害300个中国人的杀人狂田中军吉也受到严正审判。

战犯田中军吉1905年生于日本东京，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进入谷寿夫的第六师团任大尉中队长。

日本投降后，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在搜集审判日本战犯的材料时，发现了曾屠杀300个中国人的杀人狂田中军吉，便于1947年4月25日以中国驻日代表团的名义致电南京中国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希望将此人为战犯，函请驻日盟军总部迅速将其逮捕，以便引渡来华受审。

中国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迅速将此问题请示国防部审判战争罪犯军事法庭，5月4日得到批准：“查南京大屠杀案共犯松井石根等17名，前经本庭列单提请钧会（中国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核列战犯名单并引渡审理在案。现应将杀人凶犯田中军吉列入战犯名单，并案办理。”经中国外交部与驻日盟军总部联系，田中军吉被美国宪兵缉捕归案，引渡给中国驻日代表团，被用“建国号”飞机于1947年5月18日押抵上海战犯管理所收容，旋即转押南京小营战犯拘留所。

5月29日上午，南京军事法庭检察官李璿对田中军吉进行初次讯问。李璿质问道：“查被告田中军吉作为谷寿夫师团的中队长，共屠杀中国军民300余人。”42岁的田中军吉急忙矢口否认：“这不是事实，我没有在南京杀人。”李璿拿出田中军吉挥舞军刀砍中国人脑袋的照片，辛辣地讽刺说：“东京报纸上印着你的照片，说你作战很勇敢埃你否认这张照片吗？”田中军吉把大脑袋摇得拨郎鼓一般，舞动三寸不烂之舌辩解说：“照七上的人似乎很像我本人，不过并不是我。……”中国检察官又出示日本的《皇兵》一书，书中印有田中军吉屠杀中国300余人的“助广”军刀，其中还有署名田中军吉的文章。在事实面前，他供认“我曾投稿于是《皇兵》一书”，但诡称“我只在战场上杀过人”。

1947年9月20日，南京军事法庭决定对田中军吉提起公诉。理由是田中军吉1937年七七事变后来华充任侵华日军第六师团中队长，在谷寿夫率领下参与南京大屠杀。他在作战期间，违反战争法规及惯例，肆意杀戮中国旗民，并持刀砍杀绑跪不知姓名之中国人一名，查获其斩杀300人之队长爱刀助广之照片一张为证，因而必须作为战犯予以严惩。

1947年12月18日，南京军事法庭决定将战犯田中军吉与向井敏明、野田岩合并审判，在南京励志社礼堂开庭公审。

田中军吉在法庭上百般抵赖，只承认在战场上杀过人。检察官出示他挥舞军刀杀人的照片，他看照七上确实是自己，无法抵赖，心头一阵慌乱，暗想这次必死无疑，绝望之中，忽然看到他在照七上只穿着内衣，就抓住这根稻草辩解说：“法官先生，请看照片，我系穿衬衫，显在夏天，而攻占南京却是在冬天，可见该照片仅能证明本人在另一地方斩杀一人，不能以此证明我在南京杀了300人。”法官龙钟煜当即严词驳斥说：“被告所言纯属狡辩之词，要知道他在挥刀奋力猛斩之际，为便利动作，纵在冬令脱卸外衣，本属常事，而且连续斩杀300余人，怎能不热？事实俱在，已不容斤斤执此，希图避就，且其参与南京大屠杀之事实，已属众证确凿，有如上述，更奚容借端狡展之余地！”田中军吉被驳得哑口无言，南京军事法庭严肃做出判决：“被告田中军吉系已决犯谷寿夫之直隶部属，在谷寿夫攻陷京城实施屠杀时，曾携‘助广’军刀参与，已为该被告所自承认之事实。……被告等连

续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系违反海牙陆战规例及战时俘虏待遇公约，应构成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

其以屠戮平民认为武功。……爰各科处极刑，以昭炯戒。"南京军事法庭将判决书和战犯的申辩书一并报送国民政府审批。1948年1月26日，国民政府主席批复：“被告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于战争期间，共同连续屠杀，既据审讯明确，原判依法处死刑，核无不合，应予照准。至被告等请复审理理由，核与陆海军审判法第45条各款之规定不合，应予驳回，希飭知照。执行死刑日期具报备查，判决及申辩书等书卷让发还。中正。（二十七）子寝。印”1948年1月27日，南京各大通衢路口都张贴大型布告，南京市民踊跃前往观看：查战犯向井敏明、野田毅（即野田岩）田中军吉等（即南京大屠杀共犯），在作战期间共同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罪证确凿，业经本庭依法判决，各处死刑，并呈报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转奉国民政府主席蒋本年1月26日（37）柱胶字第0005号子寝代电核准，飭即执行具报等因。遂于本月28日正午12时，由检察官将战犯向井敏明、野田毅（即野田岩）田中军吉等3名提案，验明正身，押赴雨花台刑场执行死刑，以昭炯戒。除呈报外，合丞布告周知。此布。

1948年1月28日，战犯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被押赴南京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成为中国人民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情。

2、广州审判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中国政府在广州设立军事法庭，审判侵华日军第二十三军司令官兼香港总督田中久一、旅团长期野仪一、日寇华南派遣军宪兵队长重藤宪文、华南派遣军宪兵队长野间助之贤，分别在广州、香港处以死刑，使全国人扬眉吐气，拍手叫好，在国际上也赫赫有名。

被送上断头台的“华南虎”田中久一田中久一被称为“华南之虎”，曾在广州、香港等地作恶多端，审判田中久一就成为广州、香港人民久已盼望的事情。

田中久一是日本兵库县人，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的高材生，又被选派到美国考察、研究军事，回国后青云直上，到1937年已由步兵大佐、步兵联队长升为陆军少将，1938年提升为侵台日军参谋长，疯狂地镇压台湾人民的爱国斗争，以屠杀台胞赢得“镇台之宝”的称号。

田中久一野心勃勃，他虽人在台湾，心却早已飞往中国大陆，特别是对华南地区的军事地理更感“兴趣”，时刻注意着日本向华南的侵略动态，暗中搜集华南的军事情报，迫不及待地希望日本把侵略战争扩大到华南，多次要求率军进攻华南，实现他征服华南的梦想。

为切断中国南方物资补给线，摧毁华南抗日根据地，日本大本营1938年7月31日制定了《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要纲》，决定配合武汉作战实施广东作战，明确规定：“广东作战的目的，是切断蒋介石政权的主要补给线，并挫败第三国，特别是英国的援蒋意志。”为实施广东作战，日本大本营下令编组第21军，下辖第5、第18、第104师团和第4飞行团等部队，特别决定起用熟知华南情况的侵台日军司令官古庄干郎中将和参谋长田中久一少将分任第21军司令官和军参谋长。

田中久一在日本接到任命，当天下午即于设在福冈右翼团体偕行社本部召集各兵团参谋会议，研究广东登陆作战细则。

第二十一军司令官当时尚在台湾，田中久一遵照古庄干郎的指示，9月16日在日本组成该军司令部，用10天时间赶写出《第二十一军作战计

划》，规定广东作战分两期实施：第一期从1938年10月12日开始，派主力部队在广东大亚湾登陆，经惠州向东江推进；第二期任务为等后续部队抵达后，兵合一处突破东江防线，向广州北方推进，进攻广州；另派一支部队在海军配合下，进攻珠江口虎门要塞。

田中久一的作战计划经日本大本营批准后，即命令日军第五、第十八、第104师团分别从青岛、上海、大连起航，向澎湖群岛的马公岛集结。他也率领第二十一军司令部从日本门司起航，经旅顺、上海，1938年10月2日到达马公岛。

10月4日，田中久一在马公岛下达《波集团登陆计划》，对参战各兵团下达向广东进军命令，他率军司令部于10月11日晚到达广东大亚湾。

当时，国民党政府认为日本一时尚不敢进攻广州，没有把广州作为重点防御地区，因而兵力空虚，防务松懈。

10月11日夜，田中久一亲自登上海军战舰在大亚湾观察战场，只见月光皎洁，海面风平浪静，中国守军毫无察觉，便下达了进攻命令。

10月12日凌晨，田中久一命3个师团分乘几十艘战舰，在百余架飞机掩护下，发起登陆作战。由于中国军队没有认真抵抗，田中久一部队从大亚湾、稔山、澳头、霞涌等处强行登陆，接着长驱直入，迅速向广州推进。

田中久一命航空兵出动飞机百余架，疯狂地对广州、军田等地和平居民，分19个批次实施狂轰滥炸。田中久一命令航空兵专炸居民区，炸死中国无辜百姓无数。

田中久一部队的暴行激起中国军民的强烈愤怒，中国军队紧急用粤汉铁路调兵遣将，在增城给日寇狠狠一击，打退了猖狂进犯的日本侵略部队。

田中久一接到部下被击退的报告非常气恼，丧心病狂地命令日本航空兵专门找人口密集的地区投掷炸弹。田中久一这一罪恶的命令一下，日寇官兵专向广州闹市投弹，造成灾难性后果。

据不完全统计，在日寇攻占广州前数日，田中久一命日寇炸死广州市民万余人，炸伤十几万人，使得广州大街小巷尸横遍地，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到处大火冲天，断壁颓墙，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在广州军事法庭上，田中久一狡辩说这是两国交战中的“正常伤亡，不足为怪”，激起旁听席上广州市民的强烈愤慨，人们咬牙切齿冲上前来，恨不得要扒田中久一的皮，要吃他的肉！

中国公诉人控诉田中久一率领日本侵略军攻到广州城下滥施淫威。他见中国部队不投降，就命参谋田中和一郎中佐带领第十八师团独立轻型装甲车队第十一、第五十一中队，从镇龙圩出发，作为步兵前导向广州攻击。中国部队发起反击，未能击退日军进攻，被迫撤离广州。10月22日，田中久一挥军攻陷广州，纵使部下在南国广州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又犯下滔天大罪。

接着，田中久一决定提前实施第二期作战计划，命令第五师团在第五舰队的配合下，进攻珠江口虎门要塞，遭中国守军顽强抵抗，田中久一命第五师掉头溯江而上，攻击虎门对面的大角岛，中国守军300人奋勇抗敌。田中久一恼羞成怒，命日本海军用舰炮猛轰，进攻一昼夜攻下大角炮台；又出动110架飞机返回头对虎门狂轰滥炸，开动军舰火炮轰击炮台，然后派步兵冲击，终于占领虎门要塞。田中久一纵兵在广州、佛山、三水等地滥杀无辜，大耍威风。1939年10月23日，田中久一踏着广州市民的鲜血

进驻广州中山医科大学，几天后转移到广州市东郊的执信学校，指挥日军对广州实施血腥统治。

因田中久一进攻广州和屠杀广州人民有"功"，1940年8月被授予中将军衔。12月17日，田中久一命令二十一军主力围攻海南美合抗日根据地，遭到海南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沉重打击。田中久一恼羞成怒，就凶残地拿屠杀海南无辜民众出气，连白发苍苍的老人和几个月的婴儿也不放过。1940年12月17日，田中久一的部队占领了琼崖抗日公学，发现那里有100多名伤员和华侨，日寇丧心病狂，把100多名伤员和华侨全部杀死，其罪行令人发指！

田中久一命日寇对华南抗日根据地反复"扫荡"，大肆烧杀，疯狂地蹂躏根据地百姓，仅琼山县长泰村这个只有220口人的山村，就有95人被杀害，33户中有13户被日寇杀绝。

1941年12月25日，田中久一命令所属部队袭击英国在中国大陆的属地，经5天激战占领该属地后，又向香港发动进攻，经18天战斗占领香港。

日寇冲进香港圣斯蒂芬学院，发现校舍内住着英军伤病员90多人。这些伤员大都断腿缺臂，失血过多，卧床不起。

日寇把英军伤病员从病床上拖下来，剥光衣服逼到墙根，用铁钉从手掌或残肢上钉进去，顿时鲜血涌流，再用刺刀捅死60多人。女医生、女护士吓得尖声大叫，日本侵略者这才发现这些英国女子，顿时兽性大发，冲上去进行强奸，不服者全都杀死。审判法庭上，英国被害人家属愤怒控诉田中久一纵部行凶的罪行，要求严惩杀人元凶。

中国公诉人又指控田中久一在1942年1月，命该国第二十一师团到惠州一带疯狂"扫荡"，在惠州城内集体射杀、刺死、活埋无辜群众5000余人。春节前后，田中久一又率领部队对惠州、从化、清远、北江及三水至西江下游的华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扫荡"，攻占顺德县西海村后，将冯梁氏等6名老太太推入一所草房活活烧死，又放火把西海100多间房屋化为灰烬。

为实施华南作战，日本组建第二十三军，田中久一改任军参谋长，1944年3月升任军司令官，随即策应衡阳作战，从广东发动攻势，烧杀抢掠攻占梧州。

为摧毁中国在西南地区的重要补给线，打通日寇由北而南的中国交通大动脉，田中久一率该军主力投入湘桂作战，集中全力猛攻零陵机场，用炮火猛烈轰击冷水滩阵地。中国七十九军军长王甲本亲临前线指挥，以身殉国。田中久一部队攻陷零陵，展开血腥屠杀。

田中久一率领该军主力8000余人向桂柳地区推进，先后攻占四会、高要、梧州等地，又命驻雷州半岛日军由遂溪北上，分兵合击龙虎关，扑向桂平。中国一个营的守军与日寇展开血战，双方死伤累累，分不清是何方的尸体。田中久一闻报大怒，严令日军拿下桂平，把中国守卫桂平的一个营勇士全部杀害。

田中久一得意忘形，又挥军攻占南宁，与从越南北攻的日军在绥淦会师，打通了中越交通线。为奖赏部属，田中久一命部下随意烧杀抢掠，作恶多端。

在这场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战斗中，田中久一作为日寇华南侵略军

最高指挥官率领部队，击溃豫湘桂地区的国民党主力部队，占领了桂林、柳州、南宁等华南要地。为把华南建成对抗中国抗日力量和南下侵略东南亚的基地，田中久一1944年9月28日向侵华日寇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提出直接指挥香港占领地总督部的要求；10月24日又提出由他兼任香港总督。

为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日本大本营决定撤销香港总督部，改为香港防卫司令部，隶属日寇第二十三军建制，并任命田中久一兼任香港占领地总督。

为消灭华南地区的抗日力量，田中久一命令驻佛山的日寇独立步兵第十三旅团对广东宝安阳台山实施五路围攻，采取日寇“扫荡”华北抗日根据地的侵略战术，变化运用“远道奔袭”、“拉锯清剿”、“铁壁合围”等方式，野蛮地推行“三光”政策。在攻占安阳台山时，田中久一令日寇官兵进行大屠杀，大平村庄被烧毁，躲在村里的百姓被搜出来后全遭杀害，使华南抗日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

在广州军事法庭上，美军将领义愤填膺走上证人席，控诉田中久一屠杀美军俘虏的罪行：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奉命轰炸香港的日军阵地，美国空军“飞虎英雄”荷克少校屡立战功，在一次空战中，荷克少校驾驶的飞机被击中，荷克少校被迫跳伞，中国农民冒着生命危险将荷克少校保护起来。田中久一闻讯大怒，命令日寇派出重兵到跳伞的附近村庄搜索，终于搜出荷克上校。田中久一命令日寇对营救美军飞行员的村庄进行血洗，又对荷克少校施加虐待，最后处以极刑。美军将领怒火满腔，强烈要求对公然违犯海牙和日内瓦公约关于给俘虏以人道待遇和保护的规定，要求广州军事法庭严惩田中久一，为英雄的美国飞行员荷克报仇。

日本法西斯灭亡之前的1945年1月，日本大本营制定了《帝国陆海军作战计划大纲》，命令日寇华南侵略军司令官田中久一大将加强中国东南沿海兵力，将中国大陆作为防卫日本本土的屏障。

那时候，中国各个战场逐步转入反攻，粤汉铁路南段更连续遭到我抗日军民破坏，南进日军得不到及进补给，田中久一奉日本大本营之命进行粤汉铁路南段作战。

中国公诉人控诉田中久一丧心病狂地推行屠杀政策。

1945年1月11日，他气势汹汹下令，命驻广西恭城、富川和驻湖南道县的日军迅速向粤北前进作战；令驻广东粤汉铁路沿线的日寇全线出击。

对田中久一部队的猖狂进犯，中国部队奋起抗敌，在莲花山击毙日寇700多人。田中久一恼羞成怒，督促日寇拚死反扑，将抓到的中国人全部杀害。1月25日，田中久一命日寇大举进攻韶关，在杨村西郊的芙蓉山麓与中国部队打了一场遭遇战，中国部队越战越勇，歼灭日寇一部。

田中久一闻报大怒，急忙派1000余人前去增援，田中久一调日寇炮火猛烈轰击，又驱赶日寇发起进攻，中国部队奋勇反击，全部牺牲在战场上。

田中久一见中国部队顽强作战，使他的侵略军付出惨重代价，他气急败坏地下令进行大屠杀，命令日寇官兵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妇女就侮辱强奸。他所属部队第一四师抓到几十名中国士兵，田中久一凶相毕露，命令第一四师团长将中国士兵集中扣押，一个个扒光衣服，七手八脚捆在大

树上，命令日军士兵用刺刀一块一块地割中国士兵的肉，直至肢体分离，白骨显露，中国士兵咬牙切齿，骂不绝口，直至从容就义。田中久一因侵略中国、屠杀百姓有"功"，获金鷄三级勋章一枚。

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田中久一作为日本侵华华南部队司令官，竟认为裕仁天皇的广播词是伪造的，胡说，起码是裕仁天皇受人威逼才搞出投降讲话录音。在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召集的会议上，声嘶力竭叫嚷：“我坚决拥护冈村总司令官的主张，坚决打下去！”只是得到可靠情报，中国军队“确实已经拟定好了进攻广州的作战计划，最迟在一个月內也要发动”，才不得不同意投降。

接受日本投降的，中国政府指定第二方面军司令长官张发奎将军在广州受降，田中久一到广州向张发奎呈交华南日军驻地表册，率领华南10万多日军向中国投降；接着，田中久一又马不停蹄赶往汕头，代表华东日军向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将军呈递华东日军驻地表册，并签署降书。

田中久一在汕头参加完日军投降仪式，即被中国当局以战犯嫌疑扣留监禁，准备作为侵华战犯进行审判。

这时，饱受田中久一残害、压榨的广州人民在日寇投降的情况下，怀着深仇大恨向中国当局控告田中久一惨无人道，纵兵杀人，张发奎将军立即决定将田中久一送交军事法庭审判治罪。

田中久一情知他在中国作恶多端，血债累累，必死无疑，忽然得到中国陆军司令何应钦到广州视察的消息，忙运用各种关系与何应钦拉关系。何应钦遵照蒋介石拉拢日本战犯反共的指示，在广州行辕召见田中久一。

田中久一进入何应钦行辕后，何应钦起立热情地与田中久一握手寒暄，张发奎认为田中久一是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他紧板面孔端坐不动，不理睬田中久一。等何应钦走后，仍将田中久一扣押，交广州军事法庭审判。

1946年5月，国民党广州行营军事法庭对田中久一正式开庭审判。

田中久一在法庭上极力为自己开脱罪行，说自己的罪行没有谷寿夫、酒井隆显著，而且又是投降将领，辩称在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下辖的华北、华中、华南三个派遣军司令官中，根本博、横山勇都是中将，他是大将，根本博等人在华北平受优待，他也不应该认真办罪，应宽大处理。

中国公诉人控诉田中久一作为日本侵华高级将领，肆意纵兵轰炸中国城市，屠杀无辜百姓，虐杀英美俘虏，强奸中英妇女，已构成发动战争和违反人道罪，因而被广州行营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1946年8月，美国军事法庭也指控田中久一在香港虐杀美国空军少校荷克，在香港圣斯蒂芬学院捅死英国伤病员60余人，强奸女医生和女护士，要求将其判以绞刑。

1947年3月27日，广州行辕军事法庭考虑到美军法庭对田中久一的绞刑判决要求，经长时间调查，维护判处死刑的原判，把田中久一验明正身，五花大绑，背插“战犯田中久一”的木牌，推上囚车，在广州市大街上游行示众。

处决田中久一之日，整个广州市轰动了，当年遭受田中久一和日本侵略军压榨、奴役之苦的广州人民纷纷走上街头，观看昔日“华南之虎”的可耻下场，饱受当年“香港总督”田中久一奴役的香港人士也纷纷前来广州观看。

田中久一被押到广州流水桥刑场，刑场四周挤满了广州和香港市民，一起发出震天动地的怒吼声。这个当年纵横华南8年、杀人无数的日本侵略

军头子，顿时吓得完全失去了昔日不可一世的皇军威风，瘫软在汽车上。

中国法警看田中久一副软骨头狼狈相，顿时升其中国人的崇高自豪感，怀着深仇大恨把田中久一拖下汽车，抓小鸡一般拖到行刑地点，喝令田中久一跪下，扣动板机一枪击中战犯的后脑，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被问斩的--平野仪一！

平野仪一是广州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5个日本战犯之一。

平野仪一1890年生于日本静冈县，191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40年3月任侵华日军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独立步兵第六十三大队大队长，他一上任就率领平野大队投入宜昌战役。

为了将据守汉水右岸的中国第五战区部队压缩在宜昌一带予以歼灭，完成宜昌战役第一起作战任务，平野仪一奉命率领该大队4月17日从九江出发，追歼庐山地区的中国军队。

平野仪一给他的部属打气说，宜昌战役之目的是击溃中国第五战区主力，促使国民党军队衰败，有助于日本对华政略和战略取得显著效果。

平野仪一率领他的大队耀武扬威开进中国风景区庐山，沿途烧杀抢掠无所不为，遭到中国守军突然阻击，平野多次组织部队猛烈冲击，都被中国守军打退，死伤惨重。平野仪一惊惶失措，急忙向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和顶头上司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长藤堂高英发报求救。冈村宁次、藤堂高英忙派三个大队日军赶来增援，才协助平野仪一攻下庐山。平野仪一兽性大发，指挥日军在庐山烧杀抢掠，疯狂破坏庐山胜景，罪行令人发指。

1940年4月23日，平野仪一又气势汹汹投入宜昌战役第二期作战，妄图消灭宜昌以东的中国部队。平野仪一首先揭开第二期作战的序幕，又实施"超越既定作战地区作战"，以凶残的屠杀开路夺取中国大平国土。

冈村宁次和藤堂高英见平野仪一法西斯精神十足，便下令以平野的第六十三大队为骨干组成平野大队，与第十一军主力在宜城东北地区包围张自忠将军率领的三十三集团军部队。

张自忠率领部队跳出日寇重围，对平野支队等日寇进行反包围。张自忠率领中国军队奋勇追击，日寇急不择路，夺路而逃，死伤惨重。

平野仪一狡猾异常，他看准时机率平野大队跳出重围，带日寇第十一军主力逃到宜城东北10公里的沟园、南瓜店一带。

张自忠将军得到这一情报，虽然手下主力部队均已派出作战，手头只有3个团，仍决定亲自率领两个团从宜城渡过汉水，向平野仪一所在日军发起猛烈攻击，日寇猝不及防，遭受沉重打击。

平野仪一感到面临灭顶之灾，后来看到中国部队势力单薄，便又重新整顿部队，动用20多门火炮实施反击，张自忠只有3000余人，武器装备又差，在阵地战中伤亡增加。

平野仪一急忙向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和第十四旅团长藤堂高英求援，冈村宁次即派日军航空兵前来助战。张自忠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与其野部队展开决战，张自忠先是左肩受伤，又一批密集枪弹射中胸部，加之日寇航空兵疯狂轰炸，致使张自忠将军死于平野仪一的进攻之下，光荣为国捐躯，成为八年抗战第一位殉国的总司令，平野仪一因"战功"晋升为步兵大佐。

1941年9月18日，侵华日寇第十一军发起第二次长沙战役，该军司令官横山勇特别赏识平野仪一，特意以平野大队为骨干组成平野支队。支队长按惯例由旅团长级军官担任，横山勇破格任命大队长的平野仪一为

战斗支队长。

1941年9月28日，中国第六战区司令官薛岳以15个师的兵力向宜昌发动猛攻，日军第十三师团和平野支队拚死抵抗，平野支队死伤惨重，平野命令后勤和伤病员也投入战斗，又紧急呼叫援兵。

10月10日，薛岳命中国部队发起总攻击，日寇陷入绝境，第十三师团长内山英太郎和平野仪一命令日军官兵烧掉军品和秘密文件，用密码写好绝命书，准备自杀。日寇第三十九师团10月11日赶到战场，同中国部队展开激战，才救出平野支队。

平野仪一获救后凶焰万丈，立即率领平野支队疯狂屠杀中国抗日军民。第二次长沙战役中，平野仪一指挥日寇和其他部队共屠中国军民5.4万多人，并将被迫投降的中国官兵全部杀死，犯下滔天大罪。

第二次长沙战役结束后，平野仪一率领残兵败将撤回九江归建，在旅团长藤野高英指挥下进行“清乡”作战，推行“三光政策”，杀死中国抗日军民无数。

1942年4月18日，美国B25轰炸机从航空母舰起飞，首次轰炸东京、名古屋、大阪，返回途中降落在中国浙赣地区机常美国飞机首次空炸日本本土使日本大本营十分恐惧，为摧毁分布在浙江各地的国际机场，命令侵华日军发起浙赣战役。

平野支队奉命从九江出发，配合10万日军出动，担任江西方面的水路作战。平野仪一率军配合日本海军第一遣华舰队，在鄱阳湖北水路口东岸奇袭登陆，相继攻占都昌、黄矶街、梅溪嘴，又沿锦江逆流而上。沿途受到中国军队顽强狙击，死伤惨重。平野仪一兽性大发，每攻占一个地方，他都命令部属疯狂烧杀奸淫，又像强盗一样公开抢劫，他亲自监督把抢劫来的军用物资装船运回日本。为此，受到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横山勇的通令表彰。

在浙赣战役三个月中，日寇杀害中国军民25万余人，其中在江西被害的几万人，全部死于平野支队的屠刀之下。广州法庭上，受害人愤怒控诉平野仪一的滔天罪行，认为不亚于南京大屠杀。

1943年3月，平野被调往中国东北，任第九师团第十八旅团第三十六联队联队长，率领部下镇压东北抗日民主联军；1945年2月升任第二十三军军附，协助军司令官田中久一镇压华南抗日力量；同年4月升任第一二九师团第九十二旅团少将旅团长，更卖力地进攻抗日部队。

日本投降后，平野仪一作为日本战犯被收押在案。在法庭上，平野蛮横无理，拒不认罪，广州军事法庭经过一年多的深入调查，掌握了平野疯狂屠杀中国平民的大量证据，他才不得不低头认罪。1947年5月12日，广州军事法庭判处平野死刑，押赴广州流水桥刑场处决，为残害的广大中国人民报了血海深仇。

被押赴刑场的重藤宪文原侵华日军华南派遣军宪兵队长重藤宪文是广州军事法庭处决的5个日本战犯之一。

重藤宪文为日本福冈县人，1916年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宪兵科毕业后，就开始了罪恶的侵华宪兵生涯。

1937年七七事变后，重藤宪文作为宪兵加入关东军，对东北人民和抗日武装力量疯狂地围剿、屠杀，所到之处，烧毁村庄，杀害无辜百姓，抢劫粮食和牲畜，造成了许多荒芜人烟的无人区。

重藤宪文的凶残屠杀获得日本军方的赏识，调他参加进攻上海和南京

大屠杀。在南京，他杀人如麻，罪恶滔天。

1938年10月26日，重藤宪文来到日寇攻陷后的武汉，被提升为武汉宪兵队中佐分队长，直属于日寇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畑俊六，在武汉旧法租界的利冰厂办公楼设立宪兵队本部，对武汉进行血腥控制。

公诉人控诉重藤残无人道地滥捕滥杀无辜市民。重藤为搜捕中国共产党党员和抗日人士，经常率领所属宪兵，在武汉走大街串小巷，采用定期查户口、突击搜查旅馆行栈的方法，肆意捕杀中国军民，甚至连孩子也不放过。重藤在武汉大街上听见一个小孩哼了几句《义勇军进行曲》，就命宪兵抓来，用水管子向小孩嘴里灌凉水，把肚子灌鼓，然后把小孩的父母抓来逼着脚踩；小孩父母不踩，重藤宪文就命日本宪兵用鞭子狠狠抽打小孩父母，又令日本宪兵抬起穿着皮鞋的脚，朝小孩的肚子野兽般踩去。只听一声惨叫，血水迸溅，因小孩唱了几句抗日歌曲就要了他幼小的生命。

重藤宪文把他管理的汉口宪兵所在地大孚银行，搞成了一个阴森的阎王殿，中国人被抓到这里犹如进了鬼门关。他指挥日本宪兵采取最惨无人道的手段对待无辜百姓，用挖眼、剥皮、开膛、刀劈、电击、镪水浸、一刀刀割肉等令人发指的残忍手段，折磨、屠杀中国百姓。1938年冬，他从汉口伟英里抓走七八人，内有一个22岁的孕妇，全都被抓到这个地地道道的杀人魔窟里拷打致死，拉到礄口掩埋。

武汉市民控告重藤宪文把礄口建成恐怖的杀人常重藤宪文常以搜查抗日分子为名，带领部属开动警车在汉口横冲直撞，在人多的闹市区抓上人装上汽车，拉回宪兵队严刑拷打，然后在夜半更深时拉到礄口，砍头或集体活埋，据李重汉1939年11月根据目睹材料写成的《铁蹄蹂躏下的武汉》一文记载，仅1938年11月到1939年11月的一年间，重藤宪文宪兵队在礄口刑场就残杀中国无辜百姓2万多人。

重藤宪文还在离汉口市20多华里的坦教湖的偏僻地方设立了一个秘密刑常坦教湖附近农民在广州法庭出庭作证，说重藤宪文总是命令汉口宪兵队宪兵把要杀的人，用汽车拉到这里，强其他挖沟"自凿坟墓"，再关押起来严刑拷打，最后用白布蒙上眼睛，捆绑着拉到深沟旁边，由重藤宪文挥起日本武士刀照头砍上一刀，一脚踢倒在沟里，其他宪兵一拥而上，挥舞军刀竞相屠杀，把中国百姓不分死活都推到沟里，铲土掩埋。当地农民在法庭上揭露重藤宪文每月至少在坦教湖刑场杀两批人，每批三五十人不等。重藤宪文残忍的屠杀行径激起了人们的强烈愤恨，强烈要求严惩这个杀人魔鬼。

重藤宪文靠屠杀中国人被晋升为宪兵大佐，提升为华中派遣军宪兵队队附。他一上任，就接到一起日军电线被割案件，重藤宪文立即下令把汉口经营旧电线的摊贩全部抓来，严刑逼供，致使几人被拷打致死，却一无所获。不久，又发生日军第二次电线被割事件，重藤胡说武汉中山公园一带有抗日分子，就命令宪兵把附近居民2000人赶到一个竹篱笆院内，要作案者自首，见无人承认，重藤恼羞成怒，就把这2000人赶在空场晒太阳，两天不给吃喝，致使许多人晕死过去。

1942年5月，重藤宪文被提升为日寇华南派遣军宪兵队长，协助华南派遣军司令官田中久一疯狂镇压抗日力量。他运用多年屠杀中国人民的经验，制订出广州为中心四处撒网的恐怖计划，派出宪兵队到汕头、惠州、佛山、香港、九龙等地活动，对中国居民进行严密的法西斯统治，找个借口就随便抓人，血腥镇压。

重藤宪文在广州发现香港《亚洲内幕》(文摘社)杂志上登有号召亚洲各国人民奋起抗日的文章,就赶到香港,伙同日军香港宪兵队队长野间助之贤,出动宪兵在香港九龙四处搜查,在九龙发现了《亚洲内幕》编辑蒋学楷,便指使香港宪兵将其残酷枪杀。

1943年冬天,重藤宪文派往日军中的宪兵发现侵华日军内部有异常动向,立即派宪兵四处侦察,很快发现台湾爱国人士丘念台、钟浩东、李南锋、徐森元、邓慧等人受不了日寇的法西斯统治,秘密串连爱国台胞,建立抗日台胞组织,准备策动在广州的2万名台胞和侵华日军中的2000多名台籍军人起义,建立抗日队伍。重藤宪文侦破此案,立即出动警车,大肆逮捕丘念台等爱国台胞,进行疯狂的大屠杀,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

1944年冬天,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命所部官兵驾机轰炸香港的日军阵地,美国空军英雄荷克少校的飞机被日军击伤,荷克少校被迫跳伞,降落在广州与香港交界处附近地区。重藤宪文联合香港的日本宪兵队长野间助之贤派宪兵和日本兵四处搜索,最后从老百姓家里搜出荷克,将其施加酷刑后杀害。对营救美军飞行员的村庄放火血洗,重藤宪文率日本宪兵杀人无数。

1945年初,侵华日军华南派遣军在打通粤汉铁路作战中,受到中国军队沉重打击,死伤惨重,重藤宪文受田中久一之命疯狂报复,把俘虏的中国官兵捆在大树上,用刺刀一刀一刀割死,惨不忍睹。

日本宣布投降后,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寇宪兵头子作为战犯被收审,美国军事法庭根据他残杀美国飞行员的罪行,要求判处他死刑;1947年8月9日,中国广州行辕军事法庭判处重藤宪文死刑,押赴广州流水桥刑场处决。有许多香港同胞和美军代表与广州人民一起观看处决日本宪兵头子,无不拍手称快。

昔日杀人狂,今日刀下鬼的--近藤新八!

原侵华日军第一三师团师团长近藤新八是在广州流水桥刑场被枪毙的5个日本重要战犯之一。

近藤新八1893年生于日本香川县,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毕业,开始了罪恶的侵华生涯。

1938年7月,近藤新八被晋升为步兵大佐,把他派往中国东北,任新京(长春)宪兵队队长。

新京宪兵队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过程中建立的第一批宪兵机构,辖有附属地(长春分队)、吉林、洮南、通辽、公主岭5个分队及城内、宽城子、敦化、西安、南岭、磐石等分遣队和分驻所,有宪兵300多人。

近藤新一上任,就派出宪兵四处搜集以杨靖宇为首的抗联部队的活动情报,提供给关东军,引导关东军对抗日武装进行规模空前的大"扫荡",使抗联遭到重大损失。杨靖宇壮烈牺牲,无数抗日军民被惨杀,东北抗联的活动被迫进入低潮,抗联主力转移到中苏边境地带坚持游击活动。

近藤新一被赋予极大权力,他可上管军下管民,为审查有"危险思想"的人员,他不仅可以拘捕比自己军阶高三级的关东军军官,而且可以以紧急处罚为名行使处决权。近藤充分运用这些特权,在充当新京宪兵队队长的4年期间,出动宪兵大肆搜捕所谓"政治犯"、"思想犯"、"嫌疑犯",以各种借口逮捕中国军民,关入长春监狱严刑拷打,许多人被折磨而死。

为弥补日本侵略战争力量的不足，近藤新八同日本驻华北军队和宪兵队达成协议，每年从关内以"军事讨伐"、"治安肃正"为名，抓捕大量农民，用闷灌车拉到东北，抢修军事工程，有部分华工被运到日本，葬身异国他乡。

1942年2月，近藤新八勾结关东军司令部炮制出《劳动者紧急就劳规则》，规定每年由需要劳工的部门提出申请，由近藤新八指挥宪兵向下"摊派"指标。近藤还在长春等地以"行迹可疑"为名，将老百姓当作"俘虏"抓来当苦力使用，完成军事工程后被全部杀死。

近藤新八在新京成立了"矫正辅导院"，命令日本宪兵"抓游民"，仅1942年初一次就抓捕3500多人，动用各种刑具拷打"抗日分子"，用枪逼其中国人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在他任新京宪兵队长4年间，几万中国军民被他命令日本宪兵残害致死。

1942年3月，近藤新八被提升为第三十七师团参谋长，他率军来到华北，进行强化治安作战。1943年5月，近藤新八指挥该师部队对太行根据地的腹心地区辽县、武乡、涉县一带发动大规模毁灭性"扫荡"。近藤新八企图消灭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主力，却扑了个空，他恼羞成怒，就在太行根据地中心区进行"抉剔清剿"，疯狂地捕杀抗日干部和群众，到处逼迫老百姓挖掘藏在地下的粮食和秘密文件，凶恶地推行"三光政策"，却被太行根据地军民开展麻雀战、地雷战、伏击战，遭受沉重打击。近藤新八部队被地雷阵炸得死伤累累，胆战心惊，只得被迫撤兵。撤退途中，近藤新八又丧心病狂地屠杀太行根据地无辜百姓。

这时，台湾同胞不堪忍受日寇的法西斯统治，到处掀起抗日浪潮，日本军方便把有在东北和华北"扫荡"根据地经验的近藤新八晋升为陆军少将，提升为日寇侵台军参谋长。

1943年10月，近藤杀气腾腾到台湾上任，为把台湾建成日本侵略中国大陆和进行太平洋战争的滩头阵地，他运用在东北和华北的"扫荡"经验，血腥镇压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欠下同胞笔笔血债。

1944年7月，近藤新八被提升为独立混成第十九旅团旅团长，从台湾来到广东，担负潮汕地区的"扫荡"任务。近藤一上任就率军进犯清远、连江口，受到中国军队沉重打击，日寇被歼灭500余人，近藤气急败坏，就纵兵血洗潮汕地区广大农村。

同年9月，近藤奉命参加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湘桂作战，受到揭阳、普宁等武工队的迎头痛击，近藤疯狂地率领日寇对顺德展开"扫荡"作战，被武工队用游击战术拖得死去活来，近藤打不到武工队，就指挥部属拿老百姓出气，烧毁房屋100多间，把顺德西海村冯梁氏等6个老太太推进一间着火的房间内活活烧死。

近藤新八又指挥侵略军进犯惠州，受到潮汕人民抗日游击队迎头痛击，近藤新八兽性大发，刺死、活埋当地百姓5000余人，真是尸横遍地，惨不忍睹。

近藤新八不甘心失败，协同日寇其他部队对宝安、台山实施五路围攻，采用他在华北进行治安战时运用的"远道奔袭"、"拉锯清剿"、"铁壁合围"等战术，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广东犯下屠杀罪行。

1944年底，近藤新八率军到潮州西南25公里的揭阳地区反复"扫荡"，被当地游击队声东击西，打得狼狈不堪，近藤新八狗急跳墙，兽性大

发，下令进攻前，把老百姓拉来用刺刀割开胸膛，挖出心煮熟分给部属吃，再挥刀驱赶日寇士兵冲锋。其滔天罪行，令人发指。

1945年4月，近藤新八晋升为中将军衔，被任命为新组建的日寇华南侵略军第一三师团师团长。他一上任就投入打通广东南路干线的"膺惩之战"。

近藤新八率领六路日军，气势汹汹杀向粤中的台山、开平、新会、阳春等地，一路大炮开路，空中有日本飞机掩护，烧杀抢掠。中国第七战区第七纵队为粉碎近藤师团的"扫荡"，避其锋芒，化整为零，诱敌深入，近藤师团得意忘形，占领粤中大部城乡，成为抗战以来粤中地区人民受害最深的一次。

近藤新八自以为是，率领侵略军烧杀抢掠，中国军队在运动中伏击、截击敌人，日军受到沉重打击；近藤命令所属骑兵突袭苍城，却中中国军队之计，在楼岗、塔山一带再次受到重创。

近藤新八整顿侵略军队，兵分三路突袭楼岗，在飞机掩护下像野兽一般企图一口吞掉中国军队，受到里讴乡抗日民众武装首领周福率领的周家军的迎头反击，近藤师团损失惨重，日本飞机亦被击落一架。周福为避免过大伤亡，将周家军主力后撤，化整为零，巧妙地与近藤师团周旋。

近藤师团找不到周家军，就挥军血洗南楼，当地司徒族7名乡卫团丁依托有利地形奋勇还击，以7支土造七九式步枪迎击近藤师团，歼灭大量日寇，坚守三昼夜，阵地岿然不动。

近藤新八兽性大发，下令用大炮猛烈轰击，气壮士巧妙躲避不伤毫毛，近藤暴跳如雷，公然下令施放毒品弹。气壮士虽中毒昏厥，仍把枪支砸烂，与日寇搏斗英勇牺牲。

近藤师团以法西斯灭绝人性手段攻占南楼后，将气壮士尸体肢解出气，又杀害了中共地下党员方继翁。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国军队第六十四军军长张驰奉命在广东大良县受降，近藤新八率领该师团一万两千人集中受检时，他拒不认罪，突然站起来煽动部属不要投降，张军长当机立断，以武力迫使近藤师团投降。

国民党广州行辕军事法庭依法对近藤新八开庭审判，近藤新八态度蛮横，拒不认罪，广州军事法庭以充足的理由于1946年3月24日判处他死刑，1947年12月24日押赴广州流水桥刑场执行枪决。

镇压--野间助之贤！

野间助之贤是被中国广州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5个日本战犯之一，在香港枪毙正法。

野间助之贤1896年生于日本东京市，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又进东京帝国大学政治系深造，然后从事日本侵略有理的法西斯宣传，1942年2月晋升宪兵中佐，提升为香港宪兵队队长，开始了罪恶的宪兵生涯。

野间助之贤接受日本华南派遣军司令官田中久一和华南派遣军宪兵队长重藤宪文的指使，在香港推行宪兵恐怖统治。

野间助之贤首先在香港扼杀抗日言论，他发现《亚洲内幕》杂志上载有号召亚洲各国人民起来抗日的文章，就勾结重藤宪文拘捕抗日志士。野间派出宪兵对《亚洲内幕》人员严加侦察，发现有很多文章是爱国人士、《亚洲内幕》编辑蒋学楷所写，就派香港宪兵对蒋学楷立案侦察。

野间派出的宪兵在九龙避风塘发现了蒋学楷，只见他坐船而来，日本

宪兵就在蒋学楷后面跟踪监视，请示野间助之贤后，日本宪兵在蒋学楷登舟而去时，将其开枪打死。

野间助之贤借处死蒋学楷一事，在香港到处张贴布告，声称凡在香港的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都必须到香港宪兵队登记，否则将予以拘捕；凡南洋来香港的华侨只要在香港宪兵队登记注册，即予以优待和特别保护，否则一切损失自己负责。

野间助之贤派日本宪兵在香港各处穿便衣监视各界人士，见有可疑者就抓回宪兵队，砍去手指、割掉耳朵、切下舌头、挖下眼睛，惨叫之声不绝于耳；见到稍有姿色的女子就抓回来绑在柱子或床上，野蛮强奸。

野间助之贤又嫌杀害普通人威慑力量小，就把矛头对准著名爱国人士。日本宪兵发现中国国民政府立法委员林庚白偕夫人将由九龙过海出港，立即向野间助之贤报告，野间马上下令对林庚白夫妇下毒手。

林庚白夫妇行至天文台道时，被野间派出的宪兵追上，光天化日之下开枪打死林庚白，其夫人惊叫呼救时，也被日本宪兵击碎右臂骨，鲜血直流，惨不忍睹。据可靠材料，被野间助之贤的日本宪兵杀害的香港民众至少有几万人。

美国军事法庭也向广州军事法庭提出控诉书，控告野间助之贤获得美国第十四航空队"飞虎英雄"荷克少校轰炸香港日军阵地因飞机被击中而跳伞的消息，当即命令日本宪兵前往出事地点搜索，将营救美国"飞虎英雄"的村民全部杀害，又亲自对荷克非刑拷打，残忍地杀害。

日本投降后，野间助之贤作为日本战犯被中国收审，中美军事法庭联合实施周密调查，取得可靠证据，广州军事法庭决定判处野间助之贤死刑。

应香港广大受害同胞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决定将野间助之贤押解到他作恶多端的香港正法。1947年5月27日，野间助之贤在香港刑场被处决，有无数香港民众前来观看这个杀人魔王的可耻下场。3、上海审判——国防部上海审判战犯军事法庭，1946年3月10日成立，直到1949年3月才告结束，历时3年之久，是中国历时最久的一次战犯审判，这与蒋介石有意包庇战犯，搞假审判真演戏有直接关系。

上海审判，判处原侵华日军第五十五军参谋长辘木正隆死刑；判处原侵华日军独立混成第八十二旅团长樱庭子郎、第四十旅团长伊藤忠夫无期徒刑；原日寇侵台司令官兼总督安藤利吉，在上海日本战犯监狱畏罪自杀；原侵华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在上海日本战犯监狱患脑溢血死亡。

全国人民强烈要求严惩日寇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竟被法庭宣判负责“遣俘有功”，“无罪释放”。

审判期间，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汤恩伯、李宗仁等国民党政府最高级头目，暗中与日本头号侵华战犯冈村宁次密谋勾结，公开为日本战犯开脱罪行，上演了宣判罪大恶极的侵华日军总司令无罪的丑剧，留下千古骂名，遗臭万年。

1、是谁放走了侵华头号战犯--冈村宁次？冈村宁次1884年生于日本东京，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毕业后，即开始侵华活动，曾任陆军参谋本部"支那"班班员、中国课课长、日本驻华使馆武官。1925年至1927年，任军阀孙传芳的军事顾问。1928年，以步兵第六联队长的身分参加侵略青岛和济南的战争，参与制造举世震惊的"济南惨案"。1

1932年，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参加侵略上海的战争。1933年，代表日本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侵略冀东和长城以北我国领土的《塘沽协定》。1935年，又协同日寇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与何应钦签订侵略华北的《何梅协定》。其后，担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兼驻伪满洲国武官、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第二师团长、第十军司令官、华北日军总司令、第六方面军司令官，最后升任侵华日军总司令，在中国作恶多端，罪行累累。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冈村宁次和东条英机、松井石根一起列为甲级战犯。令人奇怪的是，中国军事法庭从1946年开始审判日本战犯，到1948年已基本审判完毕，松井石根、谷寿夫、田中久一等已被判处死刑，正法枪决，但冈村宁次这个日本侵华头号战犯却不见踪影。

2、讨好蒋介石的冈村宁次原来，冈村宁次明知自己罪孽深重，难逃惩罚，自忖不仅被列为战犯，且死刑也在所难免。就用专机把家属送回日本，准备一人承担制裁。

但是，他又料定在国共冲突中有保全性命的机会，就决心"卖力反共，戴罪立功"。他把百万侵华日军的优良武器装备交给国民党政府，把他多年在中国对付共产党的四、五十份秘密文件呈送给蒋介石，还向何应钦献反共之计说："中国最大的内患，是共军部队实力庞大，不可小视。现华中长江与黄河之间尚有30万日军，建议暂不缴械，由我本人率领，在贵司令的统一指挥下帮助国军剿灭共军。贵方只需负责供应给养，其他武器、弹药、医务方面概由我们自己解决。"何应钦对此极为欣赏，马上报告蒋介石请求批准。蒋介石虽害怕失去民心，不敢妄行，但却把冈村宁次视为自己人，确定将战犯范围限制在最小限度，甚至一个人即可，他明确地发布指示："逮捕汉奸消息及逮捕条例，概勿发表，必须由本委员会批准后，方得正式公布"，"以后关于逮捕汉奸之案件，准令戴（笠）副局长负责主持，以归统一，而免分裂。"蒋介石专门交代，对冈村宁次要格外优待。因而在日本投降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迟迟不下达解除冈村宁次武装的命令，因而设在南京大方巷外交部大楼的侵华派遣军司令部依然戒备森严，房上架有高射炮、机枪，日军官兵仍欺压百姓，奸淫妇女，胡作非为。经南京警备司令邱维达多次交涉，才命令冈村宁次缴出武器装备。

蒋介石、何应钦为勾结冈村宁次反共，不顾国际国内要求审判冈村宁次的强烈呼声，宣布冈村宁次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委其以协助投降、维持治安和帮助遣返日俘日侨的重任，后来又让其改任与国民党政府的"联络班长"，暗中兼有国民党军事顾问的职责。在生活上特殊优待，甚至让他以外交官身分随便活动。

1945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公布，把冈村宁次列为头号战犯。蒋介石、何应钦指示南京和国民党各地报纸，不登这一消息。在制定确认战犯条件文件时，只注重松井石根、谷寿夫等指挥的南京大屠杀，酒井隆在广东以及日寇在长沙、徐州会战中的暴行，因冈村宁次与这些暴行无直接联系，而为其开脱罪责。

国民党战犯处理委员会负责人，于1946年9月受蒋介石、何应钦之命，对记者提问答曰："冈村宁次本是日本战犯，但自日本投降以来，在维持南京治安、协助我政府接受以及受降工作上，成绩显著。目下正在任联络班长，工作尚未结束，何时对其拘留审理，委员会现正在研究中。"3、

蒋介石包庇冈村宁次蒋介石包庇冈村宁次的倒行逆施，引起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不得不于10月26日下令，停止冈村宁次的一切外交活动；11月2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要求冈村宁次到东京出庭作证。而国民党政府却以冈村宁次健康有问题予以拒绝。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识破国民党政府的阴谋，要求把冈村宁次送往东京审理。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把冈村宁次作为战争嫌疑犯拘留审查，由何应钦特派两个高级军官陪冈村宁次从南京转移到上海，诡称把冈村宁次关在上海战犯监狱候审，实际上成了国民党政府的重点保护对象。

冈村宁次住在上海黄渡路王文成的宅邸，住所十分秘密。

国防部长白崇禧特别训令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对冈村宁次进行监护。汤恩伯派出大批便衣为冈村宁次日夜担任警戒，不时提供中国对冈村宁次的内部情报，还专门聘请日本医生中山高志为冈村宁次治疗肺结核。真是细心照顾，关怀备至。

1947年6月17日，白崇禧特派国防部高级军官王俊中将，向冈村宁次传达蒋介石、何应钦的口信称：“根据国际情况，以暂不归国为安全。为了敷衍舆论，也可能移交军事法庭审理，但审判只是走走形式而已。”这时候，各国对冈村宁次的下落传说纷纷冈村宁次坐卧不安，便派他手下参谋小笠原向国防部二厅少将曹士澄打探消息，曹士澄第二天就带来了可靠消息：“对冈村的审理，争取于9月以后进行。由于蒋主席、白崇禧国防部长、陈诚总参谋长、何应钦将军等对冈村在停战后的工作甚为感谢，审判只是走走形式，但归国时机，以在和约签定后为宜。”1948年7月，国民党政府签于南京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理已接近尾声，南京、上海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一再催促尽快审判冈村宁次，国防部长何应钦重新上任后，便于7月1日向石美瑜发出训令称：“冈村宁次病已痊愈，对该俘的战犯嫌疑部分，应立即开始审理；根据规定进行，随时报告情况。……”4、假审判真演戏，幕幕狼狈不堪7月7日，上海军事法庭检察官向冈村宁次送去法庭传票，令他7月12日上午10时到法庭受审。这又使冈村宁次精神紧张起来。蒋介石对冈村宁次体贴入微，命国防部二厅联络官吴文华悄悄来访，传达蒋介石、何应钦和国防部的安排，讲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结束之前，对冈村宁次进行审判，训令已经下达，并不惜出卖核心机密，奴颜婢膝地说：“训令中所谓病已痊愈，乃是为了病中可拖延审理，法庭将根据病情斟酌行事，为此速向法庭提出诊断书为好；蒋总统也同意开始审判，并已指出要从轻处理；你作为被告理应拘禁于战犯监狱，但因病中疗养或以移住于京沪医院为宜，此事尚在研究；关于保释问题，届时法庭当有指示。”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谈及他此时此刻的心情时说：“停战以来，我一直以为，作为战犯而受审的日子势必来临，现在终来到了，然而两三年来对于中国政府及军方的领导层所给予我的关照和好意，更使我万分感激。”1948年7月12日，中国上海军事法庭对冈村宁次正式进行侦讯审理。法庭采取五人合议制。审判长为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少将庭长石美瑜，审判官为4个上校专职法官：叶在增、陆起、林健鹏、张体坤。

10时半，对冈村宁次的侦讯开始。首先由检察官施泳对冈村宁次在中国的侵略作战经历及部下不法行为等有无责任问题提出质问。

冈村宁次因有蒋介石、何应钦背后撑腰，有恃无恐地为自己辩解说：“我想，部下犯罪纵属事实，也是下层发生的零星的不法行为，与军司令官、方

面军司令官、总司令官无关，不属于共同责任犯罪问题。虽然如此，我仍应承担道义上的责任。”石美瑜向法官们事前传达了蒋介石、保应钦的指示，因而谁也不敢触动冈村宁次的个人犯罪问题。一小时后审讯即告结束，纯粹是走走形式而已。

冈村宁次退庭后，石美瑜与施泳（检查官）、刘季坪（翻译）展开激烈争论。石美瑜认为，冈村宁次既为被告，而且健康状况良好，就应立即住战犯监狱监禁。刘季坪反对石美瑜的主张，认为冈村现在的住所既为国防部指定，除非有国防部指示，否则不能擅自移动。双方争执不下。最后由国防部官员出面和石美瑜协商，石庭长才同意申请保释。

7月18日，国防部二厅联络官吴文华再次访问冈村宁次，殷勤地为他起草了一份保释申请书，由参谋松冈抄写清楚后提交法庭批准。

7月23日，上海军事法庭派京沪医院的朱院长，在日本医生中山高志陪同下，为冈村宁次做疾病诊断。正直的朱院长根据冈村宁次的病状，拒绝为他担保。这可急坏了冈村宁次，他又费尽心机才找到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钱龙生为他担保，8月2日终于取得法庭的保释同意。

8月2日，上海军事法庭送来起诉书，指控冈村宁次在任侵华日军总司令任内，应对第二十三军、第二十七师团、第一百十六师团、第一百六十四师团、第八十九旅团等所属兵团官兵的犯罪行为负连带责任。

8月9日，国防部二厅联络官吴文华告诉冈村宁次说，石庭长的申请已得到国防部批准：“冈村应扣押于战犯监狱，于该处就医”。

8月10日，石美瑜在吴文华陪同下访问冈村宁次，表明来意说：“今天我未受任何人指示，完全以个人资格来访。带病入监，当很痛苦，然迫于形势，经与政府当局协商，只好如此，希能谅解，监内住处我已看过，可独居另室，医师来治疗及送进营养品均可自由。万一病情恶化，仍可申请保释。

在此期间尚望安心保养。入监时间定于14日退庭之后，由法庭直接前往，希有所准备。”8月14日，上海军事战犯法庭对冈村宁次进行初审，纯粹是走过场，只短短半个小时便草草收场冈村宁次松了一口气离开法庭，刚到走廊就被100多名中外记者团团包围，争相提问。冈村宁次害怕暴露蒋介石对他的庇护内幕，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急得满头大汗，狼狈不堪。

国民党宪兵急忙开道，推开阻拦的记者，将冈村宁次送进休息室。二三十名记者紧跟不放，举起相机拍照不止。冈村宁次急忙离开法庭，登上早已准备好的大卡车。但仍有几名记者登上卡车，追赶提问，一直到上海高镜庙战犯监狱门口，由典狱长孙介君接了进去，方才解围。

蒋介石、何应钦吩咐孙介君对冈村宁次百般优待，又请国民党的“一流律师”钱龙生、江一平、杨鹏担任辩护律师，紧张地策划帮助冈村宁次正式渡过审判关的计谋。

8月22日，典狱长孙介君特意到特殊病室探问冈村宁次“病情”，并无耻吹捧，透露国民党当局的庇护奸计说：“先生前在塘沽协定时和在停战投降时，均未采取对中国不利的措施，中国有志之士均堪嘉许。蒋总统本无意使先生受审，然考虑国内外的影响，不得不如此，但绝不会处以极刑，至于无期也好，十年也好，结果都一样，请安心受审。在受审时，对中国民众所受灾难，要以表示痛心为宜。判决后可根据病情请求监外疗养，无论是审理和入狱都只是形式而已。”1948年8月23日，拖延很久的对战犯冈村宁次的公开宣判终于开庭。

法庭设在上海塘沽路市参议会大礼堂。尽管那天下着大雨，但不仅大礼堂里座无虚席，而且在礼堂门口、上海商会前广场上，以至上海的大街要道，到处都有冒雨肃立静听广播审判实况的群众，自晨至暮，万头攒动，始终不散。国民党政府唯恐出事，派出荷枪实弹的军警，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但从各地赶来观看审判战犯冈村宁次的人们仍像潮水般涌来。

8月23日上午8时10分，冈村宁次在8名宪兵监押下，乘红色警车一辆，自江湾高镜庙战犯监狱抵达临时法庭，在群众的一片怒吼声中进入参议会大楼候审室。国民党官员立即请冈村宁次坐在专门为他准备的大扶手椅上，他对“如此周到照顾，感激莫名”。

国民党官员告诉冈村宁次，为了使这次公审在国际社会和中国民众中产生较大影响，上海军事法庭做了种种准备，会前发出近千张旁听证，邀请外交使团、中外记者和各界代表出席旁听，为公审造成一定声势，但不会为难冈村，请他放心。冈村宁次听了，才放下心来。

上午9时30分，对冈村宁次的公审正式开始。审判长石美瑜偕陪审法官叶在增、陆起、林建鹏、张体坤、检察官施泳、王家楣等，在审判席上就坐。

审判长宣布传冈村宁次和4名从犯进庭。观众一起把眼光投向受审席，只见冈村宁次剃光头，戴着玳瑁边眼镜，身穿草绿色军便服，里套白翻领衬衫，低头走上被审台，昔日耀武扬威的日本皇军气势早已荡然无存。

紧跟在冈村宁次后面的是4名从犯：第二十七师团长落合甚九郎，第一一六师团长菱田元四郎，第六十四师团长船引正之，第八十九旅团长梨冈寿男，一个个垂头丧气，如丧家之犬。

首先由检察官施泳宣读起诉书，控诉冈村宁次作为侵华日军总司令参与发动侵略战争，纵容部下残杀无辜平民。如纵容第二十七师团长落合甚九郎，于1945年1月进犯江西时，残杀中国平民周浩平、王占明等89人；还纵容菱田元四郎、梨冈寿男、船引正之等残杀平民及掠夺财产，无恶不作。

接着进行法庭质询，旨在搞清发动侵华战争的责任及战犯所犯罪行。冈村宁次有恃无恐，态度傲慢，为自己和其他战犯开脱罪责。他胡说对日本侵华政策从未参与策划，也不赞同。声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主谋既非裕仁天皇，也非东条英机、近卫文麿等战犯，而“猜测”是以桥本欣五郎为代表的少壮派军人。强调自己不是杀人放火的直接指挥者，不能负屠杀中国旗民之责。

广大听众见冈村宁次把一切责任推得干干净净，激起强烈愤怒，纷纷要求追查冈村宁次的战争罪行。

庭长石美瑜频频击动法锤，于上午10时40分宣布对冈村宁次的质询完毕，接着对4名从犯进行审理。落合甚九郎等4人一方面为冈村宁次涂脂抹粉，一方面为自己开脱罪责，激怒人们更大的义愤。石美瑜悍然宣布上午宣判结束，下午3时继续开庭审理。

午餐极为丰盛，如同规模盛大的筵宴，冈村宁次和4名从犯吃得满嘴流油，极为满意。

庭长石美瑜和4名法官进午餐时，席间传叫石美瑜接长途电话。不一会儿，石美瑜回到饭桌旁，脸色阴沉地对4位法官说：“刚才接（国防部）秦（德纯）次长电话，冈村一案，暂停审理，听候命令，法庭人员一律不得离开职守。”法官们心中不满，都主张下午继续开庭审判，否则无法向社会

舆论交代。石美瑜对此表示赞成。

下午开庭后，主任检察官王家楣慷慨陈词，强烈主张冈村宁次应负战争共犯之责，希望参照国际公法外以应得惩罚。

辩护律师江一起、钱龙生、杨鹏3人公开为冈村宁次辩护，令听众瞠目结舌。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对此始终念念不忘：“今日的公审，是考虑到对民众和国际的影响，是一次大型公开展览。然而在此情况下，辩护人敢于大胆为我辩护，令人感谢。尤其江一平律师不顾其父反对，毅然出庭，并列举我在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期为供给农民棉布、打击奸商等事例，为我辩护，使我永铭肺腑。1961年6月，我去台北曾经访江一平及石美瑜表示谢意。”法庭辩论极其激烈，直至下午6时30分，石美瑜庭长宣布庭审结束，改日再审。具有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按照惯例，重大案件在辩论终结的当天就要审判，原定3时的宣判无人提起。明眼人不难看出：这是一次愚弄人民、搪塞国际舆论的大平局。

8月23日晚7时20分，冈村宁次回到监狱。典狱长孙介君像迎接凯旋的大将军一般热情招待。次日，他又特意前来冈村宁次的监房慰问，神秘地透露机密说：“对先生的公审判决的时机，（国民党）政府内部有两种意见，外交方面主张等待国际上对其他方面的战犯判决后，斟酌情况再作判决为宜；而国防部方面则主张从速判决。因此，只得请示蒋总统才能决定。下次公审可能是继续辩论，是否立即判决尚未定。”孙介君前脚刚走，军法局徐局长又以来监视察为名，传达国防部长何应钦的慰问之词，问候冈村宁次病情。问候冈村宁次病情。

冈村宁次对蒋介石、何应钦的阴谋心领神会，马上向上海军事法庭递来一件申请状：“因病请求保外就医。”石美瑜情知冈村宁次这个申请状大有来头，他不敢决定，马上转送国防部，很快得到批示，由国防部两名少将高参出面，保外安排在秘密住所。

接连几天，上海和中国各地报纸对冈村宁次公审情况大加报道，不少文章对国民党政府包庇战犯的作法进行激烈抨击，讽刺说拖延三年之久才作戏剧性审判，实不光彩，莫若及早宣告冈村宁次无罪！

冈村宁次的案子一搁几个月，无人问津。外电传说，冈村宁次将送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记者据此向上海军事法庭多次提出质问，石美瑜只得命法庭发言人发表谈话搪塞说：“冈村并未参加日本侵华的中央系统组织，其犯罪仅与在中国战场上发生的事实有关，因此当然不须送往东京。”尽管如此，外面传说很快将对冈村宁次进行第二次公审，第一次公审纪录片将分送世界各国。冈村宁次对自己的命运仍忧心忡忡，忙向可能“通天”的典狱长孙介君打探消息。

1948年10月11日，孙介君来到冈村宁次的住室透露重要消息说：“最近我去南京面谒国防部副部长秦德纯及二厅副厅长曹士澄少将，对先生病情均颇关心。他们认为，现在情况与前不同，社会上众目注视。此时，以在健康许可范围内于狱中静候宣判为宜，并说一般认为，对先生的宣判以等东京军事法庭结束后再做处理为有利。”11月13日，冈村宁次以心脏病及腹泻等症并发为由，申请监外就医获得批准；对他的审判推迟30天举行。

冈村宁次住院后，国防部长何应钦召集国民党高级官员讨论如何审判冈村宁次问题。何应钦、曹士澄主张无罪释放；司法行政部长则主张考虑与

论并与东京军事法庭量刑一致，会议争执不下，只得请示蒋介石。

这时，蒋介石的宠将汤恩伯与何应钦主动配合，在蒋介石面前为冈村宁次苦苦求情，并派心腹参谋龙佐良少将特意访问冈村宁次，透露重要情况说：“约一周前，汤恩伯将军面谒蒋总统，力陈冈村、松井太久郎（参谋长）在停战时有功，应令松井立即归国，对冈村应判无罪，蒋介石大致同意。事为何应钦得知，何应钦认为松井可归国，冈村必须考虑舆论及国际关系，未便立即宣判无罪，应徐图善策以待时机。”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谈及汤恩伯如此卖力地包庇他时，这样：“由于汤恩伯（1924年至1926年间在日本士官学校读书期间）之学业成绩欠佳，结业时校方准备让他留级一年，汤恩伯闻讯后急得要命。不知怎的，又如期毕业，后来得知是我从中帮忙所致，汤恩伯对此铭心刻骨难忘。”汤恩伯则直言不讳地承认这是出于勾结日本战犯共同反共的需要，在《汤恩伯札记摘要》中供认：“民国三十七年，对冈村宁次大将进行审判时，正值华北局势恶化，共产党对此审判也极为注意。在国防部战犯处理委员会审议本案时，行政院及司法部的代表委员均主张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我从反共的见地出发，主张宣判无罪，并要求主任委员、国防部副部长秦德纯，特别是何应钦部长出席参加审议；结果我的意见获得胜利，并经蒋总统批准。”这时候，蒋介石在反共内战中一败涂地，蒋介石玩弄以退为进的诡计宣布下野，李宗仁代总统出面与中共进行和谈。

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将逮捕审讯冈村宁次等日本战犯作为国共和谈的条件之一，国民党政府被迫对冈村宁次进行第二次公审，但蒋介石仍在背后紧紧操纵。

1949年1月22日，汤恩伯又派他的心腹参谋龙佐良到上海会见冈村宁次说，出于对中共的策略，对冈村宁次的审判仍按预定计划进行。蒋介石虽辞职，但是汤恩伯将军仍担任上海警备司令，尽可放心。

预定1月26日上午10时，对冈村宁次进行最后一次公审。蒋介石仍在暗中操纵审判，他担心冈村宁次不能登上新法庭所在地四层楼受审，便通过何应钦、汤恩伯，派国防部官员吴文华、军事法庭副官郭新夫接连探询病情，询问是否需要用担架抬上四楼。冈村宁次对中国当局“不念旧怨，对我关怀备至，情实难忘”，一再致谢。

1949年1月26日清晨，石美瑜把手下法官都叫到庭长办公室，阴沉着脸说：“今天要辛苦各位，请大家发表对本案的处理意见。”大部分法官都怀有中国人的民族正义感，一致表示冈村宁次是中国人民愤恨的头号战犯，为伸张正义，维护民族尊严，为百姓报仇雪恨，应该将冈村宁次处以极刑。

原来石美瑜已受蒋介石的威逼，有苦难言，情知审理此案决不是什么好差事，就玩弄“金蝉脱壳”之计，送上请调报告。谁知请调报告没有得到批准，反而把他提升为国防部检察处处长，又将军衔由少将提升为中将，还接到蒋介石一封密电，电文大意是据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呈请，将冈村宁次宣判无罪，应予照准，云云……石美瑜不敢得罪蒋介石，只得起草了一份替冈村宁次开脱罪责的判决书，呈请新任国防部长徐永昌审阅并签章，算是交差了事。

石美瑜从公文包里取出两份文件，让叶在增等4位法官看，原来是代总统李宗仁和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的两个命令，内容相同：“冈村宁次遣俘

有功，法庭应该宣告其无罪。”石美瑜又拿出一份文件，众位法官接过一看，是抄写得很工整的冈村宁次判决书原本，主文只有6个字：“冈村宁次无罪。”4位法官谁也不愿开口说话。石美瑜便告诉大家判决书已经国防部长批准，拿出盖着徐永昌大印的文件给大家看。法官们面面相觑，暗骂徐永昌卑鄙无耻。

石美瑜将脸一沉，施加压力说：“此案上峰已经决定，我已身不由己。现在，请大家在判决书的原本上签名吧。”谁都知道这是干违背公法和民意的丑事，无人提笔签名。

石美瑜又厉声道：“你们不肯签字，我也没有办法。不过，就在隔壁房间里，已有国防部派来军法局的三位法官等在那里，他们马上可以接办本案，宣布更新审理。”石美瑜说到这里，用手一指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说：“不签字，我们三人就得到那个地下室去，后果怎样，就不需要我说了。”僵持了一段时间，年纪最大的法官陆起打破沉默，说：“一定要签字，那没办法，不过，应允许我在评议本上写下保留意见。”石美瑜考虑再三，无可奈何地说：“保留意见当然可以。”在这种情况下，陆起首先签名，随后林健鹏、张体坤、叶在增依次签名。最后，石美瑜也在那份开脱冈村宁次罪责的不光彩的判决书上签了名。

1949年1月26日，上海军事法庭对冈村宁次进行最后一次公审，规模大大缩小，仅请20多名新闻记者旁听。

庭长石美瑜装模作样地做例行公事性提问，冈村宁次早准备好一套对付审判的办法，不替自己做任何辩解，概由律师代为申辩。最后问他有何陈述时，冈村宁次颇有城府地说：“本人对法庭审判无任何意见，但对由于日本官兵的罪行给多数中国国民造成物质、精神上的灾难表示歉意，同时对因病推迟审判造成工作困难，也表示歉意。”当天下午4时，法庭再次开庭。石美瑜宣布判处独立混成第八十二旅团少将旅团长樱庭子郎、独立混成第四十旅团中将旅团长伊藤忠夫无期徒刑。然后宣布对冈村宁次判决如下：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民国三十七年度战审第二十八号）公诉人：本庭检察官被告冈村宁次男66岁日本东京人前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官陆军大将指定辩护人江一平律师、杨鹏律师、钱龙生律师对上述被告因战犯案由本庭检察员起诉，本庭判决如下：主文冈村宁次无罪理由构成战争犯罪的条件是：在作战期间，犯有恣意屠杀、强奸、抢劫，或阴谋策划违反国际公法以及支持侵略战争等罪行。此为国际公法及我国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二、第三条所明确规定者。

本案被告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接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所有长沙、徐州各会战中日军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广东，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在南京的大屠杀事件等，均系被告到任以前发生之事，与被告无关。

被告在任期间，我军作战大有进展，日军陷于孤立，战意丧失。日本政府正式投降后，被告立即停战，率百万日军奉命投降。在此期间并无上述条款之罪行，只因身为敌军总司令官，而被列为战犯嫌疑犯。

被告在任期间，驻湖南、江西、浙江等地之日军曾发生零星罪行，已由该驻军直接上级落合甚九郎、菱田元四郎等承担罪责，本庭已分别判罪，现在服刑中。以上零星地罪行无以证明与被告有联系，因而不应负共犯罪责。

综合以上各项，依法应判为无罪。

根据以上结论，按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一条第一项、刑事中诉讼法第

二百九十三条第一项判决如主文。

中华民国三十八一月二十六日审判长等人署名盖章。

当时审判人员全体起立，听石美瑜宣读判决书，整个法庭鸦雀无声，当读到“冈村宁次无罪”时，法庭顿时大乱。法庭警察极力挥舞棍棒维持秩序，才使石美瑜读完判决书。

5、战犯竟无罪，中外舆论大哗石美瑜勉强宣判结束，法庭秩序更加混乱，新闻记者怀着强烈愤怒提出种种责问，石美瑜自觉理亏，无法回答，就运用庭长权力当即宣布退庭，扭头躲进庭长室。愤怒的记者不顾法警阻拦，拥进庭长室向法庭提出抗议，但却不能扭转大局。

冈村宁次比谁都更清楚，他作为百万侵华日军最高统帅，是屠杀与掠夺中国人民生命财产的头号战犯。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参加过日本占领青岛的战争；1928年参加侵略济南的战争；1933年、1935年强其中国政府与其签订侵略华北的《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作为日寇华北派遣军司令官，曾对华北等地推行极其残忍的“三光”政策，罪恶滔天。

蒋介石、何应钦再包庇他，也会判7年以上徒刑。现在听到宣判无罪，深感意外，就想向庭长石美瑜表示感谢，但却被拒绝会见。正不知如何是好，法庭副官郭新夫忙走过来向他附耳低语：“啊，先生，还是乘此混乱之机从后门走脱为妙。”一句话提醒了冈村宁次，他恍然大悟，急忙与陪他来法庭的松冈在混乱中从后门溜出，徒步返回寓所。

1949年1月28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严正声明，谴责国民党当局宣判冈村宁次无罪，要求必须将冈村宁次重新逮捕监禁。全国舆论也一致表示谴责，上海各处出现了“不许把日本战犯运走”的标语。

国民党当局颇为紧张，立即悄悄安排冈村宁次坐美国轮船回国之事。28日晚，就派上海军事法庭副官郭新夫通知冈村宁次，次日凌晨6时半之前到战犯监狱集合，与狱中其他战犯一起乘船归国。汤恩伯还派参谋龙佐良送来卡车一辆，便于冈村宁次在29日拂晓乘车赶到上海战犯监狱，与259名战犯一起乘美国轮船约翰·W·维克斯号离开上海回国。

获得国民党政府释放冈村宁次的消息，中国共产党立即通过新华社发表文章，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在国共和谈中，也要求引渡冈村宁次，并以此作为维持国内和平的条件之一。

迫于中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代总统李宗仁下令重新逮捕冈村宁次。但汤恩伯依仗七上海警备司令的职权，以蒋介石为后台，扣压李宗仁的命令不发。李宗仁无奈，后来又命令中国驻日本代表团团长商震，与驻日盟军总部交涉重新逮捕冈村宁次，但被麦克阿瑟总部拒绝。

冈村宁次回国后，被安排在东京国立第一医院住院治疗。

更使冈村宁次吃惊的是，美日当局打破战后严禁悬挂日本国旗的禁令，在医院悬挂太阳旗，向冈村宁次表示慰劳。麦克阿瑟还派盟军总部军官肯尼中校到医院慰问冈村宁次。不久，又同意蒋介石聘请冈村宁次为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高级教官。至此，美国和蒋介石包庇头号侵华战犯冈村宁次的罪恶阴谋暴露无遗，受到中国和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

4、沈阳审判沈阳和太原审判亦称共和国审判，是新中国特别军事法庭对苏联移交和在中国逮捕的一千多名战犯的审判，它的鲜明特色是把罪恶滔天的战犯改造成对社会和人类有用的新人，谱写出世界战犯审判史上的新篇章。经过几年艰苦细致的改造教育，将1017名战犯宽大处理，免于起

诉，立即释放。只分批对45名情节严重的战犯开庭公开审理，分别判处25年以下不等徒刑，刑满后释放归国，受到各国的普遍赞扬。

日本在押战犯闹监风波1950年7月下旬，东北名城抚顺社会主义建设热气腾腾，一日千里，新生的共和国又把审判日伪战犯的任务交给了抚顺。对此，抚顺城东北部高尔山山亭的楹联表达了抚顺和全国人民定能审判日伪战犯的豪情壮志：到此已穷千里目，何须更上一层楼！

抚顺人民紧急行动魄来，把高尔山山脚下日本帝国主义1936年修建的"抚顺典狱"，改建成规模巨大的日伪战犯管理所，更有讽刺意义的是当年的日本"抚顺典狱"典狱长大村忍，现在作为苏联移交给中国的战犯之一，也关进抚顺战犯管理所。他担心中国"以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认为准没有好下场！

实际上，不只一个大村忍，几乎所有日本战俘都有大祸临头之感，特别是在抚顺当过警察局局长的柏叶勇一在火车上一看见"抚顺城"三个字，就吓得魂不附体，想到他曾在此屠杀许多抗日分子，今天落入中国人民之手，又重归抚顺，必被处死无疑。铃木启久、藤田茂等30多个将级军官全有死到临头之感，因而一个个气势汹汹，摆出武士道军官的架子。

藤田茂身穿将校呢军服，头戴战斗帽，佩带标志中将军衔的肩章，撇着仁丹胡子，傲慢地迈着方步走在最前头，铃木启久、佐佐真之助等30个将校级军官紧跟其后，后面的900多名战犯也态度嚣张，带示威性地走进抚顺战犯管理所，仿佛他们不是战败后被战胜国收押待审的战犯，而是耀武扬威凯旋的武士道英雄！

这些日本战犯一进抚顺战犯管理所就存心闹事。凡属罪证，都妄想一概否认。师团长铃木启久携带9个大提包，装满从中国掠夺的文房四宝和贵重首饰衣物；藤田茂把随身携带的玉石雕刻蟋蟀，说成是"朋友送的礼物"。对此，管理人员都如实照登，开列清单交战犯保存，保证释放时如数返还，他们谁都不信。

更可笑的是在登记姓名、职务时，日本战犯都把大官写成小官。如在抚顺当警察局长的柏叶勇一在登记表上填的是"社会役員"（勤杂工），管教员早认出了他，当众揭穿说："你在抚顺呆过吧？是不是在警察局？？柏叶勇一见被抓住了狐狸尾巴，才被迫填上："当过警察局长。"也许是从伯力到抚顺一路太疲乏劳累了，日本战犯们当夜躺下呼呼大睡，第二天睡够了就开始群起闹监。

突然之间，各个监房里乱作一团，战犯们用力敲打门窗、床铺，大喊大叫："我们是战俘，不是战犯！"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孙明斋觉得日本战犯自以为抓到了一个要害问题，竭力想把自己归入战俘之列。因为战俘要遣返，而战犯须接受审判，很可能被判刑，甚至像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一样被送上断头台处以极刑。事关每个战犯待遇，因而一千多人都跟着起哄闹监。

孙所长正要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一个战犯（姑隐其名）主动找到所长室，将黑边眼镜一托说："所长先生，我向你们提出抗议！"孙明斋是个久经沙尝能征惯战的老八路，看自己昔日的手下败将竟然如此嚣张，不由气炸心肺，但为把昔日的战争魔怪改造成弃恶从善的新人，还是耐着性子搬把椅子请他坐下讲话。这位战犯仍像木桩一样站在那里，唾沫四溅地口出狂言道："所长先生，你们在大门和岗楼上安排那么多持枪的士兵站岗，对我们刺激

太大了！我代表被关押这里的无辜的日本人，请你们立刻把岗哨撤掉！否则。……"孙明斋义正辞严驳斥说：“你不觉得你提出的这些无理要求过于荒唐了吗？你说你代表关押在这儿的无辜的日本人，好大的口气！我问你，你是干什么的？是谁给你的代表权？你们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怎么又竟然成了无辜的人？设岗哨刺激你们了？可是，你是否想过，你们犯的滔天罪行是怎样‘刺激’中国人民的！”毕竟邪不压正，那个战犯被驳得哑口无言，灰溜溜地鞠个躬溜走了。

这时候，还有一个闹得更凶的日本战犯，他就是伪满锦州市警察署警务科长鹿毛繁太，这家伙嘴大鼻歪，又黑又壮，俨然像一座黑塔，他猛敲铁栅，大喊大叫，凶恶地骂看守“混蛋”，日本战犯们都为他鼓掌叫好，把他吹捧为“磊磊落落的民族英雄”。

鹿毛繁太嚣张到了极点，打上门去要和所长孙明斋辩论。

孙明斋感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另一个战场，是改造日本战犯的重要一仗，便做好准备要与这位又臭又硬的武士道英雄舌战一常孙明斋以咄咄逼人的目光逼视面前的日本战犯，威严的目光是说你在1937年前后，曾抓捕中共柳河县委组织部长郭喜明等52人，杀害了赵永玉等25人，还在柳河西门外杀害的抗日爱国人士22人，在大青沟、石头河子等地屠杀无辜百姓多人！

鹿毛繁太想到欠中国人民的条条血债，心虚地冒出冷汗，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只听孙明斋大吼一声：“鹿毛繁太，你知道你在监内的表现是什么行为吗？”鹿毛繁太狡猾地转守为攻：“我们是战俘，不是战犯！”孙明斋抓住要害发动猛攻：“我要你答复：你这么长时间大嚷大叫闹监是什么行为？”鹿毛繁太避开实质问题，仍按他的战术反攻：“你们凭什么关押我，不让我回国？我是来帮助中国百姓维持治安的！”鹿毛繁太自以为理直气壮，只听孙明斋厉声质问：“中国老百姓什么时候请你来中国帮助维持治安？”鹿毛繁太被一炮打哑，无言以对，但鬼眼珠眨了几眨便想出狡辩之词：“我奉天皇陛下的御旨！”孙明斋振振有辞驳斥说：“天皇是你们日本的，你们日本的天皇为什么把手伸得那么长，要管中国的事情？”“这。……”“你要明白，我们不是到日本把你抓来的，你正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中，执行昭和天皇的侵略政策而犯罪的战争犯罪分子，你们是名符其实的战犯！”

“鹿毛繁太一下被重型炮弹打乱了阵脚，急忙乱找搪塞之词：“你们是战后新独立的国家，无权关押我们，你们违反国际法！”孙明斋见日本战犯竟不顾羞耻讲起国际法，真要笑破肚皮，就辛辣地讽刺说：“你既然懂得国际法，那么，你来回答：国际法哪条规定，一个国家侵略另一个国家是合法的？”

“这。……”……"孙明斋见鹿毛繁太理屈词穷，就越战越勇，扩大战果：“违犯国际法的，恰恰是你们，而不是我们！对你们这些罪该万死的日本战犯，按照中国法律关押、处理，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你必须老实承认你是个战犯！”鹿毛繁太无言以对，孙明斋勒令他写出检讨，鹿毛狼狈不堪，软磨硬抗，孙明斋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命令他写出检讨，并把他关进单人小号，鹿毛害怕触犯中国法律，写了4次检讨才算勉强通过，并在喇叭里公开检讨。这个“民族英雄”举手投降，使日本战犯们遭受沉重打击。

随着朝鲜战争爆发，战犯管理所迁移到哈尔滨，日本战犯错误地分析形势，以为美国会派兵来救他们，活动更加猖狂，扬言伙食太差，竟把送来的高粱米饭倒入厕所和垃圾桶，叫嚷要吃大米饭，不给大米饭就罢食，吵嚷

吼叫“饿啊，饿啊！”闹个不停；给他们打针，胡说是进行细菌试验；让他们洗澡，硬说临刑前“净身”；原日本步兵中佐广濑三郎等7人合伙闹事，打上门来抗议中国关押；几十个战犯联名给联合国写信，“控告”中国关押、审讯“战俘”。

更严重的是日本黑社会组织“黑龙会”分子利用日侨来抚顺战犯管理所修理电器的机会，阴谋策划了两起暴动越狱计划，声称“逃出一个算一个，逃出几百算胜利”。谁知两个战犯因下棋“悔子”发生争吵，泄露了暴动越狱计划。

孙明斋所长立刻把组织越狱的骨干分子单独关押，命令各牢房严锁房门，减少放风时间，限制上厕所人数，加强武装警戒，全力以赴对付这帮不思悔改的日本战犯，形势极为紧张！

这些战犯是怎么被教育过来的呢？战犯铃木启久在狱中提“抗议”中国特别军事法庭对铃木启久的审判，就其所犯罪行之重，态度之蛮横，认罪态度之好来说，都很有典型性。

1950年7月18日，在苏联交给我国的日本战俘中，有个中将师团长身穿保存的将军制服，佩戴着满金两个豆的肩章，脚踏高筒黑皮靴，挺胸迭肚大摇大摆架子十足，秃头下面的满脸乱蓬蓬的络腮胡须使他野性十足，浓眉下目光射出仇恨的光芒，他就是关东军第一一七师团长铃木启久。

从伯力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第二天，铃木启久就和30多个将级军官密谋闹监风潮，他们策动伪锦州市警察署警务科长鹿毛繁太公然出面闹监，又联合提交了一份名义上写给联合国的书面抗议书，声称他们是战俘，应当释放，抗议中国把战俘当战犯，违反国际法。孙明斋所长答复铃木启久等说：“抗议书，我们留下了。哪一天你们想通了，提出收回，我们保证发还。希望你们还是像圣经上讲的那样，要想进天国，唯有彻底改悔吧！”铃木启久仍不死心，叫嚷“我们是战俘不是战犯，你们把战俘当战犯，违反国际法，我们抗议！”管教人员很有策略地回答：“根据你的罪行，是战俘呢，还是战犯，你自己考虑考虑吧！”经过在中国各地的参观，万人坑的白骨使铃木猛醒，他开始交代自己的罪行。

1956年6月10日上午，中国军事法庭在沈阳首先审问铃木启久，控诉他1941年12月到1944年10月，他在日本侵略军中任联队长和师团长时，指挥所属部队在河北、河南制造了六起集体屠杀和平居民的惨案。

法庭首先追查铃木启久血洗河北省遵化县鲁家峪的罪行，铃木供认他作为日寇第二十七旅团长兼唐山地区防卫司令官，1942年对遵化县鲁家峪进行扫荡，杀死220多人。

国家公诉人王志平将军指出铃木启久率部在鲁家峪杀人的手段是很恶劣的，杀人甚多，但铃木启久的供述太简单，建议传当事人张俊金到庭，对铃木部队杀人放火、强奸妇女等罪行作证。

审判长袁光传受害人张俊金出庭，张俊金愤怒地指着铃木揭露说：“铃木部队在鲁家峪村杀人放火、强奸妇女的罪行，时间是1942年农历3月初2下午2点左右。日本鬼子包围了我们村，把我捉住，用马鞭子打我，问我有八路没有，我说没有。

日本鬼子又抓来一个老头，有50多岁，问他有八路没有，他说没有，日本鬼子就把他的眼睛蒙上，用战刀把他的头砍掉了。日本鬼子把于长河的

老婆子带到刘清隆的院子里，要强奸她，她拒绝强奸，大骂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把她带到河沟边，用刺刀把她挑死了。她还是个孕妇，日本鬼子豁开她的肚子，把胎儿也挑死了。然后鬼子就拽刘清隆的老婆进行强奸，强奸后也用刺刀把她挑死了！”张俊金控诉铃木率领日寇找到几个山洞，放毒杀害八路军干部和伤病员72人、无辜百姓100余人，又脱下衣服让法官察看他的满身伤疤，失声大叫控诉说：“日本鬼子在鲁家峪大街上砍死7个人后，砍到第八个时就拽我，把我的衣领子窝起来，蒙上眼睛，我挣着不让蒙眼睛，日本鬼子就把我踢到井里，接着打了两枪，都打在我的身上，我的骨头被打坏了。日本鬼子又往井里扔死人、石头、土，扔完就走了。日本鬼子走后，送凉水的赵奎来取水桶，听见井里有声音，把我救上来了。我出井后就昏过去了，此后五六个月不能行动，以后就成了残废。日本鬼子在我村打死、烧死、熏死的人共有200多个。张俊金像发疯一般冲上去要和铃木拚命，法官急忙命法警拦祝接着，法庭追查铃木指挥日伪军制造“潘家戴庄惨案”的罪行。铃木供认1942年10月为执行“三光政策”，曾向所属第一联队和平兵队下过“彻底肃清潘家戴庄”的命令，使日军在潘家戴庄集体屠杀了1280多名和平居民的罪行。

法庭传从潘家戴庄死人坑里逃出来的周树思出庭作证，这位44岁、浑身是伤的农民流着眼泪控诉说：“1942年10月28日早晨4点钟左右，日本鬼子包围了潘家戴庄，进庄后挨户搜查，把人赶到庄东南角一个大场里，强迫青壮年挖坑，把1200多人都推到坑里火烧埋死。我被烧得疼痛难忍，就从土坑往外钻。钻出来一看，鬼子都不在了，我就这样逃跑了。”周树思说他家20口人，被铃木部队杀害了6口，村中血流成河，粮食牲畜被洗劫一空，又剥开衣服露出遍身伤疤。周树思的血海深仇激起旁听席上人们强烈的怒吼声，铃木启久“扑通”一声跪倒在法庭之上，连连喊着“饶命！饶命！”承认“这些完全是事实，我诚恳地谢罪！”铃木还供认1944年10月17日以师团长身分命令所属部队在河南省长坦县小渠村，以刀砍、火烧和推入井内淹死等手段杀害无辜百姓刘俊英等660人，造成小渠村惨案；又供认1945年8月12日命令所属部队烧毁、破坏了吉林省白城县的车站、给水所、电话所、铁路医院、粮食仓库和桥梁等设备，仅被烧毁的粮食即有8400余吨、油类28万斤。

沈阳法庭经10天审理，基本搞清了铃木启久所犯指挥部制造无人区、残杀无辜百姓等罪行，铃木也供认不讳，他痛切地说：“对自己的残暴行为，起初曾企图隐瞒，但在中国人民对我人道主义态度的感召下，启发后进行反省，认识了自己的罪行，我诚恳地谢罪……铃木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他对记者发表感想说：“我按照我过去的罪行来判断，认为中国对我这样悖逆人道，违反国际公法的作法，当然要从严处断，处以极刑。但是，只判处20年徒刑，这是由中国的真正的和平政策产生出来的，今后我一定要成为和平的一分子，参加到和平阵营，以我的余生进行努力。”在抚顺战犯监狱服刑期间，铃木启久服罪、认罪态度良好，1959年被中国政府特赦释放回国。他的起来中国接他，日本记者问：“你回国以后准备做什么？”铃木立刻回答：反对战争，争取和平。我知道记者的职责是真实报道，我希望你们真实报道这里的情况。

藤田茂的新生藤田茂被称为日本战犯中的“武将头”，他转变极难，便转变后影响巨大。

藤田茂1889年生于日本广岛县，侵华战争期间曾任大佐联队长、少将旅团长、中将师团长等职务。从苏联移交给中国后，他态度蛮横，每天都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一角有个佛像的小独屋里匍匐在地，拍着那身中将制服，向皇宫遥拜，密谋和中国作对。他悄悄打开私藏的小盒中的玉石雕刻蟋蟀，把从中国掠夺来的玉歧视为宝物，欣赏玉石蟋蟀的白色牙齿，绿色翅膀，呆呆地看那四脚蹬开咬斗的姿势，也想方设法与中国较量决斗。

那时候，日本战犯中有这样的说法：武将看藤田，文官看古海。藤田出身日本封建武士家庭，很有大将风度，在日本战犯中威信较高。他为向管教人员示威，穿上特意保存的将官服，肩佩中将肩章，翘着两撇浓密而微弯的仁丹胡子，足蹬乌黑发亮的高筒皮马靴，大摇大摆走在前头，一大群战犯跟在他后头，一片呼喊“天皇陛下万岁”“大和魂万岁！”管教员根据藤田茂的性格、思想脉络和在战犯中的影响，找他个别谈话，藤田抖着仁丹胡子拒绝道：“你们是共产主义者，我是帝国主义者，是日本军人，没有谈话的必要！”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胜利使藤田茂受到沉重打击，他不再轻视中国人民了。管教员组织他们学习《帝国主义论》、《矛盾论》、《关于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批判》。他是个重实际的人，慢慢明白侵略别人国家的军队，必然陷在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毛泽东讲战争的胜负不取决于武器而取决于人心的向背，他觉得中国共产党深得人心，毛泽东是个伟大的预言家，开始明白中国和日本所受的灾难是日本军国主义造成的，也有他一份罪恶！

他接到姐姐的来信，得知姐姐全家及广岛市20万人全部在美国投掷的原子弹中丧生，心灵更受到强烈谴责。

在中国各地参观中，一处处日本屠杀中国人的万人坑，使他受到强烈刺激，认识到日本所受灾难的罪魁祸首是日本军国主义，其中也有自己一份罪恶，他毅然剃去仁丹胡，决心迎接审判。

在法庭上，62岁的老妇人张葡萄控诉他率领部队对山西省安邑县扫荡时杀害被俘人员140多人，全家都被杀害，只剩下她一人。张葡萄越说越激动，气得浑身发抖，白发倒竖，隔着桌子向藤田茂起来，多亏法警阻拦，才没有和藤田茂拚老命。

听了26个人的血泪控诉，藤田茂认为理所当然要判他死刑，结果只判了18年徒刑，在法庭最后陈述时，他说：“我在胜利了的中国人民的法庭面前，低头认罪。按我的罪行，杀一万个藤田茂也是应该的。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把我变成了吃人的野兽，使我的前半生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国政府教育我认识了真理，给了我新的生命。我在庄严的中国人民的正义法庭上宣誓：坚决把我的余生，贡献给反战和平事业。”藤田茂是“武将头”，他认罪服法对推动他日本战犯改造起了推动作用。

日本记者想从藤田茂口中得到攻击中国的材料，别有用心地问“你们的所谓学习，是否被迫的？”藤田茂让日本记者碰了个大钉子：“没有学习，就没有我的再生！我正和夫人谈话，请不要打扰！”藤田茂与其子相见更富有喜剧性。藤田茂首先向妻子喜代子鞠了一躬说：“真是对不起，这十几年让你受苦了！”这一躬使喜代子大吃一惊，因为过去丈夫对他打骂是家常便饭，现在觉得中国真是把他改造得好多了，她喜极而泣，抱住丈夫一句话也说不出，平静下来才问丈夫：“在我的印象中，你是个很正派的人，说您杀人放火，我真不敢相信。”藤田茂认真地用检讨的口气说：“我确实是个战犯，我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杀了很多人，我不是人，我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

鬼，但是中国政府宽大了我，我在这里天天学习，就像在中国留学一样，希望你回国后要学习进步书籍。”喜代子明白真相后，对中国的怨恨立刻消失，认为丈夫犯罪也有她的份，要求与丈夫一起在中国服刑。中国管理所人员哈哈大笑，鼓励喜代子帮助丈夫加快改造，争取早日回家团聚。

不久，他的老同学远藤三郎率领日本前军人访华代表团访华，见到藤田茂时说了一些同情的话，藤田茂教训远藤说：“你们都是日本高级将领，在推行日本军国主义战争期间，演出了不少类似于我们这样的悲剧。忘记过去的历史，今后的日本就没有希望。我们只有在深刻反省的基础上，取得中国人民谅解的基础上，才有资格谈日中友好。”因认罪态度较好，藤田茂1957年提前释放归国，回国后被选为“中归联”会长，致力于促进中日友好，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周总理亲自邀请他率团访华，亲切接见他时，高度赞扬他为中日友好所做的贡献。临别时，周总理赠他中山服寄托着无限的深情。1982年他逝世时特意穿上那套中山服，并要求子孙世代代与中国友好。

古海忠之脱胎换骨古海忠之1900年年生于日本东京都，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曾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主计处特别会计科科长、一般会计科科长、主计处处长、经济部次长、总务厅次长兼企划局局长等职务，被称为伪满洲国的二号太上皇。

在苏联移交给中国的近千名日本战犯中，古海忠之和藤田茂是两个头头，典型的说法是“武将看藤田，文官看古海”。

古海忠之被日本战犯们称为“老学究”，别看他瘦瘦的，有一张马脸，给人面目可憎之感，但认为他最有学问。他毕业于日本著名的东京大学经济系，20多岁就当上了宇都宫税务署署长，他的才能得到伪满洲国第一任太上皇星野直树的赏识，星野调回国内任日本内阁总务局局长、企划院总裁后，特意调古海忠之继岸信介之后当伪满第二号太上皇。

日本战犯们敬重古海忠之，还因为他文质彬彬，谦逊有礼，谨慎寡言，不卑不亢，有着典型的高级知识分子风度，佩服他遇事有办法，能讲出个道理来。

刚到中国时，他运用举足轻重的影响，告诉日本战犯凡是罪证一概否认，鹿毛繁太等莽汉的闹监大都是他的主意。

古海忠之的转变主要是他看书学习的结果。抚顺战犯管理所设有图书馆，古海忠之是最常去的读者，一看起来就废寝忘食。

古海最早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发现在日本发动以“七七事变”为标志的全面侵华战争10个月后，毛泽东就英明地预见中日战争的结局，他如梦初醒，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应该发现，日本早就败了！”他令人信服地说：“我们过去根本未曾想过侵略他国的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受到中国人民的反对，世界舆论的反对，最终必定失败！1945年‘八·一五’投降时，我们还不肯认输，现在，读到毛泽东早在开战之初，就从理论上预见结局，真是从心里钦佩和服输了。”也许因为他是搞经济的，在别人眼里干巴巴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他看起来津津有味，爱不释手，有的武将和他开玩笑，说他不玩麻将不迷游戏，单单和共产主义书刊搞开“单恋”了。

大部分战犯认为古海是闲极无聊，逢场做戏，但在一次大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工作团的李甫山主任的话却使日本战犯们大吃一惊：“坦白检举大会开始，首先由古海忠之做自我批判，认罪示范。你们要认真听，向

他学习。"日本战犯们心里感到好笑，他们的"文官头"是日本天皇的代表、"大和魂"的体现者，他只会"自杀成仁"，决不会举手投降！看吧，古海忠之准会借此机会大骂共产党，今天准有好戏看！

在众目注视之下，古海忠之稳稳当当走到扩音器前，鞠了一遍转圈躬，就开口讲道："我犯下了极为严重的滔天大罪，我向中国人民真诚地谢罪！我向给我以机会，指导我反省并使我恢复了人性的中国人民和管理所各位先生，表示真诚的感谢！"这犹如投下一颗重型炸弹，日本战犯们大吃一惊，接着他诚心忏悔说："过去，我认为我们到中国来，虽然给中国人民造成种种灾难和不幸，但是为日本的民族利益，是为个人的光宗耀祖。

现在我已认识到，我简直是一个失去了人性的不知羞耻的恶魔，是一个不可饶恕的战争罪犯！日伪许多官吏贯彻执行我制定的法令，犯下了各种罪行。对此，我应负重大责任。我还认识到，在侵华战争中，日本夺去上千万中国人的宝贵生命，掠夺了中国几百亿美元的财产，这一滔天罪行，我也是有重大责任的！"古海承认了在中国犯下的种种罪行后，特意谈到接受中国审判的理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法有了新的发展。策划和指挥侵略战争的固然是甲级战犯，但是也有规定：凡在侵略战争中犯有各种罪行的人，无论他的职位高低，被侵略的战胜国，都有权定其为乙级或丙级战犯，并根据本国的法律自行处理。根据这一点、我们没有理由不承认自己是战犯，没有理由不接受中国政府的侦讯和审判。"古海忠之本来就在日本战犯中有较高威信，示范认罪又有理有据，因而有不少人相信古海忠之的权威性说话，承认自己是战犯，争取宽大处理。

到中国各地的参观，使古海大开眼界，特别是到鞍山一看，更让古海惊呼连声。古海作为伪满的第二号太上皇，多次到鞍钢视察。日本投降时曾将鞍钢彻底破坏，狂妄地断言："把鞍山留给中国人种高粱吧！要想恢复出钢，最快也得20年！"古海亲眼看到鞍山已全部恢复，还新建了不少高炉，古海连声惊呼："这不是神话吧？惊人！惊人！"在沈阳公开审判法庭上，古海忠之打头走上被告席，首先承认他是日本统治、操纵伪满洲国的最高权力机关"火曜会"的重要成员，介绍该机构的情况说："'火曜会'是审查决定在'满洲国'实行的政策、法令、预算、人事及其他措施的会议。'火曜会'不是'满洲国'的正式机构，也不是组织法上的构成部分，但它是事实上的组织，是日本人统治'满洲国'的最高决策会议。这个会议决定政策、法令和措施，在组织之外，对'满洲国'国务院会议和参议府会议进行控制，为实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起了决定性作用。'满洲国'从表面上看好像是通过国家的形式进行统治，实际上都是披着中国人民的外衣。'火曜会'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国'实施各种侵华罪行的集中表现，同时也是我成为这个'火曜会'的组成人员以来罪行的集中表现。我认为这个制度实在是非正义的，非真理的。"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出庭作证说："古海忠之直接辅佐着武部六藏，参与策划、制定危害中国东北人民的一切政策法规，所以古海忠之是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的唯一辅佐者，他也是'火曜会'最重要的成员。"伪满洲国总务厅长王贤伟揭露古海忠之说："1945年的春天，我参加了武部六藏主持的'火曜会'会议，在古海忠之的极力主张下，通过了扩大总务厅企划处的组织，把企划处改为企划局，古海忠之亲自兼任企划局的局长，他集中了满洲国的一切实权，以便更有计划地加强对中国东北人民财富的掠夺，使中国东北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遭受严重的危害。

由于武部六藏和古海忠之的策划，制定了各种镇压、屠杀、奴役中国东北人民和掠夺中国东北财富的政策法令。对这些罪行，武部六藏应负完全的责任，古海忠之也应该负参与策划制定和推行的主要责任。”沈阳法庭严肃追查古海忠之对中国东北进行经济侵略的罪行，古海供认说：“我起草并在‘火曜会’会议上审议决定了第一次和第二次《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及《日满华经济建设联系要纲》、《战时紧急经济方策要纲》，主要是为进行军事生产。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对中国的侵略而建设一个由日本自己所支配的掠夺的侵略的经济圈，用这样一个经济圈来建立适应各个地方的产业，以便有计划有系统过建立他们的经济圈。……以进一步增加军需生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大量供应物资。为了这个目的，在‘满洲国’内进行了残酷的经济统治，大力征用劳工，掠夺资金，并在中国的东北、华中等地协力互通有无，尽量减少日本帝国主义的负担，尽可能掠夺更多物资，以支持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古海忠之供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以总务厅长次长身分参与策划、决定和推行《战时紧急方策要纲》，从中国东北掠夺走大批煤、铁、铝、石油等战略物资，用以支持侵略战争。

他供认，1940年6月至1941年11月，参与策划、推行《价格等临时措置法》，推行《物价及物资统制法》，哄抬物价，榨取东北人民财富。

古海供认，他参与、推行《金属类回收法》，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金属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战时最感到困难的东西，当时‘满洲国’也感到缺乏，因此就制定了《金属类回收法》，禁止转移金属，这样便于‘满洲国’任意大量收买金属。同时在中国整个东北展开金属献纳运动，掠夺了大量的铜、铁、铅等金属，还毁坏了中国的一些历史文物，如对承德‘离宫’的铜亭、五大莲寺的佛像等也加以破坏。”审判员质问他掠夺人民日常生活用品采取了什么措施，古海供认说：“对中国人民日常用的锅、金属门把、铁刷子、铜平等，甚至暖房里使用的机器都全部掠夺了。同时在我所主持的‘物资动员计划’中对人民日常使用的铁、铜等用品根本不配给，征用的人民日常用品有100余种，我就是使中国人民陷入到贫穷、破产甚至死亡深渊的一个极凶恶的犯罪分子。”古海供认他参与制定、推行《米谷管理法》、《粮谷管理法》、《特产物专管法》、《农产物交易场法》、《战时农产物增产搜荷对策大纲》等政策法规，大量掠夺农民粮食，甚至在各省次长会议上做出使用强暴手段夺取农民粮食的决定，使东北人民饱受饥饿摧残。

中国军事法庭追究古海用鸦片等毒品毒害中国人民的罪行，他供认说：“我参与鸦片政策，首先在1932年到1933年初，‘满洲国’制定鸦片专卖制度时，我以总务厅特别会计科长身分，参与制定了这个制度。以后把鸦片专卖作为特别会计的时候，我从任特别会计科长到主任外长的期间，主管了编制鸦片专卖的预算及决算的事务。我就任总务厅长次长以后，仍旧领导有关鸦片事项，负责编制鸦片专卖的预算及决算。”中国军事法庭掌握了古海忠之等日本关东军头子在中国推行烟毒政策的罪证，于是审判长袁光单刀直入提问：“你是不是亲自到过上海、南京推销鸦片？”古海忠之见中国掌握他的罪证如此之细，只得老老实实供认说：“在总务厅长次长任内，我于1944年亲自到过上海、南京，通过派遣军总司令部卖给汪精卫南京政权10万两鸦片，在当地订了契约，后来正式做出决定，把大量鸦片送往南京，使严重的烟毒传播到更广泛的地区。我不仅把烟毒更广泛地传播到上海、南京

及其他地区，并且在上海掠夺了战时需要的大批物资，如棉布、汽车、铜等。"审判长袁光对日本在中国贩毒问题专门进行过研究，进一步追问：“你们在中国东北地区为了推销鸦片，施行毒化，采取了什么办法？”古海忠之供认说：“我们在东北各地建立了不少制造鸦片的工厂。1933年初，我和当时的财政部税务司长源田松三乘飞机把大量种植鸦片的传单运到热河一带散发，这是鼓励热河省和兴安西省人民大量种植鸦片的一种方法。‘满洲国’曾有一个‘十年禁绝鸦片’的欺人招牌，大东亚战争爆发时，我认为一切政策都要为战争服务，因此我就任总务厅长次长以后，将这个招牌也抛弃了，公然推动大量种植鸦片。为此，1942年采取了提高鸦片收购价格、对收购组织发给奖金等各种措施。1942年，在东京由‘兴亚院’召开了‘支那鸦片需给会议’，由企划院召开了‘建立大东亚鸦片制度恳谈会’。我派遣了‘满洲国’的官员出席这两个会议。会议决定张家口也就是蒙疆及‘满洲国’负有鸦片供应地的使命。根据会议的决定，我决定扩大鸦片的种植面积，即除过去在热河盛兴安西盛间岛继续种植鸦片外，又在平原地区，也就是在奉天盛吉林盛四川省等地区推行了集体种植，生产了大量鸦片，使鸦片烟毒的传播更加严重。对此，我应负责任。”审判长对日本帝国主义公然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义愤填膺，怒声喝问：“所谓的‘十年断禁鸦片’，‘断禁’了没有？”古海忠之苦笑着回答说：“1937年，在‘满洲国’掀起了反对吸食鸦片的舆论，当时为了缓和这种舆论，需要采取一些措施，因而，制定了《十年断禁鸦片和麻痹品要纲》，采取了十年断禁鸦片、麻痹品的欺骗政策。因为在这个要纲里并没有规定为了断禁鸦片而必须缩小鸦片的栽培面积，也没有禁止吸食鸦片的工作计划，更没有限制贩卖鸦片，因此，并没有断禁鸦片和麻痹品的意图。特别是我在任主计长长期内，为了增加‘满洲国’的收入，同时也为了削弱中国人我对日本的反抗，我认为这种鸦片政策有它的重要性。我推行了使一个民族衰亡的量可怕的鸦片政策，广泛地传播鸦片的烟毒，同时又掠夺了大量的资金，我这种行动是违反国际公法的，是不可饶恕的非人道的罪行，我不胜惭愧。”古海忠之还供认，1940年6月至1941年11月，他以伪经济部次长身分参加‘火曜会’，参与修改《出版法》、《满洲国通信社法》、《新闻社法》等罪恶法令，并且以伪总务厅长次长身分负责领导总务厅弘报处，控制东北的新闻、出版、通信等宣传工具，鼓吹侵略战争，向东北人民灌输奴化思想。

在做法庭最后陈述时，古海忠之痛哭流涕说：“过去，我为了拥护和保证以天皇裕仁为首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同时为了追求我个人的飞黄腾达和家门的荣誉，毫无理由地侵入中国的神圣领土东北。我剥夺了这个社会的主人--中国绝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对他们进行了镇压、残杀、奴役和鸦片毒化，掠夺了中国的物资财富，强占土地房屋，我确实犯下了滔天罪行。”根据古海忠之所犯罪行和认罪态度，中国特别军事法庭判处古海有期徒刑18年。

古海忠之激动地对记者发表感想说：“在这次审判时，尽管我认为应该被判处极刑，中国政府仍然作了非常宽大的判决，对我只判18年徒刑，而且可以把被捕以后的日数抵算刑期，这实在是想都不敢想的宽大政策。

我希望日本的人士想一想我过去所犯的 errors 和污秽的罪恶行为。我现在已经认识到发生侵略战争的原因，而它的结果又是什么。我要说明我的决心：我不论处在什么情况下面，都要贡献出一切，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和

平而斗争。"古海忠之是个说到做到的人，他被判刑后马上就受到考验。

当时日本首相岸信介是古海的前任，又是古海的老朋友，听到古海被判18年徒刑的消息，马上派古海的老部下、水栖市市长赶到抚顺，看看古海忠之是否变心，千方百计拉拢古海参加反华活动，这位市长甜言蜜语说：“古海君，您将来回国以后，是否还有意做官啊？岸信介先生很关心您哪！”古海忠之早已看穿了岸信介之流的可耻居心，冷笑一声回答他的老朋友、老部下：“请您转告岸信介，他的盛情，我难以从命。岸信介当年还不是同我一样，是侵略中国的罪魁祸首吗？如今他向美国一边倒，执行敌视中国的反动政策，莫非想重走老路，再一次使中国人民受难吗？我怎么能给这样的家伙当爪牙？不！绝不！”见老部下被训得面红耳赤，张口结舌，古海忠之才把语调变得温和一些，但态度依然如故：“那么，我获释后做什么呢？我要积极从事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工作。我决心促进中日友好，这一点，我不妨代为转达。”1958年，藤田茂获释离华归国时，古海忠之请他带给岸信介一封长信，揭露岸信介曾当过伪满总务厅次长，炮制了许多为战争服务的法令，指责他和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一样都是侵略战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使中国人民陷于苦难的军国主义者，当上首相后不思反省，反而追随美帝国主义，与中国为敌。古海在信中警告岸信介：“凡是想把日本民族导向毁灭的人，他就是日本民族的公敌，不久就会在民族的裁判面前自己打破自己的头颅。”藤田茂要求向岸信介转交古海的信，岸信介不敢接见，藤田茂就将《古海书简》公开发表，引起朝野轰动，一时被传为美谈。

古海忠之在抚顺战犯监狱表现较好，1963年2月提前释放，3月12日回到日本，很快投入“中归联”的活动之中。他因知识渊博，经验丰富，同年即被推举为“满蒙同胞援护会”副会长，并担任相互贸易公司和出光兴产公司顾问。

他的经济才能得到充分发挥，1966年任大谷重工业公司副经理，1967年任星制药公司理事、东京批发公司副经理，1968年任东京批发公司副经理，后任经理、董事长。

古海战前曾与池田勇人同在大藏省共事，私交甚笃。古海在苏联、中国关押期间，池田对古海家属多方照顾。古海回到日本后，两人在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等问题上有共同语言，合作较好。

在池田帮助下，古海忠之在日本政界、经济界都非常活跃，曾担任日本内阁在外财产问题审议会委员、内阁海外移民审议会委员。还出任白露田园俱乐部董事长、新大谷饭店理事、“满蒙关系思给期成同盟”会会长、日本预防医学会会长。

1978年10月，古海忠之率领日本大藏省出身者访华团访问中国，受到廖承志副委员长的亲切接见，他以自己曾是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学习积极分子感到骄傲，说自己不花一分钱，在中国读了4年大学。他深情地回忆在抚顺管理所学习《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的难忘情景。他说是中国人民使他恢复了良知，才能够为促进中日友好尽一份力量。

古海忠之著有《不能忘怀的满洲》一书，笔端带着浓厚感情写出他在中国东北的巨大变化，成为中日世代友好的一个例证。

战俘武部六藏的巨大变化武部六藏是日本制造的伪满洲国的“太上皇”，他的经历是独特的，故事格外动人。

武部六藏1893年生于日本石川县，1918年东京帝国大学法学

部毕业，被日本当局看重提升为秋田县知事，可以说身居高位。侵华战争期更官运亨通，1935年任日本统治我旅大地区机构"关东局"司政部长，次年升"关东局"总长。1939年任阿部内阁企划院代理总裁，1940年到中国更进一步登天，担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名义上辅佐伪满洲国总理行使职权，实际上他的权力在伪满洲国政府中超越一切，被称为伪满洲国的头号"太上皇"。

1945年苏联红军对日宣战后，武部六藏主持召开伪满洲国内阁会议，伪总理张景惠六神无主，把当前紧张形势报告一下，就要武部发表意见，武部六藏说：“目前情况对满洲自是极为不利，关东军已准备与苏俄决战，只要能打败苏俄侵略军，局势还有希望扭转。”关东军被苏联红军打得溃不成军，武部六藏和皇室御用挂吉冈安直先带溥仪逃往通化，又乘小飞机飞往沈阳，尚未来得及换大型飞机，苏联飞机神速赶到，他和溥仪被苏军扣留，作为战俘押往赤塔，转押伯力关进第45特别收容所。

武部六藏在伯力重病不起，1950年7月苏联向中国在绥芬河移交战犯时，他是用担架抬来的唯一重病号，那时面色苍白，奄奄一息，中国战犯管理人员本着高度人道主义精神，对他精心治疗，终于从死亡线上把他抢救了过来，保住一条性命。

那时候，武部六藏顽固异常，不但不向中国医护人员称恩答谢，反而在军国主义思想驱使下自吹他当伪满洲国太上皇，是"帮助满洲国建设"，"不但无罪，反而有功"，直着脖颈叫嚷什么"我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满洲国的利益，为建设王道乐土"，还亲笔起草了一部共130条的日本战后新宪法，野心勃勃准备回国与岸信介竞争日本首相，妄图卷土重来侵略中国。

岂知天有不测风云，仿佛是对武部六藏死不改悔的报应，1952年的一天，武部六藏突发脑血栓，突然间跌在监房床上，一下子昏迷过去，病情危笃。

遵照周总理要使日本战犯一个不死的严格指示，抚顺战犯管理所医务室奉命全力抢救，任何贵重药都可以用，硬是凭着革命人道主义，把武部六藏从死亡线上抢救了过来，但却半身瘫痪，嘴歪眼斜，只能在床上休养，成了管理所的大包袱。

日常护理武部六藏的任务交给了年轻护士焦桂珍。她一日三餐，细心喂养，武部有时把饭菜像水箭一样全喷出来，喷焦桂珍一身一脸。她本着革命人道主义，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忍受着呕吐和痛苦擦把脸，又怀着强烈的责任感，重新用毛巾把武部六藏吐的东西收拾干净，再慢慢给武部喂饭。

武部长期大小便失禁，焦桂珍从不嫌弃，还经常给他做床上浴，坚持天天用酒精、滑石粉擦拭全身，竟使四年一直卧床的人没有生褥疮。

武部六藏看自己一天天胖起来，焦桂珍却一天瘦下去，他感动得哭了，拽住焦桂珍的手连声说：“你大大的好，我的女儿的一样！谢谢！谢谢！”对武部六藏的审判与众不同，武部的律师关梦觉、赵敬文1956年6月28日向特别军事法庭审判长贾潜提出申请：“我们于本月25日接到特别军事法庭通知，指定我们为武部六藏的辩护人。我们于接到通知书后，除查阅了有关案卷材料外，于6月27日会见了被告人武部六藏，在会见时被告人提出他长期患有严重的瘫痪症，不能坐立，到庭候审有很大困难等。鉴于被告人的身体健康情况，本着我国一贯对于日本战争罪犯的人道主义精神，我们特请求法庭考虑，对被告人武部六藏进行就地审判，免予到庭候审。是否可

行，敬请裁定。”第二天，贾潜审判长即做出裁定：“因被告人武部六藏身体有病，到庭确有困难，申请予以就地讯问，本庭认为申请人的申请有理由，准予就地讯问，特此裁定。”中国特别军事法庭派法官杨显之到武部六藏病床前进行审理，此前派辩护律师与他谈话为其辩护，这一切都使武部深受感动，承认他1940年7月到1945年8月，担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名义上辅佐伪满洲国国务总理行使职权，实际上他的权力在伪满洲国政府中超越一切，通过“火曜会”统治东北，是伪满洲国的头号“太上皇”。

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过去受够武部六藏等日本人的骗，经过几年改造思想大有转变，又有到东京国际法庭出庭作证的经验，因而在沈阳法庭上，他以崭新思想风貌，架着一副粗边眼镜，堂堂正正做证说：“我今天在祖国庄严的法庭上，在我们祖国人民面前，对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伪满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等操纵伪满政权，奴役我国东北人民的罪行作证。

旁听的西方记者发现，溥仪比在东京法庭时更充分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面对法庭的紧张空气，他毅然的态度，仍不减当年一国元首的充分威严”，只听溥仪以特有的魅力理直气壮揭露鲜为人知的内幕说：“我当过‘满洲国’的皇帝，但在‘满洲国’我是没有实权的。统治和支配‘满洲国’实权的是‘满洲国’的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和他的辅佐者古海忠之。他们在日本关东军司令官领导下，奉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操纵‘满洲国’实权，奴役中国东北人民，他们是日本帝国主义代理人。”在审判古海忠之的法庭上，溥仪振振有词揭露武部六藏操纵伪满洲国的罪行说：“在‘满洲国’建国十周年前夕，武部六藏为了使‘满洲国’称日本国为‘亲邦’，他就指使伪总理张景惠把各大臣召集到伪总理办公室，由武部六藏把‘满洲国’必须称日本为‘亲邦’的理由加以说明；另一方面，监督我的吉冈安直和武部六藏相互呼应，他们对我说，现在一定要称日本为‘亲邦’，理由是没有日本就没有‘满洲国’，所以你们应当把日本当作父亲看待，这是‘满洲国’对日本和对其他国家称盟邦友邦的区别。”溥仪的揭露使稍有民族正义感的中国人都怒不可遏，溥仪也义愤填膺，他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扶扶宽边眼镜说：“‘满洲国’建国十周年时，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又制订‘诏书’，通过张景惠交给我，让我签字公布。我记得这个‘诏书’的内容主要有两句话：‘明明之鉴如亲，穆穆之爱如子’。意思就是把日本说成父亲，把‘满洲国’说成是它的儿子。这就说明日本帝国主义是怎样操纵‘满洲国’政权，操纵我对中国东北实施殖民统治的。”接着，溥仪也愤怒揭露武部六藏是如何操纵他使伪满洲国向联合国宣战的：“还有，‘满洲国’所颁布的‘时局诏书’，是‘满洲国’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主持制定的。就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同一天，即1941年12月8日，武部六藏把他制定的‘诏书’，通过张景惠交给我。同时规定我在有武部六藏、总理、各部大臣、参议府正副议长、参议等参加的会是我为日本帝国主义作了帮凶的事实。”伪满交通部大臣谷次亨为立功赎罪，又详细揭露更令人切齿痛恨的事实：“我说一说武部六藏操纵伪满参议府会议的情形：1940年9月公布的所谓《粮谷管理法》、《特产物专管法》，就是我当总务厅长官期间亲眼见到的。武部六藏当时向参议府副议长暗示说：‘这次在火曜会议所通过的政策法令中，有《粮谷管理法》、《特产物专管法》，它们对于日本继续战争是绝对必要的。实行这两个法令，对于全满农民是有极大影响的，我相信在参议府会议上，满籍议员一定要有意见的，可是必须照原案通过。武部六藏对参议府副议长桥本所说的这些话，是我亲

眼看到亲耳听到的事实。这个议案后来提到参议府会议时，参议员于芷山提出质问说：'这两个法令如果付诸实施，在农民方面来说，能不引起他们的不安心情么？'审判员追问：“结果怎样？”谷次亨继续作证说：“那时出席该会议的武部六藏没等提案者主管部的答复，就蛮横地回答说：'政府方面已有适当的准备，决不能发生意外的情形。'接着。参议府副议长桥本虎之助即极力发表主张说：'既然政府方面已有妥善安排，我们应当信任政府的措施，可以照原案通过。'在他这一句话之后，谁也不敢再发言了。这时候，议长即宣告表决，结果毫无异议地照原案全部通过了。由于武部六藏操纵着伪参议府会议，所以在伪参议府会议上向来就没有不通过的法案。”特别军事法庭法官杨显之把这些证言记录念给躺在病床上的武部六藏听，他承认都是事实。

武部六藏供认在任伪满洲国总务长官期间，先后主持、策划、决定、领导推行《治安维持法》、《思想矫正法》、《保安矫正法》、《时局特别刑法》等罪恶法令，对东北人民血腥屠杀，还多次实施“治安肃正”，制造了许多血腥惨案，又在热河地区制造无人区，毁灭和平村镇，驱逐无辜百姓，仅1943年春季到秋季，就在热河地区驱逐我国和平居民18万户，建立了3000余个“集团部落”即变相集中营。

武部六藏供认他作为伪满洲国“太上皇”，为大肆掠夺我东北物资财富，策划并推行《日满华经济建设联系要纲》、《战时紧急经济方策要纲》等一系列法令，确定伪满洲国按照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意图进行生产，把东北建成日本侵略战争的物资供应基地，从东北掠夺走钢、铁、煤、石油、轻金属等军事战略物资，又进一步加强物价统制，降低人民生活水平，榨取人民的财富。1943年8月，他主持制定、推行《金属类回收法》，强迫东北人民献铜、献铁，强制征收日用金属制品110余种，连家里的门环、铜匙、铁火盆等日常用具，也被武部六藏命日满伪军搜刮去制造杀人武器，连承德离宫的铜殿等历史文物也被掠夺破坏。

为从东北大量掠夺日本侵略军队急需的粮食，武部六藏供认他以伪满国务院总务长官身分，策划、制定并大力推行《粮谷管理法》、《农产物管理法》等一系列法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亲自主持召开伪满洲国各省次长、警务厅长会议，在会上歇斯底里下令：“当此大东亚战争紧急进行之时，诸君对粮谷出荷工作，要加倍努力，如有阻碍，须把它压过去！”

“武部六藏命令伪满警察、行政官员组成“出荷督励班”、“游动检索班”、“检问所”等，一到收获季节，就四出乱窜，挨户搜查，用拷打、逮捕、囚禁等残暴手段，从农民和城市居民手中抢夺粮食，甚至连种籽和口粮都被抢走，许多人被活活饿死。

为把东北建成侵略中国内地和东南亚并进攻苏联的军事基地，武部六藏供认策划并推行《劳务新体制确立要纲》、《劳动统制法》、《国民勤劳奉公法》、强迫东北人民充当劳工、修筑军事工程，许多人在军事工程完工后以保密为由被全部杀害；他下令把东北18岁至50岁的男子编入“国民勤劳奉公队”，从事看守桥梁及其他军事性劳役，大批人被折磨而死。

从1941年起，武部领导推行《国兵法》，驱使东北地区青年充当日本侵略战争的炮灰。

在沈阳军事法庭上，伪满洲国厚生部大臣金名世揭露武部六藏在东北推行烟毒政策的罪行说：“武部六藏认为鸦片是巨大财源，又是弱种亡身的

工具。

1940年7月当上伪国务院总务长官后，极力推行鸦片毒化政策，毒害中国东北人民。日本发动太平洋侵略战争后，由于鸦片的用途更为广泛，他同掌管鸦片经济的总务厅长古海忠之，决定实行扩大栽种罂粟的地域和面积。1943年2月，接到武部六藏以'中央'政府名义下达的秘密指令，从1943年起，除热河省和兴安两省仍旧继续大量栽种罂粟外，吉林、奉天、四川三省为新的罂粟栽种地域，指令吉林省栽种500公顷，1944年增加到1000公顷。武部同时指示实行'集团栽培'方法，就是限制在一个地方种植不许分散，吉林省的'集团栽培'地点指定在乾安县。这是武部六藏为便于'满洲国'政府监督、管理和收买而防止鸦片流出所采取的毒辣手段。"金名世的揭露使法官和听众耳目一新，都对日本为灭亡中国而采取的恶毒政策感到愤怒，审判长袁光深入扩大战果进一步追究武部六藏推行鸦片政策的罪行，金名世继续做证说：“关于罂粟栽培面积，历年都是由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和古海忠之决定，而由我这个厚生部大臣来执行的。我奉武部六藏命令1945年下达给热河省的任务是36万亩，兴安西省6万亩，奉天，吉林、四川三省是3700公顷。”审判长严厉追问：“你们怎样收购鸦片？”金名世为立功赎罪，揭露日伪罪恶内幕称：“当时伪满洲国政府采取的办法，是每年在鸦片成熟收割时，由经济部发表强行收卖的'指定价格'，以最低的价钱把农民生产的鸦片全部掠夺到手。一部分由奉天（沈阳）、锦州、绥化等十余处鸦片烟膏制造厂制成烟膏，做成烟形，由禁烟总局发交各市、县、乡'烟管所'，再以更高的价钱卖给已登录的鸦片瘾者，榨取金钱，毒害人民。”审判长袁光气愤地追问挂羊头卖狗肉的"烟管所"情况，金名世说：“这种'烟管所'是1940年禁烟总局成立后，由原来的鸦片零卖所演变而成的，归为官办，由各市、县、乡直接经营管理，不论是城市和乡村，到处都有，统共1800多个。另一部分鸦片，则保管烟土或制造吗啡，作为对外贩毒追求暴利的。1944年10月，武部六藏卖给南京汪精卫政府鸦片20万两！”审判长袁光追查武部六藏推行烟毒政策的恶果，金名世供称：“武部六藏等推行鸦片毒害，东北人民所受的损害是无法估量的，仅就鸦其中毒的人来说，据禁烟总局1940年实行鸦片瘾者登录，当时登录鸦片瘾者近100万人，吗啡瘾者4万余人。据禁烟总局的统计，自1940年实行鸦片瘾者登录后，到1944年共5年，已登录的鸦片瘾者和吗啡瘾者中毒而死的有7万余人。这是武部六藏主持实行鸦片毒害政策，使中国东北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的损失的事实。”中国军事法庭法官在武部六藏的病床前，把上述法庭笔录交给武部六藏，武部承认都是事实。

武部六藏还供认在任职期间，还主持策划、决定修改、推行《出版法》《满洲国通讯社法》《新闻社法》等反动法令，加强伪满国务院总务厅弘报处，对东北人民实行恐怖统治，妄图泯灭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以这些法西斯法令把几十万东北人民投入监狱，许多人被残酷折磨而死。

中国特别军事法庭认定武部六藏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犯有执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政策，支持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在东北操纵伪满洲国傀儡政府，篡夺中国国土主权，违反国际法准则和人道原则，主持决定和推行镇压、奴役、毒化、奴化中国人民和强征兵役劳役、掠夺我国东北地区物资、搜刮人民财富的各种政策法令，实施"开拓移民"强占农民土地的罪行，因而判处他有期徒刑20年。

武部六藏在宣判后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作录音谈话时表示忏悔说：“我曾经担任伪满洲国的总务长官。在这期间，我犯了违反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的许多罪行。日本和中国是近邻国家，有着亲戚关系。然而，日本侵略了中国神圣的领土，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我被判处徒刑20年，我相信中国的判决是真正基于正义的正确的判决。我对这次判决表示非常感谢，同时保证今后决不充当帝国主义实行侵略的角色。我要以我的余生来为亚洲的和平，为世界的和平而努力。”武部六藏感激涕零说：“我应当判死刑，至少也得判无期，不料只判20年，还将过去的关押抵刑期，这是太宽大了，谢谢！谢谢！”使武部六藏高兴的是马上接到了1956年7月21日由审判长贾潜签发的特别军事法庭的裁定书：被告人武部六藏，男，1893年生，日本石川县人，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在押。

上列被告人因战争犯罪一案，已经本庭于1956年7月20日判处徒刑20年。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战犯管理所所长孙明斋向本庭申请，略称：被告人武部六藏，身患高血压及半身瘫痪之症，已有4年之久，迭经医治，均不见效，并且武部六藏在关押期间，悔罪表现尚好，可否予以假释，使他能够回家养病，特请核夺。经本庭指定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科教授潘绍周，给予病情鉴定，诊断为：“武部六藏：（一）高血压病；（二）动脉硬化；（三）脑血栓形成；（四）左侧半身痉挛性瘫痪。根据以上病情，此人健康已难恢复。因此，本庭认为，武部六藏身患重症，并且在关押期间表现好，准予假释，特此裁定。”武部六藏在病床上看罢准予假释裁定书，激动得热泪盈眶，双手掩面而泣，俄顷擦把眼泪，郑重表示：“我回国以后，一定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与和平事业，贡献余生！”

“武部六藏的妻子武部歌子1956年7月22日晚上9点钟在从日本到中国的轮船“兴安丸”上，从无线电广播里听到武部六藏被假释的消息，高兴得喜笑颜开。7月23日“兴安丸”一到塘沽她就在“兴安丸”上对新华社记者说：“我实在太高兴了，我原来打算看护他几天后就回去，根本没有想到这样快就能和我的丈夫一起回东京了。”武部歌子意犹未尽说：“我不知道如何来表达我的谢意，我深深地感谢中国政府。”她表示今后一定要努力教育孩子，要她的孩子为中日两国友好，为反对战争和维护和平做一些工作。她说：“我们绝对不再要战争了。”焦桂珍要把武部六藏送到天津，武部六藏几次要起来感谢她的救命之恩，都被焦桂珍拦住婉言谢绝了。

焦桂珍跟着专车把武部六藏送到天津港，久别重逢的武部夫妇在一家医院见面，武部六藏二话不说，首先把焦桂珍给妻子介绍说：“这位小姐端屎端尿侍候了我4年，没有她的照顾你我今天是不能见面的。”武部六藏滔滔不绝地讲起焦桂珍精心护理他的动人事迹，讲其他几次病情恶化，都是焦桂珍细心观察他的病情变化，几次及时发现异常，马上与医生联系抢救，才把他从死亡线上挽救了过来，不然，他就上西天了。其他吃喝拉等一切生活细节都不能自理，全靠焦桂珍精心照料，称赞焦桂珍体现了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好情感，使人永世难忘。

武部歌子听得热泪横流，她抱住焦桂珍放声大哭，感谢她代表中国人民精心照料他的瘫痪丈夫，感动地一遍遍述说：“大大地感谢中国政府！大大地感谢中国人民！大大地感谢焦桂珍小姐！”武部歌子陪丈夫登上“兴安丸”告别中国，武部六藏感慨万千地对新华社记者说：“当我坐上自己国家的船即将回国的时候，我不知道用什么话感激才好。我亲自经历了战争的痛苦，

我希望中日两国能迅速恢复邦交，我回国后要为反对战争和维护世界和平而工作。”坐在武部六藏身旁的武部歌子说他丈夫被中国政府释放回国养病，她实在是“太感谢了”，“太高兴了”。

回国后，武部六藏一家都成了中日友好的促进者。

战俘岛村三郎的新路岛村三郎是日本战犯中出类拔萃的才子，从中国释放之后写了《从中国归来的战犯》、《战犯管理所秘录》，反映了他一生的曲折变化，特别是他的新生。

岛村三郎1908年生于日本高知县，曾任伪满洲国三江省警务厅特务科科长兼地方保安局理事官、警务总局特务处调查科科长，1945年9月被苏联红军俘虏，押到伯力，1950年7月移交中国。

刚到抚顺，他又臭又硬，他紧跟在铃木启久、藤田茂等30多个将级军官之后，利用他擅长写作之笔，起草了写给联合国的“抗议书”，“抗议”中国把战俘当作战犯处理，违反国际法，又发表了颇有文采的谬论：“松花江水东流而又西折，这是自然形成，无可厚非呀！”

谁能够质问江水：你这一段为什么向东而不向北？同样，怎么能够责备我走过的路，而没有走你们的路呢？”岛村三郎发表完这些诡辩，又找到管理所科长金源少校辩论说：“侵略战争可是国家发动的呀！我个人不过是一名小卒，仅仅服从了国家的命令，依照法律履行了自己应尽的义务罢了。如果我当时不服从命令，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我认为战争的责任应该由国家来承担。像我这样的小卒是不应该承担责任的。如果我说战争责任由我来承担，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金源少校义正辞严驳斥说：“你说战争责任应该由国家承担，是吗？当然，日本人民是无罪的，但是你们做了些什么呢？你所说的国家究竟是指的什么呢？你不会是生活在真空中吧？如果除去构成国家权力机构的具体人，哪里还有什么国家？你也许是一个小官吏，但你却是组成国家权力机构的一分子，尽了你自己的义务，执行了国家的权力，镇压、奴役、杀害了中国人民。”岛村三郎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却要求早日释放归国，金源耐心地讲解战争的性质，分析世界形势的变化，以无可辩驳的逻辑阐明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说：“中国人民有权要求你们改造成为不再侵略中国的日本人。中国人民绝不能把企图卷土重来的战犯释放回国。是不是能够回国，决定于你们自己的行动。”对日本下级军官演唱反对侵略战争的节目，岛田三郎拉一帮人喝倒彩。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幸灾乐祸，态度更加嚣张，拒不交代自己的罪行。

在侦讯过程中，岛村三郎仍坚持顽固态度，中国检察员亮出岛村的第一号《请功报告》，上面有他的亲笔签名，白纸黑字清清楚楚记载着他所犯的罪行：“在拉麻塔拉汗激战中，给周永久率领的队伍以毁灭性打击”；“捕获了周永久的参谋长宁中孚”，还记述了他追赶一支400人的小游击部队，打死打伤200多人的“战功”，记载着枪杀两名游击队员的事情。

岛村三郎明白自己几份《请功报告》都已落入中国法庭手中，只得被迫交代直接或间接杀害抗日人员500多人的罪行。

中国检察员又拿出一份《思想对策成果月报》，上面有岛村三郎的签名，清楚地记载着他在三江省任职的一年多时间里，共逮捕中国人3820人，就地枪决18人，送交检察厅335人，大多数人被处死，还不包括他在伪保安局系统犯的罪行。

中国检察员让他看了400多件控诉材料，控诉人都“请求政府将岛村

“ 岛村三郎这才感到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感到自己的行为太野蛮、太残忍了，他惊恐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

战犯管理所组织战犯在辽宁等地参观，许多万人坑深深触动了，才决心向中国人民低头认罪。

在法庭上，他觉得几千只眼睛一起盯向他的身上，他连睁眼的勇气都没有了，那些仇恨、愤怒的目光刺透了他的心，他沉痛地认识了自己的罪恶面目，心平气和地回答审判长袁光少将的提问：“ 这里起诉的事实，只是我在侵略中国 11 年中所犯罪行的一部分。”接着，岛村三郎彻底交待罪行说：“ 我作为特务警察所犯下的罪行，主要有下面几个：第一，我破坏了中共依兰县的地下组织；其次，讨伐了赵尚志将军领导的爱国军，在这讨伐当中，犯下了以搜索班来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岛村三郎交代他在 1939 年 1 至 11 月，协助警务厅长领导全省各市县警察特务，抓捕中国抗日救国人员及和平居民 2995 人，其中 14 人被杀害，然后特别交代他在依兰县的罪行说：“ 1939 年 2 月，我为邀功请赏，抢在日本宪兵队之前逮捕了中国爱国者 50 余人，对他们进行残酷的刑讯：先殴打，打昏后灌凉水，让他们醒过来然后再打，或者再灌凉水，把肚子灌大之后，再站在他们的肚子上把水挤出去，然后再灌。我就是用这样的手段进行刑讯，使他们遭到极大的痛苦以后被折磨死的。

“ 岛村三郎的滔天罪行引起旁听席上中国各界人士的强烈愤怒，审判长袁光少将怒声问道：“ 现在你对过去的罪行有什么想法？”岛村三郎怀着沉痛的心情供诉：“ 当年，我满怀帝国主义的野心，杀害中国的和平公民，任意污辱、迫害他们，掠夺他们的财产，并把这些通通当作向天皇效忠的业绩。我是个地道的人面兽心的鬼子，这就是我这个侵略者的本质，也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岛村三郎痛苦流涕说：“ 经过中国人民多年无微不至的关怀和耐心教育，我现在才认识了自己的本质。现在我从心里忏悔自己在 11 年中所犯下的各种严重罪行。我深感自己是个死有余辜的战争罪人。我痛感自己是一个已经没有资格活在人世的鬼子，所以说。……”岛村三郎说到这里，擦把眼泪，往后退了两三步，在法庭地毯上跪了下来，以真挚的情感泣不成声请求说：“ 请审判长对我严厉惩办，判处我死刑！”审判长袁光少将要他站起来，岛村三郎缓缓站起，向审判席深深地行了个九十度的鞠躬礼，又转向旁听席，边鞠躬边大声喊道：“ 各位旁听代表，请向我讨还血债！”法警急忙跑过来制止岛村三郎的拚命叫喊，审判长向他询问：“ 有什么意见可向本庭供述。”岛村三郎又鞠一躬回答说：“ 没有意见。这是我诚心诚意的话。无论对我判什么刑罚，都是中国人民根据我的罪恶事实和认罪态度做出的公正判决，我都决不反悔。”1956 年 7 月 20 日，中国军事特别法庭判处岛村三郎 15 年徒刑，他后来记叙他当时的激动心情说：“ 宣读到此结束。我有说不出的高兴和激动，腿也不疼了，好像能立刻飞出去似的，浑身是劲。当我走出法庭，眼望不挂一丝浮云的蔚蓝色晴空，我对中国人民给予我们第二次生命十分珍视，对中国人民的宽大政策万分感激。

我获得了新生。当然，中国人民认为，要把我改造成真正的新人，还需要 4 年时间。

我衷心感谢中国人民对我的宽宏大量的判决，我决心从这天起，为把自己变成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新岛村而竭尽全力地学习。”判刑

后，中国组织岛村三郎等到北京等地参观，回来学习《政治经济学》、《实践论》、《矛盾论》等书和文章，岛村表现较好，1959年12月被释放回国。

宣布岛村三郎被释后，让他发表感想，由溥杰担任翻译。

岛村回顾了他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从内心深处再次谢罪，表示决心说：“今后，我一定要为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与日中友好而奋斗！这就是我向那些被害者的母亲所发的誓言。”岛村离开抚顺时，金源少校握着他的手说：“岛村，祝你旅途顺利。”金源等人的话使岛村终生难忘，回国后以极大的精力撰写出《从中国归来的战犯》，此书于1975年出版，岛村已成为中日友好的积极推动者。

第三章侵略战争性质不容否定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失败、投降后，日本右翼及其政治代表人物死不甘心，一直在拚命地否定日本侵略战争的性质。更为严重的是有些右翼分子钻进日本自民党中，以现职内阁大臣的身份大发日本侵略有功的谬论，为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和东南亚人民犯下的罪行开脱。然而，在遭到亚洲各国强烈谴责后，他们又不得不“收回”自己的“失言”，最后又不得不在一片反对声中被迫“辞职”。

一、“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产生——“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是从日本重整军备开始的，是美国当局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必然产物。

战争后初期，基于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广大人民的强大压力，美国占领日本后采取了使日本实现非军国主义化与民主化的措施。但到1947年东西方关系进入冷战时代后，美国看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大陆上节节取胜，东亚、东南亚反帝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美国侵朝战争的爆发，美国很快改变对日政策。

于是，美国开始重整日本军备，解除了对旧日本军官的清洗令，企图加速把日本重建为美国在远东的兵工厂。

于是，被美日政府结束“整肃”的大大小的日本战犯又出现在日本政治舞台上，耀武扬威地横行起来。

这样，曾任东条内阁的商工大臣、伪满洲国实业部总务司司长、产业部次长、商工部次长的岸信介，二战后被定为甲级战犯关在巢鸭监狱，1948年获释，1951年公开出来活动，1952年组建“日本重建同盟”，同年当选众议员。1954年参与创立日本民主党，出任干事长。1955年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成立自民党，他仍任干事长。1956年任外务大臣，1957年任自民党总裁，并出任内阁首相。

1951年11月，作为甲级战犯而被判处7年徒刑的前外务大臣重光葵提前出狱，参与创建改进党并被推选为总裁，后任民主党副总裁、外务大臣。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思想理论界出现了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认为日本侵略亚洲国家是“迫不得已”的事情，战争责任并不仅仅是日本人的事情，被侵略的国家也有责任，明目张胆地为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滔天罪行翻案。

二、济南惨案的真相

1928年4月，日本侵略者借口保护日本侨民制造了举世震惊的“济南惨案”……日本右翼分子制造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在电影《战争和人》中，有明显的表现。在这部影其中，竟把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的责任从中国方面去找，似乎战争是由中国引起的：在说明1928年日本制造的“济南惨案”时，绝口不提侵华日军武装干涉中国的北伐战争，只说“日中两军在济南发生冲突”，事情完全被弄颠倒了。让我们来看看事情真相：蒋介石1928年1月复任北伐军总司令之后，频频向美国暗送秋波，对美、英帝国主义炮轰南京打死打伤2000多人的“南京事件”说成是共产党煽动而发生的，承认美、英为保护本国侨民“而不得已开炮轰击”。这样，蒋介石以颠倒是非的手法，扫除了他对英、美的外交障碍。

“南京事件”的解决标志着蒋介石政府和美、英帝国主义的结合。在美国的支持下，蒋介石率军北伐，攻入山东。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止“以美国为背景的南军北上”，不让英、美势力向中国北方发展，借口保护日本侨民，决定再次出兵山东，并不顾国民政府外交部的抗议，于1928年4月下旬进攻济南，制造了举世震惊的“济南惨案”。

那时，奉系军阀的“狗肉将军”张宗昌盘踞济南。这位直鲁联军大帅有三不知：一不知自己的家产和钱财；二不知有多少姨太太，见了漂亮女人他就命部下抢来收为侍妾；三不知道有多少兵员，因他搞募兵制，“会说掖县话，便把洋刀挎”。到处有他的官兵。

张宗昌见蒋介石率北伐军来攻山东，知道自己的“狗肉部队”不堪一击，便要率军逃走，倒是他的四姨太太仙拽着他的仁丹胡子讥笑道：“你平时不是老说日本的福田司令官最讲义气吗？你何不请他来对付蒋介石。”张宗昌将大腿一拍，夸四姨太太说得有理，就派参谋长金寿良到青岛请日本快发救兵。

日本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中将进占青岛后，正愁没有进兵济南的借口，现在见张宗昌前来搬兵，便满口答应驱赶北伐军，扰乱革命军的后方；但要求将青岛、济南、龙口、烟台等地都交日军负责“防守”。

“狗肉将军”眼看地盘不保，哪管爱国还是卖国，便全部答应日军的要求。福田彦助又得到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要他抢占济南的训令，于是便于4月25日派先头部队向济南进发。

日本侵略军被张宗昌引入济南，占领了济南医院、济南报社等地，并用沙袋筑起堡垒，设置活动电网，不许华人接近。

“狗肉将军”哪知日本侵略者的狼子野心，反而觉得日本人“够朋友”，将福田彦助及手下将领请来赴宴，并把他的姨太太全都叫来侍候作陪。

宾客正与主人喝得酒酣耳热，参谋长金寿良忽报北伐军已占领济南门户万德，胶济铁路也被截断。

张宗昌吓得魂不附体，忙向福田彦助求援，岂料福田彦助将金鱼眼一翻冷笑道：“大日本皇军只管驻地防守，不干涉中国内政！”这家伙不但不帮张宗昌的忙，反而和“狗肉将军”的四姨太动手动脚，肆意调笑。

张宗昌气得直想骂娘，但又惹不起日本人，只得哼其他写的大风歌以泄胸中烦闷：“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回家乡，安得巨鲸兮吞扶桑！”参谋长金寿良哭笑不得，见形势迫在眉睫，不容再加延宕，便上前小声劝道：“大帅，现在不能吞扶桑了，北伐军已攻进济南，我看还是归隐扶桑吧！”张宗昌见大势不妙，赶忙结束筵席，命令家眷尽快收拾金银财宝，带着四姨太，坐上挂着日本国旗的小轿车，连夜逃离济南至烟台，后乘船经大连亡命日本去了。

话说张宗昌退走逃亡，北伐军于5月1日占领济南，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当日下午到达济南，任命第四军团总指挥方根武为济南卫戍司令，任命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蔡公时兼任山东特派交涉员，负责与日本驻济南领事联系交涉。

国民党当局接管济南后，多次声明保护外侨，要求日本政府从济南撤军。随后，蒋介石率众视察济南军情，发现日本军队在许多路口修起防御工事，摆出一副临战架势，荷枪实弹，待机而动。又见遍地都是日本散发的传单，落款是“日侨义勇团”，传单中写道：“济南一处，中外杂居，战线缩小，有所扰乱，良民恐慌。

日军临此，固期保护日侨，而日侨混在华境，日军保护之法，不得不选择中外侨期一并而护，实为常法。本日纬十一路日侨万屋商店、大马路日侨山东仓库会社、二马路航空处，纬十一路总监部制造处等，流氓便袭掠一空。日军治扰，流氓误损其命，诚可悯也。由来日军不放空弹，不用空喝，无论中外不逞，若有接近日军所守地域，非有预先派人表示诚意，不然枪杀不论。特此布告。”蔡公时期愤地说：“济南商埠本是中国领土，日本竟敢公然出面声称保护，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蒋介石面露愤愤不平之色，俄顷问道：“传单中说‘流氓误损其命’，是指什么事情？”蔡公时回答道：“今天早晨，有个叫宋占光的饥民，到纬十一路中国人开设的食品厂内拿了点吃的，被日本兵看见枪杀！”蒋介石听了甚感气愤，于是便对蔡公时说：“请日本驻济南领事来司令部谈判”第二天，即5月2日，日本驻济南领事西田畊一偕日军参谋应邀而来。蒋介石寒暄后正面提出要求说：“贵国士兵在济南市区高筑防御工事，实是引起我国人民之恶感，易招纠纷。为防止意外冲突，请贵军先行撤除一切防御工事。”日本领事西田畊一当即回答道：“总司令言之有理，我军马上照办。”当天晚上，日军在济南马路上建的防御工事迅速撤去，日军撤回原驻地点，济南城内顿时不见日军巡逻车踪影。

蒋介石喜不自禁，以为日本人给了他好大面子，岂知日本早已视满洲为日本第二故乡，视山东为第二满洲。为实现日本内阁决定的第二次出兵山东计划，日军第六师团司令福田与第十一旅团司令斋藤多次密谋，故意装出接受蒋介石要求之态，麻痹对方，处心积虑导致“五·三济南浩劫”之发生。

且说5月3日清晨，泉城济南城内各处商店相继开门，生意兴隆，市面熙熙攘攘，一片太平景象。但不料在上午9时许，北伐军一名徒手士兵经过日军警戒区时，被无故射杀；北伐军一部移往基督医院时，日军又突然开枪，与此同时又向国民北伐军第四十军第三师第七团的两个营发起攻击，北伐军损失惨重。

九十二师、九十三师奋起还击，立即制止住日寇的嚣张气焰。日军指挥官福田彦助见事不好，急派佐佐木到一去会见蒋介石，并威胁说“如不停火，中日将全面开战”。蒋介石便派出10个参谋组成的传令班，分头到各

部队传令，对日军停止还击。

不久，蒋介石派外交部长黄郛到侵华日军司令部交涉。黄郛到了设在正金银行的日军司令部，福田彦助避而不见，只派其参谋长黑田出面接见。

黑田蛮横地提出，北伐军必须立即停火，一律退出日军警戒区。黄郛回来后便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为顾全大局，严令北伐军不许还击。

但是日本侵略者却得寸进尺，一面以武力将商埠区的北伐军全部缴械，一面派部队占领设在济南路局的外交部长办公处。堂堂外交部长，号称"隐身仙人"的黄郛及其卫士亦被缴械，乖乖退出其办公处，迁往北伐军总部办公。正当中国派人与日本人交涉时，恰有两个日本兵被流弹打死。

日本侵略军这下找到了挑衅借口，大举向中国军队驻地进攻。日本侵略军更凶焰万丈，不论官兵，见人就杀，一时尸体遍街，血流成河，哀声动地，中国军队7000余人被迫缴械。

此时，蒋介石仍下令不准抵抗，只命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蔡公时速去交涉，要求日军迅速撤退。

蔡公时正要与日本方面交涉，但见交涉署已被日军包围。

蔡公时只得拿起电话，要通日本驻济南领事西田畊一，询问因何发生冲突。

西田畊一狡黠地回答：“不知何故互起误会，双方现应立即停战。”蔡公时再派人出去，但全被日本兵开枪打回。全署人员被围困一天，又饿又乏。到上午9时左右，传令兵跑来报告：“外面日本兵撞门，势极凶猛，怎么办？”蔡公时略一沉吟，随即毅然决定：“开门，请他们进来！”还没等传令兵转身，交涉署大门已被日军枪托撞开，20多个日本兵撞了进来，不容分说，剪断电灯、电话线，交涉署顿时陷入黑暗之中。

在日本兵的手电筒照射下，日本兵直入寝室，搜查枪械。

一个穿西服的日本人首先说：“我们是为搜查械弹而来。白天被打死的两个日本皇军，必是你们署里的人干的，你们的主管是哪位？”蔡公时挺身而出，婉言解释说：“上午被打死的两个日本兵，确系为流弹所击，彼此不误会。我们是外交人员，从来不带枪支，请不必搜查，免滋纷扰！”那日本军官，一声令下，除蔡公时外，其他工作人员全部被绑了起来。

日本兵翻箱倒柜，抢了五大包文件，扬长而去。

不一会儿，又来一个日本军官厉声高叫：“我们已经查明，大日本皇军确系署中人员所枪杀，非交出枪弹不能了结！”蔡公时据理辩争，请释放被绑人员。日本军官恼羞成怒，命令日本兵也将蔡公时绑缚起来。蔡公时忍无可忍，便操日语叱责道：“汝等不明外交礼仪，一味无理蛮干！此次贵国出兵济南，说是保护侨民，为何借隙寻衅，肆行狂妄，做出种种无理之举动！实非文明国所宜出此。至于已死之日本兵，若果系敝署所为，亦应由贵国领事提出质问，则中国自有相当之答复，何用你们如此喋喋不休耶？若你们果系奉日本领事之命令而来，则单人即到领事馆交涉，亦无不可！”一个会说中国话的日本军官冷笑道：“你们的蒋总司令都不敢骂大日本皇军半句，他想找我们谈判，我们都没有兴趣。

你的官儿有多大，再大也大不过蒋先生！”那日本军官还不解气，一巴掌掼在蔡公时的脸上，顿时打得鼻青脸肿，鲜血直流，还咬牙切齿骂道：“你不要命啦，竟敢辱骂皇军，把你送到蒋总司令手里，他也得杀了你，再向大日本皇军道歉！”蔡公时一腔爱国热血似烈火般熊熊燃烧，义愤填膺，痛斥

他们说：你们这些强盗！我早就看透你们。现在我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痛斥你们这帮强盗。

日本军官兽性大发，便命日本兵将中国人绑在柱子肆意毒打。为向蔡公时施行法西斯攻心战术，命日本兵挥动刺刀割耳、切鼻。顿时鲜血喷流，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日本强盗大声狂笑，形同禽兽！

那日本军官原以为会把蔡公时吓得屁滚尿流，低声下气求饶性命，却见蔡公时虎目圆睁，大声怒骂：“日本强盗禽兽不如，此种国耻，何时能雪！”交涉署庶务张麟书、参议张鸿渐、书记王炳潭等在蔡公时激励下，争相痛骂，怒斥强盗。但这帮丧心病狂的法西斯强盗先将张麟书耳鼻割下，又断其腿臂，血肉狼藉，不成人形！

日本侵略者仍不放手，又将蔡公时等人的绑绳砍断，三人一组，拽出屋外。蔡公时被第一批拖到交涉署院内，枪声一响，可怜蔡公时正值英年，未见国家统一，竟牺牲在倭寇的乱枪之下。勤务兵张汉儒乘枪声一响，应声倒地，后找机会死里逃生。他作为现场见证人，写下了《蔡公时殉难始末记》，揭露了日寇犯下的滔天罪行！

日寇屠杀了蔡公时和交涉署人员后，听说北伐军蒋总司令仍在济南城内，于是派兵又包围了北伐军总部办公楼。

日军情报非常准确，此时蒋介石正和“隐身仙人”黄郛密商逃脱之计，听见外面枪声渐紧，急忙吩咐黄郛与日本交涉。黄郛要求日军停止射击，日寇哪里肯听，还公然侮辱黄郛，把南京政府的堂堂外交部长扣压一天。

面对日本的蛮横态度，这时蒋介石已知日本人根本没有给他面子。为了委曲求全，蒋介石气急败坏地吩咐说：“给我下令，停止向日军还击。真把日本人激怒了，我的面子往哪里放。不要慌，务必采取镇定、和平态度，要顾全大局。”蒋介石说罢，又派熊式辉深夜赶往日军司令部交涉，但被日军轰了回来。

5月4日，蒋介石命外交部长黄郛致电日本首相兼外务大臣田中义一，指出“似此暴行，不特蹂躏中国主权殆尽，且为人道所不容。今特再向贵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请立即电令在济日兵，先行停止枪炮射击之暴行，立即撤退蹂躏公法、破坏条约之驻兵，一切问题当由正当手续解决。”日本政府根本不把这个抗议照会放在眼里，不予置理，反而扩大济南事态，更疯狂地向中国公民开炮射击。

蒋介石一味忍耐，连连派出黄郛、熊式辉、罗家伦、赵世暄、崔士杰、王正廷与日本谈判，都被日本轰了回来。于是，蒋介石又急电在东京的张群直接找日本当局谈判。

日本方面的意图是很明显的，他们想先把蒋介石势力控制在济南，其他签订城下之盟，阻止北伐军北上，从而日军控制华北大平领土。为此目的，日寇不但没有把事态平息下来，相反还加紧进攻，企图消灭蒋介石的部分力量。

蒋介石见济南的事态不但平息不下来，相反有越来越紧急的势态，于是他整顿了北伐军，拉着黄郛等人在混乱中溜出了济南。

蒋介石、黄郛等从济南逃出后，来到党家庄住下。梳洗已毕，急忙修书一封，送给日军：福田师团长惠鉴：自本月3日之不幸事件发生，本总司令以和平为重，严令所属撤离贵军所占区域。现在我各军已一律离济，继续北伐，仅于城内留相当部队，借维秩序。本总司令亦于本日出发，用特通知

贵师团长查照，并盼严令贵军立即停止2日以来一切特殊行动，俾得维持两国固有之睦谊，不胜企盼之至。专布顺颂公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事前，福田已通过安插在蒋介石身边的顾问佐佐木，得到蒋介石的传话：“革命军为避免糜乱地方，决不与日军冲突。”现接到这封来信，才知道蒋介石改道北上，继续北伐，并得悉已离开济南，急得顿着脚咆哮道：“糟了，北伐军继续北上，以后的事更难办了！”福田彦助恼羞成怒，便于5月7日下午向蒋介石提出最后通牒：蒋总司令阁下：贵总司令屡违对于中外之声明。此次由贵部下之正规军实现此不忍卒睹之不祥事件，本司令官不胜遗憾。平加诸帝国军部及居留民之一切损害，以及有关毁坏国家名誉之赔偿等，虽有待于帝国政府他日之交涉，本司令官不欲置喙，然敢对贵总司令要求左列事项：

- 一、有关骚扰及暴行之高级武官，须严厉处罚。
- 二、对抗我军之军队，须在日军阵前解除武装。
- 三、在南军统辖区域之下，严禁一切反日宣传。
- 四、南军须撤退济南及胶济路沿线两侧20华里之地带，以资隔离。
- 五、为监视右列事项之实施，须于12小时以内开放辛庄及张庄之营房。

盼右列事项，于12小时以内答复。

临时山东派遣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北伐军将领见到这个最后通牒，简直把北伐军当作战败国看待，把抗日将士作为投降的战俘，大都气炸心肺；但蒋介石不愿以“小不忍而乱大谋”，因此除第二条外，准备全部接受。当下拟定六项答复，并派熊式辉、罗家伦前去交涉。

福田彦助看了蒋介石的六项答复，并不满意，他横眉怒目回答：“规定时间已过，不必再谈！”福田彦助蛮横地赶走派去的使者，随即下令对济南发动攻击。济南军民在济南卫戍副司令苏宗辙的指挥下，与日寇奋战，特别是邓殷藩团第九连连长郭德芳与部属发誓说：“我们生为军人，死当卫国。今天的事，日本人逼得我们实在忍不下去了！为国家，为人民，正是我们牺牲报国的时候了！我们不忍心，也不愿意亲眼看到祖国河山破碎，而束手被擒！我们要本着‘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精神和决心，与敌人拚一个你死我活！”北伐军将士以散兵战术抗击日寇的立体战术，打得敌人闻风丧胆。留守济南的李延年、邓殷藩两团将士，与日寇激战三昼夜，打得日寇不敢轻举妄动，直至接到蒋介石令他们撤退的“总，伐蒸坚”密电后，才撤出济南。

北伐军撤出济南后，日军于5月11日上午举行“显扬国威”的入城式，开始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见人就开枪射击，见女人就割去双乳，乱刀刺死。济南死伤军民1.1万有余，真是血流成河，尸横遍地，惨不忍睹，举世公愤！

当时，作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在日军血腥屠杀面前，也作了如下表示：“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于济南横阻我们北伐，残杀我们同胞，霸占我们土地，这是中国民族最耻辱的一个纪念日！临到这个纪念日，凡是中国人，凡是我们的黄帝子孙，对于这种耻辱，是永不能忘怀的，日本种种野蛮行动简直就是禽兽，如果不谋报复，我们就不能算是中国人！我国国民政府是绝不会因为他们的压迫而对他们屈服的！”蒋介石当时的这一讲话，虽然反映了他对日本军队野蛮行径的痛恨和谴责，但在日寇野蛮屠杀之际，他却下令：“须知我们报仇雪耻的敌忾心，绝不能暴露出来，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原来，张群奉蒋介石之命已于5月4日到达东京。后来蒋介石电

告张群，告诉他发生了“五·三济南惨案”。张群奉命与日本外务省亚洲局长有田八郎和日本参谋第二部长松井石根联系，求见日本外务省次官出渊胜次和军部首脑伊藤安之助少将，发现日本军方气焰极为嚣张，叫嚷“中国北伐军必须投降”，“要蒋介石自己来日本交涉”等。

张群跟日本军政官员无法会谈，又通过老关系见到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会见中，张群用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方表示说：“中、日两国必须友好，而要达到全面亲善之目的，必须让国民革命军完成北伐，统一中国。因此，国民政府希望日本政府不仅对北伐不加阻挠，更应站在正义的立场上，同情并帮助中国革命。对于济南事件，不要任凭当地双方军队直接冲突，应该通过外交交涉予以解决。”田中义一对张群的话根本听不进去，但为掩盖日本政府业已通过的增兵山东的决议，他便通知张群，说日本将派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松井石根作为日本的全权代表，赴山东处理济南事件，希望中方与松井进行谈判。

5月8日，张群再次会见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说明“中国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来电表示：‘如果日本出兵只意在保护日侨，不影响国民革命军北伐，则我们必将尽力完成北伐，达成统一中国之使命。至于济南惨案，如果查明其曲在我，我们亦愿向日本道歉。总之，对于一切事件，我们均将以光明磊落的态度来了结。’”张群又说：“福田师团长曾提出要蒋总司令往他的师团部与他直接谈判，对那种‘城下之盟’的要求，中国方面当然不能接受。既然田中首相决定协派松井中将前往济南，则福田所提出的无理要求当已作罢。”田中义一不得已接受张群的意见，催其速返中国。

张群于5月8日离开日本，13日到达上海。张群到沪后，接到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一封信，希望他担任与日本代表松井石根的谈判任务。他正要赴徐州向蒋介石汇报东京之行情，忽然接到蒋介石派赴济南的谈判代表何成浚的报告，说尽管中方完全答应日方提出的最后通牒条件，但日方福田彦助师团长仍坚持要中方接受其无理要求：在侵华日军撤退前，中国必须将抵抗日军侵略的方振武、贺耀祖、陈调元三军团，在日军面前解除武装，将抗日军官处以严刑，如不照日方条件处理，日方即不再接见中方代表。

张群认为这是节外生枝的要求。于是他又根据蒋介石的指令，一面催促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秘书长德兰孟、美国总统柯立芝，要求根据国际联盟盟约第十一条第二项规定立即召集理事会会议，要求日军停止暴行并立即撤军；一面于5月14日致电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严肃指出：“查福田师团长此等态度，与首相及诸公对张群之表示，大相径庭，不知何故！且当日张群与首相面谈后，复承佐藤先生赴参陆各部传述首相意旨，想福田师团长必已接洽，何尚坚决若是？（张）群意拟请松井先生遵照首相意旨，克日首途，一面电达福田师团长，静候和平解决，两国幸甚！迫切陈词，伫候电音。”日本政府对张群的交涉电不加理睬，反而于5月18日送来日本政府第三次出兵山东声明书，声称济南事件是“日本为保护山东日本侨民及确保胶济路之交通而为之。”1928年6月8日，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6月15日宣告北伐成功并发表对外宣言。对外宣言明确提出，要求同各国“遵正当之手续，实行重订新约”。美国和西方诸国先后签订了有关条约，日本则因济南惨案与中国“处于邦交断绝状态”，对华贸易陷于困境，而田中内阁在国内外失掉人心，声名狼藉。在这种形势下，日本政府才被迫同中国由军事交涉转入外交谈判。

在中日谈判"济南惨案"的过程中，田中内阁提出三项无理要求：其一，日方不派全权代表，只派日本驻沪商务领事矢田七太郎为代表；其二，谈判地点在济南；其三，谈判的前提是先向日本道歉、赔偿损失、惩罚凶手、保障侨民安全。不答应这三条，不进行谈判。

在全国人民的抗议浪潮中，南京国民政府拒绝了日本的无理要求。日本代表矢田又三次赴南京联系，均未谈成。

1929年1月23日，田中义一亲自向日驻华公使芳泽谦吉面授机宜，命他作为日本的全权谈判代表到达南京，与外交部长王正廷开始外交谈判。

在开始阶段，王正廷坚持主张，日军如不从山东撤军，"济南惨案"就不能解决，并郑重提出解决"济南惨案"的四项条件：(一)日本政府郑重道歉；(二)赔偿中国财产损失；(三)严惩主凶；(四)日本保证此后不发生此类不幸事件。

对此，芳泽谦吉小眼一瞪，荒谬地提出所谓"对等要求"。日本提出的所谓"对等要求"是什么货色呢？就是中国政府要向日本政府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惩办肇事人。

王正廷严辞驳斥说：“济南惨案的发生出自日本兵枪杀中国百姓，向日本道歉、赔偿，这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芳泽词穷耍赖，结果不欢而散。

在1月29日的谈判中，芳泽开始接受撤兵条件，但又借口请示，从南京跑回上海。

芳泽谦吉刚回到上海，便接到日本政府指示，令其"相机行事"，蒋介石也命谈判代表王正廷、崔士杰"因事赴沪"。

这样，双方代表继续在上海谈判。

中日双方达成三项决定：(一)日本无条件从山东撤军；(二)"济南惨案"责任及赔偿问题，由双方组织调查委员会，赴济南调查后再定处理方法；(三)蔡公时等被害之事，日方另行向中国道歉。

蒋介石为推行其外交政策，在"济南惨案"的责任问题上放弃了原来立场，同意日方提出的"对等要求"，即双方互相道歉。道歉的方式，由于日本坚持不愿到南京政府外交部，而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又与外交部不对等，最后双方决定，两国代表都到南京鸡鸣寺会晤，以同样的辞令各自向对方表示歉意。

谁知到2月8日芳泽谦吉又奉命推翻了上述三项决定，别有用心地耍赖声称：“日本政府对三项协定提出了异议，日本方面不准备索取赔款，也反对对方要求赔款。”日本方面为何在赔款问题上出尔反尔呢？对于其中的奥妙，当时的日本驻上海的总领事、后任此次谈判的日本代表重光葵在《外交回忆录》中讲得十分清楚：“日本又生怕中国方面提出诸如要求日本修复济南战争中被破坏的城墙，要求日本支付巨额赔款，赔偿在战争中丧生的中国居民的生命财产。据报道，当时中国方面遭受的损失达数亿元。”2月18日，日本外务省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外务次官给重光葵下达训令说：“企图完满地解决'济南事件'是一个根本性错误。正因为芳泽公使（当时他已任命为驻华公使）已经与中国达成了协议，所以才会发生今天这样的障碍。

……我提请你注意，脑子里必须经常记住一点：必须破坏这次谈判！”日本首相兼外务大臣田中义一更老谋深算，他指示重光葵在谈判中要压中方

做出更大的让步，从而打开中日关系的僵局”，全面推行“积极政策”--即侵占中国，灭亡华夏。

这时，日本驻华公使芳泽和驻上海总领事重光葵派出特务四下活动，蒋介石身边的日本间谍佐佐木到一更把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底细了解得清清楚楚。他们分析认为：“蒋中正为了与当时还残存在北方的军阀，尤其是与冯玉祥、阎锡山的势力相对抗，完成中国的统一，蒋在解决‘济南事件’时，必将会符合日本方面希望的意向，采取全面退让态度。”重光葵回到上海，蒋介石就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周龙光到上海租界的三井别墅拜访了重光葵。周龙光小心翼翼地请求道：“听说总领事阁下负有日本政府赋予的重大使命，对于解决‘济南惨案’定有高明打算，请给予关心，设法加以解决。”重光葵老谋深算，见这个外交官素质如此之低，态度又这样卑下，就像精明的投机商人一样不露日本当局交给他的底牌，玩弄权术先行狠命压价说：“我是大日本帝国驻上海总领事，与日中谈判无关。但依我看来今天的（日中关系）状况真是太糟糕，太愚蠢了！”“本人奉命找到一条打开僵局的道路，请阁下运用影响大力帮助。”“如果中方向日本索取赔款，那么，日中关系只会恶化。”重光葵威胁说。

周龙光闻听此言，赶忙兜底说：“中方无意要求日本赔款！”重光葵如获至宝，马上紧紧抓住不放，迫不及待地追问道：“这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我以外交官身份担保！”“你跟我说的是不是新任外交部长王正廷所希望达成的？你说不打算要求赔款，这是外交部长王正廷的意思吗？中国方面是否真有此想法，请你回去商量商量，再把结果告诉我。”为了迫使蒋介石继续退让，重光葵眼珠一转鬼话连篇地说：“我虽是总领事，但为解决‘济南惨案’，也要再考虑一下不赔款的做法是否行得通。”重光葵打发走周龙光，忙与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商量。

芳泽大喜，两人决定相机行事，压蒋介石再作让步。

不久，重光葵从南京回到上海法租界的三井别墅，屁股还没坐稳，紧接着周龙光就气喘吁吁跑了进来，并开门见山地说：“总领事，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王外长也打算按这种办法谈判。”“好，那可请王外长立即与我方取得联系，重开谈判！”“那好，但必须进行秘密谈判。”“这又为何？”“南京老百姓听说王部长要对日本人让步，就会群起捣毁了他的住宅，因此，这个谈判只能秘密进行。要让老百姓知道了谈判内情，肯定是会弄砸的。”地点选在何处？”“在我亲戚家。”不久，重光葵和王正廷先后来到周龙光的亲戚家。他们在吸鸦片的床上对坐着，手里摆弄着吸大烟的各种工具，稍事寒暄，便开始谈判。

王正廷一改对上海新闻界发表激昂慷慨讲话的冠冕堂皇言辞，不再摇晃革命旗帜了，奴气十足地向日本人表态说：“周龙光是我的部下，他所说的一切都是本外交部长的意见。”重光葵盛气凌人地讲出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提出的条件：“我认为日华双方所受损失相差无几，相信完全可以立即抵销。”王正廷在蒋介石指使下，不顾日寇在“济南惨案”中惨杀6123人的血的事实顺水推舟说：“由于‘济南惨案’之发生，中方已蒙受损失，而芳泽公使亦屡陈日方也有损失。由于以上皆属事实，凡属中方义务者，国民政府自当履行。”就这样，在吸鸦片床上，王正廷与重光葵、芳泽谦吉初步达成了有利于日本政府的解决方案。

对中日初步达成的方案，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内部存在强烈的意见分歧。

为此，芳泽谦吉、重光葵一面对王正廷软硬兼施，施加压力，一面又会晤宋子文，要蒋介石亲自出面“抑制不同意见”，最后，终于在南京政府内部消除了异议。

3月28日，王正廷和芳泽谦吉在南京政府外交部签署了解决“济南惨案”的文件：《济南惨案协定》协定规定：一、撤兵之实行与正式会议同时开始，至多两个月内将山东现有日本军队撤去，接受办法由双方各派委员就地协商办理；二、此后国民政府对于日侨之保护，视为当然之事；三、共同组织调查委员会；四、双方损害赔偿问题，俟调查委员会共同负责清查后，互以名义上声明，采取宽大主义办理之。双方视此不快之感情，悉成过去，以期两国邦交益臻敦厚。

这个协定是蒋介石国民政府向日本政府屈服的一个协定，当然遭到国人的愤怒谴责。但作为当时的北伐军总司令，掌握实权的蒋介石，却要中国人民忍受这种耻辱，他说：“图报国仇，谋雪国耻，要使中国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真正达到独立自由的目的，今日只有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效法往哲先贤的志节，深信失土必能收回，国耻必可洗雪！”

三、蒋介石与日本浪人的勾结

事实上，日本军国主义早通过日本浪人与蒋介石搭上了关系，妄想通过蒋介石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因此日本军国主义者、浪人与蒋介石的关系极富于代表性和传奇性--日本浪人亦称大陆浪人、国土、大男人、义盗、任侠、“英雄”，是近代日本特有的历史现象，为日本近现代社会中十分复杂又具有一定势力的社会阶层，他们是离开主家到处流浪的穷困武士。为恢复昔日的权威而具有疯狂性和冒险性，他们以天皇的亲兵自居，到处以“爱国者”的面目出现，因有一技之长而能量惊人。他们秉承日本帝国主义的意旨，参与对中朝苏和亚洲国家的侵略活动，特别是在侵华战争中充当了谍报队、先锋队和别动队角色，堪称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急先锋。

纵观蒋介石的一生，可以说与日本浪人结下了不解之缘：早在保定军校时期，就和浪人医学教官发生了联系。在日军当兵和士官学校时期，认识了浪人间谍铃木贞一。其后，日本参谋本部派铃木贞一陪伴蒋介石从上海南下，为蒋介石出谋划策，以退为进，步步高升，直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当上国民党新军阀。在抗日战争时期，铃木贞一、土肥原贤二、佐佐木等仍与蒋介石有错综复杂的关系，有的隐藏在蒋介石周围，窃取了许多机密情报。逃台之后，仍和浪人出身的日本右翼分子勾结起来，策划反华活动。日本浪人鼻祖头山满更与蒋介石关系匪浅，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寻找新靠山，在日本追求宋美龄，与日本政要会谈，都离不开头山满的“鼎力相助”。黑龙会主干（会长）内田良平及其徒子徒孙也给蒋介石帮了不少忙。

日本浪人是日本统治阶级的座上客和有力打手，蒋介石通过他们，与日本统治阶级建立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由此演绎出近代中日关系史上许多令人眼花缭乱、怪诞难解的活剧来。

1924年1月，日本参谋本部获悉蒋介石被任命为黄浦军校校长的消息，马上命令铃木贞一来到上海，伙同戴季陶、张人杰，连劝带拉把蒋介石

石带到广州。

作为蒋介石的私人顾问，铃木贞一出谋划策，帮助蒋介石纵横捭阖，玩弄权术，耍尽阴谋，利用军权夺取党权，又利用党权扩大军权，一步步爬上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央组织部和军人部部长的高位，又制造"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在极左口号掩盖下打击共产党和革命党人。两人又共同密谋，1926年4月3日，由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出师北伐的建议：“北方国民军退出京津以后，中国形势会有迅速而重大之变化。如奉军占领京、津，则日本在华之势力，愈加稳固；吴佩孚在鄂豫之势力，英国必竭力助长之；孙传芳盘据江浙，英必逼孙与吴联；美国近且有联系以牵制日本之倾向；法国恐苏俄在华势力之复张，故急与英日建立联合战线，在滇助唐（继尧），以牵制广东之北伐。

“总之，列强在华，对于北方国民军处置既毕，势必转移视线，注全力于两广革命根据地无疑，且其期限，不出于三月至半年之内也。

“是故北伐出师，必须要在未达上述所料状态之前--也就是必须在6月底以前，付诸实行。”这个建议很快被国民党中央批准，蒋介石被推举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迅速着手筹划北伐事宜。蒋介石感激地置酒款待他的日本师兄：“老同学，你不愧为我的诸葛亮！”铃木贞一举杯祝贺，酒酣耳热之时不忘本身担负的重要使命：“老同学，你功成名就之时，千万不要忘记照顾日本帝国的在华权益！”“一定，一定。”1926年7月1日，蒋介石在广州东校场举行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暨北伐誓师典礼。广州市民载歌载舞，欢声雷动，军民五万人参加隆重的庆祝典礼。蒋介石一身戎装，满面春风，威风凛凛地发表他和铃木贞一精心策划的誓师辞：“国民痛苦，火热水深；土匪军阀，为虎作伥；帝国主义，以梟以张，本军兴师，救国救民；总理遗命，炳若日星。吊民伐罪，殄厥凶酋；复我平等，还我自由。嗟我将士，为民前锋，有进无退，为国效忠，实行主义，牺牲个人，丹心碧血，革命精神。……”这时候，东校场五万名军民纵情欢呼，放声高歌，气氛极为热烈。

蒋介石受到军民强烈情绪感染的感染，精神抖擞地发表宣言：“中正今兹就职，谨以三事为国人告：“第一--必与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为不断之决战，绝无妥协调和之余地。

“第二--必与全国军人一致对外，共同革命，以期三民主义早日实现。

“第三--必使我全军与国民深相结合，以为人民之军队，进而要求全国人民共负革命之责任。”铃木贞一作为私人顾问随蒋介石出征，对北伐军征战和日本的态度，戴维·贝尔加米尼有如下记载：1926年3月，蒋介石戏剧性地炫耀了一次武力，命令宪兵逮捕广州的全部中共党员，并迫使他们同意对名义上是共和制的北京军阀政权进行军事讨伐。蒋军开始北伐，所向披靡。

那个到处活跃的观察员铃木对蒋军在各地受到农民支持的情景印象颇深。在他寄回东京的几份报告中，他把蒋介石评价为一个真正被人民拥戴的并能使中国成为一股需要认真对待的力量的领袖。1926年1月28日，虽然那个曾在1915年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的加藤高明撇下他一生冷静和老谋深算地处理的俗务，撇下他的单眼镜离开了人间，但还有其他一些“中国通”身居要职，他们了解铃木的这些报告的重要性，因此就把它们呈述给裕仁，奏请他注意。

据此，裕仁在1926年春派了一批包括军官和文官在内的年轻精干的人员，到中国参加铃木的工作（包括外交家松冈洋右），并对局势直接进行研究。他们一致认为蒋介石是值得支持的；他也许不完全可靠，因为他梦想统一中国，但在这时，他愿意让满洲、蒙古和华北建立自治的傀儡政府，使这些地区不危及日本的安全。

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仔细分析铃木贞一的报告，印证了日本军部、外务盛黑龙会所获情报，掌握了中国革命营垒内部分化的重要动向，加快了与蒋介石试探性接触的步伐。

币原喜重郎首先指示他的心腹佐分利贞男接触蒋介石。

1926年12月，已升任日本外务省条约局长的佐分利贞男作为日本代表，来北京参加关税会议。

这是段祺瑞执政府同帝国主义国家就增加附加税税率讨价还价的会议，美、英、日、意、法、比、荷、葡、瑞典、挪威、西班牙、丹麦和中国13国参加。此会原定在华盛顿会议闭幕后三个月召开，帝国主义迟迟不动，后来看到北伐军顺利进展，为破坏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才同意召开这个会议。

佐分利与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黄郛因蒋介石的关系打得火热，一个是蒋介石的教官，一个是蒋介石盟兄，关系非同一般。佐分利在黄郛帮助下，使日本只负担七级税率的19%，远远低于英国的37.5%、日本输华商品的60.34%，为最低税率。

为感谢黄郛，佐分利私下置酒款待，请来最年轻的妓女相陪，极力吹捧黄郛说：“黄君足智多谋，不愧‘隐身仙人’之称，又是蒋介石的盟兄，前途不可限量！”“过奖了，实在不敢当！”“不，黄君1921年就担任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代表团顾问，1923年先后出任北京政府的外交总长、教育总长；后来参加北京政变，一度代理内阁总理，又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将来必有鹏程之举！”黄郛老于世故，深知这位浪人高官如此吹捧他，必有所求，也不点破，只含笑摇头故作谦虚之态。不一时，果见佐分利贞男提出要求说：“黄君，我有重要事务要见蒋介石，请代为引见！”黄郛深知这决非寻常会见，便满口答应，便带佐分利贞男南下武汉，会晤武汉政府外交部长陈有仁，又前往南昌，在北伐军总司令部会见蒋介石。总司令部设在旧江西督署，是一所散漫的大衙门。

蒋介石摒退左右，单独会见了佐分利贞男，热情主动上前握手：“教官好，中正一生都不忘教官的谆谆教诲，不忘教官的大力相助！”佐分利细看自己昔日的学生，今天已成为堂堂的北伐军总司令，一身戎装，更显得威武英俊，精神抖擞，感慨无量地说：“我早就看蒋君夙怀大志，气度不凡，久后必成大事，我眼力不错，竟让我言中了！”“教官有何见教？”蒋介石单刀直入问道。

佐分利贞男收起笑容，一本正经说：“现在蒋总司令军权、党权在握，外国观察家把你视为正在崛起的明星，但却是个闪烁不定，令人眼花缭乱的明星！”“此话怎讲？”“你奉孙中山之命赴苏联考察，率领黄浦军校学生镇压陈廉伯商团叛乱，与共产党合作东征打败陈炯明，在汕头演讲声称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都令人捉摸不透，看不清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蒋介石故做委屈之态，向他的教官诉苦道：“教官，你应该了解我，冒险发动中山舰事件，赶走苏联顾问季山嘉，迫使共产党人退出黄浦军校和第一军！外国

朋友为什么就看不到我的良苦用心呢？”佐分利贞男急忙安慰他的学生道：“外国朋友对此当然不会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西方观察家曾断言，广州似乎可望采取更为保守的政策，大日本帝国政府才派我私下会见你，探询蒋总司令的真意！”蒋介石思之再三，才低声说：“我目前处境极其危险，武汉政府和共产党都在跟我捣乱，左倾言论我不得不防。娘希匹，总有一天我会向共产党开刀的，请日本朋友放心！”1927年1月8日，佐分利贞男将他会晤蒋介石的情况如实上报日本外务剩特别指出，在对外政策上，目前蒋介石派与武汉共产党派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人的公开宣言与他们的真实意旨之间有着不小的距离。他向日本当局建议，日本对华政策宜以南昌为中心，同蒋介石取得谅解。

对这段史实，黄郛的夫人沈亦云在《亦云回忆》中有如下记载：“膺白在关税会议熟识了日本币原外相之股肱佐分利贞男，他们深谈过不少次，我家搬天津后佐分利尚来过几次。

讨论到中日两国各自百年之计，膺白希望日本人在大处着眼，以中国之和平统一为利，勿再利用中国之继承内争。中国分崩，日本未必有益。国民革命军北伐，日本政府派佐分利南来观察。他是同情中国改革，颇存期望于革命军的一个人。”王凡生在《我对于膺白先生的几点追忆》一文中也提到此事：“尤其在特别关税会议中，日本代表在原则上首先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听说膺白先生的侧面策动和游说，卒感动了佐分利等日方要人，有过不浅的因果。

后来日本虽然变卦，而终于不能公然反齿，这点更使我们追想到膺白先生的努力。”沈亦云、王凡生的回忆当然有吹捧成份，但仍可作为历史的作证。

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接到佐分利贞男的报告，摸到了蒋介石的底，为吸引蒋介石走出“朦胧”混沌的深渊，特地发表对华政策演说向蒋介石传递信息：“对于中国国民之合理希望，日本当以充分之同情与理解考虑之。若中国方面，能如吾人之所期望，以稳健平衡之精心相待，则改定条约之交涉，必可顺利进行。日本当尊重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对中国内政采取绝对不干涉主义。”美国、英国也发现蒋介石是北伐队伍中的“稳健温和派”，争相示意拉拢，美国国务卿凯洛格1927年1月27日对蒋介石发出示意声明说：“美国政府对所有互相争持，图谋控制中国的各党派，曾尽一切努力保持严谨的中立态度，美国政府愿意从最宽大的精神同中国办交涉。”蒋介石从日本、美国、英国的信息受到鼓舞，又觉得毫无把握，便把他的好友黄郛、张静江、虞洽卿找来商量，开口骂道：“娘希匹，日本人、美国人跟我捉什么迷藏，有话也不明说，他们要干什么名堂？”虞洽卿抽一口雪茄，再吐出一个又一个圆圈，慢斯条理地说：“目前局势犹如云雾缭绕，扑朔迷离，谁都想把对方看清楚，但谁都用烟雾掩盖自己，把对方看透！”“娘希匹，玩什么把戏？”张静江拍拍他的残腿，举起拐杖在空中一抡，引起众人注意说：“目前北伐形势锐不可挡，看样子将取得全面胜利，要从正面破坏不那么容易了，就只能从内部破坏，谁有资格担当如此惊天动地的重任呢？哈哈。……”蒋介石为日美帝国主义选中他心里暗喜，却故意问道：“他们选中了谁？”黄郛、张静江、虞洽卿三人同时放声大笑，都指着蒋介石的鼻子笑弯了腰，蒋介石顿时心花怒放，故意埋怨说：“既然把我当成了自家人，有话为什么不找我明说？”虞洽卿笑笑说：“奥妙就在这里！日美朋友就把我当

成真正的自家人！你知道我是荷兰银行的买办，又是上海英租界的华董，日本、美国都有我的朋友，他们对我没有不放心之处！”蒋介石挠挠秃脑瓜说：“这就是说，日美朋友对我还不放心？”黄郭三人异口同声道：“你说对了！”蒋介石苦恼地摇摇头说：“请问三位仁兄，我该如何动作？”张静江、虞洽卿笑着指黄郭说：“膺白兄足智多谋，神通广大，人称隐形仙人，定有妙计！”蒋介石转而向黄郭求计道：“盟兄从来是我的诸葛亮，而今眼目下我处在十字路口，一失足会形成千古恨，可谓身处险境，步履维艰，请盟兄教我致胜之计！”黄郭见蒋介石如此礼贤下士，便微微一笑说：“你如此不耻下问，我就教你三条妙计！”蒋介石喜形于色问：“第一条计是。……”黄郭慢悠悠地说：“第一条计，最为重要的是向国内外明示政策，内容有二，一是必须离开俄国倒向日美，二是放弃容共亲共政策！”张静江手举拐杖在空中猛烈挥舞，呼呼生风，然后用力劈下，恶狠狠地说：“你必须将共产党一脚踢开，踩在脚下，不让共产党兴风作浪，无法无天！”虞洽卿以手做砍脑袋状吼叫：“一脚踢开还不行，要大开杀戒，杀他个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以绝后患！”蒋介石不动声色，从容问道：“第二条计呢？”黄郭看蒋介石没有反对，便以强硬语气说：“第二条计是外交上采取断然措施，首先谋求同日本、美国的谅解，无论如何，不应放弃走日本这条路！”蒋介石暗想，这条路我早已在走，却不明确说出，只催盟兄讲第三条计谋。黄郭更以铿锵的语调向盟弟献策道：“第三条计策是平定东南之后，联络冯玉祥、阎锡山，引为同调，形成中心力量。”黄郭献计三条，然后用力将手一挥特别强调道：“实行这三条妙计，就可以减少内争而早致统一！”黄郭献罢计，三人一齐声叫好。蒋介石兴致勃勃说：“听兄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现在是一主不烦二客，请问膺白兄，我当先从哪里做起？”黄郭早已有成竹在胸，大笑道：“既然总司令言听计从，我早已为总司令预谋一条路了！”蒋介石大喜，忙问“路在何方？”黄郭含笑作答：“日本驻九江领事正在牯岭恭候大驾！”“日本领事？他是谁？”“江户千太郎！”“他是铃木贞一的朋友，我留学日本时就认识他——走，膺白兄，陪我牯岭一游！”蒋介石携黄郭驱车前往江西庐山。一路卫士开道，前呼后拥，摆尽总司令威风。

牯岭一称牯牛岭，位于名胜庐山之上，以有大崖石状如牯牛得名。早在清朝光绪年间，牯岭先后被英、法、美、日等国强行租占，北伐军攻克江西后，蒋介石看中了这里的绝妙风光，占了几座别墅，经常在此开会密谋军国大事。

黄郭的夫人沈亦云回忆当时情况说：“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包租着牯岭仙岩旅馆全部，一所楼房，一所平房。平房除客厅饭厅外，有两组卧室，较大的一组是蒋先生住，小的一组膺白祝我到庐山时，蒋先生已经搬住另一独立之屋，我们就住了他空出来的一组。因饭厅客厅都在这所平房，且有火炉，故在楼房的人常来聚在一起，蒋先生也亦来同吃饭。……膺白差不多一天到晚在蒋先生处……”蒋介石一到牯岭别墅，就让黄郭把江户千太郎请来。两人多年不见，都还依稀记得当年面容，交谈十几年沧桑变迁，都不胜感慨。

两人慢慢把话拉入正题。江户千太郎捋着仁丹胡子说：“总司令阁下，恕我直言，我们对阁下与苏联顾问鲍罗廷过从甚密感到不安，对总司令在黄浦所讲‘中国革命必须承认共产国际的领导’，‘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的总参谋部’之类的话，感到分外刺耳！对你一再申言，北伐的最大目标是打倒帝国主义，感到不可理解，甚至可以说是不能容忍！”蒋介石想到黄郭的第二

条计谋，含笑看了他盟兄一眼，信誓旦旦向江户太千郎表明态度说：“我本人非但不打算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要尽可能地尊重现有条约，我保证承认外国借款，并如期偿还，外国人投资的企业将受到充分的保护。”日本外交官江户千太郎大喜过望，紧紧握着蒋介石的手说：“蒋总司令，大日本帝国对你的表态给予极高的评价！”江户千太郎迅即把晤见情况上报日本外务省，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把他的密友、日本海相财部彪请来密商拉拢蒋介石的方法。

财部彪拍手称妙道：“真是再巧也没有了，天照大神保佑，你我必定成功！”“啊？你有什么高招儿？”“我的秘书官小室敬二郎曾当过蒋介石留学时的教官，蒋介石逃离日本时，小室敬二郎曾置酒送行！”“妙极了，”币原喜重郎当即做出决定，“我打算派小室秘书官前往南昌，进一步摸蒋介石的底，你看如何？”“好，事不宜迟，我回去就命小室秘书官开始他的南昌之行！”于是，小室敬二郎奉日本当局之命，悄悄来到南昌，通过黄郛，在牯岭见到了蒋介石。

蒋介石深知小室敬二郎大有来头，就打起精神与小室畅叙分别之情说：“教官，我清楚地记得，我们三人刚出了营房，就见教官和一帮朋友追来，我们吓了一跳，拔腿要跑，是教官低声跟我们说：‘别害怕，我们知道你们要离营驰赴革命，我们是特意前来送行的！’”小室敬二郎心中暗喜：“你不忘旧情，倒是好兆头！”便有意称赞道：“总司令真是好记性，佩服，佩服！”蒋介石更设法把戏唱下去：“我更难忘教官在三一洋食店，举杯致送别词说：‘今天设宴惜别，祝贺你们迈向人生新的旅途。日本军人在道别时，要饮酒干杯。这样干杯是日本武士诀别之际，传杯共饮，誓不生还的表现！’”小室敬二郎得意地说：“使我感到骄傲的是，蒋君不畏艰险，回国投身革命一帆风顺，荣登总司令宝座，真是可喜可贺！”蒋介石点头致谢道：“本人决不忘记日本朋友的深情厚意，也永远要做日本的朋友！”小室敬二郎顺势抛出日本当局的真意道：“我们倒是听蒋总司令口口声声说什么：‘俄国力量直接间接帮助我们，故要革命成功，须联合苏俄共同打倒帝国主义。联合世界革命力量，中国革命方可成功，总理主义政策方能实现’，又不断声称，政治、军事一切都要听鲍罗廷的指挥，说什么‘孙中山是国父，鲍罗廷是亚父’！”蒋介石被揭得脸红一阵白一阵，急忙辩解道：“我们没有受苏联的利用和指导，苏俄制度不可能在中国再现。”小室敬二郎威严地将手一摆，厉声驳斥说：“光这样讲，并不能取得西方的信任，列强都对你感到恐惧。”为解除西方的恐惧，蒋介石一本正经表态说：“我们从未考虑用武力收回上海租界！”小室敬二郎冷漠地摇摇头，蒋介石搔搔头皮搜索枯肠，忽然似有所悟，完全针对日本表态说：“我理解满洲同日本在政治上、经济上的重大关系，知道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在那里流过血，有感情上的问题，因而我认为对满洲问题必须特殊考虑！”小室敬二郎脸上这才有了笑容说：“币原外务大臣1月18日在议会发表的对华演说，讲得十分明白，请总司令仔细研究。”蒋介石马上接口道：“我十分欣赏币原外相的这个演说。

如果日本正确地估价我们的主义和斗争，我愿意同日本握手！”小室敬二郎满意地点点头说：“总司令，我将很快回国复命，我走以后，你有事可以就近与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高尾亨接洽！”蒋介石喜笑颜开说：“好极了，我命黄郛和高尾亨直接联系。”黄郛再次出马，引出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故事，又有好戏看了。

四、日本为什么要推脱战争责任

——日本右翼分子大肆宣扬“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先叫嚷东京审判不公正，胡说“国际法中并没有战争中获胜的国家，可以审判战争中失败的国家这样的条款”等等。

更为严重的是有些右翼分子钻进日本自民党中，以现职内阁大臣身份大发日本侵略有功的谬论！

战争责任观是指发动非正义战争的国家，战后对这场战争的认识和态度。它有两层含义：一是如何评价这场战争，二是应从中获得什么样的启迪？日本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之一，对世界人民尤其是对中国人民犯下严重的战争罪行。

这场给人类造成空前浩劫的战争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

但它给人类带来的深重灾难，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虽然包括日本在内的战败国的历届政府对这场战争基本持否定态度，但由于意识形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有期相对的独立性，发动这场战争的精神力量——军国主义，却没有因日本战败而在社会生活中销声匿迹。

日本右翼分子大肆宣扬“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先叫嚷东京审判不公正，胡说“东京审判，一言以蔽之，乃是战胜国为了制裁战败国，完全无视审判的规则，单方面进行的报复审判”，竟声称“东京审判本身就是违反国际法的，因为国际法中并没有战争中获胜的国家，可以审判战争中失败的国家这样的条款”，企图推翻二战后对日本战犯的一系列正义审判。

日本右翼势力竟为日本军阀发动的侵略战争评功摆好，胡说日本进行侵略战争，是“为帮助亚洲国家争取独立解放”。他们别出心裁编出种种理由，认为英美等西方帝国主义者歧视亚洲国家，既不让亚洲许多弱小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走独立与解放之路，而且抑制亚洲的强国日本，不让日本走富国强兵之路，担心日本强盛起来会激起亚洲多数国家开展民族独立运动，所以认为英美帝国主义者带着西方人轻视亚洲人的偏见，以限制军备、封锁经济来抑制日本。他们认为日本与英美开战，是为帮助朝鲜、越南、缅甸、印度、菲律宾等国家摆脱西方殖民主义统治，硬说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对上述亚洲国家走民族解放之路有“功德”。

更为严重的是有些右翼分子钻进日本自民党中，以现职内阁大臣的身份大发日本侵略有功的谬论，为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和东南亚人民犯下罪行的开脱，为侵略战争涂脂抹粉，最典型的代表是藤尾正行、奥野诚亮。

藤尾正行1917年1月1日生于日本栃木县，上智大学专门部新闻科毕业后，历任记者、农林广播事业团常务理事、通产省政务次官、劳动大臣、文部大臣、自民党政调会长等职，为右翼团体青岚会、“日华（台）议员联盟”的主要成员。

他与台湾当局关系密切，多次率自民党代表团访台，仅1985年就两次赴台同蒋经国会晤，极力反对田中首相1972年9月访华，阻挠中日邦交正常化。他鼓吹修改日本现行宪法，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否认日

本进行侵略战争。

1986年藤尾正行以现职文部大臣身份，在日本国会答辩中，美化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朝鲜和发动的战争，公然声称，在日本过去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日本“没有干过应该感到羞愧的事情”，“世界史是部侵略史，是部战争史。只有日本进行了侵略的错误历史观必须加以纠正”。

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奥野诚亮。他1913年7月12日生于日本奈良县，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毕业后，历任内务省官员、高知县警察部部长、自治省事务次官、自民党总务局长和内阁文部大臣、法务大臣、国土厅长官。

奥野诚亮一直主张修改日本现行宪法，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辩护。他竟认为“日本不是侵略国家”，胡说日本没有侵略意图，竟说什么日本政府迎合中国，轻易使用侵略一词，“对不起日本的先辈，也对不起后代”。他攻击中国干涉日本内政。

1988年，奥野诚亮以现职国土厅长官的身份，公然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歌功颂德，他说：“日本奋起发动太平洋战争是想建立亚洲人的亚洲，解放亚洲，并使陷入半殖民地的中国，法属印度支那的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作为美国殖民地的菲律宾，作为荷兰殖民地的印度尼西亚，作为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缅甸和印度，全都获得了独立，”“看到现在的亚洲状况，我想日本希望实现的大东亚共荣国，从结果上说，不是已经诞生了吗？”与这些人相比，清水几太郎则讲得更为系统，他举出种种似是而非的歪理，违背世人皆知的历史事实，欺骗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情况不熟悉的人们，明确地强调说日本军国主义挑起的侵略、奴役战争是日本不得已而为之的自卫战争，并且那场战争是日本为“解放”亚洲各民族，使之免于西方国家的侵略而进行的“正义战争”，其结果是对被侵略的国家有利的，因此不该否定。

他说：“1937年的日中事变以后，美国开始向日本施加经济压迫，1939年7月通知（日本）废除了日美通商航海条约。

日本陷入A B C D包围圈（A是美国，B是英国，C是中国，D是荷兰）。美国、英国及其他国家接连不断地把兵员、武器、物资送到中国去，帮助了中国对日本作战。

“1941年11月26日，美国突然向日本提交了《赫尔备忘录》，要求日本撤出中国、满洲、法属印度支那，退出日德意防共协定。这是日本不能接受的要求。它预料到日本不会接受，所以决心进行战争。”“这是事实上的对日宣战。美国的大舰队正集结于夏威夷，而英国的大舰队已集结于新加坡。战争不是从12月8日袭击珍珠港开始的，而是从11月26日的《赫尔备忘录》开始的。”“开战后，许多日本人一起欢呼雀跃，激动异常！”

人们了解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来到亚洲各地进行侵略征服的历史；他们相信，开战将把亚洲各民族从西方国家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大约在四年的时间里，日本差不多单枪匹马地以全世界为对手进行战争，但失败了。

作为败者，按战争的规律，日本承担起了一切罪责。日本成了恶之结晶。

“但是，第一，日本是遵循西洋各先进国家所揭示的榜样行动的。日本从幕府末期到明治的历史表明，日本不断地被西洋各先进国家分割，处于要沦为它们的殖民地的危险边缘。

第二，日本迅速、敏锐地学到了在国际政治这个角斗场中生存下去所必需的行动。日本必须做别国所做的事情。第三，日本的行动与英荷等国的行动相比，时间上极短，规模上极校第四，日本采取行动的结果，英荷等西洋各国在亚洲的殖民地消灭了。”“在大约四年的时间里，日本在与这些国家作战中被打败了。且战且败的过程及其结果，便是印度、缅甸、马来亚等国家从英国独立了，菲律宾从美国独立了，印度尼西亚从荷兰独立了，中国则从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的统治下独立了。并且，在日本统治35年之后，朝鲜从日本独立了。在日本统治50年之后，台湾从日本独立了。战败后的东京审判（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西洋各国打着正义、人道、和平等等美丽理想的名义，审判了日本的领导人。但是，在美丽的思想的背面，恐怕交织着对于使它们丧失殖民地的日本的憎恶与怨恨吧！”上面这些论述，非常露骨地肯定了那场侵略战争，是地地道道的为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朝鲜、缅甸、马来亚、菲律宾等亚洲国家发动侵略战争，占领这些国家，在这些国家烧杀掠夺、无恶不作的罪行进行辩解的强盗理论。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清水教授完全撇开了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之前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包括台湾）、朝鲜，在中国东北地方建立伪满洲国的罪恶历史。言下之意，那些事情是提都不用提的、完全是正当的。

自民党中的右翼团体在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翻案的鼓噪声中，调门最高的是日本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中的右翼团体，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国家基本问题同志会和宗教政治研究会。

日本自民党1955年由日本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而成直到1993年7月，一直处于执政党地位，被称为日本的“万年执政党”。从该党成立的50年代后期，一直得到日本垄断财团的大力支持，连续执政达38年之久。1993年7月的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内部发生分裂大选失利，被八党联合政权取而代之，但它仍是日本实力雄厚的第一大党，在野仅一年又参加联合政权，1994年6月29日与社会党联手组成村山富市内阁。

村山内阁名为社会党委员长任首相，名为社会党执政，实际为自民党掌权，不少人把它叫作社会党挂牌，自民党营业。

经营一段过渡之后，日本自民党总裁桥本龙太郎依靠该党的雄厚实力，又登上了三党联合政府首相的宝座。

自民党一党执政的结束，是该党推行金权政治的必然结果，垄断资本给政客提供大笔金钱，让政客推行日本右翼为侵略战争翻案等种种政治主张，因而产生了不计其数的政治丑闻，仅曝光的就有60起，形成久治不愈的腐败沉痾，真是自民党自己整垮了自民党。

为了集中力量推行日本右翼的否定侵略战争等政治主张，反映日本“新民族主义”或曰“右翼民族主义”的政策理想，日本右翼势力推出他们的“政治精英”玉置和郎、龟井静香、石原慎太郎等组成自民党右翼团体，极其活跃地行动魄来，逐渐引起日本各界人士的注意，成为日本政界具有很大能量的团体，形成极其显著的特点：目标明确、活动频繁、势力膨胀、锋芒毕露。

国家基本问题同志会这是日本右翼分子龟井静香挑头，从自民党年轻众议员和参议员，挑选有右翼思想的对“国家基本问题”--顽固否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性质的“同志”组成自民党右翼团体。

龟井静香1936年11月1日生于日本广岛县。1960年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毕业，进入日本警察厅工作，曾任鹿儿岛县警察本部监察本部监

警察室室长、鸟取县警察本部警务部长、警察厅长官官房调查官、自民党民情局长次长、众议院地方行政委员会委员、法务委员会委员、物价特别委员会委员。作为警察官出身的日本议员，他凭借否定侵略战争性质而受到日本当局和右翼头目赏识而飞黄腾达，他由此尝到甜头，对推行否定日本侵略战争性质那一套特别卖力气，四方联络日本年轻的参众两院议员中的右翼分子18人，1978年7月1日发起成立“国家基本问题同志会”，他出任会长，干事长为蒲田胜，事务局长为平沼赳夫。成立大会上决定：“（1）组织名称为国家基本问题同志会；（2）本组织由自民党内年轻的众议员和参议员构成，入会资格原则上定为四次当选众议员、两次当选参议员；（3）本组织系超派系的自由奔放的行动集团和提出政策建议的集团；（4）对于涉及国家基本权力的问题，热心地负起全部责任；（5）广泛征集同志，至少确保30多名成员；（6）定期集会，积极参加学习会；（7）与民间友好团体密切联系，展开活动；（8）通过举办讲演会和出版书刊，进行启蒙活动。”他们自称是“没有背叛自民党立党根本宗旨的、品格高尚、志向远大的政治家的集团”，并且特地声明：“国家基本问题同志会里没有一个军国主义分子”，“既不是国家主义者的集合体，也不是军国主义分子的团体”。他们还宣称，大家的一致信念是“不使战争再次发生”。

事实胜于雄辩。行动检验言论。首先来看一看它的“设立宗旨书”是如何阐述这个“政治家的集团”缘何成立、宗旨何在的。“设立宗旨书”全文如下：“目前我国处于严峻的国际环境之下，为了祈求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我们被赋予很大的责任。为了真正的国际协调，要以各个国家坚持互不侵犯、独立自主的原则为前提。”“但是，如今，在外交和内政两个方面，来自外国的对于我国的不正当干涉一次接一次地发生。举例说，像在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教科书问题等事情上，直接关系到国家主权的干涉继续执拗地进行着。”“我们要求政府从长远的观点出发，准确地处置这种干涉，以便取得真正的国际协调的成果。为此，我们发誓要超越派系团结起来，采取行动，于是设立了‘国家基本问题同志会’。”他们在这里明确地把矛头指向了我国。众所周知，我国从中日世代友好的长远利益出发，对于日本政府领导人正式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等牌位的靖国神社、文部省审定教科书时为从前的侵华战争翻案等错误行为，严正地提出了批评，开展了必要的斗争。

其次，看一看他们在系列重大问题上的主张。

东京审判问题。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对于东条英机等28名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并判处东条英机等七名罪大恶极的甲级战犯死刑，判处16人终身监禁，判处两人有期徒刑；在判决之前，有两人已经死亡，一人不予起诉。

对于这个审判，他们认为：“东京审判，一言以蔽之，乃是战胜国为了制裁战败国，完全无视审判的规则，单方面进行的报复审判。”“审判本身就是违反国际法的，因为国际法上并没有战争中获胜的国家可以审判战争中失败的国家这样的条款。”“国际法上没有一条条款把‘战争’规定为犯罪。”“大东亚战争不是1945年8月15日结束的，真正结束是1952年4月28日（美日单独媾和的）和约生效之时，因此，东京审判是在战争状态下进行的审判，可以说是战争行为的一个形态。”他们扬言：“东京审判时对28人提出起诉所定的罪名是，这些人犯了三类罪，即危害和平罪、杀人罪、战争犯罪以及侵犯人道罪，而这完全是捏造罪科，完全没有任何法的根据。”东

京审判指控 28 人合谋，有计划、有组织，统一地进行了侵略战争，乃是牵强附会、夸大妄想。"并且说，那 28 名甲级战犯的"一致点就是爱国"。

因此，他们声言：“我们难道可以单方面简单地把战胜国所作出的裁决囫圇吞枣，承认有错吗？难道不需要冷静而客观地挖掘和分析到那场战争发生为止的历史过程，当时的世界形势，各个国家的立尝盘算以及所采取的行动吗？”他们直言不讳地说否定东京审判是为了要指导从今往后日本人的行动。他们说：“在走向 21 世纪的时刻，世界难道在按理想的状态进步着吗？现状难道不是越来越混沌不清，连前景都不能预见吗？在这样的时代，今后日本人的作用很重要。我们必须尽早从自己套在自己身上的东京审判史观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作为真正的日本人为建设新世界而奋斗！”教科书问题及参拜靖国神社。在这个问题上，这个组织的表现正是它的国粹主义及军国主义"心思"的大平光，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响。

教科书在涉及历史问题时应尊重历史事实，不允许任何的歪曲和篡改。而国家基本问题同志会则坚持认为：教科书"不得有损国益"，"事关国家利益，必须认识一致，必须维护"，"以培养下一代国民的精神为最重要"，要使国民具有高度的"民族意识"。

国家基本问题同志会称：“实现真正的国际协调的前提，是坚持各国互不侵犯、自主独立的原则。然而，来自外国的对日本内政、外交的不正当干涉不断发生，例如对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教科书问题等，与日本国家的存立直接抵触的干涉，连续顽固地进行。”他们认为：日本今日的繁荣是建立在大战中英灵宝贵的牺牲上的。1986 年 8 月 5 日，“国家基本问题同志会”在众议院第一议员会馆的第一会议室再次召开会议，集中讨论了正式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并做出如下决定：（1）要求直接会见总理，对靖国神社进行正式参拜；（2）与遗族会人员密切联系，为实现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而努力；（3）与在教科书和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有不同意见的中国、南朝鲜的议员及其代表举行直接会谈，取得相互理解。

同年 8 月 6 日，“同志会”派出代表会见自民干事长竹下登、总务会长安倍晋太郎，强烈要求自民党首脑和政府官员仍像 1985 年一样，正式参拜靖国神社。

中曾根首相在国内外舆论影响下决定 8 月 15 日不去靖国神社正式参拜后，该组织在 8 月 15 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声明称：“中曾根首相今天背弃公约，不去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国民将歧视为重大背信行为。”“我同志会从考虑国家主权的见解出发，认为这一事态不能接受。”此后，“同志会”多次要求中曾根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

10 月 28 日，“同志会”的龟井静香等人会见了南朝鲜驻日本大使李奎浩，说双方在教科书、靖国神社、藤尾失言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上述问题是日本内政，外国不能干涉。南朝鲜和日本报纸纷纷以“日本少壮鹰派议员在韩国驻日本大使馆口出狂言、恫吓韩国驻日本大使”，“日韩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为题发表文章，很多南朝鲜群众向日本外务省提出抗议。

在防卫问题上，“国家基本问题同志会”的态度也十分强硬。他们认为：为自卫的目的而排除侵犯行为（侵略进攻），仅仅击退武装进攻是不够的，必须使侵犯国放弃侵犯意志。因此，必须拥有为达到上述目的所需要的反击力量。要努力使国民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利用宇宙（太空）对国防来说无论如何是必要的，要努力取得国民的理解和支持，迅速建立起利用太空的

体制。

宗教政治研究会这是日本著名右翼头目玉置和郎联合楠正俊佐藤奎佐藤信二、石原慎太郎等右翼骨干分子，以研究宗教问题为名成立的右翼团体。

玉置和郎1923年1月1日生于日本和歌山县，日本拓殖大学院经济研究科毕业，年轻时就抱着"大陆雄飞"的思想到中国经商，在山西省陆军军官学校就读，是日本少数曾经在中国军官学校深造的日本右翼人物，1946年从中国回到日本，经营制盐业，开办教科书店、玩具商店。1953年曾为众议院议员早川崇进行竞选活动，并在早川议员的指引下，参加自民党，任自民党社会保障部长、青年对策部长。1965年当选参议员，属自民党无派系。1968年任农林水产省政务次官。1972年任冲绳开发厅政务次官。1981年任参议院行财政改革特别委员会委员长。曾任参议院地方行政、预算、社会劳动、文教、大藏等委员会委员，自民党总务会总务，国会对策委员会副委员长。1983年当选众议员，无派系。之后任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委员、自民党总务会副会长、生产之家国会议员联盟会长、宗教政治研究会会长、剑道联盟会长、体操协会会长等职。

玉置和郎主张恢复战前的天皇制，认为"日本国民中存在着潜在的崇拜天皇热"，应"寄希望于他们"。

玉置和郎一贯亲台反华。1972年7月，田中角荣组阁后，日本国内欣赏了以要求恢复中日邦交为中心的"中国热"。玉置则极力反对，他多次赴台湾活动，勾结台湾当局阻挠日本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谈判。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玉置又纠集中川一郎等自民党内部分鹰派议员于1973年7月成立了"青岚会"，任代表召集人。他拼命攻击田中内阁的对华政策，叫嚷"同中华民国断交是莫大的损失"，要求田中首相、大平外相辞职。

玉置还反对日本政府同中国缔结日中航空协定。在1974年4月5日举行的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第二小组会上，与大平外相展开激烈争论。在其后连续举行的自民党总务会上，他多次猛烈攻击外务省，追究自民党和政府领导人的责任。日中航空协定签署后，玉置又同台湾帮的主将藤尾正行亲自到首相官邸，要求日本政府"尽快恢复日台航线"。

在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题上，玉置也从中作梗。1975年1月，他要求三木首相从"日中和平友好条约"里删除"和平"两字。1977年10月，他又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在缔约前"应书面要求中国废除中苏军事同盟中敌视日本的条款"，并在自民党联席会议上提出"应明确尖阁群岛（即我钓鱼岛）的归属问题"。1978年5月，玉置抓住我渔船驶近钓鱼岛事件大做文章，攻击中国是"表里不一的国家"，不应同其缔约。

著有《善人更强》、《政党组织论》、《幼儿与家庭教育》。

他挑头于1977年11月1日成立宗教政治研究会，除"创价学会"和"耶稣基督教"外，其他宗教团体都是它的联系对象。主要有"立正佼成会"、"P L教团"、"妙智会"、"松缘神道大和山"，还有"灵友会"、"生长之家"、"世界救世教"、"佛所护念会教团"、"神社本厅"、"曹洞宗"等"新日本宗教团体联合会"的成员。

该会最初由45名自民党议员组成，其中众议员126人，参议员29人。会长为玉置和郎（参议员），副会长为楠正俊（参议员），干事长为佐

藤隆（众议员）。发言人是佐藤信二（参议员），众院代表干事是石原慎太郎（众议员）、林大千（众议员）、藤波孝生（众议员）；参院代表干事为楠正俊、佐藤信二、玉置和郎。

1977年11月1日召开成立大会时，当时的自民党干事长大平正芳、总务会长中曾根康弘、全国组织委员长竹下登、首相福田赳夫都到场祝贺。

会议上明确地显示出“宗教研”的政治倾向。“宗教研”会则中提出了目标：“在我国的政治中确立以宗教为根基的政治理想，从而在即将来临的新的世纪里给亚洲和世界带来和平与繁荣。”研究课题是：“宗教、教育、福利、外交、国防、经济及其他。”玉置会长讲话中指出：“本会是政治家组成的研究集团，因此，不停留在为研究而研究上，研究的成果当然要通过宣传活动和立法活动反映在政治上。”“宗教必须在政治路线中生动有力地开辟一条出路。”由此可以看出，“宗教政治研究会”对日本的内外政策将有着间接或直接的影响。

玉置和郎有一段话表明他是野心勃勃的。他说：“宗教政治研究会作为政教大联合的中枢，要成长为自民党最强的派系。”实际上，在自民党国会议员中，八人中就有一人加入了“宗教研”。它的103左右的会员为福田派的议员，因此又有“福田别动队”之称。“宗教研”在福田、田中、大平、三木、中曾根五大派系中都有人。因此，一旦它成为最大派系，必将左右整个自民党。

日本社会舆论指出，“宗教政治研究会”是个鹰派集团，它很可能成为自民党右翼路线的推进者。倘如此，它将把战后的民主主义拉回到战前的军国主义去，而成为日本民主主义的敌人。在封建宗教传统势力浓厚的日本，这个宗旨在政教合一的巨大执政议员的组织中存在，对于日本政治的走向，实在具有非同小可的影响，值得认真而具体地研究。

五、屠杀东南亚人民的刽子手

——日本侵略军不仅屠杀中国人民，也侵略占领东南亚、给东南亚各国人民带来战争灾难，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

按照日本右翼分子的强盗逻辑，日本侵略东南亚“有功”，亚洲国家人民应该感谢率领日本侵略军占领东南亚、挥动屠刀屠杀东南亚国家人民、奸淫东南亚妇女的日本强盗了，这是对日本侵略东南亚历史的肆意歪曲。日本甲级战犯武藤章、木村兵太郎不仅在中国，在东南亚也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

武藤章罪责难逃审判屠杀中国和东南亚人民的刽子手武藤章，是东京军事法庭的又一场大较量。

武藤章1892年12月生于日本熊本县，陆军大学毕业后曾任教育总监部课员、参谋本部第二部第四班班长、军务局军事课员、关东军参谋，参谋本部课长，职位一直升迁缓慢，后来他找到了窍门儿：在中国东北大开杀戒，便很快爬了上去。

中国公诉人倪征燷首先指控武藤章曾到绥远策划阴谋，武藤章说自己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关东军参谋，不可能在绥远兴风作浪。中国公诉人揭露

武藤章是破坏绥远抗战的罪魁祸首。武藤章受命调查绥远形势，他见日本关东军操纵的德王傀儡军队已发展到两军 8 个师，外加一个警卫师、一个炮兵团、一个宪兵队，与傅作义的第 3 5 师紧张对峙，他便向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做了紧急报告，植田谦吉当即命令武藤章和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到绥远活动。

板垣征四郎和武藤章到达绥远，在省政府会见绥远省主席兼第 3 5 军军长傅作义，挑拨傅作义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答应帮助傅作义发展自己的势力，对抗国民党政府。武藤章气势汹汹施加压力，要傅作义勾结德国投降日本。

傅作义正告武藤章说：“华北是中国的领土，绝不许任何人出来搞一个独立局面；内蒙和绥远都是中国的领土，不允许任何人分割独立，也不允许任何人来侵占蹂躏！”板垣征四郎和武藤章见无空子可钻，离间阴谋可耻破产，第二天便扫兴而去。

中国公诉人指控武藤章是“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好战分子，武藤章说他只是参谋本部第三（作战）课课长，官小位低，无足轻重。

倪征燮引用参谋本部第二（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对当时的情况回忆驳斥武藤章的谎言，河边虎四郎回忆称：“在看过 7 月 8 日（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的电报后，柴山兼四郎军务课长来电话说，‘发生麻烦事情了。……’这是他对我讲的第一句话。

武藤章第三课长则与此相反，认为此时即使动用武力，也要解决华北满蒙问题，心情上有很大差别。”倪征燮又引用日本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的一的日记揭露武藤章的战争狂人罪行：“东京中央部异常惊慌，但又不能不感到这是应该出现的情况终于到来了。在卢沟桥事件爆发之初。……在一片混乱中，只有参谋本部第三课和陆军省军事课在事务工作方面稳步采取应对措施。这两课的课长都认为事态不容乐观，对此，除诉诸实力外别无对策。只有增强日本在华北的兵力，根据情况，不失时机给予一些。他们的想法，是认为只有如此才能收拾局面。在此种想法的基础上，该两课长对紧急派出以 3 个师团和 1 8 个航空中队为骨干的兵力，取得了一致意见。”1 9 3 7 年 7 月 8 日，武藤章拟定的参谋本部作战课时局处理方案内容如下：“力求事变限定于平津地区，并迅速确保该地区，这是以谋求平安定为方针。……中国方面若对我军采取挑衅态度，则应向中国驻屯军增派必要之兵力，将与我敌对的中国军队逐出平津一带。外交交涉亦以此方针为准则。”日本政府根据武藤章等人的建议，决定向华北增派 3 个师团和航空兵团。

日本军部对武藤章要使平津、内蒙成为缓冲地带的意见极为重视，在一份文件中特意表扬他说：“武藤章作战课课长是 1 9 3 7 年 3 月就任的。在此以前任关东军第二课长，是绥远事件等一系列对华强硬政策的执行者。他主张为对苏战备，应巩固背后的华北、蒙疆，同石原莞尔第一部长的观点完全相反。他在实行能力方面较石原部长有过之而无不及。”武藤章建议将华北战火扩大到华中，积极参预日本进攻上海的阴谋策划，为此需要增派兵力。1 9 3 7 年 8 月 2 0 日，日本参谋本部批准了武藤章的意见，决定从日本国内抽调 4 个师团参加侵华战争，使日寇侵华兵力达到 1 1 个师团。

武藤章侵略野心恶性膨胀，又召集参谋本部第二课长、陆军省军事课长、军令部第一课长、海军省军务课长举行“恳谈会”，要求在华北给中国军队决定性打击，进入保定一线，在华中攻占上海。

武藤章的战争计划得到参谋本部的赏识，破例让这个中级军官到皇宫晋谒裕仁天皇，奏请增派第9、第13、第101师团及台湾守备队进攻上海，再派后备步兵4个大队到上海助战。

武藤章受到裕仁天皇接见，气焰更加嚣张。1937年9月起草《战争指导纲要》，首次正式提出设立大本营，裕仁天皇接受他的意见，1937年11月18日以昭和12年军令第一号公布了大本营令，统一指挥对外侵略战争。

大本营成立后，武藤章又卖力推动统帅部下令进行侵占石家庄的作战，还起草进攻山东的作战计划上奏裕仁天皇，请求派精锐兵团在海州登陆，沿陇海线进攻，造成夹击山东并攻击南京的态势。1937年10月中旬，武藤章主持参谋本部第三课，研究把战火扩大到华南沿海作战问题，制定出《华南作战纲要》，决定在进行华南作战之后再进攻南京。

日本军部见武藤章对进行上海、南京作战有发疯般的劲头，便任命他作为松井石根的帮手，提拔他当华中派遣军副参谋长。

武藤章受宠若惊，迫不及待地从小日本赶赴上海战常当时松井石根有病在苏州休养，武藤章更卖力地协助方面军司令官朝香宫于1937年12月12日攻陷南京。

12月17日，华中方面军为庆祝日军占领南京，在一片血泊中举行入城式，武藤章紧跟着骑大白马的松井石根乘汽车抵达南京中山门外，又陪同松井石根，自中山门至中国国民政府官邸，检阅列于两旁的侵略部队。

当时松井病尚未痊愈，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又臀部受伤，裕仁天皇的叔叔朝香宫鸠彦便把武藤章视为“天皇心腹集团”成员，指令他负责侵华日军在南京地区的宿营安排。

杀人狂武藤章根本不去安排日军部队在南京找地方宿营，却宣布南京城外的宿营地不足，日军官兵可以在南京随意选择宿营地。

这一声令下，犹如打开了野兽的牢笼，几十万日本侵略军就像几十万头穷凶极恶的三头六臂怪兽，公然冲向金陵石头城的大街小巷，看到男人就杀，看到女人就强奸，看到财物就抢夺，导致几十万中国人被杀，武藤章的一道命令直接促成了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

在东京法庭上，中国公诉人倪征燮控诉武藤章作为日寇侵华华中派遣军的副参谋长，参与了南京及其附近由松井所属部队犯下的骇人听闻的暴行，犯下了发动战争和屠杀无辜平民罪。

武藤章急得摘下眼镜在空中胡乱飞舞为自己辩解说，我只不过是松井石根手下的一个军官，居于没有指挥权的下属地位，自然不能采取有力措施，制止华中派遣军在南京地区的暴行。

中国公诉人倪征燮以充分的证据指出，武藤章当时已是华中派遣军副参谋长，根本不是毫无权力的下属军官，他下达的侵华日军可以在南京随地宿营的命令就是证明。

在中国公诉人的猛烈追击下，武藤章哑口无言，倪征燮乘胜追击：‘你作为华中派遣军副参谋长，为什么要下达促使南京大屠杀骇人事件发生的命令，要让野兽一般的日军随便在南京为非作歹？’武藤章在被告席上连声冷笑，以无耻的态度嘲弄公诉人对他的指控，摆出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大佐的劲头儿，找了一个荒诞不经的借口为自己辩解说：“我下达帝国陆军在南京随便宿营的理由，是说在南京城外长江畔的部队营地由于缺乏用水而不敷使

用。因而当大批日军搬进南京城的时候，他们赖以生存的水，大部分是经日军自己过滤和煮沸的，再由苦力们开船从长江上给日军官兵送到南京城里去。”为揭穿武藤章的谎言，中国公诉人倪征奥质问这是怎么造成的，武藤章继续编造谎言说：“南京市供水厂在12月9日被一颗炸弹击中，我急忙派第六野战卫生部队和第八野战工程兵部队去抢修，直到1938年1月7日，即帝国陆军占领南京三周之后，才开始供水。这些情况都有据可查，不是我武藤章在这里胡编乱造。”韦勃庭长适时站出来讲话，指出武藤章所说的情况根本不能成为日本侵略者对南京进行血腥屠杀的理由。

武藤章的日本辩护律师本尚一、美国辩护律师柯尔冈怕武藤章顶不住中国公诉人和东京审判法庭的猛烈攻势，忙命朝中岛今朝吾出庭为武藤章开脱罪责。

中岛今朝吾暗想，我和朝香宫指挥的日军第16师团是进攻南京的主力部队，我也是南京大屠杀的罪魁之一，按理说我在南京大屠杀中的罪恶比武藤章大，武藤章被作为甲级战犯押来受审，我却阴差阳错站在证人台上，看来要活命就不能开罪于美国佬，于是就含糊其词地为他 and 武藤章辩解说：“审判长阁下，我和武藤章被告都有怠忽管辖的错误……”韦勃庭长见中岛今朝吾故意为武藤章辩解，就进一步追问武藤章为什么下令让侵华日军在南京肆意屠杀。

中岛无力地辩解说：“仅有14个秘密警察协助武藤章维持治安，我们两人都没有能力维持治安，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中国公诉人倪征奥当即驳斥中岛今朝吾的谬论说：“武藤章作为华中派遣军副参谋长，你作为南京警备总司令，都有权维护南京的社会秩序，制止侵华日军官兵的屠杀、奸淫暴行，特别是证人中岛今朝吾，刚刚离开东京秘密警察总监的最高领导职位，你随时可以使用飞机运送日本将领于日本和南京之间，你采取制止日军暴行的措施完全有可能，也来得及，为什么却迟迟不见你的行动？西方观察家还亲眼看到，你和武藤章手下的秘密警察，在指导日军官兵抢劫，甚至为闯入民宅强奸南京妇女的日本官兵担任警戒，请问这是什么行为？”当时在南京的西方基督教青年会成员菲奇、冯·福肯豪森将军，当时在南京的传教士和医生纷纷走上证人席，揭露武藤章屠杀南京人民的罪行，中岛害怕追究自己的罪行，才不得不揭露武藤章参加了南京大屠杀，承认南京浩劫从1937年12月14日武藤章进入南京开始，一直持续了6周之久！

中岛今朝吾见中国检察官和法官对他怒目而视，不由胆战心惊，又说松井石根来到南京后对中岛和武藤章严厉训斥，命令他们把所有不必要留在城里的日军部队撤出南京，命令武藤章负责安排部队宿营，但武藤章始终未能在南京城外为侵华日军找到足够的膳宿设施，任凭日寇官兵在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做。

接着，中国公诉人倪征奥控诉武藤章是屠杀华北人民的刽子手：1938年7月31日，被陆军省次官东条英机看中，要他转任华北方面军副参谋长，运用南京大屠杀的经验，挽救侵华日军在华北的失败。

武藤章杀气腾腾来到华北，马上参与指挥日寇对晋察冀边区的“扫荡”围攻作战，对晋察冀边区百姓血腥屠杀，接着又指挥日军对冀中进行五次大“扫荡”，使华北白骨遍野，血流成河，他靠着对中国人民的大屠杀，升任大本营军部军务局长，授予少将军衔。又以举行“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简称“关特演”）”名义，调动关东军部队，准备对苏联开战。

美国公诉人基南控诉武藤章是推动日本向美英开战的元凶。武藤章辩解说他只是陆军省的一个小小军务局长，连个内阁大臣也没捞上，起不了多大作用，不要冤枉了他。

基南引用大量文件，证明日本大本营在偷袭珍珠港前的半年多时间里，召开过几十次会议讨论对美开战问题，武藤章每次都到会鼓吹对美开战，参与制定《关于促进南方施策的方案》，催首相东条英机早下决断。

武藤章仍矢口抵赖，基南连声冷笑，又把他的“王牌证人”田中隆吉请出来作证。

“昭和16年（1941年）11月25日，美国国务卿赫尔曾对日本发出最后通牒。

4天后的同月29日，武藤章局长就断然拒绝说：‘假如日本接受这项要求，那日本必将成为赤贫而毁灭，所以无论如何也要出之一战’。”田中隆吉瞪一眼对他怒目而视的武藤章，又说：“挑起太平洋战争的12月8日，当东条首相兼陆相发表训话时，军务局长武藤章竟大发宏论，称赞东条英机是英雄。在第二天的大本营会议上，武藤章又发言说，‘派来栖三郎大使和客轮龙山丸去美国，只是发动战争前夕的一种伪装’。”首席检查官基南对他的“王牌证人”在法庭上的表现相当满意，向他点点头以示鼓励，又问道：“武藤章这个军务局长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作用？请回答。”田中隆吉受到基南的鼓励，劲头更足，忙从他的庞杂“武器库”里找出法庭上最需要的东西，滔滔不绝地讲下去：“至于说到武藤章军务局长为什么具有如此实力，东条大将曾这样说过，‘我对军务局长武藤章工作上相当器重，因为军务局能和德国在欧洲的活动呼应，这对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有极大帮助，而武藤章局长一向就以这种目标为作业方针’。当年因德、意、日三国同盟问题而使米内光政内阁垮台时，陆相畑俊六很有感慨地说，‘这完全是武藤章搞的，米内被自己养的狗咬了手，所以米内光政总辞职并非出于自己本意’。”检察长基南对田中隆吉的证词极感兴趣，问道：“当被告东条担任陆军大臣时，谁是他的心腹谋士？”田中隆吉心头掠过一道阴影，暗想东条那时的心腹就是我和武藤章，后来在对美作战问题上才跟东条闹翻，为与东条划清界限，田中隆吉提高声调紧张地回答说：“东条的心腹谋士是武藤章，那时他正担任军务局长。其实，武藤章何止是东条的心腹，简直就是他的大脑。这也就是说，东条只是一张唱片，而武藤章才是操纵唱机的人。”1942年以后，武藤章升任近卫师团、第二师团中将师团长、侵菲日军参谋长，又犯下屠杀东南亚人民和盟军战俘的罪行。武藤曾下达这样的命令：“当敌方侵入时，须注意勿失爆炸和焚烧的机会，当屠杀菲律宾人时，应尽可能将其聚集在一块地方，以节省炸药和劳力。”武藤章的美国辩护律师柯尔冈急忙用战争中的混乱局面为武藤章的屠杀罪行开脱：“在菲律宾的美国军队在装备、运输和战斗威力方面对敌占有很大优势，推进速度惊人，日本军队被分割成一股一股。

这些股日军几乎彼此完全孤立，山下司令官的作用已化为乌有。实现统一指挥已经完全不行了。……山下也好，被告武藤章也好，不仅不能把自己的赞同意见发出去，就连他们的情况也了解不到了。即使武藤章尽了一切可能，也是无法制止暴行的。这在小林修次郎和其他证人在一般辩论阶段的证言中都有反映。”为给武藤章辩护，美国律师特意把当时的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搬出来作证，柯尔冈在法庭更趾高气扬地说：“为了证实我们的

观点，我们提供曾在菲律宾群岛日军司令部工作过的证人。此外，为证实当时的情况确实混乱，还将提供马歇尔将军的报告节录。这个报告说明，被告武藤章已无能力去改变在马尼拉发生的事件。“马歇尔不仅把美国关于缅甸和菲律宾战局进程的绝密报告的抄件发往东京军事法庭，本人也亲自来东京做证，这使武藤章大受鼓舞，对在东南亚的罪行硬说毫不知情：“我接到担任第14方面军参谋长的任命后，1944年离开棉兰前往菲律宾群岛。我未曾从军事行政管理机关方面和当地居民方面听到对本师团的不满的意见。”检察方面据理驳斥，武藤章自知理亏，眉头一皱又打出另一张王牌，他从德国纳粹主义分子在纽伦堡法庭的诡辩受到启发，又舞动三寸不烂之舌说：“如果说有暴行，那只不过是游击队非法活动的回答，而且战俘和被拘禁人员由山下将军督管，非我管辖范围。”中国公诉人以确凿证据驳武藤章的谎言说：“1942年4月20日，武藤章被任命为日本驻北苏门答腊帝国近卫军司令官。……凡是由其军队占领的地区，就都有最残酷的暴行发生，武藤章对此负有责任。战俘和被拘禁人员遭受的是饥饿、有病有伤不予医治、刑讯拷打和任意杀戮，而对待平民百姓则采取灭绝政策。”东京法庭判决书严肃指出：“1944年10月，武藤章被任命为菲律宾群岛山下将军的参谋长，他任此职直至投降。他的地位与南京大屠杀时期大不相同，他是能够左右政策的。他在菲律宾任参谋长期间，日本军队正在对平民搞大批杀害、刑讯和其他暴行活动，对待战俘和被拘禁人员则是用饥饿、刑讯折磨他们，或把他们杀掉。武藤章对此等令人发指的违反战争法规的行为负有责任。我们不能接受辩护方关于他对这些事件一无所知的说法，那是完全不可思议的。”日本投降后，经中国军方提出强烈要求，盟军以战犯嫌疑罪名逮捕武藤章并押回东京，被东京国际法庭判处绞刑，武藤章一下惊呆了，既而强作微笑，故作行注目礼之态，走出法庭。

在行刑途中武藤章交给牧师花山信胜博士一首诀别俳句：霜夜时，横下铁心，出门去。

1948年12月23日0时11分30秒，法医宣布暴虐中国和菲律宾的武藤章绝气毙命。

木村欠下笔笔血债原侵华日军将领、侵缅日军司令官木村兵太郎陆军大将，是被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7个甲级战犯之一，对他的审判充满惊心动魄的斗争。

木村兵太郎是日本法西斯军部刻意培养的青年将校，1935年3月任整备局统制课课长。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在国民党正面战场上进展顺利，攻占了武汉、广州等大平国土；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相反，中国共产党率领八路军、新四军浴血抗战，取得了平型关大捷等一系列胜利，开辟敌后战场，建立了大平抗日根据地，成为日本侵略者极为头痛的问题。

武汉失陷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发生战略性变化，由军事进攻为主转变为政治攻势为主，侵华日军的军事作战重点也发生重大变化，由国民党战场逐渐移向解放区。

山东区抗日根据地，是最令日寇胆战心惊的重要地区。

1937年10月日军攻占德州后，中共山东省委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在山东各地举行武装起义，党中央又先后派肖华、张经武、罗荣桓率八路军一一五师开进山东，建立了鲁中、鲁南、滨海、胶东、渤海等根据地，面积

包括河北、江苏部分地区，西北与晋察冀边区相邻，西边与晋冀鲁豫边区相连，南方与华中抗日根据地连接，成为衔接华北、华中两大平解放区的枢纽，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活像插向日寇心脏的一把尖刀。

华北日军司令部惊呼：“中共势力是华北治安肃正最坚韧的敌人，共产党势力在山东的扩张更为剧烈。为此，加强情报搜集，确立排除中共势力的对策，是刻不容缓的任务。”为镇压山东抗日势力，日本军部特别于1939年3月把刻意培养的中坚将官木村兵太郎晋升为陆军中将，同时升任第三十二师团的师团长，编入第十二军。驻兵山东兖州，伺机展开“扫荡”。

木村兵太郎停止日寇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于学忠第五十一军的进攻，将主要兵力转移到敌后，专门对付八路军。

1939年4月14日，木村兵太郎率8000余名日寇，由邹县、滕县、枣庄、临沂等地出动，分路向抱犊崮山区进行“扫荡”，企图寻歼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摧毁鲁南抗日根据地。他气势汹汹地下令：“这次作战的目的，与过去完全相异，乃是在于求得完全歼灭八路军及根据地，凡是敌人地域内的人，不问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不能搬运的，亦一律烧毁；饭碗一律打碎，并要一律埋死或下毒。”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初次与木村兵太郎交战，先避开日寇主力，集中兵力进攻郛城西北的樊坝。木村兵太郎找不到一一五师主力，就对抗日人民凶残屠杀。从1939年4月21日起，又指挥第三十二师团主力和独立混成第十旅团，在鲁西地区进行多次“扫荡”，被八路军歼灭500余人。

1939年5月，木村率第三十二师团接替第一一一师团在济南地区的作战任务。根据华北日军第二期肃正作战计划，木村师团采取分散兵力、积极“讨伐”的方针进行“扫荡”作战，遭到八路军一一五师沉重打击，伤亡惨重。

木村兵太郎抓不到八路军，便抓了2000多名百姓关进济南扎营街西北角的新华院集中营，先把“俘虏”的衣服剥光，每人抽200CC血供侵华日军医院用，然后把中国百姓关进又黑又臭的禁闭室，三天不给饭吃。木村兵太郎命令日军白天押着关进集中营的人去做苦工，稍有怠慢，就挥起皮鞭毒打，不少人被活活打死，或放开凶恶的狼狗，把人拉出来让狼狗撕咬，或注射氯化汞溶液、锰酸钾和石炭酸，把中国人杀死。

发现逃跑者，就用铁丝穿透手心，在树上吊死，或用刺刀逼着他们自己挖好坑，再用刺刀刺死埋掉。

木村兵太郎还在新华院设有“特别病洞”，生病的人被丢进洞中，一天只送两次稀饭，病人大都在洞中被老鼠咬死。中国公诉人的血泪控诉，激欺人们的强烈愤恨。

中国公诉人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揭露木村兵太郎狡猾地收买叛徒，1939年5月在泰（西）肥（城）地区包围一一五师师部的罪行。罗荣桓在极端不利条件下率部顽强抗击，在一天的战斗中歼灭日军1300人，然后分散突围，转移到东平以东地区，木村兵太郎恼羞成怒，又大肆屠杀中国人出气。

徐州会战后，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六七万人进驻泰山山脉，严阵以待。木村兵太郎率领日军于1939年6月4日突破泰山险阻，先后攻占莒县、沂水、大店、河阳镇等地，逐步压缩包围圈。木村兵太郎以为这次可以全歼八路军主力，岂知一一五师在罗荣桓指挥下早已巧妙跳出重围。

1939年8月2日，罗荣桓命特务营在梁山地区前集庄设伏，歼灭木村部日军600余人，取得梁山歼灭战的胜利。

木村兵太郎气急败坏，8月4日率领5000名日寇，40多辆装甲车，对鲁西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报复性“扫荡”，企图将一一五师主力一口吃掉。罗荣桓指挥抗日健儿化整为零，利用青纱帐巧妙地与木村兵太郎周旋，伺机伏击小股日军，木村兵太郎无可奈何，不得不停止对鲁西的“扫荡”，而拿屠杀无辜百姓出气。

1940年春天，木村兵太郎指挥日军和伪军与八路军一一五师在抱犊崮山区展开激战，木村兵太郎丢失郯城，白彦，被歼灭800余人，木村兵太郎又集中日伪军8000余人，向抱犊崮发动“合围扫荡”，又被八路军消灭2200余人。木村兵太郎气急败坏，又大肆屠杀山东无辜民众。

日本军部见木村兵太郎敢于凶残杀害中国百姓，1940年10月将调任关东军参谋长。

木村一上任，就指挥关东军对东边道（今通化、延边地区）进行讨伐，又制定了《西南地区肃正工作实施纲要》，以武力镇压东北西南地区人民，杀害居民1500多人。

1940年12月，木村下令在哈尔滨设立“治安工作指导部”，大搞白色恐怖，仅在四撮房、敖木台、黑家窝铺就枪杀我抗日人员130多人，在肇原三江口将19个居民用铁丝穿在一起，投入冰窟里冻死，又进行大逮捕，使数以千计的中国百姓丧生。

木村兵太郎促使关东军和日寇侵华方面军达成协议，让侵略华北的日军以“军事讨伐”、“治安肃正”为名，采取各种方式强抓中国百姓，再用闷罐车运到东北，每年至少向东北运10万劳工，一部分被劫往日本，死在异国他乡。

木村兵太郎命关东军把从关内抓来的劳工送到吉林省辽源矿区太信方家柜煤矿，四周围有两道铁丝网，中间夹着一道高压电网，最里面又是一道一丈高的土墙。矿工在日本人的皮鞭下挖煤，无数矿工被活活折磨死，或被煤矿塌方、煤其中毒、瓦斯爆炸致死，死了就被扔进方家柜“万人坑”。这个“万人坑”从1941年开始埋人，一年零八个月就填满了，木村兵太郎调离关东军前，还命人在方家柜“万人坑”旁修建炼人炉，有的矿工未死就被扔进炼人炉里烧掉。木村兵太郎推行“人肉开采政策”，使上万个中国矿工悲惨丧生！

中国公诉人还控诉了木村兵太郎积极参与对苏联实施突然袭击的阴谋活动，进行“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的实际准备。

作为关东军参谋长，他命关东军从各地抓来几十万劳工，在中苏边境地区修筑“北边防御工程”，规定修建三线部署的、综合性的大型军事基地。木村兵太郎命关东军工兵部队监督施工，许多工人在施工中被折磨而死，其余工人在工程完工后也被秘密处死。

中国公诉人引用《台安县志》记载的资料，控诉木村兵太郎1941年命关东军从台安县强征劳工1372人，在抢修军事工程中被折磨死800多人。

法庭上的木村兵太郎情知他欠中国人民的血债太多，急得满头大汗，摘下眼镜擦擦眼镜七上的汗水，突然想起了逃脱之计：“审判长，指挥我作战的十二军军长尾高龟藏都无罪释放，却把我拖上法庭，这太不公道了吧--

再说我1941年4月10日就奉召返回国内，任陆军省次官，1943年3月31日调任陆军省军事参议官兼任兵器行政本部部长，从此就离开了中国战场！"本村兵太郎正自以为得计，美国公诉人基南又控诉他作为陆军省次官，作为日本首相兼陆军大臣东条英机的帮凶，致力于策划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阴谋活动。木村兵太郎深知麦克阿瑟和美国人最恨偷袭珍珠港的主谋者，才被基南一发炮弹打哑，不敢肆意妄为了。

中国公诉人还控诉木村兵太郎1944年8月30日就任日寇侵略缅甸方面司令官后，与中国远征军和英、美联军作战，又犯下的累累罪行。

美国公诉人基南还控诉说，木村为扫除日本军人的崇拜英美思想，提高日本法西斯官兵的大和民族优越感，以陆军省次官名义命令日本军队，把在马来西亚战役中俘虏的1000余名美英战俘押解到朝鲜，动员5万日本人、12万朝鲜人上街围观，让英美俘虏当街示众，命日本不停地向示众队伍扔石子，大肆羞辱。

中国公诉人向哲浚控诉说，"木村兵太郎有意放纵部下屠杀民众。他一到仰光，缅甸首都附近就发生了惨无人道的暴行。木村把司令部移到毛淡棉，那里又马上变为日军的屠场距离木村司令部10公里的一个地方叫卡拉冈，木村到那里不到一周，卡拉冈的居民就被他手下官兵全部杀光。"向哲浚质问说，"日本早已是1907年《海牙陆战公约》和1929年《日内瓦战俘公约》的签署国。你为何公然违背《日内瓦战俘公约》的明文规定，即俘虏应受合乎人道的待遇和保证？"木村兵太郎趾高气扬说："我们日本皇军将士最崇尚武士道精神，宁肯剖腹自尽也不投降，认为天皇陛下而死是最大的光荣，认为投降乃耻辱之举，是最可耻的事情！"中、美公诉人严厉驳斥木村兵太郎的蛮横狡辩，指出在侵略战争期间木村兵太郎担任陆军省次官3年之久，无论如何难逃违反战争法规之罪责。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木村在仰光参加了联合国军举行的受降仪式，代表日本政府、日军缅甸方面军在投降书上签字盖章，然后根据中国、美国、英国、缅甸的强烈要求，将木村兵太郎作为甲级战犯逮捕，押回东京交给远东军事法庭审判。

经两年多艰苦审判，东京法庭判处木村兵太郎绞刑。木村兵太郎以标准的立正姿态听完判决，然后转身退出法庭，步伐虽大，却掩饰不住他慌乱颓唐的神情。

六、东南亚不信任日本

——日本右翼分子否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的性质，使东南亚国家人民对日本失去了信任感，对日本政治家感到极不信任，极不放心，认为日本政治家不具备领导亚洲事务的资格。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等人认为，日本人非常看重东南亚，认为东南亚是日本重要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日本进口的主要战略物资，如石油和铁矿石的90%以上均通过马六甲海峡和龙目海峡，从中东等地运往日本，日本总进口的40%也由此运进。战时若卡断这条运输线，日本就会不战而

败。因此日本人宣称东南亚水域是日本生命攸关的海上交通线。一旦日本认为需要，就会同样发动同类性质的侵略战争，将东南亚人民推入血与泪的战争之中，也会编造各种理由，以保卫日本的海上运输线而显示威力。

印尼就对日本怀有极其矛盾的心理，一方面希望利用日本的资金和技术，另一方面又担心使印尼经济高度依赖于日本，因为现在日本已是印尼最大的投资国、最主要的商品市场也是最主要的援助，这就使日本有可能对印尼经济具有支配地位，进而操纵印尼经济，一旦印尼不服从日本的摆布，日本就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迫使印尼跟着日本的指挥棒转。

日本右翼分子否定侵略战争的性质使印尼学者安瓦尔对日本疑虑重重，他著文写道：“大多数印尼政治家认为，日本有权保护自己的领海，但日本不应该用直接的军事存在的办法来保护其本区域的海上运输线。相反，它应该通过同东南亚地区的合作，包括同本区域个别国家的合作，使其海上运输线的安全得到保障。”韩国有志之士从受日本军国主义几十年的侵略压迫其中得出结论：只要日本不对其战争罪行做深刻的反省，亚洲各国人民就应该联合起来，理直气壮地永远对它说“不”。因为“日本这个国家认为它只要有了力量，就理所当然地要侵犯别人，因此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日本都将以力量为基础来对付我们。”一位香港学者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以犀利的语言道出亚洲人民的心声：“就整体而言，亚洲国家仍然对日本存在普遍的猜忌与巨大的不信任。虽然今天的日本已经羽毛丰满，敢于对美国说‘不’，但是，今天的亚洲国家也同样当刮目相看，同样也会对日本说‘不’。日本不认错，不道歉，就回不了亚洲大家庭。

“在日本，有许多真正关心日本前途命运的人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日本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的话就很有见地：“日本要在21世纪的亚洲成为一个真正的伙伴，而不是一支新的同西方抗衡的经济力量，就必须建立一个基础，使自己能够批评邻国，也能听到邻国的批评。为此，日本必须为其侵略战争道歉，并提供赔偿。……在日本的整个现代化历史中，特别是在现代化达到顶峰的侵略战争中我们丧失了成为亚洲一部分的权利，我们一直在没有重新获得这种权利的情况下生存。”

七、“七七事变”难辞其咎

——“七七事变”亦称“卢沟桥事变”，它是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开始，是日本军国主义要彻底灭亡中国，将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的重要标志和显著信号，为日本军阀侵略中国的又一罪证。

战后，日本右翼分子一直处心积虑地洗刷日本军国主义挑起卢沟桥事变的罪恶行径，而把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责任推到中国头上，用心何其毒也！

日本右翼分子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不惜血本，兴师动众，登法庭、写文章、出书刊、拍电影，真是卑鄙手段无所不用，必欲把发动全面战争的责任从日本军国主义的肩头卸下来，硬要按到中国人民头上，为此制造了种种说法，无不令人嗤之以鼻！

日本右翼势力首先指使“七七事变”时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

群、“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的旅团长河边正三、日军北平特务机关顾问樱井德太郎，按蓄谋已久的计谋，展开进攻。

粗壮墩实的桥本群首先登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人席，以“卢沟桥事变”前线部队参谋长身份，指天发誓说“七七事变”是中国部队第二十九军发动的：中国第二十九军士兵看到日军进行夜间军事演习，感到十分恐怖，便鸣枪射击，导致了卢沟桥事件。

中国检察官倪征燠见桥本群把卢沟桥事件推到二十九军头上，就义正严词反问道：“从位置判断，这一射击不是靠近日军的地位发出的吗？”时任河北省第三行政区督察专员兼宛平县长王冷斋气愤地走上证人席，日方人员晓得王冷斋的厉害，倒抽一口冷气。

只见王冷斋以当事人身份证明，枪声来自宛平东方，而宛平城东门外正是日军演习地区，中方在那里根本没有驻军。

王冷斋当时奉北平市长秦德纯之命前去交涉，才搞清日军中队长清水听到枪声马上集合部队，亲率6个侦察兵到龙王庙去抓中国军队俘虏，看到有几个中国士兵在站岗，清水不敢下手，便借口有一名士兵失踪，向中国哨兵询问，哨兵回答说没有看见。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二十九军哨兵没有向日军开枪，否则日军怎能在二十九军阵地前沿自由行动呢？王冷斋弄清了事实，当即感慨万千写诗一首，在小序中写得明明白白：民国二十六年7月7日之夜，近11时，枪声忽作于宛平城外，后查知为日兵所发。

一声刁斗动孤城，报道强邻夜攻兵。

月黑星沉烟雾起，时当七夕近三更。

王冷斋在东京法庭吟罢他的《卢沟桥抗战纪事诗·一声刁斗》，振振有辞质问：“卢沟桥事变分明是日军挑起，你为什么要把推到二十九军身上？你还有何证据？”桥本群被王冷斋驳得无言以对，红着脸走下证人席。

日本辩护团副团长清濑一郎见初战受挫，忙把第二个证人河边正三推上证人席。

这河边正三是挑起卢沟桥事变的日本侵略军旅团长，他的部队是当时驻守卢沟桥附近地区的唯一旅团。他学着王冷斋的样子，也以事件见证人的身份，胡说卢沟桥事变是冯玉祥挑起的。

河边正三此言一出，全法庭人员都感到惊奇。审判长韦勃连连摇头，问他有何根据？河边正三信誓旦旦说，冯玉祥当时正处于反对蒋介石失败后的失意之中，想利用华北局势紧张之机掌握实权，因而在卢沟桥制造事件，从中渔利。

王冷斋对冯玉祥将军1935年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亲任总司令抗日，素怀敬仰之心，特别赞成冯玉祥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主张。见河边正三栽赃于老将军，怒不可遏，质问河边正三有何根据，河边正三支吾其词，王冷斋严肃揭发说：“证人河边正三，我们在宛平打过交道，曾较量过几个回合，你还记得吗？”河边正三不敢回答。王冷斋讲起河边正三曾指挥日军炮击宛平城，将专员公署等地全部轰毁，王冷斋等于十几分钟前迁出才幸免遭难。等枪炮声停下来之后，河边正三派人送信来，邀请王冷斋出城谈判，要求中方军队退出城外，否则将以大炮攻城，被王冷斋严词拒绝。7月9日，河边正三又要求允许他率领日军徒手幕僚进入宛平城慰劳，王冷斋知道又是日寇抢占宛平城的诡计，再次婉言谢绝。……河边正三见王冷斋把自己亲自指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的罪行公诸东京法庭，顿觉狼狈不堪，害

怕追究自己的战犯责任，忙灰溜溜走下证人席。

清濑一郎见再次受挫，就冷笑一声，拿出最毒辣的一招儿，指使樱井走上证人席，指控中国共产党制造了“七·七事变”。

樱井的指控有极大的欺骗性，顿时使东京法庭大哗，对中共有期见的西方人士更相信此说，审判长韦勃要证人提供证据。

樱井是日寇驻北平机关特务，他煞有介事编造理由说：“中国共产党挑起卢沟桥事变的第一个根据，是‘七·七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发表了《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中共主张如此激烈的对日即时开战论，就是中共挑起卢沟桥事实的有力证据。”王冷斋声明自己不是共产党，但对中共一直站在反帝抗日斗争的最前列，素怀敬佩之情，还做过这样的赞颂诗：延安奋臂起高呼，合力前驱原执殳。

亿万人心同激愤，山河保障定无虞。

王冷斋辛辣地讽刺说：“中国老百姓都知道中共号召国人团结御侮，抗日坚决，你把抗日先锋说成是‘七七事变’的罪魁祸首，真是离奇得可笑！”王冷斋的话引起法庭人员的同声讥笑，樱井脸皮比城墙还厚，又无耻地大放厥词：“我的第二个根据，是1937年7月13日左右，中共指使清华大学学生在中日两军之间鸣放鞭炮，扩大事态，挑起争端！”时任北平市长的秦德纯、宛平专员王冷斋等当事人，都证明7月7日夜里卢沟桥附近的枪声是实弹射击声，不是鞭炮声。

这时，又有一个日本人走上证人席，他就是“七七事变”时在北平特务机关任少佐的茂川秀和。他良心发现，为中国共产党大鸣不平说：“为了扩大两军冲突，指使部下鸣放鞭炮的人是我！”茂川秀和语音未落，“七七事变”时在北平的美国驻华武官也出庭作证说：“我认为7月的第一周，日军在宛平附近进行的夜间演习，是有意识的挑衅行为。……日军大部队从满洲向万里长城以南地区移动，是日军攻击宛平县城后20小时开始的。这一事实暗示，宛平事件是日本为发动对中国不宣而战的第二阶段战争进行了周密准备的行动。”中国检察官向东京法庭提交一份证明文件：是侵华日军第一联队《卢沟桥附近战斗详报》，它明确记载，7月7日夜，中队长清水听到“不明射击”之后，立即集合部队，“得知一名日本士兵不在，决定断然惩罚（中国军队）”。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直接到日本士兵失踪报告，决定借此向中国部队挑衅，公然要进宛平城搜索。

王冷斋质问樱井说：“我奉命与日方交涉时，你也在场，我当时说：‘夜间宛平城门已经关闭，日兵在城外演习，怎么能在城内失踪？就是退一步说，果有日兵失踪之事，也绝和我方无关，是否仿效当年南京日本领事藏本英明自行隐匿的故伎，企图做要挟的借口’？争论结果，决定双方派员联合调查，你樱井也是调查人员之一，岂知一到宛平，你们就自知理亏，不辞而别逃之夭夭，我怒发冲冠，愤而作诗以纪之：消息传来待折冲，当时尚冀息狼烽。

谁知一勺扬波起，故道夷兵忽失踪。

请张为幻本无根，惯技由来不足论。

茂本当年原自匿，诘他松井欲无言。

燃犀一照已分明，容忍都因在弭争。

得寸翻教思进尺，更凭强力气开城。

“证人樱井，你也是当年‘七七事变’的见证人，请你在法庭上讲几句真

话！”樱井被羞得无地自容，夹着尾巴要逃，边走边喃喃自语：“记不清了，记不清了。……”中国检察官又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发现了作为日本外相的广田弘毅的下述发言：“日本对华外交方针与过去无异，但不拟强行对华亲善。

在如今抗日、排日的漩涡中，纵想实现日中亲善，也难望取得成效。日本对此，虽深为不满，但看来除毅然推行正确政策外，别无他途。“事实证明，日本内阁一致同意外相广田的意见，决定向中国派兵，由此更证明广田弘毅是发动“七七事变”、推行全面侵华战争的主谋之一。

中国公诉人揭露广田弘毅为占领全中国，委托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提出同中国谈判的“和平条件”，压中国放弃抵抗，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广田还以外相身份发表诱降谈话称：“友邦中国，今日实遭逢最不幸之境遇，若中国能了解日本力求东亚和平之重要观点，则中国自能免除今日之惨痛。日本政府深愿在迎接1938年之时，能与友邦中国开始新的和平，解决一切问题，则中日大局，即可展开一新局面。”广田弘毅认为蒋介石政权处于极困难境地，“可以说一推就垮了”，不等蒋介石做出最后答复，就推动日本近卫政府堵死和谈道路，扩大侵华战争，企图一举灭亡中国。其后也一直以重臣身分参与日本侵略战争的策划和执行。

东京法庭认为广田弘毅利用他在内阁的重要职权，疯狂扩军备战，发动侵华战争，积极推行向东南亚的扩张政策和对苏联的侵略政策，对人类和平与安全犯下滔天大罪，因而判处其绞刑。

广田弘毅听到宣判他绞刑，两肩一耸，做出似有意外之感的动作，既而颓废地低头走出法庭，等候上绞刑架之日。

“九·一八”事变由日本挑起日本军国主义当局一面开动宣传机器，竭力否认“田中奏折”，一面按照“田中奏折”确定的侵华步骤，加快了发动侵华战争的步伐。

为试探我国政府特别是东北行政长官张学良的态度，1931年春夏之交，日本在我国东北相继挑起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

“万宝山事件”是日本蓄意制造的挑衅事件。1931年4月，吉林省长春县万宝山镇汉奸郝永德以长农稻田公司名义向三姓堡农民租借土地500垧（5000亩），未经长春县政府批准，擅自将500垧土地转租给流落到东北的朝鲜人李永勋。

不久，日本人又召集了210人组成稻植公司，仍由郝永德带领，在万宝山附近的伊通河上截流筑坝，不仅无理占用中国农民土地400多亩，而且蓄谋淹掉长春县数千顷农田。

中国农民孙永清等出于生计，向长春县政府请愿，要求制止日本人（实为朝鲜人）开挖水渠。长春县公安局派警察前往制止，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也派出日本警察前去干涉。

后来经中日双方协商，决定在问题解决前中止施工，但日方故意违约施工，并派60名警察携枪蓄意制造事端。

7月1日，400名中国农民举着写有“迫不得已，实行正当防御手段”的大白旗，拿着铁锹将堤防掘毁，把水路填平。

日本警察突然开枪射击，挑起冲突，第二天又出动60名警察强行挖渠，并制造“朝鲜人被中国人袭击残杀”的谣言，在朝鲜各地掀起大规模排华狂风，一周内即有侨民109人被杀，160人受伤，财产损失无数。这就

是"万宝山事件"。

当时，蒋介石正在江西围剿红军，接到"万宝山事件"的报告，他在日记中写道：“日人如此蛮横，吾国亦不成国矣！”他指示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方提出严正抗议。7月7日，中国外交部向日本驻华代办重光葵提出抗议，要求“立即制止朝鲜的暴行，保留要求赔偿权，并保证嗣后不再有同样事件发生。”日本接到中国的严重抗议后，内阁当天就进行研究，决定对华采取强硬方针。日本外相币原颠倒黑白，称“万宝山事件”是“侵犯帝国权益的事件”，公然向中国发出战争威胁说：“我方对此终究不能保持沉默，如果中方坚持这种态度，日本将不得不考虑改变在中方所切望的法权问题上的立常倘若类似不幸事件的发生今后不能得到充分保障，日本政府自将采取正当的随机措施，其结果必将产生极为严重的问题，中方必须慎重处理，否则后果严重！”在中日交涉中，中国代表王正廷指出，日本支持朝鲜农民在万宝山租田开渠，违反了中日有关约定，不能予以承认，而日本军警公然在中国领土上行使武力，打死打伤中国农民，更是违反国际公法的行为，中国为此提出严重抗议。

日本代表重光葵竟称，日本在华军警有保护日本和朝鲜侨民的权利，对排华事件不负法律责任，拒绝向中国赔偿损失，反要中国取缔反抗日本侵略和抵制日货的活动。

7月13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接到报告：“上海及国内各地民众集会，对日本造成'万宝山事件'及煽动朝鲜排华，准备对日经济绝交。”这时，美国驻华公使要蒋介石对日妥协，并设法引诱日本把矛头指向苏联。蒋介石也认为，“如果意气用事，反而正为日本挑衅所乘”，主张“吾当慎之处之”，因此通令全国“不得加害日本侨民”，以平息事态。

在中日交涉“万宝山事件”期间，上海、青岛等地又陆续发生一些中日冲突，而“中村事件”便是这些冲突中的一个突出事件。

所谓“中村事件”是东北军因击毙日本间谍军官中村震太郎而引起的事件。

1931年7月，日本军部派长男、森纠和中村震太郎三个大尉带人在东北进行间谍活动。中村等四人在窃取我中东铁路西部的军事情报后，继续骑马在洮南兴安区刺探军情，被我东北军兴安屯垦军三团扣留。

当时屯垦军三团团长江玉衡去外防巡查，由团副董昆吾代理团长职务。

董昆吾派人将四名间谍提来审问。为首的人脸上长满络腮胡须，脚踏短筒皮靴，胸前挂着望远镜，自称是日本人，大模大样取出一张名片，上印“日本东京农业学会会员”和中村震太郎字样。从他们身上搜出所绘东北兴安岭、索伦山一带军事地形图、指北针和南部式手枪等物，由此断定中村等是日本间谍。

董昆吾第二天向团长关玉衡建议说：“现在我国是弱国，并无外交可言，我们若将中村等解送沈阳，日寇必将他们及其所携带的调查笔记、地图等全部索回，并且还要我方赔礼道歉，其结果徒惹得许多麻烦，毫无益处。按照国际法，外国军事间谍可以处以死刑，故无论如何，不能将他们释放，唯一办法是将他们秘密处死。”关团长派人去提中村四人时，不料日本间谍乘机逃跑，屯垦团卫兵马上追击，在追击途中四人均被击毙。关玉衡怕引起国际交涉即命士兵将中村等尸体烧毁。

关玉衡没有想到，中村等人在进入洮南前已在海拉尔向日本领事馆打

了电报。日本驻洮南领事接到中村等人的电报后，计算到洮南的时间已过了20多天，还不见中村等到达，于是，领事馆便派人沿着中村所走的路线向北寻找。在余公府得到蒙人告密，说在洮南一个当其中发现东北军看守士兵摘下的中村的手表。日方就把它作为中村被杀的铁证。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化装到余公馆调查，查明了中村被杀的真相。

这一下，日本更找到了侵略中国的借口。从8月17日起，在日本报纸上以耸人听闻的笔调，大肆渲染“中村被害事件”，诬陷中方无理惨杀日本军官，百般扩大事端。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奉命向中国东北伐理长官荣臻提出严重抗议。

荣臻答应将此事件请示在北平的张学良处理，并严正指出：中方在未查清事实真相之前，对日本报纸的无端指责不能接受。

张学良经与蒋介石商量，于9月6日自北京致电辽宁省主席臧式毅。荣臻指示说：“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当时日本陆相、参谋本部和内阁召开的外务、陆军、海军三省课长会议，均叫嚷用武力解决满蒙诸问题。日本军部更主张让关东军出面解决“中村事件”，反对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些情况使正在江西剿共的蒋介石惶恐不安。

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的讲话，更使蒋介石胆战心惊：“我们早定种种方策，这层此刻不便明言，唯有此点，我们须十分明白，就是‘中村事件’，不能说陆军一方面，简直可当作全日本的事件，决不取姑息手段，非彻底、干净地解决不可！”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的私下谈话更为露骨。他说：“除凭军部实力解决之外，别无途径！”这时，陈果夫拿着日本飞机在东北散发的传单，跑到南昌行营，交给蒋介石。传单上写着：“击灭暴戾东北政权！”“借此机会永久确保日本帝国在满蒙既得之特殊权益！”陈果夫还向蒋介石报告说：“据可靠情报，关东军海城炮兵队连日夤夜偷运大炮，藏在沈阳守备队中；关东军鬼鬼祟祟在满汉铁路沿线偷窥北大营动静；关东军士兵公然在北大营周围寻衅；关东军新任总司令本庄繁加紧巡视满铁沿线；关东军驻在满铁附属地内的军眷正开掘水井，种种迹象都表明日本正在做战争准备。”“‘中村事件’误事啊！”蒋介石摸着脑门说：“关东军乃‘皇军之花’，战斗力极强，别说中国军队，美国兵也讨不了便宜！我全国同胞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告诉张学良，此非对日作战之时，不力避冲突，战则必败，日本就要中国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蒋介石说着，又把秘书长杨永泰找来，让他笔录发给张学良的密电：“汉卿：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中正铣机樱”这就是闻名一时的“铣电”。

杨永泰在旁媚说：“我替总司令代拟的对日办法有上、中、下三策：如果日本进攻东北，我方还击是下策；我方且战且退为中策；全面不抵抗为上策！总司令圈定的正是上策！”

“杨永泰刚说完，蒋介石又吩咐杨永泰说：“你再给国民党东北顾问赵欣伯发一个电报，告诉赵欣伯：如果出了事，他可以向关东军总部去电话，告诉日本人：‘奉蒋主席之命决不抵抗，希望皇军停止射击！’你提出上、中、下三策，我这个是上策中的上策。”9月11日深夜，蒋介石由武汉乘专车

来到石家庄，把张学良召来，企图借日本人之手搞垮张学良的实力。

蒋介石严令张学良说：“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张学良义愤填膺地质问说：“万一东三省沦陷，被日本人侵占，我将以何脸面去见关外的三千万父老？我又有何理由回答全国人民的质询？”蒋介石像哄小孩一般连蒙带骗道：“我是一国主席，责任当然由我来负！我早已考虑成熟，我们可以提请国联出面，主持正义。日本人敢于和我们逞强，可也得看美国人和英国人的脸色。我们可以通过外交途径，把日本抢到手的东西，再要回来。”“这可靠吗？”“当然可靠！我们的老祖宗，是最擅长运用以夷制夷的嘛！”

总之，满洲这盘棋由我来下，你绝对服从中央就是。“日本军国主义通过“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摸到了中国对日本的软弱态度；又通过各种情报机构，把蒋介石和中国高级将领的情况、战略步骤以及军事部署，了解得一清二楚。

日本侵略者把一切准备停当后，就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全面发动对华侵略战争了！

1931年9月18日深夜，沈阳北部柳条湖一带，一轮弯月斜挂天际，虫声唧唧，分外寂静，天空显得那么宁静。……突然，日军铁道守备队的河本末守中尉率领一小队日本士兵，用枪逼着抓来的几名中国百姓，来到南满铁路柳条湖附近的铁路上，逼他们换上东北军军装，又将事先准备好的黄色炸药安放在长春至大连的铁路单侧轨道上，10点20分掀动爆炸开关，只听轰然一声巨响，一段铁轨被炸断。日军不由分说，向刚刚换上东北军军装的中国旗民开枪射击，河本末守命人立即拍照。就这样，便制造了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的假现常按照日本军部策划的阴谋，埋伏在柳条湖以北四公里外的日本独立守备队四个中队，听到破坏铁路的爆炸声，立刻嚎叫着向北大营扑去。与此同时，事先从日本运来的两门榴弹重炮对准北大营猛烈开炮，关东军第二师团步兵第二十九联队也凶猛地向着沈阳城垣发动进攻。……刹那间，沈阳城枪声四起，大炮轰鸣，由日本人一手挑起的一场侵略战争就打响了。

那时，我东北军部分主力虽随张学良进关，但仍有18万人，由著名将领王以哲率领的第七步兵旅，很有战斗力，而日本关东军不过两万余人，因此，当时如若奋力抵抗，决不会让日寇的阴谋顺利得逞。

步兵第七旅官兵见日寇猖狂发动进攻，都持枪实弹，狂呼若雷，群请一战。但长官却根据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不准擅自行动，那爱国官兵义愤填膺，抱枪痛哭，挥拳击壁，痛不欲生。王以哲命令部队退出营房，齐集营前大操场待命。

日寇见此兽性大发，用机枪猛烈扫射，当场亡中国官兵近千名。爱国官兵忍无可忍，这才毅然开枪还击，杀出一条血路撤出沈阳。第七步兵旅一撤，沈阳便在9月19日凌晨被日寇占领。

日寇占领沈阳的当天，又占领营口、鞍山、铁岭、抚顺、辽阳、长春等18座城市，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移驻沈阳，诬称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狂叫永远占领东北。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正和宋美龄在江西南昌，部署对红军进行新的“围剿”。

当日深夜，当蒋氏夫妇做完祈祷，准备更衣入睡时，接到了日本发动

沈阳事变的电报。

蒋介石阅读了电报疑虑忪忪地向宋美龄说：“夫人，日本人入侵满洲的枪声未打响的时候，我希冀能早一天听到；如今这枪声真的打响了，我又觉得它似乎来得早了些，因为有些事情还没有准备好。”当晚，蒋介石匆忙召集谋士研究对策。会后蒋介石马上下达不抵抗命令，还决定设立特种外交委员会，任命戴季陶为委员长，宋子文为副委员长，顾维钧为秘书长，任命陈立夫、孔祥熙、丁惟汾、于右任、颜惠庆、李石曾、罗文干等人为委员。为捞取政治实惠，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身份，指示外交部对日本提出“文明抗议”。

9月19日，中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指出日本军队突然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占领沈阳城，实为蔑视《非战公约》，破坏和平；声明中国军队并无抵抗还击，日本军队却继续攻击，故意破坏和平，其责任须由日本政府负责；要求日本政府迅速电令关东军从占领区域及时撤退，恢复事变前原状，并声明保留正当赔款之要求提出权。

9月20、23日，中国政府又接连向日本政府发出第二、三次抗议照会，谴责日本政府忽视中国抗议，使侵略事态日益扩大，严重破坏东亚和平，要求日本政府停止一切侵略行动。

但日本政府对中国的声明不做正式答复，只于9月24日发表《日本对于满洲事变的第一次政府声明》，以贼喊捉贼的伎俩，胡说“9月18日夜半，在奉天附近的一部分中国军队破坏了南满铁路的路轨，袭击了日方守备队，以致发生冲突”，竟称日本“认为有必要先发制人，以铲除危险的根源”。

蒋介石还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国际联盟上。

那时候，国际联盟正在日内瓦召开理事会会议，中国于9月14日当选为非常任理事国。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南京政府外交部通令中国驻外各使领馆说：“仰向驻在国政府切实接洽并探询其态度，迅速电部为要。”并指示中国代表施肇基将东北事件报告国联，请其主持公道。

9月21日，中国外交部指示出席国联理事会的中国代表施肇基，根据国际联盟盟约第十一条的规定向国联提出如下照会。

“秘书长阁下：兹遵本国政府训令，请贵秘书长注意后开事实，并请根据国联盟约第十一条，由贵秘书长立即召集行政院会议，以便采用明敏有效之方法，俾国际和气得以保持。查9月19日会议时，中日代表已将满洲之严重情势，报告于行政院。中国代表并已声明，据当时所得之消息，此次事变之造成，中国方面绝不负其咎。9月19日之后，中国代表又接本国政府电告，得悉情势之发展，较第一次报告者更为严重，并称：日本正式军队于9月18日夜10时，无故向沈阳及其附近之中国军队轰击，同时将兵工厂营房炸坏，火药库焚毁，并将长春、宽城子及其他地方的中国军队解除武装，嗣复占据沈阳、安东及其他各城。各地的公共机关均经强占，各交通路线亦被日军夺据。我国军队及人民因遵守本国政府命令，并未抵抗，以免任何可使情势扩大之举动。

中国为国际联合会会员之一，鉴于上述事实，认为所生之情势，国联殊有依据盟约第十一条之规定，采取行动之必要。故本代表奉本国政府训令，请行政院根据第十一条所赋予之权利，立采步骤，阻止情势之扩大，而危害各国间的和平；并恢复事前原状，决定中国应得赔偿之性质与数额。中国政

府对于行政院之任何建议及国际联合会对于本案之任何决议，均愿完全遵行，合并声明。”蒋介石为对付国内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振振有辞地鼓吹：“余主张以日本侵占东三省事实，先行提出国际联盟与签订《非战公约》各国。此时惟有诉诸公理。……忍耐至于相当程度，乃出以自卫最后之行动。”蒋介石把向国联的申诉吹得天花乱坠：“此为一外交之转机。……如天果不亡吾中国，则此次外交当不致失败也。中国应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日本为在国联大会上摆脱困难处境，大肆对美、英、法、德、意等常任理事国展开外交活动，鼓动西方列强采取绥靖政策。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国各驻外大使纷纷出动，到处游说。日本驻美大使出源胜次立即奉命去见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以苏联的共产主义威胁为借口，向美国说：“苏俄是日、美两国的共同敌人，日本占领满洲的作战计划，就是日本参谋本部拟定的日军对苏作战总计划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史汀生对此极为赞成，但因日本发动侵略东北的战争，威胁了美国的在华利益，便以强硬语调指出：“日本要把东北变为自己的独占殖民地，这是公然以武力破坏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重大行动，破坏了列强在远东的均势，美国政府决不能置之不理。”“尊敬的国务卿，帝国政府为了对付布尔什维克，提议与贵国达成一项秘密谅解，不知阁下意向如何？”“什么秘密谅解？”“只要美国不插手满洲事变，日美两国在中国问题上，什么事都好商量。”史汀生为借用日本力量削弱苏联，经过讨价还价，最终微微一笑道：“胡佛总统认为，假如日本人公开对我们说，不能再遵守华盛顿协定了，请给日本机会以在中国恢复秩序，美国是不会提出异议的！”“国务卿的意思是……。”“美国对日本所提条件可予以同意，只附加一点：日本的军事占领应限于锦州以北，不可再往南进。”日本与美国做成私下交易后，又命出席国联会议的代表芳泽谦吉，去做在国联理事会有举足轻重影响的英、法两国的工作。

芳泽谦吉深知当时西方列强正处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英、法两国都疲于应付国内问题，又希望日本能成为反苏宪兵，因此日本便向英、法保证：日本进攻中国东北只是想“充当远东的防共宪兵，防止共产主义在远东蔓延”。

在9月22日举行的国联行政院会议上，中国代表施肇基在提交大会的申诉中，既不指控日本为侵略者，也不要求对日本进行制裁，只要求各国阻止形势恶化，恢复“九一八”事变前的状态。

日本代表芳泽谦吉气焰嚣张，倒打一耙称：“据日本所获情报，此项发动，或如所称之‘偶然事变’，乃因中国军队毁坏沈阳附近日本铁路所致。因之，日本军队之行为以及占据数处村庄，皆为防卫之性质。”芳泽谦吉还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说：“此次事变显为一种地方事件，日本政府已明令日本军队司令官采取必要步骤，阻止扰乱之扩大。余向国联行政院保证，日本政府并无扩大情势，或对中华民国开战之意。余确信此次纠纷，定可由中、日两国政府直接交涉，达于和平之解决。如干涉过早，结果必不堪设想，徒足鼓起日本已激昂之舆情，有碍和平之解决。”中国代表施肇基提出，为验证中、日两国谁的报告属实，可由国联派出调查团到东北视察。西方各国因与日本私下搞了卑鄙交易，就由美国出面反对说：“这种行动足以刺激日本国民的情绪，反使自由主义者陷于不利的地位。”由于美、英等列强推行绥靖主义，此次会议仅通过对理事会主席、法国外长白里安的授权：“一、紧急

通知中、日两国政府，要求双方都不采取足以使事态恶化和妨碍和平解决的任何行动；二、商同中、日两国代表，寻求适当解决办法，可使两国立即撤兵，而不危及两国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9月30日，国联理事会又通过相似决议。但侵华日军对国联决议置之不理。日军气焰更为嚣张，10月8日开始轰炸东北行政中心锦州，这使英、美等国态度开始发生变化，理事会主席、法国外长白里安提出一项决议草案，要求日军在11月16日前撤退到满铁区域之内。

对此，日本政府为了应付被动局面，芳泽谦吉坚持要求进行日、中两国直接谈判，声称日本已确定解决日、中问题的五项基本原则。英、法代表追问其主要内容，芳泽谦吉却拒不回答。英、法等国代表揶揄芳泽说：“对于内容都不能说明的原则，实在无法赞成。”这时，全国范围的抗日运动风起云涌，青年学生纷纷到南京请愿，外交部长王正廷因没有出来亲自接见，爱国学生冲入外交部，把王正廷打得头破血流。蒋介石见势不妙，一面发表告同胞书，号召速作抵抗外侮之准备，一面命令张学良的东北军牢守锦州，并任命马占山为代理黑龙江省政府主席，抵抗日军，不得越过嫩江铁桥。

于是，马占山率领抗日健儿与日军展开激战，日寇伤亡惨重。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见久攻不克，便在11月12日向马占山发出通牒：本官对于贵主席要求左记之件：一、马占山主席应下野；二、黑龙江省军可由齐齐哈尔撤退；三、日本军之一部为洮昂线安全保证起见，应向洮昂线昂昂溪车站出进。本回答于11月12日夜12时以前，望即提出。

日寇极其恶毒，当天下通牒，必须当天回答。马占山是个爱国将领，对日寇这一套，慷慨通电自卫说：日本图谋北满，野心暴露，举世睽睽，无庸讳言。此次借口修理江桥，大举进攻，我军力图自卫，只可相与周旋。连日激战，昼攻夜袭，恣意残杀，致我死伤枕藉，卒以受迫过甚，退保三间房大小新庄一带筑垒坚守。顾日军武器精良，胜我百倍，明知江省联络断绝，呼援不应，仅以一隅之兵力，焉能抵抗日人一国之大军？所差堪自恃者，凡我前方将士，莫不深知大义，慷慨激昂，大有期吞河岳，敌忾同仇之势。兼之占山受国家依畀之深，人民寄托之重。……除已誓率前方将士，一致决死相拚，并将最近情况电向国联声请设法制止，静候世界各国公理之解决外，惟愿全国父老，努力振作，以救危亡，不胜感慨之至！

日寇见马占山不投降，便出动飞机、重炮展开猛攻；但马占山所属各部与敌寇肉搏，真是惊天地、泣鬼神，由于实力相差悬殊，最后于11月中旬不得不退出黑龙江。

11月16日，国联理事会会议由日内瓦移至巴黎举行。会议形式发生重要变化，重要活动大都改在幕后进行。美驻法大使道威斯居住的巴黎丽姿饭店，成了幕后活动的舞台。他根据国务卿史汀生的指示，提出“同时撤军”方案：日军撤至满铁地区，中国军队撤至山海关。

对如此偏袒日本的方案，日本政府不但不准备撤军，反而将其用作扩大侵略的借口。

12月3日，在中国新任外长顾维钧与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的“礼节性会晤”中，擅长辩论的顾维钧反唇相讥道：“如果日军后撤，中国可向国联保证，中国军队决不进入日军撤退区，请日军安心后撤。”重光葵被驳得理屈辞穷，狼狈不堪，顾维钧便乘胜追击道：“若国联竟请中国军队自本国领土以内撤退，这真是天大的怪事，全中国均将深为骇异！再说中国在锦州并

无集中军队或增派援军之事实，日军若不进攻，华军亦必不去寻衅。”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相反，中国共产党于9月20日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地号召全国军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立刻撤退占领东三省的陆海空军！自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在全国人民的反日怒潮中，国民党内部矛盾激化，蒋介石只得玩弄权术，12月15日被其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等所兼各职，再次下野，返回奉化老家“隐居”。日寇乘机对锦州发起攻击，1932年1月2日占领锦州，又挥兵直扑山海关，整个东北至此全部沦入日军铁蹄之下。

美国对日本移兵南下触犯了它在华利益，大为不满，美国务卿史汀生振振有辞地质问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说：“你在日本陆军大臣及参谋总长的同意之下，曾向本人保证，日军不再向锦州方面推进，现在日军已南移，这显然有违保证。”币原喜重郎还未来得及回答，就因若槻礼次郎内阁的垮台而宣告币原外交的结束。于是，美国务卿史汀生1月7日向中、日两国政府发出内容相同的照会。这是一篇千古奇文：“最近锦州方面的军事行动，已将1931年9月18日以前中华民国在南满最后存留的行政权破坏无遗。美国政府鉴于目前情势及其自身权利义务，不承认任何事实上的情势为合法。凡是以损害美国的条约权利及其在华公民，损害中国的主权和独立或领土和行政的完整，或者损害通称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对华国际政策’的任何新情况，美国不能也不予以承认。”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不承认主义”，亦称“史汀生主义”。

美国政府怕人们不理解，接着又进一步发表声明解释称：“第一，美国根本不想干涉日本在满洲的以条约为根据的合法权利；第二，美国并不想干涉日本对任何事件的解决，只要这些事件不损害合众国的利益。”在美国等国的纵容下，日本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不久便发动了进攻上海的“一·二八事变”。

八、日本岂能如此总结“教训”

——错误的战争责任观，助长了军国主义残余势力的气焰！

令人注目的是二次大战后，日本右翼分子或受其影响的人，以总结日本二次大战中的经验教训为名，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开脱罪责，洗刷罪行。

这方面突出的代表是秦郁彦所著《日中战争史》，山冈贞次郎所著《中国事变--它被隐秘的史实》等，都把发动“七七事变”的责任推给中国方面，一会儿胡说是“二十九军所为”，一会儿胡说是爱国将军冯玉祥挑起，一会儿又竟称是中国共产党煽动。

这些带主观偏见的主观猜测即“中方说”被铁的事实粉碎、驳倒后，他们退而求其次提出“日方说”，即卢沟桥事变出自侵略中国的日本的“中国驻屯军或日本特务机关的特务的个人阴谋”，但自己也觉没有多大说服力，又做了自我否定：“到目前为止，虽列出了两三个日本人的名字，但都没有逃

脱推论的范围，与现地有关的人员都几乎否定它。"受"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影响，日本一些学者和旧军人撰写的有关二战的著作，如今井武夫等著的《日本军队的研究》、森村俊夫编写的《败者的战争教训》、《指挥者的战争教训》，奥宫正武的《如何正确理解太平洋战争》等书，都不提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这场战争的侵略性质，单纯地从军事方面总结日本的经验教训，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从事研究，由于受"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大框框的限制，处心积虑地掩盖这场侵略战争的根本性质，掩盖侵略战争的社会根源，为日本侵略军队犯下的滔天罪行辩解，为杀人放火、奸淫妇女的日本侵略军的将领唱赞歌，从总的倾向上是不可取的。今井武夫曾任日本侵华部队总参谋长，双手沾满中国和亚洲国家及英美反法西斯人民的鲜血，对所犯罪行不去认账，就更谈不上有发言的资格了。至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纂的102卷本的巨著《战史丛书》，作者大都是当时日本侵略军队的作战参谋，理应借此机会良心发现，虔诚地向中国和被他们侵略的国家及人民真诚道歉，低头赔罪，但却大肆宣扬"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仍然站在侵略的立场上，成篇成章地介绍战争指导和战争概况，就失却了起码的公正立场，只为侵略战争唱赞歌了。

还有些日本学者对旧日本陆海军之间的矛盾特别感到有兴趣，津津有味地美化旧日本海军的战争责任观。

左立平在《战后日本战争责任述评》一文中，对歌颂天皇宫庭集团的战争责任观和"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辩解史观做述评之后，对此问题有精辟论述：旧日本海军从明治维新以来，同旧日本陆军一直存在着矛盾。围绕着"陆主海从"，还是"陆海并重"的问题，他们之间争吵了80余年，但这种矛盾是在向外侵略扩张的根本国策的基础上展开的。换言之，他们的矛盾只限于各自在武装力量总体结构中的地位和具体作战指导上，并不影响他们充当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对外侵略的工具。可是，战后日本理论界却把海陆军之间的矛盾作为推卸海军战争责任的借口，一味强调旧日本海军与陆军的矛盾，美化旧日本海军，否定其在这场战争中的责任。这方面的主要代表著作有：宫野澄的《最后的海军上将--井上成美》、生出寿的《反战大将--井上成美》、阿以弘之的《井上成美》、市冈扬一郎的《短视的研究--推动日本前进的海军精英》、中川靖造的《海军技术研究所--电子学王国的先驱者》等。在这些作者的笔下，旧日本海军将领已不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而成了和平主义的使者，成了日本科技事业披荆斩棘的开拓者。其中《山本五十六》是美化旧日本海军的一部艺术代表作，该书突出和深化海军是和平主义者的这种战争责任观的主题。曾经竭力主张集中全力侵略中国，后来又成为太平洋战争的直接发动者的山本五十六，居然被美化成一个虽然明知对美战争最后没有胜利希望却英勇地服从国家决定、鞠躬尽瘁的悲剧英雄。美化旧日本海军的战争责任观所赞颂的井上成美，确实反对过旧日本陆军与德意法西斯结盟和贸然对英美开战，但他力主对中国实施战略轰炸。从1937年7月到1943年7月，井上成美参与推行的对中国的战略轰炸政策，夺去33.5万中国人的生命，此外还有43万人被炸伤。

（《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115页）仅1941年3月3日日军对重庆空袭造成的一次"大隧道惨案"，就死亡1.2万名片民。可见，美化旧日本海军的战争责任观的实质，仍是肯定这场战争的侵略性和给人类带来的深重灾难。

此外，为了医治日本现代企业的僵化体制的弊端，日本又出现了海军经营理论。这一理论是“要改变观点，把大东亚战争中各次作战的失败看作是作为组织的日本军的失败，并把它作为现代应当汲取的教训或反面教员加以利用”（户部良一：《失败的本质--以组织论的方法研究日本军》钻石社1983版）。就是说，它要从旧日本陆海军的“失败”中找出组织科学方面的教训，并且积极地将它应用到现代企业经营中。主要代表著作有：集体编写的《海军武器管理研究》、户部良一的《失败的本质--以组织论的方法研究日本军》，堺屋太一等的《联合舰队的挫折--日本型组织的局限性再考》、村上薰的《今天从太平洋战争史实中学习什么？》等。

这种理论没有对日本的近代化方式和天皇制政治体制进行深刻剖析，只是把海军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人的管理--‘教育’和‘人事’的失败”（吉田俊雄：《海军式人才管理学》讲谈社1987版）。

他认为错误的战争责任观影响下的日本社会暗流特别值得重视。

错误的战争责任观对日本社会影响很大，助长了军国主义残余势力的气焰。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社会出现了一些令遭受过日本侵略战争创伤的国家与人民关注和担忧的现象。例如：1950年9月，日本把歌颂天皇的《君之代》当作国歌唱起来；复活国家神道，强制人民为伊势神宫捐款；1951年10月，首相吉田茂借靖国神社秋季大祭之时，竟以“个人”身份去参拜战犯的亡灵；80年代，首相中曾根康弘也曾去参拜靖国神社；文部大臣藤尾正行下令将日本中小学教科书中有关这场战争性质的内容全部删去；日本军费突破了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大关。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到1987年10月1日，日本战后出生的人口已占总人口的60%。战后出生者急速增大表明，具有直接战争经验，饱受这场战争之苦的一代人，不得不被“纯战后派”所取代。后者由于对这场战争缺乏亲身感受，在发达的现代经济刺激下，表现出更强烈的使日本成为政治大国乃至军事大国的欲望；其中极端者，则成为日本极右势力的基本成员。这部分人对战争责任比较淡漠，认为“这场战争已失去了时效，如果日本人总是拘泥于战争责任，这不仅对日本，而且对整个亚洲来说也没有好处。”（长谷川庆郎：《再见吧，亚洲！》文艺春秋社1986年版）进入90年代后，日本做出了战后以来内政外交的两个重大突破性决策：一是出巨资支持多国部队的海湾战争，二是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决定向海外派兵。这些举措虽同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政策有本质区别，但是日本淡化战争责任，开始试图恢复政治大国乃至军事大国地位的轨迹，却初露端倪。

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一事，在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韩国深感忧虑和担心，各报共同的论点是，这个法案为日本向海外派兵开辟了道路；它是日本走向军事大国的一个转折点；也违反了日本的和平宪法。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表示：“最令人担心的是日本会不会成为军事大国。”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也强调指出：“日本必须采取措施，以便不给亚洲国家造成不妥。”（《参考消息》1992年6月11日）。由于日本是一个有侵略“前科”的国家，人们对它的某些言行表示关注与忧虑是自然的和可以理解的。

当然，承认日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责任，仍是日本社会的主流。人们之所以强调战争的责任不容推卸，战争的历史不容篡改，目的不是为了发动战争的国家与人民，背上父辈们的包袱，时时有“罪错感”，而是希望

他们能够深刻剖析上一代人发动战争的历史根源，总结战争教训，从根本上清除一切不利于亚洲与世界和平的思潮，为人类与社会的进步事业做出一个战败国家应做的贡献。

九、日本内阁官员的三步曲

——“失言”、“收回”、“辞职”正因为如何对待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是个关键问题，因而日本右翼分子顽固地坚持为侵略战争翻案立场，必欲否定侵略战争的性质而后快，于是一个接一个频频在侵略战争问题上“失言”。

撮其要者，早在1986年9月，中曾根内阁的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就曾诡称，“南京事件的真相还不清楚”，并否认日本有侵略战犯。1988年4月，竹下内阁的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又辩解说：“日本从不是一个侵略国家”。1994年5月，羽田内阁的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叫嚣：把太平洋战争“定为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日本“是为了解放殖民地以确立大东亚共荣圈”，“南京事件纯属捏造”。同年8月村山内阁的环境厅长官樱井新又颠倒是非，说“日本并非想发动侵略战争而打仗”，“与其说侵略战争，毋宁说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托它的福，从欧洲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1995年8月，第二届村山内阁新任文部大臣岛村宜伸宣传，“是不是侵略战争，属于思想方法问题”。10月11日村山内阁总务厅长官江藤隆美私下又声言：“日本统治朝鲜时期并非没有做过好事”。

正像毛泽东为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所揭示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规律一样，已经形成一种规律性的东西：日本高级阁僚接二连三地日本侵略历史翻案，遭到亚洲各被侵略国强烈谴责后，他们又不得不表示“收回”自己的“失言”，最后又不得不在一片反对声中被其辞职。

有人形象地把日本右翼阁僚的愚蠢而有规律的行动，总结成捣乱三步曲：“失言”、“收回”、“辞职”的三步曲闹剧，似乎已发展为一种政治传染玻近年来，随着日本政界新老保守势力占据优势，日本报界指出：“近年来日本阁僚围绕战争的‘失言与收回’宛如逢年过节似地反复出现。这已不是失言，而应视为真心话。”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右翼政客都思想僵硬，顽固抵抗，受国内外舆论强烈谴责，被迫下台却死不悔悟。

在上述6名右翼阁僚中，除岛村宜伸以外，其他5人虽在日本国内外强烈谴责下被罢官或辞职下野，但他们的想法根本没变，有的还变本加厉，通过种种活动为日本的侵略战争翻案。奥野诚亮辞职后叫嚷：“我毫不认为我说过不正确的话”，“大东亚战争对建立亚洲人的亚洲作出了贡献”，“使用掠夺土地这一说法，便对不起日本先辈和后代”。日本国会之所以通过了一个改汤变味的战后50年决议，与奥野等人的大肆活动有关。前不久江藤虽被其辞职，但所述辞职理由并非是对历史说了错话，而是为了避免新進黨纠缠以免让自民党难以在国会通过修改宗教法人法案。江藤辞职后，日本一些议员反而对他表示同情，指责当时的村山首相“屈服外压”，一些人竟抱怨新闻界未“履约保密”。好像江藤倒成了“受害者”和“舍己为党的”“英雄”。

这种倾向还可能发展。

桥本的战争责任观现任首相桥本龙太郎是日本有名的鹰派人物，他的战争责任观很值得研究。

截至目前，日本政界对侵华战争问题的看法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是认为这是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日本大部分能正视历史的日本人都持这种观点。曾任日本首相的村山富市、细川护熙、海部俊树、河野洋平等都认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及亚洲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日本应该对此进行反省和谢罪。

二是认为这根本就不是侵略战争，而是日本以欧美为对手进行的一场自卫战争。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前法相奥野诚亮、永野茂门等自民党及新進黨内的极右分子和社会上的右翼势力。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能量颇大，一遇合适的气候便兴风作浪。对历史了解不多的年轻人造成了不良影响。

三是认为对这场战争要区别看待，在对亚洲的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确有采取侵略行为的一面，但对美、英、法等国的作战不具有侵略的性质。在日本持这种观点的人为数不少，桥本便是其中的一个。

桥本在其1994年所著《政权夺回论》一书中写道：我是1937年出生的，但并不知道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军事强国。在我懂事时，已经开始了日中战争，在物资不足及快要败战的阴影下度过了幼年时期。

之后我在学校学习历史，听了一些年长者的讲述，加上自己的学习得到知识。回过头来看，日本的确对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采取过侵略主义的行动，这是不可否认的。从现在的历史观来看，批判日本对朝鲜半岛和旧满洲国实行了殖民主义的统治是无话可说的。

在当选众议员之后，我长期从事在太平洋战场的各战区收集日本阵亡者遗骨的工作。从亚洲到南太平洋的广大地区听到的对日本及旧日本军队责难的呼声来看，确实感到日本当时给他们带来了相当大的麻烦。

但是，如果把在这段较长时间内的日本的行为都断定为“侵略”是不客观的。我不认为在太平洋战争中对美、英、法等国的作战是侵略行为。特别是在日本战败前夕，对撕毁日苏互不侵犯条约，与直扑旧满洲的苏军作战根本无“侵略”可言。

桥本从1993年到1995年担任“日本遗族会”的会长，主要负责照顾日本在战争中失去亲属的遗族的工作。

“日本遗族会”是一个积极为战争翻案的日本战争阵亡者家属组织，1953年成立，其前身是1947年成立的“日本遗族厚生联盟”，在全国各地设有10400个支部，现任代会长中井澄子，副会长末广荣。遗族会本部事务所设在东京九段会馆，同时经营旅馆业务。事务所现有职员约220人，大部分为食堂、旅店部门的服务人员，只有10人为遗族会本部专职职员，负责与全国各地遗族会支部联系。

1946年，日本政府停止发给军人、军属补助费，生活贫困的阵亡者家属增多。同时，由于美军占领时期发出了“国教分离指令”，战前国家与靖国神社的密切关系中断。战前，死亡军人家属被誉为“荣誉之家”，死者被当作“祭神”供奉在靖国神社。美军占领时期，日本社会对阵亡者家属表现冷淡，使他们颇觉愤怒不平，从而结成全国性组织，逐步发展成为积极为战争翻案的右翼团体。

日本遗族厚生联盟成立之初在其机关杂志中曾表明，成立的目的是“在

建设和平日本的同时，防止战争，保卫世界永久和平，为全人类福利做贡献”。但是从1962年自民党鹰派人物、众议院议员贺屋兴宣就任遗族会第四代会长开始，该会积极掀起政治活动，向政府陈情，搞签名运动。

贺屋是东条英机内阁时代的藏相，东京审判时被判为甲级战犯。获释后不久重返政界，就任遗族会会长，使日本遗族会发生决定性质变，而始于1959年的国家保护靖国神社运动更确立了该会的“鹰派组织”地位。

日本遗族会的两大支柱活动为“加强援助遗属对策事业”和“表彰英灵事业”。前者是要求提高补助金，后者是实现政府阁僚正式参拜，从而达到国家保护靖国神社的目的。为使这些要求得到满足，他们动员组织力量。为支持的政治家拉选票。从50年代初开始，遗族会出身的议员一直以领先票数当桥本作为“日本遗族会”会长，为拉140万户、17万自民党员的选票，就大力迎合“日本遗族会”的政治主张，宣传该会的观点。

在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问题上，桥本的主张基本接近第三种主张。桥本基本上仍坚持他1994年10月任村山内阁通产相时的提法，当时他虽然承认日本“侵略过中国”和“对朝鲜半岛实行过殖民统治”，但却不承认对亚太其他国家的侵略，说“是不是侵略，是一个相当微妙的问题”，并因此而曾受到韩国政府的批评，被指责为“歪曲历史”。

1996年1月26日，桥本作为首相在参议院会议回答日本共产党议员立木洋的提问时承认，日本在历史上有过对外侵略和对殖民地统治，关于对历史的认识与村山前首相的谈话没有区别，“在过去的一个历史时期，我国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带来了很大的损害和痛苦，这是事实，对此我们必须承认，并在深刻反省的基础上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

桥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到一半时，日本对中国大陆的政策开始出现侵略的动向。翻开朝鲜半岛的历史，当时我们祖先所选择的行动，按今天的历史观来看，不能不说它是殖民主义。这样的历史我们不应该忘记。”但同时，桥本又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对美国、英国、荷兰宣战是事实。但是否可以说这是侵略战争，我尚有疑问。当时，日本在太平洋各地区都有战场这也是事实。所以我认为在当时日本确实给各个地区的人们带来了麻烦。但是不是因此在语言上就一定把此定为侵略，这是一个相当微妙的问题。”当天下午，一群记者追着他问：“关于对战争与历史的认识同做通产大臣时有何不同？”“没有变化。”他爽快地回答。

“那南京大屠杀呢？”记者进一步追问。

桥本也不迟疑地答道：“具体数字暂当别论，我认为有此事。”然而不久，他却自食前言，1996年7月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这种言而无信的做法受到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

第四章参拜靖国神社和阴魂不散的军国主义

每年的“八·一五”都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纪念日，每天这一天，日本右翼分子就特别伤心落泪，他们无论如何也不甘心无条件投降，至今仍拒不承

认投降，而只称作“终战”。

每到这一天，他们就从四面八方奔向供奉着侵略者亡灵的靖国神社，穿上当年侵略中国、东南亚及同英、美军队作战时的旧海军白制服或旧陆军黄制服，扛着三八大盖枪，佩着日本武士刀，耀武扬威地高唱《君之代》。人们感到奇怪：50多年过去了，这批顽固不化的右翼分子，为什么还念念不忘那场本来就打不赢的非正义战争呢？一、从东京招魂社到靖国神社日本是个神社之国，日本各民族都以本族的祖先为神，称之为“氏族之神”；各行各业都有自己供奉的神，日本各地建有许多神社，是各村庄共同行农耕之礼仪的场所。最初只有“神籬”，即在一块干净的土地上，四周种上松柏等树木，在其中祭神。其中设“磐境”，即四周用石头围成栏墙，用神笼石做一个神位，称为“神奈备”，指神所在的森林，供人们拜祭。然后才逐渐设有社殿，定期祭祀。

公元气世纪时佛教传入日本，佛教用咒术祈求国家的安宁，日本人在神社设立神宫和佛寺。日本皇室的祖神，逐渐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祖神。对这些神社，外国人视为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也从不过问。

问题是日本明治维新后，朝廷下令神社分离，政府设置神社局，掌管一切神官和神职事物，将神社寺院、神职与僧侣分离。

靖国神社前身是“东京招魂社”，1869年为追悼明治维新前后内战中阵亡的将士而建。随着明治时代日本国家神道的建立和对外侵略扩张的需要，1879年日本明治政府把东京招魂社改为日本靖国神社，以天皇的名义发布文告，把战死的军人美化为“军神”，在靖国神社安置神位，进行定期的祭祀和参拜。于是，靖国神社的地位日渐上升，成为日本核心神社之一。据统计，靖国神社中祭祀的“神灵”有250万之多，其中绝大部分是死于对外侵略战争的。

靖国神社的教义，源于日本民间的“御灵信仰”，即通过祭祀来安抚冤魂，以免给人们带来灾难。但出于统治阶级的需要，靖国神社的性质已由安魂变为表彰效忠天皇的所谓“忠节”。

战前，靖国神社既是国家宗教设施，也是军事设施，它从一开始就与军队和军国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特殊关系，并一直由陆军省和海军省负责管辖（其他神社均由内务省管辖）。

在日本对外侵略中，军国主义分子利用靖国神社煽动崇拜天皇、为天皇陛下英勇赴死的军国主义情绪，起到了控制国民政治和意识形态、为侵略战争服务的特殊作用。

于是，靖国神社专门祭祀对外战争中的战死者，目的是鼓励当年的日本军人为对外战争卖命。此后，日本先后进行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侵华战争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大举侵华招兵买马，曾在靖国神社正门外两侧立碑，上面共刻有6幅浮雕，颂扬日本军人的“勇武”。其中一幅刻写着：“上海事变爆发，昭和元年一月二十八日，我海军陆战队击败八十倍于我之敌，发扬了武威。”所谓“上海事变”，即日本侵略军1932年1月28日侵占上海的“一·二八”事变，飞机在上海市区狂轰滥炸造成中国军民几万人丧生，60万人无家可归。而现在，这些歪曲历史、赞颂侵略的浮雕仍然完好地保留在那里，无声地向人们说明靖国神社的性质。当时日本天皇每年都身着“大元帅”军服在春秋两季前往参拜，从而形成今天所谓“春季大祭”和“秋季大祭”的惯例，只不过秋季的参拜时间从原来的10月

中旬改为现在的8月15日，而"春季大祭"则基本未变。

这样，靖国神社就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鼓吹武士道精神，欺骗日本人民为"大日本帝国"对外进行侵略、扩张卖命献身的工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推行政教分离政策，靖国神社改为独立的宗教法人团体，日本把战争中丧生的其他人也祭祀于靖国神社内，才使其性质显得模糊起来。但是，1978年，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竟被作为"昭和殉难者"祭祀于靖国神社，远东军事法庭定罪并处决的1000多名乙级和丙级战犯也被同样合祀其中。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一些政界要人仍年年前往参拜，不仅严重地伤害了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而且引起人们对日本是否真正反省侵略历史，永不再走军国主义老路的极大怀疑。

日本投降后，迫于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压力，日本右翼分子祭祀和参拜靖国神社的活动曾一度有所收敛，但随着美国推行冷战政策和日本右翼势力的发展，日本右翼分子在靖国神社的活动再度复活，把许多战争罪犯作为"军神"，收集到靖国神社中供奉起来。

二、什么人参拜靖国神社

到目前为止，靖国神社奉祀着从明治以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次侵略战争中死去的大邪军神"250多万名，包括被东京国际法庭判处死刑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14人的牌位，这是遭受这些战犯侵略的中国和亚洲人民决不允许的。

当然，靖国神社的战死者灵牌中也包括日本军队中一般士兵、军队医务人员和一般军官，他们的亲属在春秋两季的祭日，去悼念充当了侵略战争炮灰的亲人，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决不允许把那些沾满中国和亚洲及英美将士鲜血的甲级战犯们当作"军神"供奉，不能把他们当作军国主义思想的象征而奉若神明，不能把他们当作"为国躯的忠臣、英雄"顶礼膜拜，不允许对他们以隆重的仪式加以祭奠。

更不能允许以日本最高行政领导人--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亲自带头带领日本内阁大臣去悼念甲级战犯。

我们十分遗憾地看到，每到日本投降纪念日，就有执政的日本官员甚至日本首相、内阁官员去靖国神社为甲级战犯们歌功颂德，在他们影响下，日本右翼分子倾巢出动，把靖国神社搞得军国主义阴魂作祟，弄得乌烟瘴气，邪气十足，令人不能容忍：一些右翼分子不知从哪里翻出当年沾满中国和亚洲人民鲜血的日本侵略者"皇军"军装，举起杀过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头颅的日本武士刀，扛着同世界反法西斯国家人民作过战、打过仗的步枪，招摇过市。

一些右翼青年，头上系着印有红太阳的白头巾，叫喊"大东亚战争是神圣的"等口号。

神社大院一隅，陈列着以颂扬当年皇军"赫赫战功"和"剖腹自尽效忠帝国"为主题的绘画，书摊出售着《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等书籍。还有人在神社里散发着宣称当年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是"自卫"，远东国际法庭的审

判只是"胜者对败者的打击报复"等宣传品。神社内举行的"感谢英灵会"等集会发表声明叫嚷把日本当年的战争行为称作"侵略"加以声讨"极为不当",并要求政府为早日实现天皇、皇后参拜靖国神社而努力。

由此看来,对待祭祀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的态度就不是寻常小事,作为日本首相和各省大臣来说,实际上就是正确对待日本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的历史问题,是具有政治意义的国家大事,这又和日本社会上的极右思潮有着密切联系,正是这些右翼分子受到日本首相和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事件的鼓舞,他们便更加猖狂。这使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为了不使日本在又一个十字路口上再走错路,做出错误的选择,就有权利指出事情发展的危险倾向,及时地发出警告,制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倒行逆施。

三、参拜靖国神社的魁首

从1951年吉田茂开始,日本各届首相几乎都到靖国神社参拜,但70年代中期以前都极力避开8月15日这一"战败日",也未超出私人身份的范围。1975年,三木武夫首次在8月15日以私人身份参拜。此后首相及阁僚参拜逐步长喙,但在以"公职身份"还是"私人身份"问题上仍含糊其辞。

1982年,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开始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前往靖国神社祭祀和参拜。

同年,日本政府把每年的日本无条件投降日8月15日定为'追悼战亡者、祈祷和平之日',不仅引起日本在野党、群众团体及舆论界的不满和反对,也引其中国和朝鲜等国的严厉指责。

1983年秋天,中曾根康弘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怒,认为中曾根率日本阁僚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中国《人民日报》刊载新华通讯社的述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义正辞严地指出:"今年日本少数企图复活军国主义的人的活动和对日本政治的影响超过了往年。"1985年是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40周年,日本和亚洲国家发表许多纪念战胜日本法西斯的文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发表谈话,都警告日本领导人不要再参拜靖国神社,认为这极端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然而中曾根康弘却率领18名内阁大臣参拜靖国神社,受到中国和亚洲人民的强烈谴责。

由此可见,战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一直是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其原因:一是靖国神社与日本军国主义和对外侵略战争的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特别是其中供奉着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及1000多名乙、丙级战犯,首相参拜意味着对侵略历史的肯定,这不仅与日本宪法中的"和平主义"原则相违背,而且必然会引起世界人民和日本国民对军国主义复活的不安。二是战后根据盟军的要求,日本实行"政教分离",靖国神社已和国家脱离关系,成为普通的宗教法人。《日本国宪法》规定:"国家及其机关都不得进行宗教教育以及其他任何宗教活动。"因此,首相前往宗教设施并以宗教仪规参拜神灵,与宪法的"政教分离"原则也是明显不符的。

四、桥本自食品言的背后

日本现在首相桥本龙太郎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言而无信、自食品言，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桥本早就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大做文章。

桥本任首相前曾长期担任日本遗族会会长，平均每年要参拜3次靖国神社。桥本虽承认日本过去对中国有过侵略行为，但坚持“上次世界大战及战前日本的所有行为不能都断定为‘侵略’”，这种历史观是他参拜靖国神社的思想根源。

在很长时间里，桥本都利用日本遗族会参拜靖国神社为自己和自民党捞取选票。

他看到不少日本人无视日本给中国和亚太国家人民造成的灾难，只看到自己在那场战争中失去了儿子、丈夫或父亲，以此为借口不接受“侵略战争”这一事实。桥本迎合这些人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这些人的心理要求，也为自民党捞了一批选票。

“日本遗族会”在日本被视为自民党的“票田”，其前身是成立于1947年的“日本遗族厚生联盟”。其成员在日本战败之前被誉为“荣誉之家”，但在日本战败后则遭到冷遇，因而日本全国的战争遗族便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1953年该盟改称“日本遗族会”。

其后，甲级战犯、日本东条英机内阁藏相贺屋兴宣出狱后担任第四任“日本遗族会”会长。结果，从60年代开始，该会开始提出由国家“维护靖国神社”、“英灵显彰”、“援助遗族”等活动，要求日本政府给战争遗属以精神和物质方面的安慰和补偿。它在客观上为日本否认侵略战争的右翼势力所利用，故被称为“鹰派组织”。日本遗族会现在140万户，在日本全国建有1万多个支部，其中自民党员就占17万人，所以要竞选自民党总裁往往离不开这批党员的支持。

为捞取政治资本和选票，桥本龙太郎曾对中曾根首相中止参拜靖国神社表示不满。因为在80年代，桥本还担任过“大家一起参拜靖国神社社会会议员之会”的会长和“日本遗族会”会长。1985年10月，他曾对当时的中曾根首相中止参拜靖国神社表示不满，说众多国民对此“极感失望”。1992年10月，他又说“军人遗属无法理解政府称其战死的丈夫为侵略者。”1995年8月15日，桥本再度参拜靖国神社时称：“我不想强迫别人，但希望不要妨碍我的感情”，“我是作为日本遗族会会长参拜的，不是私人性质的”。这就使日本国内外一些报道几乎一律把桥本说成是日本自民党内的“鹰派”人物。

这个称呼使桥本心中不悦，他曾经发问：“鹰派与鸽派定义的界线在哪里？”因为他自认为，当年在菲律宾收集日本战死者遗骨时，曾亲身感受到往昔战争给亚洲邻国带来的痛苦，所以自己根本不是什么“鹰派”。

他总想在自己与日本政界的“鹰派”之间划一条界线，并为自己开脱说：正因自己深知亚洲邻国没有忘记日本兵的所为，所以在主张日本自卫队参加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时，强调"不应携带对准别国国民的武器"。

1995年5月末，在执政三党内，围绕战后50周年国会通过"不战决议"发生分歧，桥本采取了折中的立常在前法相奥野诚亮发起的"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的名单中可以找到桥本龙太郎的名字。该组织反对通过一项承认日本曾发动过侵略战争的不战决议。

但是，由于日本联合执政三党有约在先，要在战后50周年时通过一项国会决议，所以桥本作为通相为维持政权稳定而不便正面反对，但在决议内容方面，桥本则有他自己的考虑。

桥本曾找到当时的自民党干事长森喜朗表示，"有报道说遗族会反对决议，并非如此"。

作为当时遗族会的会长，他在内阁恳谈会上向当时的村山首相表示："遗族会不反对国会通过谋求和平的决议，只是作为遗属的心情，希望避免使其亲人受到屈辱的措辞。"正因为如此，桥本对细川、村山两位首相全面承认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持批评态度，在村山首相1995年8月15日就二次大战结束50周年发表的下述讲话特别不满，村山真诚地表示：今天，日本成为和平富裕的国家，因此我们会常常忘记这和平之可贵与来之不易。我们应该把战争的残酷告诉给年轻一代，以免重演过去的错误。我们要同近邻各国人民携起手来，进一步巩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为此，重要的是同这些国家建立基于深刻理解与相互信赖的关系。日本政府将本着这种想法，开展在近代史上日本同近邻亚洲各国的关系的研究，并扩大同该地区的交流这两个方面的和平友好事业。同时，关于我国现在致力于解决的战后处理问题，为进一步加强我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信赖关系，我将继续诚恳地加以处理。

正当战后50周年之际，我们应铭记在心的是回顾过去，从中学习历史教训，展望未来，不要走错人类社会通往和繁荣的道路。我国在并不遥远的过去一段时期，因为国策错误，走上了战争的道路，使国民陷入存亡的危机。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为了避免将来犯错误，要虚心地对这一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在此我们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致意。同时，谨向在这段历史中牺牲的所有国内外人士表示沉痛的哀悼。

桥本害怕村山首相这个讲话引起中国和亚洲国家要求赔偿等国际问题，便反其道而行之，以日本政府通商产业大臣和日本遗族会会长身份，同8名内阁大臣一起参拜了靖国神社，其目的之一是为自己和自民党捞取更多的"遗族选票"，并迎合自民党内保守势力的情绪及巩固在自民党内的地位，桥本也因此在国际上给自己制造了一个"鹰派"形象，引起了亚洲邻国的高度警惕。

桥本当选首相后，起初对改变自己的"鹰派"形象格外精心，他意识到这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名声，还可能影响他执政期间日本同中国及亚洲各国之间的关系，必须言谨行慎。他当选自民党总裁后于1995年10月31日辞去日本遗族会会长之职。关于参拜靖国神社，他只是说自己"小时候曾参加为日本士兵上战场的送行活动，这使他不能不想起他们"。

1996年4月23日上午，日本自民党88名议员和新进党32名议员参加了靖国神社的"春季大祭"，桥本内阁科技厅长官中川秀直、北海道绳开发厅长官冈部三郎、自治大臣仓田宽之分别前往参拜，而桥本则没有

像往年那样前往参拜。同年5月27日桥本表示：既然进了首相官邸，8月15日就不能去了”，但“并非不能以私人方式去”。

然而，言犹在耳，桥本却突然于同年7月29日上午旧态复萌地参拜了靖国神社。桥本为自己辩解说，他选择7月29日参拜靖国神社，是因为这天是他的生日，也是为避开8月15日日本投降日，另外还因为他的一个堂兄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当记者问他是以何种身份参拜时，桥本竟答道：“怎么说都行。”他还说什么：“因为这种行为而影响国际关系的现状应该结束了。迄今我每次参拜都写明自己的身份，因而当了总理大臣就写总理大臣。”很显然，这就是以首相身份进行的参拜。

这是自1985年中曾根康弘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亚洲邻国谴责以来，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第一个日本首相，这不仅对中日关系再次产生消极影响，也使桥本在亚洲的形象大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当天便对桥本此举表示遗憾，称这“严重伤害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之害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日本应真正反省过去那段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各国人民，走和平发展道路。”韩国外务部当天也发表评论，要求日本尊重曾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朝鲜、新加平等国也对桥本此举加以谴责。

桥本这种言而无信、自食其言的作法，使他再难摘下鹰派人物的帽子，遭到中国和世界人民的严厉谴责，著名记者王大军在《军国主义阴魂仍在日本作祟》一文中，尖锐地指出：就在“8·15”到来之前，桥本步11年前中曾根的后尘，于7月29日以首相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就在亚洲各国舆论谴责桥本参拜靖国神社之际，大阪府枚方市因右翼团体的威胁而停办了反映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美术展览；日本自民党国会议员奥野诚亮竟胡说“慰安妇”与日本政府无关，是一种商业行为。……这一切，怎能不让曾经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之害的亚洲各国人民义愤填膺！人们不禁要问：日本究竟要干什么？看一下日本近年的表现，就会发现这些现象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而是近年来日本政治右倾化的集中表现。日本政府中的一些人经常得意地夸耀起本国的经济成就和实力，并扬言日本理所应当可成为政治大国。这种极富诱惑力的鼓动性口号，使一些日本人不去正视本国的侵略历史。日本政府的一些人还极力在教科书和宣传媒介中掩盖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罪行，并通过强调日本在二战期间遭到原子弹轰炸一事，去混淆战争因果关系、模糊加害者和被害者的界线。这些人具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他们越来越不把其他亚洲国家、民族放在眼里。在一些日本人中，“大国”意识正迅速膨胀，诸如“经济大国”、“科技大国”、“安全大国”、“卫生大国”等词汇充斥印刷物中。

这些年来，日本一心追求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地位。为此，相继打破军费不能超过当年国民生产总值1%、不能向海外派兵等禁区。经过多年“整备”，日本的自卫队已成为世界上一支不可小视的军事力量，它已拥有最先进的进攻型武器，年度军费金额已达500亿美元。今年以来，日本又同美国强化安保条约，扩大它们之间的军事合作范围，把其防卫范围扩至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亚太地区。

日本政治的右倾化有期深刻的历史根源：二战结束以后，虽然以东条英机为首的甲级战犯被判处了绞刑，但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一大批军国主义骨干受到了美国战后冷战政策的卵翼和呵护。就在战后

不久，大批战犯并没认真反省自己的罪恶，清理自己的军国主义思想，便被美国或在美国的斡旋下从同盟国的监狱中放了出来。

这批人在财界和社会上右翼势力的支持下，重新返回政坛，窃据要职，有的还当上了首相。因此，什么是正义战争，什么是非正义战争，这个问题在日本至今未能得到彻底的解决。

五、让我们回顾丰岛前哨战

多年来，日本右翼分子都把在丰岛海域挑起甲午战争的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佑亨、舰长东乡平八郎等吹得神乎其神，供祭靖国神社。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他们不顾国际公法，在公海上袭击中国运输船高升号，屠杀1000多名中国陆军士兵的罪行吧--1894年7月22日，刘公岛外，水深风急，波浪滔天。

刘公岛北洋海军提督署议事厅内，鸦雀无声，气氛紧张。

看上去比58岁年轻得多的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正向围立在海图桌周围的“济远”号管带（舰长）方伯谦、“广乙”号管带林国祥、“操江”号管带王永发交待任务：“三位管带奉李中堂亲命，前往朝鲜执行增援任务，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叶提督与聂总兵在朝鲜翘首以待，决不能有半点闪失！”“喳！”接着，丁汝昌颇具绅士风度地分头叮咛：“方管带，你深得李中堂常识，既荣获捷勇巴图鲁勇大号，又作为大清国管带队长，于4月下旬率‘济远’、‘超勇’二舰，成功地护送叶提督、聂总兵赴朝作战。此次执行增兵护航任务，可谓驾轻就熟，定然不辱使命，但倭兵活动猖狂，不可不小心从事！”方伯谦骄矜地夸夸其谈：“本职已上书李中堂，速将北洋舰队化零为整，再快添坚甲利舰，以基地为依托抗拒倭兵。现在中日间尚未宣战，谅小日本也不敢冒然向大清军舰挑衅！”丁汝昌以很有教养的举止将手一摆，神色转趋严肃：“话虽如此，也要提高警惕--林管带！”“卑职在！”林国祥谦恭地应声而诺。

“在今年5月的北洋会操中，你指挥广东水师的‘广乙’舰操纵自由，船阵整齐，施放的鱼雷均能破的；行驶中打靶，中靶也在七成以上，我很欣赏。此次赴朝，望能协助方管带对‘高升’号和‘操江’号严密护航，决不能有任何闪失！”“喳！”丁汝昌又转身面向王永发，很威严地叫道：“王管带！”“卑职在！”一向以头脑灵活著称的王永发一躬到地。

“你多年在英国军舰上当水手，见多识广，灵活机敏，积功擢升参将，委带‘操江’运船。船上满载炮械饷银，为驻朝将士生命所系，万万不可儿戏。又是独自航行，方管带，林管带自牙山返回时才能直接保护你，更要小心从事！”“请丁军门放心，卑职定当肝脑涂地，为丁军门争光！”“诸位都要为国争光，为皇上争光！执行此次任务可谓重任在肩，诸位还有什么问题，尽可提出！”处事谨慎的林国祥双手抱拳，恭恭敬敬地请示：“还有一事，必须先考虑周到，途中如遭日本舰只攻击，当如何处置？”丁汝昌听罢，心里为之一震，旋即毅然回答：“目前日清两国既未言明开战，岂有冒昧从事之理？若果有倭船首先开炮，尔等岂有束手待毙之理？完全可以纵兵回击！”一向

办事认真的林国祥又忧虑重重地请示：“在目前倭兵猖獗活动的情势下，只让两艘快船对运兵船‘高升’和运货船‘操江’号进行护航，卑职深感责任太大。

若遇倭兵拦截，卑职丢失性命事小，帝国安危事关重大！”“林管带多虑了，有我和‘济远’舰在，保你太平无事！”方伯谦傲慢地口出狂言。

“林管带，你还不相信大名鼎鼎的方伯谦吗？”牙利齿的王永发赶紧去抱方伯谦的粗腿。

闻讯而来的“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定远”舰管带刘步蟾、“经远”号管带林永升鱼贯而入：“参见丁军门！”丁汝昌兴奋地招呼他的三名部属：“诸位，请坐。我们正在议论对‘高升’舰和‘操江’舰的护航问题，诸位有何见解？”邓世昌以威严英武的神情首先进言：“丁军门，倭兵正瞪着虎狼之眼盯着大清国，对如此重要的运兵船和运货船，只用两只快船护送，实难应付意外之变。

依标下之见，北洋水师应立即全体出动，前往护航接应！”刘步蟾作为丁汝昌的亲密助手，“才明识远，饶有干略”，在创建北洋海军中卓有贡献，被任命为右翼总兵兼“定远”管带。面对日本军国主义日益嚣张的侵略行径，他满怀一腔热血，曾冒死与先后担任北洋水师总教习的洋员琅威里和汉纳根及其顾问泰莱争夺舰队指挥权，使英帝国主义妄图建立“中英联合舰队”的计划破产，因此很受丁汝昌器重，特别询问他道：“刘总兵，你有何高见？”刘步蟾侧耳倾听完邓世昌的独特见解，双目炯炯闪光，洪钟般回答丁汝昌的发问：“标下请求立即升火起锚，陪同方管带共赴朝鲜！”林永升也被众舰长的奋勇报国精神所感染，上前一步道：“丁军门，标下誓死请战！”丁汝昌欣慰地环视部下一周，叹口气说：“我同意诸位的意见，不能眼看着‘济远’、‘广乙’有闪失。如有不测，有负皇上浩恩。为此，我已请示中堂，请看复电！”邓世昌上前从丁汝昌手中接过电报读道：“日本政府和大清并未宣战，现各国正为中日关系事进行调停。日本兵船必不敢挑衅，全队不必前去接应。”邓世昌手举电报愤然发出抨击之言：“李中堂的这个决策，将铸成千古大错！”“不能白白断送‘济远’、‘广乙’！”众将气愤地议论纷纷，只有方伯谦独出一枝，口出狂言：“诸位不必大惊小怪，莫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标下不才，定舍命奔赴朝鲜！”丁汝昌镇静地挥手制止，毅然发布命令：“众将士同仇敌忾，精神可嘉！方伯谦、林国祥、王永发立即升火出发！我将再电李中堂，请求全队出动！”当晚，日本浪人石川伍一兴冲冲回到天津“游廊地”玄洋社开的赌场兼妓院里，见花子和阿菊正在神秘地交谈着什么，老远就喊道：“花子老板，阿菊姑娘，我搞到了一件重要情报！”阿菊跑过来接上一页纸，交给花子，母女一同观看：“丁军门，火速运兵十二营到安东，如遇日舰，务须避免冲突。李鸿章。”阿菊白嫩丰润的脸上绽开艳如桃花的笑容，笑着对花子说：“义母，这和刚才从张士珩衣袋里掏出复制的两封信互相印证，很能说明问题！”花子花板微笑发问：“石川君，这份电报是从哪里搞来的？”石川伍一接过阿菊送来的茶杯，将一杯茶水一口气喝下才说：“张士珩给我介绍认识了天津电报局的一个电报生，我给了他大把钞票，他便把这份电报底稿交给了我，加上我的朋友宗方小太郎在烟台亲自登上‘济远’舰，探知‘济远’二舰将去朝鲜，两个情报正好相互佐证。--阿菊，你从张士珩身上搞到了什么重要情报？”阿菊从桌上拿起两封信递给石川伍一。石川先抽出第一封信读道：曙卿伯兄军门大人麾下：兹特启者，顷奉中堂面谕，

现雇"高升"号轮船载步兵八百，又亲兵营炮队一哨，准于念一日由大沽开行，径赴牙山海口。此次轮船到口，务须先上兵勇，愈速愈妙，以防阻挡。辎重不妨随后再上……阿菊听到这里插话说：“下面内容无关紧要，你且看第二封信。”石川伍一赶忙抽出第二封信读：曙卿仁兄军门大人麾下：18日至20日连肃三城，交给运兵各船带呈，度可次第达览。昨晚正拟电布一切，适平壤线断，只得函陈。19日晚"爱仁"号载千人；20日晚"飞鲸"号载八百人，马百匹，并军械；21日晚"高升"号载八百人，又炮队一哨，次第开行。"爱仁"〔由〕洋人满德照料。

"高升"〔由〕洋人汉纳根照料。上岸须速。闻南岛距轮船泊地一箭之远，虽多走陆路百余里，较为稳妥，可省出小船驳辎重。其速飭派人指引为盼。倭船12号已出长期，虽有海军来护，终觉担忧。……再，弟思牙口兵力究嫌单薄，已面禀中堂，拟派黄本和带护军一营、炮6尊，下次"高升"运牙。

如果尚须炮用，乞函电示遵，以便随后设法补运。

阿菊等石川伍一看完几份情报，嫣然笑道：“石川君，你知道这曙卿是谁？他就是直隶提督叶志超，字曙青，现正带太原总兵聂士成出兵朝鲜，驻扎牙山。而写信人，一个是李鸿章的外甥、军械局总办张士珩，一个是轮船和电报局会办盛宣怀，两人掌握着此次战争的武器供给和兵力运输大权，我们手中情报的价值就可想而知了！”花子老板听罢，当年风韵犹存的白净脸上，闪过终于要大显身手的狂热激情，张开涂满口红的双唇，津津有味地推理：“中国人写信是用的阴历，张士珩、盛宣怀信上的6月21日就是阳历7月25日，清国雇用'高升'号运送援兵2500人……好情报！石川君，请你立即把这个情报上报帝国驻天津海军武官泷川大尉，也就是堤虎吉，请他以最快速度呈报大本营，把清国这批援军全部干掉！”“花子老板，此事请交阿菊去办，我还有重要问题请示！”石川伍一等阿菊一走，就迫不及待地请战：“花子老板，我请求立即派船把我送到牙山，亲自向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佑亨中将提供情报，一定能把这批清国援军全部干掉！”“噢？你也有这个想法？咱们俩真是不谋而合了！”“花子老板，我自幼就在兴亚学校专攻中文，19岁到上海，跟随曾根俊虎给帝国海军搞军事情报，后来又到北京，协助帝国驻清武官关炳文搞北洋舰队情报。关炳文死后又成为井上敏夫海军少校的助手，所以对北洋海军情况了如指掌，对'济远'等舰只如数家珍。此次前往丰岛，必能立下奇功，为玄洋社争光！”“石川君，你若前往丰岛，必定旗开得胜！”花子老板极为惋惜地说，“我刚接到头山满指令，要做好大日本帝国皇军打到东北和华东的准备，因此命你充分利用在天津的情报关系，着重调查黄河沿岸可供登陆地段的详细资料，发挥你善于绘图的特长，做好中日海军黄海决战的准备！”“那么，此次丰岛之行的任务。……”“我考虑让钟崎三郎前往，你看如何？”“花子老板真有眼力！”钟崎君是比我更适当的人选！”“何以见得？”“钟崎是日本情报界有名的'三崎'之一。早年就跟御幡雅文学习汉语，后来投到荒尾精门下，在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搞中国情报。从今年开始化名左钟武，和我一起秘密调查北洋水师情况，对丁汝昌、邓世昌、方伯谦等将领的资料背得滚瓜烂熟。他若前往丰岛，一定能成为伊东司令官的高级参谋！”“好，一言为定，你去请钟崎三郎。……”“不用请，我来了！”花子老板的声音未落，钟崎三郎的粗犷声音自门外飘然而至。

“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啊！--钟崎君，请你马上到丰岛助战！”花子老板

赶快说明刚才的决定。

“参谋本部刚才来电紧急调我前往牙山，汇报山海关地区清军情况，并助联合舰队伊东司令官一臂之力。哈哈，玄洋社和大本营真是英雄所见略同，钟气急于上船，告辞了……”7月24日下午4时，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佑亨中将率领军舰15艘、水雷艇6艘、侦察舰一艘，驶至丰岛海面。

在联合舰队旗舰--巡洋舰“吉野”号舰桥上，伊东佑亨身穿笔挺的海军中将军服，披着迎风飘逸的绛紫色风衣，威风凛凛地率领着他的20多艘战船，在丰岛海面劈波斩浪，于阴沉沉的海面上冲向前方。看这个军国主义将官的得意模样，好像他不仅仅统率着几十艘战舰，而是统帅着整个世界。

在伊东佑亨身旁，大模大样地站着日本驻天津海军武官泷井大尉，专门用特别快船送来的玄洋社浪人钟崎三郎。

此刻，钟崎三郎长满酒刺的脸上堆满了小人得志的笑，张开厚唇大嘴吹捧伊东佑亨：“司令官真正是日本海军的栋梁之材，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亲自到港口送行，实在风光！”伊东佑亨1843年生于鹿儿岛武家屋，历任海军二等士官、中校、常务舰队司令官等职。为推行侵华政策，他坚决主张在战略上采取攻势，竭力鼓吹把日本海军力量全部集中起来，组成一支联合舰队，因而被热衷于发动侵华战争的桦山资纪看中，任命他为日本第一任联合舰队司令官。他以前认为浪人都是江湖骗子，对桦山资纪亲自推荐的钟崎三郎也将信将疑。此刻，他极看不惯钟崎的吹拍之风，便用桦山资纪的话训斥道：“军令部长亲到港口送行，训令联合舰队发扬帝国海军荣誉，打出帝国海军威风！万万切记，光靠江湖骗术是无济于事的！”“请司令官放心，我在清国搞北洋海军情报多年，对清国海军战将和战舰了如指掌，保证有问必答，有答必准！”“报告司令官，前方发现清国舰艇！”第一游击队司令官、“吉野”舰长期并航三少将神色紧张地报告。

伊东佑亨从联合舰队参谋长蛟岛员规大校手中接过望远镜，坪井航三、蛟岛员规、钟崎三郎也手持望远镜一同观察。

钟崎三郎首先报告：“走在最前面的是‘济远’，一艘运兵船夹在中间，‘广乙’殿后！”“哪条船战斗力强？”伊东佑亨像严厉的老师拷问小学生，钟崎三郎如小学生背课文一样喷出连珠炮：“‘济远’号是铁甲巡洋舰，战斗力最强；‘广乙’是广东水师的铁甲船，到北洋海军参加会操时被留下作战，战斗力次之；‘操江’号是条运输船，战斗力最差！”伊东佑亨时钟崎三郎的回答比较满意，但却并不形诸于色，又突然掉转话题：“‘济远’号管带。……”“方伯谦，生于1852年，福建侯官人，1871年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又入格林尼次海军学校深造，1884年回国后任‘威远’练船管带，负责修建威远炮台。1889年被李鸿章看中，提升为左营副将，委带‘济远’舰。今年4月作为护航队长，护送叶志超，聂士成赴朝作战！”伊东佑亨听得津津有味，又进一步提问：“方伯谦脾气如何？”“此人刚愎自用，功名心特重！”

“好，再讲‘广乙’管带！”“林国祥，广州人，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办事认真，为人谨慎！”“那么，‘操江’号管带。……”“王永发，浙江镇海人，船生出身，胆小怕事，爱财如命！”伊东佑亨满意地连连称赞：“你们玄洋社浪人真有本事，这些情报真价值连城。本司令官有你们浪人相助，真正如虎添翼，哈哈。……”“报告司令官，清国舰队已进入我们布设的水雷区！”伊东佑亨得意地拿期望望远镜，脸上浮起狡黠的笑容：“看他们如何应付我这个下马威！”在急促的警报号声中，“济远”等三艘船在做紧张的战斗准备。

“济远”号舰桥上，29岁的大副沈寿昌慌忙报告：“方管带，前方发现水雷！”方伯谦看着舰首在海浪上不停地翻滚的黑色水雷，额上渗出惊恐的汗珠，但却故作姿态，威风凛凛地下达命令：“右满舵！”年轻的大个子舵手李仕茂熟练地转动舵轮，嘴里按条令复诵命令：“是，右满舵！”“济远”舰在李仕茂操纵下，巧妙地绕过一个个黑色水雷。

“广乙”和“操江”号如法炮制，清国舰队终于绕过一颗颗黑色水雷，冲出雷区。

方伯谦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更威武地下达作战命令：“校正炮位，准备射击！”

“是！”大副沈寿昌精神振奋地转身面向炮位，朗声发令：“校正炮位，准备射击！”

“是！”炮手王国成响亮地回答，随即挥动大手合上炮栓，转动着舰炮大声报告：“后炮已准备好，请准开炮！”在对面不远处的“吉野”号舰桥上，伊东佑亨阴险地冷笑道：“方伯谦，你躲过了我的水雷，却快进入我舰队炮火射程之内了，看你怎么渡过此关？”俄顷，坪井航三急切地向伊东报告：“司令官，清国舰队已进入我游击队大炮射程之内！”伊东佑亨抬头看了越来越近的清国军舰，犹如一只饿狼看到三块肥肉，顿时想一口吞进肚中，他咽口唾沫，下意识地吧中将帽沿一拉，恶狠狠地低声命令：“准备射击！”“是！”坪井航三发疯般高声答应，歇斯底里地下达命令：“准备射击！”刹那间，日舰“吉野”、“秋津洲”、“浪速”三艘战舰的炮口纷纷对准清国三舰，饿虎扑食般冲了上去！

联合舰队参谋长鲛岛员规见状大惊，忙走到伊东面前，小声提醒：“司令官，大本营命令，25日前不准开战！”钟崎三郎早就梦想攻占中国，此时更张开大嘴怂恿伊东立即开战：“司令官，日清战争若能在您指挥下从这里开始，定能将这三艘支那舰打沉海底。司令官将会名留史册，为万人敬仰！”伊东佑亨凝神沉思。他知道日本外务省给清国最后通牒的截止日期就是今天。大本营命令日本海军在7月25日以后才能自由行动，不超过这个期限绝对不准动手。若在今天开战会遭受各方面的指责，而且清国战船现已做好战斗准备，立即动手占不到便宜，不如暂时麻痹对方，在中国人明天返航时再打他们措手不及！

伊东佑亨想到这里，把上挑眉一扬，厉声下令：“准备施放礼炮！”“什么？施放礼炮？怎么能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攻击良机？”钟崎三郎嚷着大嘴高声叫嚷。

“你不懂政治，没有战略头脑，休得胡言！”伊东佑亨绷着脸大声斥责。

鲛岛员规马上明白了伊东佑亨的意图，随即面向坪井航三重申联合舰队司令官的命令：“司令官有令，准备施放礼炮！”坪井航三稍有犹豫，随即扯着尖嗓子向第一游击队所属战舰发布命令：“甲板列队，准备施放礼炮！”刹那间，“吉野”、“秋津洲”、“浪速”三条日舰忙作一团，水手们从各个角落忙乱地冲向甲板，列成整齐的队形，随着军乐队奏起的军乐，在隆隆的礼炮声中，士兵向清国舰队行注目礼军官们行举手礼。

“济远”号舰桥上，方伯谦从口袋里掏出手绢，匆匆擦去额上因虚惊而流出的冷汗，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我谅小日本也不敢动我方某人一根毫毛！--传我的命令，按国际礼节还礼！”于是，清国三舰上的军官也向对方行举手礼，士兵行注目礼。待双方舰艇相向驶过后，方伯谦威严地下令：“礼毕！”

--全速开往牙山！”大副沈寿昌悄悄对他的好朋友二副柯建章说：“柯老弟，今天的事有点儿奇怪，伊东佑亨莫非有阴谋诡计？”柯建章也有同感：“是啊，开始接触时，倭兵如临大敌，好像马上就要动手了，但不一会儿，又突然行起了军礼真是奇怪得很！”20岁的练习生黄承勋长得眉清目秀，很有心计，听见大副和二副的议论，走过来说出自己的见解：“大副、二副，我刚才突然看见站在日本指挥官面前的大嘴巴，肯定是与我一起在芜湖顺安号商店当店员的李钟三，那是个专卖日货的商店！”柯建章也猛地用巴掌一拍光头，带着疑惑的神情说：“黄承勋一说，我倒觉得那个大嘴巴好像是在天津碰到的药材商左钟武。那时，我经常发现他鬼鬼祟祟地在渤海湾测量水深。

他那张大嘴巴给我的印象极深！”大副沈寿臣点头说：“那个大嘴巴是不是日本特务不敢肯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为霸占中国，日本派了许多特务，打扮成中国人模样在各地活动。……”“船快到牙山了，快做准备！”方伯谦走来大声命令。

“方大人，柯建章、黄承勋发现站在日本最高指挥官身旁的大嘴巴很可疑，可能是在我国搞间谍活动的特务！”大副沈寿臣赶快向方伯谦报告可疑情况。

“哈哈，不要神经过敏！”“倭兵今天的行动有点奇怪，还是小心点儿好！”“放肆，你想教训我吗？”方伯谦勃然大怒。

“小人不敢。……”当日深夜，伊东佑亨率领众舰在半岛海面游弋。他命部属除留下少量人员值班外，全部上床休息，一个人坐在灯下观看兵书，实在困了才上床而眠。

黎明前的最黑暗时刻，也是忙碌了一天的军人睡得最香甜的时间。突然，联合舰队司令官寝室门外敲起了轻轻的叩门声。伊东佑亨听到声音从床上一跃而起，厉声喝问：“谁？有何急事？”“我，钟崎三郎，有重要军情报告！”伊东佑亨敏捷地起床穿衣，来到办公桌前，心里直纳闷，这个浪人怎么有这么大胆子，竟敢在黎明时分，把堂堂联合舰队司令官从床上叫起，于是神色不悦地把他叫进来问道：“钟崎君，你有什么重要军情？”钟崎三郎将身躯向前一凑，张开厚唇大嘴极富煽动性地说：“几年前，我曾化名李钟三，在芜湖顺安商店当店员，以后又化名左钟武，扮作药材商在天津活动，结识了李鸿章的外甥、天津军械局总办张士珩，慢慢对北洋水师的活动了如指掌。我推测，‘济远’、‘广乙’、‘操江’舰今晨将折返天津，运兵的‘高升’号也将于今天中午开到丰岛海面。我建议，司令官率部在丰岛海域设伏，给他们突然袭击，定然会取得辉煌战果！”伊东佑亨听钟崎三郎讲得头头是道，正巧与自己思之再三的作战计划不谋而合，不由得瞪大眼睛看着这位日本浪人。

此刻，伊东佑亨真对他刮目相看了，已被他说动了心，但又不愿在这个面目可憎的大嘴巴面前说出，只是自言自语地说：“大本营虽给了我今天开始行动的自由，但又命令我：‘如果丰岛海面附近的清军舰队弱小，不必攻击；若强大，则予以进攻’。对此，如之奈何？”钟崎三郎听罢笑道：“司令官，我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伊东佑亨现在非常重视这个日本浪人的意见了，马上抬起刚51岁就已有斑斑白发的大圆头，带着充满期望的目光道：“但讲无妨！”钟崎三郎见自己已得到伊东佑亨的赏识，更斗胆滔滔不绝地讲下去：“大本营的命令当然有它的道理，但也给了司令官行动的自由：清国舰队弱小还是强大，不经过对战怎能知道？遇到敌舰，开炮打它就是了！何况从昨天应付我舰队水雷下马威的手段看，方伯谦还真是个不弱的

对手呢！”伊东佑亨站起身来，双眼直逼钟崎三郎：“你说，方伯谦吃软还是吃硬？”钟崎三郎被伊东佑亨那双三角眼中射出的利剑一样的寒光刺得直打冷战，但还是装出浪人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武士道精神侃侃而谈：“方伯谦骄横自狂，刚愎自用，却又胆小如鼠，贪生怕死。”

突然间打他个懵头转向，就会乖乖地装孙子！”伊东佑亨听罢，回转身坐在转椅上微闭双眼，外表纹丝不动，脑子里却像波涛汹涌的大海，又如疾风中奔腾于莽莽草原的烈马。突然，他将三角眼一睁，忽地从转椅上蹿起，厉声下达战斗命令：“参谋长，全舰队立即进入战斗状态！”霎时间，日本军舰上警报声四起，军官、士兵纷纷惊醒，根据海军作战要求，有条不紊地进入各自的岗位。

伊东佑亨率领联合舰队似利箭一般，驶向丰岛海面的一个平静处埋伏待机。

7月25日7时50分，丰岛海面朗日高照，微风拂海，波浪如一面巨镜。

突然，坪井航三神色紧张地报告：“司令官，清国舰队正从牙山方向开来！”伊东佑亨立即举起望远镜观察，发现“济远”号一马当先，以中速从对面驶来，不由得双唇一闭，自言自语道：“赌国运决一死战的时刻终于来到了，虽然没有必胜的把握，但我以逸待劳，出其不意，定会打他个措手不及，起码不会吃亏！”钟崎三郎赶紧接过话茬儿：“司令官所论精辟之极，现在到了下令开炮的时候了！”“清国北洋舰队赫赫有名，本联合舰队从未与其交手，实在没有必胜的把握。别慌，看看他们在干什么？”在“济远”号舰桥上，大副沈寿昌正在耐心地劝方伯谦备战：“方大人，我们虽已在凌晨4时驶出牙山，但仍在日本联合舰队出没海域，还是小心为妙，不要被诡计多端的伊东佑亨钻了空子！”方伯谦不耐烦地厉声瞪眼训斥：“你太多虑了！想我‘济远’舰是重2320吨的穹面钢甲快船，为德国弗尔干造船厂建造，装有威力巨大的炮塔。昨天倭兵见了我方某人，吓得连大平都不敢出，乖乖地向我行礼、鸣放礼炮。今天我完成了护航任务胜利凯旋，小鬼子胆敢动我一根毫毛，我就狠狠地教训他们一顿，瞧吧！”伊东佑亨看到“济远”号等清国舰只毫无进入战斗状态的样子，舰尾上的黄龙旗高高飘扬，水兵东一群西一伙在甲板上晒太阳，根本没有想到日本联合舰队就埋伏在眼前，于是他右手刷地一声从腰间抽出指挥刀，狠毒地下令：“第一游击队，立即出击！”“是！”坪井航三也学着伊东佑亨的蛮横模样，从腰中抽出长柄指挥刀，望着在阳光下熠熠闪耀的剑光，兴冲冲发令：“‘浪速’、‘吉野’、‘秋津洲’，立即出击！”于是，三艘日本战舰像恶狼扑食般冲向清国舰艇。

“济远”、“广乙”两舰将士见日本军舰飞速驶来，都大吃一惊，方伯谦吓得六神无主，竟忘记下令进入战备状态！

7时55分，在距清国舰船3000米时，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司令坪井航三狼豺般狂叫下令：“开炮！”刹那间，“吉野”等三艘日本战舰的炮口立刻喷出浓烟烈火，炮弹呼啸着飞向清国舰船。

“广乙”号舰船上，神情肃然的林国祥知日舰来意不善，严阵以待，威严地下令：“弹上膛，准备开炮！”“浪速”舰突然向“广乙”舰猛开一炮，炸弹在“广乙”右舷一侧猛烈爆炸，激起冲天水柱，林国祥义愤填膺地下令：“开炮，狠狠打！”在“济远”号舰桥上，方伯谦大惊失色，一边慌慌张张地寻找躲避炮弹的保命之处，一边哆哩哆嗦地下令：“开。……炮，还击！”“济远”号大

副沈寿昌、二副柯建章、练习生黄承勋、炮手王国成和水手李仕茂一个个气冲牛斗，纷纷请战，但却不见管带方伯谦的踪影，便一起把充满期望的目光投向大副沈寿昌。

在此危急关头，老成持重的沈寿昌见方伯谦溜之乎也。气愤地巍然屹立，双手狠狠操舵，高声发令：“各就各位，开炮还击！”粗胳膊粗腿的水手李仕茂把一发炮弹塞进炮膛，黑铁塔似的炮手王国成用力合上炮栓，转动着舰炮大声报告：“后炮已准备好，请准开炮！”

“沈寿昌浑身热血沸腾，大手一扬，高声下令：“开炮！”于是，“济远”舰开始英勇还击，一发发炮弹呼啸着愤怒地飞向“吉野”号。“广乙”舰也在管带林国祥指挥下，从高昂的炮口喷出一道道火舌。一颗炸弹在“浪速”号周围爆炸，激起冲天水柱，打得舰长东乡平八郎浑身是水；一颗炸弹在“秋津洲”右舷水面炸响，将船樯击穿；一颗炸弹响着刺耳的尖音横穿“吉野”号甲板，把一个日本兵炸成两段。……钟崎三郎顿时失去日本浪人的武士道精神，慌忙跑向舷侧保命，回头看到伊东佑亨镇静而严厉的神情，又连忙跑回伊东身旁，把秃头一拍，装作突然想其妙计的样子向伊东献策：“司令官，快令所有大炮都对准‘济远’号，它是我们的主要对手！”伊东佑亨连声称赞“好主意”！随即下令：“集中火力对付‘济远’号，狠狠打击方伯谦！”伊东一声令下，“吉野”等三艘战舰的炮手都紧急转动炮塔，将炮口对准“济远”舰。

不一会儿，“济远”号周围响起震耳欲聋的炮声，一颗颗炮弹如雷鸣般炸响。“济远”舰立刻浓烟密布，火光冲天。

在隆隆的炮声中，“济远”舰大副沈寿昌奋不顾身地指挥战斗：“弟兄们，照准日本鬼子的炮塔，狠狠地打！”炮手王国成见方伯谦躲在船舱内铁甲最厚的地方藏匿不出，气愤地骂道：“他妈的，姓方的真不是东西，不知跑到哪儿装孙子去了！”二副柯建章很能顾全大局，大声喊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弟兄们，我们都要服从大副指挥，狠狠地教训日本鬼子！”水手李仕茂一抡大手高呼：“不是鱼死，网破。豁出一条命，打呀！”炮手王国成仰天大呼：“为了国家，为了百姓，死怕什么！”

二十年后又是一条英雄好汉！”面对气焰嚣张的强虏，沈寿昌大义凛然，英勇无畏，指挥全舰官兵拚死搏战，前扑后继，军威大振！鏖战中，沈寿昌灵机一动，命令信号兵：“通知‘广乙’舰，专门对付‘秋津洲’，‘吉野’和‘浪速’由‘济远’舰收拾！”刹时间，“济远”和“广乙”两舰开动所有火炮，向敌舰猛烈还击。只见李仕茂打得性起，干脆把号衣脱下摔到一旁，赤膊抱起一颗炮弹塞进炮膛。王国成大汗淋漓地合上炮栓，沈寿昌一声令下，王国成用力合上炮栓，转动舰炮瞄准，再猛拉导火索，炮口立时喷出怀着满腔仇恨的浓烟烈火，炮弹呼啸着从“吉野”舰的樯头掠过。钟崎三郎狼狈地闪身躲避，受伤地日本兵痛得哇哇乱叫，打死的横七竖八满甲板皆是！

沈寿昌率众将士越打越起劲，高兴得大叫：“弟兄们，干得好！”“王国成，真有种！”

“在惊天动地的大炮轰鸣声中，沈寿昌指挥“济远”舰众儿郎愈战愈勇。沈寿昌嘶哑着嗓子又一声令下，王国成奋力一拉导火索，一发炮弹呼啸着直扑“浪速”舰而来，不偏不斜，正好将“浪速”舰上的信号索打断。沈寿昌手托望远镜，看到“浪速”舰被击中的情景，情不自禁地高喊：“弟兄们，东乡平八郎的‘浪速’舰被击中，打断了信号索！”“好啊！”“济远”舰上一片欢呼声。二副柯建章、练习生黄承勋、水手李仕茂、炮手王国成等兴奋得眼泪直

流。李仕茂9327开大嘴笑着弯腰又抱起一颗炮弹塞进炮膛，在轰鸣的炮声中高喊：“王国成，照刚才的样子干！”王国成高兴得像小时过春节得到压岁钱一样，哼着山东柳琴书曲调，手舞足蹈般合上炮栓，转动舰炮对准前进中的“浪速”舰，口中咬牙切齿痛骂：“打你个狗娘养的！”王国成边骂边拉动导火索，一发炮弹立时呼啸着奔向“浪速”舰左舷舰尾，“浪速”舰迅即火光冲天，浓烟四布。东乡平八郎大惊失色，慌忙命令信号兵：“报告坪井航三游击队司令官，请求支援！”“吉野”号舰桥上，坪井航三在隆隆的炮声中向伊东佑亨大声报告：“司令官，东乡平八郎报告，‘浪速’舰信号索被打断，左舷船尾负伤，请求支援！”伊东佑亨听罢紧皱双眉，苦思良策，正要开口发令，钟崎三郎张开厚唇大嘴抢先进言献策：“司令官，我认为应该继续集中全部火力，猛攻‘济远’！”伊东佑亨以赞许的目光看着这个奇异浪人，心中暗想，这家伙又跟我想到一起来了！他知道这是一场赌国运和自己仕宦前途的硬仗，情况紧急，不容片刻犹豫，于是决断传令：“集中舰队所有火力，猛攻‘济远’号！”伊东佑亨一声令下，日本联合舰队的大炮都一起向“济远”号开火！密雨似的排炮一起向“济远”倾泻。

在“济远”号远望台上，大副沈寿昌从望远镜中看到日舰“浪速”号舰尾畸火，浓烟滚滚，以无限喜悦的语调高声呐喊：“弟兄们，打中了，‘浪速’舰起火了。……”沈寿昌话未喊完，便被从日舰上飞来的一发炮弹击中头部，鲜血立刻如泉水般涌出，倒在了远望台，望远镜被摔出太远。……二副柯建章见状大惊，立刻跑上前一看，只见沈寿昌已被炸得血肉模糊，壮烈牺牲。柯建章悲痛之极，大叫一声：“大副。……你。……”练习生黄承勋是个特别机灵的小伙子，在刻不容缓之际，忙从甲板上拾起望远镜，双手递到柯建章手里，恳求说：“二副，大副已壮烈殉国，你代他指挥吧！”柯建章双手接过望远镜，顾全大局地微微点头，大步走上远望台，毅然站出来指挥：“弟兄们，为大副报仇，狠狠地打！”在柯建章指挥下，“济远”舰上下一心，协同作战，又射出颗颗复仇的炮弹。

“吉野”号舰桥上，伊东佑亨看到日本联合舰队慢慢占了上风，脸上露出骄横自得的笑容。钟崎三郎也将此情景尽收眼底，为争功邀宠，又贼眉一皱，计上心来，张开厚唇大嘴媚地对伊东佑亨说：“司令官，在你英明指挥下，清国舰船已呈衰败之势。我有一计，可收全功！”“请讲！”“仗着我方舰多势众，又有炮火优势，应号令全联合舰队兵力，冲上去一举歼灭‘济远’号。群龙无首，‘广乙’两舰定会丧失战斗意志，司令官必获盖世之功！”此时的伊东佑亨对钟崎三郎已有高度信任感，开始言听计从：“参谋长，命令全联合舰队从四面包抄‘济远’号！”“济远”号二副柯建章挺身而出处于危急关头，毅然代替牺牲的大副和逃命的管带，冒着枪林弹雨继续指挥战斗。在激战之际，一发炮弹飞来，从胸部穿透柯建章的上身，小柯当即身亡，倒在“济远”舰前炮台下。

练习生黄建勋见二副也壮烈殉国，奋然纵身跃上远望台振臂大呼：“弟兄们，大副、二副都为国阵亡，为给他们报仇，狠狠地打！”黄建勋带领李仕茂、王国成等士兵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满腔悲愤，不畏强敌，拚死向着“吉野”号奋勇冲击，终于一炮命中“吉野”号。坪井航三发现“吉野”号右舷受伤，赶快以保护伊东佑亨为借口，掉转船头，向一旁逃避。

黄承勋看见“吉野”号想溜走，心中大喜，振臂高喊：“弟兄们，‘吉野’舰要逃走，赶快追击，李仕茂，快装弹！”黄承勋刚招呼炮手装弹，忽然在

望远镜中看见钟崎三郎正在"吉野"号炮台上指挥炮手向"济远"号开炮，从那个明显的大嘴巴一看就知道是在芜湖、天津搞情报活动的日本间谍正要开口揭穿日本特务的画皮，说时迟，那时快，忽然从"吉野"号上飞来一颗炸弹，正巧击断了黄承勋的右臂，他"哎呀"一声摔倒在甲板上。

王国成、李仕茂等看见黄承勋负伤摔倒，真有肝肠俱裂之感，急忙将失掉右臂的黄承勋抬入船舱内，准备裹伤治疗。

黄承勋痛苦地摇头制止说："战事打得正紧，你们快去开炮，不要管我！"王国成难过地劝道："小黄，你要保重，大副、二副都已壮烈殉国，'济远'舰就指望你出面指挥了！"黄承勋因失血过多，有气无力地回答："请转告丁军门，左钟武。……也就是李钟三，是个日本间谍。……与张士珩有勾连。……"黄承勋说罢，闭目而逝，牺牲时年仅21岁。战后，李鸿章把黄承勋的事迹上报朝廷，清政府下令追加他为参将军衔，"从优照游击阵亡例议恤，予云骑尉世职，袭次完时，以思骑尉世袭罔替"。当然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再说王国成、李仕茂见黄承勋伤重身亡，都难过得失声痛哭。

"别哭了，都回各自岗位，准备战斗！"王国成、李仕茂回头一看，见方伯谦不知从哪个角落钻了出来，对众人高声斥责。

王国成怒火满腔，不禁义愤填膺地指责："方大人，你刚才哪里去了？大副、二副、黄承勋等先后为国捐躯，你知道吗？""我刚才身体偶有不适，授权沈大副代为指挥，你休得胡言！"方伯谦恬不知耻地回答，继而几步走到舵轮旁，作贼心虚地下令："快撤，驶向西北方向！"王国成惊讶地望着方伯谦，以充满怀疑的语气问道："方大人，往回跑？这合适吗？""众寡悬殊，不能硬拚，你懂吗？不听指挥，定军法从事！"方伯谦声色俱厉地斥责，继而厉声舵手："左满舵，向西北方向开！"王国成眼睁睁地看着"济远"舰舵手被迫转动舵轮，看着"广乙"号燃起熊熊大火，向东北方向逃避，长长地叹口气，但却束手无策。

"吉野"号舰桥上，日本浪人钟崎三郎眼睛最尖，发现"济远"号向西北方向逃走后，马上向伊东佑亨进言："司令官，你指挥我无敌舰队把方伯谦打怕了，现在要逃，千万不能手软，请司令官下令，穷追不舍！""方伯谦不会设什么圈套吧？""丰岛海面在我联合舰队控制海区，离中国沿海甚远，决不会有清国伏兵！""好！追击'济远'，把它抓过来！"方伯谦站在"济远"号舰桥上向后观看，只见日舰"吉野"正在后面紧追不舍，吓得匆忙下令："快撤！快快往回跑！"王国成愤怒地提出反对意见："方大人，我们撤走了，'广乙'舰怎么办？""'广乙'舰已向东北方向逃避，谁也顾不上谁了！"这时，日舰"吉野"发挥每小时22.5海里的速度优势，追赶时速只15海里的"济远"舰，越追越近，其发射的炮弹在"济远"舰前后爆炸。方伯谦吓得胆战心惊，急忙下令："王国成，快挂白旗！""什么？挂白旗投降？""先把'济远'舰保住再说嘛！""我不当卖国贼，宁愿血战到底！"王国成大声喊罢，气愤地往甲板上吐口唾沫，转身奔下舰桥，向舰尾跑去。

恰在此时，"吉野"舰发射的一发炮弹射中"济远"号舰桥，该舰立刻浓烟四声，火光冲天。方伯谦吓得魂飞天外，忙跑回管带室，把事先早已秘密准备好的白旗，从保密柜中取出，返身跑回舰桥，用发抖的手扯下高高飘扬的黄龙旗，无耻地升起白旗，还不放心，又从口袋里掏出一面日本海军旗挂了出去，然后在隆隆的炮声中，抱头鼠窜钻进官舱。

在日舰"吉野"号舰桥上，钟崎三郎从望远镜中看到"济远"舰桅杆上随

风飘扬的白旗，像饿了三天三夜的饿狼突然发现一只小羊一样惊喜，忙向伊东佑亨报功：“司令官，‘济远’舰升起了白旗！”“什么？‘济远’舰挂起了白旗？”伊东佑亨举起望远镜观察，果然看到一面白旗在“济远”舰上空气扬，旁边还有一面日本海军旗与之并排迎风飘扬，旁边还有一面日本海军旗与之并排迎风招展，细长脸上慢慢露出骄矜的笑容。

“司令官，我说的不错吧？我们把方伯谦狠揍一通，这不就乖乖投降了吗？方伯谦就是那种吃硬不吃软的东西！”伊东佑亨神采飞扬地将指挥刀用力一挥：“停止射击，紧追不舍！”“司令官，清国士兵的爱国心特强，不可能全都愿意投降，不要停止射击，以免上当！”钟崎三郎唯恐放过邀功请赏的机会。

“本司令官从来不打愿意投降的人，不必过虑！”伊东佑亨将明晃晃的指挥刀在空中一挥，盛气凌人地显示大将风度。

“济远”舰上，船员们愤怒地望着桅杆上随着阵阵海风刷刷作响的白旗，一个个怒火满腔，破口大骂：“方伯谦是卖国贼，打死他！”“誓死决不投降！”王国成、李仕茂满怀一腔热血，飞身跃上舰桥。王国成手举一把大刀，愤然砍断缆绳，可耻的白旗被无情的海风吹进大海，卷进浪底，王国成又从李仕茂手中接过黄龙旗，徐徐升起，怀着对祖国的无限激情，看着高高飘扬在桅杆上的黄龙旗，一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

王国成怀着一腔热血，站在黄龙旗下高声疾呼：“弟兄们，有种的决不投降！爱国的英雄好汉，不要命也要打！”李仕茂带头拥护：“王国成，你领头干！大副、二副、黄承勋都英勇牺牲了，为给他们报仇，玩儿命打！”众水兵都是中华好儿男，一致齐声拥护：“王国成，我们听你的！”王国成双眼充满激动的泪水，振臂高呼：“弟兄们，照准追赶我们的‘吉野’舰，狠狠打！”王国成喊着，带头冲向舰尾，亲自操纵起15公分口径尾炮，瞄准在后面紧追不放的“吉野”舰，在李仕茂协助下连发4炮，竟有3炮命中，“吉野”舰顿时烈火腾空而起，浓烟滚滚，船头低俯。钟崎三郎吓得魂飞天外，带着哭声恳求伊东佑亨：“司令官，‘济远’舰不能追了，再追下去，我们自身难保。……”伊东佑亨皱着眉头低声自语：“‘济远’舰好生厉害，不好惹呀！”不得不低声下令：“暂缓追击！”在日清两国海军正鏖战之际，装载着枪炮和饷银的铁甲运输船“操江”号，与清国雇用的运载北塘援兵的英国商船“高升”号同行而来。

听着远方隆隆的炮声，“操江”和“高升”号船员还以为是天边的雷声。“高升”号船长高惠悌因为有旧式木造铁甲炮舰“操江”号护航，还会有“济远”和“广乙”保驾，有一定的安全感，所以放胆前行，根本不知道日本军队已攻占朝鲜王宫，更未料到丰岛海面正进行激烈海战。

方伯谦正强带“济远”舰匆忙西逃，恰见“高升”和“操江”号迎面驶来，船员们大海遇故人，发出一片欢呼之声，王国成欣喜地报告：“方大人，‘高升’号和‘操江’号来到，我们再不孤立无援了！”方伯谦气急败坏地大声斥责：“他们顶个屁用！向他们降旗示意--快快逃命！”但是，一心前往朝鲜的“高升”、“操江”两船错误地理解了“济远”的旗语，以为是在“表示敬意”，仍然放心大胆地向东行驶。

10时15分，“操江”号舰长王永发听见远处传来的隆隆声响，诧异地对大副孙茂盛说：“这不是雷声吗？好像有异常情况！”“王大人，三英里外好像有战事！”王永发端起望远镜一瞧，只见几艘日本军舰正在紧紧追“济

远"号，忙下令：“左转舵，向西行驶！”11时30分，“操江”号与“济远”舰相遇，王国成紧张地报告方伯谦：“方大人，‘操江’号升祈求援！”方伯谦气哼哼地将手一挥极不耐烦地嚷：“日本军舰正在追赶‘济远’，哪有工夫理他们？”王永发见“济远”号对他们的求救信号置之不理，惊慌地破口大骂：“方伯谦这个狗娘养的见死不救，我命休矣！”大副孙茂盛以更紧张的神情报告：“王大人，日舰‘秋津洲’快追上我们了，怎么办？”王永发举目一望，只见“秋津洲”已越追越近，吓得浑身发抖，面如土色，慌忙抽出指挥刀做出要自杀的模样，大副孙茂盛赶忙拉住劝道：“王大人，我舰虽是运输船，但也有5门火炮，打吧，说不定还有一条活路，何必自寻短见！”二副孙起凤也劝王永发下令抵抗。

这时，搭乘“操江”号前往汉城接管在朝鲜的中国电报局的丹麦人弥伦斯亦过来相劝：“王大人，大副的意见很正确，再说王大人身边必定带有重要文书，即使要死，也要先烧毁机密文件，以免泄露军情机密！”“是啊，丁军门不是还托你给聂总兵带有重要书信吗？怎能置之不顾！”“咱们船上带着20万两饷银，责任重大！”王永发看看紧紧追赶的“秋津洲”，吓得体如筛糠。恰在此时，“秋津洲”放出一炮，炮弹响着刺耳的声音从“操江”号上空掠过，王永发唬得屁滚尿流，匆忙发令：“下锚停船，挂白旗！”“王大人，要投降？”大副孙茂盛、二副孙起凤都吃惊地问。

王永发看“秋津洲”已追到眼前，为保命就掏出手枪，再次下令：“快挂白旗，违令者死！”孙茂盛在王永发的手枪威逼下，不得不升起白旗。

伊东佑亨见状大喜，忙命“秋津洲”舰长上村彦之丞少校派出24人，乘舢板登上“操江”号，将全船82人关在后舱，只把王永发押上“秋津洲”，然后又把20万两饷银一箱箱抬了过去。一个个日本军官手捧唾手而得的白花饷银，骄横地纵声狂笑。

在日寇军官的狂笑声中，“操江”号被日本兵驾驶着开往朝鲜群山浦。

在日舰“吉野”号上，钟崎三郎眉开眼笑地向伊东佑亨表功：“怎么样？钟崎略施小技，就把清国海军打得落花流水，你联合舰队司令官风光十足了吧？日后可别忘了给本浪人记功封赏啊！”伊东佑亨从心里讨厌这些无法无天的浪人，见钟崎三郎如此狂妄自傲，更是厌恶之极，但想到他在丰岛海战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也不便直接训斥，而代之以发布争取全胜的部署：“命令‘吉野’号对付‘济远’号，‘浪速’号攻击‘高升’号，‘秋津洲’负责‘操江’号，扩大战果，务求全胜！”47岁的东乡平八郎指挥‘浪速’舰似利箭一般冲到‘高升’号面前。他知道‘高升’号是清国从英国雇来的商船，毫无抵抗能力，便如饿狼碰到小羊一样骄横。

为施加武力威胁，东乡平八郎命令炮手向“高升”号频频施放空炮，并发出要“高升”号停锚接受检查的旗令，但清国陆军并不买帐，纷纷从船舷边、舰桥上、扶梯中用步枪英勇还击。

东乡平八郎见此计不成，宽大的额头现出几道斜纹，又令‘浪速’舰耀武扬威地冲了过来，将大炮对准“高升”号，占据了对其控制地位。

英国船长高惠悌对此虽甚感惊慌，但想到此次向朝鲜运兵得到的白花银子，便走到清军最高指挥官、仁字军邦办高善继面前吹牛：“高大人，请放心，本船为英国商船，又悬挂大英帝国国旗，足以保护你们免受一切敌对行为的攻击！”“遵照国际惯例，一切拜托贵船长周旋！”高善继内心虽感到要出乱子，但作为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却极为镇定。

这位爱国军官高善继，字次浦，江西彭泽县人，举人出身。他见朝鲜局势紧张，便挺身而出，到天津拜见李鸿章，自请投笔从戎，挺身报国，但见李鸿章一味求和不战，愤然转投直隶通永镇总兵吴育仁幕下，做了仁字军营务处邦办。后来李鸿章派仁字军赴朝作战时，高善继慷慨陈辞，奋然请赴前敌。吴育仁被高善继的一腔热血所感动，命他与翼长江自康共同带队赴朝作战。江自康先带两营三哨兵乘英国小商轮“爱仁”、“飞鲸”于7月21日起碇安抵朝鲜，高善继与营官骆佩德，吴炳文带两营两哨兵马于7月23日乘“高升”号从天津出发，中途遇上运输船“操江”号，两船便相伴而行。

此时，东乡平八郎命“浪速”舰开到“高升”号400米处停下，将船上21门大炮的炮口全部对准“高升”号，特别用右舷炮的黑洞洞炮口对准“高升”号的船腹，再次发出警告。

英国船长高惠悌狡猾地以此威胁高善继说：“高大人请看，日本人已挂出第二次警告旗号，意思是--”高善继带着鄙夷的神情抢先朗声回答：“日本人的意思是：原地不动！不然，承担一切后果！”“那么，我们怎么办？”“停车以待，看倭兵耍什么鬼花招儿！”年轻的营官骆佩德闪着聪慧的目光，轻声向高善继进言：“高大人，日本人来者不善，宜早作准备！”“言之有理！”高善继对情况的严重性已有充分的估计，明白全船官兵都在注视着自己，他冷静地思考着在突如其来严峻考验面前的应付办法。

此时，“高升”舰上响起了官兵的一片吵嚷声：“快跑吧，日本兵来了！”“了不得了，日本人把大炮对准了我们！”高善继高扬剑眉，异常镇静地扫视全船官兵，慷慨激昂地鼓舞士气：“弟兄们，吾辈自请杀敌而来，岂可贪生怕死？今日之事，莫要惊慌，要听号令！”营官骆佩德一腔热血沸腾，挥拳振振有辞地像发表演讲一般：“高大人所言极是！我们不下两营两哨人马，有1100多个英雄好汉，配备着14门行营炮，带着大量枪支弹药，怕什么？咱们跟日本人拚命！”营官吴炳文也以满嘴文辞表达中华男儿的爱国热诚：“弟兄们，目前正值国家多事之秋，恰是五尺男儿挺身报国之时，军语说置之死地而后生，不怕死，还怕什么？”高善继精神抖擞，看着官兵们宁死不屈的爱国精神，激动得热泪盈眶。在此关键时刻，他为进一步鼓舞士气，稳定军心，又以沉着刚毅的果决态度嗖地一声，从腰中抽出所佩宝剑，明晃晃地举到头顶，对天发誓：“高某人不才，今日定与全体官兵共存亡，我若贪生怕死，弟兄们就用此剑将我碎尸万段！”全船官兵个个义愤填膺，对海天怒吼：“誓跟高大人，以死报效朝廷！”“高大人死，我们岂可独生！”清国爱国官兵们的怒吼声惊天动地，震动海空！在此怒吼声中，英国船长高惠悌惊慌失措地用手擦着满头汗水，向高善继报告：“高大人，情况越来越紧急--”“浪速”号派出一只小艇，已停靠在我船旁边。请问高大人，该如何处置？”高善继冷静地吩咐：“你去见日本人，听他们讲些什么？”“好！”高惠悌转身而去，不一会儿回来向高善继通报情况说，“日本海军大尉人见善五郎要求上船检查商船执照，我知道他要窥探船上情况，因此一口回绝，他又提出要‘高升’号跟‘浪速’舰走！”“你怎样回答？”“如果硬命令跟着走，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在抗议下服从！”高善继听罢，毅然将左手一摆，低声从牙缝中挤出四个字：“不要理他！”高惠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在甲板上来回走动，抬头向“浪速”舰一看，几乎要哭出声来：“高大人，日本人又第三次挂出信号旗：“立即斩断绳缆，或者起锚，随我前进！”哎呀，这可怎么办？”高善继义无反顾地回答：“告诉日本人，清国官兵宁愿战死，决不服从

日本人的命令！”“抵抗是无用的，你们已处于日本人的炮口之下，一颗炮弹就能在眨眼之间使‘高升’号沉没！”高惠悌连吓带气。

“清国志士宁死不当俘虏兵！”高善继斩钉截铁地回答。

“请再认真考虑，事已至此，投降才是上策！”“除非日本人同意让‘高升’号退回大沽口，否则拚死一战，决不投降！”“你们决心要打，必须让外国船员先行离船！”高惠悌摆出老牌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派头，提出强硬要求。

清国官兵看到日本军舰步步紧逼，英国船长态度蛮横，无不怒发冲冠，叫骂连天。一时间人声鼎沸，全船骚动：“打死英国佬，再和小鬼子拚命！”

“把英国人抓起来！”营官骆佩德走到高善继面前，俯耳低言：“为防止意外，应严格控制英国船长的行动！”高善继深沉地将头一点，扭转巨大身躯，像泰山压顶般向高惠悌斜倾，以利剑般的目光射了过去：“鉴于你的不合作行为，我只好限制你的行动自由！”高善继说罢扭头命令营官吴炳文：“派人监视高惠悌，严格看管全部吊艇，未经允许，不许任何人离船！”“喳！”吴炳文高声领命而去。

“你们把我看起来，怎么跟日本人联系？”高惠悌狡黠地将高鼻子一翘，想起了歪主意。

高善继正要回答，却见吴炳文带着一个日本海军大尉来到面前，正要开口报告，高善继抢先以眼色制止，吴炳文会意，立刻缄口不语。接着，高善继以命令的眼光示意高惠悌出面应酬。高惠悌在清军官兵的无形压力下，乖巧地开口与日本海军大尉用英语讲话：“尊敬的人见善五郎大尉，请转告大日本帝国海军指挥官，华人拒绝当俘虏，坚持要退回大沽口。考虑到‘高升’号出发时尚在和平时期，应该同意本船退回原出发地大沽海口，不应按战时办法处理。即使已宣布开战，这也是个公平合理的请求。”人见善五郎边听英国船长的话，边不停地转动一双贼眼，窥视清军官兵动向，对高惠悌的要求，慢条斯理地回答：“本职仅奉命传令，愿将贵船长的见解带回去，报告舰长东乡平八郎。”在清军官兵仇恨的目光逼视下，人见善五郎急忙离开“高升”舰，回舰向东乡报告称：“‘高升’号有清兵一千多人，清军指挥官不仅拒绝投降，还对英国人舰长采取高压态度，使英国高级船员都心怀不满。

本职确信，无论如何，这些英国人都不会做出对帝国不利的证言！”东乡平八郎面对毫无海上作战能力的清国陆军士兵，陡然生起杀人取乐的蛇蝎之心，歇斯底里地狂叫：“让他们投降，已劝了足足4个小时，大大超过了帝国海军军官的容忍时限，真是岂有此理！”“对在运输船上的陆军动手，在国际公法上允许吗？”人见大尉提出疑问。

“我们劝他们投降长达4小时之久，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至于国际法，就看你怎么解释。我认为，商船船长在航行中拥有绝对的权限，现在船长已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图行事，就可以认为该船已被清军非法劫持！”“可是，清国官兵并没有扣押英国船长呀，而英国舰长的要求是合乎国际公法的！”“清军官兵拒不投降，就是有意与大日本帝国为敌！为显示帝国海军的威风，必须对他们进行炮击，让不投降的支那人统统葬身海底！”“这样做似乎有些不妥，违约国际公法！”“休得胡言！”东乡平八郎发疯般圆瞪牛眼下令，“发信号，通知欧洲人立刻离船！”“是！”人见善五郎命人第四次挂出危险信号标志，并在“浪速”舰桅顶上升起表示危险的红旗--要施放鱼雷！

高惠悌看到“浪速”舰挂出的危险信号和红旗忙陪着笑脸问高善继道：“高大人，日本人已发出危险信号，要欧洲人立刻离船，求求你，让我们逃

命吧！”高善继鄙夷地冷笑不语，高惠悌立即用信号通知“浪速”舰：“中国人不准我们离船，请派一只小船来！”东乡平八郎看到英国人船长高惠悌的求救旗语，无动于衷，毫不理睬，而命“浪速”舰开到距“高升”号150米处，用右舷前部鱼雷发射管发射一颗鱼雷。看到鱼雷未能击中目标，东乡勃然大怒。

于7月26日零时40分，丧心病狂地命6门右舷炮一起瞄准“高升”号，猛烈施放排炮。

刹那间，“浪速”舰6门大炮犹如6条青龙，猛烈地喷出浓烟烈火，炸弹如霹雳般在“高升”号上空炸响，探照灯光像白色闪电扫向“高升”号。

在此惊心动魄的时刻，在危急关头，高善继镇定自若，亲自拿起一支步枪，大声怒吼：“弟兄们，拿起枪，跟日本人拚命！”在隆隆的大炮轰鸣声中，高善继亲自端起步枪，怀着对日本强盗的无比仇恨，扣动板机，向“浪速”舰射出复仇的子弹。

“日本鬼子，操你娘的八辈祖宗！”“打他妈的王八蛋！”在高善继奋不顾身的英勇行为带动下，仁字军两营两哨1000多名官兵毫无畏惧，一个个手持步枪，从甲板上，从舰桥上，从船舷旁，勇敢地向敌舰射出愤怒的然而又是在海上作战中意义不大的步枪子弹。

东乡平八郎看到中国官兵在绝境中不仅不低头挂白旗求饶，反而英勇抵抗，愤怒还击，顿时兽性大发，疯狂地指挥“浪速”舰开动全部火力猛烈轰击。

顿时“高升”号多处起火，燃起熊熊巨焰，转瞬间烟雾迷漫，漆黑一团，从船上不断传来英国船员的鬼哭狼声，也传来中国官兵的愤怒叫骂声。

高善继怀着满腔悲愤瞄准“浪速”舰桥扣动板机，一颗步枪子弹从东乡平八郎头顶嗖嗖飞过。东乡平八郎气急败坏地向下一拉中将大沿帽，疯子般叫嚷：“发射鱼雷！”说时迟，那时快，一枚鱼雷飞出“浪速”舰船舷，击中“高升”号煤仓猛烈爆炸，震耳欲聋。“高升”号顿时煤粉四飞，迷漫海天，船尾也开始下沉，但高善继仍带领营官骆佩德、吴炳文和众儿郎临危不惧，将一颗颗步枪子弹射向敌舰。

“浪速”舰的信号绳终于被击断，信号旗随风平落，坠入水中。

隆隆的炮声中，又一颗步枪子弹直扑东乡平八郎面门而来，他大吃一惊，咬牙切齿下令：“放舢板，救出英国人，中国人一个也不准救！”在明晃晃的探照灯照耀下，“高升”号慢慢下沉，清国官兵站在水中怒骂着开枪射击：“日本鬼儿，老子下辈子找你算帐！”“方伯谦，你他妈见死不救，操你老娘！”在雷鸣般的爆炸声中，“高升”号甲板被无情的海水淹没了，但舰桥上的士兵还在奋起抗击。慢慢地，“高升”号全部沉没了，桅杆上最后一个士兵仍视死如归地射出最后一颗子弹。不一会儿，桅杆尖渐渐没入海水之中，可是，一支步枪的枪刺仍在明晃晃的探照灯下，闪耀着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光芒！

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营官骆佩德带一些清军官兵英勇地劈波斩浪，拚命游向“浪速”舰，力图登上敌舰，与罪恶滔天的日本鬼子做最后的搏斗。

东乡平八郎见状大惊，觉得这些中国人真是不可思议，洋洋1000名官兵，竟没有一个叫喊投降者，甚至在“高升”号沉没后，还挣扎着游向“浪速”舰，做最后殊死的斗争，不由得自言自语道：“中国人真不好惹呀！”正在此时，追赶“济远”舰归来的“吉野”舰返航驶回，站在伊东佑亨身旁的日本浪人钟崎三郎突然指着在大海中搏斗的清军官兵大笑道：“这就叫困兽

犹斗！"钟崎闭上厚唇大嘴，返身跑到船边，跳到舢板上，领着几个日本士兵毫无人性地向在海水中挣扎的中国官兵疯狂射击。

东乡平八郎见此情景也兽性大发，命"浪速"舰士兵分乘小船，丧心病狂地向在海浪中拚命挣扎、完全失去抵抗能力的中国官兵开枪射击。

在残无人道的射击声中，在日本鬼子的狞笑声中，一个个拒绝投降的清国官兵惨死在敌人的枪弹之下，一片片鲜血染红了探照灯下黝黑的海水。几百名不屈不挠的炎黄子孙大义凛然，宁死不屈，视死如归，怀着对日本强盗的深仇大恨葬身海底！

海浪在咆哮，海风在怒吼，海水在呜咽，天地万物都在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罪行，在为献身祖国的烈士们哭泣！

正如爱国志士高善继在死前怀着一腔悲愤所说：“虎落平阳被狗欺！”1100名仁字军英雄好汉，在陆地上不愧是顶天立地的豪杰，但在海上，他们却英雄无用武之地，除第二天被经过丰岛海面的法国军舰救起少数人外，大都被日本强盗残害洋底，但他们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浩然正气，真正可歌可泣，永为后人敬仰！而日本侵略者竟违背国际公法，悍然击沉中立国商船，造成千余名无辜者葬身海底的惨剧，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丰岛海战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前哨战，也是甲午战争的序幕和缩影。这一前哨战，清国损失惨重：“广乙”舰被毁，“操江”号被掳，“济远”舰受伤，但却以沉重的代价向世界宣告：中国人虽然贫弱，但却有堂堂爱国正气，由此演化出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的威武不屈的一幕幕活剧。……

第五章妄图篡改历史教科书

日本右翼分子既然硬着头皮否定日本侵略战争历史，就必然要处心积虑地篡改历史教科书，以日本右翼思想培养日本下一代，这必然要引起中国和亚洲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国家和人民的强烈愤懑！

一、教科书问题的三起三落——教科书问题引起国际舆论对日本的强烈反对，中国、朝鲜、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的政府和人民纷纷谴责日本政府。……众所周知，历史教科书亦称历史课本，是根据各国政府的意志，根据教学大纲编写的历史课本、讲义、讲授提纲，担负着以正确的历史观教育下一代的重要任务。

日本右翼分子既然硬着头皮不看事实，否认日本侵略战争的性质，图谋推翻东京审判，公然参拜靖国神社，主张向海外派兵，就必然处心积虑地篡改历史教科书，以日本右翼思想培养日本下一代。这必然引起中国和亚洲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国家的人民的强烈愤怒。为维护世界历史的真实性，为揭穿日本右翼分子用他们那套宣传侵略思想的教科书教育日本下一代的险恶用心，亚洲许多国家广大人民不得不站出来谴责日本右翼势力的倒行逆施，与日本右翼分子进行尖锐的斗争。

大多数日本人深受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之害，不少人被搞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处于死亡与饥饿的水深火热之中，因而他们对那场侵略战争深恶痛绝，经历过战争的大多数日本人，对于未能制止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外扩张和发动侵略战争而感到内疚。出于这种反省，他们进行了历史上

的清算，特别是有正义感的学者，为了使日本人正确认识历史，总结教训，在战后初期编写出一批正确反映史实的教科书，以尽到教育后代的责任。另一方面，日本投降后，在世界民主势力的有力推动下，驻日美军总司令部根据《波茨坦宣言》和《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方针》的基本精神，针对过去的军国主义教育，下达了四条指令，命令修改教育内容，从教科书中删除传播军国主义及超国家主义思想。日本当局被迫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取消鼓吹天皇制及军国主义的教学内容；将中央集权制的教育制度改为地方分权制的教育制度；缩小文部省权限，使其由监督、统治转为服务，规定文部大臣由教育家担任，导入教育委员会制度；改“国定教科书”为“审定教科书的自由选择”；停讲修身、日本历史及地理等鼓吹侵略战争的课程；驱逐教师中的军国主义分子；禁唱“君之代”歌，禁止奉拜天皇御像和遥拜皇宫等活动；废除《教育敕语》，制定战后教育基本法、学校教育法等。

但到50年代初，美国出于冷战政策的需要，开始支持日本右翼势力，于是右翼文人及官僚闻风而动。第一个跳出来的是文部相天野贞佑。他以文部省的名义要求升“日之丸”旗，唱“君之代”歌，主张仍以明治天皇的《教育敕语》为战后日本人的道德准则，力图恢复修身课。这些主张因遭到日本教职员工会的反对而未果。

1958年岸信介上台后，任命滩尾弘吉任文部大臣。

这滩尾弘吉被称为日本右翼元老政治家、亲台派的“总司令”。他1899年12月21日生于日本广岛县，1924年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后，入内务省任职。历任内务省秘书官和官房会计课课长、生活局长、卫生局局长、地方局局长、大分县知事、内务省次官。

战后历任文部大臣、厚生大臣、自民党总务会会长、众议院议长、自民党顾问等。

滩尾弘吉在日本政界有一定影响，如在1976年三木内阁时代，自民党内的福田、田中、大平派联合进行倒三木活动，双方对抗纷争不已，最后由滩尾出面收拾事态。他联合椎名悦三郎调停纷争，提出了“由三木召集临时国会，在会后三木下台”的“滩尾设想”，声称若三木不接受这一建议，他将决心辞去自民党总务会长之职。结果三木辞职交由福田赳夫接替组阁。滩尾、椎名和前尾繁三郎时常聚集交换意见，被称之为“三贤人会”，他们的见解颇受自民党各派重视。

滩尾弘吉作为日本右翼政客一贯亲台反华，极力阻挠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多次率团赴台活动。

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前，滩尾派玉置和郎于1972年8月访台，与台湾当局密谋策划破坏恢复邦交。中日建交后，以滩尾为首成立了“日华（台）关系议员恳谈会”，自任会长。当田中首相在自民党众参两院议员全体会议上报告中国之行时，滩尾带领亲台议员在会上发难。他说：“日本以断绝同台湾关系为代价，换取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个代价太大了。真是得此失彼！”滩尾竭力反对缔结中日航空协定。在1974年1月举行的自民党联席会议上，滩尾坚决反对大平外相提出的解决日台航线的方案，他说：“这个方案台湾是不会接受的，日本在国防、经济两个方面都同台湾有着很深的关系，今天和它一刀两断怕不妥，要三思而后行。”由此，自民党统一认识的工作被迫推迟。中日航空协定达成协议后，只要一有机会滩尾就要求政府修复日台关系，恢复日台航线，并一直通过秘密途径，同台湾当

局讨论复航问题。经过滩尾的多方奔走，日台航线终于1975年9月15日复航。

滩尾率领国会代表团乘坐复航的首航班机抵台北，并前往蒋介石陵寝献花，与"总统"严家淦和"行政院长"蒋经国会谈。在蒋经国任总统及去世时，滩尾均亲自率团赴台参加蒋经国的就职仪式和葬礼。

多年来，只要日台之间一遇难题，总是滩尾出面解决。

1983年4月，被台湾授予"中国文化大学"名誉哲学博士学位。

滩尾弘吉当上文部大臣后，第一次对日本历史教科书进行重大修改，不仅不再写明中日甲午战争的侵略性质及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反而称赞甲午战争"提高了"日本国际地位。其，日本政界、军界、财界的右翼势力纷纷介入教育，文部省也利用审定教科书的大权，强行修改教科书，把有关"战争反省"的内容全部删掉，强制加进提高天皇地位、复活神化教育等内容。日本进步人士奋起坚决反对。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发生了举世闻名的"家永三郎教科书案件"。

家永三郎是日本东京教育大学教授，他编写的高中历史教科书较客观地叙述史实，战后一直被日本当局采用。但1963年文部省却将他的《新日本史》做不合格处理。家永三郎要求文部省再次进行审定。1964年，文部省提出300条修改意见。家永三郎对文部省违反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的行径表示反对，于1965年和1967年两次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法庭于1970年7月17日判决文部省违法，撤销了对家永三郎教科书的不合理处理，并明确指出："根据宪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六条以及教育基本法第十条的精神，(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过程中只限于审查误写、误排及其他技术性问题，超出这一范围去涉及记述内容当否，实属违宪违法。"同年7月24日文部省向东京高等法院起诉，反告家永三郎。1971年7月16日，东京高等法院一面判决文部省对教科书的审定为合法，一面又认为审定教科书是教育行政手续问题，于1975年12月20日驳回了文部省的起诉。十天后，文部省又向日本最高法院上诉。

为改变不利处境，文部省对《文部省设置法》第五条(文部省权限)作出重大修改，增加了"对教科书进行审定"和"对义务教育学校使用的教科书指定发行者"两条，还做出扩大该省权限的决定："对文部省有著作权或有著作名义的出版物进行管理。"这样，文部省就基本垄断了教科书的著作权，出版单位亦由文部省指定，便使文部省由"指导、建议、助成机构"，变成了掌握教育大权的集权化官僚机构。

在80年代，日本右翼势力在对"家永三郎教科书案件"采取无限期拖延手法的同时，利用在参众两院同时选举中取得胜利的有利条件，在教科书审定方面又改取主动进攻姿态。

与此同时，社会上的右翼团体对家永三郎横加威胁，与文部省配合默契，形成夹攻之势。不断掀起"修改教科书运动"。

在向家永三郎进行迫害的同时，右翼分子策划了篡改教科书的勾当。其主谋就是"宗教政治研究会"会长、自民党众议员玉直和郎。1981年3月9日，玉直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大肆攻击由正直学者所著的反映侵略战争史实的教科书。在他的倡议下，成立了由部分国会议员组成的"教科书协议会"，要求文部省对教科书进行全面修改。

经过一年多的篡改工作，文部省在1982年6月25日对高中二、

三年级和小学1983年度使用的教科书审定完毕。在这些教科书中，大量地掩盖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史实，把1931年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改成日本军队“爆炸了南满铁路的局部地方”；把侵华日军侵略华北，改为“进入”华北；把对中国进行全面侵略，改为“全面进攻”；把惨无人道的杀害中国30万军民的南京大屠杀，改为日军“占领南京时，在一片混乱中，日军杀害了很多中国军民”；把在中国推行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改为中国“抗日运动的展开，迫使日本军队保证治安”；把朝鲜人民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奴役而“举行集会示威，独立运动波及朝鲜全土”，改为“示威和暴动波及朝鲜全土”等等。

A 原则问题上中国决不让步日本文部省篡改历史，为侵略战争开脱罪责的行径，激其中国、朝鲜和亚洲广大国家人民的强烈谴责，与日本当局和右翼势力展开激烈斗争。

7月26日，中国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司长约见日本驻华公使渡边幸治：指出日本文部省与审定中小学历史课本中，篡改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态度极不严肃，动机何在是令人怀疑的，中国政府希望日本政府注意到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纠正文部省审定的课本中的错误。

7月29日，日本文部省官员约见我驻日公使王晓云，为日本篡改军国主义侵略历史辩解，王晓云当即予以驳斥。

7月30日，我《人民日报》发表短评《忠言逆耳利于行》，指出“人们注意到，日本政府中某些居于负责地位的官员，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在大放厥词，竭力为文部省美化军国主义的行为辩解，这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日本国土厅长官松野幸泰在对记者发表谈话中，说什么在日本‘进入’外国时并没有使用侵略一词，因此如果要求把‘进入’改为侵略，就是‘干涉内政’，就是‘歪曲事实’，就会使孩子们说‘祖先干了坏事’。还有几名内阁大臣发表了类似的说法。身为日本内阁大臣的人说出这种话来，实在丢脸。”8月1日，中国教育部外事局局长李滔紧急约见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公使渡边幸治，指出，应日本文部大臣小川平二大臣的要求，中国教育部部长何东昌曾邀请小川大臣访华。遗憾的是，直至7月29日，日本文部省初等中等教育局局长铃木勋仍然在为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篡改日本当年侵略中国的历史辩解，推卸文部省的责任。这件事已引其中国人民和教育工作者的强烈不满，因此，日文部大臣目前不宜访华。

8月5日，吴学谦副外长约见日驻华大使鹿取泰卫指出，7月26日中国政府就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的过程中篡改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历史一事提出交涉后，日本政府向我方作了答复。但文部省在说明中回避了审定教科书过程中的错误和日方应该采取的纠正措施，而是作了种种辩解，企图推脱责任。日本政府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作为侵略战争的受害一方，对篡改被侵略的历史的错误表明自己的态度，要求予以纠正，这是理所当然的，是中国的正当权利，企图用‘干涉内政’的指责来混淆是非，不仅掩盖不了篡改历史的错误，还会激其中国人民更加强烈的反对。再次强烈要求日本政府纠正文部省审定教科书中的错误。

8月26日，日本从阁官房长官宫泽喜一在首相官邸举行记者招待会，就教科书问题发表谈话：“日本政府及日本国民深刻地认识到，过去我国的行为给包括韩国、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的国民以很大的痛苦和损失，并且进行反省，决心不让这样的事情重演，在这个基础上一直走了作为和平国家的

道路。关于韩国，我国在1965年的日9第五章妄图篡改历史教科书韩联合公报中陈述了'过去的关系是遗憾的，现在深刻地反省'的认识。"宫泽喜一表示将充分倾听中国和朝鲜等国家的批评意见，由日本政府负责纠正，但也未说明纠正的措施。

文部大臣小川平二于8月26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就教科书问题发表谈话，表示将充分倾听中国和朝鲜等国家的批评意见，由日本政府负责纠正，但未说明纠正的措施。

8月28日，吴学谦副外长再次约见日驻华大使鹿取泰卫指出，尽管日本政府发表了官房长官讲话，表示要充分听取批评，负责纠正教科书的有关记述，但是并没有提出令人满意的、明确而具体的纠正措施，同中方的要求相距甚远，不能不令人感到失望，中国政府对此不能表示同意，中国人民也是无法接受的。

9月6日，日本驻华大使鹿取泰卫约见吴学谦副外长，奉日本政府之命表示，日本政府根据铃木首相早日解决教科书问题的指示，对教科书问题的解决办法再次做了研究，决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日本政府将负责纠正教科书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审定教科书审定标准，从本年度起可望纠正教科书中关于中方特别指出的有关问题的表述；关于已经审定的教科书，将通过发表文部大臣见解，刊登《文部公报》下达，在教学中实际上满足中方的要求。日本将于1982年9月召开教科书审定调查审议会，11月底以前做出修改教科书审定标准的结论，11月底前后发表文部大臣见解，在1983年4月教科书使用前贯彻落实。

9月8日，吴学谦副外长约见日驻华大使鹿取泰卫，代表中国政府对日本政府9月6日提出的纠正错误的具体措施给予评价，尽管还有一些含糊不清、不能令人满意之处，但同过去所作的说明相比，是前进了一步。吴副外长指出，中国政府一贯认为，承认还是不承认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历史，是中日关系中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我们注意到，日本政府重申，愿意遵循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痛感日本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并表示日本政府要充分倾听中方对教科书表述的批评，由政府负责纠正。根据新的审定标准，从本年度起，可望对教科书中关于"侵略"，"南京大屠杀"等部分的表述做出纠正。关于已经审定的教科书，将由文部大臣在11月底前后发教科书中的错误能不能切实得到纠正，我们还要看今后采取的具体行动及其所产生的效果。我们对此保留评论的权利。我们希望日本政府继续做出努力，尊重历史事实，履行诺言，以利于中日两国关系的继续发展。

9月下旬日本首相铃木善幸访华。铃木在与赵紫阳总理的会谈中谈到教科书问题时说，日中联合声明的前言中指出，"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我们的这一认识没有丝毫改变，日本方面要充分听取中国对教科书问题的批评。对于中国指出的有关表述，日本政府将负责尽快纠正，愿意诚心诚意地执行具体措施，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然而，日本右翼并不服输，他们对日本政府在教科书事件中接受中国和亚洲国家批评，纠正篡改史实的错误极为不满，暗中策划编写、出版更坏的教科书。在这次活动中，"保11第五章妄图篡改历史教科书卫日本国民会议"最为积极。

就在日本铃木首相向中国领导人当面表示要认真纠正篡改历史教科书之后，“保卫日本国民会议”便于1982年10月开始行动，用两年时间，写出了美化侵略战争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新编日本书》，并于1985年8月送文部省审查。文部省“教科书审定调查审议会”接到送审本后，在5月27日审查通过。

《朝日新闻》5月底将此消息披露后，日本各在野党、教育界、工会和各界群众纷纷表示强烈不满，朝鲜和东南亚各国当局和报界群起谴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月4日发表谈话，谴责日本右翼分子篡改历史教科书。

6月7日，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杨振亚约见日本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股野景亲，就日本文部省教科书审议会审定的新编高中日本史教科书问题提出严正交涉，并递交了外交部的一份照会，指出这本高中日本史教科书多处记述严重歪曲史实。日本政府曾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对过去的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表示“深刻的反省”；1982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也表示，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在日本学校教育和教科书审定中“当然应该受到尊重”。但日本文部省不仅没有贯彻和履行上述精神和允诺，反而审定了这本有许多错误论述的高中日本史教科书。中国政府强烈要求日本政府认真贯彻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切实履行1982年所作的允诺，消除由于这一事态给中日友好造成的不利影响。

日本政府在接到中国照会后，立刻召开会议，研究对策。

官方长官后藤田正晴和外相安倍晋太郎主张，使这本历史教科书作废，或敦促这本书的编辑主动撤销审定的申请，以外交为重的原则平息这场风波。但文部省认为，“不能使一度认为合格的教科书再度变成不合格。”6月10日，文部相海部俊树发表谈话，虽然声称文部省“正在按照重视与邻近各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方针进行努力，不允许偏离这一方针”，但无进一步表示。两天后，外务省发言人波多野敬雄，在向外国驻东京记者吹风会上竟然说：日本正在对中学历史教科书进行全面复审，还没有完成这个过程。

在日本政府最后决定是否批准之前，中国政府或其他任何国家的政府发表官方评论的做法都是“不大适当的”。

与此相呼应，6月14日，日本《产经新闻》发表社论称“日本人有写任何教科书的自由”，中国等对“尚未审定完毕、也未向一般国民公开的教科书进行谴责”令人不快”。

从6月中旬起，国际舆论对日本的抨击日益强烈，中国、朝鲜、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的政府发言人和新闻评价论纷纷谴责日本。马来西亚《南洋商报》发表题为《日本又修改历史教科书》的社论，指出日本要实现其政治大国的目标，就要消除修改宪法和调整防卫政策等问题上的障碍，“日本统治集团和某些上层势力只有从改造日本人思想方面着手，这或许是日本在教科书上力图篡改史实，美化战争的动机所在。”新加坡《联合早报》社论指出，“我们不主张老跟历史纠缠不清，但不幸的是，日本另一部分人却不如此思想”，我们“不得不向日本抗议，施加压力，以防患日本国粹主义分子的重新得势”，“最令人担忧的情况还是，日本目前仅是‘经济大国’，还会接受抗议照会，一旦成了‘政治大国’，反应也许就会完全两样。外国人担心的是，篡改历史的那些人，正是主张日本应成为‘政治大国’的那股势力。”在这种形势下，6月18日，中曾根首相发表谈话说：“在研究了中国等国的意见后，我得出的结论是，希望对某些部分进行重新审定。”6月23日，

中曾根首相重申要根据1982年官房长谈话精神，处理教科书问题，敦促文部省主持修改，并召开阁僚级协商会议制定措施。随后，中曾根首相召开有安倍外相、海部文相和后藤田官房长参加的协商会议，要文部省通知《新编日本史》的编者，“如果不接受修改要求，最终将决定审定不合格，不得出版”。

教科书问题的三起三落，反映了日本右翼企图以篡改历史的手法，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开脱罪责，以便欺骗新一代重走战前对外扩张的道路。特别值得警惕的是，他们的企图是通过文部省审定历史教科书变为行动的。这说明，他们的影响已在某种程度、某种范围一度在国家机其中产生效果。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今天，在日本国内外舆论和各种力量的制约下，右翼在教科书问题上的阴谋未能得逞，而明天，他们还会在其他问题上兴风作浪。

二、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多年来，日本右翼分子吹捧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是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那么，就让我们看看在甲午战争的山东半岛作战中，日本侵略军是多么不顾廉耻、多么毒辣地对待中国士兵和老百姓的吧--1894年岁尾的旅顺口，依然处在日寇疯狂屠杀的阴森恐怖之下，加之凝霜满地，朔风刺骨，更显得凄凄惨惨，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在旅顺海边一家酒馆里，两个身穿中国服装的日本男子正喝得醉醺醺的。高个儿大嘴巴男子头戴珊瑚顶的貂皮帽，身着虎皮大衣。中等身材的瘦猴子头戴裘皮高帽，身穿曲襟蓝绸獭袖狐皮大衣。这两个男子穿着日寇攻占旅顺口后从中国皮货商店抢来的高级皮货，远看倒也道貌岸然，但眉宇间却掩藏不住侵略者的贪婪无耻之色。

高个儿大嘴巴端起一海碗酒仰脖儿喝下，摇摇摆摆地站了起来，中等个儿瘦猴子连忙上前搀扶。两人来到窗前，高个儿大嘴巴伸手推开窗户，手指与旅顺口夹海相望的北洋海军基地威海卫，再指着横列在威海卫港口东西两侧的刘公岛、日岛，酒气喷人地口出狂言：“渤海的门户有两个，旅顺口已在大日本皇军手中，威海卫、刘公岛、日岛不要几天也会落入皇军之手！你立即动身前往威海卫，再作实地侦察，向我作出攻占威海卫的作战实施计划！”“是，我马上出发！”中等个儿瘦猴子口里虽利索地答应，但心里却在打退堂鼓，找推辞的借口。只见他小心翼翼地扶着大高个儿坐回酒桌旁，灵机一动找到了逃避的借口：“根津参谋，根据大本营作战计划，不是要进军山海关，驰骋直隶平原，直捣北京、天津，逼迫清政府彻底投降吗？应派我再赴北京城！我当过乐善药店北京支店长呀！那可谓故地重游，驾轻就熟，何必去不相干的威海卫。……”根津参谋名叫根津一，号山洲，1860年生于日本山梨县，自幼攻读汉文典籍，后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与日本后来的谍报头目荒尾精、明石元二郎等经常在东京市谷的“谷中家”餐馆聚会，讨论侵略中国的方策，因而被日本统治当局看中，与荒尾精一起成为日本侵华谍报活动的重要头目，任“日清贸易研究所”代理所长。1894年

7月，他奉召结束京都林丘禅寺的平稳生活，由长期潜入上海，与宗方小太郎等日本间谍在上海、威海卫一带活动两个多月，后害怕被清政府逮捕，乘船逃回日本。

为实施山东半岛作战，大本营首席参谋川上操六把他从名古屋召到天皇专用列车上，请到广岛大本营，破例让他参加御前会议两小时，明治天皇又单独见他询问中国情况一小时，有人将他长达三小时的汇报编集成《根泽大尉的长奏上》，被日本情报界和军部传为“美谈”，还任命他为“山东作战军”和第二军参谋，策划进犯我山东半岛的阴谋。

根津一听到宗方小太郎不愿去山东的推辞，就笑着给宗方小太郎斟酒一杯，带着极其诡秘的神情说：“宗方君，在本营内部，对下一步作战计划曾展开激烈争论！第一军军长山县有朋被调回东京后任大本营监军，他向大本营提出《征清三策》，主张贯彻原定进攻直隶平原的作战方针，但伊藤首相和联合舰队伊东司令官都强烈反对！”“为什么？”“他们认为，辽东半岛冰封雪冻，人马都有冻毙的极大危险，不如进兵山东半岛，消灭北洋舰队，对清国威胁更大！”“结果如何？”根津一端起酒杯，饮驴般张开大嘴巴一口而尽，不知羞耻地大吹大擂：“本人写了一长期奏折，详细论述山东半岛作战的得失。

大山严司令官看了赞赏备至，马上转呈大本营。大本营才当机立断，不但同意修改原定作战方针，而且任命大山司令官为山东作战军司令官，任命我为山东作战军参谋！”宗方小太郎从头上摘下裘皮高帽，猛地往酒桌上一砸，嘻嘻地谄笑道：“谢谢根津参谋栽培，本浪人决不给你丢脸，一定把威海卫的清军部署侦察得清清楚楚！”根津一见终于说动了间谍浪人宗方小太郎，不由得喜上眉梢，又给宗方小太郎斟酒一杯道：“宗方君在中国活动过三、四十年，曾冒死出入被称为死地的芝罘。这次你带藤岛武彦去。他准备到浙江普陀山法雨寺，找高见武夫联络，配合你行动！”“太好了！”“你先到荣成湾，勘察大军登陆路线，我们得到你的报告后才开始进攻作战，然后你再深入威海卫、刘公岛、日岛一带侦察，提出你的威海卫作战计划！”“是！”12月24日，宗方小太郎和藤岛武彦等4名间谍化装成中国和尚模样，带刘雨田、“栓板柱子”等汉奸坐日本联合舰队汽艇，由大连湾窜到山东半岛荣成湾，在距岸万米处跳上舢板，悄悄划向岸边。

宗方小太郎一行八人沿岸划行，见荣成湾位于山东半岛成山角西南，湾口宽阔，能避强风，沿岸又丘陵起伏，适于进行登陆作战。于是，便到龙须岛落凤沟东北的浅滩地段泊下舢板登岸，见岸上并无清国士兵把守，就立即向落凤沟村奔去。

宗方一行刚进入落凤沟村，立即听见一片哭叫吵嚷之声，忙上前去看。只见几个清军士兵正在万顺渔行附近抢一个老太太的鱼摊。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正颤抖着双手祈求：“老总，给点儿钱吧，家里还有两岁的小孙子张着黄海口等着吃东西呢！”“老子是山东河防营副将阎德胜大人麾下泰靖营营官，阎大人克扣军饷，老子总得吃饭，不吃你的鱼喝西北风！”泰靖营营官周下成恶狠狠地叫嚷。

宗方小太郎悄悄给刘雨田使了个眼色，刘雨田会意，即上前恬不知耻地嚷叫：“听说日本人占了辽宁普兰店，有个叫姜恒申的少年救了日本人向野坚一，大日本皇军第二军大寺参谋长亲自到黄海平台村道谢，送去大批穿着用品，还把姜恒申送到日本留学！”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吃惊地瞪大眼睛，

将信将疑地问：“日本人有那么好？可比泰靖营老总强多了！”周下成闻听此言一跳三尺，指着刘雨田的鼻子骂道：“这家伙不是汉奸，就是日本特务，快抓起来，到阎大人那儿领赏！”刘雨田顿时吓出一身冷汗，连连后退，藤岛武彦在中国骄横已惯，此时跳出来把秃头一晃蛮横地吼道：“日本人怎么的？总比欺压中国百姓的地痞恶霸强！”周下成看一个和尚竟敢管他们胡作非为之事，勃然大怒，跳起来举拳就向藤岛武彦打去，几个清兵也一拥而上，双方立刻像一群恶狗般打了起来。平时对老百姓耀武扬威的这些清军兵勇，哪里是经过玄洋社严格训练的日本浪人的对手？几个回合便被打得屁滚尿流。周下成正要撒腿逃跑，突然见从藤岛武彦身上掉下一张纸来，忙哈腰捡起，瞪眼一看，便如获至宝般扯着嗓子大叫起来：“弟兄们，这几个秃驴是日本间谍，抓起来！”宗方小太郎大吃一惊，故作镇静问道：“这位老总，可不能这么血口喷人！”周下成手举从地上捡起的那张纸大声斥责：“这是日本冈山清禅寺海宴和尚，给浙江普陀山法雨寺住持的介绍信，叫他去跟高见武夫接头，配合日军山东半岛作战，你们不是间谍是什么？弟兄们，上，抓个日本间谍发大财！”这帮兵痞听说能发大财，一个个如狼似虎般冲了上来。宗方小太郎见事不好，扭头就跑，刘雨田等紧紧跟随，藤岛武彦被围在中间走脱不得，寡不敌众被捕。在五花大绑押往烟台途中逃跑，于宁波船上搞情报活动时再次被捕，最后被浙江巡抚衙门斩首。另一日本间谍高见武夫的身份因而暴露被捕，在杭州被处死前还又臭又硬地赋诗一首：此岁此时吾事止，男儿不复说行藏。

盖天盖地无端恨，附予断头机上霜！

且说宗方小太郎一行惶惶如丧家之犬、漏网之鱼，从荣成湾逃到成山角，再向西40华里来到威海卫。

只见威海卫这个名闻遐迩的军事要地位于成山与烟台之间，北负黄海，三面环巾，南北两岸形若箕张，如两条巨臂伸入海中。南岸修有日灶嘴、鹿角嘴、龙庙嘴三个炮台，统称南岸炮台。北岸建有北山嘴、黄海泥崖、祭祀台三个炮台，统称北邦炮台，而刘公岛则如箕舌，为威海卫的天然屏障。

宗方小太郎沉思有顷，怕集中活动目标太大，便命“栓扳柱子”带两个日本浪人专门调查南北两邦炮台资料，令刘雨田等前往刘公岛、日岛、黄海岛，绘制威海卫外围地图，自己则化装成中国农民模样，当夜登上威海西城环翠楼，眺望威海夜间全景形势，细记灯台火亮情景。第二天装作游客模样，登上威海东门，窥探港内军情。第三天窜至刘公岛，带刘雨田到北洋海军提督公署附近刺探军事机密，还装扮成送货农民，登上停泊在那里的“定远”舰，观察军舰修补工程和舰上兵痞，然后于12月26日偷偷窜回荣成湾，与刘雨田等会合，乘船前往大连湾。……1895年1月中旬，寒风料峭的大连湾在日寇铁蹄下痛苦呻吟。黄海山、和尚岛左右拱抱，愤怒呼啸，似在控诉日本军国主义者血腥屠杀旅顺、大连人民的滔天罪行，像在无情揭露日本当局派日本联合舰队20多艘战舰窜据大连湾这个天然良港后，正在策划进攻山东半岛的新阴谋。

在日本联合舰队旗舰“松岛”号作战室里，日本陆海军高级将领正围绕山东半岛登陆作战的登陆地点问题，争得不可开交。

“山东作战军”司令官大山严手抚胸前的花白胡子，以权威性口吻下结论性地说：“综合玄洋社浪人和驻清国武官情报，我山东半岛登陆作战企图已被清国发觉，光绪皇帝和清政府已严令其山东驻军加强防范——根津一参谋，

请你把两份重要情报读给诸位听！”根津一从文件夹中抽出一份文件，神色庄重地介绍：“去年12月24日，宗方小太郎带领的侦察小分队到荣城活动，李鸿章第二天就致电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应速统现有师船赴龙须岛、成山一带巡探，如日船少，即设法驱逐；否则，听其由后路包抄，则威（海卫）危而无驻足之地’。”根津一又从公文包内拿出一份文件，一本正经地介绍：“今年1月13日，光绪皇帝给李鸿章下达了‘相机迎击，以免坐困’的圣旨，李鸿章马上指示丁汝昌称：‘查倭如犯威（海卫），必以陆队由后路上岸抄截，而以兵船游弋口外牵制我师，彼时兵轮当如何布置，水陆相依，庶无疏失，望与洋弁等悉妥筹’。”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佑亨不以为然，把头来回摇得如拨浪鼓一般：“我得到的情报。……”根津一急忙打断伊东佑亨的话，盛气凌人地抢先说：“对不起，我这里还有清政府1月14日给李鸿章和山东巡抚李秉衡的电文指示：‘前据税总务司探闻，倭兵第二军两万二千人欲往威海。今成山西南有倭轮抛锚，似系先来试探，其大队恐将踵至，飭令各军加意严防’。由此看来，清军似已严阵以待。……”伊东佑亨对根津一打断自己的话极为恼火，气鼓鼓地以联合舰队所获情报猛烈反驳：“据玄洋社浪人所得密报，李鸿章仍在坚持其避战保船方针，并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山东防务，甚至命令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不许出战，不得轻离威海一步，如果违令出战，虽胜亦罪。’因此，应迅速猛攻威海，拿下山东，不能稍有迟延！”“威海水陆相依，胜似铜墙铁壁，如若从正面强攻，将造成多大伤亡！”大山严厉声驳斥，言外之意是冲锋陷阵要由陆军出动，海军说得轻松。

“这。……”伊东佑亨顿时语塞，双方陷入难堪的僵持局面。

“报告，宗方小太郎回营交令！”根津一兴冲冲报告的这一消息，立时打破了僵局。

“快请！”大山严、伊东佑亨同时喜不自禁地传令。

“请”音未落，宗方小太郎大步走进作战室，向陆海军高级将官们躬身施礼，大山严迫不及待地抢先问道：“宗方君，你刚从敌后归来，快说说清国的山东防务情况！”宗方小太郎在根津一搬来的椅子上坐下，不慌不忙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我这次带人亲赴荣成、威海、登州、烟台一带进行实地侦察，发现清国错误地以为帝国要进攻北京天津，根本没想到我国会先取山东，因而山东防务十分薄弱，只有48营一万七千余人，而且又在宁海、旧馆、威海、荣成四个方向平均使用兵力！”伊东佑亨听罢，脸上露出骄矜之色，得意洋洋地问道：“这四个方向防守哪里最强，何处最弱？”“旧馆为主要防御方向，兵力最多；荣成方向防守最弱，仅有阎德胜指挥的1400余人，而且分为赵得胜、徐抚臣、阎德胜三部，互有矛盾，难以统一指挥！”“哪里适合我军登岸？”伊东佑亨首先考虑的是登陆地点问题。

“荣成湾龙须岛！”“为什么？”“龙须岛落凤沟东北的浅滩地估只有几十人把守，又是泥底海滩，适于放锚，而且汽艇可开到距岸3米处，舢板能直接靠岸，岸上丘陵起伏，适于掩护陆军进行登陆作战！”伊东佑亨听完拍案而起，拍着宗方小太郎的肩头连连称赞：“宗方君，真有你的，荣成湾可谓理想的登陆地点！”大山严作为日寇“山东作战军”司令官虽对把荣成湾作为登陆地点没有异议，但考虑更多的是进攻山东的“重头戏”-- 攻占威海卫问题，便以不以为然的神情给伊东佑亨泼冷水：“荣成湾不适于大部队迅速登陆，而且若被北洋舰队半渡而击，后果不堪设想！”“山东作战军”参谋根津

一对大山严的意图心领神会，立即从文件夹中抽出一页公文开言道：“玄洋社浪人阿菊从张士珩那那里得到准确情报：丁汝昌已向李鸿章慷慨请战：‘与其安坐以待围攻，易若僭师而起，迎头痛击’！”宗方小太郎微笑着不以为然地反驳：“丁汝昌早已是我联合舰队的手下败将，再说他完全制掣于李鸿章，难于有所作为！这位李中堂一心保存实力，不会放他出来！--比起拿下威海卫，这都是小事一桩！”大山严仔细琢磨宗方小太郎的话意神情，知道他经实地勘察后已有攻占威海卫的腹案，遂摆出礼贤下士的面孔问道：“请问宗方君，威海卫之役采取什么战术为好？”宗方小太见最高指挥官不耻下问，更显得踌躇满志，极力装出很不在意的样子：“重演司令官攻取旅顺的故技即可！”“从后路包抄？”大山严、伊东佑亨几乎是异口同声。

“两位司令官高见！”“宗方君高见！”“因为威海炮台虽相当坚固，但却只能顾及海中，不能兼顾后路！所以为减少对荣成登陆场的压力，可采取声东击西战术，派出两支疑兵：一支炮击登州，一支兵发威海，造成大日本皇军要进攻登州和威海的假相，牵制住大部敌军，皇军主力再出其不意直捣荣成。……”“哈哈！”“松岛”舰作战室里，充满了日寇高级军官们狂妄的笑声。

狂笑中冲出室外，震荡在大连湾上空。……1月18日，新上任不久的山东巡抚李秉衡，在烟台巡抚衙门里正为兵力分散在300里漫长防线上而发愁。突然，嵩武军营官惊慌失措地前来报告：“李大人，倭兵第一游击队的‘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艘军舰正向登州猛烈炮击。看样子，倭寇要进攻登州！”李秉衡听罢心里猛吃一惊，但却装出满不在意的样子，以昔日的荣耀激励部属：“想当年中法之战时，老夫与冯子材分任战守，一举取得谅山大捷，彭玉麟曾向朝廷奏言：‘两臣忠直，同得民心，亦同功最盛！’今倭兵进犯，也比法国入侵者强不了多少！传令登州守将夏辛酉昼夜巡访，准备迎敌！命荣成，宁海各营一体严防！”“喳！”营官刚走出又旋即返回报告：“李大人，侦探紧急报告，成山角、金山寨等地都有倭船窥伺！”“倭兵到底要攻哪里？我手头兵力有限，而东路之荣成、成山等处皆威海后路，情形均属万紧，唯有就现有兵力，分布各个岛口！”李秉衡被日寇声东击西战术所迷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不由得喃喃自语：“丁军门忠勇为国，足智多谋，定有良策！”于是，李秉衡想起了去年11月3日巡视威海卫、刘公岛时与丁汝昌会见时的情景--丁汝昌知李秉衡大驾光临，特派右翼总兵兼旗舰“定远”管带刘步蟾前往迎接。

李秉衡站在“定远”号甲板上举目向东眺望，只见威海南北两岸青山巍峨，果如箕张之双臂逶迤东伸，又似两条苍龙跃入大海。刘公岛则像箕舌般横亘港前，堪称中流砥柱，紧守威海湾大门，形成巧夺天工的二龙戏珠之势，不由得啧啧称赞：“真不愧东隅异藩！怪不得有人咏叹：刘公天开海国雄，屹然威海护京城！”一行人不一时来到刘公岛前弃舟登岸，在刘步蟾引导下，行至刘公岛中部的北洋海军提督署前。李秉衡放眼观瞧，只见这座北洋海军司令部是典型的清式举架木砖结构建筑，座北朝南，依山傍海，高居危崖之上，下临深水大海，四周长墙环绕，飞甍房檐斜插云天。朱漆大门正中，高挂李鸿章亲题的“海军公所”匾。

李秉衡见北洋舰队虽遭丰岛、黄海海大战之败，但仍军容严整，士气高昂，便带着几分敬意询问：“丁军门，请问倭兵若攻山东，当先从哪里开门？”丁汝昌对此早有深思熟虑，很快以十足的绅士风度回答：“从各种情报判断，倭兵将派两万大军犯我威海，并首先从成山登岸！”李秉衡听罢微微

点头，若有所思：“戴宗骞戴道员也向我报告过他的看法：‘威海台坚炮利，敌由海口来犯，自难逞志，北岸虽绵长，南有烟台防兵，闻警可以援应，所虞者成山一带空虚，将来敌必由此，蹈瑕而入耳！’你们打算如何御敌？”丁汝昌神色更为严肃，有眼有板地向李秉衡汇报：“刚才我与众管带共商御敌对策，都认为北洋水师若远出接战，势力太单薄，倭兵舰队船多速度又快，我舰队容易顾此失彼，即使能击伤倭兵几艘战船，但倭兵联合舰队若派大批舰艇急驶而来，封锁住威海卫海口，则我舰船在外，进退无路，不免全失，威海卫亦很危险；若在口内株守，如两岸炮台有失，我船队亦将束手待毙，均不妥慎。因此，针对倭兵海路协同进攻的作战计划，制定了依辅炮台，以收夹击之效的防御方针。”丁汝昌讲到这里，对地位仅次于自己的刘步蟾说：“刘总兵，你把咱们商定的具体作战方针向李大人禀报一下！”正在侧耳倾听丁提督讲话的刘步蟾迟缓地将头一点，稳健地报告：“如果倭兵只令数船进犯威海卫，我军船艇将出口迎击；如倭兵船队大队全来，则我军船艇均令起锚出港，分布东西两口，在炮台炮线水雷之界，与炮台合力抵御，相机雕剿，以免敌船驶进口内；即使倭兵陆路包抄，南北两岸师船尚可支撑攻击彼船！”丁汝昌听刘步蟾禀报完毕，带着忧心忡忡的神情又作补充：“北洋水师采取这一海路夹击的防御方针，最担心倭兵从威海后路包抄。因为威海地阔兵单，陆路防御薄弱，请李大人大力加强后路兵力，并奏报李中堂采取有力措施。若后路果被倭兵包抄，北洋水师就惟有誓死拚战，船沉人尽的一条路了！”1月19日下午，宗方小太郎带汉奸商人刘雨田乘小舟偷偷爬上龙须岛，躲过清军哨兵，悄悄向落凤沟村窜去。远远听见前方鼓声咚咚，喊声震天，忙上前一看，宗方小太郎不由笑出了声。

原来，在落凤沟村东头的打谷场上，一营河防军正在进行操练。宗方小太郎知道一营清军编制500人，但悄悄一数，只有200人，一半粮饷就都被河防军统领阎德胜克扣了。

宗方小太郎看这营士兵的操练情形更加可笑：每个士兵手持长矛一杆，排成两队，随着旁边一个破鼓的鼓点，像跳大神一般舞动，简直如同儿戏。宗方小太郎瞪大眼睛到处寻觅河防营的枪支，找了半天也未找到一支快枪，只看到营官手中郑重其事地拿着旧式抬枪一支，此外再无任何御敌兵痞。

刘雨田在与士兵交谈中获悉，这些士兵一半是附近贫苦农民，一半是本地的地痞流氓，原打算到河防营混口饭吃，万没想到却被拉来当正式军队打仗。……正在此时，一片锣声震天价响个不停，河防营士兵听到锣响立刻大声欢呼，一窝蜂拥向饭场，风卷残云般就起餐来。

又见营官领着一群人扛着成捆的东西走进饭场，大声宣布：“弟兄们，听说快跟倭兵开战了，步枪没有领来一杆，倒领来了好几捆烟枪。弟兄们抽了过足瘾，再跟倭兵干仗--快来领烟枪！”河防营士兵听罢，又发出一阵欢呼之声，蜂拥而上，将成捆的烟枪拆捆分领到手，回到各驻兵房内，一人一杆烟枪吸将起来。

入夜，落凤沟村黑云滚滚，阴霾满天。只见一间间兵房内露出一盏盏吸食鸦片的灯光。

远远望去，宛如晴夜碧空的一片星光。

宗方小太郎鬼鬼祟祟地窜到清军兵营中窥探，见军官们在自己的单间里搂着当地“破鞋”吞云吐雾，浪语冲天。当兵的住的大房间里，正一人一杆烟枪在过烟瘾，直闹得一座兵营乌烟瘴气，乱七八糟，根本没有大敌当前的

备战平息！

宗方小太郎见此情景大喜，忙拉了刘雨田扭头就走。两人来到海边，在黑暗中找到停泊在隐蔽处的小舟，从舟中摸出做联络信号用的保险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点着火，再用红布将保险灯蒙上结牢，用力在空中挥舞，但海上却毫无反应，宗方小太郎正要大发雷霆，刘雨田小声提醒道：“宗方君，先遣舰不足凌晨四时才来吗？”宗方小太郎听了恍然大悟，只好耐心地在严寒中缩头等待。好不容易等到黎明时分，茫茫大海上有几盏红灯闪烁，宗方小太郎喜出望外地手举红灯联络，俄顷小声欢叫：“我们的先遣舰来了！”此时天尚未明，荣成湾由阴转清，残月斜照，一片朦胧。

由巡洋舰“八重山”和三艘炮舰“爱岩”、“摩耶”、“盘城”组成的先遣舰，先期到达荣成湾外。

侵华日寇第二军参谋根津一在巡洋舰“八重山”号上用红灯与岸上取得联系后，立刻命令开动三艘汽艇，拖带9条舢板，满载日本士兵向岸边摸来。

此时，贫苦出身的营官周荣发正带5名河防营士兵巡逻至此，见气扬着太阳旗的三艘汽艇正拖着许多舢板满载日军向岸边冲来，便怒目圆睁，大叫一声：“不好，倭兵来了！--王长发，快去报信，其余人跟我向倭兵开炮！”周荣发吩咐完毕，立即带人跑步来到岸边小炮台旁，熟练地开动两磅小钢炮，向敌舰猛烈轰击。炮弹吐着通红的火舌呼啸飞出，一弹正中敌兵舢板，立时艇翻板飞，几十名日兵纷纷落水，另两艘汽艇见事不好，急忙转过艇头匆匆而逃。

根津一在巡洋舰“八重山”号舰桥上看得真切，立即向第二、三游击队发出进攻信号。刹时间，十余艘日舰同时驶向岸边，向岸上清军守军猛烈轰击。

周荣发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并不惊慌，亲自操炮奋勇还击，忽听王长发回来报告：“那些当官的还在单间里抽大烟，根本不理我。突然一发炮弹打中他们抽大烟的房间，烧起冲天大火，当官的领头仓皇逃走，几百名弟兄也跟着逃跑了！”此时，十余艘日舰一起向落凤沟村猛烈轰击，清军士兵伤亡惨重。周荣发杀红了双眼，操纵小钢炮连续发射，使敌舰前进一米都困难重重。

王长发看阵地上所剩士兵寥寥无几，死命拉着周荣发撤了下去。成山头始皇庙两棚玃军也从山北平西撤而去。

侵华日寇被周荣发的小钢炮吓破了胆，虽听不到落凤沟的枪声了，但仍不敢贸然登陆，胡乱发炮两个多小时，根津一看毫无还击动静，才命日军在龙须岛登陆，随即在万顺渔行建立了临时指挥部，一面巩固滩头阵地，一面派先锋部队西进，不战而夺取荣成县城。

1月23日，大山严到达荣成湾，屁股还未坐稳就接到了大本营转来的两份电报，原来是玄洋社女浪人阿菊从天津搞到的清政府给李鸿章的两个紧急指示，大山严急忙打开第一封电报读道：“刻下敌已登岸，必将猛扑威海。……闻敌人载兵皆系商船，而以兵船护之，若将“定远”等船齐出冲击，必可毁其多船，断其退路，此亦救急之一策。

著李鸿章速筹调度为要。

“报告司令官，我师团发生流行性感冒，病倒士兵两三千人，对部队作战行动有重大影响！”大山严正为清军将出动陆海军部队大举反攻的情报伤透了脑筋，第二师团长佐久间左马太的报告更使他心烦意乱，这位“山东作

战军"最高指挥官连理也不理佐久间，继续看清政府给李鸿章的第二个批示：现在贼踪逼近南岸，其兵船多只，难保不闯入口内，冀呈水陆夹击之诡谋。我舰虽少，而铁甲坚利，则为彼所无，与其坐守待敌，莫若乘间出去，断贼归路。

大山严顿有泰山压顶之感，但并不形诸于色，迟缓地站起身来，正要踱步沉思。根津一又递给他刚接到的丁汝昌的请战报告：与其安坐以等围攻，曷右僭师而起，迎头痛击！

大山严看罢，又有雪上加霜之感，看到佐久间左马太还笔挺地站立一旁，又将思绪抽回，恶狠狠地向佐久间吩咐道：“你在龙须岛和荣成县城西南角建两个‘随军医院’，凡不能冲锋陷阵的病号，一律送医院烧尸焚化。本司令官估计清军要在这里进行反击，在荣成必有一场恶战！”“司令官，那样处理流行性感冒病号，会使皇军内部人心惶惶，严重削弱战斗力！”大山严勃然大怒，根根胡子冲天而抖：“恶战在即，不这样就会全军覆没！--走，快去布置修建‘医院’事宜，再随我立即赶往荣成县城！”大山严率大军在荣成严阵以待，但使他奇怪的是两天来清军竟毫无踪影，他悬在半空的心才落了下來，随即传令，兵分两路，以第六、第二师团分任左右纵队，从背后猛扑威海，并请伊东佑亨派舰只从正面进攻，水陆三军，疯狂进逼威海卫！

当时驻山东半岛的清军有40营2万多人，但“大小二李”李鸿章、李秉衡一心只想与日本进行和谈，并不认真研究战守之策，未调大军反击，只命总兵孙万林率1200人前去迎敌。

这孙万林身材不高，其貌不扬，但却忠肝义胆，精明能干，绰号“孙滚子”，是当时山东著名的“敢战之将”。他受命于危难之际，立即率军踏雪东进，在羊亭遇到从荣成溃退而来的阎德胜，绥军首领刘澍德也奉戴宗騫之命率两营人马前来助战。三股清军兵合一处，由孙万林统一指挥。

1月22日，孙万林率部行进到距威海东25公里的桥头五尚地时，只见几十个农民飞跑而来，为首的膀大腰粗的小伙子上前躬身施礼：“孙将军，我们是威海附近几个村里的农民，我叫丛蔼亭，得到日寇第二师团正向这里进犯的消息，特来报告！”孙万林听完禀报，激动得上前拉住小丛的手使劲摇晃：“谢谢乡亲们，你们真是大清的忠义臣民！”丛蔼亭精神抖擞地表达成千上万威海人民的抗敌救国之志说：“我们威海村民，为保家卫国，提出了倭兵‘进村就赶，进家就打’的战斗口号。没有武器，决心用民间武术，使铡刀、木棍、铁锨、镢头打击倭兵。威海周围几百个村的乡民，都愿听从孙将军指挥！”“孙滚子”激动得热泪盈眶，怀着满腔忠义肝胆向威海父老乡亲发誓：“有我孙滚子在，就不让倭兵在山东横行霸道，不让乡亲们受禽兽们欺压蹂躏！”孙万林又回头与阎德胜、刘澍德商量道：“两位将军，是否就按我们刚才研究的作战方案，我率部正面进攻，阎将军背后包抄，刘将军相机支援，在白马河畔与倭兵决一雌雄？”“喳！”1月25日傍晚7时，孙万林在白马河畔的东豆山、观里村一带设下了打击日寇的埋伏网，丛蔼云自报奋勇充当诱敌入网的尖兵。

日寇第二师团长佐久间左马太率左纵队沿荣成至烟台大道，经埠柳窜至白马河东岸的姚家圈村，见村中寂静异常，因该师团几百名病号在“随军医院”被焚毁，兵力有所削弱，因而行动格外小心，不敢贸然进村，就派绰号“栓板柱子”的汉奸带一个骑兵中队进村侦察。

“栓板柱子”是个开大烟馆的毒品商人，早就因勾结日本毒品贩子贩卖”

红土”而大发起财。这次跟宗方小太郎窜回荣成，更死心塌地投靠侵略者当了翻译官。

“栓板柱子”领日本鬼子摸进姚家圈村一看，家家户户闭门不出，只有丛蔼云装作匆忙逃跑的样子在侵略者前面不远处一闪而过。鬼子中队长龟田哪里肯轻轻放过，马上派人把丛蔼云抓来，叽哩咕噜地向他高声吆喝，丛蔼云极力装出胆小怕事的样子，吓得浑身发抖。

“栓板柱子”横眉怒目吼道：“皇军问你，村里有官兵吗？”“不知道。……没有。……”丛蔼云故意支吾其辞，一问三不知。

鬼子中队长龟田火起，挥起明晃晃的指挥刀在丛蔼云头上嗖嗖挥动，厉声喝道：“你的说实话！”丛蔼云假装害怕，咕咚一声跪在地上，抱住“栓板柱子”拖着哭腔哀求道：“压根没看见官军，快救我的小命！”“栓板柱子”对龟田一讲，龟田狡猾地用指挥刀向丛蔼云胸前一挑，小丛胸前的棉衣立时全被割开，胸脯上被拉开一道口子，鲜血直流，小丛痛得哇哇直叫，“栓板柱子”得意地“开导”说：“要活命，就给皇军带路！”丛蔼云装出万般无奈的样子，忍痛用双手掩上棉袄，随手找来绳子在腰间一系，领着日寇第二师第三旅团人马，向姚家圈村里摸去。

时值农历除夕夜晚，姚家圈村在日寇入侵淫威下，顿改往昔欢声笑语、鞭炮齐鸣的热闹节日景象，呈现出一片漆黑恐怖的气氛。

孙万林在夜幕笼罩下，把嵩武左营及福字三队的爱国士兵巧妙部署在白马河岸边和村中的民房及临时工事里，严阵以待，把一支支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侵略者来犯的必经之路。

日寇第三旅团长山口素臣狡诈异常，突然命令部属大开行军探照灯，企图利用夜暗中突然明灯顿开造成的强烈威慑效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猛烈进攻。

孙万林手下多是刚招募来的新兵，手中拿的又是旧土枪和老前膛来福枪，一时被日寇的灯光战术弄慌了神儿，眼睛被强光照得奇痛难耐，无法瞄准射击，纷纷大叫：“不好，倭兵厉害！”孙万林蹭地一声纵身而起，朗声鼓舞士气：“弟兄们，洋鬼子不可怕，利用倭兵的灯光，打他个措手不及！”孙万林喊着，首先在临地工事掩护下，巧妙利用日寇的行军探照灯光，奋不顾身地开枪连续射去。枪声响处，日本鬼子一个个应声倒地。众士兵见主将镇静地把几个入侵者撂翻在地，也纷纷开枪还击，刚才的慌乱情绪一扫而光。与此同时，小钢炮“愤怒发言”，一颗颗炮弹在鬼子群中开花爆炸，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寸步难进。

威海村民在丛蔼云带领下纷纷参战：有的拉炮送弹，有的冲上去和侵略者打在了一起。

丛蔼云施展一身武艺，赤手空拳和一群鬼子搏斗，使侵略者寸步难行。他全身被砍伤13处，鲜血直流，远远看去成了一个血人，但仍怀着保家卫国的豪情壮志，越战越勇。孙万林看在眼里，朗声大叫：“丛蔼云，好样的！——别赤手空拳，夺倭兵的刀枪！”丛蔼云在酣战中听到“孙滚子”的提醒，瞪圆虎眼，大吼一声，飞起一脚将一个矮个儿鬼子踢翻在地，伸手顺势夺过日本兵手中的步枪，又狠狠用刺刀刺进侵略者的胸膛。

一个鬼子小队长乘丛蔼云拔刺刀之机，挥动长柄武士刀恶狠狠地朝丛蔼云背后劈来，武艺高强的小丛早已听到背后动静，便松开紧握枪托的双手纵身一跃，跳到鬼子小队长身旁，飞起一脚将鬼子小队长踢倒尘埃，又一脚

踢在鬼子小队长的手腕子上，痛得鬼子小队队长哇哇直叫，长柄武士刀飞到空中，小丛轻伸右手稳稳接住，顺势砍出，立刻把这个鬼子小队队长送上了西天！日本侵略者见这个中国人如此厉害，吓得纷纷撒腿而逃！孙万林欢欣鼓舞地激励众将士：“弟兄们，好样的！你们虽是新兵，武器又差，但都死命拚战，创造了以少胜多的辉煌战绩！有力地证明，大清军队能打败日本侵略者！”众将士军心大振，齐声高呼：“跟着孙将军，打败日本兵！”“报告，绥军派人来见孙将军！”“孙滚子”正要命部属赶修工事，突然听到刘澍德差人来见的报告，急忙问所差骑兵：“刘将军有何见教？”“接到戴道员命令，刘将军已带两营绥军撤走！”孙万林闻听此报大吃一惊，厉声斥责：“正与倭兵激战，刘将军为何突然从火线上撤走？”“刘将军说他奉命行事，身不由己，望孙将军好自珍重，还说……”“还说什么？”“还说阎德胜早已溜之大吉，连气也不放一声。刘将军派人前来报告，算是好的了！”孙万林仰天长叹，正要重新部署兵力，忽听村对岸响起激烈的枪声，立刻就有几发炮弹在阵地上爆炸，几个可爱的士兵顿时毙命。

原来，日寇第二师团长佐久间左马太见山口素臣败下阵来，勃然大怒，立刻带领该师团主力部队，一路枪炮齐放，气势汹汹地冲杀过来。

孙万林立即挥军与日寇激战，但终因寡不敌众，不得不向羊亭集退去。

白马河战斗后，日寇根据日本浪人提供的威海卫军事地形图，猖狂地分左右纵队，以两个师的兵力向威海卫展开总攻。

1月30日拂晓，日寇第十一旅团长大寺安纯在宗方小太郎引导下，率军来到威海南部炮台的重要关隘摩天岭前。

身穿笔挺少将军服的大寺安纯，是日本陆军中与乃木希典齐名的凶狠死硬派猛将，此时骄横地对宗方小太郎启发称赞之辞：“宗方君，自荣成登陆以来，皇军势如破竹，勇不可挡！”

多亏你几次深入威海卫侦察之功，你们浪人画的地图太准确了！”宗方小太郎听到少将旅团长的夸奖话，得意地把曲襟蓝绸獭袖狐皮大衣一挺，将裘皮高帽一扬吹牛道：“我极力主张先攻摩天岭，因为它是威海南邦炮台的制高点。攻下摩天岭，南邦炮台就会土崩瓦解！”

清军将领多为平庸之辈，直到最近才开始在摩天岭修筑炮台。我前几天去那里侦察时，看到正在用夯打土围墙，现在肯定还未完工，我们突然发起猛攻，一定打它个措手不及！”大寺安纯对宗方小太郎奉若神明，迅即在朦胧拂晓中催动日军，悄悄向摩天岭上爬来。

此时，威海玁军新右营营官周家恩正带领爱国士兵严阵以待。

原来，日寇侵犯山东前，周家恩在威海卫城南15里之长峰村训练新兵，战事吃紧时才把他紧急调来监修摩天岭炮台。

周家恩是个有强烈爱国心的硬骨头大汉。他见摩天岭扼威海咽喉，却无坚固炮台，便带全营士兵和附近村民，昼夜奋战在岭顶平坦处赶修临时性炮台：用夯在炮台周围打起一道厚厚的圆形围墙，每隔十几步留一垛口，再于围墙外挖深沟一道，砍来大树树头堆积沟外作为鹿砦，又在深沟和鹿砦间遍布地雷。近几天，周家恩把士兵分作两班，一班赶修工事，一班在炮台上架起8门行营炮操炮训练。两班轮流作业，抓紧备战。

1月30日拂晓，周家恩正带亲兵沿炮台巡警，突然从摩天岭下小路奔来一个农村青年。周家恩见其如此匆忙，便迎上去喝问：“站住，干什么的？”“我叫‘飞毛腿’，要见周营官，有紧急军情！”“我便是周营官，有何

紧急军情？”“一旅团倭兵正偷偷摸上摩天岭，周营官快快调兵准备打这些狗日的！”周家恩顺首“飞毛腿”手指的方向朝东一看，果见九家疃一带全是日本兵，正密密麻麻向摩天岭南坡上爬，立即命令亲兵唤起全营士兵，各就各位，做好了迎敌准备。

周家恩亲自操起一门8公分行营炮，怒瞪虎目严阵以待。

在日寇爬到距山顶几十米处时，他猛开一炮，炮弹呼啸着愤怒地飞向半山腰的敌军群中猛烈爆炸。士兵们见营官开炮中敌，也纷纷开枪开炮。半山腰的日寇遭到突然攻击，惊惶失措，死者像石头一样滚下山去，活的也被打得屁滚尿流，连滚带爬地退下山去。

大寺安纯见偷袭不成反蚀把米，便命令开动该旅团所有山炮，对摩天岭猛轰。躲在皂埠东山外面海上的日本联合舰队舰只也偷偷钻出来，开动舰炮向摩天岭炮台轰击。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大寺安纯催逼日本兵蜂拥冲击。

面对强敌的进攻，周家恩熟练地开炮轰击，8门行营炮随即一起开火，8条火龙呼啸着扑向敌人，一颗颗炸弹在日寇群中爆炸，一个个侵略者被炸得血肉横飞。周家恩看山坡上遗尸累累，精神抖擞地鼓舞部属道：“弟兄们，你们不怕死，打得顽强，真是好样的！坚持打到底，准能赶走东洋鬼子！”玠军新右营士兵越战越勇，日本侵略者被风卷残云般赶下山坡。

日寇第十一旅团长大寺安纯兽性大发，挥动大刀逼迫1000名士兵用人海战术硬往上冲，好不容易爬上鹿砦，就马上传来惊天动地的巨响，摩天岭阵地上浓烟四起，顷刻间200多个日本侵略者几乎全部丧生。原来日寇进入雷区引起连环爆炸死伤惨重，一个入侵者后来在日本中曾对此战作过真实记述：“日军立即进逼垒下，敌发大炮防战，日军亦乱放山炮应战。大战正酣时，山动谷鸣，地轴为倾。敌兵在垒下预伏地雷，日兵误踩其上，爆燃而炸，黑烟冲天，日兵势稍沮。”大寺安纯像一头激怒的恶虎暴跳如雷，扯着尖嗓子下令：“大炮一起开火，先把摩天岭炸个稀巴烂，再用预备队冲击！”刹时间，日寇的陆海军武器一起对准摩天岭猛烈轰击，山岭上立时黑烟滚滚，遮天蔽日。清军的简易炮台一座座被毁，围墙一段段倒塌，士兵们非死即伤，周家恩也身中数弹负了重伤。

在危难关头，周家恩和负伤战士强忍伤痛，在枪林弹雨中奋勇开枪开炮，毫不退缩，再次把日寇打下山去。

周家恩和众士兵还未来得及包扎伤口，又一股日寇冲上炮台，周家恩圆睁虎目大吼一声：“弟兄们，上，拚掉老命也要把鬼子赶回去！”周家恩喊着，端着刺刀第一个冲了上去，照准一个手拿军用地图，正在指手划脚的鬼子小队长的胸膛刺去。由于用力过猛，一下捅了个穿膛葫芦，刺刀怎么也拔不出来。恰在此时，又一个高人儿鬼子乘机从背后偷袭过来，周家恩听得背后有风声，知有敌人来袭，并不着急慌乱，等大高个儿鬼子冲到身边时，才突然转身，紧紧抱住大高个儿鬼子，用尽平生之力向炮台外甩去，大高个儿鬼子像死狗般滚下出去，当场毙命。玠军士兵见状大声欢呼：“周营官，好样的！”周家恩和仅存的几十名士兵以顽强的意志和大无畏精神，再次打退了日寇的又一次进攻，还未顾得上喘口气，大寺安纯又指挥日寇展开再次进攻。

在密集的炮火轰击中，在又一次肉搏战中，周家恩手下士兵全部壮烈殉国，他腿部受伤不能行走，但还是咬牙爬着操炮还击，此时日寇一颗罪恶的炸弹飞来猛烈爆炸，弹片击中他腹部，肠子露出腹外，但周家恩毫不气馁，

以惊人的毅力向威海方向爬去，爬了十余华里，终因流血过多而光荣牺牲！

大寺安纯见摩天岭上寂无人声，忙命炮兵疯狂轰击，但日本侵略者慑于周家恩一营壮士的声威，仍不敢贸然登台，后来确信炮台上已无任何清国士兵后，才心惊肉跳地登上摩天岭。

大寺安纯拿下摩天岭后得意忘形，亲自打着太阳旗，请日本《二六新报》随军记者远藤为其拍照志功留念，不料被前来助战的北洋舰队“来远”舰将士看见，丁汝昌亲自下令照准摩天岭上的太阳旗连发几炮，一块弹片击中大寺安纯胸部将这个日寇少将和记者远藤都送上了西天！

日寇在摩天岭失去一少将旅团长后，恼羞成怒，立即在摩天岭上架起大炮，掩护混成第十二旅团向杨枫岭炮台发动进攻。

杨枫岭守军一个营在副将陈万清指挥下士气高昂，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毫无惧色，从上午8时期激战3小时，打退了日寇的一次次进攻。

多年跟随陈万清的侄子陈广生被日寇的嚣张气焰吓破了胆；在隆隆的炮声中向陈万清献计：“叔叔，倭兵势力太大，我们还是逃走为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陈万清闻听勃然大怒，决定以大义灭亲的行动鼓舞士气，便装作愿意听取意见的样子说：“别大声嚷，你近前慢慢说！”陈广生不知是计，洋洋自得地上前正要陈说投降计划，陈万清猛然抽出佩剑大吼一声，一剑将侄儿的脑袋砍了下来，众人见状大惊，正要询问原委，只见陈万清举剑朗声宣布：“陈广生妄图劝我逃跑，已被我阵前处决！目下大敌当前，你我同为大清将士，只有誓死保家卫国，若再有言逃言降者，立斩不饶！”“愿跟陈将军，誓死守住杨风岭！”陈万清大义灭亲、嫉恶如仇的爱国精神使全营士卒备受感动，更勇敢地以高昂的抗敌热情投入战斗。

日寇第十二旅团长长谷川好道求功心切，催动日军在密集火力掩护下轮番进攻。

陈万清身先士卒向强敌冲杀不止，众兵丁斗志昂扬，打退敌人一次次进攻。双方激战3小时之久，杨风岭炮台仍岿然不动。

宗方小太郎见他搞的摩天岭炮台情报很不准确，致使堂堂日军少将大寺安纯毙命于此，甚觉脸上无光。他见长谷川好道久攻杨风岭炮台不克，便向长谷川献计：“少将阁下，杨枫岭炮台坚固难攻，守将又狡猾刁顽，不宜硬攻。我有一计，可不伤士兵又大获全胜！”长谷川好道虽因老友大寺安纯之死对宗方小太郎耿耿于怀，但抓不住宗方小太郎的把柄，又处于久攻杨枫岭炮台不克的困难形势之下，只得将信将疑地问道：“宗方君有何妙计？不妨讲来！”“杨枫岭炮台虽坚，但却孤立无援，炮火又弱，不如发挥我军火力强的优势，对杨枫岭采取长时间炮火轰击战术，把这个炮台轰成粉末。到时不攻自破，岂不快哉？”长谷川好道听罢大喜，马上下令：“全旅团炮兵注意，一齐开火，轰击杨枫岭半小时！”长谷川一声令下，日寇第十二旅团全部炮火对准杨枫岭一起猛轰，日本联合舰队战舰也对该炮台狂轰滥炸。杨枫岭上，马上黑烟滚滚，遮天蔽日，一棵棵大树连根拔起，树枝野草熊熊燃烧，弹药库被击中起火猛烈爆炸。

陈万清率军誓死奋战，死伤大半，眼看日寇蝗虫般漫山遍野而来，陈万清气红了眼，还要死战，却被手下士卒拖着撤出杨枫岭炮台。……日寇攻下南邦陆路炮台后，长谷川好道当即传：“冲原光孚大校，立即带步兵第十三联队进攻龙庙嘴炮台！”“是！”冲原光孚虽满口答应，但却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坐在长谷川身旁的宗方小太郎，脚下不挪动一步。

长谷川将此情景看在眼里，笑着对冲原光孚说：“你是想请宗方君去助战吗？”“师团长高见！”“宗方君，那就请你跟冲原大校辛苦一趟？”“正合吾意！”宗方小太郎欣然答应。

在从摩天岭前往龙庙嘴炮台途中，冲原光孚与宗方小太郎并马而行，冲原心事重重地问道：“威海南邦海岸的龙庙嘴、鹿角嘴、皂埠嘴三炮台对日本人并不陌生。早在明朝时代，日本探险者（被中国人称为倭寇）就吃尽这三炮台的苦头。经过后来的多年修建，想必更加固若金汤，不知宗方君有何破敌妙计？”宗方小太郎得意地将瘦猴头一扬，以神秘莫测的语气说道：“这三座炮台确实是铜墙铁壁，从正面硬攻，一定会被碰得头破血流，但若了解了它们的奥秘，攻起来就易如反掌了！”“宗方君多次深入威海侦察，对其奥秘想必了如指掌，我请宗方君助战算请对了神仙！请问宗方先生，这三炮台的奥秘何在？”宗方小太郎将曲襟蓝绸獭袖狐皮大衣一紧，小声说道：“这三个炮台有三个弱点，正好被我利用。第一个弱点是对内防御力太差，德国人汉纳根设计三炮台时就包藏祸心，让它们只能顾及海上，不能兼顾后路！汉纳根在酒席桌上偷偷向我泄露过‘天机’；第二个弱点是皂埠嘴炮台无法顾及东南海面；第三个弱点是龙庙嘴炮台深居港内，对防守威海毫无作用，对我军攻击威海则是无价之宝！”“真是天照大神保佑，宗方君的后路包抄战术真真高明！”宗方小太郎在马上扬鞭纵声大笑，突然又将笑声戛然而止，故作庄重地说：“帮助大日本帝国打败清国的，不是天照大神，而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谁？”冲原光孚大感意外，吃惊地问。

“北洋大臣李鸿章！”“李鸿章？别开玩笑，堂堂清国北洋大臣，他能帮助日本？”“那当然！他不但在战略上推行妥协投降路线，而且还将直接帮助大校阁下攻占威海南邦海岸三炮台！”宗方小太郎这番话把冲原光孚抛到了五里雾中，冲原光孚眨巴着三角眼问道：“帮我打炮台？太好了！请道其详！”于是，宗方小太郎把玄洋社所获情报提供给冲原光孚：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见龙庙嘴炮台被划在皂埠村至海埠村长达15华里的长墙之外，仅有40人防守，又无短炮长枪护卫，以为“倭若由后路抄来，此台即为前敌，该台毫无希望；敌若由长墙抄来，亦必失”，便主张放弃此炮台，但李鸿章的亲信戴宗骞、刘超佩借此诬告丁汝昌怯战，李鸿章大骂“丁（汝昌）系戴罪图功之员，乃胆小张皇如是，无能之极！”这样，龙庙嘴炮台才得以保存下来。

1月30日上午，冲原光孚和宗方小太郎催军来到龙庙嘴炮台前几千米处，立即架起大炮向该炮台展开猛烈轰击，然后派步兵在炮火掩护下进攻炮台。清军40名守台炮兵奋勇还击，毙伤日寇多人，但因负责指挥防守海岸炮台的总兵刘超佩听到枪声就逃之夭夭，40名壮士得不到支援，全部壮烈牺牲。

冲原光孚一拿下龙庙嘴炮台，就马上将该炮台大炮掉转炮口，对鹿角嘴炮台集中轰击，在强大火力掩护下，派出优势兵力转眼间攻下了鹿角嘴炮台。

冲原光孚连续拿下两个海岸炮台有点儿得意忘形了，正和宗方小太郎举杯祝贺，万万没有想到邵景伦等清军负伤士兵突然从龙庙嘴炮台洞里冲出，挥刀砍翻了几个日本兵。冲原光孚大惊，以为清军从天而降，吓得扭头就跑。倒是宗方小太郎有点儿武士道精神，知道这里清兵不多，便拔枪逼着日本兵还击，邵景伦等负伤士兵见寡不敌众，才沉着地安全撤出龙庙嘴炮台。

与此同时，右翼之敌开始进攻皂埠嘴的卫星小城百尺崖所。营官何大勋率众打退日寇多次冲锋，与多如牛毛的侵略者展开激烈巷战，后众寡悬殊，被迫退向右营盘与张友志营会合。又在小石桥旁与敌激战，何大勋、张友志光荣牺牲。日寇冲过小石桥又对百尺崖所城北的小炮台发起进攻，原守官鲍义璧早已逃跑，众士兵在徐哨官指挥下奋勇还击，全部壮烈殉国。

此时，皂埠嘴即“秃子头”炮台处于日寇水陆夹攻之下，炮台守军开动5门大炮勇猛还击，强大火力压得敌人近前不得，日寇第六师团长黑木为桢气得暴跳如雷：“长谷川，限你半小时之内拿下皂埠嘴炮台！”“哈依！”日寇第十二旅团长长谷川好道迟疑地领命，“请宗方先生助我一臂之力！”宗方小太郎笑而不答，提其中国狼毫毛笔刷刷修书一封，给身边的汉奸“栓板柱子”“快快送给联合舰队伊东司令官！”日寇第十二旅团长长谷川好道欲问究竟，宗方小太郎狡黠地一笑置之：“请旅团长尽快发兵，宗方保你马到成功！”长谷川好道顿时凶焰万丈，催动第十二旅团向皂埠嘴炮台发起猛攻，林营官带领一营儿郎操炮还击，密集火力压得长谷川好道抬不起头来。

长谷川好道正在气恼之际，忽听附近海面上传来隆隆的炮声，忙循声看去，发现日本联合舰队几艘战舰钻了炮台东角叫作“爪子沟”或“东山”的高地比炮台高的空子，隐蔽在“东山”嘴附近海面，冷不防钻出来向皂埠嘴炮台开几炮，开完炮又躲到“东山”后面的海湾里藏了起来。

守皂埠嘴炮台的林营官气愤地骂道：“这准是汉纳根设计炮台时搞的鬼，李中堂相信洋人，洋人坑害中国人！”林营官气愤地骂着，脑中暗想：“难道就没有办法对付这些洋鬼子吗？”他突然灵机一动：“奶奶的，我先把炮瞄准你们出没的海面，一露头就打你们这些王八蛋！”于是，林营官亲自操起一门28公分口径大炮，根据他掌握的日舰活动规律，将大炮瞄准方位严阵以待，突然，一艘日本炮艇又窜出捣乱，还没等它停稳，林营官就亲自发炮攻击，一弹正中日本炮艇甲板，立时爆炸起火，转眼间沉入海中。清军守台官兵大喜，都设法沉着机智地打击顽敌。

长谷川好道见这股清军打得如此顽强，兽性大发，命令该旅团大炮更猛烈轰击，又催逼日兵蜂拥而上。林营官毫无惧色，指挥炮手奋勇还击。一个炮手倒下了，又一个炮手顶上来，最后全部壮烈殉国。

日本侵略者猖狂地登上皂埠嘴炮台，鬼子小队长手举太阳旗正要升起，突然一声巨响，炮台顿时被炸得土崩瓦解，十几个鬼子被炸飞空中，和石头瓦块一起落入海里。

在威海卫港外观战的英法等国海军官兵被惊得目瞪口呆，以消息灵通自诩的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忙向各国舰队司令解释：“这是丁汝昌派出的鱼雷艇敢死队干的！”他知道皂埠嘴炮台落入日本人手中，对守卫刘公岛十分不利，就派鱼雷艇敢死队埋伏在皂埠嘴炮台之下。炮台一失守，清军敢死队立即引火爆炸。我看得最清楚了，大炮一响，巨石马上盘空而下，落在鱼雷艇停泊处，动作稍一迟疑，就人艇皆碎了！”美、法海军军官也纷纷举起大拇指啧啧异口同声称赞：“清国士兵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真让人望而生畏！”与此同时，日寇在左纵队一猛攻虎口山，绥军分统戴宗骞就不战而逃，幸亏陈万清领头奋战突围，才粉碎了日寇全歼威海南岸驻军的企图，但南岸炮台全部落入日寇手中。对此全然不知的戴宗骞一站住脚跟，又喋喋不休地将牛皮吹破了天：“倭兵的鬼蜮伎俩，本统领早经洞烛，倘仍妄思逞动窃发，必令倭兵堕入我布的天罗地网之中，歼除净尽！”他手下营官秦得

章知其为人贪阴险，敢于狠心克扣军饷，竟明目张胆地规定新兵入伍后要克扣3个月军饷。士兵们对戴宗骞恨之入骨，公开称他“活剥皮”。更可恨的是戴宗骞故意把绥军营房与妓院隔邻而设，怂恿手下官兵窝娼聚赌，他和妓院老板勾结大发横财。听到日寇进攻风声渐紧，早就让儿子把北邦炮台的8000两存银偷偷运往烟台，据为己有，自己也时刻准备逃跑。

秦得章见戴宗骞大肆吹牛，成心要看他的笑话，便故意大声报告：“戴大人，倭寇贞爱亲王已率第四旅团向威海西路进攻！”“什么？倭兵来了？”戴宗骞吓得差点没从安乐椅上摔将下来，心惊肉跳地下令：“传。……传我的命令，让孙万林誓死顶住！”“喳！我们这里早就‘十额丘兵缺’，如何御敌？”“让随营木工穿土号衣顶数，你再去抓壮丁！”2月1日凌晨，贞爱亲王指挥日寇第四旅团向孙家滩大举进攻。

孙万林怀着与日寇决一死战的雄心壮志，把阵地设在双岛河河堤附近的树丛里，利用树丛的掩护严阵以待。

此时，纷纷扬扬下起鹅毛大雪，刚才还像亮如明镜的双岛河面，不一会儿就银装素裹，与威海大地白成一片。风雪中，日本侵略者妄图利用风雪扑面时容易疏忽的机会，打清兵个措手不及，但侵略者一踏上双岛河，即纷纷脚下溜滑摔倒在河床之上。贞爱亲王在后持刀催逼，日寇只得爬在河床上匍匐前进。

孙万林看得真切，待日寇爬到双岛河正中时，突然以洪亮的嗓音传令：“弟兄们，开火！”孙万林一声令下，将士们纷纷在树丛掩护下开枪开炮，把鬼子打了个措手不及，一个个扭头就跑，忘了脚下是光滑如镜的河冰，纷纷重重摔倒在河冰之上，鬼哭狼嚎，不是被打死，就是摔伤。孙万林一炮打来，河面被炸开一个大口子，不少鬼子被掀进河中活活冻死。

刚一交手，日寇便被打得狼狈不堪！

第十二旅团长贞爱亲王是裕仁天皇之弟，由于在侵华战争中极为卖命而列大正六亲王之首。此时，觉得打败仗有失皇族尊严，立刻大发雷霆之怒，挥起指挥刀哇哇叫着连着砍翻两个后退士兵，逼着日寇以密集的队形冲过江来。

孙万林率士卒越战越勇，在树丛掩护下巧妙轰击，将日寇一片连一片击倒在地。不一会儿，侵略者的血便把双岛河面染红了。日本士兵吓得魂飞天外，纷纷向后逃跑。

贞爱亲王万般无奈，忽然心生一计，命部属绕到侧后攻击孙万林，又被久候多时的李楹所部打得狼狈不堪。正在黔驴技穷之际，宗方小太郎以惊喜的神情报告：“旅团长，翼侧的清军突然率部退走”！

“什么？清兵退走了？”贞爱亲王大喜过望，立即指挥日军从翼侧包抄而来。孙万林见状垂足顿胸，仰天长叹：“都怪我有妇人之忍，没及时杀掉闫德胜，铸成大错，悔之晚矣！”原来，孙万林早在1月29日就接到山东巡抚李秉衡要他将闫德胜就地正法的命令，但他担心处决闫德胜影响五营河防军士气而未下手，希望闫德胜能戴罪之功，没想到闫德胜毫无爱国之心，在关键时刻又临阵脱逃。……孙万林悔恨交加，誓死孤军奋战，但终因众寡悬殊，不得不撤往旧馆隆福寺，亲自用佩刀将这个民族败类处决！

戴宗骞的六营绥军得知日寇越过双岛河来攻威海的消息，纷纷逃散，只剩下他一个光杆司令，使日寇不战而夺取了威海北邦炮台！戴宗骞畏罪吞鸦片自杀。

2月1日上午，凛冽刺骨的寒风狠命狂吹，大海上波浪滔天，漆黑一团。不一会儿，又纷纷扬扬下起大雪，威海卫冰冻天寒，令人不寒而栗。

日本联合舰队40多艘战舰和观战的英美法德等国军舰都躲到荣成湾避风，美丽的天然良港荣成湾顿时成了外国军舰霸占的避风港。

在气扬着太阳旗的日本联合舰队旗舰“松岛”号会客室里，日寇“山东作战军”司令官大山严、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佑亨、浪人间谍宗方小太郎正以丰盛的酒宴，热情招待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

大山严一手捋着飘洒在胸前的银白长须，一手举起高雅的精致酒杯致意：“尊敬的斐利曼特司令官，承蒙不辞万里来此观战，不知有何见教？”斐利曼特以高雅的绅士风度软中带硬地侃侃而谈：“有机会旁观日清大战，真是幸运之极！大日本皇军勇猛善战，开战以来连败清军，目前又完成了对威海卫的水陆包围，确实可敬可贺，但丁汝昌乃当今杰出战将，北洋舰队仍实力可观，‘定远’，‘靖远’等铁甲巨舰不可轻视。贵军若从下面进攻，恐怕也不那么容易高奏凯歌吧？”伊东佑亨对精明狡猾的英国远东舰队司令微微一笑道：“斐利曼特司令官不愧当今世界著名海将，对日清战争的分析可谓鞭辟入理，今天请你到此一聚，除顺致敬意外，还有一事相求！”“日英两国早就是友好之邦，有事但讲无妨，不必客气！”“我与大山司令官修好一封以我的名义写给丁汝昌的劝降信，想烦贵司令官亲自送到丁汝昌的手中！”斐利曼特听罢紧皱双眉，脑子在飞快地旋转，俄顷，双眉一松，纵声大笑：“这真是上帝的安排，本司令官愿意效劳！两位司令官此举，可谓一箭三雕！”这倒要请教了！”伊东佑亨极感兴趣地问道。

“送劝降书一可瓦解敌军士气，二可窥探威海卫军情，三可在清军内部挑起事端。但我可以肯定地说，你们劝降丁汝昌必将以失败告终！”“司令官不必那么悲观，北洋舰队总教习马格禄、‘定远’舰副管驾泰莱，都是你们英国人，可让洋员促降嘛！”在一旁侧耳静听的宗方小太郎适时出来补充说。

大山严以老于世故的口吻讥讽道：“我就不相信，北洋舰队所有将军都和丁汝昌一样硬走绝路，也不相信洋员们都对腐朽的清朝忠贞不二！”大山严的话立刻使日英高级军官们高声狂笑不已。……2月2日，威海卫附近风浪稍停，天气较前一天显著转暖，但丁汝昌心中却犹如巨浪澎湃，万马奔腾。

刚才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亲自送来伊东佑亨的劝降书，丁汝昌虽勃然大怒，当众严辞拒绝，即刻派人将劝降书上呈李鸿章，但深知他处境险恶的大山严、伊东佑亨对他假表同情，劝他不必为怀疑自己的清廷死战，特别是以明事理的权宜之计的说辞强烈地拨动了他的心弦：“夫大厦之将倾，固非一木所能支。苟见势不可为，时云不利，即以全船舰权降与敌，而以国家兴废之端观之，诚以些些小节，何足挂齿！仆于是手指誓天日，敢请阁下暂游日本。切愿阁下蓄余力，以待他日国中兴之候，宣劳政绩，以报国恩。”丁汝昌想到这里喟然长叹：“我丁某一生早已以身许国，在黄海海战中拼死搏敌，岂料皇上竟下令‘拿交刑部治罪’，我生为大清海军提督，决不放弃报国大义，唯有一死以尽臣职！”2月3日，伊东佑亨在诱降失败后恼羞成怒，驱动联合舰队倾巢向刘公岛、日岛和港内的北洋舰队发动进攻。日寇的大炮顿时像发疯的毒龙一般尖厉地嘶叫着，从陆地和海上把火红的毒舌伸向清军。

丁汝昌亲自登上“靖远”舰指挥将士奋勇还击，见皂埠嘴炮台火力凶猛，对威海卫威胁太大，便断然做出决断：“王平听令，你前几天率敢死队成功

地炸毁皂埠嘴炮台大炮，我已为你请功。现在28公分口径大炮修复后对我威胁极大，你再带人前去毁炮！”“喳！”此时，日清两军正进行激烈炮战，威海卫上空炮声如雷鸣般炸响，震耳欲聋。刘公岛上浓烟密布，火光冲天。

守卫刘公岛的北洋护军总兵张文宣热血沸腾，亲自指挥炮兵开炮，一炮击中日寇巡洋舰“筑紫”号左舷，炸弹穿过中甲板，舰体严重损坏，刹那间炸死侵略者3人，另有5人被炸伤，爬在甲板上痛得哇哇乱叫！

张文宣见状大喜，欢欣鼓舞地激励将士：“弟兄们，就照这样打！把小鬼子打沉到海里喂王八！”北洋护军将士见敌舰“筑紫”号拖着长长的黑烟狼狈逃窜，都来了精气神儿，更猛烈地向敌舰开炮，不一会儿又一弹击中日寇巡洋舰“葛城”号大樯上部。伊东佑亨看连伤两舰，又将日暮，只得灰溜溜地率舰队退走。

丁汝昌接到北洋护军连创日寇两舰的捷报，连日来压在心头的愤满怒情绪顿时轻松了许多，立即抓住时机鼓舞士气：“弟兄们，这证明我们能坚守刘公岛，只等陆上援军一到，就可彻底打败倭兵！”“丁军门，王平回营交令！”丁汝昌听到王平回的禀报，忙传进王平问道：“王管带，炸炮之事怎么样了？”王平听丁汝昌劈头就问此事，心里暗吃一惊，原来他是个胆小鬼，鱼雷艇一遭日寇轰击，他就慌忙逃回。此时略一迟疑，就恬不知耻地虚报战功：“我带士兵刚上岸就被倭兵发现，来不及炸毁大炮，便向炮膛内倒进‘坏水’（镪水），把大炮给废了！”“好，这下刘公岛的威胁小多了！”丁汝昌在情绪好时一时疏忽信以为真，使王平得以蒙混过失，埋下了日后的绝大祸根。

伊东佑亨诱降失败，正面进攻刘公岛又碰了一鼻子灰，心里烦躁异常，便请宗方小太郎陪他饮酒。

宗方小太郎把细长脑袋一拍，立刻明白了伊东佑亨的真意，就带上威海卫汉奸“栓板柱子”去给伊东借酒解愁。

伊东佑亨笑呵呵请两人坐下，亲自为两人各斟中国白酒一杯，抿嘴微笑开言：“两位为大日本皇军进行山东作战提供了几个价值连城的情报，本司令官特置酒席一桌，聊表感谢之情！”宗方小太郎知道伊东佑亨是借此对“栓板柱子”进行深入考察，今晚若拿不出破敌妙计，“栓板柱子”就休想活着回去，因而笑而不答。“栓板柱子”受宠若惊，正要开口千恩万谢，伊东佑亨却含笑以手制止，回身拿出一副中国象棋发出邀请：“来，将一军！”于是，一个侵略中国的罪魁祸首，一个出卖民族灵魂的汉奸，便在棋盘上杀将起来。还真棋逢对手，伊东佑亨防守严密，“栓板柱子”步走进逼，猛然间“栓板柱子”钻个空子，一炮袭击轰了过去，将伊东打了个闷棍而结束战斗。

伊东佑亨输罢哈哈大笑，站起身拍着对面的“栓板柱子”的肩头道：“你赢得好，谢谢你提醒我不能正面硬攻，而应出奇兵夜间偷袭！但刘公岛东西两口封锁极严，我们该从哪里偷袭？你的一定明白！”“栓板柱子”这才明白伊东佑亨此番找他饮酒下棋的真意，便迅速开动汉奸脑瓜机器，飞速运转思索：刘公岛海域所埋水雷虽因日寇侵占水雷营而全部失效，但6000米方圆木材和粗铁索连结防材却坚固异常，无空可钻，只有刘公岛南端留有百米狭窄通道，岸边岩石暗礁密布，在涨潮时或可偷渡。……“‘栓板柱子’，从哪里可以偷渡？”伊东佑亨不而顺地又问。

“栓板柱子”吓得胆战心惊，哆哆嗦嗦地说：“刘公岛南端的狭窄通道在涨潮时或可一试，但三条铁索坚硬如石，短时间内恐怕不易砍断！”伊东佑亨黔驴技穷，决定冒险一试：“好，就从那里下手，你先乘6号艇探路！”2

月3日晚，“栓板柱子”带日寇两艘鱼雷艇偷偷在威海卫南口，将拦坝防材切断一个缺口，再挥刀砍击铁索，刚砍断一根即被清军发现，慌忙狼狈而逃。

伊乐佑亨闻极大喜，2月4日夜派出第二、第三鱼雷艇队的10艘鱼雷艇，从阴山口出发，在暗夜中摸向威海南口。刚到龙庙嘴炮台附近，就有四艘鱼雷艇坐礁。一驶进威海南口，又被北洋舰队的警戒艇发觉，马上发出红色警报信号。

原来丁汝昌接到日寇2月3日进犯的报告判定敌人还会前来偷袭，就命令北洋舰队加强戒备，自己更彻夜不眠，在旗舰“定远”号上分析敌情，忽见威海东口信号火箭接连腾空而起，舰队哨兵马上进来报告：“丁军门，敌鱼雷艇入口偷袭！”丁汝昌一声令下，北洋舰队各舰警号齐鸣，炮声大作。

在隆隆的大炮轰击声中，丁汝昌登上“定远”舰桥观察敌情，但却不见敌舰踪影，使命令各舰：“停止炮击，仔细搜索！”俄顷，浓烈的硝烟慢慢散去，发现在“定远”舰左舷约半海里处有一黑物驶来，“定远”管带刘步蟾眼尖，凝睛细察，马上发现是日本鱼雷艇，便毅然说明传令：“开炮！”“定远”舰将士早就憋足了劲儿，刘步蟾一声令下，立即开炮轰击，其他战舰也炮火齐鸣，丁汝昌还未看清轰击效果，就听见甲板上传来一片欢呼之声：“打中了！”“打得好！”丁汝昌定睛一看，见在距“定远”舰300米处，一艘日本鱼雷艇被一炮重重击中，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大平管爆裂引起猛烈爆炸，一缕白色烟雾从敌艇中喷薄而出，直冲云天，划破了漆黑的夜空。

“定远”舰将士正在欢呼雀跃，忽听又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定远”舰体马上剧烈震荡不止。原来日本鱼雷艇被击中前已将鱼雷放出，正巧击中“定远”舰底。丁汝昌见事不妙，当即急急传令：“快关闭防水密门！”丁汝昌言犹未尽，哗哗的海水已汹涌地从升降口喷出。

向脚下一看，军官室里已积水盈尺，海水还在以势不可挡之势喷涌，舰体也开始倾斜。

“定远”舰管带刘步蟾当机立断，大步走到丁汝昌面前小声交换意见后传令：“砍断锚链，驶往南岸浅滩！”于是，“定远”舰艰难地拖着逐渐倾斜的舰体，绕过东码头东行，好不容易驶到刘公岛南海岸浅滩搁浅，使其作为“水炮台”充实刘公岛东口防御体系。

伊东佑亨获悉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被击中搁浅的消息大喜，命日本舰艇于2月5、6两日夜间连续进行大规模偷袭，击沉、击伤北洋舰队“来远”、“威远”、“宝筏”等舰，便认为全歼北洋舰队的时机已到，2月7日7时半下达了对刘公岛的总攻击命令：“全舰队兵分两路，猛攻刘公岛和日岛，全歼北洋舰队！”伊东佑亨下达完总攻击令，立即亲乘旗舰“松岛”号，率领联合舰队本队及第一游击队，成单纵队向刘公岛疯狂发起进攻。

伊东佑亨调水陆炮火，首先对刘公岛展开猛烈炮击，丁汝昌亲自指挥刘公岛守军奋勇还击。刹时间，刘公岛上空无数炮弹尖叫轰鸣，猛烈爆炸，掀起道道黑烟，一幢幢营房，一座座炮台被万恶的日寇击毁，岛上的参天大树亦被连根拔起，掀翻到空中。

在隆隆炮声中，清军将士勇搏敌寇，接连击中日舰5艘，取得辉煌战果：“靖远”号管带叶祖珪率舰冲杀在前。他见日本联合舰队旗舰“松岛”号耀武扬威地横冲直撞而来，不由得想起黄海海大战中与“定远”舰密切配合重伤“松岛”的情景，不由得怒火中烧，激昂慷慨地激励官兵：“弟兄们，‘松岛’在黄海海大战中早已是我们的手下败将。

那一仗，打死'松岛'号倭兵113人，舰上的炮手全部被歼灭，舰体严重损伤，舵机毁坏失灵，伊东佑亨险些被我军活捉，被迫挂起'不管旗'夹着尾巴狼狈而逃。今天又狭路相逢，定要打它个弃甲不归！”“靖远”舰将士听管带叶祖珪一番鼓动，士气大振，足智多谋的管带大副刘冠雄亲自操炮射击，一发炮弹尖叫着由“松岛”左舷舰首200米远的海面跳越飞来，正好击中前舰桥，将日寇航海长高木英次郎等三人打成重伤，“松岛”号烟筒也被击穿。

伊或佑亨对黄海海大战中的情景记忆犹新，心有余悸地匆忙下令：“‘松岛’号退出战斗！”“靖远”舰将士见“松岛”号逃跑了，又盯住日本巡洋舰“桥立”号猛冲狠打，一发炮弹击中“桥立”，顿时火起，掀起冲天烈焰。

刘公岛守军也不甘落后，在总兵张文宣指挥下狠狠开炮轰击，一弹击中日寇主力巡洋舰“吉野”号，破坏了该舰的上甲板舱室，把连射炮楯和二号舢板炸得粉碎，毙伤入侵者6名。日寇巡洋舰“秋津洲”见事不好正要逃避，正好被从刘公岛飞来的几发野炮炮弹击中，只听轰然巨响，弹片横飞，日寇成片倒下，非死即伤。

与此同时，刘公岛守军与日本联合舰队第二、三、四游击队及南邦炮台日寇展开激战。

面对强敌进攻，副将衔精练左营游击萨镇冰带领康济营30名水手在方圆14亩的礁石岛上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萨镇冰亲自操起一门连射炮，水兵们也纷纷开动地阱炮、连射炮，向敌人猛烈开炮。在惊天动地的轰响中，萨镇冰一炮击中日寇的王牌舰--装甲巡洋舰“扶桑”号，敌舰两名炮手立时毙命，5个水手受了重伤。一向仗着“扶桑”耀武扬威的巡洋舰“筑紫”号惊慌失措，也被日岛守军一炮击中甲板，官兵死伤8人。

退在一旁观战的伊东佑亨见连伤几艘主力战舰，又听到清军的炮声如山崩地裂舰炸响，心中极为惊慌，正要传令收兵，忽然看见清国10艘鱼雷艇，2艘汽船冲出威海西口，更加慌乱无主，便问身旁的浪人间谍宗方小太郎：“清兵是否要派鱼雷艇对我们进行偷袭？”宗方小太郎摘下头上的裘皮高帽，扭动猴头双眼仔细观瞧，好一会儿才以推测的口吻说：“看他们匆匆忙忙的样子，不像是偷袭，倒像夺路而逃！”伊东佑亨迟疑不决，便派第一游击队前去监视。

原来，民族败类、鱼雷艇队管带兼“左一”鱼雷艇管带王平怕虚报战功之事暴露，早就密谋逃跑，便串通“福龙”号管带蔡廷干，假装请战，袭击敌舰，但一出威海西口便向烟台方向逃窜，日寇第一游击队司令坪井航三见状大喜，马上驱舰猛追。结果，这些鱼雷艇大部被歼，只有王平逃往烟台。

清政府下令，尽快拿获王平，即行正法，蔡廷干亦被革职查办。

伊东佑亨见歼灭了清国十几艘鱼雷艇，更加凶焰万丈，命令联合舰队向刘公岛展开猛攻。

萨镇冰身先士卒，奋勇还击。士兵们奋不顾身地架起被打倒的地阱炮，开炮射击，但由于这种炮没有附着镜子，开炮的人必须爬到炮台上去，就更容易成为日寇炮击的目标，但年轻的清国士兵早将生死置之度外，每三个士兵负责一门地阱炮，不少人全身负伤，稍加包扎就又投入战斗。

分工运送弹药的黄海学喜正满头大汗地扛着一箱弹药前行，忽然从皂埠嘴炮台飞来一发炮弹，在他前面猛烈爆炸，黑烟冲天，黄海学喜的两名同伴被炸飞空中殉国，他脸上、脖颈上、衣服上溅满了泥土。平日做威作福的

炮兵教习坑里陷（英国人肯宁咸）早就吓破了胆，到处躲藏。

恰在此时，敌人一发炮弹击中日岛炮台火药库，只听轰然一声巨响，弹药库黑烟冲天，弥漫全岛。敌人的炮弹又呼啸着雨点般飞来，日岛上一座座火炮被炸毁，民房和营房四处起火。“坑里陷”等洋员早已不知去向，活着的士兵们仍在誓死奋战。

丁汝昌见日岛炮台士兵死伤大半，只得下令将日岛守军撤回刘公岛。

在形势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北洋舰队内部的妥协投降空气更加活跃。

2月8日夜，在刘公岛海军俱乐部里，任北洋舰队总教习的英国人马格禄，召集“定远”号副管驾英国人泰莱、陆军炮术教习瑞乃尔、刘公岛海军医院医生英人克尔克、水陆营务处候选道牛昶、山东候补道严道洪等密商投降事宜。

这马格禄原是英国“金龙”号拖船船主、因常在天津和东南沿海搞投机生意，用发财的钱向李鸿章行贿，在黄海海之战后继汉纳根担任北洋舰队总教习。他对海军战阵一窍不通，但却异常情通于妥协投降之道。

整日沉溺于醉乡的马格禄举杯祝酒道：“诸位先生，你们想必比我更清楚，日军对刘公岛攻势猛烈，清军斗志全失，士气沮丧，图谋恢复已不可能，我们该怎么办？”马格禄说完，向泰莱和瑞乃尔使了个眼色，就闷头一杯接一杯地求慰藉于杯中之物。泰莱和瑞乃尔早已和牛、严二道密谋串通，此时异口同声地表示：“愿听总教习安排！”马格禄又喝下一杯酒，用手一抹胡子上的酒液，站起身以破釜沉舟之势神秘地说：“前几天，大英帝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来递劝降书时，曾私下告诉我，伊东佑亨和大山严两位司令官对我们几位洋员寄予莫大希望，认为没必要当丁汝昌的殉葬品，要我们联络北洋舰队识事务者早定大计！”牛昶装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以极为难的神色道：“中国人最恨汉奸，我和严道洪都不便出面活动！”马格禄又咕咚一声饮酒一杯，以颇为大度的口吻安排：“可以理解。目前我们都不出面，只请瑞乃尔和泰莱去劝丁汝昌。……”这些洋员和牛、严两个民族败类一直密商到午夜两点，泰莱和瑞乃尔才去北洋海军提督署密访丁汝昌。只见丁汝昌正挑灯伏在地图上苦思对敌方策，泰莱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伪善面孔劝道：“丁提督，你莫要过度劳神，凡事可战则战，若士兵不愿战，纳降就是适当的步骤！”丁汝昌在军事失利的重重困难面前毫不动摇，斩钉截铁地表示：“我知事必至此，然我必先死，断不能乖乖投降！”刘步蟾坚定地怒吼：“刘某宁死，决不做汉奸卖国贼！”丁汝昌不理两个劝降洋员，转身信心百倍地安抚众将道：“大清援兵将至，只要固守待援，定能打退倭兵！”2月10日，丁汝昌正在北洋舰队旗舰“镇远”号上处理公务，忽听舰外吵闹不休，忙起身走到甲板上一看，只见一群兵痞正挟持着护军统领张文宣吵闹不休：“给我们条活路！”“打不赢就投降，我们不愿白白送死！”丁汝昌冷眼观瞧，看到马格禄等洋员和牛昶幸灾乐祸的神情，早已明白了其中的奥秘，便义正辞严地朗声宣布：“尔等休要吵闹，且请回营待命！”牛昶佯装不知内情，乘机向丁汝昌献策：“丁军门，请召开洋员和管带会议，以决大事！”丁汝昌早已洞悉其奸，便顺手推舟：“好，请到议事厅发表高论！”众人还未坐定，陆军教习瑞乃尔便迫不及待地秉承马格禄旨意首先展开进攻：“丁军门，日本联合舰队已用巨斧和火药将威海东口防材破坏400余米。现已藩篱尽毁，门户洞开，北洋舰队损失惨重。事已至此，再打下去，徒然多杀生灵，毫无益处，况且兵心已变，势不可为，不若沉船毁台，徒手投降较为得计！”

"牛昶 耷拉着眼皮随声附和道：“众叛亲离，不可复用！”丁汝昌怒不可遏，正义凛然地一语揭破这伙人的险恶用心：“汝等欲杀汝昌，即请杀之，吾其吝惜一身！”瑞乃尔、牛昶 的阴谋被当众揭穿，灰溜溜地不敢再言。

丁汝昌以强烈的爱国热诚苦撑危局，精神抖擞地做出善后部署：“弟兄们，陆上援军不几日即到，坚持下去就大有希望！”

为防止发生不测事件，今天下午就把不能开动的'定远'、'靖远'炸掉！"牛昶 、瑞乃尔、泰莱对众将士怒目而视，众人慑于其淫威都呆立不动，只有刘步蟾气愤地大步退出议事厅，带人炸沉"定远"舰，回来毅然自杀殉国，实践了"苟丧舰，将自裁"的诺言。

2月11日上午，丁汝昌接到刘步蟾自杀殉国的报告，悲伤得涕泪纵横，正要前往现场，忽报日寇水陆大举进攻，丁汝昌怀着满腔悲愤率将士奋勇御敌，以准确的炮火连伤日寇巡洋舰"天龙"、"葛城"和炮舰"盘城"，打死日寇副舰长中野等十余人。

丁汝昌拖着疲惫的身躯刚要稍事休息，他派到烟台搬兵的士兵返回报告：山东巡抚李秉衡听信王平谎报威海卫已失的军情，已由烟台逃往莱州，援兵宣告绝望。丁汝昌马上召集将领和洋员开会，以沉痛的心情说：“现在援军已告无望，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各舰奋力突围，或可幸存数舰，得抵烟台，较之全军覆灭为好！”丁汝昌说罢以充满希望的眼光扫视众人，只见总教习马格禄铁青着脸一言不发；提督牛昶 稳坐钓鱼台，只顾安然喝茶，摆出一副无动于衷的架势；再看众将，都低头不语。丁汝昌长叹一声，大声问道：“谁自报奋勇去炸毁'镇远'诸舰？”马格禄冷笑一声，扭头便走；牛昶 耷拉着眼皮，扬长而去。众管带见状，也默默纷纷离去。此时吵吵嚷嚷涌进一群兵痞，举刀威胁：“丁汝昌，给条活路！”“不投降，就杀死你！”丁汝昌此时顿有穷途末路之感，毅然下定殉国决心。他命人把牛昶 喊来，慷慨激昂地对他说：“本军门对局势已无能为力，吾誓以身殉国，你连将提督印戳角作废！”“喳！”牛昶 冷笑着转身而退，但他并未远走，藏在暗处窥视丁汝昌的动向。

只见丁汝昌面对北京方向望阙叩头，然后镇静地坐在椅子上吞食鸦片而亡！

牛昶 见状大喜，俄顷恶计顿生，装出惊慌悲伤的语调大喊：“丁军门自杀啦！丁汝昌殉国了！”不一时，诸将和洋员纷纷赶来，"镇远"舰管带杨用霖等真诚地流下伤心的眼泪，马格禄、牛昶 之流的帝国主义代理人、流氓无赖和冒险家也挤出几滴鳄鱼的泪水。在马格禄示意下，牛昶 别有用心地开言道：“丁军门殉难后，'镇远'舰杨管带拥有护理左翼总兵头衔，地位最高，请出面主持投降大计！”杨用霖圆睁怒目，指着牛昶 的鼻子大骂：“要投降就不是炎黄海子孙，杨某决不做貽笑子孙的千古罪人！”杨用霖说罢，昂然大步返回"镇远"舰，仰天大呼文天祥的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悲壮地咬手枪自杀身亡。

北洋护军统领张文宣闻讯大哭，想起自己"刘公岛孤悬海中，文宣誓同队勇先用力，后用命"的誓言，宁死不降，以身殉国。

牛昶 见投降的障碍已扫除完毕，便在马格禄等洋员支持下公开降敌。伊东佑亨摆出一副征服者的架势，在1895年2月17日上午举行捕获式，得意洋洋地斜视着"镇远"、"济远"、"平远"等10艘战舰全部俘虏。伊东佑亨看着太阳旗在这些战舰上徐徐升起，手舞足蹈地如发酒后狂言：“北

洋舰队全军覆没，山东半岛战役以大日本皇军的辉煌胜利宣告结束！”伊东佑亨言犹未尽，突然在威海卫传来惊天动地的炮声，一炮正打在伊东佑亨身旁，掀起冲天黑柱。伊东佑亨正惊慌地要问究竟，联合舰队参谋长鲛岛员规气喘吁吁地边跑边叫：“司令官，北洋舰队将领虽已投降，但一群群士兵还在开枪开炮反抗，威海卫村民纷纷揭竿而起，长峰村百姓杀掉几十名帝国士兵，到孙家沟征粮的7个弟兄无一生还，7个日本特务在刘公岛东曠善莹全被杀死，尸首被挂在树梢上示众！”伊东佑亨挠着秃头喃喃自语：“中国百姓真难对付！”

第六章图谋修改日本和平宪法

战后由驻日美军主持制定的新《日本国宪法》于1947年5月3日实行，并取代战前《大日本帝国宪法》，迄今被国际上普遍接受，也被绝大多数日本人所承认，但是也不断遭到日本右翼分子的反对。因此，围绕修改战后日本这一和平宪法的争执，便一直是右翼分子所标榜的“昭和维新”的主要内容，也是日本政治生活中斗争的焦点之一。

一、为何要修改《日本国宪法》第九条——在战后的40多年里，以进步力量为主的护宪派和以右翼为主的改宪派有过三次斗争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驻日美军主持制定的新《日本国宪法》，1946年11月3日颁布，并于1947年5月3日实行，取代了战前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迄今为止，这部宪法所起到的历史作用已是无可怀疑的。绝大多数日本人都承认，日本之所以有今天，其原因，除了千载难逢的国际原因外，归根结底，是实施了这部被称之为“和平宪法”的宪法。

这部宪法，已经在日本深入人心，并且为国际上普遍接受。这部宪法中有两条是针对日本自从《大日本帝国宪法》实施以来一贯对外进行侵略、对内实行军国主义统治的状况制定的条款，即第一章中天皇的第一条、第二章中放弃战争的第九条。

第一章中天皇第一条曰：“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为依据。”第二章中放弃战争第九条曰：“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右翼纷纷反对上述这两个条款。在右翼的种种主张中，清水儿太郎教授的有关论述最值得注意。从战后《日本国宪法》制定的过程开始，直到这部宪法的关键内容（第一条和第九条），他一概加以否定。他在《日本啊，要成为国家！芬皇櫓行吹溃骸罢胶笏枷氩幕 疚募 恰度毡竟 芋罚 绕涓堑诰盘酢*“战败后，日本的许多宪法学者不承认有修改宪法（《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必要。还有许多人主张，假定要修改，那也必须花费很长的时间，慎重地进行。对此，占领军始终要求日本修改宪法，并且要求迅速进行修改。

“美国的目的在于彻底削弱日本。美国所命令进行的修改宪法是使日本不再成为强大的国家的保证。保证的文件是用美丽的、理想的言词点缀起来

的。

“保留天皇制是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时提出的绝对条件，对此，美国十分勉强地接受了。既然如此，假如不命令日本永久地放弃战争和战力，就会盘算落空，即达不到从根本上削弱日本的目的。于是，美国在许可天皇制继续存在的同时，又许可共产主义者粗暴地攻击天皇，并且绝对地禁止日本拥有军事力量。

“第九条就是同天皇制作交易的产品。美国在《日本国宪法》第九条中明确地向国内外宣告日本已不再是国家了。第九条不久就成为战后思想的最重要的基本文件。战后思想是从日本并非国家的自白开始的。”清水几太郎教授强调，现行的《日本国宪法》“必须修改”。

他写道：“《日本国宪法》第九条，是美国为了达到彻底削弱日本的目的而强加给我们的规定，以便不使日本再次成为强大的国家。

“从常识来考虑，为外国的军队所占领，按占领军的意志和强制而制定的宪法，不会到什么时候都具有正当的有效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德修改过宪法30次，法国修改过五次，意大利也修改过五次。

“《日本国宪法》是1947年5月3日实施的，那以后才过了一年，到1948年10月，日本虽然还在美国的占领下，可是，华盛顿的美国政府却决定了日本重整军备的计划。正是他们命令日本彻底非武装化的，而现在却又命令日本重整军备了，这实在是随心所欲。

“这个要日本重整军备的计划，在当时日本处于饥饿的状态来看，完全是无理的要求，而且，在把第九条强加于日本的麦克阿瑟元帅看来，肯定会因为‘朝令夕改’而招致权威的丧失，所以就予以拒绝了。

“又过了两年多，日本同样处于美国的占领之下，到了1951年1月，来日本的美军国务院顾问杜勒斯又强硬要求日本重整军备，遭到了吉田首相的拒绝。当时，吉田首相的主张接近于一些在野党所说的‘非武装中立’。”朝鲜战争爆发后，到1951年7月8日，麦克阿瑟元帅命令日本政府创建一支7.5万人的警察预备队。当时，驻在日本的8万余美军陆陆续续投入朝鲜战常填补了由此而产生的真空的，便是警察预备队。到1952年，警察预备队改称保安队，到1954年，再次易名为自卫队，直到今天。不管叫什么名字，它都是军队，当然，各外国也认为它是军队。

“军事力量是国家的本质。战败后丧失了国家的本质的日本，借朝鲜战争爆发的机会，拥有了不准许命名为军队的军队，从而悄悄地恢复了国家的本质，就好比有罪似的。”至此，清水教授的意思已很明确，他主张要废除《日本国宪法》第九条，从而使日本堂堂正正地成为“国家”。

正因为如此，修改战后日本的和平宪法，一直是右翼分子所标榜的“昭和维新”的主要内容，也是日本政治生活中斗争的焦点之一。

在战后四十多年里，以进步力量为主的护宪派和以右翼为主的改宪派有过三次斗争高潮：第一次高潮发生在50年末，改宪派的代表人物是岸信介。右翼势力企图明文改宪，以恢复战前的天皇制，废除新宪法的第九条，限制国民权利，扩大内阁职权，进而实行征兵制，逐步复活军国主义。其倒行使遭到护宪派的坚决反对而严重受挫。

实际上，从1947年新宪法生效实施之日起，就拉开了护宪派与改宪派斗争的帷幕。

护宪派是以"拥护宪法之会"为中心的有135个团体参加的"拥护宪法国民联合",片山哲任议长,在日本各地举行大规模护宪运动。当时一方面纠集民主党、自由党和绿风会的保守派议员,组成了以广濑久忠为会长的"自主宪法期成议员同盟"。

1955年11月,民主党与自由党合并为自民党后,修改宪法的劲头更大了,在其政纲中明确提出之奋斗目标,便是"谋求自主地修改宪法,重新研讨占领时期的各种法规,并根据国情予以修改或废除"。

鸠山一郎于1955年11月22日第三次组阁后,立即将修改宪法作为头等任务,有计划地分三步进行改宪活动。第一步是成立以山崎巖为会长的自民党宪法调查会,制订改宪方案。第二步是在1956年1月底复会的第二十四届国会上提出了宪法调查会、小选区制、新教育委员会和教科书等法案,加紧为修改宪法做准备。第三步是在1956年7月举行的参议院选举中,企图获得改宪必需的2/3席位,但却以失败告终。

50年代改宪代表人物岸信介1957年2月上台执政。据金戈的文章称:岸信介生于1896年11月13日,今年90岁。

他家几代都是山口县有名的大地主。据说从岸家到山阳线田布施车站约2公里的路程,可以不踩别人家的土地。

岸信介早年就读于被称为是"官僚摇篮"的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系,在同级生中属佼佼者之列。1920年他面临毕业,本来凭其优异成绩可以选择去当时人们向往的大藏省或内务省工作,而他却出人意外地决意进农商务剩从此,便开始混迹官场和政界。

在农商务省,他很快便成为出人头地的人物。1929年滨口雄幸内阁通过了"官吏减薪一成"决议。当时,岸任文书处首席事务官。但他宁愿冒被罢官的危险,充当了反减薪运动的首领。此举使岸名声大振,他给人的印象已不仅仅是一个"才子",而且是一个"兼有统帅能力和政治手腕的人"。他"思路严谨", "口齿伶俐",因而得到一个"剃刀"的绰号,即指他头脑敏捷,干事麻利,快如剃刀。

岸信介从青年时代起对建立伪满洲国一直抱有野心。他还在东京任职时,就想方设法与关东军勾结。1936年他担任了对满事务局事务官后,更是变本加厉。岸信介派出了许多特务去伪满搜集工商情报,以至"东京没有一个官僚能象岸信介那样准确地掌握满洲的情况"。1936年他赴伪满任职,先担任"实业部"次长,后又任"总务厅"次长。因为伪满的汉奸部长只是傀儡,所以岸信介实质上是掌握伪满经济的"最高负责人"。

岸信介初到伪满时,由于其貌不扬而被人耻笑。有人形容他"像鸟一样瘦",还有一颗"大虎牙"。但岸信介在伪满贯彻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却不遗余力。他一方面进一步密切与关东军的关系,与当时关东军参谋秋永月三"情同手足",而秋永恰恰是当时关东军与伪满政府联系的"窗口"。另一方面,岸信介竭力推行"满洲产业5年计划",为维护所谓"大东亚圣战"搜刮资财,输血出力。

岸信介在伪满时,生活放荡,每晚饮酒嫖妓,花钱如水。

其手头资金主要是通过在中国贩卖鸦片发的横财。他靠这笔巨款在满洲策划了一个个阴谋。加之,他性情古怪,喜怒哀乐无常,且刚愎自用使人难以捉摸,故一直被人称为"满洲之妖"。

日本战败后,东条英机等人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曾充任东

条内阁商工大臣的岸信介被列为甲级战犯，但由于美国首席检察官季南建议，不起诉而获释。这一结局，连他本人也始料未及。他的独生女儿洋子回忆说，当岸信介被拘留时，她认为是不可能再回家了。

战后，美国提出的判断战犯的标准是，指导战争的人而不是赞同战争的人。而指导战争的主要标志是出席当时的大本营与政府联络会议。当时参加会议的大藏大臣贺屋兴宣和书记官长星野直树被起诉并判为罪犯。而岸信介却因没有参加这一会议而获释。日本不少学者认为，美国的上述判断罪犯的标准显然是要开脱一些人。也有一种说法是，1944年由于在塞班岛决战问题上，岸与东条发生了尖锐冲突，尔后岸又拒绝单独辞去大臣职务，以至于东条内阁内部意见不一而不得不实行总辞职。据说这也起到了减轻岸罪行的作用。

1948年12月24日，岸从东京巢鸭监狱被释放。那天，他身穿工作服，头戴战斗帽，脚着一双帆布鞋，剃着光头，蓄起了胡须。当吉汽车把他送到了他的胞弟佐藤荣作官邸时，女佣人竟以为来了一个乞丐。

岸信介获释后，写下了一首反映他政治野心的诗：“郁屈三年竟始伸，还来今日万象新，谁言邦国妖云蔽，满耳满目总是春。”1949年，他在银座设立了一家以他别号命名的公司——“箕山社”。该社会员大都是右翼政客和财界人士以及被剥夺公职的头面人物。1952年，恢复了公职的岸信介建立了“日本重建联盟”，自任会长。提出的3项政策纲领是：（1）排除共产主义“侵略”，坚持自主外交，以期建设和平的国家；（2）加强日美经济合作，密切同亚洲各国的贸易；（3）修改宪法，健全作为独立国家的体制。在50年代前半起，岸信介一直是以吉田茂的对立面而出现在日本的政治舞台上的。

1957年岸信介终于登上了日本权力的顶峰，取得了内阁总理大臣的职位。他极力摆脱和改变吉田制定的以经济复兴为主线重建日本的政治路线。他提出要制定自主宪法，大规模扩大自卫队，确立新的防卫体制，并制定警职法，修改日美安全条约。

1957年2月岸信介执政后，便想通过解释宪法达到修改宪法的目的。其典型讲法是：“为了自卫，即使在现行宪法下也允许拥有核武器。”为此，岸信介内阁采取了四个重大步骤：第一个步骤是不顾社会党的强烈反对，在1958年8月强行成立内阁宪法调查会，与进步势力的“拥护宪法国民联合”对抗；第二个步骤是在全日本推行对教员的“勤务评定制度”，以压制和分化进步势力，减少修改宪法的阻力；第三个步骤是在同年10月7日的第三十届临时国会会议上突然提出《警察官职务执行法修改法案》（简称《警职法》），给警察以强行拘留、审讯、搜身、随时进入房间搜查的特权，以便镇压反对修改宪法的进步群众；第四个步骤是修改日美“安全条约”，加强日美军事同盟，加速日本的扩军步伐，以既成事实来修改宪法。对此，日本人民掀起战后最大规模的反对日美反动派的全国性统一行动，岸信介出动大批警察和利用右翼势力，对日本人民进行了血腥镇压。岸信介的倒行逆施派平日本人民更大规模的反抗浪潮，迫使岸信介在6月23日辞职。这场斗争中，包括了日本人民反击右翼进攻的重要意义。

护宪派与改宪派的第二次斗争高潮发生在60年代中，改宪派的代表人物由岸信介改为保守党内的政治集团。

岸信介被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赶下台后，并未停止

其推进修改宪法的活动。他唆使宪法调查会18名委员，于1963年9月4日提出名为《修改宪法的方向》的意见书，主张废除战后和平宪法，制定彻底删掉宪法第九条，实行征兵制、可以向海外派兵、天皇为国家元首的"日本人的宪法"。宪法调查会于1964年7月4日，向池田内阁提出了《宪法调查会报告书》。由于修宪内容过于露骨，引起护宪派的强烈反对。

在这种情况下，岸信介等右翼分子感到尚不具备修改宪法的必要条件，需要改变手法。

于是一方面通过自民党宪法调查会在1965年1月制订《宪法修改纲要》，企图使改宪活动合法化；另一方面用扩大解释的方法和造成既定事实的伎俩，来达到实际上修改宪法之目的。

经过他们的活动，使日本在1967年制订"第三次防卫力量整備计划"(1967~1971年)时，军费总额达23400亿日元，比第二次防卫五年计划的军费增加一倍。

与此同时，日本内阁频频发表否定战后新宪法的言论。

1968年2月6日，农林大臣仓石忠雄向新闻界发表谈话说："日本应有自己的军舰、大炮"，"日本也应该进行核武装"。防卫厅长官增田甲子七又在参院内阁委员会上说"宪法第九条没规定坐以待毙"。

改宪派的这些言行，遭到了日本人民的强有力反击。他们在全国各地举行了护宪国民大进军，并在东京举行护宪国民大会。在野党则在国会上抨击仓石忠雄，与群众的护宪呼声联成怒潮。当时的佐藤荣作首相深恐形势发展下去造成政局不稳，不得不使仓石辞去大臣职务，并在国会上正式地说："日本政府尊重现行宪法。"日本企图修改宪法的第三个高潮发生在80年代，修改宪法的代表由政治集团改为首相。

1982年11月，中曾根康弘出任日本首相伊始，便在修改宪法问题上表现出不寻常的兴趣。他在向新闻界散发的《我的政治信念》一书中写道："日本必须修改美国所给予的和平宪法，这是我的一贯信念。"中曾根改宪的"一贯信念"，还在他任铃木内阁的行政管理厅长官时，已有表露。即通过行政改革实现宪法修改，据《每日新闻》记者岩见隆夫所著《新总理中曾根康弘》称："中曾根所说的通过'行政改革'实现'修改宪法'是他多年来的愿望。"由于中曾根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其政权的上台，当然对全国企图修改宪法的右翼组织来说是一种鼓励。

岩见写道：中曾根的改宪活动受到日本右翼势力的大力支持，1981年曾在自民党的轻井泽讨论会上，谈到与岸信介的关系："当我受命出任(铃木内阁的行政管理厅)大臣时，我想到前首相岸信介是官场和政界的老前辈，应该去向他求教，于是前去拜访了他。他鼓励我说：'中曾根君，日本历史上仅进行过两次行政改革，一次是明治维新，另一次是战后麦克阿瑟将军搞的改革。如果平时想搞的话，不发动政变是行不通的。事情就是这样困难，所以你要做好这种思想准备，好好干吧！'岩见指出，1982年5月3日，在被称为"修改宪法运动实干派"的右翼新宗教团体"生长之家"举行的集会上，中曾根把他的行政改革与修改宪法的关系问题，讲得极为明确："时代的潮流终于到来了。我想首先要断然实行行政改革，并令其成功。……如果这个重要工作遭到失败，教育的改革也就无法实现了，解决防卫问题也就无望了。因此，我认为，我们的路线应是这样的：通过行政改革进行一场大扫除，把座位打扫干净，然后再把合情合理的宪法请来入席。""把合情合

理的宪法请进来"的含意是什么？那就是去掉现行宪法的第九条，不断扩充军备，使日本再度拥有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交战权。然而，尝尽发动侵略战争之苦的日本老百姓，是反对修改和平宪法和重新走军国主义老路的，他们拥护现行的宪法。这一点连中曾根也承认。他在1986年10月在一次谈话中说：“国民讴歌战后宪法所带来的自由，这部宪法在人们心中生了根。特别是在战后诞生的人增多的情况下，抱着怀旧的心情去修改宪法，就只会遭到反对。”在“光明正大”的修改宪法行不通之后，日本又在通过一些具体作法造成既成事实，以谋求在实质上修改宪法。

日本右翼势力一直策划大力重新武装和派兵出国。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为此，日本右翼分子千方百计要取消战后宪法第九条的限制，在增加军费和派兵出国的问题上进行突破。但是，由于日本在二次大战中曾给亚洲国家造成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在这场侵略战争中堕入水深火热之中。因此，日本社会一直把派兵出国问题视为“政治禁区”。

但是，随着日本由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自民党在1986年夏天的众、参两院同时选举中又取得巨大胜利，日本当局便有意要冲破此禁区：1987年1月24日的内阁临时会议决定，将防卫费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重修改为可以超过1%（三木内阁的规定不得超过1%），为日后大幅度增加防卫费开了绿灯。同年8月27日，中曾根首相在众议院内阁委员会会议上说：“为保护我国的船舶，自卫队前往扫雷等进行保卫航行安全的活动，从法律上讲是可以的。”事后他又对新闻记者说：“如果让我从法律上进行探讨的话，我的判断是，出动自卫队也是可以的。”日本首相的这些言行，使日本右翼受到了鼓舞。此后，很多右翼团体在增加军费和派兵出国问题上，更加有恃无恐地大肆鼓吹起来了。

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海湾形势发生危机，战争已不可避免。日本右翼认为派兵出国的时机已经到来，叫嚷得更加露骨。在这种右的舆论支持下，日本执政党企图以“协助联合国维持海湾和平”为理由，向国会提出派自卫队出国参加联合国和平部队的法案。由于遭到在野党的强烈反对以及国内外舆论的压力，这一法案未能成立。但这种意图并未因法案未通过而放弃，他们仍在设法寻找机会，以某种方式使自卫队出国，以期在实际上修改宪法第九条。

二、鼓吹大和民族优秀论

——战前，日本对外侵略、君临亚洲、称霸世界的指导思想是大和民族优秀论。今天，这一思想又以新民族主义的形式再现于日本社会思潮之中。其核心是：既然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那么对其他民族来说，就理所当然地处于领导地位。

日本右翼分子首先宣传大和民族的大脑结构好。为日本统治阶级服务的一些右翼文人、学者竭尽全力宣传，战后日本经济之所以高速发展，创造经济奇迹，是由于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大和民族从5世纪

统一日本时期，其大脑构造就与其他民族不同”。

他们认为，日本人的风俗习惯、品质、语言甚至头脑构造，都比任何民族优越、高贵。因此，其他民族都应拜倒在日本大和民族脚下。

右翼理论家则更是为这种民族沙文主义大造理论根据，他们通过报纸、书刊、广播电台不断发表大量文章，争相论述大和民族的特性。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京都市立艺大学校长、日本学研究所所长梅原猛教授。他和他的同事被称为京都派。他们继承战前哲学家西田和文化历史学家高山等的学说，在“战后政治总决算”“争做政治大国”思想指引下，创造了“独特的京都派新民族主义理论”，即日本民族紧紧地围绕在神圣天皇的周围，形成一个被称为民族政体的实体，个人只是仁爱天皇意志的延续，因而有着自发的社会和谐意识以及同大自然进行交往的意识。

日本许多高级官员对梅原猛等京都派的理论都大加吹捧。中曾根对日本学研究所和梅原猛的学说“怀有强烈的感情”，并且说：“日本种族是杰出的，因为自天照大神时代以来，日本人就像最好的清酒那样纯洁。”因此，“一般说来，日本人在西方和法国人最相近，不过他们一般都优于法国人”。

这类论调，在日本日益泛滥。如1986年11月号《MIME》杂志居然用民意测验的方式，说“意大利人是世界上最差劲的人”，说“犹太人是万恶之源”，因而“使路透社、美联社、合众国际社、法新社等都有劣等倾向性”。对此，意大利、美国等国的许多知名人士纷纷向日本提出抗议。意大利政治家、学者蒂齐亚诺·台尔察尼在所著《日本人的自负与傲慢》一文中尖锐地指出：“财富使日本人变得更狂妄，传统的对外国人的敌视态度比以前表现得更为明显。”日本新民族主义者不仅蔑视欧洲人，而且从心底里看不起美国人。中曾根在多次讲话中公开流露出对美国 and 整个西方特别是西方经济缺乏活力的轻蔑。他1986年9月在自民党年轻党员集会上说，日本人比美国人聪明，因为美国的黑人、波多黎各人和墨西哥人压低了总的教育水平，所以美国的智力水平低于日本。受其影响，日本作家马野修二更把美国贬得一文不值，说美国不过是一个由劣等的下层阶级的后裔组成的移民国家。其后，轻视美国的书籍如《美国信得过吗？》、《日美战争尚未结束》等纷纷出版。美国看到日本官方首脑和民间人士如此蔑视美国，朝野人士群情激愤，指责日本放纵民族沙文主义任意泛滥。

对这种新民族主义思潮，许多日本人也有察觉。如新闻记者石塚正彦写道：“日本人对自身优越感的信念，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根深蒂固。新获得的财富和经济实力正诱使日本人要求重新获得他们认为在世界上的合适位置。”野村经济研究所一个专家则一语道破了日本的合适位置。他说：“英国19世纪建立了一个国际经济秩序并自封为领袖。美国人在20世纪也如法炮制。现在是日本设想出能反映自身利益的国际制度的时候了。”日本京都派的新民族主义理论，引起国际社会的警惕。美国学者伊恩·伯鲁马在《一种新的日本民族主义》一书中指出，“梅原同四十年以前的西田一样，主张输出这样的思想：‘一条适用于全世界的原则将从我们的历史精神中产生；天皇的方式必须于一切国家。’这些理论曾对日本战争时期的领导人，如东条英机将军之类有过很大的影响。”伊恩·伯鲁马指出：“大和民族派最重要的象征之一是东京的靖国神社”，“使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成为正式行动是大和民族主义事业的主要目标之一”。他指出，“关于大和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人类学者、血统和土壤论信仰复兴运动分子和靖国神社参拜者，使人感到担心”。

的，并不是他们的人数，因为他们的人数相对来说不多”，“这种不合理性的民族神秘主义的危险，在于这种神秘主义能够导致在国内产生独裁主义和在国外发生冲突”。

其次，宣扬日本文化特殊论。日本右翼认为，大和民族既然是世界上的“最优秀民族”，他们的文化也就理所当然的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因此，世界的出路要到东方文化中寻找，特别是要到日本文化中寻找。

以梅原猛教授为首的京都学派通过对欧洲哲学的广泛研究，得出一种奇怪的结论：西方的文明像瘟疫一样威胁着现代世界，唯一的医治办法是“要到东方文化，特别是日本文化即日本精神中寻找”。梅原把日本文化一直追溯到太古时期的绳文陶器文化，说这种文化始于1.2万年以前，“早在中国的文明改变日本的面貌以前”，在诸如阿伊努人和冲绳人之类的少数民族中既已存在。梅原说：“重新估价绳文化不仅对日本，而且对世界其他地区，事实上对全人类都是极其重要的。”为了宣扬日本文化，文部省于1986年拨款2000万日元在京都设立了“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还提供10亿日元的经费，供60位学者从事日本文化的研究工作。与此同时，在东京文部省大楼的七层楼上，一个由精选出的官员组成的小组正在梅原猛教授的领导下，研究把日本文化推向全世界的计划。梅原猛说：“我们的任务是找出日本文化的特殊性并传授给人类。……外国人必须能引用松尾芭蕉（日本江户前期的诗人）的话，就如我们能引述里尔克（德国作家）的话那样。”东京大学医学系教授角田忠信最近出版了一本在日本很畅销的书《日本人的大脑：特殊性与其遍性》，用彩色计算图片和图表论证说明，中国人、朝鲜人和所有东南亚人，都通过大脑的右半球接受元音，而唯有日本人既用大脑的左半球接受元音，也用它接受辅音，因此创造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造就了日本人闻名世界的含而不露的语言风格，使日本文化比其他民族文化达到更高度的统一和和谐，更能表达声、色、情、思的细致差别。因此，他们竭力鼓吹日本战后经济发展快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的固有文化，设法把日本文化推向全世界，使日本精神适用于全世界，使天皇方式适用于一切国家。

日本国际政治学家舛添要一曾明确地谈到日本文化的作用。他在《宝石》月刊1990年1月号上发表的题为《90年代日本的生存之路》中说：“90年代对日本来说，是一个不亚于明治维新或战败那样的重要年代，日本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已开始发生两大变化”；“美苏将从和解发展到勾结，而日本将成为它们的新敌手。美国将抛弃日本。”“面对不断恶化的国际环境，日本摆脱困境、谋求霸权的出路在于确立并输出日本文化。”他认为，“以往的历史证明，一个国家要谋求世界霸权，必须拥有军事、经济、金融和文化四个方面的优势。

如今，日本已基本拥有经济、金融两方面的优势，而且，只要日本愿意，谋求军事优势也不困难。因此，在上述四个要素中，对日本来说，关键是‘文化’，换言之，即价值观或生活方式。一旦某种价值观或生活方式在世界普及，成为人们所羡慕的文化，那它就具有不可估量的力量。”他得出的结论是：“必须用某种方式在世界范围内树立起令人羡慕的‘日本哲学’，这是90年代日本的重要课题。能否在今后十年内实现这一目标，将决定日本今后的命运。”右翼鼓吹日本文化特殊论，是为了使日本文化发挥“称霸世界”的“特殊”作用。

日本新民族主义思潮已引起国际社会的严重不安。东南亚舆论指出，

日本的新民族主义思潮，实际上和战前的"大和魂"是一路货色。战前的"大和魂"挑起了罪恶滔天的侵略战争，今天的新民族主义思潮也会导致出现政治和军事大国。

新加坡《联合早报》社论委员兼驻东京记者卓南生，1989年2月在东京举行的"外国记者眼中的日本及日本报章"座谈会上，发表了引人重视的意见。他说：“对日本是否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亚洲各国都有同样的忧虑，相信美国最近也已发现问题不妙。对于我们来说，日本前首相中曾根所提倡的'战后政治总决算'的路线，其实就是对战争不清算的路线。”关于过去的战争，“在我们看来，主要的责任固然应由日本的领导人承担，但日本国民也不等于就没有责任。日本人的意识是不是真的有了改变？由于有过去的惨痛经验，这是一个不仅是邻国，而且也是全世界的人都在关注的问题，都担心日本走老路。”中国著名日本问题专家刘江永认为，由于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变化，90年代日本修改宪法的议论升温，日本右翼分子加快了修宪步伐。

从国际上看，近年国际形势的变化对日本宪法产生了两种相互抵触的影响。80年代末，东西方冷战结束，国际局势趋于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在此情况下，日本的和平宪法得到日本国民的进一步肯定，但是1990年底的海湾战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对日本在战争中只出钱而不出人的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而日本不出人也并非是其本意，恰巧是受到了宪法的制约。冷战后，世界大战的危险减少了，但地区性冲突明显增多，维持和平活动在联合国的活动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联合国秘书长和西方大国要求日本要与西方大国一样，不仅出钱，也要出人。实际上就是要求日本向海外派兵，这显然与日本宪法第九条相抵触，这使日本人不得不考虑如何解决国际贡献与日本宪法的矛盾问题。

从国内看，日本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国际影响增大，迫切要求在国际上发挥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作用，早日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日本追求的重要而具体的政治目标。西方大国则把日本是否参加联合国维和活动当做是否同意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的条件之一。新进党干事长小泽一郎认为应该在日本宪法第九条第二款后追加第三款，其内容是：“根据第二款之规定，拥有维护和平活动的自卫队，接受邀请组建在联合国指挥下活动的国际联合机动部队，并不妨碍这个国际联合机动部队在联合国指挥下的活动。”在这种国内外背景之下，日本国内各种势力纷纷响应，自民党内修改宪法势力积极支持。当时的自民党最大派竹下派的实力人物小泽一郎率先表示赞同。1993年初，自民党前干事长梶山静六表示：应把修改宪法作为中、长期的课题加以研究。渡边美智雄前外相也赞成修改宪法。在野党的护宪阵营发生动摇，并作了不同程度的政策调整。社会党前委员长山花贞夫认为，修改宪法虽有大国主义之嫌，但在重视宪法为日本带来和平与繁荣的基点上，进行议论是有必要的。前公明党书记长市川雄一则强调，应首先讨论日本在冷战后的国际社会如何生存，然后再讨论宪法是否符合时代潮流，才有价值。民社党的态度与自民党相仿。支持革新势力的一些工会的领导人也敦促反对修改宪法的革新政党顺应时代潮流，投身到宪法议论中来。财界代表人物也纷纷就宪法问题表态。日本经济同友会1994年7月26日发表《争做新和平国家》的建议，提出讨论宪法，使“保持必要的最小限度的自卫力量和对国际和平、救援活动做贡献”，以易为国内外理解的形式法制

化。日本一些学者更是积极发表议论，在可以就宪法问题进行议论这点上基本取得共识，连以拥护宪法而著称的宫泽喜一前首相也认为众多的人参加宪法议论是有必要的。

从日本宪法颁布至今，日本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本的国民意识也随之发生很大变化。日本护宪与改宪斗争的焦点是宪法第九条。截至90年代，主要围绕自卫队的存在是否违反宪法第九条规定的日本不拥有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这一点，由于日本自卫队的发展壮大和日本朝野普遍认为其符合宪法而名存实亡。90年代以来，关于宪法第九条的争论已转向日本能否在国际上运用军事力量及如何运用的问题。尽管如此，日本宪法仍像当初一样受到大多数日本人的支持，反对修改日本宪法的力量多年来一直占主导地位。尽管日本的“改宪论”此起彼伏，但时至今日未能修改宪法，这体现了日本人民对和平的衷心希求。但是，主张修改宪法的人也在加紧制造舆论和声势，以在今后的修改宪法的过程中争取更多的支持者。另一方面，宪法与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自卫队增强防卫力量有密切关系。由于日本人防卫观的变化，日美安保条约和自卫队得到了大多数日本人的承认。早在50至60年代，为了不让战争重演，在日本曾出现过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反对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等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但是，进入70年代之后，由于苏联在远东增强军事力量，特别是在日本的北方四岛修建军事设施，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甚至直接出兵阿富汗，引起日本各界的警惕和关心，促使日本人的“防卫观”进一步发生变化，当时认为日本应增强防卫力量的人明显增加。

社会舆论发生微妙变化。1981年《法律时报》就自卫队是否违反宪法问题进行舆论调查时，持否定态度的人为71%，持肯定态度的人为27%，反映出当时多数人认为自卫队不合法。但是，进入90年代，特别是海湾战争后，日本人观念发生重要变化。1991年3月同样调查结果表明，对自卫队持肯定态度者上升至61%，而持否定态度者降至22%。

《读卖新闻》1994年3月19日、20日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有关国民宪法意识的舆论调查”。其结果显示：认为“放弃战争，维护和平”和“天皇作为国家象征使人感到亲近”的各占42%，“基本人权受到尊重”的占30%，“过着健康的文化生活”的占26%，“拥有表达自己意志的自由”的占17%，但是“公正迅速的裁判”的仅占3%，“国民的意志在政治上得到反映”的占4%。“国民主权在政治上得到反映”之低，表明作为宪法支柱之一的国民主权没有受到重视，也表明国民对政治和选举的不信任感已经根深蒂固。“天皇令人感到亲切”是由于皇太子前一年成婚，使人们对皇室的关心和亲切感增加。在战争结束50年临近之际，日本国民的80%对宪法在战后到现在所起的作用给予正面评价，其中“高度评价”占22%，“一般评价”占59%，但是认为“修改宪法为好”的占79%。

中曾根康弘前首相1994年组织完成的报告《日本的综合战略大纲》，将开展国民对宪法的议论列为面向21世纪推进国家改革的第一项内容，提出要在内阁设立审议会，从各种角度重新评估宪法，并就宪法第九条提出“缺少有关联合国等集体安全的规定和同盟方面义务的规定，是否合适”等问题。

1992年12月9日，读卖新闻社邀请各界名流创立的“读卖宪法问题调查会”（猪木正道任会长）第一次提出动议，提倡为使自卫队存在的意

义明显化，纠正诸多有关宪法的混乱解释，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是制定《安全保障基本法》。

主张坚持宪法前言和第九条一款的和平主义宗旨，但认为就第九条第二款应该进行修改，以利积极参加联合国集体安全保障活动。关于修改宪法具体事项，争取在1996年宪法制定50周年之前提出对策方案，并在本世纪末得以实现。

主要内容与具体目标是：（一）将修改宪法第九条作为重点。日本宪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第二款规定：“为达到前款之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多年来，宪法第九条遏制了日本的扩军，自民党几次提出修改宪法，均因在野党的反对而未果。报告强调，日本今后不应回避日本的军事力量参加国际协调，应积极参加联合国宪章规定的集体安全保障措施，并不失时机的修改宪法第九条第二款与之不相适应的内容。

（二）为“海外派兵”合法化提出新论点。联合国维持和活动不与宪法第九条相抵触；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是制定宪法时未能考虑的新事物，因此不能说其违反宪法；日本作为联合国的一员，有义务帮助受侵略的国家。

（三）将“安全保障基本法”作为向修改宪法过渡的第一步。其主要内容是：（1）日本拥有主权国家固有的个别自卫权和集体自卫权。（2）日本为了自身的安全，可与有密切利害关系国家缔结安全保障条约，与条约缔结国采取共同的防卫行动，按该防卫条约进行，但是，这种行动仅限于在日本及该国受到紧急而不正当的侵害后，在联合国集体措施取得效果之前所采取的必要而最小限度的实力手段。（3）积极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4）自卫队可拥有用于日本防卫所必要的、最小限度的军事力量，其任务包括上述1-3的活动。（5）自卫队实行严格的文官统制。（6）日本在注意周边国家的军事平衡的基础上，在军控、裁军，特别是在废除核武器方面作贡献。（7）对日本进行经济合作对象国的军事预算、武器贸易、大规模破坏性武器的拥有情况充分留意。

宪法调查会提出修改宪法报告后，在日本各界引起很大反响。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之一。

宪法调查会强调PKO（联合国维和活动）与日本宪法不相抵触。PKO是在冲突当事者之间就解决纠纷达成协议之后，以联合国为主体来完成这些协议而进行的活动。这种冲突不是与日本的利益有关的国际冲突，也不是以行使武力和威吓为目的的。因此与宪法第九条第一款的内容完全不矛盾。

该会强调，一部分人认为在PKO问题上，日本可以拥有用于自卫的最小限度的军事力量，但是不能派往海外，这是错误的。实际上只要把自卫力量用于为世界和平作贡献便是理所应当的。PKO的重点是完成除军人以外的非常困难的军事活动，日本即便不是为了自卫，只要是为了世界和平就是无可厚非的。该会强调，PKO产生在日本宪法之后，因此宪法第九条未能涉到不足为奇，既然如此，说参加PKO是违反宪法自然不能成立。

1993年，日本读卖新闻社又成立了“宪法问题研究会”，在对上述建议进行了近两年的研究后，于1994年11月3日发表了“修改宪法草案”。该草案的中心内容是要求宪法承认天皇在对外关系方面具有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性质：承认日本可以拥有自卫力量（军队）；允许向海外派遣自卫

队队员等，同时也加了某种限定。其意在为修宪进一步造舆论。

海湾战争爆发后，为日本当局向海外派兵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1990年4月，美国总统布什向海部首相提出，希望日本派遣扫雷艇参加多国部队的行动。为了响应美国的要求，日本政府除向多国部队提供上百亿美元的资金援助外，还于当年10月向国会提交了"联合国和平合作法案"，打算以此为依据向海湾地区派遣自卫队和舰艇，但在国内外的反对声中该法案一度搁浅。海湾战争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日本出钱不出人的作法强烈不满，使日本政府的面子受到伤害。1991年4月24日，日本政府绕开国会，以政令形式决定向海湾派遣扫雷艇，协助多国部队作业。此后，日本又于1992年6月5日和15日分别在众参两院强行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案"（简称PKO法案）。根据这项法案日本自卫队可以以自卫队员的身份，携带武器装备，以部队的形式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且在人身生命受到威胁时可以用武器进行自卫。一旦日本因参加联合国维和活动而与其他国家发生武力冲突，便有可能与日本宪法相抵触。

PKO法案以立法的形式在国会通过，是日本一个时期以来的大国主义思潮的反映。随着自卫队正式派往海外，必然引起日本战后宪法体制、安全保障及防卫政策的变更等一系列连锁反应。表明日本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期。目前已经跨入世界军费大国的行列。据报道，日本自卫队为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已准备购买具有长距离续航能力的大型运输机和空中加油机。日本陆上、海上自卫队决定从1992年7月开始在民用通讯卫星上搭载军用通讯器材，以确保军事通讯线路的畅通。日本战后成为经济大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有赖于日本和平宪法的保障。近年来，日本一些政治家强调向政治大国迈进，日本的鹰派势力更提出"国际安全体制新概念"，认为对国际安全履行义务不违反日本宪法第九条，主张把自卫队作为联合国机动部队使用。日本舆论认为，向海外派兵合法化必将架空日本宪法，从而导致宪法规定的和平主义路线发生根本变化，使战后和平宪法名存实亡。

现阶段，日本国内围绕护宪和改宪的斗争仍将继续，并可能成为今后日本政党分化组合的一个斗争焦点。日本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和最高法规，要对其修改，需要严格的程序和条件。宪法规定："本宪法的修订，必须经过各议院全体议员2/3以上的赞成，由国会创议，向国民提出，并得其承认。此种承认，必须在特别国民投票或国会规定的选举时进行投票，必须获得半数以上的赞成。"1955年以来，长期执政的自民党虽然一直主张修改宪法，但始终未能如愿。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此举很难获得国会2/3以上的赞成。一则自民党难以占国会议席的2/3，二则社会党及日共等坚决反对改宪。1994年6月，村山作为社会党领袖，战后以来首次出任首相，此时社会党政策虽作出重大修改，但在护宪这一原则问题上仍未让步。与社会党一同联合执政的自民党也不像从前那样强烈要求改宪，而是首先考虑维护联合政权的稳定，以免因改宪问题引起自民党与社会党的分裂，加之社会党已承认自卫队符合宪法，部分满足了自民党的需要。否则，只要社会党和自民党一致同意改宪，是很容易在国会内获得2/3以上多数赞成的。

1995年是日本政界重新分化改组之年。

自90年代以来从自民党分裂出来的各路小党与公明党等合并为的新进党，有可能成为未来推动日本修改宪法的主要势力。而以社会党为基础形成的"民主自由势力"或新的政党，则可能与日本共产党等继续坚持护宪立常

第七章警惕日本向海外派兵

近年来，中国和亚洲国家人民对日本向海外派兵的警惕性越来越高，对日本增强防卫力量，突破军事方面的禁区越来越担心。

这绝非空穴来风，无中生有，故作紧张之态，而是日本右翼分子顽固地否认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纲领，妄图推翻对日本战争罪犯的正义审判，一味地否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性质，逐年增加军事费用，着重在质量上建军，频繁地举行针对中国、苏联、朝鲜的军事演习，图谋修改法律向海外派兵，为海湾战争筹措大笔战费，对慰安妇的赔偿极不积极、企图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篡改历史教科书，谋求政治大国地位。……这一切，都不能不令人高度警惕！

一、日本的扩军与军事力量——日本以雄厚的经济基础为依托，大幅度增加军费加快扩军速度，提高军队质量，追求军事大国地位，这不能不引起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的警惕！

据日本《赤旅报》1996年10月14日报道：日本军费数额之大，是其它亚洲国家所无法比拟的。根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9日公布的1996至1997年版《军事力量对比》年度报告，1995年，日本军费为472亿美元。这一数额相当于东盟九国（包括将要加入的国家）军费总和的三倍以上，是中国（317亿美元）的1.5倍以上，约是北朝鲜（52亿美元）的10倍。这11个国家的军费合起来才与日本相当。

日本军费逐年增加，1996年度预算为48455亿日元（1美元约合110日元）。从绝对数额来看，根据《军事力量对比》年度报告，1995年度日本军费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位居世界第三。1993至1994年版的该年度报告曾显示日本位居第二。

日本政府已决定实施中期防卫力量整備计划，从1996年度开始，5年间拨款25万亿日元，大幅度扩充军备，今后军费将日益扩大。

自卫队作为美国战斗力量的“补充部队”，一直在不断扩大。即使从主要装备来看，日本已经拥有了100架以苏联潜艇为目标的P3C反潜预警机，并在美国的要求下，以每架550亿日元引进了四架预警与控制飞机，具备了补充美国战略的最新式武器。根据今年开始实施的中期防卫力量整備计划，日本将更新保护美国航空母舰的护卫舰，大量引进与美国联合研制的E2战斗机，扩充直升机预警系统，提高“爱国者”导弹的性能。

日本对驻日美军的负担增加也很明显。根据美国国会的一份调查报告，日本在土地租赁、征用当地劳动力以及设施建设等方面，为驻日美军付出的开支（美国方面称“直接援助”）1995年度为33亿美元，相当于德国的5.5倍，英国的8.3倍。而且，各国都在减少自身的负担，唯有日本在增加。

经过战后四期防卫力量发展计划的建设和发展，日军的体制已基本定型，已发展成为约30万人的高质量军队：陆军18万人，5个军部，13个步兵师，3个特种兵旅，8个防空导弹群，6个航空队，坦克990辆，飞机480架。

海军：4个护卫队群，2个扫雷队群，2个潜水艇群，7个航空群，

5个地方队，舰艇200艘，24.7万吨，飞机350架。

空军：14个战斗飞行队，1个侦察机航空队，2个运输机飞行队，7个防空导弹群，31个航空管制警戒队，飞机920架。

我国日本问题专家童心在《日本军事大国倾向》一文中，对日本自卫队的质量作过如下精辟分析：日本战败后制定的“和平宪法”明确规定，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尽管如此，日本“自卫队”经过40余年的发展，已成为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军队，是亚太地区除美、俄之外现代化水平最高的一支武装力量。目前日军总兵力约30万人，规模虽不庞大，但编制精干，军官和专业技术骨干比例较高，是一支适合迅速扩充的骨干型军事力量。在常规武器方面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陆军装备的90式坦克在火力、机动性及自动化程度等方面均列世界各国主战坦克之首。海军“宙斯盾”级驱逐舰总吨位达7200吨，装备世界最先进的“宙斯盾”舰载导弹系统。空军拥有E-15战斗机200多架，数量仅次于美国。九十年代以来，日本加快了军备发展的步伐，特别是以使军队应付多元化威胁、执行多重任务为目标加速质量建军。根据1996年至2000年5年军备发展计划。到下个世纪初期，高技术兵痞的比例明显增加。陆军主要装备的自行化比例，部队的火力、机动能力将有新的提高；海军将拥有4个以“宙斯盾”级驱逐舰为主力的8·8舰队（即由8艘驱逐舰和8架直升机组成的舰队），其作战能力将居世界同类驱逐舰编队之首。同时，海军舰艇将进一步向大型化、导弹化、隐形化方向发展；空军将在继续保持E-15战斗机数量优势的同时，装备日美共同研制的E-2型战斗机，该机性能超过了E-16战斗机，将成为日本空军的主力机种之一。同时还将陆续引进空中加油机、新型运输机、大型运输舰，提高兵力的远距离投送能力；发射自己的侦察卫星，更新C3I系统，完善后勤建设，提高综合作战99第七章警惕日本向海外派兵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上述目标实现后，日本的军事力量将大大增强，其对亚太发展中国家的军事优势将更加明显。日本在加强军事力量建设的同时，还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不断渲染别国的军事威胁，强调自身所受威胁的多元化，赋予军队除国防以外的多种任务，利用一切可乘之机积极向海外派兵，极力扩大在国际上的军事影响，强化日美军事同盟，扩大日美军事合作范围，以日美安保体制为掩护提高自身的战略威慑力，争夺在亚太安全事务中的主导权。种种迹象表明，面向即将到来的21世纪，日本将把军事力量作为推行国家战略的主要手段之一，把发展军事力量作为提高综合国力的重要内容，使长期以来以抵御侵略为主要任务的“内向型”军队向更多参与国际事务的“外向型”军队转变。

更令人警惕的是日本以雄厚的经济基础为依托，今后将更加快扩军速度，提高军队质量。1996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就是明显的例证。童心以《日本军事力量的发展值得注意》为题，为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敲响警钟：日本政府正式发表的1996年版《防卫白皮书》是自1970年以来的第22期。与往年所不同的是，新版白皮书在书名后首次增加了“面向新时代”这一醒目的副标题。在前言中强调“自卫队迎来了新的时代”，给人一种很强的时代感。从文字内容上看，它以去年11月出台的新《防卫计划大纲》和今年4月日美首脑签署的《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为基础，全面阐述了新时期日本的防卫政策和军队建设指导方针。若站在分析新时期日本军事战略调整和军事力量发展趋势的高度来研究白皮书，就不难发现书中许多

值得思考、甚至令人感到怀疑和警惕的东西。

童心令人信服地指出，日本在冷战结束后，正以中国、朝鲜、俄罗斯的“威胁”为借口，继续增强防卫力量。

白皮书对亚太地区形势和日本周边安全环境的分析判断是，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虽保持相对稳定，但仍存在许多不稳定因素，地区内许多国家“致力于军备扩张和军队现代化”，特别是“北朝鲜开发核武器的危险依然存在，并正在研究远程导弹，是影响日本及亚太地区安全的重大不稳定因素”。关于俄罗斯，白皮书虽未使用是“日本安全的潜在威胁”或“地区安全的不稳定因素”等提法，但仍指出，鉴于俄罗斯未来政治、经济形势仍不明朗，对俄军事动向应继续予以“关注”。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白皮书对中国军事动向的论述较以往明显增多，其篇幅由去年的4页增至7页。白皮书强调，对中国核武器及海空军力量的发展，海洋活动范围的扩大，在台湾海峡举行军事演习而“导致该地区局势紧张”等军事动向，日应予以“关注”。

上述论述似乎在告诉人们，即使在冷战结束、世界不断趋向缓和的今天，日本仍处在一个不安全的环境中，日本不仅要对付朝鲜半岛发生危机时的紧急事态，还要警惕中国和俄罗斯的军事动向，随时准备应付来自各方的威胁。但实际上，在日本军队日益现代化、日美军事同盟不断得到加强和巩固的今天，无论是俄罗斯、朝鲜，还是中国，有谁能构成对日本的军事威胁呢？然而为什么日本在其它国家的军事动向上大作文章呢，答案只有一个，这就是，日本在国际形势不断缓和、世界主要军事国家纷纷裁军的新形势下，仍在不断寻找新的依据和借口来继续加强军事力量，追求军事大国的地位。

面对周边的不稳定形势和许多令人“关注”的国家，白皮书强调，为防止“成为力量真空”，日本要继续增强军事力量。

A 突破禁区成为军费大国日本早从1987财政年度财政预算，就废除了防卫费占国民生产总值1%的上限。这个上限是三木内阁在1976年11月的内阁会议上决定的，但中曾根内阁却于1987年1月召开内阁会议，决定了新的防卫费基准，把不超过防卫费国民生产总值（GNP）1%这个定量限制，改成了表明“总额方式”。

这个撤掉防卫费定量性限制的行动，是日本决定加快建军速度的最突出、最有长远意义的行动，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响，惊呼日本在军事上有了第一次突破，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乃至无数突破。

因这个防卫费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1%的上限在日本非同小可，被视为约束日本扩军的象征。其后的大平、铃木内阁又将其作为日本不当军事大国、不给亚洲以威胁感的标志。

因此日本当局的这一重要举措引起日本在野党的强烈反对，亚洲国家也纷纷表示极大的不安和警惕，使日本首相向东南亚国家郑重做出的“日本不当军事大国”的诺言的分量已大大减轻，使人们觉得日本人不可信了。

果不其然，日本军费在开了这个口子后，每年以2-3%的增长率上涨，从1987年度324亿美元，增加到1994年度的459亿美元，1995年度增至472亿美元，1996年度更增至484亿美元。军费总额仅次于美国，为世界第二；若按军人人均军费计算，则日本名列世界第一，为18.9万美元，为适应要做政治大国的需要，日本重点加强海军建设，把海军武器装备的高技术化摆在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为此，优先向海军拨款。日本海上自卫队1991度的预算为79亿美元，1992年度增至近

90亿美元，1994年度为100亿美元，90年代末将达到180亿美元。与此同时，正加快海军舰艇和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并使之高技术化。

现在，日本海上自卫队已成为亚洲地区作战能力最强的一支海军，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系统和亚洲最大规模的驱逐舰队，其扫雷能力居世界第一位，反潜能力仅次于美国和俄国，早已超过了保卫日本自身的需要，却还在大幅度增加军费，这在世界普遍裁军的形势下，不能不引起世界人民的高度警惕。

A 日本右翼的扩军叫嚣日本右翼分子对日本自卫队目前的现状仍不太满意，他们主张日本迅速扩军备战，甚至发展核武装，以便利用强大的军事力量去攫取争夺各种利益，使自己的力量超出自卫的范围而成为进攻的手段。日本的右翼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竭力主张日本成为军事大国。

在这方面，清水几太郎教授提出了非常完整的理论和实施方案。

清水教授认为，作为最必要的第一步，日本必须“创建新的国军”去取代迄今的自卫队。

他特别强调日本要“新建一支航空母舰部队”以“保卫我国这样的经济大国”。

他写道：“为了日本作为国家而拥有真正的防卫力量，把自卫队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国军，我们应当做什么？自卫队必须进行根本的变革。与其说是改善自卫队，不如说是创建新的国军。”清水教授提出：“像我国这样的经济大国，始终要靠由美国纳税人出钱建立的军队来保卫，这是不正常的。如今，在美国国内，剧烈的反日感情乃至厌恶日本的感情正在高涨，这也是有其原因的。美国人民难以理解，他们负担着高额税金保卫中东等地，究竟是谁受益最多？能源99%依赖海外的日本乃是最大的受益者，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确凿事实。

如果中东的石油停止了，那么，即使不进行武装进攻，日本也将立即崩溃。

“不仅中东地区的稳定靠美军来维护，而且连我国本身为免遭进攻也要靠美军来保卫。

但是，另一方面，日本却倾盆大雨地向美国出口汽车、家用电平等商品，造成了美国国内的失业--美国人民就是这样看待我们的。厌恶日本的感情，从他们的逻辑来说，实在是理所当然的。

“经济大国日本首先必须拥有在同美军协调的基础上能够靠自己的力量保卫本国的防卫力量。而且，要为致力于提高西方阵营的战力、世界的安定而作出某种贡献。要能够在盟国提出要求时派遣航空母舰舰队到那个海域去。与美军之间，也可以采取分担巡逻区域的办法。这是如今业已成了大国日本对世界当然要做的事情。

“具体地说，可以考虑拥有两支与美国第旗舰队的航空母舰部队相同规模的航空母舰部队，一支用以保卫北太平洋，另一支则用于印度洋到南中国海的巡逻。”请注意：这里清水教授提出，一支航空母舰舰队要用于“印度洋到南中国海的巡逻”。

为了大力增强日本军事力量，清水教授还发表了建立国军的方案，即《日本应该拥有的防卫力量》的建议，其全文如下：A《日本应该拥有的防卫力量》日本必须紧急地开展增强防卫力量的工作。

创设攻击兵力一、改变核政治。拥有核武器的四种选择：(1) 实行独

自的核武装；(2) 采取西德方式；(3) 拥有核武装的美国陆军新驻扎在日本；(4) 宣告许可美军把核武器带进日本。采用这四种政策中的任何一种都是可能的。

二、创设航空母舰舰队。以四艘攻击型航空母舰为中心，由巡逻舰、驱逐舰、潜水舰等100艘舰只组成，拥有战斗机、攻击机、反潜巡逻机等约1000架。

- 一、在水面舰艇上装备对空导弹（目前装备了三艘）。
- 二、装备地对舰导弹。
- 三、配备小型护卫舰作为对付敌舰的部队。
- 四、配备水中固定的潜水舰探测系统。
- 五、贮存封锁海峡用的水雷。
- 六、增强扫雷部队（目前有40艘扫雷舰）。
- 七、为了给舰队护航，把护卫队群增强到17个（目前是四个）。
- 八、增加反潜巡逻机、反潜直升机（目前有巡逻机132架、直升机

59架）。

加强航空防卫力量一、雷达站地下化。

- 二、在雷达站周围配备对空武器。
- 三、新设十个移动式雷达队。
- 四、把预警机增加到30架（现在为4架）。
- 五、配备E15截击战斗机350架（现在为老战斗机230架）。
- 六、配备战术战斗轰炸机300架（现在没有）。
- 七、在航空基地配备对空火器。
- 八、加强民用机场的跑道。
- 九、把对空导弹增加到540座、15个群（现在为216座、6个群）。
- 十、把陆上自卫队的野战用防空导弹增加到15个群（现在为7个群）。
- 十一、为了从空中保护运输舰队，在南方航路上的各座岛上建立雷达

站。

- 十二、把侦察机增加到80架（现在14架）。
- 十三、发射侦察卫星（现在没有）。
- 十四、把运输机增加到100架（现在是40架）。

加强陆上防卫力量一、增加反坦克导弹。

- 二、引进武装直升机（现在仅仅是作为试验用）。
- 三、每一个师配备坦克200辆到300辆（现在定额为48辆）。
- 四、增强对空火力（现在是一个师配备高射机关炮6门）。
- 五、为北海道的师配备装甲运兵车300辆（现在为十数辆）。
- 六、使火炮现代化（现在使用的火炮与世界水平相比，落后一代甚至

两代）。

- 七、在北海道贮存增援部队用装备（现在没有）。
- 八、对师进行根本的改革。

加强总体防卫力量一、确立紧急状态体制。

- 二、确立国家总动员体制。
- 三、确立民间防卫体制。
- 四、加强情报的统一综合利用功能。
- 五、提高后方补给能力。

六、加强兵器的研究开发。

清水几太郎更进一步主张日本实施核武装。清水几郎特别在日本核武装问题上，竟然向战后日本社会舆论之“禁区”挑战。

他主张废除日本迄今执行的“非核三原则”。他说：“我国，迄今为止的核政策是非核三原则，即所谓‘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由于订有《原子能基本法》、《防止核扩散条约》等文件，即使在法律上，我国也被禁止拥有独自的核武器。但是，法律当然要根据情况发生变化而改变。”“必须改变非核三原则等禁止我国拥有核威慑力量的政策与法律。”

“清水教授认为，在核武器问题上，日本可以仿效西德的做法。他说：“在考虑日本的核政策时，西德的做法可资参考。”

西德首先是承认拥有核武器的美军驻扎。西德并非一切都交给驻留的美军去办。现在，西德国防军拥有许多核武器运载手段。只是，其核弹头由美国拥有和管理，西德不能单凭自己的意志使用核弹头。能发射和运载这些核弹头的西德军队中的有关部队，一旦有事，就得提供给北约军队指挥。一旦美军提供了核弹头，发射命令也将由北约军队司令（美国军人）下达。”但是，清水教授的真意是日本拥有独自的核武装，犹如法国那样。

他说：“第一是实行独自的核武装。这就是法国、中国等国家的做法。在技术等方面，日本已经可能制造与美苏所拥有的洲际导弹相同水平的东西了。”清水教授竭力宣扬核威慑力量之功用。他写道：“许多国家虽然已经拥有核武器，但是，它们都知道使用核武器会有招致自身毁灭的危险，所以不轻易使用。尽管不使用，而拥有核武器，就能够对不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造成巨大的威胁。像日本这样，不拥有核武器只是一个胆小怕事的国家，在那些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看来，是最容易打垮的国家。向日本施加政治压力，就好比扭拧婴儿的胳膊一样。”

“核武器是重要的。如果我们拥有作为人类第一个受原子弹灾害的国家的特权，那么，这个特权就是，正是日本可以首先制造和拥有核武器。没有比《禁止核扩散条约》更露骨地表明核武器拥有国的利己主义的东西了。日本缔结这个条约，除了说明日本的软弱外，并不对世界和平有所贡献。”作为鼓吹“核武装论”的一个根据，清水教授着重宣传日本如今进入了“新的战后”，必须对一切都有新的看法。他说：“保卫日本”有种种方法、手段可以利用，而说到底，就需要警察和军队。但是，军队在日本这个充满自由和平等的国家里，却比谁都严重地被剥夺了自由和平等”。在这里，清水教授为今天的日本军队没有战争年代的那种“自由”而鸣不平了！

A 日本扩军，令世人不安 96年10月18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达君题为《威胁来自“威胁论”的鼓吹者》的述评文章。文章指出：近年来，日本一些势力对鼓吹“中国威胁论”特别卖劲。

今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比以往更加突出地强调所谓“中国威胁”，并首次提出，中国“推进核战力和海空军力量的现代化，扩大在海洋的活动范围，在台湾周围进行军事演习，从而导致台湾海峡局势紧张等，对这一动向必须注意”。前不久，日本国际关系论坛递交给桥本首相的一份报告称：“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在谋求超级大国地位和霸权，这是危险的。”对中国过去进行的有限核试验，也是日本嚷得最凶，与它对美国等国进行的核试验的态度形成巨大的反差。

人们不会忘记，日本在近代史上，一直是亚洲国家的最大威胁。明治

维新以后的70多年里，日本对外发动和参与了14场侵略战争，其中10场是针对中国的。日本把它的军队开到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领土上，烧、杀、淫、掠，无恶不作，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今天，日本把曾经遭受它欺凌的中国说成是威胁，这是别有用心。

战后，日本并未象德国那样痛痛快地承认史实，进行认真的反剩半个世纪以来，日本总有那么一些势力一有机会便替战犯和侵略罪行翻案。在去年二战结束50周年之际，日本本应对历史认识来一番彻底的清理，同过去的顽固态度划清界限，可是日本交出的却是一份令人失望的答卷。今年7月底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步11年前一位首相的后尘，参拜了供奉有甲级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在此前后，日本政府还纵容右翼分子登上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这些活动一方面表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在抬头，同时也表明经济上崛起的日本又犯战前的毛病，不把别国人民的感情和别国的主权放在眼里了。

这些年来，日本相继打破了一个个确保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禁区。如宪法不允许日本拥有军队，而日本却以"自卫队"的方式建立起名副其实的现代化军队。这个军队今天拥有世界上先进的常规武器。

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舰艇很多，普遍装有新式武器，其潜水艇是适合远洋作战的最高性能潜艇。日本从1988年起着手建造宙斯盾驱逐舰，它完全可以与美国最先进的舰艇相匹敌。日本军方还有人主张日本要拥有自己的航空母舰。陆上自卫队的国产装备的性能也已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航空自卫队拥有185架世界上先进的美制E-15战斗机，并计划近期增加到223架；日本还拥有世界上先进的"爱国者"导弹，航空自卫队的6个防空导弹大队的24个中队已经配备了120部"爱国者"地对空导弹发射装置。

事情明摆着：日本一面信誓旦旦地说它"决不做军事大国"，一面扎扎实实地发展军事力量。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今年10月9日公布的一份报告说，1995年度日本的军费达502亿美元，在世界上居第三位。这一数额相当于东盟7国和将要加入东盟的两个国家军费总和的3倍以上。日本不惜重金进口世界上性能最好的武器，它在这方面的开销也使其步入世界大国的行列。

80年代以来，日本还打破了防卫费不能超过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一、日本不能向海外派兵等禁区。今年日美两国首脑签署《日美安保联合宣言》，将日美军事合作范围从《日美安保条约》规定的"保障日本安全"扩展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亚太地区"。为此，日本正致力于打破宪法中关于日本不能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规定。

日本的上述动向给亚洲地区形势注入了不安因素。有着侵略前科的日本今后将走什么样的道路，已引起世界人民，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的普遍担心。

与日本相比较，中国的国防开支大大低于日本。日本跟在美国后边说中国国防费用增长速度如何惊人，这是在蛊惑人心。

在近代史上，中华民族曾经饱受列强的侵略、压迫和掠夺。新中国成立以后，无比珍视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并且力主尊重各国主权，努力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今天，中国经济与过去相比虽然取得了一些进步，但12亿人口平均下来，人均收入还很低。消除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仍是我

们的一项繁重任务。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有可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为此，中国需要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

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是倡导、维护亚太地区以及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谋求超级大国地位和霸权”的不是中国，恰恰是步美国后尘的日本；所谓“威胁”，正是来自鼓吹“中国威胁论”的日本及其盟友美国。日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要转移国际社会的视线，使各国放松对它的警惕，以便它悄悄地实现梦寐以求的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目标。

韩国《朝鲜日报》10月14日发表汉城大学教授张达重题为《日本仍没有放弃扩张的野心》文章，文章指出：冷战结束后，日本的外交政策成为亚洲太平洋地区国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日本是顺应时代潮流走相互依存的“共生”道路，还是同时代潮流倒行逆施追求符合自己的经济力量的政治和军事霸权，对于这一地区国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关键问题。

从历史上看，亚洲的和平只有在日本将其外交课题同时代潮流相统一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

当然还很难断定现在日本是在施行同时代潮流倒行逆施的外交路线，但我们之所以对日本的动向如此不安，是因为一直对日本不正确的外交选择进行遏制的制度和政治基础正在逐渐崩溃。

日本最大的政党自民党把对独岛、钓鱼岛和北方四岛的领土主张写入选举公约之中，同时也提出了参拜靖国神社一事。在冷战时期的80年代末期还无法想象这些问题竟然能够写入政治公约，这就是日本国内政治的潮流。

无庸讳言，近来的外交政策是引起日本国内舆论向两极化方向发展的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同时也是促使保守势力同革新势力继续对立的核心问题。保守势力和革新势力之间的对立，在冷战体制下是围绕着日本行使何种国际作用问题的对立。但随着冷战的结束，这种对立轴心崩溃了。换句话说，现在以遏制日本政治的保守右倾化的社会党和工会为代表的革新势力实际上已经解体，因此日本此次选举带有“保守”同“保安”对立的色彩，具体地说就是桥本龙太郎的自民党同小泽一郎的新进党之间的对立。

当然也并不是不存在第三级，日本人希望民主党能够成为代表进步势力的政党，重要的是民主党对美日安全体制采取否定的立常同日本政治的保安化倾向一起令我们不安的还有，遏制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在制度上的保证正在名存实亡，而军费开支则逐步增强。四个非正式的遏制因素：无核三原则、禁止出口武器、防卫开支保持在国民生产总值的1%以内和禁止自卫队向海外派兵实际上都已经遭到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在北方同俄罗斯在北方领土问题上，在南方同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展开了领土纠纷。同时，日本不仅不对过去进行清算，还把参拜靖国神社写入选举公约，这更加强了周边国家的警戒和不安。在战后40年时间里，德国共支付了864亿马克（约合560亿美元）的赔偿金，而日本只支付了2500亿日元（约合22亿美元）。因此，在外交政策上，日本不要大谈什么领土问题和参拜靖国神社，而应该把精力更多地放在清算过去和战后赔偿问题上。

纵观过去100多年间日本的外交政策，可以说都是从极端走向极端。19世纪的“脱亚入欧”政策到本世纪30年代换成了“大东亚共荣圈”和侵略战争，而战后则以建立试图成为西方一员的美日同盟体制的姿态而出现。

现在，对日本右翼政治势力领土扩张的动向进行道德上的说服作用十

分有限，对这种动向进行政治和制度上的遏制的基础正在崩溃，我们应该通过国际上的压力防止日本走向极端。

二、日本突破向海外派兵禁区

——海湾战争打响后，日本于1991年1月24日决定派航空自卫队去海湾运送难民，并于战后的1991年4月24日做出《关于向波斯湾派遣扫雷艇等》的决定，迈出了向海外派遣自卫队的第一步。……1946年日本通过的战后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战争和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冲突的手段。为达此目的，不拥有陆海军及其战斗力。由于日本战败后国力衰竭，所以日本不得不采取“轻军备优先发展经济”的路线，而宪法第九条则成为日本战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主要法律依据。

多年来，日本人慑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给中国和亚洲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基于对过去发动侵略战争的反省和宪法第九条的限制，一直把“派兵出国”一词视为“禁区”，谁也不敢触犯。

因为日本是个岛国，如果自己不跨海出征，绝少其他国家进犯四周皆汪洋大海的事情。

因此，是否向海外派兵，长期以来是日本各政党斗争的焦点，日本右翼分子总想在派兵问题上有所突破，但在国内外舆论强烈反对下不敢轻举妄动。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日本立即向海湾国家提供了30亿美元经济援助，并于同年10月16日由海部内阁向国会提交旨在参与维持和平行动的《联合国和平合作法案》即PKO法案。一石激起千层浪，此举在日本国内引起激烈争论，结果该法案于同年11月10日成为废案。然而“和平合作法案”出笼一事本身，已预示着日本政府将对以往的政策做根本性调整，以法律形式使日本向海外派兵正当化、合法化。

日本右翼分子急不可待地等待时机，不久海湾战争爆发，为日本向海外派兵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据《跨世纪的日本》一书介绍，情况如下：1990年11月，日本政府借海湾危机之机第一次向国会提出派兵法案，即“联合国和平合作法”，因遭到日本在野党和广大国民反对而成为废案。但日本政府及自民党一直在为通过新的有关法案而加紧活动。首先是争取部分在野党的支持。经过一番折冲樽俎后，自民党与公明党、民社党在1990年底达成以下共识：日本要为国际社会提供人力贡献；与自卫队分开，单独成立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组织；根据联合国决议进行人道援助及救灾活动；尽早制订有关法案，并争取国会通过，从而形成所谓“自公民”三党联手态势。此后自民党加紧拟定新法案，1991年6月确定了《国际和平合作法》（PKO）法案的基本方针：（1）同意自卫队参加新组织。

（2）自卫队可以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3）自卫队不参加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的活动，停火状态变化时自卫队要撤离。据此，日本政府于同年9月再次向国会提出PKO法案。

新提出的PKO法案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那就是允许自卫队成员

兼任国际和平合作队成员派往海外。同时P K O虽然规定了自卫队员使用武器仅限于保护自身，但未具体规定使用何种武器。因此一些国际舆论认为，该法案比成为废案的"和平合作法"有过之而无不及。

1991年1月17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向伊拉克发动了"沙漠风暴"作战计划，一场牵动世界政治神经的海湾战争打响了。

海湾战争打响后，日本立即召开了"内阁海湾紧急对策本部"会议，于1月24日决定将派航空自卫队去海湾运送难民，算作对美国的人力支援。防卫厅1月19日提出具体设想：(1)派遣航空自卫队C130H型战术运输机5架。(2)派遣机组人员45人，地面及后方支援人员200人。(3)以埃及的开罗为据点，从约旦的安曼将难民运往开罗或叙利亚。22日航空自卫队着手对飞机检修，随时待命起飞。尽管日本政府强调，此举"是在非军事领域或负责救助难民，属人道主义措施"，但战后以来日本向海外冲突地区派遣自卫队尚属首次，它很可能成为今后日本军队介入国际冲突的第一步。

日本政府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参与国际争端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日本政府1990年提出的所谓"联合国和平合作法案"成为废案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因此，如何使自卫队介入海湾战争合法化，是当时日本政府绞尽脑汁考虑的难题之一。经过反复权衡比较后，日本政府最后决定采取绕开走的方式(即绕开宪法和自卫队法)。

据报道，日本政府决定以总理大臣特例政令方式认可派遣航空自卫队。海部强调，这种派遣仍为"非军事性的"，所以不违反宪法。根据《自卫队法》第100条第5项规定，自卫队"可以用飞机运送国宾、内阁总理大臣其他政令所决定者"，所以，日本政府企图钻这个条文的空子，用特例政令形式宣布"难民"也可作为自卫队运输对象。然而，这遭到日本在野党谴责，当时的社会党委员长土井指出："不经修改自卫队法，而依靠制定特例政令就决定派遣自卫队(飞机)，其责任极其严重"，"将成为向海外派兵的先例"。日本报界称，运送难民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进行，如支援汽车等，但是出动自卫队就不能不令人担忧。

日本政府置若罔闻，海湾战后又于1991年4月24日做出《关于向波斯湾派遣扫雷艇等》的内阁会议决定。

海湾战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所造成的一个客观结果是，日本在国内法律体制尚未建立的情况下，迈出了向海外派遣自卫队的第一步。

但是，日本要向海外派兵，需要法律手续予以批准，便加紧活动通过P K O法，以"名正言顺"地向海外派兵，为此大造舆论。正在日本这股海外派兵正当论升温之际，1992年3月15日联合国为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而成立了联合国柬埔寨临时行政机构，日本人明石康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主持这一机构。他一上任便与日本外务省相互配合，多次敦促日本政府派遣自卫队参加联合国在柬埔寨的维和活动。

日本政府也一直与柬当时的洪森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最终以对洪森的支持和经援，换取了洪森对日本向柬派出自卫队的"邀请"。

此后，日本政府及主张外派自卫队的各种势力均大力宣传，日本要在柬埔寨维和活动中作出人员方面的国际贡献。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参议院国际和平合作特别委员会时隔4个月又重新开始审议"P K O法案"。1991年6月15日，经过国会内的激烈斗争，P K O法案在通常国会上有条件地

通过。这些条件是日本参加和平合作队时的基本方针，包括五项原则：(1) 冲突当事国达成停战协议。(2) 包括维持和平队活动地区所属国家在内的冲突当事人，同意日本参加维持和平队及有关活动。(3) 该和平队不偏向于冲突中特定的一方，严守中立。(4) 上述各项原则中任何一项得不到满足时，日本可以撤出参加的部队。

(5) 使用武器仅限于旨在保护要员生命等所需的最小限度。

“PKO法案”共分5章27条，另有附则9条。该法规定国际和平合作活动内容包括16项：(1) 监督停战或监督冲突当事者的军队的重新集结、撤退、解除武装的执行情况。

(2) 在缓冲地带及其他为防止发生武装冲突而设置的地区驻留及巡逻。

(3) 检查或确认有无通过车辆及其他运输手段，通过行人携入或携出武器(包括武器零部件)的情况。

(4) 收集、保管或处理放弃的武器。

(5) 协助冲突当事者设立停战线及其他类似的边界线。

(6) 协助冲突当事者交换俘虏。

(7) 监督并管理议会议员的选举、居民投票及其他类似的选举或投票的公正进行。

(8) 对警察行政事务实行建议、指导或监督警察行政事务。

(9) 对(8)所列事务外的行政事务实行建议或指导。

(10) 医疗(包括疾病预防措施)。

(11) 对灾民的搜索、抢救及回归家乡实行援助。

(12) 对灾民发放粮食、衣料、药品及其他生活物资。

(13) 设立灾民收容设施或设备。

(14) 对因冲突受损坏、居民生活必需的设施或设备进行恢复的修缮。

(15) 为恢复因冲突而受污染或其他损害的自然环境而采取的措施。

(16) 除1-14项所列外，还有运输、通信、建设、保管(包括储藏)或机械设备的安装、检查及修理。

该法还规定了实行国际和平合作业务的前提条件、实施方法和和平限及国会对其的制约监督办法。该法规定，日本参加联合国和平维持活动时，必须获得冲突当事国的同意；为参加上述16项维持和平活动，向海外派遣自卫队之前，必须经国会批准；国际和平维持活动所需要的装备，以联合国秘书长认可的需要为限度；从事国际和平合作业务的总人数不得超过2000人；参加第1-6项内容的国际和平维持活动的日期从国会批准之日算起，一般两年，如需延长，必须在期满之前30天由内阁总理大臣提请国会批准，以后每隔两年必须办理同样手续。当实施计划的决定发生变更、实施内容结束以及在实施期间，内阁总理大臣有义务向国会报告，以加强国会对国际和平维持业务实施的监督。关于实施方法，该法律规定由“合作队”负责实施，海上保安厅长官应根据本部长的请求，派遣海上保安厅的职员利用海上保安厅的船舶和飞机从事国际和平维持业务，防卫厅长官则根据本部长的要求派遣自卫队部队参加。被派遣的海上保安厅职员及自卫队队员在执行任务期间，均同时保留原先的身份。“合作队”可携带由政令规定的小型武器，当本人及与本人在一起的队员遇到不得已事态、需要保护生命或身体安全时，可

以使用携带的武器。

“PKO法案”通过后，日本于1992年9月和1993年4月分两批向柬埔寨派出1200名陆上的自卫队员，参与维持和平活动中后勤和修路、架桥任务；日本航空自卫队首次派出6架C130H型大运输机执行任务；海上自卫队出动了3艘运输舰及补给舰。这是自战后以来日本陆、海、空军首次公开向海外冲突地区派遣并完成集体配合的实际演练。

1993年8月，以细川为首相的联合政府也表示，“要努力推进实现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和平，包括参加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要积极推进对联合国的合作及联合国的改革。”日本将和平与安全作为建立新秩序的首要任务，强调日本要坚持战后和平宪法，不像北约国家那样参加军事行动，但也要“付出一定的牺牲，承担责任和作用”。在人力支援方面，日本除向柬派出自卫队以外，还于1993年3月向莫桑比克派出了由自卫队陆、海、空自卫官组成的“和平合作队”。村山内阁同样表示，日本将继续稳步推进这种合作。日本防卫厅已将参加联合国维和活动作为对国际做贡献的重要方式，正式写入历年的《防卫白皮书》，大加宣传，称其并非是“以使用武力为目的，向别国派遣部队的所谓海外派兵”。

这一切，都不能不令人想平日本曾7次向海外派兵的情景--A 第一次出兵：争占朝鲜明治维新后，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确定了五步侵略方案：第一步征服中国的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第三步征服中国的满蒙地方（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第四步征服中国内地，第五步征服世界。

征服朝鲜是日本“大陆政策”的重要一环。日本把朝鲜看作“渡满（中国东北）桥梁”，不仅可以把朝鲜作为日本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而且朝鲜又可作为向中国大陆和俄国西伯利亚侵略扩张的跳板，因此马上产生了“即征论”和“缓征论”的争论。争论的结果认为，日本能不能征服统治朝鲜是“直接关系到日本对亚洲近邻国家树立权威的大事”，因此日本当局指示日本黑社会组织玄洋社首领头山满，着手策划向朝鲜出兵的阴谋。

1881年6月，在玄洋社会客室里，头山满正在与年轻英俊的朝鲜独立党首领金玉均举行私下会见。

头山满通过玄洋社驻汉城情报员葛生修亮获悉，在1880年前后，以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为首的朝鲜年轻贵族知识分子，对以大院君李熙应为首的保守党允许清朝公然干涉朝鲜内政，听任日本资本主义入侵极为不满，幻想效仿明治维新走上独立富强之路，金玉均便受国王密令，以贸易为名到日本寻求支持。头山满与当时的日本首相井上馨密商后，认为金玉均等开化党人是日本在朝鲜驱逐清朝势力时可以利用的力量，便安排了这次会见。

但是，狡猾的头山满却像一个令人高深莫测的魔术师，将自己对金玉均极感兴趣的真实意图掩藏得极其隐蔽，竭力装出漠不关心的态度，懒洋洋地问：“金先生，大院君性格刚强又得到国王，也就是他儿子的信任，大权在握，你们几个年轻人能成何大事？”金玉均见头山满如此蔑视他们，便一下急红着脸进行辩解：“尊敬的首领，我高宗皇帝温文慈善，极欲改变朝鲜的落后面貌，因而对开化党极为器重，已任命我为东南诸岛开拓使并负责外交工作，合作朴泳孝任广州留守，封洪英植为邮政局总办我们还得到中小地主和封建官僚、下级军官和新式军队士兵、城市商人、地方儒生的大力支持。我们登高一呼，自会有人云集响应！”头山满对此当然早有所知，听到这里，

眯缝着眼睛傲慢地问：“听说你请玄洋社代为筹集300万元外债，你打算以什么东西担保？”金玉均感到所提保证实在有被指责为出卖国家权益之嫌，但万般无奈，只好出此下策：“我高宗皇帝命我赴日前已亲口允诺，以郁陵岛木材采伐权、朝鲜东南海岸捕鲸权、朝鲜东南诸岛开拓权等作为担保。

圣意已定，决不食言！”头山满听了这些保证，脸上露出几丝贪婪的笑意，但随即眉头一皱，定出阴险毒辣的奸计：“片言只语犹如水上浮萍，空中烟云，怎能为凭？万一出事，我玄洋社岂不坐腊？要借钱就得把你作为人质，押在日本，不知尊意如何？”金玉均对头山满的无赖行径极为愤怒，但他一味想通过搞明治维新式改革，将朝鲜引上独立富强之路，对玄洋社和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并地无明确认识，听到这里哈哈大笑说：“我金平均争的是朝鲜的独立富强，为此不惜抛洒一腔热血，区区作人质小事，何足道哉？”金玉均振振有辞地说到这里，想到大院君正派人刺杀他，心头不免涌起一阵凄凉之感，鼻子一酸，眼中不觉流出两行热泪，但又马上意识到此举有失开化党人的威严，随即掏出手绢，擦掉泪水，毅然决然地说：“为显示我朝鲜礼仪之邦的风度，我情愿留在日本，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经验。我甘愿和日本政界要人和玄洋社等社团人士多多联系，还请头山满先生巧为斡旋！”头山满见金玉均并未识破玄洋社的狼子野心，不由心中大喜，为进一步把金玉均引上依靠玄洋社的错误道路，他又装出一副对金玉均极其赞赏的恳切态度，走到金玉均面前，轻轻拍着金玉均的肩头说：“金先生果然忠勇无比，义胆照人，我头山满总算没有看错人。井上馨伯爵要我转告你：日本的军务发展不只是为了日本自己的防卫，更重要之目的也是为了援助朝鲜获得完全独立，如果金先生在朝鲜执掌大权，朝日两国就能在一起实现许多宏伟目标！”1882年6月15日，的野半介带领玄洋社5个暴徒出现在朝鲜江原道金刚山山麓。

的野半介放眼四望，只见金刚山口，处处鲜花盛开，河畔溪旁，到处都是穿着节日“照格里”传统服装，用清水冲洗头发的男男女女。在碧绿的草地上，携带酒食的人们在一群一伙地举行洗头宴。树荫下，三五成群的老人穿着白色传统服装悠闲地闲谈弈棋。

短小精悍的“小诸葛”不由得手摇纸扇，口中啧啧赞叹：“朝鲜真不愧是礼仪之邦，贤人君子之国，金刚山真是蓬莱仙境，天下名山，人杰地灵，风景奇美，有口皆碑，人所共赞！”

“一个脸像被谁踩扁了的馒头一样的玄洋社暴徒田中侍郎，目不转睛地看着身穿大红大紫袍子正在洗头的朝鲜姑娘，嘴里的口水不觉哗哗而下，梦想有朝一日占领朝鲜后，抓几个天仙般的朝鲜姑娘好生享受一番。俄顷，他突然像从梦中惊醒一般，紧走几步，来到的野半介身旁问道：“首领阁下，这些朝鲜人在搞什么名堂？”多次来往于日朝间以经商之名搞情报活动之的野半介，左手摸着脸上稀稀拉拉的几点麻子，右手摇着纸扇得意洋洋地说：“今天是朝鲜的洗头节，凡能走得动的朝鲜人，都要用流水冲洗头发，除去污垢。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美貌动人的大姑娘，都专门登山爬高，到山涧去找清冽的溪流泉水洗头，达到冲邪躲避灾难的目的--但无论如何，我们玄洋社给他们带来的灾难是逃不掉的！”的野半介说罢冷笑不止，田中侍郎等暴徒哈哈大笑，活像得了神经病一般，引来不少朝鲜人鄙视的目光。的野半介忽然有所醒悟，以手执扇故作神秘制止状道：“你等且莫得意忘形，高声喧哗，须知我等负有陆军参谋本部和玄洋社交给的重要任务，且不可因小失大，

误了帝国开疆扩土的头等大事！”于是，玄洋社这一伙阴谋分子来到一个村子，把带来的棉布、染料、食品和日用杂品在街旁摆上小摊，先狡猾地把一些糖果食品分给几个朝鲜男孩。不一会儿，朝鲜男童的稚音便响遍全村：“做买卖的东洋人来啦，货色齐全，物美价廉！”刹时间，殷勤好客的朝鲜老大娘、小媳妇、大姑娘便纷纷拿着小米、大豆等农产品和龙虾、明太鱼等水产起来到摊旁，换取合用的棉布和日用杂品，美丽、宁静的朝鲜山村立刻充满了欢声笑语。

此时，的野半介狭长的白脸上充满了得意的微笑，几颗麻子显著变红。他带领几个门徒收下零碎金银和农副产品，在旅店里暗中绘下朝鲜的军事地形图，又慢慢向朝鲜京城--汉城进发。

7月22日，的野半介一行来到汉城，将田中侍郎、木间九介、白水健吉、葛生修亮等安排在旅馆里，便亲自到汉城西大门附近的日本驻朝鲜公使馆，拜见日驻朝公使花房义质。

在公使馆门口，的野半介正好与刚要出门的花房义质撞个正着。花房义质人高马大，的野半介瘦小孱弱，花房又是急急忙忙夺门而出，一下把的野半介撞出四、五步之外，痛得的野半介“哎呀”一声，跌倒在地。

的野半介正要张口大骂，抬头一看是花房公使，深知此人一向办事稳重狡猾，人称“老狐狸”，没有急事，决不会如此慌张，忙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捂着屁股，一瘸一拐地挣扎到花房面前，嘻皮笑脸地主动打招呼：“我刚到汉城，就来拜见公使阁下。……”花房义质是头山满的刎颈之交，他知道的野此番前来，一定带着玄洋社的重要使命，但却顾不得问，不耐烦地截住的野之话头吩咐：“事情紧急，赶快回去！”花房说罢，从西服内口袋里掏出一份文件递给野半介：“回去快看，看后烧掉！”花房说完，带领公使馆官员旋风般匆匆离去。

的确半介情知情况紧急，回到旅馆便躲在单人房间里，飞快地阅读花房义质交给的文件，从中得知--浪人出身的花房公使自1880年10月到朝鲜任公使后，凭着比狗还灵的西乡隆盛“征韩论”信徒特有的敏感嗅觉，发现朝鲜人民对日本肆意入侵和闵妃集团残酷统治的不满越来越强烈，特别是朝军下级军官和士兵被闵妃集团13个月扣发饷米所激怒，驻守在汉城的几千名士兵在原训练都监兵使柳春万、金长孙等策划下，秘密准备举行起义。

当时主管发放饷米的朝鲜将领是闵妃亲信--宣惠厅堂上兼兵曹判书闵谦镐。此人五短身材，一脸横肉。为缓解士兵的怨愤，他下令发了一个月饷米，士兵领到一看，一半竟是砂石米糠，嚼一口磕掉两颗门牙，怎能食用？愤怒的士兵怒而痛打护库军官。

闵谦镐闻报大怒，逮捕杀害了几个主谋者，妄图将士兵的示威镇压下去，但却促使朝鲜士兵加速举行把矛头指向闵妃集团和日本侵略者的“壬戌兵变”。

花房义质闻此大惊，忙命手下浪人大平正吉把“壬戌兵变”首领之一金长孙绑架而来，对其严刑拷打，企图从金长孙口中获得此次兵变的准确情报。

金长孙农民出身，长得五大三粗，为人耿直，且自幼练得一手好武艺，深得士兵和下级军官爱戴。此次回家途中被日本浪人擒来拷打，对日本侵略朝鲜的面目有所认识，已下定必死决心，就愤怒地瞪着花房义质揭露道：“你们倭寇个个都有虎狼之心，对朝鲜犯下的滔天大罪必将彻底清算！”花房义质闻此大吃一惊，但却竭力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伪善面孔：“我是堂堂大日

本帝国的驻朝公使，始终以朝日亲善为己任，罪从何来？”“你身披外交使节的合法外衣，但却和开着军舰的倭军贼将一样，都是侵略朝鲜的罪魁！”花房义质正要命人将其枪毙，突然想到命浪人大平正吉将金长孙绑架而来之真正目的。他深知此人是充满热血的堂堂男子汉，拷打、收买都不会奏效，应用狡猾的激将手法套取情报。

想到这里，花房一脸怒气刹时烟消云散，代之以和颜悦色的满面春风，命手下浪人搬过一把椅子，手摇纸扇，尽量装出和蔼可亲的面孔道：“金壮士，愿听尊言，请道其详！”金长孙圆睁双目，怒发冲冠，义正辞严地历述日帝侵朝罪行：“远的不说，只从‘云扬号事件’讲起。1875年5至6月，倭兵开着‘云扬’号等三艘军舰窜入朝鲜东南沿海进行非法武装侦察，还跑到釜山港搞什么舰队战斗演习，肆无忌惮地干尽挑衅勾当，只是慑于我礼仪之邦的威势未敢轻举妄动。不料9月间又派‘云扬’号闯入我西南沿海寻衅闹事，企图抢占江华岛草芝镇炮台。朝鲜海岸炮兵奋勇还击，倭兵狼狈而逃，你们贼心不死，以此为借口进行什么‘报复性回击’，连续两天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破坏了我江华岛草芝镇、顶山岛、永宗岛炮台，还强行在永宗岛登陆，奸淫烧杀，无恶不做，接着又两次袭击釜山，暴行累累，天理难容！”“金壮士所言不差，当时本公使正在‘云扬’号上当作战参谋，为大日本帝国立下赫赫战功！”花房义质不但不生气，反而厚颜无耻地引为自豪，这使金长孙更义愤填膺：“你们这些日本强盗真是厚颜无耻，豺狼成性！”“这里用得着中国一句名言：‘无毒不丈夫嘛’！”“日本强盗并不善罢干休，又以‘云扬号事件’为借口，在1876年1月派出一支舰队（7艘战舰、1000名陆战队员）气势汹汹来朝鲜追究责任，强迫我国与日本签订了《江华条约》，胁迫我政府开放釜山等通商口岸，给日本商人提供居注贸易方面的优惠条件；使日本人有权自由测量朝鲜沿海岛屿、暗礁，任意绘制海图；让日本人在朝鲜享有领事裁判权。”“说得不错！”“那年7月，日本再派舰队侵朝，强行缔结《江华条约附录》和《朝日贸易规则》，规定日本商人除交纳象征性船税外，一律免纳关税；允许日本钱在通商口岸自由流通，还可将朝币任意带回日本，从而使你们这些强盗在政治上任意侵略，经济上随意掠夺朝鲜的财富！”花房义质听着金长孙的血泪控诉，心里舒服极了，得意洋洋地自吹自擂：“本人赴贵国以来的政绩，金壮士了解吗？”金长孙看着花房义质那副流氓嘴脸，不由得两眼直冒火星：“朝鲜人对花房公使1880年11月常驻汉城以来的桩桩罪行，在血泪帐上记得极为分明：是你，为控制朝鲜军队，强迫朝鲜政府把军队改编为武卫营和壮御营，新建什么别技军，还派日本军事教官牢牢加以控制；是你，强迫朝鲜政府开放我国首都的门户济物浦（仁川）和永兴湾的元山为通商口岸；是你，以军事威胁强迫朝鲜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掠夺朝鲜的政治经济权益！”“根据进化论观点，适者生存，强者生，弱者亡，你们这些穷高丽棒子又奈我大日本帝国何！”“花房公使，你莫要高兴得太早，日本侵略朝鲜的可耻下场，在1592年丰臣秀吉大举进犯朝鲜的壬辰战争中已见分晓：在我朝鲜礼仪之邦，像李舜臣、宋象贤、刘克良、金应瑞那样的爱国将领比比皆是，郭再佑、郑文孚、金德龄那样自发抗敌的义兵将领层出不穷，像西山大师、泗溟堂那样的僧人兵将不乏其人，像桂月香那样的爱国者成千上万！碰上他们，倭军中赫赫有名的大将加藤清正被朝鲜小将金应瑞吓得魂飞魄散，脑袋被一剑砍下，滚出十步之外；武艺高强的倭将小西飞亦被金应瑞一剑毙命！丰臣秀吉的几万海军在李舜臣手下

一败涂地，作恶多端的日本侵略者被朝鲜军民打得屁滚尿流，我可以断言。……"花房义质听到这里，气急败坏地插言叫嚷：“壬辰战争已是过去之事，如今的大日本帝国无敌于天下！”仪表堂堂的金长发威风凛凛，气冲牛斗：“我们朝鲜人相信中国一句古话！”“快快讲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花房义质气得暴跳如雷，一下子从椅子上蹿起来，狠狠地扔下手中的纸扇，伸手从站立两旁的玄洋社浪人本间九介手中抢过一把明光闪闪的日本武士刀，“呀呀”地发疯般叫着，咬牙切齿地向金长孙头上砍去，口中狠命骂着：“混蛋，我杀了你！”

“金长孙见花房义质被自己揭穿了原形，露出野兽般的丑恶狂态，不由得哈哈大笑：“金长孙死不足惜，我死后，不出三日，也有人宰掉你的狗头！”花房义质虽处在狂怒之中，但一听到“不出三日”之语，浪人间谍的素质使他突然将向金长孙砍去的日本武士刀触电般停在空中，继而缓缓把刀收回，哈哈大笑不止，一转身挥手将武士刀向身旁的日本浪人本间九介抛去。那把武士刀直向木间九介的面门飞去，木间九介大吃一惊，飞快地向旁一闪，用右手轻轻将武士刀接住，插回刀鞘，疑惑不解地问道：“请问公使，你这是。……”“哈哈，金长孙，你中了我的激将之计！”金长孙闻听此言，心中疑虑重重，不知这个老狐狸又在耍什么新花样，只听木间九介问道：“公使先生，此话怎讲？”花房义质得意地大肆炫耀道：“我刚才用的是激将法智取核心机密--他说不出三日要我的脑袋，那就是说--”“英雄所见略同！”花房义质骄横忘形地说罢，突然觉得形势如箭在弦，便如大敌当前般从椅子上一跃而起：“事态紧急，命令驻汉城日军立即进入待命状态，公使馆也紧急动员，全力应付突发事态，通知玄洋社人员配合行动！”花房义质说罢，劈手从记录员手中夺过审讯记录，往西服内衣口袋里一塞，急忙出门去与闵妃集团官员联系，策划镇压壬戌兵变之策，没想到在公使馆大门口正巧撞着玄洋社首领的野半介……。……7月22日深夜，汉城城内漆黑一团，黑沉沉伸手不见五指，万籁俱寂，只偶尔传来几声断断续续的犬吠。

的野半介在客房里看罢花房义质交给他的文件，一下子吓得瘫在床上，“小诸葛”的随机应变本领霎时间荡然无存，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在黎明前的最黑暗时刻，他听到汉城城内突然枪声大作，杀声震天。的野半介被枪声和惊天动地的喊杀声震得打了个寒噤：“畏缩不前岂是浪人所为？刚才的狼狈相若被头山满、平冈浩太郎发现，岂不被笑掉大牙？朝鲜发生动乱，正是浪人混水摸鱼，为大日本帝国建功立业的天赐良机，怎能白白放过千载难逢的机会，在此束手待毙！”的野半介想到这里，从床上一跃而起，右手举起明晃晃的日本刀“啪”地往桌上一插，两颗贼眼敏感地环视四周，确信无人在场后，偷偷掏出文件，拿到水池前引火点燃，将文件烧成灰烬放水冲走，大步回身从桌上拔出刀来，推门走出客店，正要举步上街。

突然，从对面巷子里跳出一个彪形大汉，旋风般向的野半介卷来。的野大吃一惊，手挥武士刀正要向那大汉砍去，但那大汉轻轻一闪，回手攥住了的野半介的手腕，小声说道：“首领，不要动手，是我！”的野半介一看大汉那张像被踩扁了的馒头一样的脸孔，知道是自己的部下田中侍郎，便摆出首领的威严，低声怒斥：“慌什么？堂堂日本浪人处变不惊，才能成就大事！”惊慌失措的田中侍郎听到首领的斥责，也顿时冷静下来，双手垂立，笔直地站在一旁。

“汉城出了什么事？”的野半介见田中侍郎从慌乱中平静下来，满意地

点点头，装出镇定自若的神情问道。

“报告首领！朝鲜士兵发现他们的副头领金长孙失踪，训练都监兵使柳春万便率领一万多名士兵发动兵变！”“兵变的矛头指向谁？”的野半介在朝鲜做贼心虚，最关心的是能否保住自己的性命！

田中侍郎大嘴一咧，扁平的馒头脸显得更加难看，而带哭腔的声调像敲破锣一样难听：“事情都让大院君这老东西给搞坏了！”“怎么回事？”的野半介的眼珠子瞪得铃铛一般。

“起义的朝鲜士兵原是为克扣饷米和在饷米中掺沙子而起事，谁知暴乱士兵同汉城平民会合在一起，首先攻占了几个军械库，夺取武器武装了起来。他们杀死了作恶多端的朝鲜军官，捣毁了朝鲜首相闵谦镐的住宅，把闵谦镐打成重伤扔在了沟渠之中，他儿子闵泳翔装扮成和尚溜之大吉，柳春万便带人冲进皇宫去见大院君！”“好！大院君这家伙一心投靠清国，手段毒辣，贪得无厌，借柳春万的手杀掉他，也除掉帝国的一块绊脚石！”的野半介幸灾乐祸的话还未说完，田中侍郎便抢先说道：“没想到大院君老奸巨滑，为从闵妃手中夺取朝廷大权，他满口答应亲自处理克扣饷米之事，说坏事都是闵妃集团勾结日本人干的！”“大事不好，你我性命难保！”“现在，柳春万正指挥暴乱士兵分三路出击！”的野半介迫不及待地一把抓住田中侍郎的脖领，声色俱厉地喝问：“他们第一支人马杀向何处？”体态魁梧的田中侍郎被矮靶瘦猴子的野半介抓住脖领，像被卡住喉咙一般难受，几乎有被窒息之感，不由得怒从胆边生，几乎想一时性起把的野半介摔到九霄云外，但忽然想到的野半介虽弱小如瘦鸡，但他必竟是玄洋社头领之一，谁敢惹他？只得忍气吞声，哈着腰使脖颈处稍微轻松一点儿，卑恭屈膝地说：“他们的第一支人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击捕盗厅、义禁府，砸开牢门铁索，放出几百个被捕入狱的士兵和百姓，正打开粮仓，救济饥民。”的野半介气哼哼地骂道：“便宜了他们，日后跟他们算帐！”继而又狠狠地抓住田中侍郎的脖领，咆哮如雷：“你他妈拣要紧的说，暴乱士兵对日本人态度如何？”田中侍郎被的野半介勒得更加难受，索性扑通一声跪倒尘埃，他意外地发现，自己跪着倒与的野半介一般高，也舒服多了，便赶紧报告说：“他们的另两支人马，一支以泰山压顶之势扑向别技军受训的下都监，处决了在别技军任教的五个日本教官；另一支人马趁夜幕包围日本公使馆，救出被绑架的起义军副首领金长孙。……”“花房公使现在何处？”“起义的朝鲜士兵视日本人如仇人，见一个杀一个，我亲眼看到公使馆7名人员死在暴乱士兵的刀枪之下！”“混蛋，我问你花房公使下落如何？”“花房公使被吓得魂飞魄散，亲手烧掉帝国驻汉城公使馆，化装成中国商人模样，趁乱逃出汉城，连夜向仁川逃命去了！”的野半介听到这里，活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顿时失去了刚才的蛮横与威严，一把松开勒住田中侍郎脖领的右手，一屁股坐在地上，有气无力地说：“花房公使临行有何指示？”田中侍郎这才慢慢伸直腰，整理着脖领说：“花房公使命我们化装成清国商人，在汉城潜伏下来，密切监视壬辰兵变情况，及时报告陆军参谋本部！”“他妈的，这不是要咱们的命吗？他倒溜得比兔子还快！”的野半介正要大骂花房义质不是东西，突然一声枪响，把他吓得全身冷汗淋漓，汗毛倒竖，扑通一声卧倒在地，急忙从随身包裹中取出一套汉人服装，就势在地上躺着换好，看看周围并无异常情况，一骨碌从地上爬起，训斥田中侍郎道：“笨蛋，还不快快化装！”四肢发达、头脑迟钝的彪形大汉田中侍郎看到的野半介这身打扮，半天才醒悟过来，也急忙从行李捆中取出

一套中国服装换上，随的野半介躲进客店，闭上房门，静观壬辰兵变的发展。

7月24日下午，的野半介听到外面的枪声渐小，才在田中侍郎保护下，偷偷到汉城街上探听动静。

两人路过一条小街时，遇见两个朝鲜士兵押着一个日本商人模样的人从对面走来。两人定睛一看，被押解的不是别人，正是跟随花房义质活动的玄洋社浪人白水健吉。

的野半介给田中侍郎递了个眼色，两人便车转身来，暗中尾随于后，乘押送的两个朝鲜士兵不备之时，突然像野兽一般扑上前去，挥刀向两个朝鲜士兵砍去。

的野半介见两个朝鲜士兵应声倒地，忙拉白水健吉向另一条街跑去，田中侍郎在后紧紧跟随。

白水健吉道谢后匆忙相告：“的野先生，我有紧急情况报告：今天中午，兵变总指挥的柳春万派副总指挥金长孙带一支人马，跟踪追击花房公使去了。花房公使命你带玄洋社浪人前去保驾！”“是，你我三人马上出发，前往仁川！”路上，的野半介从白水健吉口里得知，汉城的朝鲜各营士兵和黎泰院等地的百姓，已纷纷加入兵变队伍。柳春万率领义军攻入皇宫，掌权的闵妃暗中逃走，正暗中派人与在天津的朝鲜开化党头领金允植联系，请求清朝派出援兵，再从大院君手中夺取朝廷大权。

的野半介知道这是重要情报，为使日本赶在清朝之前派兵入朝，他及早报告花房义质。

的野一行急急忙忙向仁川赶路，不觉天色已晚，但却前不着村，后不靠店，身处荒郊野外，三人心中都不免惊恐万分，忽然从小路旁杂草丛中蹿出一个手持大刀の壮汉，大声喊道：“站住，可找到你们了！”的野半介三人见此壮汉持刀拦路，大吃一惊，都从腰中抽出日本武士刀，准备决一死战；但上前一看；四人同时哈哈大笑，原来此人就是花房义质手下的玄洋社浪人本间九介。

的野半介忙问花房义质的下落，得知金长孙带人在仁川追上了花房义质，双方混战一场，金长孙在朝鲜仁川府正直士兵协助下，将花房义质打得落花流水。花房只得施展金蝉脱壳之计，命8名浪人冒死堵击，才逃到月尾岛，用金钱买通英国军官，乘英国军舰逃回长期。在长期，花房命本间九介秘密返回汉城，潜伏下来搜集中朝情报，等待花房带日军卷土重来，还命的野半介立即回国。

的野半介星夜兼程赶回东京，直接前往玄洋社东京总部。

只听会议室里吵吵嚷嚷，好不热闹，急忙推门而入，只见头山满、平冈浩太郎、箱田六辅、进藤喜平太、来岛亨喜等正争论得面红耳赤。

的野半介彬彬有礼地向各位致意，之后心有余悸地说：“我此次在朝鲜，正赶上壬辰兵变。那些高丽棒子真凶，我驻汉城公使馆官员十余人被杀，玄洋社也有五人遇难。所幸花房公使死里逃生，我奉命紧急回国不知为了什么事情？”头山满摆出玄洋社头号首领的威严先对的野半介慰勉有加：“的野先生不亏是我玄洋社的‘小诸葛’，在壬辰兵变中指挥若定，手腕灵活，令人钦佩！”“你们刚才吵吵嚷嚷，正在议论何事？”玄洋社第二任社长箱田六辅是个极有心机的浪人，此时主动向的野介绍情况：“朝鲜人在兵变中把矛头指向大日本帝国，玄洋社五个弟兄死在他们的大刀之下，我们对此决不善罢甘休，已两次敦促陆军参谋本部赶快派兵护送花房公使返任。为在朝鲜半岛

宣扬国威，平冈浩太郎、来岛亨喜提议组织义勇兵做征韩急先锋，我和进藤喜平太主张慎重行事，目前不宜盲动，不知的野兄弟有何高见？”的野立即摆出军师的足智多谋风度侃侃而谈：“朝鲜的壬辰兵变还在动乱之中，我几名兄弟不幸遇难，这正是我玄洋社以讨还血债为借口，在朝鲜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本人认为，组织征韩义勇兵很有必要，我们浪人有足够的本领做帝国军人的楷模。照我们的样子干，何愁朝鲜不灭？”一直对此未表态的头山满突然两眼流出几滴眼泪，脸上显出悲天悯人的沉痛表情，吩咐箱田六辅：“快去准备礼物和钞票，你亲自带人送到死去的兄弟家里，转达我的沉痛哀悼之意，说我头山满保证周到地安排死者家属的生活，让他们家永远过比死者生前更好的生活！”头山满说到这里，脸上的阴霾一扫而光，又换上一副颇有深谋远虑的神情，有板有眼地宣称：“朝鲜半岛自古以来，就遍洒我同胞开拓疆土的热血，玄洋社志士也曾为之流血牺牲。帝国要扬威四方，必先取得这块宝地。如果不首先攻取朝鲜与神国日本合而并之，何来日本到支那大陆活动的这块跳板！”头脑敏捷的箱田六辅对头山满的话心领神会，马上以玄洋社长身份宣布：“从今天起，我社将全力组建征韩义勇兵，诸位都是担此大任的统帅人物，请迅速操办，四处招兵买马！”1882年7月31日，还没等玄洋社组织起征韩义勇兵，日本政府就命花房义质带着朝鲜独立党首领金玉均，率领1500名日本士兵赶在清兵入朝前，风卷残云般重返汉城。

花房义质率军一进汉城，就杀气腾腾地去见闵妃逃跑后执掌朝鲜大政的大院君：“你们朝鲜国对大日本帝国好生无礼，帝国驻汉城公使馆的20多名人员被残酷杀戮，本公使为保证在朝日本国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得不在1500名军人护卫下重返汉城！”大院君虽已60开外，但却是个颇具才干的朝鲜执政者。

他见暴乱士兵占据了汉城许多地方，日本又派军队开了进来，却并不慌张。他知道清朝已决定派大兵入朝，朝鲜前途尚难预料，于是便虚与花房义质周旋：“日本人被朝鲜叛乱暴徒杀害，我也甚感遗憾，但朝鲜皇室受害更深：我儿媳闵妃残遭杀害，我的外甥、首相闵台镐伤势惨重，王公大臣死伤无数，我誓与乱贼势不两立。公使先生既带兵前来，请助我镇压叛乱的兵匪！”花房义质本来气势汹汹，杀气冲天，但看到大院君装出的那副可怜相，口气也软了下来：“大日本帝国要求朝鲜政府严惩杀害日本外交人员的叛逆分子，支付5000万元赔款，派使节到日本赔礼道歉，重修日本驻汉城公使馆，如若不然，帝国就宣布向朝鲜开战！”大院君装出更加害怕的样子连连答应：“公使所言，本人极表赞成，但平叛是当前头等大事，请公使传令发兵，以解燃眉之急！”“先解决日本受害问题，才能谈发兵痞叛之事！”花房义质托辞拂袖而去。

花房义质刚回到日军兵营，玄洋社浪人田中侍郎就旋风般卷进军帐：“报告公使，清国3000大军已启程赴朝！”“清军将领是谁？”“北洋海军水师提督丁汝昌，淮军统领吴长庆，前敌营务处袁世凯，道员马建忠，兵力比日军多一倍！”花房义质听说清兵比日军多出一倍，不由得暗吃一惊，继而奸计顿生，哈哈大笑：“清国兵多是件好事，让支那人替帝国镇压乱兵！”于是，花房义质按兵不动，虎视眈眈地静观朝鲜局势的发展，并放金玉均回到朝鲜国王身旁，夺取朝鲜军政大权。

等清军拘捕大院君并把壬辰兵变镇压下去之后，花房义质又蛮横地向

重新掌权的闵妃集团施加压力，强迫朝鲜与日本签订了两个新侵略条约：《济物浦条约》和《朝日修好条约续约》。

1882年8月，朝鲜派出由朴泳孝、金玉均、金晚植组成的谢罪团赴日赔情。谢罪团在馆驿住下后，金玉均便首先秘密前往玄洋社东京本部，去见头山满和平冈浩太郎。

金玉均首先谦恭地向头山满讲明来意：“我这次作为朝鲜谢罪团顾问，陪同朴泳孝团长来日，恳请头山满和平冈浩太郎先生运用你们的巨大影响，在井上馨爵士面前多多美言！”平冈浩太郎是赳赳武夫出身，蛮横地一拍大腿骂道：“你们朝鲜人是贱种！”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金玉均闻听此言，心中不由火气腾生，年轻英俊的脸上露出愠色，忍不住发出指责之声：“平冈先生何出此言？”头山满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知道对金玉均应该存有戒心，但却装出毫无反应的样子默默不语。

趾高气扬的平冈浩太郎对金玉均的抗议不屑一顾，仍然在发“大和民族优秀论”的无耻狂言：“我们大和民族是天照大神的子孙，乃世界最优秀民族，你们朝鲜人不识抬举，竟敢在壬辰兵变中杀我20余人，这岂不是在太岁头上动土！”金玉均听到这里，正要拍案而起，但想到自己谢罪团的身份，为求助于玄洋社，只得忍气吞声地听平冈浩太郎吐着唾沫星子大放厥词：“我帝国大兵一出，一枪未发，兵不血刃，你们就得乖乖跟帝国缔约投降，不得不向日本政府和被害人员家属支付赔款55万元，同意日本有权在朝鲜驻扎军队，保护日本驻汉城公使馆的安全，还答应由朝鲜政府负责修建被暴徒破坏的公使馆和日本兵营，允许日本外交官员及其家属在朝鲜自由旅行，增开汉城附近的杨花津日商商埠，日本商人在通商口岸的活动范围由直径10里扩大为50里。朝鲜人若再敢同大日本帝国作对。……“那又怎样？”金玉均强烈的爱国心像烈火一般在胸中天崩地裂般燃烧，年轻气盛，横眉怒目，不计后果了。

一直眯缝着眼睛在一旁察言观色的头山满看到双方剑拔弩张的气势，这才睁开双眼，以威严的目光扫视平冈浩太郎：“平冈君不得口出狂言，不许对金顾问无礼！”平冈浩太郎正要对弱小而又有求于玄洋社的朝鲜使者大施淫威，想大吼一声：“再敢与大日本帝国作对，就要朝鲜亡国灭种！”但看到头山满那严厉的目光，猛然醒悟到今天的奸诈之计，便气哼哼地哑口无言了。

这时，头山满又把高屋建瓴、不可违抗的目光转向金玉均：“金顾问，平冈浩太郎乃一介武夫，心直口快，刚才多有冒犯，还望海涵！”金玉均余怒未息，还想痛斥平冈浩太郎污辱朝鲜民族的言行，但想到肩负的谢罪使命，考虑到开化党没有活动经费，只得低头求援：“我们开化党决心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把在朝鲜驻军、干涉朝鲜内政的清国军队赶走。

为此，正计划举行推翻闵妃集团事大党的武装政变，但是缺乏经费，请玄洋社慷慨解囊，大力支援！”头山满听罢，抬头看平冈浩太郎一眼，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事情果然像前两天他俩同外相井上馨私下商谈中预料的那样，他调整一下坐姿，摆出一本正经的庄重样子说：“支援中朝革命，是我玄洋社义不容辞的义务，我们打算请求日本政府，从朝鲜给帝国的50万元壬辰赔款中，拿出40万元，赠送给朝鲜独立党，作为朝鲜内政改革经费，不知金顾问意下如何？”金玉均听到这个喜从天降的消息，年轻英俊的脸庞犹如鲜花开放，把日本侵略朝鲜的狼子野心完全当成了大慈大悲的菩萨心

肠，从内心深处发出无限感激之情：“玄洋社和头山满、平冈浩太郎先生真是朝鲜爱国志士的忠贞之友，有你们的无私援助，朝鲜独立党的事业大有希望！”金玉均说罢，千恩万谢而去。

待金玉均走后，头山和平冈拿出酒倒满两大杯，同时举起一饮而尽，手举酒杯同时发出刺耳的奸诈狂笑。……1884年12月4日，朝鲜政府为新建的京城邮局举行隆重的开幕式，接着举办盛大宴会。

京城邮局作为金玉均领导的朝鲜独立党兴办的第一个开化事业，备受重视。远远望去，一幢高大宏伟的西式建筑耸立在一片平房建筑之中，确实是鹤立鸡群。

那天傍晚，京城邮局灯火辉煌，亮如白昼。红色大门赫然洞开，两旁站着四个身穿整齐西式服装的男仆和四个穿着大红大紫民族袍子的朝鲜妙龄女郎，笑容满面、彬彬有礼地向应邀而来的宾客鞠躬致意。笑语喧天，热闹非凡。

23岁的朝鲜独立党首领、东南诸岛开拓使金玉均身穿黑色西洋燕尾大礼服，手拿洁白的手套和高高的黑色大礼帽，精神奕奕地在门口恭迎客人。

此时，金玉均的亲密伙伴、邮政局总办洪英植远远看到美国驻汉城公使富特那瘦高挑儿身影，忙驱动他那肥胖身躯前往迎接，将其作为最高贵的客人亲自引进宴会厅。

金玉均满面春风地拱手让客，在看到日本驻汉城公使秘书下村和他的翻译河本到来时，忙彬彬有礼地上前握手、致意：“热烈欢迎秘书和翻译阁下大驾光临，不胜荣幸--竹添公使随后就到吧？”下村一边和金玉均紧紧握手，一边故作致歉之态：“金先生，我遗憾地奉告阁下，竹添公使偶感风寒，不能参加今天的盛宴，但却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今晚汉城的连台好戏！”

“什么？竹添公使偶感风寒？”金玉均听到这个消息，心里不由格登一愣，暗想竹添进一郎昨天不还健壮如牛吗？他眉头一皱，马上意识到这是外交界常见的“政治感冒”，从心里狠狠骂道：“这个狡猾的老狐狸，不知又耍什么花招？”金玉均虽在心里暗骂竹添不在关键时刻捧场，但却装出极为惋惜的神情应付下村：“请下村秘书回去转达我的亲切问候，不日将到公使馆看望竹添公使！”金玉均送进下村与河本后，不由得想起了两年来极为紧张的政变准备--金玉均从玄洋社搞到一笔活动经费后，立即从日本购进一批手枪、炸药和日本武士刀，秘密组织起200人的政变队伍，其骨干有10名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士官生、7名朝鲜别技营下级军官、5名中小官吏，还有部分宫女愿作宫廷耳目。

1884年11月11日，金玉均来到日本驻汉城公使馆，将政变计划交给竹添进一郎。

头山满的浪人密友竹添看罢，良久未发一言只是用大手掌摸着斜插嘴角的仁丹胡子，在地上像老驴拉磨似地来回踱步。他觉得这正是日本利用朝鲜独立党驱逐清朝势力的大好机会，但深知开化派力量薄弱，能否成功尚难预料，他需要请示国内才能决定持何态度，于是便阴险地说：“朝鲜独立党发动推翻事大党的政变，日本政府原则上表示支持，届时将提供大量军经援助，但不经我同意，你们不得擅自行动！”“公使的话我一定牢记在心！”竹添理理斜插嘴角的仁丹胡子，又极其神秘地说：“根据玄洋社浪人情报，袁世凯已命驻朝清军处于紧急戒备状态，我也命驻朝日军今晚进行射击演习，还派玄洋社在汉城浪人四出散布谣言，制造紧张气氛。”11月14日，美

国驻朝鲜公使富特秘密会见金玉均，对开化派将发动的政变表示积极支持，金玉均兴奋地在日记中写道：“已见美国公使纵论内情之艰，时势之困，美国公使无不以吾所言为可！”11月25日，金玉均携带详细的政变实施计划去见竹添。

竹添看罢连连摇头：“朝鲜国王优柔寡断，缺少权威，但却温文慈善，还有利用价值，你们计划把他绑架到江岛的行动不可龃如要成功，还需继续得到国王的信任，挟天子以令诸侯，就能事半功倍！”“公使所言极是！”金玉均对此深表赞成，又问道，“我们起事时，日本政府到底能给什么援助？”狡猾的竹添摆出一副慷慨援助的架势：“你们的政变如能成功，在成立新政府时，日本政府将马上提供300万元，作为第一笔财政资助。不仅如此，你们政变的枪声一响，我就立刻命令日本军队进入朝鲜皇宫，对你们提供最可靠的支援！”金玉均对竹添的回答甚感满意，正要起身告辞，却被竹添拦住问道：“请问金先生，届时我以什么名义把日本军队开进王宫？”金玉均稍加思索，便以肯定的语气回答：“我们打响第一枪后，将给你送去一封朝鲜国王要求日本出动军队予以援助的信件。这封信将由国王的妹妹朴永孝送来！”

“竹添进一郎为掩人耳目，又郑重提出：“为不给大日本帝国带来麻烦，你我在发动政变前不宜再次接触！”11月30日，金玉均秘密召集朝鲜独立党头目开会，决定12月4日借汉城邮电局落成举行宴会之际发动政变，并迅速通知了竹添--金玉均想到这里，只见一个身穿大红袍子的妙龄女郎前来报告：“客人已经到齐，请入席！”金玉均缓步来到宴会厅，只见宴会厅里，客人已按他别出心裁的方式做了精心安排：在最受尊敬的上首位置上端然坐着美国驻汉城公使福特，他正饶有兴致地向天花板吐着烟圈儿，故意摆出一副悠闲自得的神情，身旁坐着他的秘书C·L·斯库特尔；第二个座位上坐着颇具绅士风度的英国驻汉城总领事阿斯顿，一周前曾阴阳怪气地告诫金玉均：“很快就必将发生重大事件，希望阁下加倍谨慎小心。”此刻，阿斯顿正与日本驻汉城公使馆秘书下村谈笑风生。最下等的位置安排给中国商务委员陈树棠。

另一旁坐着朝鲜外务大臣金弘集和亲军营使闵泳翊、韩圭稷和李裕元。此次宴会的主持者金玉均则坐在下村和他的秘书河本近旁，不时用日语同这两个日本来宾亲切交谈。

此时的金玉均，年轻英俊的脸庞闪耀着亢奋的神情，他为有周密的政变计划而觉得稳操胜券：在邮政局四周，他的最得力的行动队员已将邮政局团团包围，特别指派两名干将刺杀一名保守党大臣：跆拳道高手尹景春和李殷钟刺杀军营使闵泳翊，棍棒高手朴三龙和黄海龙泽对付闵妃的亲信尹泰俊，日本陆军户山学校的高才生崔殷章和申重棋负责干掉军营使李裕元；无敌双刀李奎完和林殷明负责对付韩圭稷。

在别宫，朝鲜独立党的前营小队长尹景宪今天任宫内守护值班军官，带领着60名亲兵牢牢守住宫殿大门；正殿里，金玉均得力干将徐载弼率领郑兰教等13人隐密潜伏，待机行动；在殿外，派黑社会头目李寅钟暗中埋伏，伺机枪杀入宫的保守派大臣。在邮政局和别宫之间，派武林高手柳赫鲁、高永锡互通信息，还派火药专家金风均、李锡尹四处放火。……金玉均想到这里，又看到侍女们正按他的吩咐大大拉长一道菜与另一道菜之间的上送时间，尽量把宴会时间拖长，知道政变计划正在顺利实施，深信不一会儿，金

风均、李锡尹就会带人纵火焚烧别宫，把政敌引来救火，乘其不备逐个暗杀，于是，他俊俏的脸上绽出了少有的笑容。

金玉均正坐在靠近门口的座位上静候佳音，扭头向门口一看，只见打扮成男侍模样儿负责侦探通信的柳赫鲁，正手托一盆菊花站在门口，以焦急的目光注视着他，知道这是有紧急情况要向他报告的信号，便托故起身，来到门口附近一间密室里，只见柳赫鲁早已站在那里等候。金玉均随手关上门问道：“柳赫鲁，有何消息？”“报告首领，警察戒备森严，金风均、李锡尹没法放火，他们派人前来听取指示。”“快快通知金风均，不管什么房屋，只要烧着就行！”金玉均打发传信兵走后，又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下村身旁。

大胡子下村已从混入朝鲜独立党的日本浪人田中侍郎处获悉，金风均因技术欠佳几次都没有把火放着，现已产生恐惧情绪，不少人产生了放弃在皇宫进行谋杀的计划，要求兵合一处，集中力量在邮电总局的宴会上行动，于是便低声告诉金玉均：“皇宫那边的行动不太顺利！”金玉均闻听大吃一惊：“我刚接到起事受挫报告，还未来得及向阁下通报，你怎么。……”下田傲慢地摸着大胡子神秘地微微一笑：“日本浪人神通广大，有些人就在你的身旁大力相助……”金玉均听罢浑身虚汗淋漓：“这些日本人真是诡计多端，高深莫测。……”金玉均正坐在那里低头沉思，忽觉自己的脚被人轻轻踩了一下，忙低头一看，正是下田。只见下田微笑着用嘴向门口一努，金玉均顺势扭头一看，见传信兵柳赫鲁又手托菊花出现在门口，忙起身进入密室。刚进门，柳赫鲁就气急败坏地向他报告了出人预料的坏消息：“大事不好，我们的行动已被警察发觉，徐载弼要求撤回部署在别宫的兵力，在这里杀死事大党官员！”金玉均见事情真如下田预料地那样发展，便当机立断地下达命令：“别宫兵力不准撤离，坚决按原方案行动，万不得已，也要在邮政局附近完成任务！”金玉均掏出怀表一看，时针已指向10点，但仍听不到政变的枪声，心里很是不安。刚走回宴会厅，军营使闵泳翊便端着酒杯来到金玉均面前，阴阳怪气地说：“金开拓使真是个大忙人，10分钟之内就有部下两次报告紧急密情。……来，我敬你一杯！”金玉均被闵泳翊的话吓了一跳冷汗，知道自己两次离开宴会厅已引起守旧派官僚的疑惧，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我有点小事。……”下田见金玉均如此狼狈，阴险地奸笑一声，举着酒杯过来打圆场：“闵军营使莫开玩笑。……你们二位英才盖世都是朝鲜的栋梁之材。来，我敬两位一杯！”“干！”三人同时举杯，一饮而荆此时，金玉均慌乱的心情稍微平息了一些，忙高喊一声：“仆役，上茶和甜食！”当仆役将茶和甜食一一摆到宴会桌上时，突然从厅外传来一片混乱的喊声：“着火了，快救火！”“起火了，快逃命！”刹时间，宴会厅里乱作一团，惊慌的喊叫声充斥整个大厅。

金玉均怀着欢欣鼓舞的心情冲到窗口，向外一望，只见邮政局附近的建筑物已燃起冲天大火，熊熊火焰烧红了半边天，他故意高声向匆匆走到窗前的亲军营使闵泳翊、韩圭稷、李裕元问道：“请问，出了什么事？”“但愿不是叛乱！”闵泳翊没好气地嘟囔着往外便走。

“请三位亲军营使留步，外面情况不明，贸然出去有生命危险！”金玉均想把三个军事指挥官留在宴会厅寻机干掉，使其所辖部队失去指挥。

韩圭稷、李裕元听金玉均的话很有道理，便留下来静观局势发展，但性情暴躁的闵泳翊却狠狠骂道：“你们枉为朝廷命官，一旦有事就胆小如鼠！”

"闵泳翊嘴里大声咒骂着冲出屋去，李裕元世故地摇头叹息：“一介武夫，胸无韬略，必吃大亏！”李裕元语音未落，忽然从门外踉踉跄跄跑进一个血肉模糊的人，一进门便摔倒在地。金玉均跑上前去，弯腰一看，摔在地上的人竟是闵泳翊，脑袋、颈部、双肩都受了刀劈的重伤。紧接着枪声骤起，吃惊的人们四散逃去。

金玉均看看窗外熊熊燃烧的大火，正要夺门而去，忽然看到门外站着黑压压一大平朝鲜警察，知道他领导的“甲中政变”遇到曲折，便装作悠闲的样子转过身来，慢慢走到窗前，看着周围无人监视自己，便拉近一把椅子，轻轻登上窗台越窗而出，正在考虑到什么地方去时，从旁边忽然窜出一人，飞身来到金玉均面前，手中高高举起的日本刀在熊熊大火映照下闪闪发光。金玉均大吃一惊，忙从腰间抽出手枪，低声喝道：“谁？”“田中侍郎！”金玉均一听是玄洋社浪人田中侍郎，心中大喜，正要启口询问，田中侍郎低声说道：“竹添公使让我专门前来保护金先生！”“竹添公使有何见教？”“竹添公使让我转告先生，目前要下豁出一切的决心，按原计划干到底！最上策是把朝鲜国王争取过来，请日本出兵保护，共同把清军赶出朝鲜！”“好，我完全赞成，马上就去昌德宫！”“我愿跟随先生，助一臂之力！”“请！”金玉均和田中侍郎来到昌德宫，见到在殿外待机行动的黑社会头子李寅钟等10人，心情才稍微平静了一点儿。

血气方刚的大个子李寅钟急忙请命：“现在宫中还没有异常动向，请问下一步怎样行动？”这正是金玉均正在考虑的问题，他一时尚无成熟的计划，正在冥思苦想时，田中侍郎一晃他那像被谁踩扁了的馒头一样的脑袋，大声抢先吩咐：“情况紧急，不容犹豫！李寅钟、李昌奎，赶快吩咐手下人在宫里用小包炸药，四处制造爆炸事件，大造清军变乱的声势，金先生借此逼迫李太王请日本出兵保护！”“田中先生已下达了我的命令，赶快行动！”

“聪明的金玉均赶快顺水推舟。

不一会儿，宫里就四处传来爆炸声。金玉均赶快带着田中侍郎去见李太王和王妃。

朝鲜国王李熙温文慈善，胆小怕事，在昌德宫听到连续不断的爆炸声，早已吓得魂不附体，身旁的丽人闵妃则比李太王有决断，急命宫女打探政变情况。

这时，金玉均和田中侍郎像旋风般卷进昌德宫。李熙就像溺水的人抓住了一根稻草似的，怀着极大希望问道：“金爱卿，外面情况如何？快设法搭救寡人！”金玉均看到田中侍郎递过来的眼色，会意地奏报国王：“大事不好！”“不要惊慌，且说发生了什么事情？”性急又专权的闵妃抢在丈夫之前喝问。

“驻汉城的清兵发生了变乱！”“依卿之见，当如何处置？”仍是闵妃在替李太王主持朝纲。

“清军正在焚烧邮政总局。形势危急，请陛下速传圣旨，求日本驻汉城公使竹添进一郎火速发兵相救！”这时，昌德宫外又四处传来猛烈的炸药爆炸声，使昌德宫沉寂的气氛更为紧张。

聪明的闵妃临危不惧，镇静地速速摇头：“真是那样吗？我感到怀疑！”闵妃话音未落，又传来更激烈的爆炸声。在一旁以手拭剑的田中侍郎有点儿不耐烦了，把扁长驴脸一拉嚷道：“清军就要打进来了，再不下决断，大家就会同归于尽！”闵妃愤怒地圆睁双目，大声喝道：“你是何人？胆敢在此

大声喧哗！”“他是我的私人保镖，绝对可靠！”金玉均忙出来打圆常闵妃瞪着秀美的大眼盯住田中侍郎的扁平驴脸看了半天，直看得田中侍郎心里发毛，不由得悄悄寻找逃跑之路。半天，才见闵妃叹了一口气说：“就是求救，也要向日清两国同时发出求救信。陛下，圣意如何？”像文弱书生一样的李太王似乎有了主心骨，当即下令：“马上派出两个信使，一个前往日本驻汉城公使馆，一个到清朝驻军指挥部求援！”站立一旁的田中侍郎阴险地一笑，劈手从宫女手中夺过纸和笔塞给金玉均：“事不宜迟，请陛下迅速给竹田公使发出求援信！”金玉均会意，马上把纸和笔放到李太王面前的几案上：“请陛下快快修书！”不知所措的李熙慌忙拿起毛笔，颤抖着蘸上墨水，抬头看看金玉均和田中侍郎，只见田中侍郎的扁平驴脸呈铁青色，双眼露出狰狞的目光，吓得赶快把目光移向闵妃，看见闵妃不得已地点了点头，才哆哆嗦嗦地提笔写道：“日本公使来卫朕。”金玉均从李太王手中接过致日本公使的求救信，匆匆来到昌德宫外，交给国王的妹夫朴泳孝，让他把日本军队引往景裕宫，然后赶回来对李太王说：“陛下，昌德宫过于开阔，靠我们的有限兵力难以防守，不如迅速前往景裕宫，那里易守难攻，能保证陛下的人身安全！”“就依卿家！”

“当金玉均保着李太王来到景裕宫时，日本驻汉城公使竹田进一郎早已率领1500名日本兵到达景裕宫，协助开化党杀掉了朝鲜首相闵台镐，前营使韩圭稷和赵宁夏等守旧派官僚，推翻了事大党政权。

12月5日清晨，竹添用刺刀“支持”的朝鲜独立党领导的新政府宣告成立，宣布由朴泳孝统率朝鲜亲军的左右营，日本陆军户山学校毕业的申福模指挥亲军前后营，金玉均负责掌管国库。金玉均特别宣告，朝鲜结束与清政府的“封建藩属关系”而“完全独立”。

12月6日下午，清军将领吴长庆和年仅23岁的袁世凯率1500名清军应朝鲜国王之邀兵发景裕宫，但是景裕宫已被挥舞刺刀的日本兵控制的开化党把持，驴长脸田中侍郎带着玄洋社几个浪人手执大刀把住景裕宫大门，不仅朝中士兵被拦堵在大门之外不准进入，就是朝鲜的王公大臣也不允许迈进宫门。

此时，朝鲜国王李熙早已不在景裕宫里。原来，狡猾的日本驻汉城公使竹田进一郎发现中日军队在景裕宫附近已呈剑拔弩张之势，便施展金蝉脱壳之计，以景裕宫起居不便为由，勾结闵妃将国王挟持到桂洞宫。竹田仍怕清军知道朝鲜国王踪影，6日当天傍晚又悄悄把国王带回昌德宫。

此时，金玉均正和竹田为处理国王问题发生激烈争论。金玉均因与国王有些交情，显然主张保护李熙：“陛下在朝鲜还有一定威信，从长远着想，应暂且把他软禁在江华岛，以应付不测之变！”竹田进一郎蛮横地以命令口吻吩咐：“大丈夫焉能讲妇人之忍？李熙软弱无能，耳朵太软，要他何用？不干掉也要将他放逐到东京。”“要不就扶嗣子即位，倒也名正言顺！”“嗣子现已失踪，哪里去找？不如任命年方7岁的国王的侄子暂时出任国家元首，我们也好挟天子以令诸侯！”竹田进一郎不耐烦地嚷道。

“这。……”金玉均对竹田的蛮横无理极为不满，但又无可奈何。恰在此时，长脸驴田中侍郎提日本刀气喘吁吁地进来报告：“公使阁下，清国驻军指挥官袁世凯派人给国王前来送信，要求进宫！”“袁世凯此时此刻派人下书，有什么诡计？”金玉均自言自语地犹豫不决，竹田则对此不屑一听，厉声吩咐：“告诉送信人，国王要袁世凯亲自进见！”“哈依！”

"田中侍郎响着破锣般的嗓子大声答应着举刀而出。

不一会儿，田中侍郎又手执明晃晃的日本刀，惊慌失措地自宫外像恶风般卷入："报告公使，大事不好！""不要惊慌，拿出浪人的勇起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竹田进一郎瞪着牛眼大声申斥。

"袁世凯在宫门口等候晋见国王！" "什么？袁世凯来了？"竹田对袁世凯的果断勇武作风很感意外，他牛眼一转，摸着仁丹胡子轻声问道："袁世凯带了多少人来？" "他手下人说只带600名士兵保驾，我看远不止这数，起码有四、五千人！"竹田进一郎听后大吼一声："速去传达国王圣旨，命袁世凯速速退兵，只身一人来见国王"。

"哈依！"田中侍郎领命而去。

竹田进一郎沉思片刻，又悄悄将身边的另一个玄洋社浪人白水健吉叫来，附耳面授机宜，白水健吉转身悄然而逝。

此时，在昌德宫门外，日清两军对垒，一个个荷枪实弹，剑拔弩张。年方24岁的袁世凯在威风凛凛的袁字帅旗下高声传话："请再次通禀国王，清国军队指挥官袁世凯请求谒见！"宫门开处，露出田中侍郎那像被踩扁了的馒头一样的驴头扁脸，随后传来了破锣般的话音："朝鲜国王有旨，命袁世凯下令退去清国官兵，只身一人进宫谒见！"话音未落，日本浪人有田突然从宫内向袁世凯开枪射击，子弹从袁世凯耳边呼啸而过，他顺风看去，只见一人从宫墙上跳下而逃，知道是控制昌德宫的日本浪人所为，这位血气方刚的年轻将领勃然大怒，狠狠骂道："这些倭贼，果然心黑手辣--传令进攻王宫！"于是，袁世凯指挥4500名清兵开始进攻昌德宫。

骄横不可一世的竹田进一郎哈哈大笑："金先生，怎么样？大日本皇军果然天下无敌吧？"仿佛是给竹田的话做证明，田中侍郎不知何时来到竹田和金玉均身旁禀告："报告公使，袁世凯所部寸步不前，吴长庆一伙被大日本皇军打得落花流水，那家伙好像负了伤，被部下抬着退出火线，他的副将带着清兵躲到城墙下不敢再放一枪，清军被我们打得四散溃逃。"竹田骄横得手舞足蹈："谁敢跟大日本帝国作对，决无好下场！"夜幕降临，枪声暂时平静下来。

金玉均忧心忡忡小心翼翼地跟竹田商量："公使先生，在傍晚日清两军激烈交战之际，闵妃已带王储逃出宫去，怎么办？"竹田进一郎闻听大怒，目眦尽裂："闵妃逃到哪里去了？" "可能是到清国大营。" "混蛋，你们这些高丽棒子是干什么吃的？金玉均，赶快派人死死看住国王。国王再跑了，我要你的狗命！" "国王请求公使，放他逃去，从此再也不理朝政！" "不行，那是妄想！" 12月7日黎明，袁世凯趁天亮前最黑暗的时刻，调动精锐兵力向昌德宫发动更为猛烈的进攻。

这一下竹田进一郎感到形势危急了，正要调动预备队再次反击，田中侍郎又响着破锣嗓子禀报凶讯："公使阁下，朝鲜士兵靠不住了！" "有什么坏兆头？" "在清军手下受过训练的那些高丽棒子，都他妈的往袁世凯那里跑，支持开化派的朝鲜兵四处溃逃！" "金玉均赶快控制住你的部队！不然我们都要完蛋！"金玉均赶快去找朴泳孝，设法稳住军心。

金玉均一走，阴险狡猾的竹田进一郎立刻命令田中侍郎："通知大日本帝国官兵，准备撤退！" "撤退？扔下这一大摊。……" "少废话，没有必要为他们把老命都赔上。"对当时中日双方的激战情况，金玉均后来在他的日记中这样追述："2点30分，送来了一封给竹添的信，他还来不及打开看，

我们就听到了混乱的枪声。中国军队从南方攻入的消息传来，整个宫殿陷入了一片惊慌之中！"金玉均拚命稳定所属部队人心时，突然发现日本军队在匆匆忙忙做撤退准备，便急忙跑回竹田进一郎身旁请求道：“公使阁下，现在双方正在激烈交战，胜负未见分晓，咬着牙打下去，还有胜利的希望！”竹田进一郎摸着干枯的脸上的两撇仁丹胡子，竭力装出毫无畏惧的样子应付道：“金玉均先生所言极对，事情尚未到不可挽救的地步！”“那么，日本军队在干什么？”“军事形势瞬息万变，多做准备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你快去命令洪英植、朴泳教率领部下，把李熙护送到昌德宫北面的一个寺庙里，千万不能让清国军队抢走！”金玉均诺诺连声，领命而去。

当金玉均再次回到竹田进一郎身旁时，只听田中侍郎正向竹田报告：“公使阁下，目前清军势力强大，攻势凶猛，日军难于抵挡！”竹田进一郎怒容满面，恶狠狠地从腰中拔出日本刀：“传我的命令，准备撤退！”“公使阁下，我们要豁出性命打到底，千万不能撤走！”金玉均急红了脸，跳到竹田进一郎面前叫嚷着。

竹田进一郎原以为是背着金玉均下达命令，没想到他的军事机密已被金玉均听到，便顺水推舟相告：“我打算退出王宫，再设法从长计议。”“竹田公使曾多次许下诺言，要与朝鲜独立党共同血战到底，形势稍一不利，日本军队就匆忙撤走，这不是背叛我们开化党吗？”“中国有句名言：识时务者为俊杰。……”“日本若抛弃了开化党，你凭什么图谋将来呢？”“我将把你和你的同伙一起带走！”至此，金玉均完全看清了竹田进一郎一伙的狰狞面目，不由得怒火满腔，厉声斥责竹田的背叛行为：“你们这些倭寇真卑鄙透顶，简直是衣冠禽兽，不知廉耻，不讲信义！”“混蛋，你算什么东西，胆敢辱骂大日本帝国的堂堂公使！”竹田进一郎被骂得满脸通红，恼羞成怒，举起明晃晃的日本刀恶狠狠地向金玉均砍去。

金玉均心灰意懒，长叹一声，心想自己错跟了日本人铸成大错，索性闭上眼死在竹田的刀下算了，他毫不躲避，引颈就屠，但等了半天也不见刀劈下来的声音，睁眼一看，只见田中侍郎举起大手牢牢握住竹田那挥舞大刀的黑毛粗手，悄声劝道：“公使大人，此人现在杀不得，撤退时还有用处！”竹田进一郎听了田中侍郎的话，脸上的怒气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笑嘻嘻地将日本刀收起，动员金玉均道：“金先生，还是中国名言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快随我撤走！”说罢，竹田给田中侍郎使了个眼色，扭头向外便走。

彪形大汉田中侍郎会意，一把抓住金玉均的双手，像鹰抓小鸡般拖了金玉均，紧追竹田进一郎，在日军保护下冲出昌德宫，乘夜幕逃往汉城西大门附近的日本驻汉城公使馆。

一进公使馆朝鲜独立党另一首领朴泳孝哭得像小人一般，一下子扑向竹田和金玉均：“公使阁下，玉均呀，洪英植、朴泳教兄弟被清军杀死了，大部分士官生也都战死了！”金玉均听说他的两名亲密兄弟已死，立即紧紧抱住朴泳孝嚎啕大哭。

竹田见此勃然大怒，一把推开金英植，伸手拽住朴泳孝的脖领，破口大骂：“混蛋，哭有何用--我且问你：国王现在在哪里？”“陛下又被清军夺走了。……”“饭桶，混帐东西！”

“竹田破口大骂，用力一搯，把朴泳孝推了老远，尖声喊道：“田中侍郎！”“哈依！”彪形大汉田中侍郎应声而至，“公使阁下，形势危急，一股清

军和守旧派官僚正在袭击日本公使馆，不到十分钟，我们就死亡30余人！“竹田听罢，悄声命令：“火烧公使馆，带部队撤往仁川！”俄顷，汉城西大门外的日本驻汉城公使馆烈焰熊熊，火光冲天。趁着火光，竹田进一郎带着日本残兵败将杀出一条血路，乘夜逃往仁川。

金玉均、朴泳孝等朝鲜独立党人，也无精打彩地随着日本军队逃到仁川，亡命日本。

甲申政变失败后，金玉均改名岩田周作，朴泳孝化名山朴永春，经头山满斡旋，住在东京三合的日本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家中，过着寄人篱下的流亡生活。朝鲜政府多次要求日本政府按照国际法将金玉均、朴泳孝引渡回国，但在犬养毅、头山满、福泽谕吉、冈本柳之助等人的大力活动下，日本政府严辞拒绝了朝鲜的要求，将金玉均流放到小笠原岛，在玄洋社派出的浪人妇女花子的陪伴下苦度时光，转瞬10年过去了。……

A 第二次出兵：发动甲午战争1894年6月，日本政府决定利用朝鲜东学党起义和朝鲜爱国志士金玉均之死，发动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

为挑起战争，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秘密召见玄洋社头目平冈浩太郎、内田良平，煽动内田良平率领由玄洋社成员组成的特务敢死队“天佑侠”，伪装成“同情者”混入朝鲜东学道起义军中去制造混乱，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制造借口，扮演纵火队的角色。

内田良平率“天佑侠”到达朝鲜后，发现东学道起义军暴露了农民起义军的弱点，轻信朝鲜封建朝廷用以争取时间的停战条件，撤出占领不久的全州，退至顺昌和南原地区，正处在困难关头，很希望与“天佑侠”合作。内田良平大喜，便带领“天佑侠”日夜兼程赶路，暴徒们一个个汗流浹背，湿透了衣衫，累得气喘吁吁，叫苦连天，但内田良平毫不心软，硬是在一天中午时分赶到全罗道淳昌的东学党最高指挥部外。

内田良平放眼四望，只见头缠白巾的东学党人最高指挥部进进出出，异常繁忙。细看每个人的神情，个个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抬头向正门一看，四面白底红字的大长迎风招展，四面旗上书写的东学党党歌分外耀人眼目：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姓膏。

浊泪落时民落泪，歌声高处怨声高。

大门两侧，又各有四面彩旗迎风招展，旗上的战斗口号更令“天佑侠”们胆战心惊：“辅国安民”、“尽灭权贵”、“惩办贪官”、“逐灭洋倭”！

“天佑侠”一行正怀鬼胎观看，忽然听到一声怒吼：“你们是什么人？为何在此鬼鬼祟祟？”内田良平心里打个冷颤，但随即冷静下来，正要搭话，军师吉仓汪圣忙迎上前去，躬身施礼：“我们是来援助你们的‘天佑侠’，早和你们总大将全将军联系过，有劳壮士代为通禀！”东学党传令官听罢，彬彬有礼地回答：“你是‘天佑侠’军师！我们见过面了--全将军有令，请首领和军师到议事厅相见，其余诸位请到客房休息！”东学党传令官将内田良平和吉仓汪圣、武田范之两个军师领至东学党议事厅门口，总大将全琫准带领总管领金开南、孙化中和总参谋金德明早已在门外等候。

内田良平举目一瞧，看见站在前面的一条短小精悍的铁汉，虽然体态并不魁伟，但却英气逼人，一双剑眉大眼炯炯有神，紫铜色的长脸上闪出坚毅的神情，确实是有君子之风的伟丈夫。身后三条大汉也雄纠纠，气昂昂，一个个按剑而立。内田情知前面那条铁汉就是全琫准，就抢前一步躬身施礼：“拜见全将军。早就听说全将军出身在全罗道高敞群一个乡班家庭，学识渊

博，武艺超群。现在义气一举，万民归心，今日相见，真乃幸会！本人不才，但从日本带来一批武器弹药，特来大力相助！”全琫准彬彬有礼地将大手轻轻一挥：“不必客气，请到议事堂当面领教！”众人在议事堂分宾主坐定后，内田良平首先开言：“我们‘天佑侠’一行14人不辞劳苦从日本来到朝鲜，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对东学党诸公的义举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朝鲜改革弊政，协助贵国从清国的奴役羁绊下解脱出来，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为了对抗汉人和白人的侵略，为了巩固日本和朝鲜两国的合作关系而竭尽微薄之力。如果我们‘天佑侠’和东学党的奋斗目标一致的话，我们双方就能结成一个统一的大党，我们日本国内的大批同志还会像洛东江之水滚滚而来，大力援助东学党！头山和平冈先生已训练好200名玄洋社志士，以荒尾精为大将，随时准备开赴朝鲜！”全琫准胸有成竹地微微一笑，不动声色地问道：“内田先生和两位军师知道我们东学道的纲领主张吗？”吉仓汪圣将贼眉大眼一瞪，以无所不知的派头说：“东学党威名远震八方，早就引人注目了。我们知道东学党是揉合儒教、佛教和道教三教的教义，由崔济愚在1860年创立的充满反政府思潮和宗教幻想色彩的团体，希望通过个人净化达到社会净化。我们知道你们曾一度势力强大，但目前处于困难时期，需要我们伸出援助之手！”全琫准微微将剑眉大眼一瞪，以一副十分威严的神情强调：“我是问，你们了解东学道的纲领主张吗？”内田良平不等吉仓汪圣开口，就抢着回答：“我们不仅熟知你们的纲领主张，而且默诵在心，不差一字！”东学党总参谋金德明冷笑一声，语带讥讽地说：“你们日本人一贯口出狂言，言而无信！”武田范之气得将手中的禅杖一挥，铜铃般的牛眼一瞪，正要发火，内田良平却用脚尖轻轻一踢武田的脚，示意他不要轻举妄动，便高声背诵起东学党的檄文：“吾辈举义旗至此，决非他故。所望拯百姓于涂炭，奠国家于磐石。当内斩贪虐之官吏，外逐横暴之强敌。举凡苦于两班、富豪之民众，与夫受辱于方伯守令之小吏，皆与吾辈同气怨恨，勿少踌躇，勿失良机，乞速奋起。……”武田范之看全琫准等4人全都露出吃惊的神情，便狡诘地将牛眼一瞪，高声背诵东学党提出的倡议书：“苛政日甚，怨声不绝，君臣之义，父子之伦，上下之分，尽坏无遗，自公卿至方伯守令，不念国家之危殆，唯私谋肥己润家之计。途选之门，视作生财之路。应试之场，举作交易之市。许多货赂不纳王库，反充私藏，国有积累之债，不念图报。

骄众多淫逸，无所畏忌，八路鱼肉，万民涂炭。守宰之贪虐良有以也，奈之何民不穷且困也。民为国本，本削则国残。不念辅国安民之方策，外设乡第，惟谋独全之方，徒窃禄位，岂其理哉？吾徒虽草野遗民，食君之土，服君之衣，不可坐视国家之危，而八路同心，亿兆询议，今举义旗，以辅国安民，为生死之誓。今日之光景，虽属惊骇，切勿恐动，各安民业，共祝升平日月。”武田范之背罢，把牛眼一瞪，露串一副骄横嘴脸，以此向东学党示威。

古仓汪圣感到武田范之的举动太不像话，便连忙把话接过去：“我们知道东学党是崔济愚首创的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民间宗教，大力宣传这样一种现世利益学说：如果每天口诵13字的咒文，就可实现天人如一的平等社会；如果得到灵符便可治愈万玻我们深知全将军发挥教团接主权威，主张进行‘一次救世’的革命，在古阜发起暴动，广泛动员民众，联八道而成一体，才有今天轰轰烈烈的局面！”全琫准对此早已看在眼里，为伸张东学党志气，打掉“天佑侠”的骄矜之气，他深知必须以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便想起

了前几天吉仓汪圣送来的"天佑侠"檄文，他因连日研究与"天佑侠"合作问题，对"天佑侠"的檄文早已默记在心。此时，他轻轻咳嗽一声，不动声色地朗声背诵起来：“虐待百姓者为郡守，郡守之元凶为闵族，闵族恶政之根源在于袁世凯及其清国。义侠在大日本帝国已有3000年之历史，我天佑侠就是继这一传统的任侠团体。”内田良平见东学党首领如此了解“天佑侠”，又对东学党有如此的能人感到吃惊，心想可不能小看这些高丽棒子，便赶紧出来打圆场：“东学党果然人才济济，英雄辈出，双方如能同心协力，一定能把清国势力赶出朝鲜！”对此，全琫准甚表赞同，极有威严地说：“我们东学党是一个替天行道的教团，这次骑兵就是实行符合天道的大义，绝不是一味只搞暴动。我们奉行儒道佛三教，运用东洋的睿智为教祖崔济愚伸冤，使东学得到公认，获得自由转教的权利，我们决心运用东学的巨大力量，防止西方列强的入侵！”“既然如此，你们的行动口号必须修改！我们的大批武器弹药不能白送！”武田范之把眼一瞪大声喊道。

“不行，我们的行动口号是无数弟兄用脑袋和鲜血换来的！”东学党总参谋金德明看不惯日本浪人的横行霸道作法，毫不退让地予以拒绝。

胸有韬略的全琫准大手一挥，示意金德明不要意气行事，心平气和地问道：“请问武田先生，你要怎样修改我们的行动口号？”“我们并不是要把东学党的16个字行动口号全部修改，'辅国安民、尽灭权贵、惩办贪官'都不用动，但'逐灭洋倭'必须改动，我们堂堂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日本浪人，总不能自己打自己！”惯唱红脸的吉仓汪圣怕唱白脸的武田范之出言不逊，破坏借“天佑侠”之手演出放火闹剧的重大任务，急忙出来解释。

为人忠厚的东学党总管领金开南考虑到借助于“天佑侠”的军事力量，打开东学党困局的重要策略，也好言相劝：“我们所说的逐灭洋倭是有特定内容的，是指那些专门对朝鲜搞侵略活动的日本鬼子，绝不指援助东学党的日本友人！”“不行，我们没法向国内交代！”武田范之仍蛮横地大声吼叫。

“我看这样吧！”全琫准考虑到目前东学党的困难处境，特别是缺乏武器弹药的情况，决心做策略性的改变，“把'逐灭洋倭'改为'反对侵略'如何？”

“好！就这样决定！”内田良平为早日完成在朝鲜点火的任务，终于下了决心，“是否可以就这样达成协议？”全琫准谦虚地向金开南、孙化中、金德明三人投去询问的目光，金开南三人都微微点头表示同意，于是全琫准微笑着欣然站起，上前一步握住内田良平的手说：“东学道和天佑侠谋议一致，同意达成协议，双方编成一支军队，共同行动！”“好！完全赞成！”内田良平脸上闪出兴奋的光芒，“下面研究如何编组队伍！”全琫准伸出大手，从东学党总参谋金德明手里接过兵符，对内田郑重地说：“这是东学党的兵符，请接受。内田先生享有在朝鲜自由征募东学道道徒的权力，行以指挥东学军作战！”内田良平怀着难以抑制的喜悦心情，双手接过日思夜想的东学党兵符，回首交给武田范之，又从吉仓汪圣手中接过一份文件，走到全琫准面前，迫不及待地递了过去：“这是我们拟定的义军编制方案，请过目！”全琫准双手接过，立即招呼总管领、总参谋围拢观看：天佑侠编成方案天佑侠共编成一个大本营和7个方面军：大本营总督：全琫准军师：武田范之、吉仓汪圣游击军大将：内田良平副将：西胁荣助韩将：金荣昌兵：70名东面军大将：田中侍郎副将：井上藤三郎韩将：斐文玉、全化山兵：100名西面军大将：千叶久之助副将：大久保肇韩将：崔东文、安正善兵：100名南面军大将：白水健吉副将：日下寅吉韩将：李泉元、迢远方兵：100名北面军大将：

大原义刚副将：本间九介韩将：朴正元、郑保山兵：100名辎重军大将：大平正吉副将：葛生修亮韩将：李华全兵：50名红十字军大将：铃木天眼副将：田中毛六韩将：全方前兵：30名内田良平在一旁静静地注视着东学党四位领导人共阅"天佑侠"编成方案，等四人刚刚浏览完，就迫不及待地问道：“四位将军对我们提出的编成方案不会有什么意见吧？”“不行，你们想实际上把我们架空，夺取东学党的指挥权！”总参谋金德明极力反对。

“总参谋此话言重了，全琫准将军任大本营总督，是最高指挥官，我们都在他麾下听候调遣，何来夺取东学道领导权之说？”吉仓汪圣摸着修剪整齐的八字胡竭力争辩。

内田良平生怕双方谈崩，赶快出面再做让步：“我提议，金开南、孙化中为天佑侠副都督，金德明为参谋总长，都有权指挥7路大军！”“好！一言为定！”全琫准果断地下达命令，“请进午餐，下午按新编制在校军场操练人马！”下午二时正，东学道的校军场上口号震天，旗帜飞扬。

仔细看去，这真是世界上一支最奇特的部队：士兵几乎全是头缠白巾的朝鲜农民，步伐虽不甚整齐，但却精神焕发，斗志昂扬；枪法虽不太准，但却敢打敢冲，往昔忍气吞声的奴隶神态荡然无存。再看这支部队的指挥官，更是形形色色，无奇不有：头缠白巾的东学党头目精神抖擞，英姿飒爽；身穿西服的朝鲜独立党人员脸上充溢着大展宏图之志；头戴清朝乌纱帽、带子长长下垂的对李氏王朝不满者想借此报仇雪恨；穿着纯和服的玄洋社歹徒贼眉鼠眼，心怀叵测；身着日本皇军将校服装、胸前丁零当啷挂着颗颗勋章的日本军官手挥日本武士刀骄横拔扈，不可一世。这真是一支融中国、朝鲜、日本三国服装为一炉的特殊军队，难免给人百鬼夜行的怪异之感！

全琫准在内田良平陪伴下，兴致勃勃地来校军场，看见朝鲜农民军在天佑侠党徒的指挥下，果然布阵有方，步伐严整，全军上下面目一新，不由得兴高采烈地称赞说：“内田先生，你手下人虽不多，但个个胸有韬略！真是一以当千，大大弥补了东学道缺乏军事人才的不足！”“过奖了，东学党势力强大，斗志旺盛，令人钦佩！”“不，这里用得着中国一句古语：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不，我也熟记中国一句古训：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那么，我们这支队伍可以说是二者兼备，天下无敌了？”“有全将军为统帅，定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有内田先生大力协助，一定会天随人愿，大功告成！”“哈哈，哈哈！”全琫准不由得发出来自肺腑的豪爽笑声，内田良平则为自己演出的放火剧取得顺利进展而大声狂笑。……“报告都督，有重要敌情！”全琫准和内田良平的笑声未毕，耳旁突然传来东学党总参谋金德明的急切禀告声。全琫准听罢，当机立断下令：“立即通知副都督和军师到议事厅！”不一会儿，东学党和天佑侠重要头目齐集东学党议事厅，全琫准言简意赅地道明开会宗旨：“今天召开东学党和天佑党联手后的第一次军事会议，先由参谋总长报告紧急军情！”参谋总长金德明怀着紧张的心情报告：“据探马报告，两湖招讨使洪平薰正率领精兵8000，气势汹汹地杀奔淳昌而来，估计明天清晨即可到达淳昌附近！东学道新败之后，现在不到1000人，敌众我寡，众寡悬殊，请谋良策！”金德明报告完毕，议事厅里的空气立刻紧张起来。

内田良平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兵不在多而在精。……”突然，他抬起头瞪大眼睛问道：“洪启薰的部队战斗力如何？”“他的主力是1000名用美国新式武器装备起来，又经过美国教官训练的京师部队，余皆不足虑，

大都是被东学道打败又匆匆补充新兵的乌合之众！”金德明认真地报告道。

“报告都督，我有妙计！”内田良平高声喊道。

“报告都督，我有良策！”金德明年轻英俊的脸上闪耀出动人的光彩，声音里透出由衷的喜悦。

“报告都督，我有致胜之术！”武田范之瞪着牛眼抢着吼叫。

“报告都督，我有退敌之策！”东学党总管领金开南也不甘落后。

“好！东学党不仅吸收儒、佛、仙三道之智慧，取其华拔其粹而积其大成，又有日本友人相助，真乃天佑我也！”全琫准兴奋得满脸通红，忙命侍卫官：“给四位将军都准备纸笔，请他们都把自己的神机妙算写出来，然后再取各人所长制订完整的作战方案，这真乃东学道的天大乐事！”内田良平、武田范文、金德明、金开南从侍卫官手里接过纸笔，立刻分头书写起来。

不一会儿，四份作战方案很快递到全琫准手中。

全琫准看罢，立刻爆发出爽朗的笑声：“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你看第一个：‘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再看第二个：‘请君入瓮，瓮中捉鳖’；请看第三个：‘诱鱼上钩，烹而灭之’；最后第四个：‘赶猪进圈，围而宰之！’”参加东学党最高军事会议的双方人员都放声大笑，之后发出一片赞叹之声：“妙极了，真痛快！”“好极了，真有教祖暗中相助！”“哈哈，我每天的13字咒文没有白念！”“东学党的灵符真是法力无边！”“天佑侠真是神通广大！”全琫准兴奋地将手一挥，示意大家安静下来：“诸位，现在就来研究这场恶战的打法。我先讲，军师和各路指挥官再做补充。……”5月30日夜半时分。松风飒飒，呼啸在一望无际的朝鲜全罗道淳昌附近的高山上。

午夜的月亮孤零零地照着荒山古道，使朝鲜大地陷入一片朦胧之中。

月亮地里，可以模模糊糊看出，荒山古道两旁，埋伏着一个个头缠白巾的东学党士兵。

在一个大石头后面，爬着东学党最高首领全琫准。

此时，这个42岁的朝鲜汉子心潮似大海般奔腾不息。他用又粗又长的大手托着腮帮苦苦思索。他领导的东学党义军已两起两落，目前正处于最困难时期，今晚又面临强敌进攻的严重关头，他既对有美式装备的洪启薰的8000精兵忧虑忡忡，又对前来助战的14个日本浪人从骨子里不信任。虽然内田良平和自己的亲密战友孙化中、金开南、金德明都争着来挑诱敌入瓮的重任，但他却未答应，而坚持要亲自出马，亲手掌握诱敌火候，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麻痹大意，更不能中为人奸诈的日本浪人的阴谋诡计。

突然，远处传来大批马队飞驰而来的响声，全琫准精神为之一振，立即将令旗一挥，威严而简短地下达作战命令：“听我号令，准备动手！”这时，洪启薰前锋马队缓缓驰来，“得得”的马蹄声在荒山古道上越响越近，在午夜的宁静旷野里更听得十分真切。

“……15、16、17、18、19。……”全琫准抚刀数着进入包围圈中的马数，待数到“20”时，猛然从大石头后面跃起，昂奋地将大刀一挥，震天动地一声大吼：“弟兄们，打啊！”刹时间，几十条火绳枪一起开火，滚木、巨石像雨点般从古道两旁飞来，把洪启薰的前锋马队打得蒙头转向。全琫准率领100名头缠白巾的东学党战士活像从天而降的神兵，居高临下猛冲而来，有的专门砍马腿，有的专门挥着大刀斩杀马上的骑兵。

一时间，山谷中杀声震天，英勇的东学党士兵把洪启薰的50名前鋒马队几乎全部歼灭。

全琫准看到初战取得了初步胜利，兴奋地指挥战士们收拾战利品。

这时，洪启薰的主力部队已经到达。

洪启薰见50名马队前锋几乎全部被歼，气得暴跳如雷，立即指挥部队向东学军展开猛烈攻击。

全琫准见此情景，心中大喜，迅即组织100余名东学党义军与洪启薰所部展开激战。

全琫准挥舞大刀一马当先，奋力冲杀，东学党义兵个个如虎相随，不一会儿便渐渐占了上风。全琫准挥动大刀正杀得兴起，突然想到“诱敌深入”的关键决策，心中不由得打了个冷战，心想可不能一味恋战而破坏了战斗全局，便虚晃一刀，边战边退，众义军对全琫准的意图心领神会，跟着他且战且退。

洪启薰骄横成性，见全琫准不断后退，认为东学党是真打不过他指挥的有美式装备的朝鲜官军，便指挥所部在后面紧追不舍。

为诱敌上钩，全琫准打打停停，且战且退，终于把洪启薰所部8000名朝鲜官军引进一条长达5公里的大沟谷中。

洪启薰发现大路两旁全是笔直的陡峭石壁，只有一条牛车路通向远方，心知地形险恶，正要传令部属加倍小心，突然，惊天动地一声炮响，孙化中、金开南、金德明和内田良平分别率领东学党、天佑侠各路大军一起杀出，凭借有利地形，向洪启薰所部官军发动猛烈进攻。

洪启薰带领的朝鲜官军已有三个多月没有领到官饷，士气极为低落，在东学党和天佑侠的强大攻势下纷纷举手投降。

洪启薰见大势不好，慌忙带领亲信杀出重围，经泰仁、院坪逃往全罗道首府全州。

全琫准和内田良平率领东学党和天佑侠乘胜追击，于5月31日傍晚攻克全州。

全州城里一片欢腾。东学党首领忙着镇压贪官污吏，烧毁奴隶的登记簿，张贴废除旧身份制度的布告，以公平的方式平分农地。

在一家大酒馆里，天佑侠党徒正狂欢暴饮。

武田范之已喝得酩酊大醉，又端起一大杯酒像饮驴般咕咚咕咚几口喝完，瞪起牛眼吼道：“天佑侠才真了不起，东学党算什么东西？他们已濒临崩溃的边缘，靠我们帮助才能继续打下去，没有天佑侠，他们早被朝鲜官军赶尽杀绝了！”“说得对，为天佑侠立下大功干杯！”“干杯！”“哈哈！”天佑侠党徒正在纵酒狂饮，突然，酒店大门被咚地踢开，从门外旋风般卷进两个人来，后面有无数头缠白巾的东学党党徒和全州市民潮水般蜂拥而至。

众人定睛一看，原来是阿菊姑娘和井上藤三郎打着“为金玉均进行吊唁作战”的旗帜，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

内田良平看阿菊那张粉嫩俊俏的脸上露出极其惊慌的神情，知道一定出了什么大事，酒劲早已惊醒了大半，一步蹿上去抓住阿菊的红酥而富有弹性的手，迫不及待地问：“阿菊，出了什么事，快说！”阿菊见内田良平极为关心地询问，一头扎在内田良平怀里失声痛哭。

“三郎，到底出了什么事？”内田良平问阿菊身旁的井上藤三郎。

充满孩子气的井上藤三郎连忙回答：“我和阿菊到街上去玩，看到个名叫金玉均的人被凌迟处斩的布告，阿菊就失声大笑，到一家缝衣店用大刀逼着人家做了那面旗帜。她打着旗在大街上喊叫着要为金玉均报仇雪恨。东学

党一个头领让她收起旗子，阿菊火起，举刀杀死了两人，东学党闹着要抓凶手，正追赶而来！”内田良平听罢，知道阿菊闯下大祸，忙问：“阿菊，你怎么干出这种事来？”“我觉得金玉均就像亲生父亲一样，怎么甘心让他死后受此凌辱？再说金玉均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友人被害，小林胜民、尾崎行雄等人组织了‘金玉均友人会’，向清国和朝鲜政府要求引渡尸体，但清韩两国不但拒不答应，而且把金玉均的尸体抛在杨花津渡口，甚至连他的家人也惨受惩处，这作为日本人的感情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武田范之、田中侍郎等人听罢都高声叫嚷：“清国和韩国这样对待大日本帝国的友人，真是对玄洋社的天大侮辱，清国、韩国同罪，都得狠狠教训一顿！”“不要吵嚷！我们身在异邦，身负重任，稍有不慎，即有杀身之祸。我们的行动，要听军部和玄洋社领袖指挥，且不可轻举妄动，万不能胡言乱语！”内田良平话音未落，一句宏亮的话语从门外起来：“这话说得好极了！”天佑侠党徒抬头一看，齐声叫道：“野先生好！”内田良平上前一步，紧紧握住的野半介的手使劲摇晃：“首领来的太巧了！军部和玄洋社首领有何指示？我们遇到了难题，正不知下一步如何行动呢？”矮小精干的野半介用力握着内田良平的大手，小声说道：“我正为此事而来！”继而扭转他那瘦削的五短身材，用宏亮的嗓音演讲般说道：“诸位辛苦了，你们相当出色地完成了在朝鲜演出放火剧的重要使命，使东学党没有被朝鲜当局镇压下去，而向清国提出派兵请求，这就为大日本帝国出兵朝鲜，向清国开战制造了借口，为大日本皇军备战争取了时间，你们为大日本帝国开拓疆土立下了汗马功劳，日本军部和玄洋社首脑对你们的赫赫战功极为欣赏！”对内田良平领导的“天佑侠”在甲午战争中扮演的纵火者角色的作用，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宋教仁在论述《甲午战役挑发者谁乎》时，曾有深刻揭露：盖日人久欲以一战驱逐中国在韩努力，而苦无出兵之口实，及阴差遣武士一队，煽动东学党作乱，以诱中国之出兵讨伐，而已出兵相抗，以激成战争者也。……日政府为利用东学党，乃以任举付良平，并给以外务者之机密费数万金。良平乃与其徒结一团体，曰“天佑侠”，榜其旨曰“扶助人道”，相率至朝鲜。……其一切举动，无非欲激成战争，以驱逐中国之势力，断绝中国容喙之关系，而其所用手段，极尽世人之狡狴。语曰：“国际无道德”，又曰：“大外交家之伎俩，日以卖人为事。”盖彼国之二三牛鬼蛇神，亦深得乎此道者也。夫甲午一役，实吾国盛衰一大关键也。前乎此，吾虽屡与皙种齟齬，然未尝大创，人犹不敢公然侮之，自是役之败，割地一行省，赔款200兆，而吾国之声威顿减，虎视眈眈之群雄，遂张牙舞爪，纷至沓来，而吾国几于不国。然究其原因，则所谓天佑侠之一团者，不谓为最初之导火线焉不得也。甚矣，日人种因之远而结果之宏也。“宋教仁的揭露当然是后话，我们且书归正传。

且说内田良平听到的野半介的夸奖之辞虽然高兴万分，但从当前处境考虑，仍然忧心忡忡：“阿菊因金玉均事件闯下大祸，我们如何是好？”野半介不以为然地将手一挥，派头十足地侃侃而谈：“你们以非凡的才能实现了挑起日清战争的预谋，为打败清国、吞并朝鲜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野半介说到这里，手抚修剪整齐的日本仁丹胡子，轻轻咳嗽一声，强调说：“天佑侠的纵火任务已经漂漂亮亮地完成了，可以说完成了一种虎胆妙算的使命，你们的侠义壮烈行动使日本国民血液沸腾，也促使日本政府下定征清决心。你们要由纵火队改为谍报队，从现在起，就兵分两路：阿菊和井上藤三郎赶快赴天津侦察清国北洋舰队情报；内田良平带众弟兄留在朝鲜，负有三

大任务，一是引诱东学党投入反清战争，二是侦察驻朝鲜的清军动向，三是暗中监视东学党，为最后镇压他们并实行日韩合并打下基础！记住，你们归旅团长大岛义昌少将指挥！”的野半介说到这里，停了一下，以犀利的目光扫视众人一圈，然后用不容置疑的口气下达命令：“现在日清韩三国形势变化极快，真是瞬息万变，必须马上行动，不得迟疑！”阿菊、田中侍郎、井上藤三郎还想争辩几句，但野半介已旁若无人地转身走出门去，只好极不情愿地跟踪而去。内田良平极想把阿菊留在身旁，但事至此，作为“天佑侠”首领，他也不好再说什么。

内田良平正要招呼众人过来，商讨“天佑侠”今后的活动，突然听见门外响起一片急促的脚步声。

内田良平转身一看，只见东学党总参谋金德明手抚佩剑怒气冲冲地大步走了进来，心想准是为阿菊闯下的大祸而来，暗中庆幸阿菊早一步走脱，衷心佩服的野半介处事果决，不然就会带来天大的麻烦！内田想到这里，不等怒发冲冠的金德明开口，他抢先笑嘻嘻地询问：“不知总参谋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多有得罪。总参谋前来有何见教？”“见教不敢当，我是来向你追讨罪犯的！”年轻气盛的金德明依然怒气冲冲，圆眼一瞪，气呼呼地吼道。

“追讨罪犯？”内田良平装作大吃一惊的样子，一把将金德明拉向酒桌旁，将他的双肩一按，硬按在椅子上坐定，抄起酒瓶斟满一杯酒，双手捧到金德明跟前，“金将军，请喝酒，开什么玩笑，我这里哪有什么罪犯？”“去你的！”金德明勃然大怒，将酒杯狠狠向地下一摔，只听“哗啦”一声，装满酒的杯子摔得粉碎，“别给我来这一套，老老实实交出罪犯！”“金将军，请问，你让我交出什么罪犯？”内田良平死皮赖脸装糊涂。

“告诉你，是女罪犯！”“女罪犯？阿菊？她犯了什么罪？”内田良平装出一副毫无所知的样子。

“阿菊是个女魔鬼，她叫嚷要给金玉均报仇，声称搞什么吊唁作战，她一下杀死了我们两个弟兄！”“是吗？不可能吧？”内田良平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般，极力否认。

“什么不可能？阿菊在光天化日之下杀死我们东学党两个弟兄，众目睽睽，鲜血淋漓，焉能有假？”“请问，这有什么凭证吗？”“凭证？……有，阿菊打着为金玉均进行吊唁作战的杏黄海旗！在场的千百个朝鲜百姓都是证人！”“这是真的吗？好！我将立即进行调查。如果属实，一定严惩不贷！”

“行！阿菊在朝鲜国土上悍然犯下杀人大罪，你必须立即交出凶手！”内田良平见此计不成，只得眉头一皱，又生一计，他装着恍然大悟的样子，将拳头狠狠在酒桌上一捶，将酒杯震得满桌乱滚，有几个酒杯掉在地上，摔个粉碎：“金将军，经你提醒，我忽然想起来了--怪不得一个时辰前，阿菊慌里慌张向我请假，说她家里有事，带着井上藤三郎要回日本，原来她已犯下大罪，找借口弃我而逃！”正在此时，全琫准怕金德明和内田良平发生冲突，忙带人匆忙赶来，一进门就问：“金德明，罪犯抓到了吗？”内田良平不等金德明回答，就抢先回答：“金将军，都怨我警惕性不高，受了阿菊的气，放她回日本去了！请派人到釜山去截！”“是吗？能追得上？”全琫准早就看穿了内田良平的把戏，已派人去查，此时却从团结抵抗朝鲜官军的大局出发，及时掉转话头，“内田先生，你对我们的下一步行动有何高见？”内田良平见全琫准不再追问阿菊的事，知道此人城府极深，比年轻气盛的金德明要难对付得多，需要加倍小心，想起野半介刚才布置的任务，就趁机提出自己的主

张：“我们要进一步联合作战，扩大战果。我建议兵发京城（汉城），并做好与清国军队作战的准备！”“据最新情报，韩国国王已密令闵泳骏向袁世凯提出请求派兵的要求，我们的下一步行动的确需要慎重考虑！”内田良平听到闵泳骏已向清国提出派兵请求，心中大喜，心想如果东学党若能很快攻进京城，日本就更有理由向朝鲜出兵了，于是再次提出意见：“我认为我们应立刻兵发京城，干出更轰轰烈烈的事业！”全琫准不知是计，也欣然同意：“走！咱们这就去找金开南、孙化中仔细商量！”一直在一旁沉默不语的金德明对此极为不满：“这不行！我们两个弟兄的血不能白流！”全琫准像大哥般劝说小弟：“别着急，有什么话慢慢商量！”

6月1日上午，在日本内阁总理官邸正在紧张地召开内阁会议。从一个个内阁大臣忧心忡忡的脸和会议室内的烟雾腾腾，便可看出会议的激烈程度。

主持内阁会议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活像一个急于扑食的饿汉，又如一只张牙舞爪的恶虎。

伊藤博文（1841~1909），幼名利助，后改名利介、俊辅，号春亩，又号沧浪阁主人。1841年10月16日生于长州藩熊毛郡束荷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后积极参加反幕活动，主张开国进取，成为明治天皇的心腹，曾负责起草《大日本帝国宪法》，先后四次组阁，三次出任枢密院议长。1892年8月，伊藤奉命再次组阁后，积极推行扩张政策，断然发展海军，终于悍然发动甲午战争，成为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元凶。

此时，伊藤博文一扫平日温文尔雅的绅士风度，用手抚摸一下满脸大胡子，双手用力支撑着会议桌，高声打断众人嘈杂的议论声：“政府被迫使用传家宝刀解散议会，国内外形势日益紧迫，现已到了如果不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就无法稳定政局和人心的地步。外务大臣，请将帝国驻汉城代理公使杉村的来电读给众人听！”“鬼才”陆奥宗光“啪”地一声打开文件来，高声朗读杉村浚的报告电文：“朝鲜政府被东学党吓破了胆，已向清国旗援，朝鲜半岛形势岌岌可危，若默视不顾，将使已不平等之中日两国在朝鲜的权力，更有所轩轻。我邦以后对于朝鲜，唯有听清国任意行动而已。日韩条约之精神，将被蹂躏！”“请谈谈外务省的意见！”伊藤博文不动声色地吩咐。

陆奥宗光狡狴地放下文件夹，用右手将金丝眼镜一扶，以三寸不烂之舌极富煽动性地说：“我个人认为，不管中国以何等名义，若有向朝鲜派遣军队之事实，日本欲图朝鲜之霸业，并以朝鲜为跳板向大陆雄飞，实现帝国在东亚之宏图，就不能不派遣相当的军队，以备不虞，才能维持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均势！”“外务大臣意见高明！”“赞成陆奥先生的高见！”“好！内阁通过向朝鲜出兵决定！”伊藤博文得意地高声宣布，“立即请参谋总长有期川官炽仁亲王殿下、参谋次长川上陆军中将出席内阁会议，密议向朝鲜派兵的军机大事！”川上操六一到会场，立刻把内阁会议推向新的高峰。

中将衔的川上操六向以儒将风度和有远见卓识闻名于日本军界和政界，他一坐下便成了内阁会议的中心人物，洋洋洒洒大发议论：“首相和各位阁僚，首先要向诸位报告，我派往朝鲜搜集战场情报的伊地知幸介少校已把他和玄洋社浪人搞的情报带了回来。综合各种情报，清国必然答应朝鲜的出兵请求。我认为，日本应抢先向朝鲜出兵！”“这为什么？”伊藤博文早有向朝鲜出兵之意，却故意发问，旨在借川上操六等军人之口说服同僚，以减少迅速出兵朝鲜的阻力。

“刚才我同帝国驻汉城公使大鸟圭介商议，我同意公使先生的意见。”“大鸟公使有何意见？”“大鸟公使认为，清国从天津向仁川运兵，两天两夜时间足矣，而日本从门司出发到仁川，至少要4天4夜时间。很明显，日本帝国若不及早发兵，就有让清国执先鞭之患。

退一步来说，即使从保护在韩国的日本帝国臣民与维持帝国之权威而论，帝国也有早日出兵之必要！”伊藤博文心里对川上操六的一番高谈阔论极为敬服，却手捋长髯连连摇头：“事情哪有那么容易？两国交战非同儿戏！”川上操六清瘦细长的脸上掠过一丝阴影，知道在日本军界长州藩和萨摩藩的争斗已非一日，他一贯不愿卷入两派之争，此时更以发动侵华侵朝战争的大局为重，道出他几日来深思熟虑的侵华政略方案：“大日本帝国对清国的战争已准备20余年，今天终于到了有可能高奏凯歌的一天！要打赢这场关系到帝国命运的战争，就要推行杰出的一元外交！”外相陆奥宗光显然对出自军人之口的一元外交问题最感兴趣，便摆出学者风度，彬彬有礼地明知而故意问道：“何谓一元外交？”“我所说的二元外交即军事、外交、政治三位一体，就是外交和军事一元统合，互相辅助，取长补短，尽其所能去争取大日本帝国的‘国家利益’！”“光讲空话有会么用？讲点实际的！”有期川宫炽仁亲王听得有点不耐烦，大声斥责道。

川上操六对皇室成员的无知与狂妄极为不满，但对身为参谋总长的炽仁亲王更是敢怒而不敢言，对自己的顶头上司只得委曲求全，甚至把自己的意见说成是他们两人的意见：“亲王殿下所说极是！按照我和亲王殿下几天来商量的意见，应该花开两朵，各表一支！”有期川宫炽仁一听川上操六果然识时务，顺着自己的杆子爬上来了，便骄横地将计就计，竭力往自己脸上抹粉：“对，把咱们俩的意见说给他们听听，叫他们开开眼界！”川上操六见这一招儿果然灵验，更鼓动如簧之舌滔滔不绝地讲下去：“在外交上，要创造世界上最耍手腕的巧妙外交，设法以被动的形态，把清国引入我们早已布好的圈套中去！”“妙极了！我将命令大鸟公使准备随时出发，带着外务省的新方案迅速赴任，并命杉村代理公使与袁世凯巧妙周旋！”陆奥宗光兴奋得击节赞叹，并以外务省最高首长的身份做了具体补充。

“在军事上你有何妙算？”这是伊藤博文最感兴趣之所在。

“在军事上应做到三位一体：海军大臣应借‘八重山号’军舰护送大岛公使返任之机，向朝鲜速增海军，且发出该舰和海军均听从大鸟公使的指挥及训令，全力以赴寻找战机消灭清国的北洋舰队；参谋本部宜急速密令第五师团长派精锐兵力挺进朝鲜，陆军部队暗中做好紧急出师之准备；内阁也应下令向邮船会社秘密调集船只，以顺畅地运送军队和军需品。这些事情要紧急办理，敏捷行动！”“好！我赞成！”伊藤博文用右手将银髯一捋，把牙一咬，“外务大臣，请宣读我们商量好的内阁决议！”“是！”陆奥宗光又“啪”地一声打开公文夹，拿出一个文件，精神抖擞地朗读：关于朝鲜事件的阁议据驻京城公使馆来电称：朝鲜国内乱民起事，官兵屡败，乱民势甚猖獗，难保不侵入京城及其他日本人居住地。为保护公使馆及日本国民，殊有派兵之必要！

根据《日清天津条约》第三款，当朝鲜国发生变乱或重大事件时，中日两国或一国派兵时有互相照会的规定，故于出兵之时，将来或与清国照会往返，出现如何情况在所难料，但当前事变紧急，以我国兵力保护我国国民刻不容缓。为此，不待与清国联合派兵，而按条约行文照会，立即出兵为宜。

据驻京城公使馆杉村书记官来电，朝鲜政府已向清国求援。目前尚未

得知清国对此是否允诺，但不能不预先考虑到，将来清国也许会派遣骑兵员。那时，两国军队或采取联合行动，或根据朝鲜政府之请求，采取临机应变的防卫措施，殊难逆料。对比，均须预为谋划。

现在不能等待更为详细的报告，首先应以保护公使馆及侨民为重，不失时机地做好迅速出兵的准备。

伊藤博文听罢，以威严之目光扫视会场一周，然后以命令的神情征询意见：“诸位阁僚对此阁议有何高见！”众阁员一起起立，声嘶力竭地喊道：“完全赞成，誓为帝国效劳！”伊藤博文浑身充满了侵略的狂热，满嘴巴胡子骄横地斜插云天：“内阁一致通过关于朝鲜事件的阁议！我即刻进宫仰请圣裁。内阁会议至此结束，各大臣务必抓紧对清国开战之各项准备，外务省更需抓紧诱使清国迅速出兵之事，东京、北京、京城三地痞头并进，不得有丝毫疏漏！”6月1日下午，在日本驻汉城公使馆，代理公使杉村浚和书记官郑永邦正在兴致勃勃地阅读明治天皇当日给陆相、海相、参谋总长及海軍军令部长的敕语：今朝鲜内乱蜂起，气势猖獗，为保护侨居该国的我国国民，决定派遣军队，卿等应悉心协商，妥善处理。

此谕。

杉村浚、郑永邦阅罢明治天皇下达的向朝鲜派兵的敕语，激动得涕泪纵横，朝着皇宫的方向虔诚地遥拜、叩首，歇斯底里地狂呼乱叫：“圣明的天皇果然英明决断，我们终于盼到了对清国开战的这一天！”A 马关议和 1895年3月19日，清国“头等全权谈判代表”李鸿章率议和团，怀着忧悒惨淡的心情，分乘德籍商船“公义”号和“礼裕”号到达日本。

李鸿章一行甫抵下关，第一眼便看到岸上挤满了打着太阳旗和日军连队旗的人群，听到玄洋社、“神刀馆”等右翼团体暴徒充满军国主义侵略狂热的狂呼乱叫声：“打到北京去，占领全清国！”“杀死李鸿章，反对媾和！”为侵华日军连续攻克威海卫、牛庄、田庄台有赫赫侵略战功而狂热不已的日本右翼人士，纷纷拥到东京银座、日本桥、浅草、神田、下谷和山手町，到处悬挂太阳旗和日军连队旗，到处披红挂彩，到处声嘶力竭地狂叫不已。

在下关，扯着嗓子喊叫得最卖力气的是自由党打手、“神刀馆”暴徒小山丰太郎。与他并肩狂呼的是玄洋社女浪人阿菊。她刚从天津返回日本，便被头山满派来执行重要任务。

两人狂叫累了，阿菊便轻移莲步，咧开樱桃小口，以挑逗人的风骚眼神勾引道：“六之助，走，阿菊请你喝一杯！”小山丰太郎的酱黑色面孔上露出比哭还难看的笑容，长嘴巴里翻卷着狗舌似的长舌，收敛起凶悍的目光，故意朝花枝招展的阿菊道：“你请我喝酒？我还没工夫呢！”阿菊和小山丰太郎是自小在一起长大的邻居，知道小山丰太郎嗜酒如命，因此虽曾投靠日本流氓学者福泽谕吉，在福泽创办的庆应义塾上学，无奈一个酒鬼不是做学问的材料，书没念上几页就中途退学，做了评书艺人伊藤游的徒弟，没几天又因过于贪杯而被伊藤辞退，但自由党方面却看中了他凶狠无耻的本性，花几个小钱雇他当了打手，还让他加入了右翼团体“神刀馆”。

昨晚，“征清总督府”总参谋长川上操六和头山满向阿菊布置刺杀李鸿章的任务时，阿菊一提出利用小山丰太郎的计划，恰合头山满不使玄洋社背黑祸的本意，也正中川上操六打击自由党的下怀，便马上予以批准。

阿菊听小山丰太郎说没工夫喝酒，将肩上披的那条大红纱巾一把扯下来，捂在樱桃小口上，笑得前仰后合：“六之助，你骗谁都行，还能骗得了

跟你一块儿长大的阿菊？看你青紫通红的蒜头鼻子，汗毛孔就像芝麻眼一般粗，没酒时就像死了爹娘，有酒时又如捡到黄海金万两！还说没功夫喝酒，只怕一见了酒，就忘了你是狗还是人了！”阿菊边骂，边装出小家碧玉般的温柔去拉小山丰太郎，又近身用丰满而富有弹性的双乳在六之助身上乱蹭，几下便把这个酒鬼搞得晕头转向，乖乖被阿菊拉到一家酒馆的雅座里，叫上一席丰盛的酒肉，大吃大喝起来。

小山丰太郎几杯酒下肚，立时满嘴流出涎水，嘴巴张得像个吐满秽物的痰盂口，气味比驴尿还恶心！阿菊几乎要吐出口来，但为了利用他，只得耐着性子举杯祝酒：“六之助哥真是酒场英雄，我阿菊自愧不如。来，我再敬你一杯！”阿菊敬完酒，从怀中掏出头山满交给的几大捆崭新钞票，推到酒鬼面前：“六之助哥，我求你一件事，办成了，这些钱全归你！”“什么事？”小山丰太郎喷着酒气，把狗舌头歪到嘴巴边问道：“刺杀李鸿章！”阿菊圆瞪杏眼，斩钉截铁，毫不含糊。

“谁？”“李鸿章！”小山丰太郎闻听此言酒被吓醒了一半，哧溜一声软瘫在地：“哎呀，我的妈呀，吓煞人了，打死我也不干！”阿菊杏眉一挑大喝一声，一把将小山丰太郎从地上抓了起来，按在椅子上，又将头上随意梳就的马尾辫一甩，“啪”地一声打在小山丰太郎脸上：“不干？头山满说了，不干就干掉你！听话，干掉了李鸿章，陆军参谋本部和玄洋社都保证把你送到国外！”

“阿菊说到这里，捏着鼻子在酒鬼令人作呕的脸上一亲：“我陪你到美国，到欧洲，在花花世界里享受一辈子！”阿菊又把笑容一收厉声断喝：“你到底干不干！”“干！”小山丰太郎看着大捆的钞票，看着阿菊洁白的脖颈、春意盎然的双乳，顿时来了精气神儿。……3月24日，在东京麻布的一个秘密处所，日本大本营首席参谋官、“征清都督府”总参谋长川上操六再次接见玄洋社首领平冈浩太郎。

平冈浩太郎刚一落座，顾不得喝一口侍者献上的清香扑鼻的龙井茶，就用长满长毛的大手一拍胸脯，迫不及待地问道：“请问中将，日中媾和谈判谈得怎么样了？”川上操六用手指捻着干枯的脸上两撇仁丹胡子，慢吞吞地回答：“这真是世界上最奇妙的谈判，像中国一句俗语所说，是芝麻杆打狼两头怕：日本怕可能到手的東西再飞掉，清国怕失掉更多的东西！”一介武夫平冈浩太郎如被抛入五里雾中，轻轻一拍胸脯小声嗫嚅：“中将的话高深莫测，平冈。……”川上操六也发觉刚才的话对这个黑社会头子来说无异于对牛弹琴，但破坏中日谈判的差事非要借重“黑社会天皇”的打手不可，于是只得直接介绍谈判情况：“李鸿章这老儿一开始就要求立即停战，伊藤首相提出必须以日军占据大沽、天津和山海关为前提，李鸿章认为这无疑是在中国首都北京的脖颈咽喉插上一把匕首，因而老奸巨滑，拒不让步，陆奥外相担心欧美列强出面干涉，急得如热锅上蚂蚁一般！”平冈浩太郎“啪”地一拍胸脯：“看来非干掉李鸿章不可，我已命阿菊收买了‘神刀馆’的小山丰太郎！”川上操六捻着嘴巴上的胡子狡猾地对此不作正面回答，而通过“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方式予以肯定：“不仅我反对停战，而且桦山军令部长、松方藏相、西乡海相、q本农商相都坚决主张打到底，都是你们的坚强后盾！”“如无别的吩咐，我就告辞了！”“玄洋社收买‘神刀馆’的人去刺杀李鸿章，实在是高明之举，本人佩服之极！”当日下午4时，春帆楼沿阿弥陀寺经外滨町至李鸿章下榻的引接寺道路两旁，日本警察戒备森严，如临大敌。

73岁的李鸿章经过一天的艰苦谈判，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出春帆楼，坐上蓝色的日本“驾笼”小轿，由两个日本轿夫一前一后扛着，徐徐沿阿弥陀寺町向西行来，代表团成员伍廷芳、罗丰录、马建忠等乘人力车在后跟随。

转过外滨町拐角时，日本警察松了一口气，一是因为前面不远处就是清国代表团下榻的引接寺，二是因为拐角的一边是警察派出所，一边有宪兵队，是警卫最严之处，而阿菊奉头出满、平冈浩太郎之命，就钻这个空子，让小山丰太郎在此处下手。

小山丰太郎和阿菊扮成一对卿卿我我的恋人，在外滨町拐角处搂抱亲吻。

此时的小山丰太郎在长衣掩盖下全身短打装扮，腰间系一条麻绳，手中紧握张开机头的手枪，两眼瞪得铜铃一般，全身血液急速沸腾，处于最佳出击状态。

阿菊把充满诱惑力的身躯，倚在小山丰太郎的粗壮胳膊之上，见李鸿章乘坐的上蓝下红的“驾笼”徐徐行来。更使这一对狗男女欣喜欲狂的是“驾笼”四周装有玻璃窗，正好看见73岁的李鸿章正扭动1米70的高大身躯，抬手把玻璃窗打开，以昏花的老眼打量这战胜国的奇异世界。

相距2米了，正是下手的最好地方！阿菊猛然一个飞吻，亲在小山丰太郎那令人恶心的酒槽鼻子下。小山丰太郎犹如接到战斗命令，飞快地从腰间抽出手枪，跳起来“叭”的一枪，照准李鸿章的胸前打去。

当时，李鸿章看大街两旁景色看得双眼有些发酸，便闭目养神，忽听噹的一声响，一颗子弹“嗖”地穿透轿窗，击中李鸿章左颊。金边眼镜被打得碎片四散，子弹擦着眼镜框打进左眼窝下面。他顿觉眼睛发热，立时鲜血直流，痛得李鸿章大叫一声，用双手捂住眼睛倒在轿中的车褥之上。

日本宪兵队上等兵阿部猛吃一惊，大叫一声“抓刺客”，一个箭步冲上来，一脚将小山丰太郎踢翻在地，新条警部也跳上前来用左脚踏住了刺客的胸脯，两人迅即将凶手逮捕起来，阿菊则早已跑得无影无踪。

清国代表团参赞伍廷芳等一拥而上，失声大叫：“李中堂，你。……”李鸿章挣扎着摆了摆手，低声吩咐：“速归！”伍廷芳见李鸿章还能讲话，知道不是致命之伤，便催促轿夫急速而归，把李鸿章抬进引接寺，扶他在寓所榻榻米上躺下。李鸿章疼痛难忍，也顾不上询问刺客情况。多亏随团医生林联辉沉着冷静，马上做了紧急处理。

此时，全权大臣参议、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芳正被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留下来，商量第二天的谈判程序问题。突然，走廊上哄哄骚乱起来，外务省次官林董不敲门就跌跌撞撞闯了进来，笔直地僵立在两人面前，气喘吁吁，脸色苍白，紧张地说不出一句话来。

陆奥宗光和李经芳都露出大惑不解的神色。陆奥宗光刚要责备林董不该在敌国谈判对手面前做出这种越出常规的举止，林董则几乎吼叫着报告：“刚才。……李鸿章阁下，被暴徒用手枪刺杀了！”“伤势怎样？”陆奥和李经芳几乎同时发问。

“左颊中弹。……”“只一发？”“是！”陆奥宗光知道不是致命之伤，又问道：“暴徒呢？”“当场被捕！”陆奥宗光作为外务大臣马上意识到李鸿章被刺事件会给日本带来许多麻烦，便觉得头发晕，两个膝盖松软无力，但立即狡猾地走到李经芳面前，看见李经芳的额角在不停地抖动，便紧紧拉住他的手以示慰问之意：“根本没有想到会发生暴徒刺伤令尊事件，实在遗憾。”

请先去令尊那里主持大计，我立即去见伊藤阁下，全力以赴处置此事！”“鬼才”陆奥宗光一到伊藤府见到伊藤博文，就张口大骂：“这些浪人真是大混蛋，简直发疯了，竟干出这种叛逆行为，把我们费尽心血搞成的局面，给弄得一团糟。”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老练地以手制止道：“现在不是发牢骚之时，要立即着手处理来自欧美和日本各界的指责浪潮--走，我们先去探视鸿章老儿！”李经芳慌忙从春帆楼跑回引接寺，看到父亲满身鲜血，头上包扎的纱布也被鲜血染红，不禁悲从中来，上前抱住父亲嚎啕大哭，李鸿章挣扎着以手示意儿子坐下，苦笑着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中堂大人，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内阁书记官长伊东已代治陪同下，前来探望，已在门外等候！”伍廷芳报告说。

李鸿章挣扎着吩咐：“请！”伊藤三人径直来到李鸿章躺的榻榻米前，见李鸿章挣扎着在医生林联辉扶持下要坐起迎客，伊藤忙上前紧紧握着李鸿章的手，虚情假意地道歉：“发生了这极为遗憾的事件，实在对不起，刺客已经被擒，定重重按律治罪！”陆奥宗光更会花言巧语迷惑人：“伯相安心养伤，幸勿焦急，和议之事，均好商量！”李鸿章强忍疼痛叹口气道：“只因两国争端，才东渡贵国议款，不想被刺客所击，一身负痛不足惜，只望贵国肯示通融，能使大清帝国不过分丢脸，就虽死无憾了！”伊藤听罢低头不语，陆奥也紧咬双唇，两人情知病榻前不是一意硬逼之处，必须变换手法，于是伊藤博文便巧言相劝：“只盼伯相枪伤速愈，和议一层，均有我两人担待！”李鸿章发现伊藤博文的话有松动之处，怕伤好后再有变化，便抓住他被刺后对清国较为有利的国际舆论推动议和进程：“老夫愿带伤与贵国速谈停战大计，然后议和！”“鬼才”陆奥宗光奸诈地不作承诺：“伯相安心养伤，停战之事好商量！”李鸿章在日本被刺之事被当作特大新闻，不几天便传遍欧美各国。全权大臣参赞伍廷芳兴奋地拿着英、美报纸向李鸿章报告：“中堂大人，欧美舆论目前一致同情我大清国，都拿刺杀中堂和4年前刺杀俄国皇太子相比，批评日本‘胜于武器之战，败于道德之战’，指责日本‘戴着文明的假面具，时时暴露出野蛮的本性’。”谈判代表团成员罗丰祿也兴致勃勃地拿着英国报纸向李鸿章进言：“英国《泰晤士报》认为，日本把年逾古息德高望重、第一次渡海出使外国的中堂大人到日本，不仅不好好招待，反而纵容暴徒击伤中堂。是可忍，孰不可忍？现在王牌掌握在李中堂手里：可以带着全世界的普遍同情退出谈判，而谈判破裂的责任毫无疑问应由日本人来负！”此时，李经芳热血沸腾，慷慨直言：“对，退出谈判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为给日本人点儿颜色看，我们可搬出引接寺到‘公义’号上疗养，以此行动向世界宣告：在日本土地上太危险，难保不发生第二、第三次恐怖事件！”众人异口同声，大义凛然：“言之有理，就这么干！”在一旁沉默不语的清国议和团法律兼政治顾问、美国前国务卿科士达心里直发毛。他先于李鸿章一行到达日本，偷偷与陆奥宗光及其顾问端迪臣密谋勾结，后来在日中议和谈判中，虽有时也煞有介事地与端迪臣表演激烈辩论的假戏，但其实真实意图是按照美国政府的旨意，帮助日本取得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以便使美国从中渔利，因而陆奥宗光对此感激不尽地说：“我对科士达先生来日本是很满意的，他是我的好朋友。

他做了清国议和团顾问之后，日本的行动，就可不受诸多限制！”科士达听李经芳等众口一辞，要搬出引接寺甚至退出谈判，知道此时清国旗李鸿章的名望，找几个列强国家出来干涉不是太难之事，自己必须出面把这两种

意见压下去，于是便霍然起身，板着面孔训斥道：“诸位不要头脑发热，不要忘了你们的战败国地位！清国已经被一个等于它十分之一人口的敌人完全打败了，公平谈判是不可能的，等战胜国订好条件就是了！不乖乖听话，还瞎折腾什么？要是能打败日本，诸位还跑到日本来干什么？”众人被问得哑口无言，敢怒而无法还口，李鸿章只得开口讲话：“你们休得胡言，听科士达顾问的！”李鸿章话音未落，伍廷芳来报告说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再次登门看望。李鸿章慌忙起身，将两人迎至室内，伊藤博文首先开言说：“天皇陛下闻伯相受惊，特下慰问诏敕如下：“朕惟中国与我现在正在交战之中，然已简派使臣，具礼依式议和，朕亦命全权办理大臣与之在马关会同商议。朕践国际之成例，为国家之名誉，固不能不予中国使臣以适当之待遇及警卫，曾特命有司勿稍怠弛，不幸间有凶犯胆敢伤及中国头等全权使臣之身，朕心深为忧愁惋惜。朕命对犯人按法严处，勿有所假借，百僚臣庶须更善体朕意，严戒不逮，以期不损国光。”陆奥宗光也假惺惺上前炫耀表功：“李伯相遭难之飞报一达广岛行在之所，天皇陛下甚惊，不但亲发致歉之电，还派名医来马关为伯相治疗，皇后陛下也赐予御制的绷带，派看护妇前来精心照料。总之，要给李伯相以最郑重的待遇！这说明此遗憾事件纯粹是一个凶汉所为，与帝国政府与国民毫无关系！”伊藤和陆奥告辞出来，见世界各国慰问李鸿章的电报如雪片般飞来，日本各界前来慰问李鸿章的人络绎不绝。两人甚为忧虑，便回到伊藤府上商议对策。

伊藤还未坐稳，外务省次官林董即匆匆赶来报告：“刚才美国驻帝国公使来到外务省说，‘此次狙击事件已使欧美各国对日本的感情恶化，把对日本的一片赞扬之声变为同声谴责。美国认为，日本政府也只能接受李鸿章的要求，实行停战！’美国公使刚出门，俄国公使又登门来访，认为这一刺杀事件使清国得到了请求欧美列强出面干涉的充分理由！”伊藤博文搔着白头踱步叹息：“从目前帝国国内情况看，这场战争也没法打下去了，我们甚至把近卫师团和北海道屯田兵也派往清国，几乎没有用于保卫本土的军队了。如果清国派兵攻击日本本土，帝国就得赶紧撤兵回师！”“不知暂且答应休兵三周，对征清大都督小松宫亲王进行下一战役毫无影响，又可扭转帝国外交的被动局面！”“外务大臣所言极是。如果让李鸿章老儿打出‘愤然归国’的王牌，就会把帝国置于不得不对清国大行让步的不利处境，蒙受千古难雪之大耻！我这就前往广岛，说服陛下和军方强硬派！”话说李鸿章的伤势经名医调治，一周后伤处渐渐收口，就带伤要求恢复谈判。这时，日本的停战阴谋也已策划完毕，陆奥宗光便于1895年3月30日与李鸿章签署了为时三周，不包括台、澎在内的停战条约。

此时，李鸿章头上缠满了绷带，留在绷带外的右眼闪出喜悦的光芒。坐在他身旁的日本军医总监佐藤博士开言道：“李伯相，现在两国已实现停战，我看抓紧时间给您动手术吧，以便早日取出子弹痊愈，只是手术后需要静养几天！”病榻上的李鸿章右眼露出坚毅的光芒，频频摆手拒绝：“目前两国正处在战争时期，怎能为此小事耽搁时间？还是等谈判完再麻烦你吧！”陆奥宗光暗自庆幸，李鸿章还未得到俄国人在中国北部边境调动三万大军的情报，若得到那个情报，这个老儿一定会听从佐藤博士的劝告而慢慢做手术的。实际上，最急于尽快谈判的就是他陆奥宗光！于是，便顺手推舟地把媾和条约草案迫不及待地递到李鸿章手中。

李鸿章瞪大右眼仔细观瞧，只见日方的条约草案竟一要承认朝鲜独立，

二要割让辽东半岛南部和台湾、澎湖列岛，三要赔偿军费库银三万万两，四要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此外还有许多掠夺性要求，并规定要在四天之内做出回答。

李鸿章看罢伤透了脑筋，反复念叨：“不管怎么说，太苛刻了，太苛刻了！”从4月1日起，李鸿章便本着“敌所已据处，争回一分是一分；其所未据处，丝毫断不放松”的原则，以73岁的年迈带伤之身，向55岁的伊藤博文、52岁的陆奥宗光苦苦哀求，软磨硬缠，把赔款由三万万两减到两万万两之后，又从容不迫进一步提出要求：“从维护两国兄弟关系考虑，再减5000万两如何？”陆奥宗光斜视着李鸿章暗想：“这李鸿章不愧为中国当今首屈一指的人物，时而高谈阔论，讲些东方经世家的老生常谈，然后纵横谈论，引人同情，间以热骂冷嘲，以掩饰战败者的屈辱地位。李鸿章看似口若悬河，其实无时不在捉摸着他的话产生的效果，据此寻找更有效的词句。此人态度始终从容不迫，有时也发出无限感慨。

这老儿老奸巨滑，却并不令人憎恶，而显得有几分可爱，这可能就是他能几十年执掌清国大权的奥秘吧？”李鸿章见自己的要求被无声拒绝，又似市场经纪商人一般还价：“减5000万两不行，让2000万两可乎？”伊藤博文摆出殖民主义者恶狠狠的面孔，出言嘲弄道：“议和不是市井买卖，彼此争价，不成事体！”陆奥宗光看得真切，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以军事威胁发动进攻：“李伯伯想必知道，小松宫亲王率领的征清大总督府已带大批增援部队于4月13日开出宇品港，谈不成就只有打下去，那么，伯相恐怕连北京也就回不去了！”伊藤博文见陆奥宗光来了硬的一手，便也凶相毕露地拍案而起：“这个条约提出的条件，帝国让步已到极点，贵国允与不允，一言而决，不必再费唇舌了！”李鸿章心中暗暗生气，正要由着性子大发雷霆，但想到战败国的地位，只好按清政府指示，于1895年4月17日与日本签署了《马关条约》。

4月17日正是甲午之日。日清战争在甲午年爆发，又在甲午日签署媾和条约，因此是名副其实的“甲午战争”。

日本军国主义者通过甲午战争霸占了朝鲜和中国的辽东半岛、台湾岛，但却激其中朝人民的强烈反抗，引起欧美列强间狗咬狗的争斗，因而爆发了日俄战争。

A 第三次出兵：参加八国联军义和团，平山东。

不到三月遍地红。

声势浩大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风起云涌，1900年初从山东迅速地发展到河北，涌入北京、天津，“扶清灭洋”的口号响彻云霄，清王朝无力阻止，转而利用义和团惩治洋人，遂使义和团得到更迅速地发展。

义和团的反帝活动引起欧美列强的恐惧与仇视，其驻华公使联合起来一再要求清政府取缔义和团。狡猾的日本帝国主义虽也赞成欧美列强的行动，但却借口置身事外，引起欧美列强的不满，不断向日本施加压力，日本外相青木周藏才于1900年4月27日训令其驻华公使西德二郎与欧美公使一起向清政府施加压力。

5月20日，日本驻华公使西德二郎奉命参加11国列强驻华使节召开的外交团会议，声称义和团是列强的公敌不能漠然处之，共同要求清政府严厉镇压。从此，日本走上与欧美列强勾结起来镇压义和团的罪恶之路。

日本尽管决定合伙干，但不想做赔本生意，只做象征性姿态：5月2

8日，日本驻华使馆官员参加列强外交团会议，虽同意从早已停泊在大沽的各国军舰上调水兵来北京护卫外国驻京使馆，但寻找种种理由只派3名士兵参加。联军司令西摩大为不满，对日本施加强大压力，日本才同意派25名水兵，与俄、英、法、美、意等国军人共337名开往北京，另派38名水兵留在天津，列强军队共535人保卫天津租界。

接着，日本军官参加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海军中将摩西主持的塘沽军事会议，决定组成八国联军进攻北京。

列强的侵华活动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怒，使中外关系急剧紧张。6月10日，日本驻华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外出挑衅，被清军董福祥的白军士兵杀死。

日本军国主义者恼羞成怒，积极派兵参加八国联军的首批部队2000余人，不听直隶总督裕禄的劝阻，抢登上火车开往北京。在廊坊遭到义和拳与中国守军的英勇狙击，打得日本等国侵略者狼狈不堪，付出惨重的代价。他们破坏北京至天津的铁路，割断电话线，设置埋伏，以灵活机动战术，义和团与清军密切配合，协同作战，使猖狂进犯的日本和列强军队寸步难行，日本和列强侵略军只好修一段路，往前挪动一段。乘火车从天津到北京只需几小时，侵略军居然用4天时间，才在13日晚间到达廊坊车站，14日早晨，义和团三百余人围攻廊坊车站一带的侵略军。据《义和团》记载：“廊坊车站。京津中途位置，对于阻止侵略军入京，可谓战略要地。联军进入廊坊车站，德国人在这里筑起一座炮台——‘炮菲昂炮台’，取自一艘军舰名字；英国人在已经被义和团烧毁了的车站棚屋上构筑工事，挂上了一块牌子：‘美少年炮台’——这也是取自一艘英国军舰名字。

“廊坊附近的铁路被义和团破坏得比较严重，迫使侵略者不得不停下来，从事修理工作。现在侵略军的队伍拥有5挂列车，其中4挂载军队和强征的中国民夫以修路器材，第五挂车作为供应车，在可能保持交通的时期，来回行驶。15日，正当侵略军赶修铁路的时候，义和团向他们发起了攻击。义和团首领宋狮子，原名宋全海，号赤子，直隶通州人。据说赵三多起义队伍中的揭帖多是他写的，那时他四十多岁，属红门，能避火炮，刀枪不入。

“宋狮子带领四百多名义和团拳民，扎头巾，手持大刀、长矛和木棍，其中二十多名还是小孩子，向修理听尖帽联军冲杀过去。侵略军呱呱乱叫，仓皇逃向联军大本营，宋狮子等跟踪追击。这时恰有一队美军从后赶到，架起火炮进行轰击。在侵略军的枪炮之下，义和团伤亡较多，但看不到一丝恐惧与踌躇的迹象。宋狮子等部分团民转身冲向美军，其中一位叫刘青松的拳民冲到这支联军的副统帅麦卡加拉的手枪下。附近村庄的义和团也闻讯赶来，把这批联军围困在车站一带。他们时而袭击联军，时而拆毁铁路，持续两天，战斗不断。日本参谋部编纂的《明治三三年清团事变战史》也这样评论：‘义和团在优势的联军面前表现出的勇敢，不断使我们信服：中国人并不像我们迄今所相信的那样，他们很少怯懦，而更多的却是爱国心和信念。’在义和团和清军顽强抗击下，八国联军被打败退回天津。

日军和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怒，在北京、天津同时向列强使馆、租界发起进攻。日军和列强军队首先在天津进攻义和团和中国军队。

日军在摩西的指挥下冲在八国联军前头，对大沽炮台发动进攻，随即攻占大沽炮台附近的塘沽、新河等村镇。塘沽是一个5万多居民的集镇，在

日本等国军队的铁蹄下，连烧三天三夜，变成一片废墟。

在攻占塘沽作战中，日军出动“爱宕号”护卫舰猛烈开炮，派300名陆战队从背后进攻大沽西北炮台，占八国联军在天津地面兵力900人的三分之一，为出兵最多的国家。面对义和团清军的英勇反抗，日军士兵发挥武士道精神，在关键时刻冲锋陷阵，首先攻入大沽炮台，其指挥官海军中佐服部雄吉死于义和团的大刀之下，受到应有的惩罚。

日本陆军大臣桂太郎狡诈异常，他认为趁镇压义和团的反帝活动向中国派兵，是日本掌握“东洋霸权”的必要开端，应该改变只派少数兵力的消极态度，大举向中国增兵。

桂太郎认为列强能迅速向中国增兵的，只有日本和俄国，而日本与中国只有一海之隔，如能迅速派出超过俄国的士兵，就会使日本在中国攫取更大权益。

日本考虑到5年前在甲午战争中割取了中国的辽东半岛，但却在俄、德、法三国干涉下，被迫把到口的肥肉又吐了出来。考虑到这一“痛苦的教训”，日本利用英国全力对付南非布尔人无暇他顾的机会，让英国人去做俄、德、法国同意日本大举向中国增兵的工作，终于扫清了障碍。

于是，1900年6月15日，日本内阁做出大举向中国增兵的决议，紧急从各部队抽调3314人组成侵华临时派遣队，任命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福岛安正少将为司令官，率领日军6月23日到达大沽。

英国仍嫌日本派兵太少，紧急向日本政府提出要求说：“日本是能够向天津迅速增派援军的唯一国家，欧洲列强中，无反对日本迅速增援者。”于是，日本政府7月6日正式做出决议称：“从军事策略上说，日本应先派出二至三个师团救援天津，与各国军队合力，分路进迫北京，对清政府施以惩罚，以收反正之实。……从政治策略上来看。……目前各国援兵未到，天津、大沽之军方为敌军所苦，日本如能派大兵赴援，当可解该地之重围，进而平定北京之乱，则拨乱之功，盖归于日本，而各国京将永念日本之德。……要之，无论从军事策略上和政治策略上来看，日本急速出兵实为有利。因此，亟应尽先令业已动员之一师团立即出动。”于是，山口素臣少将率第五师团紧急到达大沽，日政府又派参谋本部次长寺内正毅中将来大沽，与各国侵华军统帅策划进攻天津、北京的步骤，然后回东京复命。

这样，不到一个月，日军就由51人增加到3828人，升为八国联军的第二位。接着，福岛安正就担任实际上的八国联军总指挥，指挥八国联军炮轰天津城。此役，八国联军共出动5055人，其中日军为2700人，占一半以上。

作为镇压义和团的主力军统帅，福岛安正指挥日军首先轰开天津南门进攻城内，与列强军队狼狈为奸，攻陷天津。福岛提议将天津分为四区，由日、英、法、美分别占领，成立天津都统衙门行使临时政府职权，青木宣纯和英、俄军官执政殖民大权，日军占领天津最富庶的东北区，进行了两年的殖民统治。

寺内正毅在天津召开八国联军指挥官会议，决定兵分两路向北京进发，首先兵指北仓。

日军8800人成为左路军的主力，大大超过俄军的3700人，约居进攻北京的八国联军18000人的一半。这时，侵华日军已达22000人，成为八国联军中的出兵最多的国家。

日军不仅人数多，更有武士道精神，总是冲杀在前，先后攻陷北仓、杨村、河西务、马头、张家湾、通州，又猛攻北京，占领朝阳门、东直门，接着占领安定门、德胜门、西南门，北京城的北半部成为日军占领区。其后，日军又在北京、天津、山海关附近参加对义和团等反帝人民的“讨伐”。

在八国联军中，日军不仅人数最多，打得最卖力，杀人、抢掠也最放肆，遭受的伤亡也最重：八国联军共被歼灭3411人，其中日军为1282人，占1/3以上；八国联军被打死757人，其中日军为349人。

日军的占领区最大，位于西城内、东城区的北部，南界东段以朝阳门为起点，沿朝内大街西向至皇城，南界中段为皇城北城根，南界西段以西直门为起点，沿西直门内大街东向至新街口转南，至毛家湾东至皇城，东、北、西界，皆至城根。

日本兵立刻在北京、天津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所不为，一个叫贝迪的意大利中士在日记中写道：“日本人任何时候都是亢奋的，我简直不相信他们是来自一个岛国，他们可以在一个小时内干五、六个女人，然后疯颠颠地去喝酒，还说，北京的女人比名古屋的差远了！俄国人就不这样。他们要情绪，比方有人喊：哈罗，纳科耶夫斯基音乐！他们就会立刻去找豪门要女人。然而，他们是杀死中国女人最强硬的杀手。……？”凶恶的日本侵略者不仅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体仁阁大学士户部右侍郎徐桐、怡亲王、户部尚书崇绮被逼自荆其女被兽兵轮奸或房屋被联军轰塌的王公大臣们，走上自杀道路的还有前礼部左侍郎景善，国子监祭酒熙元、王懿荣，工科给事中恩顺，掌江西道监察御史韩培森，江西道监察御史德谱，湖广道监察御史宋承痒，翰林院侍读崇寿、宗至宝半，庠吉士宗室寿富，吏部主事钟杰，户部外餐郎宗室恩单、戚善勛，主事陶见曾、李慕、铁山、英魁、崇寿，宗室谨善堂，主事才保，兵部郎中魁麟，员外郎赵宝书、重振，主事王铁栅，刑部郎中汪以庄，主事郭络征、王者馨、毛焕枢，工部主事恒昌、白庆、周增和、宗室海明，内务府员外郎端鑫、明昭，宗人府经历宗室纳钦，光禄寺署正王恩第，库使锡麟，内阁中书坤厚、清廉、玉彬、陈廷勋，国子监助教柏山，南城正指挥项同寿，东城兵马司吏目宫森，前吉林将军延藏，前奉天府尹福裕，二等待卫金成、钟祺，一起封典福谦，护军参领续林，副都统载龄，参将魁斌、王长荫，銮仪卫冠军使文禄，副尉塔芳阿，给事中恩顺、文博，侍卫继良、开泰、恩隄，道员继恩，笔贴式崇焕、保山，主事韩绍徽，銮仪使宗室奕功，护军凤来，宗室恩煦，銮仪卫鸣赞鞭官英瑞，翰林院编修支恒荣，副都统寿龄，奉恩将军宗室丸隆阿，骁骑校海昌，东陵礼部员外郎连升，副护军参领全通，护军扎隆阿，光禄寺署丞多文，戏骑校熙良，公中佐领达斌，笔贴式玉昆、文锡，佐领文瑞等等。

在这些自杀官吏中，熙元、王懿荣、恩顺、白庆、延藏、福裕、全成、富谦、续林、载龄、魁斌、文禄、塔芳阿、继良、开泰、恩隄、奕功、凤来、恩煦、支恒荣、寿龄、扎隆阿（奉军将领）、海昌、连升全通、扎隆阿（护军）、保山、玉昆、文端等均为全家或几口人同时殉难。全家同殉人数最多者，是三品衔世袭骑都尉候选员外郎陈銮一户，男女共计是31人。

名媛遭劫，候门绝户，真正是“枪声起处杂呼号，一要横尸血溅刀！”侵华日军司令福岛安正活像一头猿猴，又似一头大猩猩，他强迫酌妇王玉珍与他共浴，兽性发作将其奸污，又点燃一支香烟要插进王玉珍的阴户，王玉珍不从，福岛安正兽性大发，一刀砍得血溅床褥。

与福岛安正相比，秋山将军更阴险毒辣，他得一方如获珍宝。据《万历野获编》记载：“嘉靖中叶，上饵丹药有验。

至壬子（嘉靖三十一年）冬，命京师内外选女八岁至十四岁三百人入宫。乙卯（嘉靖三十四年）九月，又选十岁以下者一百六十人。盖从陶仲文（方士）言，供炼药用也。“素称”中国通”的日本秋山将军，早在青年时期，随父亲来过中国，对京城流传的《影庵记语》、《清圣祖实录》、《万历野获编》等无所不知。他在都统衙门委员会，亲眼目睹过袁世凯用手接过小红封套（套内装有官方黄海金支票）以后，把一只脚提起，冷静地把封套塞在自己的长靴里，然后继续进行仪式。就在这一天，他得到袁世凯的礼物“正史”《万历野获编》，如获至宝，而且对明世宗朱存熄贪图享乐，宠用方士段朝用粉制长生不老的丹药，提炼这种丹药需用大量少女的月红，非常感兴趣。

秋山将军住进乾清宫的第二天，便命人作了一种“香叶冠”的帽子戴在头上，同时还制作了五顶“沈水香冠”，叫太监张少和、程明等五人戴上作为陪衬，平时装扮成神仙，与方士、道士混在一起，“焚修斋醒”。

三日过后，秋山将军就命令卫兵抓来了52位年龄在40岁以下的宫中侍女。按方士、道士的配的药方，52位宫女一一服用。

李玉香，刚满十四岁，被抓了来。秋山将军命她服药时，她吓得两腿发抖，不从，联军兽兵便剥光她的衣服，用刀划破她的小乳房，鲜血直流。然后，与其他宫女一样，赤身裸体的两条腿和两只手被用马蹄掌劈开固定在木板上。在臀部下面木板割个圆圆小洞，好像是给大小便（月经）预备的，因为在洞的下面有只木桶，正对着圆洞。

“黄海秋花，当慈禧太后的侍女已有三年，这次慈禧逃难去西安，她染小疾，便强行留了下来。她固定在木板上六天了，已被秋山将军污辱过八次。她浑身瘦得骨头都突出来，连乳房都塌瘪得看不见；也许是瘦的，也可能是饿的，腹部的肚皮一直陷进去，好像能看见后脊梁骨。

黄海秋花身上也是被人咬得东一块疤西一块疮，三条肋骨明显地被兽兵一脚踹断了，断碴几乎从皮下刺出来。她自己的嘴唇都咬烂了。

秋山将军为了广觅仙方，炼成丹药，摧残宫女们的身心愈演愈烈，简直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宫女李金莲服药几天后，臀部下面木板割成的圆圆洞，鲜血直流，秋山看到洞下木桶盛的经血，哈哈大笑；若经血稍停，他便命令兽兵用手掏阴户。……1900年12月底，日本秋山仿效《万历野获编》中的炼丹术，按方士、道士的配方，利用宫女的大量经血，炼成了丹药。乐得他手舞足蹈，好像自己马上就要成仙一般。然而，他并没有用丹药，而是让太监张少和当场服用。

太监张太和面对血糊糊的带有腥味的丹药，呕吐不止，秋山命令两名士兵把他架起来，强行他服用，然后关进天牢里。

两三天后，太监张少和以“体虚火燥，被救无术”而归天了。

秋山将军对仙丹仍知迷不返，怀疑李金莲等宫女的经血有毒，遂会同联军司令部近卫队，将她们52名宫女绑赴市曹，剥光衣服，先把四肢上的肉一刀刀割下，再拉断咽喉，最后把身体一刀两断，将人头悬挂在木竿上示众。

A 淫暴行为岂止一个秋山将军。……八国联军首领一致要求闯入紫禁城，以显示他们的威风，并抢劫金银财宝。不同意进驻紫禁城的，只有日本山口素臣中将，他说：“还是不占紫禁城的好……我们都是负有使命而来的，

不是只为了逞一时之勇。占领一个小小的紫禁城易如反掌，可假使因为攻占紫禁城，把本来很听话的中国人彻底激怒了，那就。……“俄军中将阿列克谢耶夫和瓦德西也原则赞同暂缓进攻紫禁城。他们担心进一步激怒了中国民众和军队，同时也激化了列强与已逃离北京的清政府之间矛盾。这样会带来一个直接后果，那就是将会影响和谈，影响偿付赔款，甚至会导致中国被瓜分。

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最后以前一种意见勉强占优势，决定用盛大的阅兵游行来褻渎紫禁城，以此来庆贺联军成功地攻克北京，也表示对中国清王朝的莫大羞辱。

根据公使团和联军司令官联席会议的决定，八国联军于8月28日上午在大清门前举行了阅兵式。按照事先的协议，由800名俄国军队作为领队，后面的队伍是由800名日军、400名英军、400名美军、400名法军、250名德军、60名意大利军和60名奥军组成的。因为这一活动的“意义重大”，各国使书和司令官都参加了这一活动。俄国的利涅维奇中将军衔最高，因而由他代表司令官检阅了部队。

阅兵仪式完毕之后，各国侵略军按照列队的顺序开始到紫禁城游行，依次由大清门进入，经过各门和各大殿，过内左门，出神武门，一路鼓乐齐鸣，使尽了淫威。

联军进入紫禁城时，宫女们奉旨全部回避。但是，长久的寂寞生活，使宫女们对于外界的一切有一种本能的好奇，更何况储备国联军这样大的事。当时鼓乐声震天动地。宫女们虽然躲在木格窗后，都耐不住把耳朵贴在窗边听，或者用唾沫点湿窗纸，混混沌沌地看个究竟。

这可闯了大祸，引来日本和八国联军士兵冲进来抢宫中宝物，奸淫宫女，罕见的大劫难再度发生。……连城郊农村也不能幸免：穿东洋装的日本骑兵闯进北远山村时，一个侍女推门探望一下，哪知却被日军看到，他们就想抓住她。她拔腿就跑，日军穷追不舍，开枪打她，子弹从她头上嗖嗖地穿过，没有打中。她怎么能跑过日本兵呢？不一会儿，她被追上了。立即上来四个日本兵，对她进行轮奸。

北远山村遭到前所未有的浩劫，但北远山村的太监、宫女、侍女，就更惨。日本骑兵包围山村后，将40多名宫女及5个太监赶往一个熔岩大山洞，原先这个山洞是皇帝巡园的景点。当晚，日军500多人轮流强奸了她们。一名日军少佐示意太监脱下自己的衣服，又指着死人般裸身躺在地上的女人们，打着手势告诉他要“快活快活”给皇军看。

五个太监紧闭双眼，瑟瑟颤抖，10个日本兵一起扑上去，将太监按在地上，用刺刀一个一个割去了他们的生殖器。

山洞里堆着零散的弹药箱，里面还装着一触即发的炸弹。

这些毒品弹，本来是准备对抵抗清兵而实施的，现在可以说这些宫女已成了它的试验品。日本兵用毒品弹消灭这些中国皇宮女人，爆炸后，一队队戴防毒面具的化学兵进入山洞检查，测量各种数字，反复计算各序列数据，宫女们的尸体全都惨死在成箱的弹药下。

八国联军对皇宮禁城、三海、颐和园的抢劫，其详细数目是无法查实的。清廷档案虽有部分统计，但极不完整。

当时，日本人抢在各国之前直奔户部，先从户部银库“搬了2914856两银子送到日本使馆”，继在户部的段品库和颜料库抢走了无数的绫罗

锦缎，又洗劫了几务府的官三仓、恩丰仓和官房租库所存的32万石仓米和全部银两。

为户部银两之事，俄国同日本发生了争执。俄国人说户部是位于俄国分配的占领区之内，存银不能全归日本。起码应分给俄国一半。日本当然不干，强调日军搬运户部银两是在15日早晨，而划分占领区则是在15日下午3点30分以后的事，因此这些银两是日军用生命换来的战利品，与俄国毫无关系。

俄国人吃了闭门羹后极不甘心，这时他们又风闻户部还有大量的窖藏之金，“堆积如山”，“充栋盈屋”。法军还在户部尚书立山的家里抢劫了365串朝珠和约值300万两白银的古玩。日军则从前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宝殿的府第中抢走了藏在井中的30万两白银。……。

总之，经过这次洗劫，北京城内“各王公大臣官绅府第，所有银库之银，以及各项珍宝，无不被劫一空”，“其有遗留之处，又被后来之兵搜刮以去”。

联军对于商号、当铺、居民的抢劫更加残暴和贪婪。他们“俱以捕义和团、搜查军械为名，三五成群，身挎洋枪，手持利刃，在各街巷挨户踹门而入”，“翻箱倒柜，无处不搜”，衣物器皿好者皆掳，次者刀劈摔碰，任意作践。“稍有拦阻，即被杀害。”有的侵略者甚至抢来骡马和大车，到各街巷胡同“挨户装运”。

这种抢劫，“此来彼往，日无休息”，竟“有一日十数起进门者”。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亡国亡夫走在路上亦不安全。

“各街巷行人遇洋兵，则遍身搜索，凡银钱不拘多寡，全行掳掠。”这种事件是经常发生的。

八国联军的官兵在列强纵兵公开抢劫政策的导向下，自始至终都是这次抢劫北京的主犯。他们即不把抢劫“视为非法行动”，也因各国军纪松弛，根本控制不祝再加上各国的军官直接指挥和参与，从而愈加鼓励了那些近乎疯了了的士兵。

日本的《万朝报》曾对日本军官的劫掠丑闻作过详细的揭露，涉及的人员有司令官、师团长、旅团长、联队长、野战院院长等各级军官几十人之多。

A 第四次出兵：日俄东北之战日俄战争是日本和沙皇俄国为重新分割中国东北和朝鲜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战场主要在中国东北境内，中国人民无故惨遭屠杀和蹂躏。

日本和俄国在侵华问题上可算一对老世仇冤家，甲午战争中日本割去中国的辽东半岛后，俄国纠集德法两国强行干涉，逼平日本还辽，这就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俄国出兵东北占领了东三省，更引起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强烈不满，成为日俄战争的导火线。

为了对付俄国人，日本1902年1月与英国签订了英日同盟条约，日本人的腰杆硬了，开始与俄国进行交涉，企图通过占领东三省铁路沿线的形式，把日本势力打入俄国军队占领下的中国东北；而俄国人则把东三省当作自己的禁脔，绝不允许日本人插足期间。

于是，1904年2月5日，日本宣布中止日俄谈判，与俄国断绝外交关系。

2月8日，日舰在仁川港八尾岛灯台附近与俄国炮舰相遇，俄舰“朝鲜

人号”欲开往旅顺，被日舰拦截，向俄舰开炮攻击，俄舰也发炮还击，打响了日俄战争的第一炮。

日舰向俄舰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俄舰离开仁川港；俄舰见兵力悬殊，决定离港突围。日舰等候俄国舰艇驶至狭窄航道时，突然向俄舰发动进攻，双方展开激战，俄舰严重受损，两艘舰艇自爆沉海，日军获取了在朝鲜建立陆上作战基地的有利条件。

旅顺港是俄国海军在远东的最重要的基地，亦是辽东半岛的咽喉，日本对气势在必得。

就在仁川海战1个多小时以后，日本联合舰队下达了攻击旅顺港的作战命令。当夜23时许，日军第一驱逐舰队率先突击，4枚鱼雷一起射向停泊在旅顺港外的俄舰，俄“列特维赞”号战列舰登时中弹起火。俄军舰队被袭后也迅速组织猛烈还击，爆炸声、炮声震动了整个旅顺。当日旅顺夜战，日军共发射16枚鱼雷，击伤俄军军舰3艘。

2月9日，俄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对日宣战敕令。10日，日本天皇下诏对俄宣战，日俄战争正式爆发。

旅顺港初战之后，俄军在旅顺港附近水域设置大量水雷以御强敌。同时，俄海军名将马卡洛夫被沙皇任命为太平洋分舰队司令。马卡洛夫对旅顺海军进行重新整编，采取以驱逐舰为主力的积极进攻战术，在老铁山以南海域重创日军3艘驱逐舰，鼓舞了俄军士气。

日军首次夜袭未能重创俄军舰队，强攻旅顺又被岸炮所阻，主帅东乡平八郎求胜心切，决定对旅顺港实施闭塞战（即将船沉在旅顺港出入口，封锁住俄国舰队）。东乡在舰队官兵中召募敢死队员，组成闭塞船队，先后三次在驱逐舰队掩护下突击旅顺港，但遭受过突袭的俄国旅顺港守军警戒甚严，日军舰队尚未接近便被发现，猛烈还击，俄军设立多道防线，战列舰、驱逐舰紧密配合，以沿岸猛烈炮火为掩护，舰炮岸炮齐射，重创来犯日舰，击沉日军鱼雷艇、驱逐舰多艘，日军伤亡甚重。

日军见闭塞战失败，遂又采取水雷封锁手段，在港外水域设置机械水雷。俄军司令马卡洛夫率主力出港与日军决战，被诱入雷区，座舰触雷爆炸，全舰官兵全部丧生。马卡洛夫阵亡后，海上作战主动权再度落入日军手中。

尽管日本舰队并未歼灭俄国分舰队，但其海战多次胜利使俄军不敢出港，日军基本夺取了黄海海制海权。与此同时，日军第一集团军（司令官黑木为桢上将）从仁川登陆，击溃驻朝俄军，挺进鸭绿江，攻破俄军鸭绿江防线，进入中国东北。

日军主力在凤凰城集结，保障了日军在辽东半岛东海岸登陆的侧翼安全。因此，日军实施辽东半岛登陆作战时机成熟了。

5月初，日军从俄军防守薄弱的猴儿石、大孤山登陆，俄军抵御不住弃阵而走。日军顺利地占领了大连港附近要塞。日军大本营下令改变由海军攻占旅顺的原定计划，以海军配合，从陆路攻占旅顺，歼灭了港内的俄舰队，从而保障了黄海海交通线的畅通无阻。

从5月中旬起，根据日本大本营提出的“海军从正面封锁、陆军从要塞背面实施攻击”的作战方针，日军第二集团军（司令官奥保巩）以强大兵力攻克旅顺外围要塞南山、瓦房店及大连；第三集团军（司令官木希典上将）夺取了旅顺要塞俄军的几座前沿制高点山顶阵地，攻克了旅顺的外围防御画廊；同时，被困港内的俄国分舰队强行突围失败，几乎全军覆没，俄军海上

退路也被堵死，旅顺已成孤城。

旅顺从俄国强租为军港后，大力加强工事防御，声称旅顺要塞可谓固若金汤，俄国虽失去旅顺周边要塞，仍可与日一战。日军第三集团军从8月18日起，连续发动四次总攻，参战兵力累计达13万人，俄国顽强抵抗，使日军伤亡惨重，死亡1.54万，伤4.4万余人，历时222天，经过数次失败挫折，终于在1905年1月初日军攻抵旅顺市区，1月2日俄军签署投降书。日本取得了辽东半岛的咽喉，为辽阳会战奠定了后方基础。日军1904年5月在辽东半岛登陆后，俄军奉行既定方针，避免在主力到达远东前与日军决战；而日军深知自己的人力、物力均不如俄军，不可能像俄军那样准备打持久战，必须速战速决。根据日本大本营的战略布署，除第三集团军攻打旅顺外，第一、二、四集团军全线向辽阳方向推进。8月初，3个集团军在海城附近会师，形成了包围辽阳之势。8月下旬，3个集团军从三个方面发动进攻，由于俄军顽强抵抗，日军陷于苦战。8月30日，日军发动总攻，突击队顶着俄军的密集炮火强攻，双方在阵前展开殊死搏斗，俄军损失惨重，被迫撤回辽阳核心阵地。日军乘胜追击，攻克辽阳外翼，但自身也伤亡惨重，后备兵力不继，弹药供应不足。正当日军无力对抗俄军预备队反扑而准备暂时回撤之时，俄军上层军官却高估了日军的作战能力，下命令放弃辽阳，向奉天撤退。

辽阳战役对日俄战争的整个战局有决定性意义。俄军屡败，对解救旅顺要塞彻底绝望，对继续与日军作战失去信心，俄国国内呼吁“对日和谈”的舆论日盛。

随着俄军在日俄战争节节失利，俄国国内矛盾空前激化起来，国内舆论纷纷指责沙皇“轻启战端”，军队意志消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呼声日高，布尔什维克党开始形成。为转移国内视线，振奋士气，尼古拉二世电令俄军统帅库罗巴特金展开反攻，扭转不利战局。俄军为此先后组织了沙河、黑沟台两次决战。此时，日本由于兵力不足，正处于休整阶段，俄军两次反攻均使日军陷入不利局面。俄军在此次战役开始掌握了完全主动权，向日军步步进逼，将其击退、包围，以求合围歼敌。日军伤亡惨重，但由于俄军领导层不和，勾心斗角，贻误战机，而日军内部却能同舟共济，奋勇作战，逐渐扭转了局面。俄军在占优势的情况之下，功败垂成，未能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失去了战场的主动权。

1905年1月9日，俄国国内爆发了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俄国民众丧失了对沙皇政府的信心，俄军士气一蹶不振。

此时，日本国内形势也很严峻，战争能力已近极限，出现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双方都希望通过一次大战，消灭对方兵力，结束战争。

1905年3月，日、俄在奉天附近展开决战。俄军战线拉得过长，被日军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俄军无心恋战，全线收缩；日军乘胜追击，但因兵力不足，无力阻止俄军撤退。

3月10日，日军占领奉天，奉天决战结束。这次决战是双方陆上最大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决战，但这并不是决定性的战役，双方均未受到致命打击，亦没有媾和的强烈愿望。真正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是日俄大海战。

1904年6月，俄国抽调船只组成太平洋第二舰队，由波罗的海绕道非洲，支援旅顺，但这支舰队设备较陈旧，官兵素质较差，燃料供应困难，迟迟无法起航，直至1904年10月才开始航程。1905年1月得到旅

顺失守消息，俄国将士士气遭受沉重打击。这时，日本联合舰队开始整顿兵力，准备迎敌。5月底，俄太平洋第二分舰队进入日本九州与对马岛之间的对马海峡，与日军遭遇。俄军舰比日军庞大得多，但一来是疲惫之师，二来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缺乏日本舰队丰富的作战经验，三来指挥不当，使之从一开始就陷于被动。日军志在全歼俄国舰队，就集中兵力向俄主力舰猛烈开火，同时期使俄舰偏离主航道，以便合围。又值第一天下午海上雾气突然变大，日舰在能见度较低的情况下，冒险分散寻找对方主力舰并予以重击，俄军伤亡惨重。天黑以后，日军采用鱼雷战术攻击，使本已无力攻击的俄舰队频频受创。第二日凌晨，俄舰队已失去战斗能力。剩余舰只官兵虽奋战不屈，但已无力回天。

这次海战历时两日，俄军12艘主力舰中，8艘沉没，4艘被俘；4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被击沉，阵亡5045名，司令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中将以下5917名官兵被俘。而日本仅损失了几艘驱逐舰和鱼雷艇，只伤亡600多名。这次海战使俄国损失20多万吨舰船，同时也失去了挽回战争败局的信心和本钱，决心接受罗斯福总统的斡旋，与日本进行和谈。

此时，日本担心俄国以谈判为掩护继续向远东增兵。为彻底破灭俄国的幻想，迫其乖乖谈判，日本又采取一系列军事行动。先于6月-7月攻占库页岛，而后登陆堪察加半岛，只是由于日俄谈判开始，日军大本营担心战斗旷日持久出现不利事态，才下令放弃攻占堪察加半岛的计划，日俄战争亦告终结。

1905年6月日俄接受美国斡旋，进行谈判。双方经过一番勾心斗角讨价还价，于9月5日签署了《日俄和平条约》，即《朴茨茅斯和约》。俄国承认朝鲜是日本的独占势力范围，并将包括旅顺大连在内的辽东半岛租让权及南满铁路租让权交给日本等。

《朴茨茅斯和约》是帝国主义重新划分殖民势力范围的条约，俄国以朝鲜和中国东北作交易，换取免除战争赔款的要求。日本从中夺取了中国的许多权益及广大领土。这场日俄战争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日俄战争的主战场是我国东三省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日俄双方对当地人民恣意凌辱，对中国主权粗暴践踏。俄国四处掠夺中国财产，解除中国军队武装，强征民夫、劳工，占用民房耕地，杀人放火，毁田抢掠。日本最初打着“解救”东北人民的旗号笼络民心，后来狼子野心逐渐暴露，大肆掠夺东北资源，征收苛税，非法拘捕杀害东北官员，动辄以“间谍”罪名屠杀中国百姓，一个红十字会的外国人曾亲眼目睹日军借口“间谍嫌疑”，一次竟活埋中国百姓近40人。日军除直接烧杀抢掠外，还收买、扶植地主土匪、军阀，如冯麟阁、金寿山等匪首及军阀张作霖等人，并且在日本占领区强制推行日语，强制居民悬挂日旗，将中国人当作“劣等人”，极尽侮辱之能事。这场战争使无数中国人流离失所。东鸡冠山北有个上千户的吴家屯，几经双方炮火轰击，仅存5间房，遂改名五间房村，如此之例，不胜枚举。两个帝国主义强盗甚至公然把枪口直接对准中国百姓射击。日俄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东北人民的强烈反抗，反抗武装此起彼伏，打得敌人一筹莫展。

A 第五次出兵：侵占山东 1914年7月底8月初，欧洲爆发了重新瓜分世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当时，日本正处于内外交困之中：国内经济危机，政局不稳，不到一年半竟三次更换内阁，简直像走马灯；国外同英国在中国长江流域的竞争中

屡遭败绩，因此日本元老井上馨惊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是“大正时代的天佑”，日本朝野都急不可待地参加这次世界大战。

但是，狡猾的日本帝国主义并不想派兵去欧洲与欧美帝国主义争锋，而企图趁火打劫出兵侵占山东。

自甲午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肆意侵华，在中国北方，已占据旅大租借地，掌握了东北南部；在中国南方，已指定福建省为日本的势力范围，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正好可以从山东下手，实施中国突破战术，造成日本侵华的极有利形势，为日本帝国主义霸占中国打下基矗为掩盖日本侵略中国的真正目的，做到师出有名，日本私下请英国以英日同盟的名义邀请日本对德国宣战。英国害怕日本倒向德国一边，8月7日请求日本出动联合舰队协助英国消灭德国舰队。

日本害怕英国反悔，抓紧时间办完了参战的国内手续，但接着在英日谈判参战条件中，双方意见对立，日本坚持只“消灭德国在远东的一切力量”，不参加欧洲战争，英国对此不满，撤销了对日参战邀请。

日本当局见大事不好，急忙抢先在8月15日向德国提出最后通牒，提出两条要求：（一）德国军舰立即从日本海和中国海撤退或解除武装；（二）9月15日之前将胶州租借地全部无条件交给日本，以备将来归还日本。限德国8月23日正午前答复。

德国对此置之不理，日本便于8月23日对德宣战，派第二舰队从日本佐世堡出发，27日封锁了胶州湾。中国对此提出交涉时，日本驻华公使青木蛮横地说：“此事与中国无关，中国只能服从通牒内容，如果中国发生任何内乱，日英将加以镇压，中国当被作敌国一般对待。”袁世凯政府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淫威之下，8月6日宣布中国“局外独立”，将潍县以东、海庙口、掖县、平度、古岬以西划为中立外区域，又称行军区或交战区，但日方竟于9月2日在中立区的龙口登陆，还事先警告中国不许抗议，连提单纯形式上的抗议都不许。

在此情况下，北京政府只好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壓力宣布：参照1904年日俄战争的先例，凡在日德行军区域中之事，中国政府不负完全中立之责。日德帝国主义都不理会中国政府的声明，彻底破坏了中国的中立立常日本帝国主义名为对德宣战，却将矛头首先指向中国，背信起义占领潍县车站，胁其中国政府协助日军占领胶济铁路全线。不理中国提出的交涉，日军又抢占济南车站，从而强占了胶济铁路全线。

日军完全占领胶济线后，联合英军攻占青岛，在山东的中国大平国土上实行军管，实行殖民统治。到1918年，日本向山东移民3万人，办工厂25家，掠夺中国资金达5000万日元。

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山东大平国土极为不满，掀起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浪潮，开展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北京政府迫于国内舆论，1915年1月7日照会日本驻华公使，宣布取消战区，要求恢复原状。

日本政府不肯把从德国手中抢走的山东权益交还中国，反而指责中国政府“独断处理”，宣称日本不受中国照会的约束，不仅如此，日本政府指示其驻华公使日置益，会见中国总统袁世凯，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要把中国变为日本的殖民地。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了《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关于山东之条约》。

袁世凯的卖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激其中国人民大规模反日爱

国运动。

A 第六次出兵：干涉十月革命 1917 年 10 月，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获得了成功。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刚刚诞生就面临严峻的考验：德军入侵、美英等联军的武装干涉和在美英帝国主义支援之下的地主资本家的武装叛乱。日本军国主义对俄国远东地区和当时尚在苏俄控制之下的我国东北北部早就怀有野心。于是乘苏联忙于应付欧洲战事而无暇东顾之机，以援救捷克军队为借口，打着美英法日等联合出兵干涉的旗号，发动了策划已久的侵略战争。其目的是独占苏远东地区，制造日本的傀儡政权，以使把苏远东地区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之内。

日本为进行这场侵略战争，动员了日本现役军队和预备役军人，特意组织了所谓海参崴派遣军司令部，并于 1918 年 8 月 2 日发表出兵宣言，揭开了侵略战争的序幕。

1918 年 8 月，日军第十二师先头部队（步兵一个旅，骑兵、炮兵各一个团，工兵一个营）从海上于 8 月 11 日在海参崴登陆。派遣军司令部于同月 18 日登陆。从而在海参崴建立了入侵西伯利亚的桥头堡和指挥入侵部队的大本营。

战斗开始时，日军动员了第十二师、第七师、第三师（第七师原为驻满洲部队，第三师九月初出发至满洲）的兵力，分兵两路向苏远东地区发起进攻。一路从海参崴为基地，沿乌苏里铁路线向北，直逼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另一路以满洲里为基地，沿中东铁路线直指赤塔。

当时苏联的情况是：在日本出兵前后只有 30 万正规部队，而且都在欧洲方向作战。在远东只有非正规军 2.5 万左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出兵时，西伯利亚铁路除乌苏里和阿穆尔两段外，均在反苏维埃势力控制之下，所以苏维埃在日军侵入开始乃至中期，是无力、也不能对远东进行支援的。

日军以海参崴为军事基地，其原因之一就是海参崴与西伯利亚铁路相通，日军沿重要交通线作战，进攻速度快。9 月 5 日日军先头部队夺得苏军用列车一辆（该军列由伯力开出，车上装满炸药，原为破坏铁路桥梁用的）后即搭乘该军列闯入伯力。当时苏在伯力有守备部队总计一万人，但指挥不统一，配合不力，加之警惕性不高，给日军以可乘之机，致使日军轻易地占领伯力，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作战物资。其中有火炮 50 余门，步枪、手枪 900 余支，机枪 20 余挺，客货车 270 余节，各种炮弹子弹 5 万余发，作战舰只 30 余艘，军用地图几万张。日军就是用这些枪支弹药补充了部队，用缴获的火车、战舰从铁路、水路向海兰泡发动了新的攻势。

另一路日军第七师 9 月 8 日占领赤塔。继之，日军从东、西、南三个方面进攻海兰泡。

9 月 19 日日军占领了海兰泡和斯沃博德内。9 月 22 日日军几路在斯科沃罗金诺附近会合。

至此，贝加尔湖以东的西伯利亚铁路线全部被日军控制。

出兵不到两个月，日军便占领了当时的滨海州、阿穆尔州、后贝加尔州（现在的赤塔州和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和萨哈林州（现在的哈巴罗夫斯克边区的大部和库页岛），控制了贝加尔湖以东的整个西伯利亚铁路和黑龙江、乌苏里江的水上航道，达到了预期的作战目的，以后便转入守备阶段。

日军由第十二师驻守滨海州、阿穆尔州和庙街（尼古拉耶夫斯克），第

三师驻守博尔齐亚以东的后贝加尔州，第七师驻守博尔齐亚以西的后贝加尔州和北满洲（现在的中国黑龙江省）。这时，日军认为战事基本结束，所以向日本内地运回大部分山炮、重炮，解除预备役和后备役的召集，减少兵员，把部队改为准平时编制。

日本在东西伯利亚扶植谢苗诺夫组织傀儡政权，企图完全控制此地区。但是，进入冬季以来，苏军采用游击战，主要从事发动组织群众、壮大游击队的工作，并利用日军在冬季行动困难的有利条件，借助冬寒广泛开展游击活动，到处破坏铁路，切断电话线，给日军很大威胁。

为此，日军在守备阶段内，先后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讨伐清剿活动。

（1）阿穆尔州方面的清剿（1919年2至3月）第十二师在第二师的配合下，集中兵力在海兰泡以北地区对苏游击队进行了清剿，大小战斗几十次，营一级规模的战斗四至五次。在清剿中，田中营310人2月25、26日被2000余名游击队包围全歼。

（2）滨海州方面的清剿（1919年7至8月）阿穆尔州的苏游击队活动并未因日军的清剿而减弱，滨海州的苏游击队以乌苏里斯克附近地区为根据地，活动日益频繁。日军痛感兵力不足，于是又从本土增调第十四师（3月底）和第十六师（5月）和第五师（6月底）至苏远东地区。

从1919年7月开始，日军以第十四师、第十六师一个团、第五师一个旅的兵力，对乌苏里斯克、苏城附近和乌苏里铁路沿线的游击队开始了讨伐，直至8月底。

（3）后贝加尔州方面的清剿（1919年10月）苏游击队在额尔古纳河与石勒喀三角地域力量发展迅速，击败了白俄匪军谢苗诺夫部队（1500百余人）的进攻，占领阿穆尔铁路的莫戈恰至齐洛夫斯科耶一段铁路，并包围了日军莫戈恰守备队，对日军造成了严重威胁。

1919年第五师于8月开抵后贝加尔接替第三师。10月，日军第五师和第三师之一部（一个半营）对苏游击队进行了讨伐。

日军的疯狂清剿不仅未能使苏联人民屈服，反而激起了人民更加强烈的反抗。苏军游击队利用冬寒展开游击活动，沉重打击了日军。全歼日军田中营就是苏游击队的胜利之一。

1919年2月，斯沃博德内一带气温一般为摄氏零下40余度，2月25日下降到零下53度。当时又逢多年不见的大雪，积雪厚达半米多，雪中徒步行军一个小时只能走半里路。

田中营当时兵力为310人，炮2门，奉命清剿游击队，结果被游击队分三口全部吃掉。游击队主要是利用了严寒积雪这一有利条件。首先，田中营搜索队因情况不明，撤退缓慢，被游击队从三面包围，几乎全军覆没。接着，田中营主力增援途中遭到伏击，所乘坐的雪橇全系苏联人的。在战斗打响以后赶雪橇的苏联人全部趁机赶雪橇逃跑了。结果田中营主力150余人失去机动能力，成为雪中射击周的靶子。接着苏联游击队又消灭了田中营后卫队和炮兵。

苏联军队的顽强反抗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美梦。苏联游击队在战斗中力量日益壮大，整个苏维埃国家在1919年底也开始好转，开始有可能援助远东地区。而干涉“盟军”内部的矛盾也日益激化，英美支持高尔察克成立独裁军事政权，与日本支持的谢苗诺夫发生矛盾。日本一方面转而承认高尔察克，另一方面又不愿抛下谢苗诺夫。日、英、美间发生了冲突。10月

间，苏联红军开始进攻盘踞在新西伯利亚一带，由英美支持的高尔察克军事独裁政权，把高尔察克赶至伊尔库茨克，并于1919年底消灭了这股匪军。在此期间，国际形势也越来越不利于日本。1920年初，美国干涉军开始从西伯利亚撤兵。

日军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不得不收缩兵力，缩小防区。1920年2月，被游击队打得体无完肤的日军第十四师放弃阿穆尔州。同年决定将外贝加尔及黑龙江方面的军队向中东铁路沿线、滨海州和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集结。

在俄共远东局的领导下，1920年2月至3月间，伊尔库茨克、乌苏里斯克、海兰泡、伯力、海参崴相继成立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地方政权。

4月6日，苏远东共和国在后贝加尔州宣布成立。这个共和国是列宁为首的苏共中央为避免与日本直接交涉而采取的暂时的权宜之计。

此时，远东共和国拥有军队一万人，炮13门，飞机30架。

1920年4月至5月，日苏军队作战19次，日军出动部队多则2000人，少则七、八百人不等，主要作战地区为赤塔周围。在这次作战中，由于苏军出动飞机，掌握了制空权，使日军处于不利地位。

日军在军事形势下的恶化，迫使日军和远东共和国开始谈判，并不得于7月份由后贝加尔州撤退。

1920年3月，日军为保住最后的侵略基地，制造借口解除了海参崴政府军队和滨海州各地的苏军武装。同时从日本内地调来生力军第十一师、第九师和第八师，并借口所谓庙街事件派兵占领了库页岛。

苏联以远东共和国的形式在远东发展壮大苏维埃力量，利用各种形式打击日本侵略军。

1922年2月占领水路陆路交通重镇伯力，接着向海参崴逐渐逼近，迫使日军又不得于1922年8月开始从滨海州撤兵，至10月25日，日军撤离海参崴从海上回国。至此，日军撤离苏远东大陆，结束了对苏联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一切侵略者都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日本军国主义更不例外。早在1920年初，由于苏远东军事力量逐渐增强，日军被迫放弃阿穆尔州，向后贝加尔和滨海州收缩兵力时，就认为苏联萨哈林州力量薄弱，便借口庙街事件，派兵占领了萨哈林州及库页岛。

1918年9月上旬，日第十二师派兵占领了庙街（即尼古拉耶夫斯克），控制了黑龙江入海口。1920年1月，日庙街守军共有300余人，加上海军通信队和日在乡军人共400人。苏当地游击队有2000至3000人。2月上旬，游击队攻入庙街，一度和日军达成妥协。3月间，日军对苏游击队发动进攻被苏游击队所粉碎。五月间，日军获悉增援部队将至，于是杀死全部俘虏和协助游击队作战的日侨，烧毁该市，从当地撤离。

日军以此为借口，2月分编成步兵约一个营的庙街派遣队，5月分编成步兵4个营的北部滨海州派遣队，7月分编成萨哈林军，相继占领了库页岛和庙街。

1922年9月，日军撤出滨海州和库页岛对岸全部地区，但直至1925年2月日苏恢复外交关系后，日军才于5月正式撤出库页岛。至此，日本军国主义对苏十月革命的武装干涉以彻底失败告终。

日本军国主义自1918年8月向苏俄出兵，至1925年5月撤出

库页岛，历时长达近7年之久；累计出动兵力达11师之多（日本当时共21师），在西伯利亚兵力最多时达7.3万人；广设特务机构，扶植谢苗诺夫傀儡势力，妄图独霸远东，最终招致兵败撤退的下常日本军国主义在苏远东地区掠夺了大量资源，多次进行清剿，残害当地居民，给远东当地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巨大损失。日军的侵略暴行从一开始就受到苏联人民的坚决抵抗。

他们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破坏道路、桥梁，打击日本侵略者。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在入侵西伯利亚期间，死亡共1.2万余人，耗费军费达9亿日元以上，而最终却是，彻底失败。

历史再次证明，侵略者决不会有好下场！

A 第其次出兵：发动“九·一八事变” 1929年10月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1930年3月袭击到日本，1931年达到高峰，工业总产值比前一年下降1/3，外贸减少一半，企业纷纷倒闭，黄海金滚滚外流。

经济危机引起政治危机，日本国内阶级矛盾迅速激化，社会严重动荡不安，殖民地朝鲜和中国台湾都出现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群众运动：朝鲜革命者开始进行抗日武装斗争，台中都雾社高山族1500名居民举行抗暴起义，一度占领全区。

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使日本帝国主义陷入空前的困境，便企图从发动侵华战争中寻找出路，他们看到蒋介石调动几十万大军“围剿”中国工农红军，就利用这个机会，调动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

1931年7月3日，蒋介石作为第三次“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司令，正在南昌行营指挥30万大军，按照日、德、英等国军事顾问的筹划，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分击”战术，疯狂地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攻。毛泽东、朱德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乘退追歼”的作战方针，巧妙地与敌周旋，蒋介石大发雷霆，训斥军政部长何应钦道：“饭桶！国军不曾捕捉到共军，反被共军咬了几口，娘希匹！”这时，中统特务头子陈果夫进来报告：“蒋主席，长春发生了万宝山事件！”“怎么回事！”“日本人在长春东北的万宝山非法筑渠，与农民发生争端，农民死二、三人，负伤数十人，被拘捕受刑者十多人，日本人一方面向万宝山增派军警，一方面做‘中国人袭击朝鲜人’的反宣传。”蒋介石不耐烦地吩咐：“通知张学良，不得扩大事态，影响我剿共的决心！”蒋介石在7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日人如此蛮横，吾国已不成国矣！吾之责任更大。……”日本人不了解蒋介石此时的心情，不断煽动朝鲜人掀起反华暴乱，鼓动朝鲜人冲入仁川、汉城、元山、平壤等城市的华侨商店街，烧杀抢掠，导致在朝鲜的华侨死亡146人，失踪91人，受伤542。

蒋介石又得到报告，日本自长春向万宝山增派军警700余人，将中国农民驱赶到数里之外，继续开渠，他即命外交部向日本驻华代理公使重光葵提出抗议，指出万宝山处于1909年《中日图们江界约》确定的特区之外，朝鲜人在这里没有居住权，日本领事馆派军警进驻此地，无法理解，要求制止朝鲜人的暴行，中国保留要求赔偿权，要求日本保证不再发生同类事件。

1931年7月8日，日本驻南京总领事上村伸一来到南京政府外交部，花言巧语转达日本政府的口头答复说：“中国政府的抗议书已转达本国政府，关于要求惩凶、赔偿、保护安全各项，俟本国政府训令到后始能答复，但可肯定，日本内阁会议已经决定严惩犯有暴行的朝鲜人。”蒋介石在南昌

行营看了宋美龄递上的这个报告，当却做出指示：“一面严与交涉而制止之，一面当派人密查真相，使我人民之冤得白！”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与陆相杉山元密谋诡计，在军方支持下，指示驻华代理公使重光葵称：“最近东北发生的侵犯帝国权益的事件，日方终究不能保持沉默。如果中方坚持不妥协态度，日本政府将不得不重新考虑改变中方所切望的法权问题的立场。……倘若类似不幸事件仍继续发生，日本政府将采取正当的随机措施，结果将产生极为严重的局面。你要警告中方，必须慎重处理这次万宝山事件，否则后果严重！”重光葵会见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公然发出战争威胁，王正廷受蒋介石之命，义正辞严驳斥说：“朝鲜农民在万宝山承租土地，开通渠道，违犯了中日之间的有关约定，不能予以承认，日本军警公然在中国内地行使权力，开枪打伤打死中国农民，更是违犯国际公法及中日条约的行为，中国方面不能不表示遗憾，并向日方提出抗议！”重光葵扭转粗壮低矮身躯，横眉怒目向中方施加压力说：“对不起，请考虑你们要求谈判的商租权问题！”王正廷严正驳斥道：“至于商租权的使用范围，因为中国方面早已宣告废平日本强加给袁世凯的二十一条，所以不能视为根据。”“那不行！日本在华军警有保护日本侨民，包括朝鲜侨民安全的权利。中国废除商租权没有得到日本同意，不能视为有效！况且万宝山的朝鲜农民同中国人订有契约，不属商租权的范围！”王正廷不想为此多作纠缠，又奉蒋介石之命提出请日本保护在朝鲜的华侨生命和财产安全问题，重光葵连声冷笑说：“对朝鲜事件，日本已表示并不负法律责任，仅对暴乱的发生表示遗憾，为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向死者家属提供抚恤金！”王正廷见日本只想掏几个臭钱了事，便气愤地提出正当要求说：“日本在朝鲜的军政当局对制止暴行，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日本不能推卸应负的责任。目前在朝鲜的华侨生命难保，衣食无着，所经营的事业又无恢复之望，因此，日本应赔偿他们的全部损失！”重光葵大声叫嚷：“日本不能向中国赔偿损失，中国倒应该取缔抵制日货和排日活动！”王正廷向蒋介石汇报了谈判情况，蒋介石害怕得罪日本，立即声色俱厉下令：“通令全国，不得加害日本侨民，不准再搞排日活动！”日本见中国各地民众纷纷集会抗议，才同意撤退日本警察，却坚持非法入境的朝鲜人有权在万宝山地区开垦修渠，使中日谈判陷入僵局。

更使蒋介石头痛的是8月24日，他围剿红军的三个主力师（第四十七师、五十四师、八师）三战皆败，大部被歼！

蒋介石正在气恼之时，中统特务头子陈果夫又来报告：“蒋主席，东北又发生中村震太郎被杀事件！”“什么？万宝山事件未了，又出了中村事件？中村是什么人？”“参谋本部情报部间谍！”“这是怎么回事？”陈果夫打开公文包，取出一份文件说：“这是张学良的东北外交研究委员会的调查结果。”蒋介石接过仔细审阅：6月26日到达苏鄂公府的中村一行，欲由屯垦队第三团操场附近通过。第三团连长王秉义查阅护照，因无中国通行证，又言语支离，乃引至团部，讯系游历遇匪，追逃至此。为恐该日人等再受匪害，乃留住团部，候请示长官，意在保护出境。

因团内饭食粗劣，及请该日人等到街市饭馆食饭4次，且有长官陪食，直至27日下午，全以外宾招待。

迨傍晚，代理团长关玉衡（团长赵冠伍出差沈阳）查防归来，始疑该日人等为奸细，乃下令检查起身体，竟从内裤内搜出日、俄文军事地图两张，日记两本，笔记3张，现洋票119元，金票2元。一经阅平日记，多系记

载调查将来军事上应用各项，知为侦探无疑，即向屯垦公署请示办法，传令略加看守，而仍饬优待。

迨夜深人静时，守兵因困倦睡去，该日人等竟乘隙由团部后门脱逃。不久，守兵察觉，一起出追。

逾时，即闻北山方向有枪声一团，后乃寂然，追兵亦未归营。该连事务长郭德昌率兵前往搜索，在月光下发现日人尸身，始知追兵因击毙外人，畏罪潜逃。

代理团长关玉衡恐惹起国际交涉，乃命将尸体连同马匹及携带物品除地图、日记、笔记录外，一律焚毁，以灭形迹。对内外严守秘密，亦未报告上官。

蒋介石看罢，当即指示外交部长王正廷：“对日本的无端指责不能接受，予以否认！”不一会儿，陈果夫送来日本关东军关于对中村间谍事件态度的情报，他们反对通过外交交涉途径解决。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8月12日致函陆军省军事课长永田铁山称：“由外交当局严重抗议，以谋迅速解决的办法，只不过是一个幻想；凡有理智的国民，意见正逐渐趋于一致--除去军部实力解决之外，别无途径！”这时，宋美龄从里间屋飘然而出，神情严肃地说：“根据美英朋友提供的消息，日本关东军已在东北完成临战准备！”蒋介石若有所思：“我估计，日本人的用意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宋美龄猛地抽口香烟：“美英朋友说，日本人要在东北制造新的事端了！”蒋介石脱口而出道出心中埋藏很深的机密话：“动武不见得是坏事！”“难道是好事儿？”宋美龄惊得舌头吐出老长。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早在神户有马温泉你我男女同浴之时，我就如同盼着早日和你结婚一样，盼着日本早日对我动武！”此话大出宋美龄预料之外，惊诧地询问丈夫：“中日开战是你预料中之事！”蒋介石像手执教鞭的大学教授一样，给他的学生上启蒙课：“如你所知，日本东方会议确定的侵略纲领是：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我前年公布《田中奏折》，不是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吗？”“日本矢口否认有《田中奏折》存在！”“他们干的，和《田中奏折》完全吻合！我蒋某人认为，日本征服世界是吹牛，根本无此可能；征服中国是野心，而征服中国的第一步征服满蒙，则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宋美龄若有所思道：“怪不得美国朋友说，只要日本把矛头对准苏俄，把东北三省全送给日本也未尝不可！”蒋介石诡诈地道出肺腑之言：“共产党是我的心腹大患，日本人动武对我蒋某人来说，反而大大的好处！”宋美龄百思不得其解：“日本人侵略中国，对你反倒有好处？异想天开！”蒋介石笑着说服宋美龄：“夫人请细想，日本人一在东北动武，张学良无力对抗，就必然向蒋某人告拢，听从本主席的指挥！”“副司令听总司令的，顺理成章！”“我强调先对付心腹大患共产党，就是先安内；再对付日本人，则为攘外。把二者连起来就是我们安邦定国的大计：攘外必先安内！”宋美龄恍然大悟道：“这不是要把不抵抗将军的帽子扣到张学良的头上？岂不是有点儿太不仗义了吗？”蒋介石奸笑说：“古语说得好，无毒不丈夫！不这样，能收拾得了东北军？”这时，警卫团长王世和手持电文地来请示道：“报告，南京发来急电，外交部长王正廷紧急请示对日外交精神！”蒋介石匆匆阅毕，递给宋美龄，唤进秘书长杨永泰问道：“你前几天拟定了对日本进攻东北的上中下三策，很有道理，再说说看！”杨永泰受宠若惊，掏出文件说：“我替总司令代拟的三大方案是：如果日本进攻东北，

我方还击是下策！”蒋介石脱口而出道：“我早就说过，关东军是‘皇军之花’，战斗力无与伦比，美国兵不是对手，东北军就更甭提了！”

同关东军打交道，要退避三舍，一旦动武闹出事来，事情就麻烦了！且记！且记！--中策呢？”“我方且战且退为中策！”“因为我们无意同日本开火，他要打，打好了，是非自有公论！--上策呢？”“全面不抵抗为上策，因为反正打不过，何必费力不讨好，白白蒙受损失？干脆一百个不理，兵不血刃，不伤中日两国和平。……”蒋介石见杨永泰这样善于理解他的意图，连连夸奖道：“杨秘书长说得不错，我们按上策办！”蒋介石稍加思索，对杨永泰说：“你通知外交部，可按此精神办理：我全国同胞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才联合进攻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此次如无粤中叛变（指汪精卫、陈济堂、李宗仁等人建立的广东国民政府），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惟攘外应先安内，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则不能攘外！”杨永泰记录完毕，恭恭敬敬请示道：“总司令，你还应将此精神，对张学良再做专门指示，他年少气盛，又首当其冲……”蒋介石连连点头，吩咐道：“杨秘书长所见极是，你再发电汉卿，嘱他万事克制，力避冲突。要知道，战则必败，日本就要中国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中央现在以平定内乱为第一，东北同志宜加体会，万万不可逞匹夫之勇，动摇我的剿共大计！”8月16日，张学良从南京急电南昌称，日本政府为转嫁政治经济危机，正大肆调兵遣将，准备进攻东北，相继发生的万宝山事件和中村间谍事件，使东北形势更为紧张。为此，紧急向蒋介石请示对日方针。

蒋介石拟电指示张学良：汉卿兄：无论日军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姓柳 櫻保梗常蹯鞞冈拢保啡湛J迹 毡揪 揭运嗜颂 诺谋实颯 柰虬 绞录 楠写迨录 笏列 蟹讲疑比毡揪 佞 室庵圃焜秸 眨 咏猴 髯阶急浮*蒋介石以特有的敏感觉察到事态的严重性，将重要谋士张群、戴季陶、宋子文请进南京总统官邸客室，商议嫁祸于张学良的措施，决定由蒋介石亲自会见张学良，巧施妙计。……蒋介石9月11日深夜乘警备森严的指挥专列由武汉北驰，12日中午到达河北平原重镇石家庄，见张学良的专列早已久候多时，便命侍从传令：“快请张副总司令前来议事！”不一时，副官谭海搀扶着面黄肌瘦的张学良走进蒋介石的指挥车，蒋介石客气地把病中的张学良扶到沙发上，关心地询问病情。

张学良见偌大的指挥车上空无一人，也知趣地命谭海退下，接着就迫不及待地请缨抗战：“关东军野心勃勃，凶相毕露，正把枪口对准东三剩三千万东北父老义愤填膺，几十万东北军同仇敌忾，东北的形势极其严重！”蒋介石点点头说：“东北形势的确剑拔弩张，一触即发，我已获得可靠情报，关东军在东北就要动手！”张学良大惊，顿时满腔热血，汹涌奔腾，霍然站起请战：“只要蒋主席一声令下，我就率东北军征杀疆场！”“不许胡来，不能打！”蒋介石声色俱厉，下了严令。

“为什么？为什么不能打？”“我们力量不足，打则必败！”“难道我们要把东北拱手相送？”“怎么是拱手相送，明明是日本人用枪炮从我们手中抢去的嘛！”“这不行！我何以面对东北三千万父老乡亲？以何理由回答全国民众的质询？”蒋介石故意勃然大怒，厉声训斥道：“这全都和你无关！”

我是一国主席，责任由我来负；不抵抗的罪名，也由我来承担！”蒋介石又张学良严厉训斥一通，未了甜言蜜语哄骗说：“你身体不好，和日本打交道的事交给中央管。你安心休养吧，万一社会上出现了不利于你的舆论，由我替你承担！”当时张学良对蒋介石心存幻想，以为蒋介石也可能有应付之策。岂知回到北京就接到部属告急的电文，南京专电更使他胆战心惊：据驻日中国大使馆电告，近日日本政府决定了对满蒙的最后方针，认为中村震太郎的失踪，系被中国虐杀，已密令，驻屯南海沿线各军，相机做紧急有效的处置。

在蒋介石催逼下，张学良9月6日向留守在沈阳的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下达命令称：“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剑对于日人，无论如何寻衅，我方务当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遵照为要。张学良鱼子秘樱”蒋介石仍对张学良不放心，9月12日再次电示张学良，严词命令：我以国民政府名义向东北军发出如下通令：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要满足日方的一切要求，尽快处理完中村事件，防止日方以此作为起事的口实。

9月17日，荣臻奉蒋介石、张学良之命，会见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说：“中村事件经过我方第四次调查，已将兴安岭区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瑞玑（即关玉衡）扣押，即为负责处理，可以协商解决。”蒋介石通过特务系统得知他的指示已经落实，认为足以安定日军之心，便在9月18日偕宋美龄前往江西，督促国民党军队加紧围攻红军。

当夜，蒋介石和宋美龄沐浴后躺在舒适的席梦思双人床上酣然入睡，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了蒋介石夫妇的美梦。蒋介石一跃而起，拿起话筒质问：“喂，这么晚了，你有何军国大事汇报？”电话里立刻传来沉重的浙江奉化口音的紧急报告声：“蒋主席，我是王正廷，刚刚收到北平张汉卿副总司令的报告，关东军突然在今晚10点30分左右，将沈阳北部柳条沟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炸毁，以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本军队为借口，炮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进攻沈阳，汉卿急电南京国民政府请示对策。”蒋介石大吃一惊，随即下达指示说：“立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电告张汉卿：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事件扩大，绝对不准抵抗！”东北军奉蒋介石、张学良之命不作抵抗，但爱国团长王铁汉却率领他的六二团奋勇抗击侵略者，毙伤日寇40余名，王团长向部属发出抗击日寇的铮铮豪言壮语：“敌人侵我国土，攻我兵营，斯可忍，则国格、人格全无法维持，而且现在官兵愤慨，都愿与北大营共存亡。敌人正在轰击本团营房，本团官兵势不能持枪待毙！”辽宁省长臧式毅激于爱国义愤，派人到日本驻沈阳总领事馆质问新任总领事森岛守人：“日军攻击沈阳的理由何在？”森岛守人推托说：“本馆正向军方查询中，现在还不明情由，所以无法奉答！”臧式毅派出的中国官员提出严正要求说：“望于五分钟之内制止攻击，并将日军行动真意见复；如果逾时未得回答，我方则将通告驻沈各国领事，不能负保护外侨之责。”五分钟之后，森岛守人回答说：“正在进行制止中，请再待五分钟！”森岛守人当即赶往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据森岛回忆情况如下：特务机关内，电灯煌煌，皎如白昼。以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为中心，参谋们都在忙碌不停。板垣大佐对我说：“中国军队破坏了我方重大权益的满铁线路，我军已在出动中。”他要求总领事馆协力。

于是，我便询问：“是谁发布出动军队的命令？”他答称：“此系紧急突

发事件，因司令官（本庄繁）在旅顺，所以是我代行。”我虽然感觉到日本军队的行动有点奇怪，但由于没有证据，所以不便提及，而只得一再强调：“有循外交交涉途径和平解决的必要。”可是板垣大佐则以相当粗暴的语气反诘我说：“眼看着统帅权已经发动，总领事馆还要来插嘴，是不是想干涉统帅权？”而且，同时在场的花谷正（在饭店中把建川美次灌醉之后赶到此处）甚至在我的面前拔出军刀，摆起威吓的态度说：“干涉统帅权者，不能宽恕！”辽宁省长臧式毅等了一个多小时，得不到日方的回答，见沈阳重要地点迅即丧失，又催促日方制止军事行动，森岛守人的答复是：“正召集军官会议，商讨办法；会议结束，即行通知！”过了一会儿，森岛守人回答臧式毅的质问道：“现在日本军队既已出动，制止甚为困难；且军方行动，总领事无权制止，只有向军事当局提出要求，不过该不致于进入城内。”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日寇在9月19日上午6时占领沈阳全城，臧式毅、荣臻万般无奈，含泪向侵华日方质询真意，森岛守人巧言推诿说：“一切都要等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到达沈阳，才能接上头！”9月19日上午11时，本庄繁率关东军司令部幕僚和前来增援的步兵第三十联队耀武扬威进入日军占领的沈阳，森岛守人忙去请示回答中方质问的方策，本庄繁冷笑道：“不能与沈阳军政当局谈判，尽快张贴日军管制沈阳的布告！”日寇占领沈阳的报告迅即用民报传到南昌，蒋介石在行营仔细阅读：照得昭和六年（1931年）9月18日午后10点30分时，中华民国东北边防军之一队，在沈阳西北侧北大营附近，爆破我南满铁路；驱其余威，悍然袭击日本军守备队--是彼开始敌对行动，自甘为祸首。

抑我南满铁道者，往年日本帝国依据条约，正当获得，归属我所有，其他国一指尚不敢染。今遇民国东北军，不但敢犯之，更竿头进一步，至于对帝国军队发枪开炮，是彼东北军自对我军来求战也明矣。……本职（本庄繁）夙负保护铁路之重责者，因为拥护既得之利权，确保帝国军之威信，兹方执断然处置，无敢所踌躇。……蒋介石看罢日本帝国主义不宣而战发动侵略战争的宣言书，拍案而起，气极而骂：“一派胡言，无耻之尤！”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办公室狂怒奔走，既而狂笑连声，提笔在日记中疾书：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时，而来侵略我东（三）省矣！呜呼！痛哉！余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拚一身报我总理！报我先烈！报我民族！

日寇野心既已爆发，必难再收，东亚从此将无宁日矣！

正在这时，总参议张群来到行营进言道：“蒋主席，这次围剿三战，尽遇挫折：第一仗上官云相师被歼，第二仗郝梦麟师失利，第三仗毛炳文师遇难，我军被歼7万，失枪5万多支，断难再打下去，不如回师南京，对付日本侵略，才是得民心之举！”这话说到了蒋介石的心坎儿上，忙说：“岳军兄言之有理，传令驾返南京！”9月21日，蒋介石风风火火由南昌赶回南京，立即召开高级军政官员会议商讨对日政策。国民政府审计院长于右任抖动花白胡子慷慨陈词道：“本人认为，日本军队既已发动攻势，就应该先行抵抗，而后再议其他！”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邵力子热血沸腾，强烈主张停止内战，唤起民众，准备抗战。教导二师师长张治中要求杀奔疆场，与日寇决一死战。

蒋介石听了将脸一拉，对刚跟他从江西返回的“剿共”军前线指挥何应钦说：“敬之，你有何高见？”何应钦当然知道蒋介石的真意，叹口气说：“当前我们国力不支，军备不足，财务薄弱，工业落后，不足以言战，只能采取

不抵抗方针！"蒋介石对何应钦的主张极力支持，又特别寻找论据说：“据日本官方消息，认为此次冲突实属不幸，已电令日军长官不扩大事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贸然反抗，就会使问题复杂化，更难解决！”众人对蒋介石的主张多持怀疑态度，但谁也不敢反驳，蒋介石环视众人一眼，以严厉的神表大声宣扬不抵抗主义：“余主张以日本侵占东（三）省事实，先提交国际联盟与签约非战公约诸国，此时唯有诉诸公理；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于相当程度，乃出以自卫最后之行动！”在这次会议上，做出了四方面的决定：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议机关，以戴季陶为委员长，宋子文为副委员长，顾维钧为秘书长，陈立夫、孔祥熙、丁惟汾、于右任、颜惠庆、李石曾、罗文干等为委员。

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及“剿共”计划悉予停缓。

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专程前往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

民众方面：由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分别发布《告全国军民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信赖国联公理处断。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进犯，蒋介石抱定不抵抗宗旨，9月19日指示中国代表施肇基在日内瓦向国际联盟求助，要求国联为使日军退出侵占地区而采取最适当的措置。9月21日正式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同一天，蒋介石在南京接见了国联公共卫生处长拉锡曼。

拉锡曼是出生在波兰的犹太人，当时正奉命在中国视察疫情，蒋介石请他帮助解决沈阳事变问题。这位国联大员拍着胸脯说：“只要是国联采取干涉态度，则日本军队必会撤退，所以问题不难解决！”蒋介石听了哭笑不得，耐着性子给这位洋大人解释说：“君须知日军既进占沈阳城，必不肯随便退出。余知日人对我东北之心理--宁使东京或日本三岛全毁，决不愿自动退出东北也。望君牢记余言，切勿以轻易视之！”蒋介石送走拉锡曼，被“九·一八事变”搅得痛心至极，夜不成眠，提笔在日记中写道：日人侵略实行，世界之第二次大战于是开始矣！

不知各国人士能见及此否？9月22日，国际联盟通过一致决议：“致紧急通知于中日两国政府，请各防止有使事态恶化或妨碍和平解决的任何行动。”这个决议更助长了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更大讲特讲：“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静待国际公理之判断。”蒋介石以为抓住了救命的稻草，天真地在9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此为一外交之转机，亦为我国内部统一之良机。

如天果不亡吾中国，则此次外交当不致失败也。

由于蒋介石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国际联盟来“主持公道”，英法等国又对日本侵略东三省采取绥靖主义，日本侵略者便利用蒋介石的不抵抗和逆来顺受态度，北攻齐齐哈尔和黑龙江，南攻锦州，“九·一八事变”后仅四个月十八天，东三省大好河山便沦于日寇的铁蹄之下。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掀起了全国范围的抗日反蒋运动，蒋介石处境困难，便玩弄权术，于1931年12月15日再次发表下野通电，将好话说尽：……。……现在国事至此，若非从速实现团结，完成统一，实无以策对外之胜利，慰国民之期望。……中正许身革命，进退出处，一以党国利害为前提；解职以后，仍当本国民之天职，尽党员之责任，捐糜顶踵，同纾国难……蒋介石下野后，通过他的心

腹仍牢牢掌握军政大权，新上任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代理行政院长陈铭枢、行政院长孙科寸步难行，只得联名请蒋介石复出：“新政府虽已产生，以先生（蒋介石）及展堂（胡汉民）、季新（汪精卫）两兄均不来京，党国失却重心。……国事不易收拾，先生气昔爱党爱国，想不忍袖手而坐视也。务望蒞京坐镇，则中枢有主，人心自安。”国民党军政大员纷纷来奉化请蒋介石复出，请他出山的电报雪片般飞来，蒋介石得意在对宋美龄说：“国事危殆至此，唯余赴京，尚有挽救之望，而个人之毁誉成败，则概不应顾也。”

第八章挑起领土争端

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本属中国领土，但日本却蓄意霸占并挑起事端，成为中日两国间的重大外交问题。随着日本右翼势力的发展，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问题的矛盾越来越严重，中国政府据理奋争，香港和世界华人掀起大规模保钓运动，爱国志士陈毓祥还为此献出宝贵的生命，遂更引起世人的注目。

一、钓鱼岛问题的由来钓鱼岛列岛包括钓鱼岛、黄海尾屿、飞濑岛、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大北小岛、大南小鸟、赤尼礁等8个小岛及一些岛礁，总面积6.3平方公里，其中钓鱼岛最大，面积4.3平方公里，最高峰362米，南北窄而东西长，远望似海面凸起的一座小山，它的东南侧山岩陡峭，像鱼叉一般。

钓鱼岛位于中国台湾东北102海里处，距福建、浙江沿岸174海里，南隔一条海沟，距日本八重山列岛约100海里。

中国早在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就有关于钓鱼岛的文字记载，并从15世纪开始将企划入中国的海防区域之内，派行政官员进行管辖。中国在明朝，为抗击倭寇入侵骚扰，曾于1556年任命胡宗宪为讨伐倭寇总督，负责沿海各省讨寇的军事责任。钓鱼岛、黄海尾屿、赤尾屿等岛屿当时包括在中国海上防区之内。根据中国明、清两代向琉球派遣的使者记录和地志的史书中记载，这些岛屿属于中国，中国与琉球的分界是赤尾屿和吉米岛（现为久米岛）之间。

日本右翼分子为霸占我钓鱼岛，挖空心思编造种种理由，日本政府也予以配合，大肆宣传，企图造成事实上的占领状态。1971年3月，日本外务省发表“关于尖阁列岛领土权问题的统一见解”。翌年，外务省情报文化局又印制了《关于尖阁诸岛》的小册子，专门宣传日本政府的立常日本外务省主张钓鱼岛归属日本的主要理由是：（1）日本明治政府于明治十八年（1885年）后通过冲绳县当局等各种方式进行现场调查，不仅发现其是无人岛，而且确认没有清国统治的痕迹，于是才在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1月14日决定在当地建标桩，正式编入日本领土。所以不包括在根据1895年5月生效的下关条约（马关条约）第二条规定由清国割让的台湾及澎湖列岛之内。

（2）旧金山和约也未将“尖阁列岛”包括在根据该条约第二条日本应放弃的领土之中，而是根据第三条置于美国行政管理之下，包括在1971年6月17日签署的日美“归还冲绳协定”之中。

(3) 中国对根据旧金山和约第三条处于美国施政地区内包括上述各岛从未提出任何异议，因而表明中国并未认为尖阁列岛是台湾的一部分，只是到1970年出现东海大陆架石油开发动向后，中国才将“尖阁列岛”领土权作为问题。

(4) 日本是依据国际法“先占”原则行事的，如同英、法在太平洋拥有的大部分岛屿。

先占有有效的必要条件是：该地区是无主地；国家明确宣布该地区是本国领土；实际有效统治该地区。日本明治政府曾于1896年将“尖阁列岛”中的4个岛屿无偿借给古贺辰四郎开发经营30年，1918年起子古贺善次又继承父业，现已改为有偿租用。这说明日本通过民间实行有效统治。

(5) 中方地理文献也承认过。台湾1965年10月《世界地图集第一册东亚诸国》，1970年1月《国民中学地理科教科书第四册》，中国北京地图出版社1958年11月出版的《世界地图集》都使用了“尖阁群岛”这一日本的岛名。

对此，中国、日本、东南亚、美国许多学者纷纷发表文章，驳斥日本右翼势力的观点和立场，一致认为钓鱼岛自明代以来即为中国领土，这不仅是中国政府的立场，而且也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先生经过严肃认真地考证后所得出的结论。井上清先生曾于1972年撰写了一部专著，题为《“尖阁”列岛——钓鱼岛的历史解析》。他在书中指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经过查阅历史文献而断定：钓鱼岛在日本染指之前并非“无主地”，而是中国的领土。

中国自元朝，即1292年起设澎湖巡查司，管辖台湾，当时称“流求”，明朝时根据台南重要港湾“大湾”的谐音，改称台湾，钓鱼岛是台湾的附属岛屿。中国明朝之后关于钓鱼岛的文献记载相当多。中国从明太祖时便开始向琉球国派遣册封使（专门代表当时的中国政府册封琉球王的使节）。1534年，明朝第12次册封使陈侃的《使琉球录》中有一段描述表明钓鱼岛属中国领土，而非琉球国之疆域：“过平嘉山，过钓鱼屿，过黄海毛屿，过赤屿，目不暇接……见古米山（琉球的久米岛），乃属琉球者，夷人（船上的琉球人）歌舞于舟，喜达其家。”这表明，当时的琉球人也认为过了钓鱼岛，到达古米岛（久米岛）后才算回到了自己的国家，而钓鱼屿、黄海尾屿、赤屿等则不属于琉球国。

1561年，明朝荡寇名将胡宗宪编纂的《筹海图编》一书中的“沿海山沙图”标明了中国福建省罗源县、宁德县沿海各岛。其中包括“钓鱼屿”、“黄海尾山”和“赤屿”。可见早在明代，钓鱼岛就已被作为中国领土列入中国的防区。

日本所称最早发现钓鱼岛，是日本吞并琉球后的1884年，相距1534年明朝册封使陈侃著《使琉球录》已落后了350多年。据日本史书记载，1884年日本福冈人古贺辰四郎发现久场岛（黄海尾屿是无人岛，并有大量海鸟信天翁栖息，其羽毛可销往欧洲获利），便于1885年要求冲绳县令允许其开拓，并在岛上树立标记，上写“黄海尾岛古贺开垦”，但当时他并未判明该岛是否真属日本。

1885年10月21日，日外务卿井上馨致内务卿山县有朋信中称：“经详查熟虑，该等岛屿也接近清国国境，与先前完成踏查之大东岛相比，发现其面积较小，尤其是清国附有岛名。近日，清国报章等，刊载我政府拟

占据台湾附近清国所属岛屿之传闻，对我国抱有猜疑，且屡次引起清政府之注意。

此刻若公然建立国标，必遭清国疑忌，故当前宜限于实地调查及详细报告其港湾形状、有无可待日后开发之重要物产等，而建国标及着手开发等，可待他日见机而作。"井上还叮嘱山县，不宜将日方秘密调查公诸报端，而要暗中进行，以免打草惊蛇，引起中国及国际上的异议或反对。同年11月24日，冲绳县令西村将奉命调查结果禀报内务卿，紧急要求给予指示：“建立国标一事，如前呈文，未必与清国完全无关，万一发生纠纷，如何是好。”翌日，内、外务两卿联名下令：“切记目前不可建（国标）。”直到1894年11月底，日军在甲午战争中胜券在握，便拟迫使中国割让台湾作为媾和条件，并在未通知中方的情况下先行秘密窃取了钓鱼列岛。同年12月27日，日本内务大臣野村靖发密文给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称：“关于在‘久场岛’（黄海尾屿）‘钓鱼岛’建标桩一事，虽已下令暂缓，‘但当时与今日形势不同’，对这些岛屿日本有必要加以管理，故应重议此事。这次外务省未表异议，并称‘请按预定计划适当处置’。”结果，1895年1月14日，日本政府终于通过“阁议”决定先行将钓鱼列岛划归冲绳所辖，建立标桩。同年4月17日，中日签署《马关条约》，从此直到日本战败投降，日本统治台湾长达50年，钓鱼岛等台湾周围附属岛屿也被日本长期霸占。

战后，中日之间悬而未决的钓鱼岛主权争议，与美国有直接关系，也可以说是美国在中日之间留下了一个领土“疙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军占领了冲绳及钓鱼岛海域，其后美国从对华冷战政策出发，将钓鱼岛划归日本，而未划给中国是必然的。

美军占领琉球（冲绳）后，曾于1953年12月25日以琉球列岛民政副长官、美国陆军少将的名义发出一份美国民政府第27号令，即关于“琉球列岛地理界线”的布告。其中称，“根据1951年9月8日签署的对日和约”，有必要重新指定琉球列岛的地理界线，并将当时美国政府和琉球政府管辖的区域指定，包括北纬24度、东京122度区域内各岛、小岛、环形礁、岩礁及领海。1969年11月21日，日美签署的归还冲绳协定（《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日美协定》）中宣布的日本领土范围，与1953年美国民政府第27号令完全相同。这样就将钓鱼岛及其周围海域与中国的台湾省一刀两断，全部切给日本的冲绳县。日本政府据此主张该岛属于日本冲绳县的一部分，并将钓鱼岛划为日本自卫队的“防空识别圈”内。

1970年9月10日，美国表示支持日本的立场，但又称“若有对立主张，则是应由有关当事国解决的问题”，从而把包袱甩给了中日两国。

钓鱼岛问题从国际法上看又当如何呢？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国际法专家邱宏达对此有专门研究，他著文《从现代国际法看钓鱼岛问题》，驳斥日本的谬论说：日本主张钓鱼岛列屿是琉球群岛的一部分，已于1972年5月15日随同琉球群岛由美国“归还”日本，其主要的根据是国际法上的先占--就是说对于不属于任何国家的无主土地，一国予以占领而取得主权。我国则主张钓鱼岛列屿应属中国，其理由如下：第一、钓鱼岛列屿最早为我国人所发现并命名，十五世纪我国明朝时写的“顺风相送”一书中，首先就提到钓鱼岛，作为航路指标地之一。

第二，我国在明朝就已将钓鱼岛各岛划入我国福建海防范围。十六世纪胡宗宪统纂的《海图编》中，列有“沿海山沙图”，其中“福七”--“福八”有

关福建省部分，列出了"钓鱼屿"、"化瓶山"、"黄海尾山"、"橄榄山"、"赤屿"等。

第三，在使用方面，除了上段所述我国册封琉球使节常使用钓鱼岛为航路指标外，自日本窃据台湾迄今，钓鱼岛列屿及附近海域经常为台湾渔民使用。台湾复归祖国后，我国人民还到钓鱼岛从事采药、打捞沉船等工作。

第四，钓鱼岛列屿是台湾属岛一点，除了地质构造外，明朝嘉靖年间出版的《日本一鉴》一书中，明文指出"钓鱼屿，小东小屿也"，而小东是指台湾，在书中附图中有明白表示。

另外在《使琉球录》中，也曾说明这些岛屿不属琉球。

第五，自琉球及日本方面的史料来看，钓鱼岛列屿在历史上从未成为琉球的一部分。例如康熙四十年（1701）琉球国来使紫金大夫协理府总理司蔡铎进献的《中山世谱》中，所列的地图及说明中均无钓鱼岛列屿，且列举琉球版图为三十六岛。

日本明治六年出版的《琉球诸岛全图》中，并无钓鱼岛列屿。明治十年（1877）伊地知贞著，车也安译校的《冲绳志》（一称《琉球志》）中，所列的宫古及八重山二群岛图及说明中，均未列入钓鱼岛列屿，全书中也未说到琉球领域及于钓鱼岛列屿。另外明治十九年（1886）西村舍三所著的《南岛纪事外篇》中，附有两份重要地图，一份是"琉球三十六岛之图"及"内地冲绳支郡朝鲜图"中，均未列入钓鱼岛列屿，书中也未提及钓鱼岛列屿是属琉球。

在日本官方文书方面，也找不出任何琉球管辖权在1895年以前及于钓鱼岛列屿的证据，例如1880年中日两国讨论琉球地位问题时，日方出示的草案中，全未提及钓鱼岛列屿各岛。

相反，1975年日本学者林子平刊行的一份著名地图《三国通览地路程全图》中，却明白地将钓鱼岛各岛用彩色标明为中国领土。此外，清朝同治二年（1862）铸版《皇朝中外一统图》中，中琉航线所经各岛，直到姑米山始加注日名"久米岛"，在此以前黄海尾屿、钓鱼屿等均与中国其他各岛一样无日文名称，可见此数岛与琉球不同，应属中国。

第六，日本依《马关条约》霸占台湾后，才将钓鱼岛列屿归琉球。因此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台湾归还中国民国，且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的中日和约第四条确认《马关条约》的废除，日本窃据钓鱼岛列屿的法律根据已不存在，该列屿自应一并归还中国。

A 美国错了！

如此所述，钓鱼岛列屿在法理上应为我中国领土，但在实际上却仍有问题。1945年4月美军攻占琉球，由于日本占领台湾时期已将钓鱼岛列屿划归琉球管辖，因此美军也将钓鱼岛列屿一并占去。其后美国表示日本对琉球群岛仍有所谓剩余主权（Residual Sovereignty），而美国在琉球群岛只行使行政权。1971年6月17日美、日签约，美国准备将其在琉球群岛的行政权归还日本，日本认为美国对琉球的行政权范围既然包括钓鱼岛列屿在内，一旦美国将行政权归还日本，日本就恢复其对钓鱼岛列屿的主权。因此在签约前台湾当局在三月十五日正式由驻美大使照会美国要求美国政府尊重中国对钓鱼岛列屿之主权，并于此项占领终止时，将该列屿交还中国政府。

1971年5月26日美国正式照会台湾当局表示：美国目前对该列

屿之行使管理系基于对日和约第三条之规定：美国相信将原自日本取得之行政权利交还日本一事，毫未损害中国之有关主权主张，美国不能对日本在转让该列屿行政权美国以前所持原有之法律权利予以增添，亦不能因交还其原自日本所获取者，而减少中国之权利。

由于台湾当局的强烈抗议，1971年1月2日美国参议院通过对美归还琉球条约时，又作了类似说明。

在1971年12月2日台湾行政院下令将钓鱼岛列屿划归台湾省宜兰县管辖，但迄今无法在该列屿实际行使管辖权。

在国际法上，对被侵犯的权利，如果仅仅是抗议而久无具体行动，可能被认为是放弃。

即使一再抗议而久无具体行动，也会被认为抗议失效。抗议之后，如不采取司法解决或其他国际法上和平解决的方式，也可能使一个抗议失去有效性。

二、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1971年12月，美国在归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它占领的冲绳群岛时，竟背着中国私相授受，把钓鱼岛也一起"交还"了日本，中国人民怎能答应？中国外交部12月30日发表声明，重申钓鱼岛等岛屿的主权归中国政府所有的立场，郑重宣告：近年来，日本佐藤政府不顾历史事实和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一再声称对中国领土钓鱼岛等岛屿"拥有主权"，并勾结美国帝国主义，进行侵吞上述岛屿的种种活动。不久前，美、日两国国会先后通过了"归还"冲绳协定。在这个协定中，美、日两国政府公然把钓鱼岛等岛屿划入"归还区域"。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明目张胆的侵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

美、日两国政府合伙制造的把冲绳"归还"给日本的骗局，是加强美、日军事勾结，加紧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一个新的严重步骤。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支持日本人民为粉碎"归还"冲绳的骗局，要求无条件地、全面地收复冲绳而进行的英勇斗争，并强烈反对美、日反动派拿中国领土钓鱼岛等岛屿作交易和借此挑拨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钓鱼岛等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明朝，这些岛屿就已经在中国海防区域之内，是中国台湾的附属岛屿，而不属于琉球，也就是现在所称的冲绳；中国与琉球在这一地区的分界是在赤尾屿和久米岛之间；中国的台湾渔民历来在钓鱼岛等岛屿上从事生产活动。

日本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窃取了这些岛屿，并于1895年4月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割让"台湾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现在，佐藤政府竟然把日本侵略者过去掠夺中国领土的侵略行动，作为对钓鱼岛等岛屿"拥有主权"的根据，这完全是赤裸裸的强盗逻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府把台湾的附属岛屿钓鱼岛等岛屿私自交给美国，美国政府片面宣布对这些岛屿拥有所谓"施政权"，这本来就是非法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1950年6月28日，周恩来外长代表中国政府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派遣第7舰队侵略台湾和台湾海峡，严正声明中国人民决心“收复台湾和一切属于中国的领土”。现在，美、日两国政府竟再次拿我国钓鱼岛等岛屿私相授受。

这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不能不激其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严正声明，钓鱼岛、黄海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等岛屿是台湾的附属岛屿。它们和台湾一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日两国政府在“归还”冲绳协定中，把我国钓鱼岛等岛屿列入“归还区域”，完全是非法的，这丝毫不能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钓鱼岛等岛屿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中国人民也一定要收复钓鱼岛等台湾的附属岛屿！

在1972年9月29日中国和日本建交时，双方本着求同存异的方针，一致同意钓鱼岛的归属问题留待以后解决。我国领导人邓小平作为副总理访问日本时曾在答记者问时称：“这个问题我们同日本有争议，钓鱼岛日本叫尖阁列岛，名字就不同。这个问题可以把它放一下，也许下一代人比我们更聪明些，会找到实际解决的办法。”邓小平当时在想：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可以不涉及两国的主权争议，共同开发。共同开发无非是那个岛屿附近的海底石油之类，可以合资经营嘛，共同得利嘛。很显然，中方是在努力通过和平互利方式，谋求问题的解决。

中国人言而有信，确实说到做到，不进入钓鱼岛活动，然而日本某些人说话从来不算数，右翼分子在日本当局指使下，公然登上钓鱼岛活动，激发了世界范围的保钓风潮。

A 第一次保钓运动 70年代初，日本右翼分子公然登上钓鱼岛活动。1970年9月10日，日本政府指使琉球政府发表《关于尖阁群岛的所有权以及大陆架资源开发主权的宣言》，声称“尖阁群岛属于冲绳，行政权归还日本之事，当然属日本领土之内。”日本政府和日本右翼分子的猖狂活动，激起海内外中国人的强烈愤怒，纷纷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北美等地开展保卫钓鱼岛运动，这就是第一次保钓运动。

中国政府对日本当局和右翼分子企图霸占中国领土钓鱼岛的活动，给予强烈反击。

1970年12月4日，中国政府发言人向新华社记者发表声明指出：“钓鱼岛是属于中国的岛屿”。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一个危险的信号》，表示坚决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染指中国领土钓鱼岛。

同年12月21日，日蒋韩联络委员会在东京开会，成立日蒋韩“海洋开发研究联合委员会”，决定把“尖阁群岛”的领土权问题“搁置起来”，对从包括“尖阁群岛”在内的东海到日本近海的海域，进行资源调查，研究开发。

对此，中国政府给予强烈谴责，《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台湾省及其所属岛屿，包括钓鱼岛、黄海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等岛屿在内，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其资源属于中国所有。外交部也发表声明，保卫中国领土不受人侵犯。

1972年3月3日和10日，中国政府代表在世界海底委员会会议上重申，钓鱼岛等岛屿和邻近中国的海域的海底资源，都完全属于中国所有，

决不允许任何外国侵略势力染指。

与此同时，香港、台湾、北美等地的中国人和华侨爱国主义精神大发扬，组织起全球华人保钓大联盟、保卫钓鱼岛联合行动、香港各界保卫钓鱼岛联盟、保钓行动委员会、教育界保钓联席会议、香港各界保钓联委会等几十个保钓组织。

1971年美国威斯康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创作的《钓鱼岛战歌》最早从美国唱出，由于唱出了中国人民保卫领土完整的爱国心声，所以很快由北美传到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欧洲，几乎唱遍全世界。

钓鱼岛战歌（1971年美国威大中国留学生作）滚滚狂涛，东海之遥，屹立着一群美丽的小岛。

钓鱼岛英勇地俯视着太平洋，钓鱼岛，捍卫着我们富饶的海疆。

风在吼，海在啸，中国神圣领土，钓鱼宝岛象征着我们英勇不怕强暴。

钓鱼岛你带给渔民多少微笑，钓鱼岛，蕴存着我们无价的宝藏。

怒吼吧，钓鱼岛，我们寸土必争，誓死抵抗，我们藐视那东洋强盗。

关于第一次保钓运动的真实情景，中国的港事顾问、后来为保卫钓鱼岛献出宝贵生命的陈毓祥曾写过两篇追记文章，记得详细而生动：在保钓洪流中这是一篇追记，1978年由于中国渔船在钓鱼岛海域与日本战舰发生冲突，爆发了海外第二次保钓运动，但事件并没有延续，第二次保钓也没有真正搞起来，学联出版了一份特刊，邀请几位曾在七十年代参加过第一次保钓运动的人士，撰写纪念文章，我追记平二年五月十三日中环保钓示威的全过程，依然历历在目。本文后来并被收录入学联编印的《香港学生运动回顾》一书。

陈毓祥离开了农圃道新亚书院，我们分成几个小组；芬、辉和我改从红磡码头乘搭往湾仔的渡海轮。

在船上，我们默默地站在栏杆旁，谁也不愿意说话。小轮随着海浪起伏前进。船头两侧溅起无数汹涌的浪潮。我轻声唱起了《松花江上》：“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边唱着，我的眼睛湿润了。遥望远处的天星码头，我仿佛看见人头耸动。

辉和我都背着一个布袋，内里藏了一具手提扩音器。辉是我的后备；我们事前说好，如果我被抓了去，他便会马上接替我的工作。

我们沿着海旁步行往爱丁保广常途中，我反复背诵着那几句口号--“誓死保卫钓鱼岛”，“钓鱼岛，我们的”，“反对美日私相授受我国领土钓鱼岛”。我要喊得铿锵有力，喊出中华儿女爱国保土的决心。

广场上，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人。我们抵达后便分散开，在人群中穿插。远处停着数部冲锋车。几个军装警察站立在车前面。我环视四周：记者、便衣警探、各院校同学和一些市民，差不多有一千人。

人们不时抬头望望那钟楼，它刚刚敲响了十二下。顿时，周围的空气也变得紧张起来。

人潮突然从这个方向涌向那个方向，大家都在找寻主持示威的同学。

“为什么还不开始呢？”我有点焦急。右手紧紧握住扩音器的手柄。突然，人们不约而同朝码头的方向急步走去。天空徐徐飘下无数张传单。“保卫钓鱼岛”的巨型红色横额及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已在不远处被人高高举起来。马上便传来一阵欢呼声，更多人涌到前面去。

我猛然记起自己的任务，急忙提起扩音器，急速地呼喊同学们迅速列

队。"滚滚狂涛，东海之遥，屹立着一群美丽的小岛，钓鱼岛。……"，人群中首次响起了"保卫钓鱼岛战歌"雄壮的歌声。

队伍前面有一位外籍警司和一位华裔帮办手拿着扬声器，拦截去路：“你们的示威是非法的，你们必须马上解散，离开现场否则你们将会被控告非法集会。”没有人理会他们的话。

“钓鱼岛，我们的”，“钓鱼岛，我们的”，“誓死保卫钓鱼岛！”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使整个广场都沸腾起来。队伍开始缓缓朝着中区国际大厦方面移动。数十名记者在前面摇动着相机。还有对面停车场的天台上，有几个不是“记者”的人正以长距离摄影机，仔细地拍下示威的人群。

很长的一条人龙，四个人一排，手扣着手，挺胸前进。同学们激动地唱着：“钓鱼岛，英勇地俯视着太平洋；钓鱼岛，捍卫着我们富饶的海疆。……”。这是最雄伟的歌声，最动人的大合唱。阿辉和阿芬忙着分发袖章给维持秩序的同学，红布黑字印上“保卫钓鱼岛”的字样。纠察员手牵着手，把同学保护在队伍的中间。

星期六的中午，中环写字楼刚好是下班时候，交通阻塞得水泄不通。五月的阳光，还不算十分酷热。然而，我们的心，更加火热。队伍在国际大厦前面的空地停下来，代表们前往日本领事馆递交抗议书。抗议书被接纳了，同学们欢呼、鼓掌，战歌响起一遍又一遍。队伍继续朝美国领事馆出发。

人龙由最初的一千多人，扩展至二千多人，原来看热闹的，亦成为了参加者。手持拐杖的、结着领带的、还有穿着短裤的，彼此互不相识，不过，都是为了一个相同的目标而走在一起。

保卫钓鱼岛。

“风在吼，海在啸，我们神圣领土钓鱼宝岛，象征着我们英勇不怕强暴。”歌声响彻了遮打道的行人隧道。游行队伍越过皇后像广场经过高等法院，横过德辅道中、皇后大道中，开始向花园道前进。

“前进，前进，前进--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哼，你们封锁消息，你们出动街坊首长，你们发动电台广播、舆论攻击、歪曲事实，诬蔑示威的同学是“保钓仔”、“长发青年”、“破坏社会的安宁”。然而，铁腕政策镇压不了伸张正义的人，改变不了我们“爱国家、爱民族”的坚定立场我把扬声器指向缆车大厦二楼窗口的长程摄影机，“誓死保卫钓鱼岛！”同学们在怒吼，大地在震动。宁静的花园道上，人声喧天。

我的声音沙哑了，我的眼镜模糊了。我跑到队伍的前面，起劲地唱。一忽儿，同学们哗然一声。“怎么，领事馆今天休息？”“为什么无故休息？为什么突然关门？”人群在鼓噪。

抗议书被愤怒的同伴撕成粉碎。

游行还在继续，更多人加入了行列。百多位刚考完试的同学，从陆佑堂匆匆地来参加；有宿生会的干事，院会的负责同学，更多是不认识的面孔，然而，我们四千多颗炽热的心，却是紧紧连结在一起，跳动在一起。队伍一直由美国领事馆伸展至希尔顿酒店，看不见尽头。示威在中午一时半结束了，没有流血，没有拘捕，没有纸屑。

我在返回学校途中，唱起了《黄海河颂》。这时，我的胸口还是像翻滚的黄海河水，无法静止下来。中华民族啊，你的苦难已是过去的历史。我们又怎能再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中华儿女，决不让别人再来欺负你了。我们一定记取今天的誓言，团结，前进。

(原载于1978年5月13日《学联报》)钓鱼岛与统一中国运动七十年代初海外爆发的保钓运动,随着美国根据《冲绳条约》将钓鱼岛交给日本,而接近尾声,青年学生经过连场示威及抗议行动,依然改变不了钓鱼岛落入日本人手中的事实,当年在学界遂弥漫着一股消极失望的气氛和情绪,运动将往何处去?成为每一个参与保钓运动的人心中思考的问题,我经过与其他同学的讨论及自己的思考,认为保钓运动的出路在于认识中国运动和促进统一的运动,因此在学联报上写了这篇文章。当时我是港大社会科学院一年级学生,身兼港大学生会康乐秘书及学联署理本港事务秘书两个职位。

陈毓祥 A 引言由海外华人齐心发动之"保卫钓鱼岛运动",进行至今,已历时二年多。这"运动"在海外各地的华人社区均产生了深远不一的影响。尤其是香港及美加各地,更因着"钓鱼岛运动"的开展,而促进了此等地区的华人的团结,从而引发起"认识中国及统一中国"的一致意愿。

然而,尽管"钓鱼岛运动"在海外华人的社会里曾引起如此波澜壮阔的影响,我们目前却正在面临一项历史性的决定,也就是"钓鱼岛群岛"是否会在五月十五日,当"美日冲绳归还协约"期满时,任由日本政府唾手而得呢?"钓鱼岛"是否会失去?应否失去?能否失去?如果一旦不幸失去,海外华人应以什么态度去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呢?又若果"钓鱼岛"既不应复不能落在东洋人手中,那么海外从事"保钓运动"的同胞,将如何在这短短的一个月当中,采取有效的方法和行动,誓死保卫"钓鱼岛"呢?曾经一度沉寂了的香港"保钓运动",近日又因"美日归还冲绳协约"日期迫近眉睫,而酝酿有所行动。

为了了解"钓鱼岛运动"的发展,我们有必要检讨和分析过去两年多以来"保钓运动"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

A"运动"发展的趋势:过去与未来"运动"初期的目标简单而鲜明,专注于保卫钓鱼岛列屿。

因而当时不分左、右,均对"运动"表示积极支持。"钓鱼岛运动"在香港始于一个觉醒运动,也就是对自我身份的重新肯定与认同,因而喊出"海外华人大团结"的口号。然而这联合阵线维持不久即因理论与实际的不能相符而宣告决裂。

"运动"至此亦分裂为几条不同路线:其一是增加对"殖民地政府"的不满情绪,在"七七"维园大示威中,因港英皇家警察的血腥镇压,致使"运动"一度几乎完全扭转方向,从"保卫钓鱼岛"运动演变成为"反对殖民地政府"运动。另一方面,由于彼此的政治背景和立场不同,当理论落实到实际层面时,矛盾便无可避免地产生,因而引致个别"保鱼"团体的互相攻讦,对运动本身打击很大。

"运动"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应是从"保卫钓鱼岛"而提升到"统一中国"的口号。而"统一中国"也就一直成为此"运动"的主流。如今,因五月十五日这日子就快来临,因而有人重新提出"保卫钓鱼岛"的口号,也就是说企图把"运动"折回当初的起点。不过,中国能否于五月十五日确保钓鱼岛的领土主权,决定于各方面客观形势的分析。

A 目前形势分析(一)香港--"钓鱼岛运动"一开始时是属于一个觉醒运动。目的在于引起香港中国同胞对钓鱼岛问题的关注,从而引发起国人对中国的认同。而"运动"初期的各种示威行动,均能充分发挥这个效能。然而由于香港特殊的政治环境,搞"保钓运动"便无可避免地与殖民地政府发生冲

突，因而容易使"运动"变质。是以在香港继续搞"保钓运动"将会不切实际，亦起不了什么作用。

(二) 美日--日本因觊觎于钓鱼岛海床下蕴藏着的丰富石油，因而一直处心积虑，务求把钓鱼岛取到手。以前，日本曾把马六甲海峡形容为日本的"生命线"，主因便是马六甲海峡为日本从中东运输石油必经之路线，而石油又是这个天然资源短拙的国家的重要燃料。

倘若日本能把钓鱼岛据为己有，无疑钓鱼岛海底丰富的石油田将解决日本要倚重于中东的石油而不得受制于别人这个难题。是以日本在争取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一直都不遗余力。例如日本官方除了一直强硬表示对钓鱼岛获有权的决心，更声言必要时不惜以武力占据这几个小岛。另一方面，又要求美国发表声明支持，企图透过国际的舆论压力而达到目的。日本的狼子野心虽然昭然若揭，力莫奈之何。盖以日本目前的态度是吃硬不吃软，得寸进尺，为求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

美国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一直都采取同情日本的态度。

在"美日冲绳归还协议"中，美国就曾明白表示"钓鱼岛列屿"将随冲绳岛而一并归还日本。而最近美国国务院也就应日本的要求，而重申"钓鱼岛"将属于日本的论调。是以在"钓鱼岛列屿"主权之争，日本实际上已赢得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

(三) 台湾--台湾当局是个没落中的"皇朝"，蒋介石之再度连任为第五任"总统"，显示台湾当局在未垮台前，仍将是一贯的"老人家政治"，也就是说："以不变应万变。"于是乎，人家积极建立邦交，自己却不断跟人绝交。另一方面，再度年年力竭声嘶地"光复"一番，而同时却任别人宰割自己的疆土，丝毫没有半点怨言。这样软弱的外交手腕，徒然教自己早日走上灭亡之路而已。本来，从历史上及从法理上，钓鱼岛都是属于台湾省的一部分。

倘若台湾当局摆出强硬的态度，向日本政府据理力争，日本一定不敢过分放肆。必要时派兵驻守钓鱼岛，必定能够赢得国人的支持。而事实上，亦以台湾最能够名正言顺出兵捍卫国土，只因钓鱼岛是属于台湾省一部分。然而，证诸台湾当局一向外交上软弱无能的表现，对台湾派兵出守钓鱼岛这个幻想，可能性甚微。例如，当日中共加入联合国，倘若台湾当局有自知之明(或者：先见之明)，及早光荣退出联合国，则尚可保存一点面子，可惜台湾当局时刻仍存有幻想，以为还有一丝希望。卒之要匆匆收旗，狼狈而回。就上述例子，即使台湾在最近的国民大会中通过重申钓鱼岛的主权，亦难以寄望在五月十五日那天，派兵驻守钓鱼岛这个可能性矣。

(四) 中共--中共政权目前正如日方中。有人遂寄望中共能派兵保卫钓鱼岛。然而尽管中共目前国力日盛，在钓鱼岛问题上，却无法直接插手其中。因为台湾问题一日未获解决，中共即无由插手钓鱼岛，这是关系到法理上的问题。是以中共除了在联合国发表声明，谴责美日双方私相授受钓鱼岛之外，实有如哑子吃黄莲，丝毫动弹不得。若然寄望中共出兵，则其可能性更微。因为中共如果一旦出兵，势必马上引起苏联、日本及美国等强烈的反对，徒然做成世界局势的紧张而已。

A 钓鱼岛虽失，统一运动将继续根据国际形势的分析，钓鱼岛将于五月十五日法理上交还日本，好像是无可避免的事实。于是有人认为，钓鱼岛千万不能够失去。钓鱼岛运动开始时的目标便是刺激海外华人的民族感情，同心合力保卫国土，及后始转趋于"认同中国，统一中国"的指标上。是以倘若

钓鱼岛不保，无疑将大大打击目前正方兴未艾的"中国统一运动"，从而严重地危害到海外华人的团结运动。

这样的忧虑，当中自然带有一定的准确性。然而，只要我们的眼光能够放远一点，我们便会明白，钓鱼岛如果真的失去，将会是一个历史的因素，正如台湾和香港，目前仍未能收归中国的版图中，也是一个历史的因素。钓鱼岛是属于台湾的一部分。台湾当局既无能力保护国家的疆土，那么，只有留待中共解决台湾问题后，始能依循国际途径，解决钓鱼岛问题。而笔者深信，目前中共既已加入联合国，成为安理会主席之一，则中共必不容许日本于短期内开发钓鱼岛群岛海底的石油的。

"保卫钓鱼岛运动"，本质上就是一个促进中国统一的运动。当年五四运动的爆发，目的是反对签署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同样是一个保土卫国的爱国运动。其表面结果是和约仍旧签订了，然而五四运动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史上，却带来至深且巨的影响。同样地，钓鱼岛目前暂时可能会失去，然而"运动"本身的精神却丝毫不会因此而有损。

倘若我们换作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则钓鱼岛如果真的失去，很可能更会促成中国的统一运动。因为唯有中国统一，始能一致对外，抵御外侮。

"保卫钓鱼岛运动"是促进"中国统一运动"的酵母。现在我们可能正要面临着有一股逆流。这股逆流很可能会给予"统一运动"一个打击。是以如何去处理这股逆流，从而继续"中国统一运动"，才是我们急切要应付的课题，相信也是今届学联新干事的一项挑战和考验。

(原载于1972年4月《学联报》) A 第二次保钓运动在中国和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下，日本右翼势力在钓鱼岛上的非法活动不得不稍有收敛，但不久又故态复萌，更变本加厉地活动起来。

1978年5月，日本政府把所谓《关于实行日韩大陆架协定的特别措施法》提交国会通过，继续采取侵犯中国主权的步骤。5月10日，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约见日本驻华大使佐藤正二，提出强烈抗议。韩念龙副部长指出，中国对日本政府和南朝鲜当局背着中国在东海大陆架片面划定"共同开发区"的所谓"日韩共同开发大陆架协定"，曾先后两次声明，指出这是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所谓"日韩共同开发大陆架协定"完全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政府决不能同意。韩念龙副部长强调指出，但遗憾的是日本政府根本无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4月7日竟然又在众议院通过了所谓"关于实行日韩大陆架协定的特别措施法"，并提交参议院进行审议。

对日本政府执意侵犯中国主权的这一严重步骤，中国政府表示强烈抗议。日本政府必须立即停止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日关系的行为，否则，必须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负完全责任。

日本政府迫于中国的压力把头缩了回去，但在一年后，又派巡视船"宗谷号"于1979年5月28日至6月8日，载运人员和器材登上钓鱼岛，修建临时直升飞机场，又进而派出调查团和测量船对钓鱼岛进行测量调查活动。

对此，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沈平5月29日约见日本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伴正一，对日本政府在钓鱼岛修建临时直升飞机场等行为表示遗憾，指出日方的行为"显然违背了中日双方关于钓鱼岛问题上的谅解"，声明中国不承认这一行为具有任何法律价值。

日本政府和右翼组织的猖狂活动再次激怒了海外华人，又纷纷组织起

来进行保卫钓鱼岛的活动，提出"陆沉未必为洪水，谁为神州理旧疆"的战斗口号，纵声高唱《勇敢的中国人》：勇敢的中国人令我锦绣故乡色变，令我娇美翠湖含恨！

望向中国国土，此际浩气在腾，誓要将我苦难，化为悲愤！

做个勇敢中国人，热血决抛抵抗敌人！

我万众一心，哪惧怕艰辛，冲开黑暗！

令我锦绣故乡色变，令我娇美翠湖含恨！

望向中国国地，此际浩气在腾，誓要将我苦难，化为悲愤！

做个勇敢中国人，热血决抛抵抗敌人！

我万众一心，哪惧怕艰辛，冲开黑暗！

其后，1980年5月，日本同南朝鲜当局在东海大陆架片面划定之"共同开发区"之两侧进行石油钻探试采。中国政府5月7日声明，指出这是无视中国主权的行为，中国政府保留对该地区的一切权利。

1981年7月11-19日，日本冲绳县又有人到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调查渔常7月11日，中国外交部就此事召见日驻华大使馆官员，严肃地提出交涉。外交部发言人又专门发表谈话，对此事表示遗憾，要求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A 第三次保钓运动进入90年代，日本右翼分子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挑衅活动又活跃起来。

1990年10月，"日本青年社"茨城县本部长萩野谷辉男带领妻子和部属几次登上钓鱼岛，在岛上建立灯台、设立航标、设置邮政信箱，以造成钓鱼岛已由日本方面实际支配的事实。

10月1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举办新闻发布会说，日本右翼团体在钓鱼岛上设置航标等是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动。10月27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长期怀远紧急约见日本驻华大使桥本恕，就钓鱼岛问题提出严正交涉说，日本政府准备批准日本一些右翼团体在钓鱼岛上建立航标，出动舰艇进入钓鱼岛海域驱赶中国台湾省渔民的作法，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必须停止。他特别提到日本向海外派自卫队不是联合国要求的，也不是亚洲国家要求的，中国政府强烈希望日本政府慎重行事。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李金华还谴责日本政府出动舰艇和飞机进入钓鱼岛海域并拦阻中国台湾省渔民，指责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坂本三十次竟然把中国拥有无可争辩主权的钓鱼岛说成是"日本的固有领土"，还严正地指出："中国对固有领土钓鱼岛的主权是无可争辩的，最后围绕钓鱼岛发生的事情完全是日本方面挑起的，责任应由日本方面承担。中国政府强烈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停止一切在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侵犯中国主权的活动。"1996年9月下旬，钓鱼岛再次成为全球华人关注的焦点，世界上哪里有华人，那里就能听到华人抗议日本窃取中国钓鱼岛的呼声。

第三次保钓运动的导火线仍然是日本右翼团体到钓鱼岛修建灯塔，日本海上保安厅派舰只护航，并一再驱赶中国船只，日本外相池田行彦在香港宣称钓鱼岛是日本领土，日驻港总领事说钓鱼岛问题只是小事一件，则明显是在火上浇油，令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港事顾问、"全球华人保钓大联盟"召集人陈毓祥9月22日率领香港保钓志士，乘坐"保钓号"船从香港誓师出发前往钓鱼岛，斗志昂扬高唱《钓鱼岛战歌》：滚滚狂涛，东海之遥，屹立着一群美丽的小岛。

钓鱼岛英勇地俯视着太平洋，钓鱼岛，捍卫着我们富饶的海疆。
风在吼，海在啸，中国神圣领土，钓鱼宝岛象征着我们英勇不怕强暴。
钓鱼岛你带给渔民多少欢笑，钓鱼岛，蕴存着我们无价的宝藏。
怒吼吧，钓鱼岛。

我们寸土必争，誓死抵抗，我们藐视那东洋强盗。

陈毓祥一行9月25日11时50分驶入钓鱼岛15海里水域时，立即被日本7艘作战舰只如临大敌般从三方包抄过来，团团包围，另有飞机在空中严密监视。日本的军舰、飞机为何来得这么快？原来，日本当局早已做好了调动日本海空军对付中国保钓志士的军事部署。据日本报章报道说，最近香港“保钓号”前往钓鱼岛进行抗议活动时，日本航空自卫队由日本本土派遣预先警报机前往那里基地担任警戒监视任务。

日本《东京新闻》报道，在“保钓号”于本月二十二日由香港出航前往钓鱼岛时，航空自卫队即由青森县三泽基地派遣该基地所属航空队的六架E二C预先警报机前往那里担任警戒任务。

E二C早期警报机的主要任务是监视来自低空的飞机。

报道引述航空自卫队参谋长村木鸿二的话指出，航空自卫队的任务是警戒、监视日本周边地区，现正加强这方面的任务，目前尚未发现其他国家的飞机有特别的动向。

日本海上自卫队目前维持平时一般任务，侦察机由空中进行监视活动。报道引述日本统合幕僚会议议长（相当于军方参谋总长）杉山蕃的话指出，目前是海上保安厅负责处理钓鱼岛问题的阶段，日本自卫队正冷静地注视事态的发展。

陈毓祥没想到日本当局对他们这艘设备陈旧而又没有任何武器的“保钓号”货船会如此紧张，他们不被日本海空军舰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高唱《（新）保卫钓鱼岛》战歌与日方的军舰、飞机周旋：（新）保卫钓鱼岛团结起来，行动起来。

起来，起来，中华儿女站出来，保卫领土钓鱼岛。

抗战胜利已三代，百年国耻犹存在。

不认罪赖血债，小鬼子有后台。

军国阴魂又重来，占我领土钓鱼岛。

保卫领土钓鱼岛。团结起来，行动起来。

起来，起来，中华儿女站出来，保卫领土钓鱼岛。团结起来，行动起来。

起来，起来，中华儿女太愤慨，保卫领土钓鱼岛。

莫道峡分两岸，不论海内和海外。

求大同存小异，同仇敌忾莫等待。

不分左右和党派。

9月26日零时20分，“保钓号”驶入钓鱼岛12海里水域，准备设法靠近钓鱼岛。日舰发现了他们的企图，多次开动无线通讯器警告中国人不要靠近钓鱼岛。

陈毓祥一行保钓志士最重要的原动力是保卫祖国领土的一腔热诚。他们以残旧的货轮，成功地突破了日本舰机的海空封锁，26日2时30分驶至钓鱼岛1.5海里处，准备实施陈毓祥的“保钓三步曲”。

陈毓祥经常挂在口边的保钓三步曲，目标一是深入钓鱼岛十二海里宣

示中国主权：二是抢滩登陆钓鱼岛；三是在岛上插上中国国旗。“保钓号”上的突击队员，有来自不同阶层，各行各业，各有所长。不过，彼此在行动上，也有不同见解，要求同存异谈何容易。在突击队成员中，有几人便特别受吵架，经常争得面红耳赤。船长魏立志和陈毓祥要领导这支突击队，一点也不容易。难怪记者经常看见魏船长拿着瓶酒在灌，有时候更没有胃口吃饭。

这时，日本舰只和直升机紧紧尾随“保钓号”，用探射灯照射“保钓号”。由于风浪大，陈毓祥和船长决定“保钓号”驶离钓鱼岛海域。

26日6时整，陈毓祥率领众志士由钓鱼岛以北27海里处做第二次闯钓鱼岛试验，日舰也掉头追赶。经两个半小时搏斗，“保钓号”再次驶入钓鱼岛12海里范围，日本人更为紧张，调动15艘舰艇将“保钓号”团团包围，其中4艘贴近“保钓号”，并派直升机和固定翼飞机在“保钓号”上空低飞盘旋，向中国人施加最大压力。

陈毓祥看海浪太高，与船长商定取消原定的“保钓号”抢滩行动。他们在甲板上高举五星红旗，斗志昂扬地与日本人周旋，双方形成对峙状态。陈毓祥通过扩音机宣称钓鱼岛是中国领土，日本人不得染指；日本人也通过扩音机应战，双方展开激烈的主权宣传战。

9时25分，陈毓祥等5名壮士由“保钓号”跳下大海，以示可在中国主权领海内活动，但因海浪太大，很快发现有人遇溺，船上成员赶快抛下救生圈，从巨浪中救人。

经15分钟抢救，5个突击队员很快被救上“保钓号”，却发现陈毓祥昏迷中口吐白沫，方裕源情况稍好，其他3人安然无恙，随即发出求救信号。

新华社接到求救信号后，立即用自己的良好设备向有关方面发出求救要求，日方即派直升机把方裕源送往附近的石垣医院救治，日本医生协助抢救陈毓祥，到9月27日23时30分，宣布陈毓祥为国捐躯。

保钓成员们失声痛哭，以三首挽词表达对陈毓祥的哀悼之情：“保钓号”成员的三首挽词第一首一哭毓祥再哭毓祥毓祥毓祥今已矣却留重任难承受生为保钓死为保钓保钓旨何在取回主权方甘心第二首七一保钓未成九六保钓未竟如今遽牺牲堪恨大鹏从天落社会活动有功保钓运动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第三首决心为保钓视死如归真英雄儿女本色奋勇卫领土以身殉国我中华民族增光A日本责任不可推卸在陈毓祥身殉钓鱼岛后，中国与日本就钓鱼岛的交涉，升到另一个更高的层次。中国外交部在陈毓祥遇难后翌日，向日本驻中国大使提出严正交涉。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说，保钓号船上人员的伤亡，日本方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说，中方希望日本拆除钓鱼岛上的灯塔。

沈国放说，陈毓祥遇难，事件的起因是在日本方面，所以，日本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说，由于有人死伤，是一件严重的事件。

A 毓祥之死日不可卸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外交部副部长唐家璇前日紧急召见日本驻华大使，就日方侵犯中国钓鱼岛主权的活动，导致发生香港抗议船人员遇难事件提出严正交涉。唐家璇表示，中国对钓鱼岛的立场一向是坚定和明确的，他要求日方采取有效措施，纠正错误，并防止今后再次发生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以及伤害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

会面时，日本驻华大使表示日方已经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表示希望各方面采取冷静的态度来处理这个问题，日方会作出最大的努力。沈国放

说，唐家璇会面时要求日本采取有效措施，包括拆除钓鱼岛上的灯塔。

这并不是中国在保卫钓鱼岛事件爆发后第一次召见日本驻华大使。据消息人士透露，近几个月来，中国外交部频频召见日本驻华大使交涉，密度高时三五天就有一次。

A 参赞往冲绳探方裕源另一方面，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政务参赞程永华受徐敦信大使派遣，前往日本冲绳县立八重山医院，看望了日前在钓鱼岛海域受伤的香港同胞方裕源先生，对他表示了亲切的慰问，并祝愿他早日康复。

此外，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上周末在纽约接受一家中文报纸记者的访问时，再次表明中方的立常钱其琛说，今年七月以来，日本一些右翼团体无视中日双方达成的有关谅解，连续登上钓鱼岛制造事端，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激起了包括台湾、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在内全体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中国政府多次向日本政府提出了严正交涉。

钱其琛在访问中表示，这次在纽约会晤日本外相时，对日本政府放任右翼团体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错误态度表示了强烈不满，并要求日本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由此产生的恶劣后果和消极影响。

中国著名日本问题专家张一帆满怀对日本右翼分子的愤怒之情，认为日本传媒在分析港台这次保钓运动时，暗藏离间之心不能说不明显，他以《日本传媒一反常态恣意反扑》为题，在香港《明报》发表文章说：自七月中旬发生钓鱼岛主权之争以来，日本外务省特别向各主要传媒发出“通知”，要求对此事的报道淡化处理。钓鱼岛已经实际控制在日本手中，因此日本觉得无须为此再逞口舌之快。但是，中日外长九月二十五日在纽约有关此问题的会谈不欢而散之后，日本主要传媒一反常态，直言不讳地公然提出钓鱼岛是日本的领土，并怂恿政府不能让步，在这些传媒的言论之中，九月二十六日“读卖新闻”的社论最为典型。

A 对待领土主权不可息事宁人该社论提出，“无论是历史的还是从‘国际法’”上来看，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的事实是不容否定的，“社论并为此提出四个论据--一、经过再三的实地调查，确认这是一个无人岛后，1895年，日本通过内阁决议将此岛编入冲绳县；二、日清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规定把台湾、澎湖诸岛割让给日本，但是并未将钓鱼岛包括在内；三、旧金山和平条约使日本放弃了殖民地。但其中并没有包括钓鱼岛，在冲绳归还日本之前，此岛一直在美国的托管时期，中国未曾提出任何异议，中国既然对美国托管的不合法性没异议，中国现在对该岛屿的主权主张，也就站不住脚。

其实，该社论提出的四个论据并不新鲜。二十多年前，在第一次“保钓运动”的时候，对日本的这套说词，中国有过明确的、有根有据的回答。在此不用赘述。

不过，该社论所述的四点论据，也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即对待领土主权，不管是政府还是民众，不能以沉默息事宁人，不然的话，子孙后代，将为此付出比我们现在更大的代价。

1978年邓小平为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访问日本，并提出将中日钓鱼岛的主权之争，搁置起来，让子孙后代去解决，因为“我们的后代一定会比我们聪明”。十八年来中国一直坚持这个立常而日本传媒对这个主张也一直赞赏有加，但这次日本把脸全部拉了下来，不仅不提“搁置争议”，而且认为日本根本不可接受这一主张，由此可见日本崇武心理日渐膨胀的一

例。

A 日本传媒鼓噪肆无忌惮张一帆认为，对于香港的保钓运动，日本传媒与政府的认识相当一致，他们竟认为，香港的传媒是这次保钓运动的始作俑者。"东京新闻"带着嘲讽的口气胡说：“这次香港的对日抗议行动，完全是受传媒影响，保钓号船上真正的保钓分子只有十八人，随船记者却有四十二人，而且大部分记者都是自己在制造新闻”。日本右翼分子攻击香港报界为了发行量，把日本当箭靶。普通日本人受此影响，大部分人也就把香港这次保钓运动当闹剧来看。

另外，不少传媒在分析港、台这次保钓运动时，无不扯上台湾岛内的“党争”以及香港民主派势力利用此次运动，扩大自身势力，使之在九七香港回归之后，仍能在香港占有一席之地之说；对后者已引起中国政府的警戒。

日本传媒暗藏的离间之心不能说不明显。日本传媒的鼓噪实在是肆无忌惮。

另据香港记者郑剑平自冲绳县石垣专电，日本时事社还错误地报道方裕源的谈话，有意制造事端：两天来透过照片与传媒“见面”的保钓号受伤成员方裕源，昨日首次面对面接受记者访问。胸前挂了黑纱的他表示对陈毓祥之死感到难过，并希望保钓行动不会影响中日人民的友好发展。

而据外电引述日本时事社的报道，竟说方裕源为他们跳海一事引起这么多麻烦而道歉，但是，方氏实际的原话是：令香港市民为保钓号的意外费神担心，他深感抱歉，特别是留医的病院因记者多日来的采访，他更过意不去。

他又说，他希望保钓行动不会影响中日人民友好的发展，但重申钓鱼岛为中国领土是不争的事实。

方氏的妹妹及友人和全球华人保钓大联盟成员郑镇炎一行，赶在台风吹袭前抵达石垣岛，随即陪同方氏召开记者招待会。

方裕源在记者会前嘱护士找块黑布让他挂在胸前，以示对陈毓祥的悼念。

精神饱满的方氏坐在轮椅上，由家人推入会场，并读出一段预先写好的谈话，但没有回答记者的问题。他说，自己差不多完全康复，明白应可出院返港，而医生亦认为他病况好转，本可搬到普通病房，但鉴于记者连日贴身采访，故让他继续留在治疗部。为证明他身体无恙，他离开会场时特地站起身，行出房间，还打趣说：“若非怕记者纠缠，他本可不用轮椅，自己行入会常”据路透社东京廿六电，香港“保钓号”上的陈毓祥在钓鱼岛海域遇溺丧生后，日本便陷入外交“泥淖”中。

东海大学的昭月望表示，“日本不能采取什么有效的外交步骤，去平息情绪激昂的抗议行动。”东京某大学的渡边绍夫说，不存在这一争端在最近的将来获得解决的前景。

政治分析家杜田说，这场领土争端升级至沸点，是因为日本方面缺乏外交的技巧。他说，“这个问题已把日本推入一场外交危机之中。”他警告，这场争端会进一步扩展，影响日本设在中国大陆、台湾及香港的公司。

保钓号总指挥陈毓祥在钓鱼岛水域溺死后，日本驻港总领事上田秀明在公开场合出现时，对于记者连珠炮般提出的问题，上田秀明拒绝回答，两手不断大力拨开记者。

上田秀明出席一个由在港日本社团主办的音乐节活动，这个音乐会在

尖沙咀文化中心举行。上田秀明的座驾抵达文化中心外，他甫下车，就有近二十名电台、电视和报章的记者即一涌而上，希望询问上田秀明对近日香港保钓运动的回应。不过，上田秀明没有回答记者的问题，边行边用双手推开记者的麦克风和录音机。虽然记者由文化中心外追访至中心内，但上田秀明一直板着脸，不断推开记者手上的麦克风和录音机。

上海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研究员、留日博士包承柯在香港报纸上发表笔锋犀利的文章，揭露日本右翼分子的罪恶目的称：最近以来日本多次在中国领土钓鱼岛上挑起事端。日本为何要选在此时此刻要跨出向中国挑衅的步骤呢？众所周知，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政策下，最近十几年内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相比之下日本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由于泡沫经济的破灭而经济迟迟未能真正启动。尽管日本竭尽全力继续维持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但是由于香港、韩国、东盟国家和中国的崛起，日本的影响正在相对缩小，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日本在亚洲经济地位的下调已是指日可待。这是自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中国第一次有机会能够超越日本。不能以正常方式同中国竞争，日本就用其他方法给中国的发展增加麻烦，一会儿说"中国社会不稳定，会发生动乱和分裂"，希望国外资金不要到中国去投资；一会儿又散布"中国军事威胁论"等等。但是这类观点已经没有多大市场，并被许多亚太地区国家所拒绝。

不仅如此，日本还多方为实施政府间援助计划设置障碍，以核试验为由反对向中国提供贷款；把五年一期的援助方式改为五年分为二期的方式，最近又提出要改为每年商讨一次。原定于在1996年夏季同中国商讨第四次对华援助，可是日程一拖再拖。现在它们又在定于九月下旬商讨对华援助之前，挑起"钓鱼岛事件"，妄想让中国为了获得援助而默认日本的霸道行径。

日本选择在此时此刻挑起"钓鱼岛事件"的国际争端，还有国内政治的需要。桥本内阁已经定于1996年十月初宣布解散众议院进行大选，制造事端为自民党营造有利气氛是日本政府敢于铤而走险的主要原因。自从1993年自民党发生分裂后，它在国会内的席位不及半数，为了渴求掌握政权不得不曲求于原来的政敌社会民主党，并同其建立联合政权。通过新的选举重掌昔日的权利是现任自民党总裁、内阁首相桥本龙太郎的当务之急。可是自从1996年以来，桥本政权登场以后政治和社会危机一波又一波。为掩盖国内危机，日本政府利用日本国内"民族复权"思潮和旧的军国主义的阴魂在"钓鱼岛事件"中大作文章，以便为自民党拉到右翼集团的选票而摆脱国内政治危机。

必须看到日本挑起"钓鱼岛事件"是其实现长远战略目标的一个步骤。最近几年日本政治舆论中出现了新的以保守主义为基础的国家复兴主义思潮，这一思潮逐渐成为日本政治的主流。日本的新保守主义不同于旧保守主义。旧保守主义是强调实现日本经济的复兴，而新保守主义则是强调日本的"政治复权"。具体的说新保守主义是要修改战后宪法、彻底摆脱日本在二战失败后笼罩着的阴影、否认过去侵略中国和亚洲的罪行、否定东京审判的结果、删除联合国宪章内的敌对国条款、参加联合国维和活动以便否定联合国宪章对战败国的限制、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让美军从亚太第一线退出（如美军从冲绳撤出，退居横滨），让日本自卫队取而代之、确立日本在亚太地区凌驾它国而与美国抗衡的地位。

日本战败刚刚过了五十年的历史，它就在民族复权主义的促使下迫不

及待地挑起事端，再次成为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不稳定因素，日本需要知道的是，它要推行其扩张主义的战略目标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它越是蛮横霸道它付出的代价就越大，如果日本已经忘记51年前所付出的代价、忘记了"战败痛苦"和"东京审判"，那么世人就应该让它回忆起那段不应该忘记的教训！

三、中国对日采取强硬态度

1996年9月2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对前往钓鱼岛附近海域抗议日方近来连续侵犯中国主权而不幸遇难的香港同胞表示哀悼。

沈国放说，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它们同台湾一样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最近，由于日方在钓鱼岛问题上连续挑起事端，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理所当然地激起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并以不同方式表达义愤心情，有的香港同胞甚至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对不幸遇难的香港同胞表示哀悼，并向其家属表示慰问。

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9月26日再次严正重申；中国政府和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捍卫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捍卫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意志是坚定不移的。沈国放是在获知陈毓祥在钓鱼岛海域遇难后，向记者作上述表示的。

沈国放在回答记者有关中日外长会晤情况的提问时表示，"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晤，双方着重就当前的中国关系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沈国放介绍说，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重申了中国政府对日本的政策，并就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严正地阐明了中方的原则立场，敦促日方认真对待并且妥善地处理这些问题。对此，日本外相池田田彦表示日本政府十分重视对华关系，将继续坚持中日联合声明以及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的原则和精神，致力于发展中日关系，正视并深刻反省过去的侵略历史，不允许日本右翼团体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行动。

因此，沈国放表示中国政府要求日方言行一致，以实际行动来实践上述承诺，消除由于日本左翼势力在钓鱼岛问题上制造事端所带来的恶劣影响，为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迈出实际的步伐。

国务院港澳办也致电陈毓祥先生亲属，对陈毓祥先生在捍卫祖国领土完整的行动中不幸遇难表示深切哀悼。唁电全文如下。

陈毓祥先生亲属：惊悉陈毓祥先生在捍卫祖国领土完整的行动中不幸遇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表示深切哀悼，并向你们表示慰问。陈毓祥先生生前爱国爱港，为香港回归祖国做了许多积极而有意义的工作。我们希望香港市民能化悲痛为力量，共同为实现香港的平稳过渡而努力。

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也表示致哀，多位副社长一起出动，慰问陈氏遗属。

周南赞扬陈毓祥爱国爱港，多年来对香港贡献良多：尊敬的陈毓祥夫人及亲属：惊悉陈毓祥先生于9月26日上午在我钓鱼岛海域溺水遇难，经

多方抢救无效，不幸逝世！噩耗传来，本人深感悲痛。

陈先生自70年代即参加保钓行动；20多年来陈先生长期坚持爱国爱港立场，服务香港社会，积极进取，建树良多。

在香港回归祖国的过渡期间，陈先生倡导留港建港，以实际行动表示对香港回归的支持和对前景的信心。自1995年初陈先生应聘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地区事务顾问以来，又为香港的平稳过渡和保持繁荣稳定，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方期陈先生继续发挥所长，为祖国为香港多作贡献，不幸却遭此突变，英年早逝，哀伤莫名！

在这悲痛的时刻，请允许我以我个人的名义，并代表新华社香港分社，对陈毓祥先生的逝世表示深切的悼念，对夫人及其亲属表示亲切的慰问，并乞节哀保重！

他们赞扬陈毓祥长期坚持爱国爱港立场，为祖国为香港作出了很多工作。他们强调，钓鱼岛是中国领土，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和决心是不可动摇的。

郑国雄副社长出席香港华人革新协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七周年联欢聚餐时，对陈毓祥的不幸遇难表示深切哀悼，并向其家属亲友表示亲切的慰问。他赞扬陈毓祥长其坚持爱国爱港的立场，为香港回归，祖国建设及加强两地沟通等各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说，对他的不幸逝世，我们非常惋惜。

郑国雄强调，对钓鱼岛主权问题，中国政府的立场一贯坚定、明确，并将继续与日本政府交涉，重申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对于日本右翼分子在钓鱼岛的举动，希望日本政府能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行制止。

秦文俊副社长昨晚出席中华厂商会国庆酒会时表示，对陈毓祥先生在保钓过程中不幸遇难感到非常沉痛。秦文俊对陈毓祥的不幸逝世表示哀悼，并向他的家属、亲友表示亲切的问候。

秦文俊指出，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件，日本政府应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中国人民维护自己国家主权的决心是绝对不会动摇的。他说，现在应该是日本政府采取实际行动的时候，应该立即停止侵犯中国主权的活动，同时，要确实保证今后不要再挑起任何事端。

张浚生副社长出席新华分社新界办国庆酒会时说，对于陈毓祥先生的不幸逝世，我们感到很难过，周南社长已经给他的家属发了唁电。他说，我们一直关注他们整个的行动，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大家都感到很难过。

张浚生说，在早上十一时，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知道他们已经发生了意外，当时周南社长与我们几位副社长商量后很快就发出一个紧急呼吁，希望距离“保钓号”船最近的船只，不管这些船只属于哪个国家或地区，都能够伸出援手加以抢救，非常不幸已无法做到，我们感到非常难过。

张浚生说，我们一直关注他们整个的行动，现在发生这样的事情，大家都很悲伤。张浚生赞扬陈毓祥长期坚持爱国爱港立场，做了很多有益工作。他说，自己与陈毓祥先生有十一年的交往，对陈毓祥的不幸逝世实在感到很痛惜。同时他对日本政府纵容右翼势力滋事，以致出现这事件感到愤慨！

有记者问及如何评价日本海上防卫厅派出直升机前往帮助“保钓号”船遇难人士时，张浚生说，遇到海上发生事故的事，任何国家或地区的船只都应伸出援手，这是人道主义，这是他们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

朱育诚副社长出席香港会计界国庆酒会时强调，中国政府在钓鱼岛的

主权问题是寸土必争，绝不动摇，中国政府是希望能够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争议。这一立场钱副总理在联合国与日本外相会谈的时候已明确表达。朱育诚说，对港、澳、台同胞目前的保钓行动是很理解的。

朱育诚说，陈毓祥是我们的老朋友，也是香港一位著名的保钓运动组织者，对他的不幸去世，我们感到痛惜。

据香港报纸报道，结束出差回到北京的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召集人童增表示，日本要对全球华人保钓大联盟召集人陈毓祥之死负上全部责任；他又说，原订下月五日与港台人士同时出发到钓鱼岛抗议的计划，极可能要搁置，对此，他感到非常遗憾。

童增表示，有关陈毓祥死亡的消息，他在甘肃期间，已经从当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中得悉，他当时感到非常震惊及沉痛。他认为日本要对陈毓祥之死负全部责任，不过单靠民间保钓力量去捍卫钓鱼岛主权是不足够的，中国保钓活动都应该注意安全，以免发生悲剧。

童增认为，陈毓祥不幸死亡不会动摇中国民间保钓力量。

他说：“我要献上生命，我们再遇到更大的困难也不会后退。”中国驻日大使徐敦信认为，对日本右翼分子挑起的主权纠纷，中国不能坐视，他呼吁日本方面“言行一致”，回到中日共同声明和友好条约的立场上来。旅日华侨则表示，坚决支持中国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并将密切注意日方的动向。

徐敦信应邀分别出席东京、横滨华侨举行的国庆酒会，在谈到中日关系时说了上述这番话。

徐敦信说：“中国政府一向十分重视发展同日本的睦邻友好关系。邦交正常化二十四年以来，两国关系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围绕着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出现了一系列中方所不愿意看到的有碍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态势。对这种状况中国政府当然不能坐视，最近两国外长在纽约会晤，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就有关问题全面地阐述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日方也就有关问题作出了承诺和说明。中方希望日本方面言行一致，真正地回到中日共同声明和中日友好条约立场上来，妥善地解决有关问题。”东京华侨总会会长江洋龙说，这段时间中日之间再次出现日方侵犯中国领土钓鱼岛的问题。钓鱼岛从明朝初期的十五世纪起就归入中国版图，并有文字记载。钓鱼岛自古以来是中国固有领土，已是不争的事实。

他说，中日两国在实现恢复关系正常时，双方就从两国关系大局出发，就此问题搁置解决达成谅解。但是，最近日方单方面在钓鱼岛挑起事端，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理所当然地引起包括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也是旅日华侨所不能容忍的。

江洋龙说，日本方面在此问题上的一举一动，事关未来中日关系大局，旅日华侨支持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并将密切注视日方的今后行动。

A 隆重的追悼大会 9月29日晚，香港各界3万人在维园举行盛大的追悼大会，大会强烈要求日本政府：（一）立即撤出中国领土钓鱼岛，承认钓鱼岛是中国领土。

（二）就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人民作出公开道歉，并赔偿民间所有损失。

（三）深切反省侵略的教训，警惕军国主义复辟，停止军备扩张。

（四）日本政府官员，停止参拜日本战犯，以免伤害中国和亚洲人民

的感情。

A 香港六团体发表《团结保钓共同宣言》陈毓祥烈士为了捍卫祖国领土完整，为了维护民族尊严，在中国领土钓鱼岛海域，献出宝贵的生命。全世界华人，不分政治取向，对陈毓祥烈士同声哀悼，同感钦佩！

“保钓尚未成功，全球华人仍须努力！”为了继承陈毓祥烈士遗志，将“保钓”行动进行到底，香港各个保钓团体，谨在此誓言：“爱国不分先后，保土不分左中右。”保卫钓鱼岛，是全体中国人的神圣使命。我们一定“求大同，存小异”，抛开党派背景，不管政权认同歧见，凡是中国人，皆守土有责。在“保钓”大目标上，万众一心，团结一致，互相支援，默契配合，把海内外中国人的力量集中起来，前赴后继，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陈毓祥烈士一生追求中国的和平统一，繁荣富强。他的牺牲引起两岸三地的关注。在此，我们强烈要求两岸当局携手合作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共商保钓守土大计。当务之急，是要向日本政府声明钓鱼岛海域是中国领海，日本政府必须立刻停止在钓鱼岛水域非法的海空巡逻，停止对中国船只的非法拦截，制止日本右翼团体的非法活动！ 仓瓜棖沂可 鞍 邦 粤 晒劬 邱O楸凶且桓龉 蚀螻际校 诒5魴卸 校 颐且欢 3擲囷浴 渚病 簿坎呷裕 岢*“和平，非暴力”原则，维护香港的繁荣安定。

保钓鱼岛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任重而道远”。只要我们坚持不懈，总有一天，中国国旗一定会在钓鱼岛上，高高气扬！

继承陈毓祥烈士遗志！

团结就是力量！

保卫钓鱼岛！

全球华人保钓大联盟香港各界保卫钓鱼岛联盟教育界保钓联席会议保钓行动委员会香港各界保钓联委会保卫钓鱼岛联合行动 A 六团体到日领事馆抗议据香港报纸报道，“保钓号”总指挥陈毓祥遇溺丧生，进一步激起港人对日本侵占钓鱼岛的愤怒。香港6个团体、约一百多市民相继到日本驻港总领事馆抗议，要求日本撤出钓鱼岛；更有团体指日本要为陈毓祥的死亡负责。

日本总领事馆所在地交易广场加强了保安。除护卫外，警方派出5名军装警员戒备，并沿途跟随抗议者，直至他们离开现常20多名港大保钓联线学生在日本驻港总领事馆外通宵静坐12小时后，向领事馆递交2000多名师生联署声明，谓要用和平方法解决钓鱼岛。

他们表示，行动是针对日本军国主义者，而不是所有日本人。

抗议者又用不同方式宣泄对日本的不满，例如践踏日本国旗、将用日本军旗包裹的萝卜踏烂。适值那天是中秋节，民主党10名市政局议员以这个中国人爱与家人团聚的节日，将钓鱼岛喻作中国的孩子，愤然表示这“孩子”不知何时才能回到“母亲”怀中。

抗议者高呼打倒日本军国主义，将抗议信和上书“中秋彩灯，保钓示威”的传统中国灯笼交给领事馆代表，但日方代表坚决不接受四个保钓灯笼，亦不回答记者问题，在接过抗议信件后随即返回领事馆内。民主党发言人透露，该党打算发动各支部用“车轮”方式不停地到日本总领事馆抗议。

另外，香港崇正总会呼吁全球华人电视台停播日本节目和卡通片。

A 陈毓祥其人其事香港报纸广泛报道陈毓祥的生平事迹。

陈毓祥，1950年生于广东汕头市，潮阳人士。已婚，育有一子一女。

陈毓祥小学就读于北角堡垒山官立小学，因成绩突出考取英皇书院，1975年获香港大学社会科学荣誉学士，1980年获中文大学分院哲学硕士学位，后又获英国多个文凭。

70年代初开始，陈毓祥先后做过电台时事评论员及中学教师，先后做过节目主持人、编导、监制、电视部副总监，后又做过快报执行董事，1992年成立顾问公司并任唯美物业代理公司总经理。

陈毓祥热心社会活动并积极参与。1985年，他当选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从而开始了他的社会活动生涯，十多年来，他曾参与、倡导过多项活动，包括推广礼貌、港人建港、公民教育、青年协会等。

陈毓祥不仅积极参与香港事务、社会活动，为香港平稳过渡积极贡献力量，而且热情参与向香港推介内地情况的活动，表现了爱国爱港的精神。为此，他获委内地多个省市的有关团体的职务，并获选深圳市政协委员，1995年荣获新华社香港分社委任香港地区事务顾问。

陈毓祥早在70年代便积极参加保钓运动，1971年更任香港学联保钓运动中学生组组长，积极参加当年保钓大行动。

陈毓祥去世前为"全球华人保钓大联盟"召集人。

A 投身保钓26年身先士卒钓鱼岛可说是陈毓祥心头的一条刺！26年前，陈毓祥由一个黄海毛小子大学生投身保钓，到今天再以45岁的"老保钓"身份身先士卒，最后更为钓鱼岛牺牲。难怪较早时他回顾相隔四分之一世纪的两番保钓运动情况时，也只能叹一句：造物弄人！

A 浑号"保钓仔"若以学业成绩论人，陈毓祥可说从来都是人上人。8岁时随父亲来港后，陈入读北角堡垒山官立小学，升中试全港考第45名，以小学会考精英身分派进英皇书院就读，并获政府5年免费奖学金，7年考入香港大学，他的保钓与学生运动亦同告展开。

"保钓仔"、"长毛飞"是当时保钓学生的浑号，但陈毓祥才不理，他1971年上街参加保钓游行，被警察打得头破血流。

1972年，美国将钓鱼岛错还给日本，他又与三千名香港学生上街示威，这次没有警棍了，陈毓祥带领群众放声高唱保钓歌。

除了保钓，陈毓祥也是学生运动的中坚人物。1973年选上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1974年至1975年连任两届学联会长，为此停学两年，并制订"放眼世界、认识祖国、关心社会、争取同学权益"的学运路线。

在他当亚洲学生协会副秘书长期间，陈更曾因协助菲律宾的学生反抗马可科斯统治，偷运药物补给他们而险被菲律宾军方逮捕。

一位学运人士忆述，70年代陈毓祥是学界领袖，受到港英政府打击。1973年，前警司葛柏畏罪潜逃，学界在摩士公园举行集会，要求港府引渡葛柏返港受审。港府后来根据大专学界领袖名单，指控陈毓祥，不过，陈当日并没有带头搞该集会。

对陈毓祥说，最难忘和满意的学运事件反而是1975年发生的"崇真中学校长开除教师事件"。回顾70年代的学运，陈认为那时的学运虽有盲从、过"左"及教条的毛病，但仍不应否定同学们的真诚。

虽然全情投入学运与保钓，却未有阻碍陈毓祥学术上的长进。除了同期完成社会科学学士及教育文凭课程，并曾留任港大当任教，1978至1990年间，他先后获授传播、政治及管理文凭。最后他选定了传媒一途，正式投入社会。

佳艺电视台是他踏足传媒的第一步，而1981年后的十年，他都献身港台，担任时事节目的评论及主持。亦在此际，他揭开了人生另一页：结婚生子，并欲弃麦克风从政。

1991年，立法局首次引入地区直选，陈毓祥的参政路也以此为起点。然而，他刚起步便因其政治操守而受挫，导致他三次参加议会选举皆败北。

陈毓祥1991年辞去香港电台的工作，参加立法局“港岛西”直选，六人角逐两个议席，结果，他得其次于港同盟（民主党前身）的杨森及黄海震遐，第一次落眩该竞选期间，持身分证明书（C.I）的陈毓祥声言留港建港，不要居英权。

落选后，他为表决心留港建港，成立“建港社”，但这组织多年来并不活跃。

1995年，他再接再厉，参选市政局（中区）直选及立法局新功能组别选举，又再次成为民主党候选人的手下败将。

他并未因此放弃其参政意欲，他获中方委任为区事顾问后，与另外一些区顾问成立“台湾研究会”，先后访问北京和台湾，在两岸建立关系。他参加这次保钓行动前，报名循劳工、基层界别参加推选委员会选举，不料选举未开始他便去世。

A“保钓”别忘陈毓祥精神香港《文汇报》9月29日发表肖草的文章提出陈毓祥精神：陈毓祥为保钓运动而殉难的噩耗传来，顿时令笔者忍不住流下热泪，继续摇动笔杆前，谨此向陈毓祥和他的家人，所有支持保钓运动的人士，致以万分之敬意。

陈毓祥不幸遇溺逝世，但是笔者确信，陈毓祥精神--即不怕艰辛、排除万难的“保钓”精神，将是永垂不朽的。陈毓祥的生气事绩，传媒已介绍清楚，笔者无意画蛇添足，但是陈毓祥所表现的香港人爱国精神，笔者则欲在此写些我所见、所闻和所思的往事。

笔者较陈毓祥年长几岁，而且在70年代的“保钓”行动，是最先由美国的香港留学生发起，留美华裔学生和知识分子当时搞“保钓”的目标，以笔者亲身体会所得是纯粹的捍卫中国领土主权，抗议日本侵略的同时，亦直接针对美国政府将钓鱼岛私相授受予日本政府。不过，“保钓”热浪由美国传到香港后，却刺激了大批本地大专学生的政治觉醒，“保钓”运动也渗入了强烈的反殖民地统治和“认同中国”的意识，尤其是有位洋名威利的英籍警司，曾手执警棒冲入维园，见示威学生便挥棒击打，即时引起公愤，当时被打得血流披面的，除了陈毓祥外，尚有笔者一些同校同学，其中有人还是今天“全球华人保钓大联盟”的成员。陈毓祥做港大学生会长的时代，正是香港青年提出要所谓“反思”的新时代，他们提出“认识社会、关心中国”的口号，他们出版的刊物所倡导的思想，相当进步，甚而可以说是十分“前卫”，港大当时由学生会组织的“国事学会”，就发表了很多对新中国的正确评论和正面评价。陈毓祥在学界虽然有人叫他做所谓“国粹派”领袖，在港英眼中，他们的政治定位，跟一般“左仔”无异。

在美国搞保钓的学运分子，其际遇也好不了多少。美中央情报局视他们是与社会主义国家有关系的职业学生，甚或当他们是共产党人。由此可见，在70年代搞“钓运”的留美知识界和香港那班“政治觉醒”的番书仔，启动机只出于对祖国的热爱，而是丝毫没有任何历史背景成长的香港青年。今天的

国际形势跟25年前不同，中国社会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香港人要表现爱国，亦不一定非要用“保钓”来显示不可，陈毓祥的爱国情操，笔者绝不怀疑；陈毓祥的“誓死保钓”勇气也值得敬佩，但是陈毓祥过于坚持“不到黄海河心不死”的原则，就似乎犯了“固执己见”的大忌。事情既然发生了，任何人都无必要做事后孔明，陈毓祥的牺牲，事实上因为保土卫国而起，陈毓祥魂断钓鱼岛海域，但是陈毓祥为捍卫民族尊严、领土主权的陈毓祥精神，应该让下一代缅怀，70年代笔者在美国曾高喊：“紧记住5·15，保卫钓鱼岛”，今天我们将永远铭记：“保卫钓鱼岛，别忘陈毓祥。”日本右翼果然不就此止步，又企图把“实现首相和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和”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写进日本自由民主党众议院选举公约。对这个错误决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1996年10月3日向记者表示：“我们对日本自民党做出上述错误决定表示强烈愤慨。”他说，众所周知，靖国神社里祭祀着东条英机等军国主义头目的亡灵。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和人民历来坚决反对日本首相及政府领导人前往参拜。1996年以来，由于日方接连在历史问题上采取错误的行动，严重伤害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之害的各国人民的感情。日本自民党此次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举措，势必再次激起亚洲邻国人民的愤慨和谴责。希望日本真正反省过去那段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各国人民，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他还重申，关于钓鱼岛问题，中方的立场是明确和坚定的，日方任何行为都丝毫不能动摇中国对钓鱼岛拥有主权的决心和意志。

第九章南京大屠杀绝非虚构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期间血腥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之一，一次竟屠杀我南京同胞30万人之多，其残暴行为举世罕见，遭到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同声严厉谴责。

对铁证如山的南京大惨案，日本右翼势力一直矢口否认，企图为其翻案：日本作家铃木明等人的“虚构论”、田中正明的《“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和日本文部大臣藤尾正行的“别国不能说三道四”等等，蓄谋为日本侵略军屠杀南京人民的事实进行翻案！

一、受害者的控诉——据查证，日本侵略者在南京仅零散屠杀中国军民案达858起，被屠杀者达15万人以上，光就尸体掩埋就进行了数月之久。……早在70年代初，日本作家铃木明等人就胡说南京大屠杀缺乏“真正的资料”，纯属“虚构”；1982年日本文部省审定中小学教材时，又企图把南京大屠杀抹去；1984年，松井石根的秘书、拓殖大学讲师田中正明写出一本名为《“南京大屠杀”之虚构》的书，竭力歪曲事实，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他带头发表文章、举行座谈、出版书籍，大造舆论，蓄谋为日本侵略军屠杀南京人民的事实翻案。

1986年，日本文部大臣藤尾正行更是猖狂，他举行记者招待会，在《官界》、《文艺春秋》杂志上发表文章，叫嚷什么“强调南京大屠杀是日本进行侵略的最典型、最惨无人道的事件，从逻辑上讲是不妥当的”，“别国

不能说三道四”，非要篡改日本侵略南京的这一段历史不可。

但历史绝不是少数日本右翼分子所能篡改的，请听听中国人民的控诉吧！

参加过南京保卫战的国民党军队营长郭骑兵败后在南京险些丧生，他以亲身经历控诉说：日军在南京难民区里的屠杀，是空前绝后、惨厉无比的。

在难民区里日军的枪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而每一次枪声都使30余万难民闪过一阵战栗，又是一位中国同胞饮弹身亡了。下一个该轮到谁呢？会不会就是他自己？因为，日本军方有着严酷之极的规定，在日军成群结队，川流不息搜查难民区的那一段时期，挤在难民区里的30余万中国人，他们所住的房屋，大门必须敞开，以便日军自由出入，滥施杀戮。倘若有些胆子大些的难民，不甘坐以待毙，等着灭绝人性的日军前来屠戮，鼓起勇气跑到街上去，那么，随时随地都可能和遍城搜索的日军猝然相逢。

A 检查过头--杀！

在马路上碰到日军，那更是动辄得咎，无从逃生。我曾亲眼目击，在马路一角连续演出的几出悲剧。时值严冬，朔风怒号，有一位老者将两只手都掖进衣袖里，抄起双手埋头疾走，突然闯上了一队日本兵，其中的一名日军举起枪来，瞄准就放，但听砰的一响，老者就地痞倒，浑然无知地一命归阴。事后方始听人提起，日军一见抄起手走路的中国人立即格杀，因为他们害怕衣袖中藏有炸弹！

又有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许是在大屠杀的窒息空气下，躲在屋子里气都透不过来，冒险外出吸口新鲜空气，也许是真有什么急事赶着去办，他正在我见的马路一角走着，蓦地听见了日军整队而来的嚓嚓脚步声，他很有警觉，扭回头来就跑，一定是心想躲过这一关就好了，谁料为时已迟，有一名日军跑步向前，举枪便射，小伙子就此倒卧于血泊之中。

事后方知，骤然遇见了日本兵绝不可以拔脚逃跑，因为，日本兵认定了，见到他们就跑开的，准是匿身难民区的守城官兵。

既不能抄起手缓缓而行，也不能甩开手转身奔跑，试问，叫南京难民区里的30余万中国人，怎么样上街，过马路呢？唯一够幸运的步行者，也许是那些猝遇日军，按照“正常”方式接受他们检查的中国同胞。可是，问题在于，他们也有九九八十一道难关，必有一关无法通过。日军的检查手续既严密又彻底，加诸每一个中国人，他们照例要从头“摸”到脚，从外“摸”到里决不轻易放过你身上的任何一个部位。中国人要能通过日军的检查，首先得经过下列五道关口。

一、洗劫--身上的钞票、钢笔、手表、铜板、皮夹、皮带，每一样稍微能值两文的东西，都会先被日军抢去--日军不愿当众在尸体身上搜劫。

二、摸头--由于战时我军多半剃光头，所以日军检查的第二步是“摸头”，摸摸看有没有蓄发？蓄得够不够长，否则，就地枪决。

三、验额--验出来像头上有钢盔印子的，必是我军，一样当场处死。

四、瞄腰--脱下裤子来瞄一眼，但凡腰上有系过皮带的痕迹者，日军一律认作我军，手一挥，拉过去，执行死刑。

五、看手--命中国人把双手张开来细细验看，如果有右手持过枪的老茧，那就毫无疑问是军人了，也是当下处决，毫不容情的。

万一有天大的幸运者，幸能逃过了这上列的五道关口，也休想就此逃出鬼门关，由日本兵挥之使去。因为在上列五项检查通过以后，还有更可怕

的一关，详加盘诘，不烦其详。而盘诘的过程通常都是日兵和被盘诘者的一问一答：问：“你是不是华军？”答：“不是。”问：“那么，你是警察？”答：“是的，我以前干过警察。”至此，又是一条中国人命无辜丧生了，那位警察直到临死才知道，日本兵见了中国警察也要杀。

以此类推，当日本兵问到：“你是宪兵？”答声：“是。”--杀！“你是学生？”--是。

“--杀！”你是教员？”--“是。”--杀！“你是公务员？”--“是。”--“哈！做官的，杀！”“那你是干什么的呢？”--被检查者迫不得已地回答：“我是做工的。”“我是做生意的。”“我是种田的。”--这一下是否能够幸免于难呢？日本兵的“判决”更妙了，“哈哈，你是壮丁！”其结果呢？又是杀杀杀！

A 一见武器统统枪毙这就是日军搜查难民区的真正目的，他们的屠杀对象决非独在我军，而是见人就杀，至于检查与盘诘，那更是大屠杀残酷手段之一项，就好比捕捉到了老鼠，先把它在两爪之间盘弄一番。

中国人不懂日本话，会说中国话的日本兵毕竟有限，双方语言不通，词难达意，往往一字一语之错讹，便是一条人命。我想，古今中外，再也不会会有这种荒谬绝伦的就地“审判”，就地处决了吧？在日军搜查难民区的那一段惨无人道、大恐怖、大劫难的日子里，30余万苦难的中国同胞，成为了奄奄一息、引颈待戮的无罪羔羊。出门上街，十中有九是死路一条，从此一去不回。没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壮烈激昂意味，反倒充满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不尽悲怆。那么，躲在家里惊悚自危的人，境遇又是怎么样呢？前文说过，日军便于他们自由出入，随时搜查，规定难民区里所有的房屋，一律不准关上大门。但是，也有若干难民，根本就不晓得日本军方有此规定，同时，又有一些中国人实在是太害怕了，大门敞开，那扇大门便常日危机四伏，无论那一分秒都可能有凶神恶煞进来，抢掠财物，奸淫妻女，或烧或杀，或者是拿起一根绳子，捆了就走。于是，就有些人基于自卫的本能，偷偷地把大门关上。

关起大门来的中国难民，倘若闯上了日本兵，而又被他们发现，那就立刻会有大祸临头了，单薄的门板抵挡不了日军的皮靴和枪托，一顿猛砸，夹着破口大骂，等到大门一被砸开，恶狠狠的日本兵冲了进来，遇物即抢，见人就杀。一转眼间便是血腥皮靴鼻，尸骸狼藉，而罹难者却仅只在为获得一个短暂时间的心理安全保障，其结果是付出了更惨重的代价。在陷落后的南京城，我们的同胞，根本就没有关上大门的自由。

一队接一队的日本兵，在家家户户大门洞开的难民区里，挨家挨户地搜，挨家挨户地奸，挨家挨户地抢，挨家挨户地杀。12月13日南京城陷，全市市民大多数都逃进了难民区，屋少人多，大家都将就些挤一挤。因此，往往在一个大院落里挤了几十上百个人。日本兵只要在任何一個院落里搜到一件武器，那就不分青红皂白，全院的人统统枪毙。

就在我住处不远的一个大院子里，经过日本兵三番四次地搜查，始终没有搜出一件军用品来。全院子里的人正在额手称庆，以为自己逃过了死神的召唤。突然起来的，日本兵硬说他们在大院子外头找到了一件军衣。于是，人人脸色大变，噩运迅即来临，整个院子里的人给日本兵杀了一半。遭透了的是，剩下的那一半全是女人，不用说，她们的遭遇比死者更惨。

又是一幕为我所目击的悲惨故事，但那罹难的一群，我依然要说他们是最幸运的。由于整个腥风血雨的大屠杀、大搜查已近尾声，日本兵也稍稍

地有些收敛。我记得很清楚，那一个大院落是南京市北平路34号，里面住了好几十位难民。

一队日军开到了那一幢院落，扬长直入，遍地搜查。他们面目狰狞，来势汹汹，以致大人们吓得面如土色、魂不附体，小孩子一个个地放声大哭，双手捂面，直往父母的怀里钻。

日本兵从前庭搜到后庭，从楼下搜到楼上。老天保佑，不曾搜出一件军用皮靴，但在搜查的同时，却难免照例进行他们的“顺手牵羊”，见到值钱些又能带得走的东西，拿了就走。

A 湖泊池塘死尸淤积本文以上所记的真实故事，只能说是日军在难民区进行大搜查中的零星阶段，因为这一次大搜查，亦即大杀，前后约有两个星期。在这十来天之中，根据我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1947年度审字第1号判决书，亦即南京大屠杀案主犯谷寿夫判词所载的事实一项，即曾明确指出：“……查屠杀最惨厉之时期，厥为1937年12月12日至同月21日，亦即在谷寿夫部队驻京之期间内。计于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19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尸体经慈善机关掩埋者15万余具。被害总数达30万人以上，尸横遍野，惨绝人寰！……”笔者在此谨愿补记日军大搜查、大屠杀中笔者之亲见目睹，以便读者了然日军手段之毒辣，秉性之残暴。据笔者目击，在历时两周的大屠杀后，南京城里城外，星罗棋布，大小不一的湖泊池塘，几乎没有一个其中不见尸骸的。有的是全部都堆满了，有的则沉尸浮出，遍布水面，最令人切齿痛恨，终生难忘的是，积尸死状之惨，着实令人难以想像。

诚如前文引述的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书中所载：“查屠杀最惨厉之时期，厥为1937年12月12日至同月21日。……”，1937年阳历12月12日是阴历十一月十日，自兹而后，正是南京冰天雪地，三冬苦寒的时期，30万具尸体受到天然的冷藏，烂不掉也腐不了，仿佛上苍在展示日本人的罪证。

堆积或浮泛在湖泊池塘里的我国死难军民尸体，有的咬牙切齿，有的死不瞑目，有的血肉模糊，有的断腿剖腹。他们在湖泊池塘里，头抵着头，肩并着肩，男女老幼，混杂一处。

凡此都是日本军队集体屠杀后所映现的惨厉镜头。而日本军队在大搜查中，所押解出城，押到玄武湖之滨，用机枪滥施扫射，屠戮无遗的我国军民，为数即达8千余人。

A 三寸金莲颤立树桩在大屠杀中，远在南京城郊乡野，也曾演出了不计其数的惨剧。有一天，一小队日军奉令开拔，就在临走之前，他们搜到了一个走不动的老太婆。

这位老太婆为什么走不动，那是因为她年龄已经60多岁，其又是自幼缠足，裹成了一双三寸金莲。论年纪，这一个日军小队，自长官至士兵，全都可以当她的儿孙。然而这一小队日军却全无敬老的观念，好像他们全都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日本兵存心要开那位老太婆的玩笑，强迫弱不禁风的她“表演”一个精彩的特技节目，他们把那位老太婆押解到村外，村外有几棵树，他们拣了其中之一，用上钢锯，合力锯掉了大树的三分之二，仅留三分之一。

在那棵大树的三分之一残留处，因而也就有了一截树桩。

树桩的直径不过5寸，但是距离地面却有1丈有余。60多岁的老太婆被一群日本兵抱到大树上去，以三寸金莲支持她的体重，直到颤巍巍的东倒西歪，于是这一小队日本兵，人人鼓掌大笑。

60多岁的老太婆自从被日本鬼子兵逮着，早已吓得灵魂出窍，再任由他们抱高挪低地摆弄，寒风呼号，全身冻僵，三寸金莲愈发无法支持她的体重，她一个筋斗倒栽下来，直摔得头破血流，引起了日本兵的一阵哄笑，可恨的是，笑过以后他们仍然不肯放她一条生路，又一次把她抱到树干上去。

一次又一次地摔倒，老太婆毕竟体弱年高，她一连摔下来3次，她终于一命呜呼了。

那一支日军小队，便在哈哈大笑中开拔。

又有一回，一批日本兵进入了南京郊外的一个小村。他们满村搜查，村里的人全逃光了，找来找去，仅只找到一名老翁。

于是那一群日本兵将老翁团团围住，原形毕露，情急万分地说：“花姑娘，大大的有？”老翁沉下脸来答道：“没有！没有就是没有！”日本兵发了急，使劲掴了老翁一记耳光。老翁从嘴角边涔涔滴血，但他仍厉声喝道：“禽兽，畜生！”日本兵晓得老翁是断然不会替他们去找“花姑娘”的了，恼羞成怒，便什么也不顾。由一名日军领头，将那位老翁用绳索绑起，自两腋间拽成一线，直吊起来，然后声势汹汹地再问：“花姑娘，大大的有？”可是老翁坚贞不屈，他已经不屑于回答。

日本兵真的发了火，由一名军曹一声令下，把绑牢老翁的绳索末端抛到大树上去，绕着树干绕一个圈。顶端吊牢了，那帮日本兵开始欢呼喝采，眼看着老翁给悬空吊了起来。

受害者之一伍长德，以亲身经历揭露了日军在汉中门外屠杀中国军民1,000余人的暴行：民国26年12月15日，中岛部队在南京难民区司法院无故查出军警百姓2,000余名，用机枪12架将我等押送汉中门里，每一行列分别用绳捆绑圈住，赶至城外用机枪扫射，已死者及受伤未死者被日军用木柴、汽油焚烧之。同时本人业已带伤脱逃。《日中战争史资料》第八卷《南京事件》，第37页，日本河出书房新社，1973年11月版）又据中国军事法庭查证，日本侵略者在南京零散屠杀中国军民共858案，被屠杀者达15万人以上，尸体掩埋工作进行了数月之久，证人有1,200多名。据担任掩埋尸体的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统计，掩埋尸体43,071具；南京崇善堂掩埋尸体112,226具。受害者姜根福以亲身经历控诉了日本侵略者使他家破人亡的暴行：日本侵略者进城时，我七岁，全家有父母、兄姊共八人。我家因为没有钱，所以没有逃掉。一天，日寇发现了我的母亲，企图奸污。我母亲竭力反抗，灭绝人性的日寇，竟然从母亲怀中夺下小弟弟活活摔死。母亲哭着扑向小弟，日寇开枪把母亲打死。两天后日寇又将我的父亲抓走，一直杳无音信。又过了两天，日寇看见我11岁的二姐，竟要奸污她。二姐连骂带踢与鬼子扑打，鬼子恼羞成怒，抽出军刀将二姐从头劈为两半。……

二、侵华日军的自供

——日本报纸为了夸耀"战绩"而刊登了大量参加大屠杀的官兵们写下的日记、手记和拍摄杀害中国人，污辱中国妇女的照片，这再一次无情地记录下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

中国日本问题专家驳斥日本右翼分子的谬论称：南京大屠杀发生后，日本侵略者费尽心机掩饰暴行，然而日本报纸为了夸耀"战绩"而刊登的消息，参加大屠杀的官兵们写下的日记、手记，他们自己拍摄的杀害中国人、污辱中国妇女的照片，无情地记录下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特别是最近几年，一批极有价值的资料在日本各地陆续发现。这些证据是田中正明想推翻南京大屠杀事实的一大障碍。

当年参加攻占南京的日军士兵外贺关次，在他的日记中是这样记述日本侵略者残酷屠杀中国居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的：1937年12月13日。33联队一个大队转入攻击。一面接近举着白皮的敌军，一面继续射击……途中遇到二、三十名中国士兵，都枪杀或刺死了。

……南京南门车站，工兵队的小伙子们刺死了70多个中国士兵。城外敌人尸体很多，其中还有痛苦呻吟的，他们就给他补上一刺刀，送他上西天。

1937年12月15日。太平门城门口堆着500多具中国士兵的尸体，全部是被杀死的。

1937年12月17日。有中国人从距离宿营地约500米的房子走出，开枪把他们打死了。也许是良民，但是目前情况下，是不能让他们跑了的。

1938年1月24日。下关是个美丽的港口。从南京城里出来不远，马路两侧有数千名中国人死在那里。每当有风吹来，尸臭扑鼻，连行军都感困难。

《朝日新闻》1984年6月23日发表了一条消息，报道了一个叫中山重夫的原陆军坦克部队上等兵所目睹的屠杀情景。这个上等兵说：我在沿途看到的累累尸体中，夹杂着许多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战斗人员的妇女和老人的尸体。

……我忘不了在雨花台见到的情景。日军士兵让打着白旗来到这里的中国人站到壕沟旁，然后逐个用刺刀捅死。

A 掩饰罪行的卑劣手段中国著名日本问题专家潘俊峰驳斥田中正明的谬论称：田中正明是个被一些人称为"评论家"的人物。作为评价论家，论述问题应该忠于客观事实。但从对事实所采取的态度看，田中正明这个"评论家"实在名不副实。他为了否定南京大屠杀而采取的种种卑劣手法，使我们有理由称他为诡辩家。

田中正明对资料的引用完全是实用主义的。他对加害一方和受害一方的证言，只承认和使用加害一方的；对加害一方的各类证言，只承认和使用否认南京大屠杀一派人的；对第三国人士的证言，只承认和使用对证实自己观点有利的；即使是同一个人的证言，也是断章取义，任意取舍。他把松井石根洗刷和美化自己的《阵中日志》视为"一级史料"，反复引证；而把中国受害者的亲身遭遇贬为"政治宣传"，只字不提。他虽然承认英国记者田伯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是事件当时的"一级资料"，却又指责书中的"不乏传闻、臆造和夸张之词"。田中正明诬蔑日本民主人士在资料的引证上采取了"实用主义"和"鸵鸟政策"，其实采取这种态度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自

己。

田中正明为了替日本侵略者开脱罪责，还采取转嫁罪行、栽赃于人的手法。他混淆时间界限，把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推到了国民党军队的身上。国民党军队在撤离南京前确有一些腐败行为，但这些腐败行为和日本侵略者搞的南京大屠杀完全是两回事。南京大屠杀是在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后发生的，这时国民党军队已经撤走，来不及撤走的正在成为日本侵略者屠杀的对象，说南京大屠杀暴行是中国军队干的，这能骗得了谁呢？倒打一耙、反咬一口，这是田中正明掩饰日本侵略者罪行的又一手法。他攻击中国"违反国际法"，"使用便衣队"，好像有这个借口屠杀中国军民就是正当的。1899年和1907年《海牙陆战法规与惯例公约》规定：军事占领者应尊重当地居民的生命、财产、家族荣誉和权利，以及宗教信仰；不得征收现金、赋税、实物和劳役；不得没收私有财产、属于宗教、慈善事业和教育、艺术、科学机构的国有财产；禁止掠夺和集体惩罚；禁止惩罚、虐待、杀害战俘。这里哪一条日本侵略者履行了？田中正明闭口不谈日本侵略者违反国际法的罪行，反诬中国"违反了国际法"，这完全颠倒是非。什么"便衣队"，难道被俘士兵是"便衣队"吗？放下武器在难民区避难的散兵是"便衣队"吗？田中正明很善于借题发挥、制造假象。他在难民区20万人口上大作文章，把这20万说成是南京的全部人口，大谈南京被屠杀30万人的不可能性，以迷惑不明真相的人。其实这20万人是日本侵略者进行大屠杀后的幸存者，而不是在此之前的人口。1937年6月南京居民有101万之多（《南京市人口资料》，南京市档案馆档案，1-4-90号），日本侵略军逼近时，有近半数人疏散逃难，近半数人留在南京市内及近郊，尚有几万国民党军队未及撤出，以及从前方流入南京的人。这说明，在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前夕，南京仍有50余万人。可是，南京沦陷后人口骤减，仅剩20万左右。那30多万哪里去了？日本侵略者的一个走狗在1938年的一次会上一语泄漏了天机：“南京市人口在事变以前，计有107万之多，及至事变后，人口骤减至17万之数，相差90万……其中一部分因误会或种种不可避免的关系而罹难散失与牺牲。”这里的"误会"、"罹难"、“牺牲”指的是什么？特别卑劣的是，田中正明在书中竟大肆攻击和污蔑中国人民，以掩饰他的理屈词穷。什么"掠夺是中国军队的恶习"，什么"日本人不同于中国人，他们丝毫不以奸淫为乐趣"，什么"在中国，大屠杀的事俯拾即是；在日本战史上未曾有过"，什么"论粉饰和宣传，中国人是天才"，等等。田中正明混淆问题的实质，把一个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屠杀、掠夺的问题，说成是中日两国民族性孰优孰劣的问题。毫无疑问，日本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正如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一样。中、日两国人民都热爱和平，反对侵略。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所为，日本人民是没有责任的。至于日本帝国主义者、日本侵略者，田中正明要为他们辩护只能是枉费心机。他们没有掠夺过吗？没有对朝鲜人民、中国人民的掠夺，日本帝国主义是怎样起家的？不为了掠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干什么？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不就有"抢光"一条吗？日本侵略者是不是"丝毫不以奸淫为乐趣"呢？在南京大屠杀的日子里，他们上自高级指挥官下至士兵，不分昼夜，不择地点，到处强奸中国妇女。在大街上、公墓里，甚至在本国使馆门前都要发泄兽欲。从八、九岁的幼女到六、七十岁的老妇，只要被他们发现，无一幸免。奸淫之后，又加以残杀。田中正明怎样解释这样的奸淫暴行呢？"日

本战史上没有过大屠杀"吗？日本侵略者在甲午战争期间对中国旅顺无辜居民的大屠杀，此后对中国台湾人民的屠杀，1928年的济南惨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中国各地人民、对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屠杀，包括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田中正明抹煞得了吗？"论粉饰和宣传，中国人是天才"。每个中国人听了这种话都会感到气愤。中国人民将日本侵略者强加给自己的灾难和不幸如实地公诸于世，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至于"搞粉饰"，那是日本侵略者的惯用伎俩。他们在南京杀了那么多中国人，干了那么多坏事，却在报章杂志上大吹特吹给南京人民带来了"安乐"、"和平"；他们采取严厉的"新闻管制"，将南京大屠杀事件封锁得严严实实，妄图欺骗自己的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他们才是宣传和粉饰的天才！

A 罪证如山妄想驳邓小平同志题写馆名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985年建成，用花岗石砌成的纪念馆屹立在六朝古都，馆址就选在当年侵华日军屠杀中国同胞的"万人坑"现场，院墙上刻画着中国同胞遇难时的一幅幅惨状浮雕，小道旁的13块碑记载着中国同胞在13处遇难经过。

史料陈列馆里展示着记录侵华日军暴行的300多幅照片，有幸存者、目击者提供的大量证言，证明日寇屠杀我同胞30万人之多，其中最为凶残就是集体大屠杀。后来，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根据对三百一十五七起诉讼案进行周密详细调查后确认，被屠杀的中国30万同胞中，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19万余人。从目前调查的材料证明，其中北极阁、清凉山、汉中门外、鱼雷营，中山码头，煤炭港、草鞋峡、燕子矶江滩、上新河、花神庙、东郊树林等13处地方被集体屠杀的人数最多，有的一处竟达5万多人。

侵华日军陆军下士栗原利一当年的日记，就记录着这些集体大屠杀的惨景："在我的视线内。……形成了三四米高的尸山"，"被我部杀死的多达一万三千五百人"。有一名英国记者在他所著的《日军暴行纪实》一书中写到："劫后的南京，满目荒芜，一片焦土，宛如人间地狱。"陈列的一张照片上，两名日军露着奸笑，高站圩堤上，而他们的脚下则是一片横七竖八、血肉模糊的尸体，其状惨不忍睹。

除了当年参战日军所写的烧杀淫掠暴行的"日记"、"自白"、"反省"以及日军屠杀我无辜同胞的照片资料外，展厅里还展出了当年侵华日军杀害我无辜同胞后焚尸用的汽油桶，抢劫财物时用刺刀劈坏的木箱等实物。

陈列厅入口右边拐角处，新增设了一个大型彩色灯箱，2米多长，半人多高，灯光映示出13个造型各异的遇难同胞纪念碑的彩照。灯箱下边低矮的品形展柜里，陈放着当年侵华日军屠杀中国同胞时使用的机关枪、步枪。日本侵略军对中国同胞进行集体屠杀的暴行，从文字、图表到实物罪证，都一目了然。

展厅后半部分展出的内容主要有：远东军事法庭和南京军事法庭对大屠杀战犯审理、判决的部分照片、文字材料；日本友好人士和团体凭吊纪念馆后回国撰写的专著、文章、报道和编印出版的书籍；向纪念馆赠送的"中日不再战"、"反对侵略战争"等誓言誓词。

A 不准为松井石根翻案多年来，日本右翼分子一直企图为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松井石根翻案，殊不知这个案是断难翻的，请看当年对松井石根的审判情况。

从1947年5月5日开始，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着手审判“南京大屠杀”一案，这是东京审判的重头戏，双方都派出精兵强将，在法庭内外展开激烈斗争。

公诉人莫罗上校曾亲自到南京调查日寇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无数令人发指的兽行使这位素来稳重老练的上校怒火满腔，完全被残酷的血腥事实所激怒，因而在揭露日本1937年12月13日攻占南京发生的事件时，他显得是那样激动而愤慨，完全显示出盎格鲁撒克逊族人的正义性格：“上海和南京一带的中国心脏地区，土地肥沃，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它在一场违反国际法和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全部战争法规的不宣而战的军事侵略中沦陷了，被洗劫、炸毁和烧光了。中国战俘成群地被绑起来，然后进行大屠杀。松井和畑俊六将军以及其他人员并没有停止军事行动。……当这场不宣而战的侵略战争达到高峰时，两亿五千万中国人已沦陷于日本陆海军的铁蹄之下。”莫罗以血淋淋的例证，控告松井石根使南京居民深陷极大的痛苦和暴力之中，南京人民遭到抢劫和杀戮，妇女遭到野兽般的奸淫，一群群日军暴徒用枪弹、刺刀不停地制造举世罕见的死亡和恐怖。

松井石根的日本辩护律师伊藤清按捺不住心头的恐惧，跳起来打断莫罗法官的发言，要求把所有概括和带结论性的言词从庭审笔录中删去。

检察长基南严词驳斥伊藤清的辩解，以充分的理由有力地断言：“无可否认的是，南京沦陷后，紧接着是一连串对数万名战俘、和平居民和妇女儿童的血腥、欺凌和严刑拷打，是对毫无军事意义的众多房屋的破坏。这些事件被称之为现代战争史上独一无二的南京大屠杀！”身材矮小，形销骨立的松井石根也跳了出来，忍受着右脸和右臂的习惯性痉挛，把他在中国的活动百般美化，做了田园诗情调的般的虚假描绘：“我任军职期间，在华北和华南呆了近12年。我在这整个时期，为中日合作做了可能做的一切。……我始终坚信，日中之间的斗争是所谓‘亚洲大家庭’中兄弟之间的争吵，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动用武力，以拯救旅居中国的日本侨民和保护我们的权益，这同哥哥经过长期忍耐后赶走不听话的弟弟没有什么两样。采取这一行动的目的在于促使中国回心转意。

驱使这一行动的动机不是仇恨而是爱怜。……所以我要求我的军官们要把这次派遣作战的意义向每个士兵讲清楚。我的守则可归结为，在上海地区的斗争目的仅仅是征服反对我们的中国军队，至于中国的官员和国民，根据可能则应得到安抚和保护。”审判长韦勃、检察长基南见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松井石根把自己打扮成和平天使，都几乎要笑破肚皮，正要严厉申斥，法官莫罗抢先辛辣地讽刺问道：“请问，‘弟弟’对‘哥哥’的‘爱’反应如何？”松井石根右脸的习惯性痉挛由于作贼心虚而发作，抽搐几下才恬不知耻地回答：“‘弟弟’没有理解这一点，对‘哥哥’的‘爱’一点儿也不感到高兴。……经过两个多月的激战，派遣军才得以把中国军队从上海排挤出去。……引起我特别关注的是上海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异常强烈。……”莫罗法官见松井石根离题太远，又恶毒地把大屠杀的原因归因于中国民众的抗日斗争，便提醒他交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罪行。

松井石根脸上掠几丝阴影，这才不得不把话拉入正题：“1937年11月5日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组成中华派遣军，我被任命为该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阴险地一笑，又鼓动如簧之舌为自己奇丑无比的脸上猛劲儿贴金：“由于我多年宿愿乃是使日本和中国共存共荣，因此在占领南京时采

取种种防御措施，以避免这一战事成为全体中国居民遭受苦难的原因。……

"这时，法庭上传来"嗤嗤"的讥笑声，松井石根也不免心虚起来。他知道东京法庭已掌握了南京大屠杀的许多罪证，再否认也无济于事，就狡猾地轻描淡写地承认一些事实，以蒙混通过难以逾越的审判难关："虽然我采取一切预防措施，但在攻占南京时，在一片慌乱的情况下，还是能够找到一些激动起来的士兵和军官干出胡作非为的事情来的。十分遗憾，我是后来才听到这种过失的。"莫罗法官愤怒地质问："你作为进攻南京的最高指挥官，怎么能说后来才听说发生这种'过失'呢？"松井石根这下抓到了稻草，急忙为自己辩解说："攻打南京的当时，我正在距该城140公里的苏州卧床养病，而且并不知道他们违抗我的命令竟干出这般暴行来。12月17日我到达南京后，从宪兵司令部那里第一次听到这种意外事件，我立刻下达了命令，敦促各部队调查此事件并严惩肇事者，因此，把全部罪责都加在日本军官和士兵头上是不公正的，我是在日本投降后才第一次听到南京惨案的。……"松井石根的无耻狡辩引起各方面的强烈谴责，他厚颜无耻地自圆其说道："我声明，我是在战争刚一结束从广播中第一次听到这件事的。当时美国人宣布有过南京大屠杀，公诉方在这里就此提出了证据。当时我听了这番广播后，曾试图调查我军在南京市的活动，但是，对此负有责任的人，此时不是已经去世，就是在关押中，而有关文件又在一场火灾中烧掉了。

"松井石根耍无赖硬说此事现在已死无对证，然后又伪善地把好话说尽："我认为，中国国民和日本国民理应像兄弟一样相互合作，因此，我们之间发生的付出巨大牺牲的战争是一场真正的灾难。因此，我感到十分遗憾。我曾希望这一事件会向两国国民提供在和平与和谐中生活的可能，那些曾贡献出自己生命的人们会奠定新亚洲的基石，所以，在我回国后，就在热海附近的伊豆山上修建了一座神殿，以纪念战死的两国军人并为其灵魂安息而祈祷。我还在这座神殿塑了一尊观音菩萨的全身像，在神像的基座上撒有我亲自从长江战场上带来的黄海土。我曾在这尊神像前昼夜祈祷，祝愿牺牲军人之灵魂得到安息，祝愿世界和平得以确立！"松井石根的巧言花语激起法庭旁听人员和工作人员的极大愤怒，公诉人诺兰准将拍案而起，主动出击，他胸有韬略，先不动声色旁敲侧击问道："您的书面供词中提到，一些激昂的和被激动起来的青年军官和士兵在南京犯有暴行，是吧？"松井石根眨巴眨巴小眼，闪烁其词回答说："是的，我这样说过，但我本人没有看过，只得到过这方面的消息。"诺兰将军不紧不慢追问："消息里讲了什么行为？"松井石根避重就轻："抢劫居民，侵占财物。"诺兰准将以漫不经心的方式提出要害问题："还有杀戮？"松井石根无法否认："对，还有杀戮。"诺兰准将进一步扩大战果："您是从哪里得到这些消息的？""从我们的宪兵队那里。""您说过，您说到的罪行是在您1937年12月17日进入南京后从宪兵司令部那里听到的，您还从别的什么人那里听到过种消息吧？"松井石根不知是计，夸夸其谈道："当我在南京的日本领事那里做客时，也从他那里听到过同样的消息。""您听到的是什么？""我从日本驻南京领事日高信六那里听到一些日军士兵和军官确实犯有罪行，这可有日高总领事作证。"日本律师团马上起哄，要求日高出庭作证。日高信六早已在一旁等候多时，这时在法庭上滔滔不绝讲平日军攻陷南京之后，他特意从上海赶来参加松井石根的入城式，接着3次访问南京，他摆出见证人身份作证说："据我那时的所见所闻，松井大将攻略南京时，在战略战术上都非常慎重。当时，一般中

国军民反日情绪高昂，就连老弱妇孺都参加谍报和杯葛行列，因此就增加了日本的警戒心和敌忾心。至于说到日军的大屠杀暴行，当昭和13年（1938年）元旦我去给松井大将拜年时，才听到松井慨叹‘我的部下有胡搞的’，此外我又从侨居在南京的外国人那里听到一些风声。”公诉人诺兰准将抓住日本证人为南京大屠杀辩护中的漏洞，申明任何人都不可改变大屠杀的事实，他质问松井石根说：“你在书面供词中说过，得知这一暴行后即刻命令各部队查明事实真相并要严惩犯罪分子，调查结果向你报告了没有？”松井奇丑无比的脸上显出慌乱神色，支支吾吾说：“到次年2月我离开上海前，一直没有得到有关这次调查的任何消息。……”公诉人诺兰准将强调松井石根一贯主张办事要快而有效，以讽刺的口吻继续对松井石根施加压力说：“你要求过部下把事情真相报告你吗？他们向你回答了些什么？”“他们向我报告说，‘我们正在进行调查，一俟调查完毕即刻回复’。”“你在1938年2月离开中国前，一直没有得到回答吗？”松井无可奈何回答：“是的，是这样的。”公诉人诺兰得到了松井放纵部下进行南京大屠杀的证据，又乘胜追击：“1937年12月17日，你都召见了哪些军官？”松井石根玩弄花招儿说：“我下令召集全体军官。我要求全体军官，至少联队以上指挥官都要到常”诺兰准将仍想打开一个突破口：“谁负责处理暴行问题？”松井石根摸着秃头寻思半天，突然装模作样双手一拍暗说可找到了既言之成理又能为他辩解的人：“第十军军法处长塚本浩次大佐。”日本律师团早已和松井商量好让塚本作伪证，塚本便来到证人席上一本正经谎话连篇：“我特别奉松井大将的命令，调查日军的残暴事件，结果只发现四、五个日本将校犯抢劫与强奸罪，一般士兵很少有伤害和偷窃事件；至于杀人事件，仅仅两起而已，放火罪和集体屠杀罪根本没有。”塚本的伪证激起有正义感的人们的满腔怒火，检察官沙顿怒不可遏质问塚本：“你当时知不知道屠城事件？”塚本脖子一梗矢口抵赖说：“不知道，记不清了！”沙顿是个很有经验的检察官，怀着满腔义愤，熟练运用一种叫作“笔录方式”的审理技巧，一件件摆出确凿的证据，攻破对方耍赖否认的壁垒，使辩方的异议声明无效，给人一种罪行证据充分的成功之感。

塚本的伪证失灵使被告和日本辩护团狼狈不堪，检察官和法官乘胜追击，传讯日军的南京警备总司令中岛今朝吾。

中岛今朝吾是日寇第16师团长，为进攻南京的主将，这次未被作为甲级战犯起诉暗叫菩萨保佑，恐怕中国政府对他提出控诉，追究战犯罪责，又见塚本浩次作伪证当庭受辱，就讲了一些实话：“松井大将确曾命令第16师团，对中国军队进行残酷的扫射，而部分日军官兵在南京城内的奸淫烧杀自然难免。南京城破之后，中国军队官兵纷纷换穿便衣混入平民之中，南京城里的一般妇人女子，也表现出极强烈的抗日精神，与分散的中国军队一起游击抵抗，于是日军就不分男女老弱，不论军民，凡是看起来有反抗可能的一律加以围捕。到15日深夜为止，光是下关码头一地就杀死中国军民两万之多。此外，还有13师团的山田支队，更把俘虏在幕府山的两万多中国军民，以补给困难为由，通通枪杀。”中岛今朝吾的证词虽大大缩小了南京大屠杀的数字，但却使日本被告和辩护团狼狈不堪，清濑一郎大骂中岛是叛徒，但也无可奈何，只得又找人再做伪证。挑来挑去，挑中了日寇华中侵略军参谋中山宁人大佐出庭做证。

中山宁人一出庭就拍着胸脯保证：“松井大将并无故意违法之嫌，而且

特别注意日军的军容风纪。"中山宁人的谎言立即遭到各方面的讥笑，他却胡说：“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还有检讨整个内容的必要。”中山宁人摆出权威架势，说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可以分为“四大端”；第一是对一般市民的屠杀，他“相信绝对没有”。

第二是对俘虏的屠杀，“可能是对日军歼灭中国军残兵的误传”。第三是对外国权益财产的伤害，“确实有少数侵害外国权益财产的行为，不过，究竟是中国兵还是日本兵并不得而知”。第四是强奸妇女和掠夺财产，“确实有这种暴行，不过都是小规模”。

中山宁人的话被法庭律师和证人拿事实稍加对照，就发现全是伪证，当即被法庭赶下证人台。

在中国方面和检察官、法官穷追猛打下，松井石根妄图在东京法庭上给南京大屠杀描绘的田园诗般的画面被无情戳穿了，日本辩护团提供的伪证一个个被事实揭露，松井石根和日本律师团狼狈不堪，但决不想拱手投降，决定有组织地实施退却。公诉人诺兰将军却不给战犯以喘息之机，又乘胜追击：“南京暴行持续了多长时间？”松井石根故意所答非所问：“大部分暴行是在我军进入南京后立即发生的。”诺兰进一步指明问题的实质：“有充足的证据说日军暴行从南京陷落持续了6周时间，你知道吗？”松井石根矢口否认：“我在法庭上听到了这些证言，但我不相信这一说法。……”诺兰准将见松井死不认帐；便传冈田启乔出庭做证。

79岁的冈田启乔曾任内阁海相、陆相和首相，他向来说话半真半假，使人真假难辨，在法庭上也搔着苍白头发谎话连篇，不过今天基于强大压力才好不容易讲了几句真话：“1937年12月18日，我在南京的‘京城医院’里同松井大将谈过话，他说，从视察中与难民谈话得知他的军队给南京带来这样大的损失，我深感遗憾。”

诺兰将军当即质问松井石根：“你有过那种表示吗？”松井石根倍感沮丧，拍着满头白发说起胡话来了：“是的，如同证人指出的，我没有借助军事行动占领南京的愿望。……我并不想把南京变成血腥的战场，发生这些事，我非常懊悔。”公诉人诺兰又从另一侧面发动攻势：“你在宣誓书面供词中写有当您于12月19日视察南京时，曾驱车到过难民区，是吗？”松井石根断然否认说：“没有。”诺兰当即揭穿松井石根的谎言：“这就是说，你没有同证人冈田所说与难民谈话？”松井石根慌然不知所措，迟疑一下才被迫承认：“我没有到过难民区，我到过一座山上的庙堂，具体地点忘记了。在那里，我遇见了几个难民并同他们谈了话。……”诺兰脸显出胜利的微笑，便按照军人的惯例制定巧妙战术发动有计划、有步骤的进攻：“松井将军，你说你对给南京造成的损失很懊悔，你没有想用武力夺占该城，但是，证人中山在这里对我们说过，你曾要求你的参谋长塚田将军向全体参谋人员发出命令指出，因为南京是中国的首都，我军占领该城将成为一个国际事件，应竭尽所能发扬日本武威慑服中国。你下过这道命令没有？”松井石根犹如泄了气的皮球，有气无力地回答：“是的……”公诉人诺兰又从另一个角度攻了上来：“被告人南次郎在法庭上说，世界报界对南京大屠杀都有报道，你读过这些报道吗？”松井石根失去了自我控制能力，懒洋洋地回答：“没有读过。如果那些消息登在报刊上，那就相当迟了，那时我已经从上海回日本了。……”诺兰见松井石根的辩护如此乏力，又紧追不舍：“是谁肯定说发生了暴行？”松井石根黔驴技穷说：“我认为，散布这种流言的是中国人自己，是一些从

中国人那里听到了一些什么就散布起这种消息的外国人，很可能是为了开个玩笑。……"松井石根的话引起哄堂大笑，结果把他的厚颜无耻面目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日本辩护团见松井石根等已溃不成军，又要求让他们的"否认事实"专家、内大臣木户幸一出庭作证。

检察长基南深知木户幸一狡猾异常，怕诺兰对付不了，就亲自出马传讯木户幸一。

木户幸一在证人席上吹嘘自己精通英语，热爱英国文学，常读著名原著，常看英美报纸，了解国内外大事，可以回答各种问题。

基南见木户幸一把自己吹得天花乱坠，就单刀直入问道：“您听到过在日本议会或什么别的地方对日军在南京地区行动的讨论吗？”木户幸一拿出他的有力武器：“我不记得了。”基南耐着性子询问道：“我提醒你回忆一下外相广田（被告人之一）当时所作的声明：‘鉴于谈判进行得不顺利，决定派出派遣军’。你记得这个吗？你听到广田在议会上作过这样的声明吗？它是不是后来在东京的报纸上刊登过？”木户幸一又用出“绝妙招数”，说既没听到过广田声明，也丝毫不了解什么南京事件。

基南其冲牛斗，但丰富的法庭经验使他机智地若无期事地问道：“你知道南京是中国首都，在一次大的战役中被日军攻占了吗？”木户幸一果然中计：“是的，这个我知道。”基南这才怀着正义感，痛快淋漓驳斥说：“木户先生，日军对千千万万无辜中国人采取野蛮行为，难道不是这样吗？这一事实你当时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你和其他人串通好，在这里，在法庭上保持沉默，拒不承认了解日本军队的行动，这是因为日本军队的行动具有犯罪性质。”木户幸一被揭露得慌然不知所措，语无伦次：“不，完全不是这样。那个时候，我不了解这方面的事情。……”检察官和法官见松井石根和日本律师百般巧辩，就传见证人许傅音出庭作证，许傅音义愤填膺揭发说：“当时我是南京红十字会副会长，目睹日军野蛮暴行，日军见人即予枪击。当日军占领南京后第三日，我曾往市内巡视一次，见随处皆有尸体，约计有500之数。余曾亲见相识之中国人被杀，卧倒于其住屋大门进口，尸体均为一般男女老幼，从未见着军服者。平时余往难民所配给红十字会物品，有日兵前来用绳将难民捆绑，约解去千余人之数，凌晨8时许，在国际委员会及红十字会附近，听到机关枪声音，嗣后调查，知多数中国人已被杀死。余等知此，即前日解去之中国人。其后在任何华人集中场所，日军一来，必有人被拉去杀死。日方谓此即为中国兵，实则被杀害之任何人，均无武器。日军对于妇人行行为更坏，为文明国所想像不到者。某次日军开来货车三辆，至华人集中地，将所有妇女尽行载去强奸，余曾将此等暴行，向驻南京的日副领事（现吉田总理之秘书官福田笃泰）陈述，并请发给禁止日军出入收容所布告。

布告张贴后，仍无效。又余素所尊敬之一家族，于乘船渡河中，被日兵2名检查，日兵见其中有青年妇女2人，即在其双亲及丈夫面前实行强奸，将全家人都推入河中溺死。日军占领南京后，中国人被杀死者极多，经红十字会埋葬者为数约4万3千人，此为最低数之估计。死骸多自河中或建筑物中发现，且将手连结集体杀害。日兵遇见爱好之物，即随便携走，并用火将房屋烧毁灭迹，此为常见之事。苏联驻华公使馆亦被火焚。”许傅音的见证控诉引欺人们的强烈愤怒，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伊藤清坐不住了，他见松井石根频频向他投去救命的目光，实在无法可想，就慌忙追问日军在南京的暴

行继续了多长时间。

许傅音毫不含糊地回答：“至少三个月，三个月后亦未继绝！”这更使日本战犯和辩护律师处于狼狈境地，伊藤清无理搅三分，硬说中国人的证言不算数，英美人士的话才可信。

审判长韦勃微微一笑说：“那好吧，就请金陵大学医院外科主任、美国教授贝蒂斯出庭做证。”这时，一个高个白发教授走上证人台，以凌人不可侵犯之势揭露日本侵略者罪行说：“我是当时南京国际安全地带委员会之创立委员，此会于1937年11月下旬成立，其主要任务为在南京陷落后救护难民。”中国首席检察官向哲浚的秘书裘绍恒向美籍教授贝蒂斯投去钦佩的目光，他是在向东京法庭申请回南京进行实地调查时，遇到这位老教授的，老人主动到东京法庭制服日本杀人魔鬼，这时以大学教授的善辩才能射出一发发制敌于死命的子弹：“入城日军对人民态度极坏，数周间发生杀人事件900起，其残虐行为，极为广泛。据金陵大学教授罗伯特·威尔逊调查，有一万二千非战斗员被杀。华军于解除武装后，均被押送到长江畔用机枪扫射，在72小时内，南京国际安全地带委员会埋葬军民死尸达3万具。此外被杀死者，尚不计其数。妇女亦多被强奸。我所认识的3个妇女曾被带去强奸，其中一人且为大学教授夫人。我曾5次目睹强奸事件。在金陵大学校舍内收容难民3万人，曾发生强奸事件数百次。日军入城后曾连日在城内各街巷及安全地带搜索妇女，其中且有将校参加。南京占领后一月，计有妇女两万人被强奸。日本对市民家具食粮任意刮取，且有军官指挥用卡车装运，即使各国大使馆有价值物品亦难幸免。日军曾任意没收私人财产，限此等财产所有人于12小时内将房屋让出，市民无地容身，多露宿街头，上述残暴事件，我曾频频向日本驻南京官员报告，当时福田领事等均以畏惧军部，仅向东京报告而已。此种行为，直至占领南京六、七周之久，仍旧继续发生。日军高级军官亦有亲至暴行发生地点参观者。当时驻京日本宪兵仅17人。”贝蒂斯刚讲完，约翰·梅奇牧师又登上证人台，以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身份控诉说：“日军占领南京后，就有组织地进行屠杀。南京市内到处是中国人的尸体。日本兵把抓到的中国人用机枪、步枪打死，用刺刀刺死。强奸到处都有发生，许多妇女和孩子遭到杀害。

如果妇女拒绝或反抗，就被捅死。我拍了照片和电影，从这些资料上可以看到妇女被砍头或被刺得体无完肤的情形，如果妇女的丈夫想救自己的妻子，他也会被杀死。……”梅奇牧师又滔滔不绝揭露侵华日军100多件罪行，松井石根向他的本国律师伊藤清求救，伊藤清低头不语；松井又向他的美国律师布鲁克斯求援，布鲁克斯便盛气凌人地质问梅奇牧师：“你看到过强奸的现行犯吗？”“当然看到过。”“那么是几个？”“我看到过一个日军士兵在实际上进行这种行为，还看到过两个日本士兵把一个15岁的女子按在床上。”布鲁克斯是无耻之徒，故意在不太好说的事情上做文章：“一个是现行犯，另一件未遂，是不是？”梅奇牧师仔细寻找在大庭广众面前能说得出口的话：“我看见他们两人压着15岁的女子在床上，干。……简直是野兽……”布鲁克斯在铁的事实面前无话可说了，不服气又转换目标问：“你认为强盗或者你本身被强盗抢过的事件经历过几回？”“我见过偷电冰箱的日军士兵。……”，他还有更使日本人丢脸的事，犹豫说还是不说，布鲁克斯以为梅奇牧师没词儿了，就幸灾乐祸地问：“还有吗？”在美国律师布鲁克斯催促下，梅奇牧师只得带着讽刺口吻讲起了令人可笑的故事：“一天夜里，

一个日本兵竟三次闯进我的住宅。他的目的是想强奸藏在我家里的一个小女孩儿，当然也顺手偷些东西。

他进来一次，我就大声斥责他一次，但每次他都要偷点东西。

为了满足他的欲望，最后一次，我故意让他在衣服口袋中掏了仅有的60元纸币。日本兵偷到这点钱，便满足地向我表示感谢，然后一溜烟似的从我后门窜出去了。"东京法庭审判南京大屠杀案期间，法庭气氛极为沉痛庄重，唯有梅奇牧师讲的这个故事引起了人们的哄堂大笑，纷纷耻笑日本侵略者贪得无厌。

这时，被告们也忍俊不住失声笑了起来，松井石根苦笑不得，慌然不知所措，日本人的丑态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突然，法庭陷入一漆黑暗之中，一束强烈的光柱投射到审判厅正中悬挂的白色银幕上，美国牧师梅奇拍摄的南京大屠杀电影开始放映：只见枪声四起，刀光闪闪，到处是滚落的人头，到处是被刺刀捅死的婴儿，到处是被强奸后杀死的中国妇女。……松井石根不服输，写了《对检察官季南之意见书》，想从根本推翻“侵略”这个罪名，强词夺理说：“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东亚的战争同我日本进行的日清、日俄战争是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两种战争。……东洋日本与中国之抗争，一方面应视为两国人民自然发展之冲突，同时亦可视为两国国民思想之角逐。盖中国国民之思想，最近半世纪间明显受欧美民主思想与苏联共产思想之感化，致东洋固有思想（儒教、佛教）发生显著变化，中国国内亦招致各种思想之混乱与纷争，乃至形成同日本民族纷争之原因。”松井石根还借早期与孙中山的交往造谣撞骗，朗诵他做的汉诗搅乱法庭：迟暮昏昏，鬼影憧憧。

故友亡魂飞何处，可在紫金陵寝中？中山门下，低首策马。

两军交战事堪悲心伤欲碎难回首。

松井石根胡诌完谁也听不明白的“汉诗”，又恶狠狠一口否定检察长季南的控诉：“季南检察官所云对俘虏、一般人、妇女施以有组织且残忍之屠杀奸淫等，则纯系诬蔑，而超过军事上的需要破坏房屋财产等指责亦全为谎言。”松井石根意犹未尽，又到处张扬他攻占南京后的一首七绝：悬军奉节半星霜，圣业未成战血腥，何乳生还老瘦骨，残骸誓欲报英灵。

松井石根的嚣张气焰使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伍长德怒火满腔，他当时听到枪声先倒下一秒钟，被大平尸首压住才得以幸存，此时以亲身经历揭露松井石根指挥下的日军，在南京汉中门外屠杀中国军民2000余人的血腥罪行：民国26年12月15日，中岛部队在南京难民区司法院无故查出军警百姓2000余名，用机枪12架将我等押送汉中门里，每一行列用绳捆绑圈住，赶至城外用机枪扫射，已射死才及未死者被日军用木柴、汽油焚烧之，同时本人业已带伤脱逃。

接着，亲自到南京等地实地调查的美军上校托马斯·H·莫罗向法庭提供了8件证据确凿的宣誓证词，英国证人皮特·罗伦斯和中国人许傅音、尚德义、梁廷芳等走上证人台，宣誓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又向东京法庭提供了美国的费吴生、史密斯和中国的鲁苏、陈瑞芳、孙永成、吴经才等13人的宣誓证词。

检察长基南望一眼懊丧颓唐的松井石根，又拿出侵华日军士兵外贺关次的日记当庭朗读，揭露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军民的暴行：1937年12月13日，33联队一个大队转入攻击。一面接近举着白皮的敌军，一面继

续射击。……途中遇到二、三十名中国士兵，都枪杀或刺死了……。……南京南门车站，日本工兵队的小伙子们刺死了70多个中国士兵。

城外敌人尸体很多，其中还有痛苦呻吟的，他们就给他补上一刺刀，送他上西天。

1937年12月15日，太平门城门口堆着500多具中国士兵的尸体，全部是被杀死的。

1937年12月17日，有中国人从距离日军宿营地500米的房子走出，我们开枪把他们打死了。也许是良民，但在目前情况下，是不能让他们跑了的。

1938年1月24日，下关是个美丽的港口，从南京城里出来不远，马路两侧有数千名中国人死在那里。每当有风吹来，尸臭太平门鼻，连行军都很困难。

检察长基南又拿出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列1938年3月根据从各方面搜集和实地观察的确凿证据编写的《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一书，无情揭露说：英国记者田伯烈怀着新闻记者的正义感，认为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记录，堪称现代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检察长基南晃动魁梧身躯，怀着一个检察官的凛然正气将日寇暴行示众如下：日军进城后的两天之内，连续不断地屠杀，经常大规模地劫掠，侵扰私宅，侮辱妇女，一切都失去了控制。外侨目睹街道上堆满了太平门民的尸体。……未及退出的中国士兵，都已抛弃了枪械，有的则已脱去了军服，但日军大肆搜捕，捆绑在一起而加以枪杀。

12月17日，星期五，劫掠、屠杀和奸淫的事情有增无减。昨天白日夜间被强奸的妇女至少有1000人。一个兽兵在强奸时，因为5个月的婴孩哭声不断，便把她活活闷死，对反抗的就是刺刀惩罚。

12月20日，星期一，暴行继续不已，全城大火蔓延。午后5时，我偕史密斯君乘车外出，城内最重要的商业区太平路一带，烈焰冲天，向南行，我们看见日本兵在店铺内放火；更向南行，我们看见日本兵忙着把东西装入军用卡车。

血腥的事实，铁一般的证据，迫使松井石根低下了头，审判长韦勃威严地宣读题为“攻击南京”和“南京大屠杀”的宣判词，郑重宣布：1937年11月下旬，日军占领上海约一个月以后，到达了南京郊外。当日军兵临南京城下的时候，对中国军队进行诱降。中国方面对于日本的招降置之不理，于是疯狂的日军对南京进行了轰击。1937年12月13日南京终于失陷了，自1937年12月13日启发生了人所共知的南京大屠杀事件。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宣告：1937年12月13日早晨，当日军进入南京市内时，完全没有遭遇抵抗。日本兵云集市内并且犯下了种种暴行。据目睹者们说，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地来污辱这个城市。目睹者们又说，南京市像被捕获的饵料似地落到了日本人的手中。

该市不像只是由有组织的战斗者所占有的。战胜的日军捕捉他的饵料犯下了无数的暴行。日军单独的或者以二三人作为一个小集团在全市游荡，实行杀人、强奸、抢劫、放火。

……中国人像兔子似的被猎取着，松井率领日本军队，1937年12月13日占领了南京市。

中国军队在南京陷落前就撤退了，因此所占领的是无抵抗的都市。接着发生的是日本陆军对无力的市民施行了长期持续的最恐怖的暴行。日本军人进行了大批屠杀，杀害个人、强奸、抢劫及放火。尽管日本籍的证人否认曹大规模进行残虐行为；但是各种国籍的、无可置疑的、可以凭信的中立证人的相反证言是绝对有力的。

这种暗无天日的犯罪是从1937年12月13日占领南京市开始的，至1938年2月初还没有停止。在这六、七个星期中，数以千计的妇女被强奸，10万以上的人被屠杀，无数的财产被抢劫与焚毁。

当这些恐怖的突发事件达到最高潮时，即12月17日，松井进南京城并曾停留了5至7天左右。

根据他本身的观察和考证的报告，他只要看见哪个人一动就开枪射击。由于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在日方占领南京市的最初两三天期间，至少有一万两千名非战斗的中国男女和儿童被杀害掉了。

.....日本陆军的野蛮行为是无可原宥的，这并不是最后攻入了一个顽强坚守的阵地因一时照顾不及的军队所为。强奸、放火及杀人，在占领南京后至少有6个礼拜中，一直不断地在大规模地进行着。

经过两年半正义与邪恶的大搏斗，终究邪不压正，1948年12月12日下午，松井石根光着头，摘掉眼镜，在左右两名戴着"MP"臂章的宪兵监押下，站在受审席上，倾听东京国际法庭的判决：.....松井是日本陆军的高级军官，1933年晋级为大将，他在陆军中具有丰富的经验。.....理应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自己承认曾从宪兵队和使领馆人员处听说过他的军队有某种程度的非法行为。在南京的日本外交代表曾每天收到关于此类暴行的报告，他们并将这些事报告给东京。

本法庭认为、有充分证据证明松井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对于这些恐怖行为，他置若罔闻，或没有采取任何有效办法来缓和它。在占领南京市以前，他确曾对他的军队下令要他们严肃行动，后来又曾发出同样的命令。正像现在所知道的，这些命令并未生效，并且这在他也是理所应知的。他为他的行动辩护时说，这是由于他生病的缘故。他的疾病并没有阻碍他指挥在其指挥下的作战行动，而对于这类暴行具有责任的军队又是属他指挥的。他是知道这类暴行的。他既有义务也有权力统制自己的军队和保护南京的不幸市民。由于他怠忽这些义务的履行，不能不认为他负有犯罪责任。.....松井石根听到这里如雷轰顶，暗想大事不好，只听韦勃庭长威严地宣判道：本法庭根据法庭宪章第15条第4款宣判如下：被告松井石根根据起诉书中判决为有罪的罪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你以绞刑。.....松井石根听到宣判他"绞刑"，顿时失去当年骑着大白马举行南京入城式时的洋洋得意神态，脸色苍白，如丧考妣，两腿瘫软，眼冒金星。韦勃庭长鄙弃地冷笑一声，命令身强力壮的国际宪兵，像挟小鸡一般，将松井石根拖出法庭，打入巢鸭监狱，严加看管，等候明正典刑！

第十章不许污蔑慰安妇

慰安妇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期间，为顺利推行侵略政策而采取的罪恶措施，饱含着朝鲜、中国、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广大妇女的辛酸血泪。

日本右翼分子开始极力掩盖这一罪恶事实，继而对其横加污蔑，这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一、何谓慰安妇所谓"慰安妇"，就是随军军妓、营妓。日本《广辞苑》对"随军慰安妇"一词的解释为：“随军到战地部队、安慰过官兵的人”，简言之，随军慰安妇即随军妓女，也被称作野鸡，是日本侵略军官兵的性机器，大约有10万多人。

日军当年召集的军妓，绝大多数是被强迫征集而来，像征军伕一样，强行摊派名额。朝鲜半岛早在日军侵略之前，即已处在日本统治之下，朝鲜妇女是较早遭受被征募凌辱的。不过在亚洲各被迫充作"慰安妇"的妇女，不仅有朝鲜人，还有中国人、缅甸人、马来西亚人、菲律宾人等。事隔多年，当时被蹂躏的妇女，大多数已不在人世，而侥幸生还者基于颜面多半隐忍未发，大都不愿回顾那段令人心酸的往事，所以"慰安妇"事件几乎不被人们所了解，被世人遗忘沉冤至今。

A 为何出现慰安妇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日军官兵所到之处除烧杀抢掠外，最骇人听闻的就是大肆强奸当地妇女。长期的禁欲生活使日本军人积蓄了太多的性能量，这一问题在本国领土上是不可能得到充分解决的。在被占领区，他们一方面发扬武士道精神完成本国统治者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即充当杀人机器；另一方面，他们也自发地、几乎是情不自禁地、不约而同地兽性大发，丧心病狂地蠢动，及时将他们强壮的肉体里蕴含的那股一直处于冲动状态的能量释放出来。

当时的日军，从高级军官到普通士兵，哪个不是欲火中烧、早已把持不住！

这是一支兽欲肆虐的军队！一支几十万人的军队！欺压抑已久的性能量以极端罪恶的形式释放出来，便无异于决堤的洪水，其冲击力是毁灭性的。

最惨绝人寰的是那次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其实，与其说大屠杀，毋宁说是大奸杀。

日军在城内到处追逐中国妇女，无论老幼，无一例外地实施强奸，然后杀掉。有的日军甚至干脆不扣军裤上面的纽扣，将生殖器直接露在外面，奸杀一个又去追逐另一个。

1946年至1948年举行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郑重认定：……。……全城中，无论是幼年的少女或老年的妇人多数都被奸污了，并且在这类强奸中，已有许多变态和淫虐犯罪行为的事件。许多妇女在强奸后被杀，又将他们的身体加以斩断……其中包括8岁的女孩和70岁以上的老嫗，这不仅是凶残的大屠杀，而且是更灭绝人性的大奸杀。

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至于强奸暴行，亦极为普遍，凡被日军所遇见之妇女同胞，不论为高龄老妇或少妇幼女，几均不获免，即迁入难民区以内者，尚设法逾墙而入，肆其蹂躏。据主持难民区国际人士之粗略统计，当时本市遭受此种凌辱之妇女不下8万之多，且强奸之后，更施以剖乳、刺腹种种酷刑，必置之死地而后快。”从1937年底到1938年春，南京城一直在痛苦中呻吟，从大街到小巷，妇女的惨叫声呼救声和鬼子的淫笑声，日夜不绝于耳。这些身带禅符口颂佛号的"教徒"甚至连佛门净地也不放过，轮奸尼姑，威逼僧尼交媾以取乐。……根据远东国际

法庭调查，仅在日军攻占南京的第一个月内，确切落实姓名和地点的被害妇女即达两万多！含冤忍辱，带着肉体和心灵的创伤沉默终生的妇女又有多少？整个大屠杀期间受奸虐的女性总数又是多少？恐怕是永远也难以算清了。连日本的盟国德国驻南京的大使馆给柏林的电报中都说：“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架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日军除在南京奸虐妇女之外，还挨门挨户搜索青年妇女，组成“慰安所”，强迫她们到外地“慰问”日军。第一一四师团一等兵田所耕三写道：“（日本部队）从南京下关开了木炭车到乡下，将女人分配给士兵们，每15到20名士兵分配一个女人。……就在仓库铺上干草、树叶之类东西，士兵们手拿‘入场券’——盖了中队长印章的纸条，只穿兜裆布，赤身裸体等候轮番。……不强奸的士兵几乎没有”。

驻扎在南京中华门附近的是日军谷寿夫中将的第六师团，是占领南京后屠杀中国人最凶狠的部队之一。

12月13日中华门堆草巷内，15岁的读×被日军13人轮奸。野兽们对她反复蹂躏，读×无法忍受痛苦的折磨，尖声叫喊救命，被日军用匕首划开小腹扯出肠子而死。

同日，中华门东仁厚里五号，8个日军闯入民妇陶汤氏的住宅将其轮奸，事后又将她活活肢解，将肢体切成数块投入火中焚毁。

14日，中华门斩龙桥下，南京市民姚加隆一家为逃避屠杀躲入斩龙桥下，被过路日军发现，其妻被轮奸后杀死，8岁幼儿和3岁幼女看到这惨景吓得跪地哀求，竟被日兵用刺刀挑入火中活活烧死。

同日，中华门外土城头，3名少女被日军拖到这里轮奸。

3名少女颤抖着爬到一起，手挽着手投江自荆面对滔滔江水，她们呼喊着：“妈妈呀，野兽们糟踏我，无脸见人了。”“妈，我这就去了。鬼子，你们是畜牲养的！”“爹，你那队伍开到哪里去了？可要回来给女儿报仇呀！”“滔滔的江水，你可还记得她们的呼喊！

中国青年绝不能忘却她们的呼喊！

然而，就是如此大规模的奸淫妇女，似乎都还不足以平息侵华日军的勃勃欲火，每占领一处地方，当地妓院都迅速进入战时紧急状态。因为在占领区，妓院是最受皇军青睐的地方，他们频频出入妓院，妓女们不得不拿出比平时高几倍甚至十几倍、几十倍的效率来为皇军效劳。

由于如此混乱的性交，淋并梅毒等多种性病迅速在军中蔓延开来，日军战斗力也受到削弱。同时，日军在占领区奸淫妇女的兽行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一时间，告急的消息不断反馈到日本军部，如何解决前线日军过分强烈的性欲，已成了战争能否顺利推进的一个关键因素，成了军部决策人物思索的焦点。性欲问题几乎成了继续进行侵略战争的首要问题。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很快又接到报告，中国人民利用日本侵略军官兵要找中国姑娘寻欢作乐，就化装年轻妇女引诱日本官兵上当，中国人民更跟奸淫中国妇女的日本官兵展开殊死搏斗。

面对野兽一般的日军，手无寸铁的南京人民并没有屈服，他们不甘忍受日军的宰割和非人的侮辱，进行了必要的自卫，尽管这种反抗是那样的有限和微弱，但它却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不可战胜性。

1937年12月的一个深夜，100多名全副武装的日军包围了李家岗村，把全村青年男子逼到村前的田地里当活靶子刺杀，边杀边发出“呀

呀"的怪叫和"哈哈。……"的狂笑。

这次屠杀的幸存者、现年80岁高龄的李书海回忆，当时，有10多个日军包围了他的家，一个手持战刀的小头目踢开他家的房门，叫骂着冲进了屋子。李书海练过武术，随手操起一支红樱枪，挡住冲进屋的日军。小头目见他敢于反抗，挥刀向他头部横劈过来。李书海来了一个"缩头蹲身"，躲过刀锋，然后夺门而出，被门外四五个日本兵拦祝李书海左突右闪，逼开近身的日本兵，夺路沿村中小巷向村口狂奔，刚到巷子尽头，又被两名埋伏在那里的日本兵抓住，李书海挥开双臂，使出"封心掌"，将两个日本兵打倒在地，趁着天黑，摸出村外，终于死里逃生。

12月19日上午，6个日本兵闯入南京五台山一所小学的地下室，硬要带走十几名年轻女子。在这十几人中，有一个叫李秀英的孕妇（已怀孕7个月），她为了免遭污辱，一头向墙上撞去，顿时头破血流，昏倒在地。等她醒来，日本兵已带着其他妇女离去。李秀英想，就这样死去未免太便宜了日本鬼子，我自幼从父学过武术，何不与鬼子拚一拚。这天中午，又来了3个日本兵，他们把男人赶开，把两个妇女带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准备奸污。这时，一个日本兵走到李秀英跟前，打算解开她的衣扣，李秀英乘机抓住鬼子腰间佩挂的刺刀。日本兵见状大惊，与之争夺刀柄。李秀英见刀用不上，便张口咬住日本兵的手，日本兵痛得哇哇乱叫。另外两个日本兵听见叫声，赶来帮助被咬的日本兵。他们用刺刀向李秀英的脸上、身上、腿上乱戳。李秀英死死抓住刺刀柄不放，与被咬的日本兵搏斗。最后被一日本兵刺中肚子，昏死过去。日本兵以为她已经死了，便扬长而去。当准备掩埋时，李秀英在冷风的刺激下醒了过来，被送往鼓楼医院。经检查，身中30余刀。第二天，李秀英流产了，但由于抢救及时，保住了性命。1947年，在南京审判谷寿夫时，李秀英曾出庭作证。

八府塘小学的一个女教师面对日军的暴行万分愤恨，她设法搞到一支枪，准备随时与日军拚命。当日本兵来捉她的时候，她躲在床下面，一连打死了3个日本兵，终因寡不敌众，被日军抓获。

零星的反抗虽然不能遏止日军的暴行，但从这些不畏强暴的人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在"日本的武威"下，中国并没有畏服。

这时，"上海派遣军"的司令部不得不考虑两个问题。一是性病的威胁，二是"治安对策"的实施。

第一，所谓性病的威胁，就是害怕性病在军队内蔓延。在这方面，日本军队曾有过惨痛的教训。1917年至1921年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配合其他帝国主义对苏维埃俄国的进攻，派兵占领了西伯利亚部分地区。侵略战争必然导致军纪的败坏，在日本派遣军中，强奸的事件层出不穷，结果性病便在军中蔓延开来。

当时，日本军方在西伯利亚投入了7个师团的兵力，由于士兵患上性病，几乎有一个师团丧失了战斗力，使西伯利亚派遣军的头目们大为震惊。中日战争爆发后，在南京上海前线的日军司令部，担心日军的这一"教训"又在中国重演，因此提出配置由军方管理的女人。

当时，日本陆军在华中投入了17个师团的兵力，另有13个师团与苏军对峙。如果有期分之一的兵力因性病丧战斗力，不战自溃，那么就等于两个半师团在性的发泄中被歼。在上海战场，由于中国军队的英勇抗击，已伤亡四万人左右，如果再溃散两个师团，那么以后愈演愈烈的战事就难以支

撑了。

于是，在军队配置“慰安妇”，由军队统一管理卫生，统一管理性欲的构想便成熟了。

第二，“治安对策”的问题，也就是在占领地怎么维护日军统治的问题。如果想“永久性”占领，就不得不考虑“治安”。日本官兵对中国妇女的凌辱，只能激怒中国民众，推动抗日民族激情的高涨。然而对日军来说，要其舍之，必须予之。不让士兵强奸当地中国妇女，就必须给士兵以“军妓”。

于是，日本军部决定采取日俄战争时期的作法，1937年下半年决定给日本侵略军配备慰安妇。

A 大半是朝鲜妇女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从朝鲜诱起来的慰安妇达一半以上，有时甚至达到80%，为什么慰安妇中朝鲜人如此多呢？理由有三：第一，朝鲜从1910年就被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后方，可以用强制和诱迫的手段征到大批年轻女子当慰安妇。

第二，朝鲜妇女性情温柔，吃苦耐劳，身体强壮。

第三，朝鲜少女多属处女，无性病顾虑。

于是，为了满足军队慰安妇的需要，陆军首脑的目光盯住了朝鲜半岛。

从朝鲜半岛竟征集了多少妇女，目前已无确切的资料。根据汉城报纸的记载，从1943年到1945年，共动员了二十万年轻的朝鲜妇女加入“挺身队”，其中约有五-七万人当了慰安妇。

一名记者在文章中愤怒地控诉说：“万恶的日本军国主义在临近战败时，把从这块土地上征集挺身队的记录全部烧毁了，没有留下确切的资料。从1943年到1945年这两年间，就有五-七万人被征为慰安妇，如果从中日战争开始算起，应该有十万人左右。”日本军队在朝鲜具体是怎样征集慰安妇的呢？原善四郎原是关东军后勤少校参谋，现在隐居大阪市的南面，已成了一位温和宽厚的绅士。

“当时的陆军，一下达新编部队的动员令，便开始从朝鲜半岛征集慰安妇吧？”记者开始询问。

“是的，当时属关东军怀念部参谋第三科管。”“在朝鲜，具体是怎样征集女性呢？”“主要靠朝鲜总督府总务局进行。”“只提供必要的数字，以后就由朝鲜总督负责征集，对吗？”“是的。”“所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军队的请求即使不是命令，朝鲜总督不敢怠慢，同样具有强制性。”“不能这么讲，不过，当时，朝鲜总督命令各道，各道又命令各郡，各郡又命令各面。面相当于日本的村。”“于是，征集女性的最后责任者是面长了？”“是的。”她告诉我，回到内地的慰安妇们，从不往来。“都有着想抹也抹不掉的悲惨过去呀！”她的脸阴沉了：“也不想再见过去接待过的士兵，只想在世上的角落里，安安静静打发残生。我讨厌回忆。”战后，她对谁也没提过当慰安妇的事。

“对不起！现在还患有不感症吗？”我问道。

“奇怪的问题呀！”她笑了。“当然，为了回家才这样的，理应为伤残军人，由政府发残废金。”说着，她又笑了。

慰安所的设备设施，最初是在兵站适当制作，随着战线的扩大，就利用中国民房作慰安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战线向南方推进，于是就在日本国内设计好“简易慰安所”，把材料作为军需品，用军用运输船运去安装。

在慰安所中，有的慰安妇一直到四十二岁，有的从1938年底一直干到战败为止。

慰安妇中，日本慰安妇和朝鲜慰安妇之间也有差别，朝鲜慰安妇的住房条件大都不好，日照也差。

在麻生军医的报告中说，朝鲜慰安妇多为处女，因此事故也多，这种事故被称之为“慰安妇事故”。

前面所表示孙吴工作的军医就写过这种报告。他说：“在孙吴，有一天，一名朝鲜慰安妇请我去。开始我以为有什么企图，看样子又象。我在后方担任军医，与她们互不认识。我想也许她们觉得请我帮助容易一些，于是便去了。一进门就听她说：‘请看这个。’一开，只见壁柜中睡着一个刚出生七天的婴儿。”‘是士兵的孩子？’。……‘自己生的？’。……”“不管问什么，她们都不回答，与其说瞒过了军医的眼睛，不如说她们自身对性问题。……每村都有派出所，驻着日本警官。好像是警官和面长一道儿，从贫苦的农家招募了一些姑娘，只召年轻的未婚女性。当时以为是到日本内地的纺织厂和军服厂工作。这是开始的情况。”“1939年至1940年还那样？”“有组织的强行征集是1940年以后的事。”“在我故乡是这样。”“忠清北道，位于南朝鲜的中心农村地带，从1938年末至1939、1940年，警官和村长来到农民家，以欺骗手段征召慰安妇。

全罗南道出身，1938、1939年在釜山日本饭馆帮工的柳慧林也告诉过我同样的事。

当时的警官权力很大，从某种意义上讲，握有对农民的生杀大权。

随着战争的扩大，自1943年开始从朝鲜有组织地大量征集女性，名义上是让她们加入“挺身队”。凡十二岁以上，四十岁以下的未婚女性，都属加入“挺身队”的对象。根据南朝鲜统计，总共征集了二十万人，其中有慰安妇五至七万。

一位调查此事的朝鲜报社记者写道：“首先只挑选十八岁至二十二三岁的年轻女性作慰安妇，中年女人送军需工厂。对当时的事情，曾在总督府工作的人都守口如瓶，一问都说：‘我不知道。’‘我忘记了。’究竟按什么标准选择慰安妇呢？是漂亮，还是只要年轻就行？至今还是个谜。”当时作为学生参战的韩云史回忆说：“士兵们都争夺着送到第一线的女人。

一个小队平均分配两三名，作为天皇的赐品，送给性饥饿的士兵们。她们从早到晚受着不同部队的蹂躏，必须忍受同样的屈辱。“在这些少女中，有些忍受不了这种耻辱的生活自杀了。送到南方和菲律宾等地的女人们，大部分都悲惨地死了。

一位曾在前线作战，当过战俘的教授说：“战败后我曾见到同盟国用船运回港的慰安妇，她们就像从地狱出来一般，与其说她们是获得自由而高兴得流泪，不如说是为失去了青春而悲痛地号哭。”住在江原道的运河澈告诉我说：“在带人的前三天，加入挺身队的通知书就来了，派出所的警官们拿来的。警官便在这些农家打转，哪家有未婚女性，多大岁数都一清二楚。在三天内也有逃跑的，只要发现，就要抓住戴上手铐，关进拘留所。”“征集数目有多少？”“十八岁以上的未婚女子都行。最早去的不可能不透露她们的情况，一旦知道征召挺身队的真相，各家各户都慌忙让姑娘嫁人。要出嫁也不容易呀！四肢健全的男人，几乎全应征到了部队，或者去了日本煤矿和工厂，找不到结婚的对象……”“那怎么办呢？”“只剩下老弱病残，那也没办

法，为了不加入挺身队，只有和他们结婚，不存在什么个人的意愿。总之，嫁给他们的比加入挺身队要强。所以解放后，到处都是离婚的悲剧。”战后，这类离婚高潮已成为国家的某种社会问题。在儒教思想浓厚的这个国家，战前若说要离婚，简直不可想象。

“没有逃往山中或别处去的人吗？”“有，可是本人逃走了家里人还在。罚金刑罚都跟着来了。”“罚金多少钱。”“十四元，是当时一户农民三个月的副食费。除了罚款，警察还一天到晚在家周围打转，一旦被捕，立刻送往挺身队，那就别想再活着回来了。”“通知书来后第二天，在哪里集中呢？”“派出所。由警官带队坐火车，一直监视到汉城。送行的母亲们都抱着女儿的腿嚎啕大哭。

警官要把她们分开，她们又抱着警察的腿哭。女儿们都哀求说：‘让我回去吧！请救救我！’可警官一脚就把她们踢开了。都是贫苦百姓，她们也是人啊！”“到汉城后被带到什么地方呢？”“都是些农村姑娘，没进过京城，不知道被关在什么地方。”那些帮助征集慰安妇的，除了日本警官，还有朝鲜警官。

“战后警官一打背包就回日本了，朝鲜警官背叛了自己的同胞，同村人对他们恨之入骨，据说有人被打死。”这是怨恨，这是被夺去亲生儿女的双亲心中迸发的怨恨。

朝鲜半岛，这些被害的姑娘有五-七万，她们的父亲有五--七万，她们的母亲同样有了五-七万。相比之下，被打死的警官又有几个人呢？有一个接到加入挺身队通知的姑娘逃到了山中，事先和家里人约好，给她偷偷送粮。可是，警官知道她逃跑后，殴打她的双亲，并把她家监视起来，他们无法给女儿送吃的东西。

姑娘的双亲因思念女儿，饭食不进，一九四四年初夏，母亲便卧床不起，不待解放之日便死了。

后来，日本被打败了，她父亲在梦中见到死去的妻子，妻女告诉他去西北方向的山里。

她父亲在那里的松树下，发现了一堆白骨，松树上系着一根绳子，于是，便把白骨带回家中，葬入她母亲的坟墓。战争后，在朝鲜有多少这样的坟墓啊！

在忠清南道的天安，一名挺身队员在火车开往汉城时，从火车上跳下，撞在铁路旁的电线杆当即身亡。车内的姑娘全体放声大哭，任警官打骂也无济于事。在那姑娘死的地方，每天都有人摆上花束，直到解放之日。这是她的母亲，在深夜人静时来到那里放的，从天安到那里要走数小时。解放之日，再没人送花了，因为她母亲心力交瘁死了。

从这里被带走的挺身队员，没一个人回来。

我在朝鲜半岛，只见到一个当过慰安妇的女人。她皱纹满面，老态龙钟，可她才五十二岁。

“您是一九四三年参加挺身队的吗？”“我是昭和十五年（1940年）去的。”“警官和面长诱骗参加的吗？”“面长没来。”“来的日本警官？”“一个日本男人。”她言语极少。

“您的故乡在哪里？”“。……”她沉默了，即使翻译再三劝说也没用。不能回到故乡的人，却要告诉别人自己的故乡，不是太滑稽了吗？我忽然想到这点。

“在哪个战场？”“支那。”她仍把中国称为支那，至今还想着过去经历的痕迹“中国，不，支那什么地方。”“到处走。”“能告诉具体的地名，或者同行部队的番号吗？”“。……”“受过不少苦吧？”五-七万名朝鲜姑娘被当作慰安妇，送到日军各战线，加上以前征集的，就有七--九万人，这些都是年轻、未婚，将来做母亲的姑娘们啊！

军部的确残酷无情。他们大量征集朝鲜慰安妇，是由于看中了某些民族性格。

一位原职业军人是这样说的：“日本慰安妇可以放心，朝鲜慰安妇也可以放心，她们即便天天和士兵在一起，也不会向敌方泄露情报。之所以不征集中国女性作慰安妇，就是为了防谍。正因为如此，所以喜欢朝鲜慰安妇，内鲜一体，也就是把日本内地人和朝鲜人作为一个整体，其防谍意识非常强。把朝鲜女性编为慰安妇，多少有这些因素。”实际上呢？当时根本不把朝鲜人当人，就如路边的石头、杂草，随意践踏。内鲜一体，也只是说说而已，在朝鲜半岛上住着的中年女性心中，直到现在还深深埋藏着仇恨、怨痛。

这在心上砍下的伤痕，什么时候才会治愈呢？A 诱其中国妇女在侵华战争初期，日本侵略者不敢多招中国慰安妇，但在占领中大平河山、沦陷区统治相对稳定后，就通过汉奸诱其中国花姑娘当慰安妇。

日本侵略军先在沈阳和东北妇女征召慰安妇，既而扩大到内地，仅南京一带就有820人，台湾也有许多妇女被征为“。……”“在士兵中有亲近的人吗？”“。……”“什么时候回国的？”“。……”记者合上笔记本不再问了。虽然交谈不多，我却明白了很多很多东西。记者痛切地领悟到，她的沉默胜于雄辩。她们不仅肉体受到蹂躏，她们的人生也遭到无情的践踏。

五-七万名朝鲜姑娘被当作慰安妇，送到日军各战线，加上以前征集的，就有七--九万人，这些都是年轻、未婚，将来做母亲的姑娘们啊！

军部的确残酷无情。他们大量征集朝鲜慰安妇，是由于看中了某些民族性格。

一位原职业军人是这样说的：“日本慰安妇可以放心，朝鲜慰安妇也可以放心，她们即便天天和士兵在一起，也不会向敌方泄露情报。之所以不征集中国女性作慰安妇，就是为了防谍。正因为如此，所以喜欢朝鲜慰安妇，内鲜一体，也就是把日本内地人和朝鲜人作为一个整体，其防谍意识非常强。把朝鲜女性编为慰安妇，多少有这些因素。”实际上呢？当时根本不把朝鲜人当人，就如路边的石头、杂草，随意践踏。内鲜一体，也只是说说而已，在朝鲜半岛上住着的中年女性心中，直到现在还深深埋藏着仇恨、怨痛。

这在心上砍下的伤痕，什么时候才会治愈呢？A 诱骗中国妇女在侵华战争初期，日本侵略者不敢多招中国慰安妇，但在占领中大平河山、沦陷区统治相对稳定后，就通过汉奸诱骗中国花姑娘当慰安妇。

日本侵略军先在沈阳和东北妇女征召慰安妇，既而扩大到内地，仅南京一带就有820人，台湾也有许多妇女被征为慰安妇。中国沦陷区的无数妇女惨遭日军蹂躏和糟蹋，被日本侵略军夺去了宝贵的青春和生命，不少人被强奸后，再凶残地杀害。

A 征召日本妇女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用冠冕堂皇的“为圣战服务”的招牌，诱骗许多日本妇女当随军慰安妇。

日本陆军用什么方法，在日本国内征召慰安妇呢？军队自身也像转卖妓女的人贩子那样干吗？六十二岁的田口荣造（假名），住在福冈市内东面。

一九三八年征召军队直辖慰安妇时，他就是其中一名执行者。

“接到命令是哪年哪月？”“大概是1937年年底吧。”“你当时是军人吗？”“既不是军人，也不是军属。”“工资从联队领吗？”“联队管饭，不管工资。”“当时是军队要你征召慰安妇的吗？”“好像不止我一个人。”“在上海等地征召慰安妇？”“不，在日本内地。”“怎么征召呢？领先在内地开妓院的老鸨吗？”“不，在私娼集中的地方征召。我所在的部队，北九州的士兵很多，同乡女人好些，因此我在北九州征召。”“就是说征召有卖淫经验的妓女，条件是什么呢？一般来说，老板先借给当妓女的一笔钱，拴住她们，随着吃、穿用和手纸钱的增加，钱越借越多，实际上永远陷在里面出不来了。军队征召慰安妇，也是这么办的吗？”“稍好一些，先借支她们一千元（日元），一旦全部还清，人身就自由了。”“那么，手纸钱、膳食费、衣裳费等等。……”“军队只供饭，因为是在战场上。开始征召的人不是很多。

应征时，她们认为，自己这种肮脏之身，竟还能能为士兵效劳，为国尽忠，因此非常高兴，对她们的热情，我也非常吃惊。不过，当时的日本，到处摇着太阳旗，流行着‘胜利归来吧，勇士们’的歌，这也是经过军国主义政府宣传洗脑的结果吧。”“这次征募是军事秘密，应募的女人都悄悄集中的。”“用军用运输船运到中国大陆去的吗？”“运送她们是个棘手的问题。当时陆军规定，运送的物资是士兵、军马、军犬、军鸽，没有妇女一项。不能破坏军规，运输指挥官感到很难办。”“最后怎么样呢？”“决定作为物资运送，作为不是武器弹药，不是粮草药品的物资运送。”“物资？把人当军用物资运送？”“作为军队，不这样就没办法，对此慰安妇们倒没说什么，她们被人践踏惯了。”“为军队征召的妇女，难道不能作为军属对待吗？”田口没有回答这一问题。

“召集了多少女性？”“一百多人。”“都是日本女性？”“有少数朝鲜人。”“她们是从哪儿征召到的呢？去朝鲜半岛了吗？”“不，都是在北九州。”从北九州征召的百名慰安妇，被运到上海，收容在其美路沙泾小学。麻生军医就在那时接到的命令。

麻生彻男毕业于九大医学部，学的是妇产科。战时作为军医少尉被征入伍，分配到第十一兵站医院。在只有男人的军队，完全没必要设妇产科，因此，他转为外科医生。一天，他收到一项奇怪的命令：为了近期开设陆军娱乐所，要他立刻去其美路沙泾小学，给等候在那里的百余名妇女检查身体。

发令者是兵站司令部。

麻生医生告诉我：“开始看到陆军娱乐所的名称，还以为是表演伎艺之类的场所。我想等在那里的妇女可能是弹三弦唱唱歌，从内地前来慰问的艺伎。不过，对作妇检感到奇怪，而且，一百多人也似乎太多了。”“不知道陆军娱乐所，实际上是变相的妓院，是慰安妇们卖淫的地方吗？”“是啊，当时的陆军被称为皇军，身为皇军的日本兵，把这次战争当作圣战，怎么会需要女人呢？”“只您一个人给她们检查吧？”“还有一名军医、七名卫生兵和两名护士，一共是十一个人，地点在上海沙泾小学的医务室。她们对妇检习以为常，非常熟悉，只希望有个检查台，说话的口吻丝毫没有一般女性的羞涩。当时朝鲜女性占百分之二三十，她们不习惯这种检查。”“不习惯这种检查的都是朝鲜人吗？”“无法交谈，难以说清，总之，她们处女占多数。年纪小的女性也多，日本女性年轻的和中年人都有。一听她们的口音就知道，都是来自北九州。一看模样便知几乎全是妓女。检查时，我发现其中有人曾

患过重症花柳病，做过手术，因此非常吃惊。”“有不合格者吧？”“没有，我想由内地出发前一定检查过。”这次妇检后，日本陆军配属的慰安妇正式诞生了。营业场所在军工路附近的杨家宅，并且制定了陆军娱乐所的规则。

娱乐所的门前挂着大标语：“欢迎圣战大胜的勇士”“奉献身心的日本妇女服务。”给第一批慰安妇作过妇检后，麻生医生就战场上性欲的问题，以及对军部最为担心的花柳病的预防和提高慰安妇素质等问题，写了一篇长达九章的意见书。

这份意见书在军部中坚干部中引起很大兴趣。“找敌人要粮”是军部中对干部的作战思想之一。于是，在中国农村作战时，从农民手中掠夺粮食已成为日军的惯例。与此同出一辙的思想“找敌人要女人”不也可以吗？但是，高层干部认为，攻陷了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日中战争就结束了。他们与中坚干部长期作战的思想有分歧，因此麻生军医的意见书也就受到冷遇。

当蒋介石迁都武汉，表示抗战到底之后，他们才意识到中坚干部提出必须准备长期作战的思想是正确的，于是，又重新考虑其慰安妇的问题。

从日本征召第一批慰安妇，是在1937年底攻陷南京之后，徐州会战之前。设置慰安所，征召慰安妇，表明陆军已放弃短期作战的思想。

从中国战场，慰安妇的数目急剧增加，据推定，1938年10月28日攻占武昌、汉口时，已有三四万名慰安妇被征召到中国战常

二、备受折磨的慰安妇

——传说妓女接客世界纪录是古罗马时代，据说妓院每人一天接待罗马士兵近100人次，但这个纪录被慰安妇给打破了。……慰安妇从性别上讲是女人，但自从她当了慰安妇这种在世界军事史上相当少见的角色以后，其作为工具的性质便成为压倒一切的至关重要的性质，而其性别特征则退居次要地位，只能为其成为工具提供某种生理上的保障。这种女人已被从根本上取消了其天赋的母亲的权利。如果慰安妇不幸怀孕了，那么她将无法逃脱被遗弃的命运。

一个慰安妇哭诉她的非人强化训练的遭遇时说：“第一个留着一撮小胡子的中年军官，在进门之前他已脱得全身一丝不挂，高挺着他的阳物一步步朝我走来，我吓得大叫起来，拼命往屋角躲，他扭住了我的手腕，三下两下就把我剥得精光，我被他按在地板上动弹不得，我只感到两腿间一阵剧烈的疼痛。……此后我一直恍恍惚惚，只记得不断地有人推门进来又推门出去，当第五个军官趴在我身上的时候我以为我快要死了，我不知道我的阴部是否在流血，但我知道肯定已经肿了，我两腿间像夹着一团火，灼得我撕扯般地疼痛。我的眼泪禁不住汨汨而下，我想起了远隔重洋的家，家里的爸爸妈妈和一大群弟弟妹妹。趴在我身上的日本军官还以为我是兴奋得哭了，对我说：宝贝，以后这就是你的工作了，你将尝遍我们皇军的滋味。……那时我才16岁，我还完全不知道男人。”经过如此这般的三天强化训练之后，慰安妇们便被分头送往日军开辟的各大战场，正式成为随军慰安妇。

A 军营边排起了长队，在大雨里等候性交；战场成了野兽交配场既然慰安妇仅仅是一种解决日军性欲问题的性交工具，那么只要保证维持这种工具

的存在就行了。部队官兵的性欲在战争的特殊环境恶性膨胀到足以影响士气和战斗力的时候，前往平息那些官兵的勃勃欲火便成为她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不知是由于战争的特殊环境所致，或是日本男人本来就有着超乎人的性欲，总之战时的日本军队的确像是一群急待交配的野兽。在南方某地战场边驻扎着六百多日军。一天，一艘运输船载来了二十名慰安妇。违女人已久的日军官兵欣喜若狂，一时间欢呼声响彻云霄，其狂热的场面绝不亚于天皇出巡。而有的士兵竟兴奋得大声哭起来。

的确，对于这六百名精壮男子来说，二十名慰安妇无异于雪中送炭，虽然20比600这个比例也许是悬殊了一点。由于慰安妇的日程表安排得很紧，在此一地仅能停留两天，饥渴已极的士兵们当即聪明地选择了军营的练武房作为他们天地之合的所在，用二十条毯子将练武房的巨大空间隔成二十个小格，每个小格外都有三十余人排队等候，出来一个随即进去一个。有个执勤兵在门口发放避孕套，并催促里面的人赶紧完事。排队的人个个严肃地向前挪动脚步，倘不是人人身穿军服，真会使人误认为是逢庙会香客们到庙里去进香。出来的人除略带一丝疲倦外，个个脸上都分明地写着满足。

为了节省时间，很多士兵在进练武房之前都已除下全身衣裤，万事俱备，只等交配了。

排在后面的人支楞着耳朵倾听着练武房不时传出的呻吟声和粗重的喘息，渐渐地有些把持不祝练武房的屋顶由于美军空袭而变得千疮百孔，仰面朝天的慰安妇从屋顶的破洞可看到一片铅灰色的天。在这样的破屋顶下从事男女交媾之事本来是不乏一些野趣的，但偏偏天不作美，一会儿竟下起了倾盆大雨，雨水从屋顶哗哗地漏下来，但"慰安"并未因此而中断。场外的士兵在一派烟雨凄迷中严肃了，变得坚定不移。练武房内，无论是在下面的慰安妇还是在上面的士兵都被雨水淋个透湿，两个叠在一起的肉体变得滑溜溜的，泛着白光，像是两个重叠的银鱼。

这支部队的幸存者之一，后来对《日本军队与朝鲜籍慰安妇》一书的作者川田泰代描述了这次风雨无阻的慰安。他说：“……大雨像瀑布般往下倾泻，男人女人被浇得浑身是水。

明明是白天，却阴暗如同傍晚。在昏暗的光线中，湿湿的妇人身体像涂了夜光料般闪着灰白的光。女的脸面我已经忘了，只记得她的双腿张得很开，身体很瘦，但乳房却大得胀鼓鼓的。在右边的乳房上有块红痣。她的下身湿透了，我不知是雨水还是上个士兵留下的精液。女人问我故乡在哪里，我回答是山梨县。女人说她是秋田县的，她声音像美妙的音乐一般。雨水不断地淋在我脊梁上。正在进行中，家乡的事忽然浮现在我脑际，我感到自己这种存在十分可怜。当我离开房间时，女人仰卧在那里，她说：“满足了吗？我可以再照顾你来一次。”A1：300，创造妓女接客的世界纪录传说妓女接客世界纪录是古罗马时代。妓院每人一天接待罗马士兵近100人次。但这个纪录立即被慰安妇打破了。古罗马的妓女与慰安妇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在南亚的腊包尔驻扎着三千日军。一天，十名流动服务的慰安妇从特拉克岛来到这里。

过了半年禁欲生活的士兵排了三公里的队伍。粥少僧多，每个慰安妇必须在一天时间内接待三百个士兵。

这次慰安可说是凄惨无比。地点设在十一个简易帐篷里。

慰安妇赤身裸体躺在席子上，大张着腿等着一个又一个如狼似虎的士兵猛扑上来。因为慰安妇太少，所以每个士兵能支配的时间不允许超过三分钟，往往是前面的人刚进屋，门外排队的士兵就在七嘴八舌地催促：“快一点，人还多呢！”就算每个士兵都不超过三分钟时间，要接待三百个士兵，这些慰安妇也不得不连续工作十七个小时。她们是性交机器，但机器也需要定期地上润滑油，随时保养。饶是这些慰安妇已操此皮肉生涯几个春秋，但三千日军，毕竟还是远远超过了她们羸弱的身体所能承受的限度。

四五个小时之后，她们已感到口干舌燥，浑身酸疼，尤其是阴部和臀部和大腿完全浸泡在精液里。因为很多士兵来不及戴避孕套。甚至已开始麻木起来。但门外的日军还在一个接一个地猛扑上来。这个流程并未因为到了用餐时间而中断，既然是工具嘛只要是存在就行。

因为门外还有大队士兵迫切需要她们的肉体，所以她们是不允许坐起来从容吃喝的，她们必须一边吃喝一边继续与一个接一个的士兵进行交配。

一个慰安妇确实不能忍受这种过度的纯粹动物式的交媾，生理上的不适感加上心理上的极度厌恶感，使她刚吃下去的两个饭团又呕了出来。

A 卫生性公共厕所倘若单是两性交合倒也罢了。但在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又被卷入战争的日军士兵和慰安妇，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一种相当特殊的文化现象。研究二战期间战地日军的特殊心态，对于所有爱好和平、致力于反战工作的人们大概是不无裨益的，这需要专门的研究家来进行。总之，绝不能把这些日军看成单纯的男人，他们的性欲也不同于正常男人对于异性的合理欲求，而是动物性的原始冲动空前的恶性膨胀，在相当大程度上带有兽性的色彩。

如果说在战争之初，日军官兵主要还是把这些慰安妇的肉体作为他们妻子或爱人的替身来拥抱，交媾的话，那么愈到后来，尤其是日军在各大战场上的形势迅速逆转，已注定难逃失败的可耻下场的情况下，他们对于慰安妇更是极尽性摧残、性虐待之能事。很多日军都把慰安妇称作“野鸡”、“卫生性的公共厕所”，白天在九死一生的战场下将罪恶的子弹不断射向抵抗部队的官兵或无辜百姓的身上，晚上带着满身血污和尘土回到慰安妇身边将其变态的性欲倾注到这些“卫生性的公共厕所”里面。

慰安妇收费标准也体现出民族差别，一般按中国人、朝鲜人、日本人的顺序分别为每人一次一至三元，若过夜则另外加算钱，有时根据具体情况还可以略作调整。当时一般士兵每月薪水为20元，但绝大部分士兵都愿意把这笔钱花到慰安妇身上。尤其是在设有专门慰安所的部队，慰安妇的供与求相对能保持平衡，很多士兵甚至不惜倾其一个月之薪水以求得一夜销魂。

一次，一个刚满二十岁的士兵第一次光顾慰安所，他在慰安所的行政收费处只交了两元钱，按规定他应该在半小时内完事退出，但这个士兵因为初试云雨，特别亢奋，兼以身体特别强壮，一次之后还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再度抖擞起精神，继续战斗。行政收费处管事见他到点了还没出来，以为他是故意占便宜，推门进去见他正翻江倒海，一边继续动作一边伸手从军裤里掏出一大把钞票看也不看就递给那个管事的。

后来据这个慰安妇说，这个年青士兵当时完全处于一种痴迷状态，他似乎已累得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但动作幅度和力度并不稍减，四五十个高潮之后，他已经完全不行了，但他显然已经神思恍惚，依然机械地动作着。

慰安妇被他这种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劲头吓呆了，小心翼翼地劝他保重身体并欢迎下次再来，但他竟恍若无闻，直着脖子，丝毫不为所动。慰安妇吓得大叫起来，她意识到不借助于外力，显然已经不可能摆脱身上压着的这个疯狂的永动机似的年青士兵。

后来还是外面的人听到慰安妇的尖叫，来了三个士兵把那个歇斯底里的家伙从女人身上强行抬走，方才结束了这场马拉松式的交合。那个年青士兵一离开女人身体便马上晕了过去，他已经完全虚脱了；而那个倒楣的慰安妇了被迫休息了一天，因为她的阴部已红肿不堪。这次交合历时二三个小时。这个慰安妇后来每每回忆起此番经历都还不免心惊肉跳，余悸在心，据她说，她后来时有发作阴道痉挛症就是那次灾难性的交合留下的恶果。

A 白天是杀人机器，晚上是性交机器普通士兵对慰安妇是如此，而一般说来，军官态度还要粗暴得多。因为他们更加清楚这种女人作为性交工具的性质，到了战争后期，其实这些军官又何尝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命运。但这毕竟改变不了日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的趋势，他们把这种死一般的绝望连同体内那种兽性的冲动作一股罪恶的力量，歇斯底里地报复到这些可怜的慰安妇身上。

一支驻扎在云南腾冲的日军就近抓了30名中国姑娘作慰安妇。当时失败的气氛已经感染了整个中队。每个人都分明感到死亡阴影的逼近。中队长太田负责指挥这支队伍。一米八五的个头，精力充沛，性情粗野，是一个令部下发憊的指挥官。从各地战场陆续传来的消息使这个战争狂人空前清醒地认识到：这场由他们挑起来的，将世界搅得天翻地覆的战争已到了收场时候了，末日即将来临！他因此变得比平时更加烦躁，白天他努力维持着自己强人的形象，在士兵中间往来指挥，但晚上，魔鬼便露出了他虚弱、乖戾的另一面。近来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在一个名叫娅琼的慰安妇那里过夜。

这是一个十九岁的傣族姑娘，却有着傣族姑娘中罕有的白皮肤。太田队长所以特别青睐这个姑娘，不仅因为她的处女之身，她的难得的白皮肤，还因为她有一双修长的大腿、一对硕大性感的乳房。自从太田队长为这个“原装货”举行了“开封”仪式之后，她便几乎成了他的专有物。无论战场上的怎样疲倦不堪，但只要一到天黑，体内便立即条件反射般地升腾起按捺不住的欲火。战争的胜败不是太田队长决定得了的。但他的性欲并不因此而受到丝毫影响。他那阳物每晚能勃起多次，这一特异功能太田队长自己都每每感到惊奇不已。

那个慰安妇自从被抓来一直哭哭啼啼的，太田队长知道自己粗大的家伙使这个女人受不了，但太田队长，这个强悍的日本军人是知道如何充分利用这个已到手的性工具的。坦率地说，他在女人床上的表现远比在战场上的表现高明得多，虽然在他看来这二者之间亦不无共通处，即采用强力措施。每次都是用他那双大手猛地扯开那个小姑娘的衣裤，然后像拎小鸡一样把她摔在床上。这两个简单连贯的动作使他感觉到自己巨大的力量并获得一种奇特的快感。紧接着他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把自己肥硕的身体像山一样地压向吓得蜷缩成一团的小姑娘。他粗壮的肉体几乎把身下的小姑娘覆盖得严严实实。他只听到自己沉重的喘息，和身下小姑娘连同床一同发出的呻吟。是的，在八十余公斤的重压下，小姑娘和床都不可能不发出呻吟。

这种地狱般的日子她再也无法忍受了。带着满腔的仇恨和无尽的屈辱，她出其不意的抓坏了太田队长的睾丸。这一前未有的行动使得太田队长狂怒

不已。他大概是的确没有料到这个"活工具"也还有着反抗性。狂怒之下，他用自己的指挥刀残忍地割除了她的阴蒂。她痛得昏死过去，又被用凉水浇醒。太田队长在一旁得意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如此折磨了几个小时之后，他才一刀挑开了她的胸膛。娅琼，这个十九岁的中国姑娘，日军慰安妇，在被太田队长榨尽了精血之后，又悲惨地死在这个魔鬼的屠刀之下！

A 避孕套成了战时必备品日本军部设立慰安所的初衷，是想让这些在健康方面有保障的慰安妇即所谓“卫生性的公共厕所”来有组织地解决官兵的性欲问题，以免官兵因难耐性饥渴之煎熬而冒着染上性病的危险去光顾各地的妓院。看来日本军队的确是一支重视健康原则的军队。

及至这些慰安所有如雨后春笋一般迅速在各个地方建立起来之后，日本军方又明确规定：严禁不戴避孕套的官兵与慰安妇性交。一般说来，排队等候的士兵在进门之前都会领到管事发给的一个避孕套，其费用则已包含在官兵缴纳的那一到三元里面了。这一方面是为了进一步确保日军奉行的健康性原则得以贯彻实施，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慰安妇因性交而怀孕。避孕套成了战争必备品。这实际上是充分考虑到慰安妇作为工具的性质。既然是工具那么就只能被人随意使用以达到某种特定目的，而慰安妇一旦怀孕就不能很好地效劳于她的客人（即皇军）而且还会成为一种累赘。

三、战败后被遗弃的慰安妇

日本侵略军中的慰安妇的历史，自1938年开始，至1945年8月15日宣告结束，但是做过慰安妇的女人，即使在回到自己的国家之后，仍然受到同胞的蔑视和政府的歧视。她们将背着这段无法磨灭的历史，忍辱含垢度过自己的余生。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溃败的日军把为他们服务的慰安妇视为累赘而弃之不顾，流浪中的这些女人命运凄惨至极。

日本投降之前几个月，日军在中国和南亚诸国战场开始节节败退。在一些战场，日军已呈土崩瓦解之势，而与日军同处在战斗前线的慰安妇，其命运比那些仓皇逃难的东北日侨还要悲惨。

当一些日军部队受到包围，慰安妇们白天充当伙夫或弹药运输队，晚上还要慰安从阵地上归来的满身是血的士兵们。

在某个日军阵地，当只剩下八十多名士兵们，一名上尉命令不能动的伤病员吞下氰酸钾自杀。然后对慰安妇们说：“你们请逃命去吧。没有理由为日本尽情义。保重生命回国去。

我们就要追随士兵们之后。”但是，日本人慰安妇劝朝鲜人慰安妇挂起白布投降，自己也吞下伤病兵吞的氰酸钾。

然而，更可怜的是，士兵们死后可以得到奖勋章，得到抚恤金。而这些阵亡或自杀的慰安妇尽管死了，却仍然受到歧视--她们既无勋章，也无抚恤金，甚至没有任何人谈起过她们的存在。

当部队撤退时，慰安妇要靠一双脚和男人们一样翻山越岭，涉水渡河。她们饱受摧残的身体和没走过远路的双脚无法忍受强行军的折磨，有的倒在

路边死去，有的掉队失踪。

在撤退或被围中，饥饿常使慰安妇陷入绝境。有的女人瘦得像骨骼标本，蓬乱的长发遮着皮包骨头的脸颊，样子十分可怕。

在那些溃败的疲于奔命的部队中，慰安妇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开始被当作吃闲饭的碍脚货看待。在某个医院部队的驻地，一些被收容做"辅助护士"的慰安妇，匍匐在树荫底下挤成一团。

她们不但不会作战，而且连一条绷带也不会绑扎。无一技之长，又失去了使用价值，使她们心中充满了自卑。卫生兵们冒着生命危险挖来的红薯，她们无法启齿要吃。最后还是日本红十字会的随军护士拿来几块给她们，说：“喂，吃吧。”听了这句话，慰安妇们哭了。

在这个医院部队里，能够给慰安妇们一点点关照的，就是日本红十字会派遣来的随军护士。她们决不歧视慰安妇，有的还为慰安妇的悲惨处境流下同情的眼泪。

许多被丢弃的慰安妇于逃命中，在饥饿或疾病的折磨下死去。

更残酷的是，有些身患疾病行动困难成了累赘的慰安妇和无法行动的伤病员一起被用药毒死。当卫生兵手拿着注射器向她们走近时，有的在地上爬着躲闪，一面哀求：“别扎！”“免了吧！”；有的抱着树干尖声喊叫：“妈妈--”；有的则决然地伸出胳膊，说：“拜托您啦！”当战况越来越恶化时，军官们就对她们说：“能跟着走的人就跟着走；想自杀的，听任自由意志。自己不能自杀，告诉我们，我们替你处置。”“八·一五”之后，幸存的慰安妇陆续进入各战区日本军妓、歌女集中营，或是收容所。她们有的是随日军一道投降的，有的是有战场上和日军一道做了俘虏的。

人们在攻下日军阵地后看到的慰安妇，有的剃成光头，穿着破烂不堪的军服，浑身污垢，由于营养失调而面色土灰，形销骨立；有的负了伤；有的正在病中苟延残喘。

在云南西南部一个叫太屯的小镇上，有三十多名慰安妇（她们是三百名中的幸存者）被当地军方送进了当地收容所。

这个收容所的条件十分简陋，日本兵几十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负了伤的士兵伤口黑红，发出腐臭气息。由于医疗条件太差，半个月下来，就死了好几个日本兵。在死者的毯子下面，虱子乱爬，随手就可抓起好几个，虱子吃得又肥又亮，肚子里吸满了士兵的血。两三个月的败逃中，随军护士们也由于过度疲劳和营养失调而开始倒下了。

由于饥饿或疾病先死的慰安妇，还算是幸运的，因为还有人埋葬她。但活着的人也没了力气，坑挖得很浅。一次，一个慰安妇死了，活着的人挖了一个浅穴将她掩埋时，她的腰骨从坑里露出来。士兵们又硬撑着有气无力的身子，将她的坟培高。大家既不知道她的姓名，也不知道她的出生地。她直到临死都没有告诉别人，只说了句“请多加保重”，就断了气。

在溃逃中，一些慰安妇也穿起军装，戴上钢盔，看上去就像士兵。有些慰安妇把卖身得来的纸币缠在腰间，在要求士兵带她们逃走时，亮起胀鼓鼓的内衣袋，说：“我们有许多钱。请看有这么多，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不怕。”但那全是只能在日军占领区才能使用的军票。这些军票，随着日本的战败，早已成了废纸。

士兵们个个心里有数，但谁也不忍心对她们说一句：“这些钱不能用了。”这些变成废纸的军票是她们远离祖国、含悲茹苦、受尽凌辱挣得的报

酬啊！

有些仓皇逃命的日军干脆将慰安妇丢弃，任其流浪或死去。有些溃逃的部队把慰安妇当作累赘，甩给医院部队或尚未受到猛烈进攻的部队。而后者则以接受她们为条件，向溃逃的部队索取车辆、燃料等军需物资。

接受慰安妇的部队中有些军官，一得到这些“物资”，便转手卖给当地商人，将卖得的钱私分。

慰安妇们当然只能和士兵们享受同样的待遇。后来，这些慰安妇被送上卡车，运往昆明，在那里等候遣返回国。

在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大城市，医疗条件较好，被收容的慰安妇病患者尚能得到较好的救治；而在一些小城市，医疗条件很差，慰安妇患者被收容后，难免死去。

慰安妇中不少人染上了可怕的性病但更严重的疾病还是肺结核。日军部队医院或卫生队，只对慰安妇的性病及感冒腹泻等小病负责治疗，一般不作内科检查。即使是慰安妇诉说胸部的疾患，也不给治疗。一是当时军医没有特效药链霉素；二是肺结核病需要补充营养，安静地休息，这对慰安妇来说，是无法办到的。

有的慰安妇患病后，每日发低烧、咳嗽，但她们还一面欺骗自己是患了感冒，一面继续出卖肉体。所以当一些患肺结核的慰安妇被当地军方收容时，病情已经到了晚期。

在河南新乡的一个临时收容所中，十多名慰安妇，有三人患了肺结核，其中一人已开始不断地咯血。驻扎新乡的当地驻军卫生队没有救治的药物，只能给她们一些阿斯匹林和止咳药。那个病情到了晚期的慰安妇，只有蜷缩着身子躺在角落里等死。她不住地咳嗽，痰中带有紫黑色斑块，脸色青黄，瘦得皮包着骨。

夜深人静时，她凄惨的哀哭声时常将其他慰安妇惊醒。但她们除了说几句安慰的话外，毫无办法。

这个慰安妇未等到往上海集中登船回国，便死在收容所里。临终之前，她叫旁边的慰安妇从她的手提箱里拿出一套半新的干净衣服，说：“请你帮我换上。”说完，便偎依在女伴的怀里咽了气。

另外两名病况稍轻的慰安妇则拿钱让看守买来一些大蒜，每天挤一点大蒜汁煮汤喝，想以此使自己活下去，回归祖国。

1945年末，成立不久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派抗日军干部来中国接走了朝鲜人慰安妇。当朝鲜抗日军干部来到重庆收容所，接那些朝鲜人慰安妇时，她们和日本人慰安妇拥抱告别，个个泪流满面。这些被迫害、被强制征集来的朝鲜妇女，好不容易盼来了回国的一天。但她们的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作为慰安妇被日本兵蹂躏的历史将永远烙印在她们身上，尽管回到故乡，这种耻辱却是永远也无法抹去了。

日本人慰安妇望着她们渐渐逝去的背影，久久地挥着手，脸上挂着惜别的眼泪。

1946年6月上旬，重庆收容所里的日本人慰安妇乘卡车经洞庭湖到汉口，然后又经南京去上海登船回国。

随着日俘日侨大遣返的结束，在战场上和非人生活折磨下幸存的慰安妇们和日俘日侨一起回到了日本。这些本来年轻活泼、应该成为好母亲的女人，已变成了被魔鬼攫走灵魂、榨干血肉的皮囊。

四、慰安妇事件的曝光经过

——侵华日军招募"慰安妇"史料被公开后，日本政府迫于舆论的压力，一改过去矢口否认的态度，承认日本皇军与"慰安妇"有关。但，对慰安妇问题，日本政府却回避责任，而把包袱推给民间组织！

“慰安妇”事件，过去有人提起过，但因缺乏大量的资料和证据，未能引起人们重视。

日本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推说战时日本军中的"慰安妇"系民间人士所为，与日本政府无关。

企图掩饰事实真相。

1963年，日本《每日新闻》记者千田夏光，奉命制作《太平洋战争回顾》特集，他在审阅的两万多张旧照其中，发现一张以徐州会战为背景的照片，内有两名女性卷起裤管，随日军渡河。中国战场的日本部队出现女性，是一件叫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千田夏光追查了五年，才证实日军征召"从军慰安妇"的事实。与此同时，日本中央大学日本现代史教授吉田义明在日本自卫队防卫研究所图书馆中，发现陆军部与派遣到中国大陆日军各部队间的机密文件缀成的《陆支密大日记》资料。资料中记载：“1938年3月，日本军部要求各派遣军招募营妓时，必须慎选适当人员，要与地方上之宪警单位秘密合作，以保持军队威信及避免产生社会问题”；并露骨要求各部队"尽速设立性的慰安设施"，因为日军强奸中国妇女，更激发了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使得日军战力深受阻挠。

……吉田义明很快将这一史料公诸于众，引起亚洲各国的重视，一时舆论大哗。

侵华日军招募"慰安妇"史料被公开后，日本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一改过去矢口否认的态度，承认日本皇军与"慰安妇"有关，但是采取虚与委蛇的做法，不予真诚理会。

日本北海道选出的国会议员伊东秀子看到自己政府像说谎者被拆穿谎言之后还要继续赖下去的态度，愤愤地说：“日本政府的这种态度就是不能原谅！”她在本届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中以"慰安妇问题提质询，要求政府编列预算，就这一问题进行调查及处理。在国会质询过程中，伊东秀子找来当时被强制征召的"慰安妇"的证人到国会作证，她并表示将继续在防卫厅寻找新资料。

随后，在日本报章刊登了一位日籍"慰安妇"的长期回忆文章。那位"慰安妇"从1943年被征召到军队，从日本、韩国到中国东三省及太平洋诸岛国，她和来自日本、朝鲜、中国的"慰安妇"一起目睹战争最残酷、最恐怖的情景，她们自身则受尽蹂躏，备尝艰辛，经历了一段羞辱与痛苦、完全是暗无天日的军妓生涯。“慰安妇”生活猪狗不如，常常吃不饱、穿不暖，每天要供十几个、甚至二三十个日本官兵泄欲。

她们之中许多人被摧残得不似人样，或死于非命。这篇回忆录揭露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日本大举侵略东亚及东南亚各国时，日本军方在日本、

朝鲜、中国强征"慰安妇"随军，并非出于对日本士兵作"人道"方面的"关爱"，其目的在于以此提高日本军队"士气"，推进侵略战争。正如伊东秀子所言"慰安妇问题最能表现出日本过去发动战争的本质"。

A 右翼分子黑心肠日本右翼分子越来越以厚厚的钱包为资本，起劲地否定侵略战争性质，为日本的侵略历史翻案，争当世界政治大国，但却对为日本献出青春和生命的慰安妇横加污蔑，硬说这些被诱骗的妇女是为了挣钱才去当慰安妇，对她们的幸存者的赔偿要求也淡然处置，受到慰安妇和各国人民的强烈谴责。

A 日本政府回避责任，而把包袱推给民间组织日本民间于1995年7月建立起"亚洲妇女和平基金"，据报道，当时的村山首相曾捐赠了100万日元，但其后实际收到的捐款仍有限。该基金会的召集人--三木武夫前首相的遗孀三木睦子因此而打了退堂鼓。

在1992年宫泽内阁及1995年村山内阁均承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曾强迫外国妇女做军妓，当时的日本政府参与了并带有强迫性。

桥本任首相后，谈到战争期间沦为日军"慰安妇"的赔偿问题，桥本表示，从国际法上讲战争赔偿问题已经解决，但是从道义上讲可以考虑通过民间基金方式给予一定补偿。该基金会负责人曾几次拜访他，要求日本政府重视此事。据报道，桥本也向该基金捐赠了15万日元。经过多方努力，该基金会总算收到日本全国各地捐赠的3.4亿日元。1996年6月4日，该基金会终于决定，于8月15日之前向在世的国外受害妇女每人支付200万日元补偿金。对此，韩国等一些受害者代表认为，日本政府也应进行国家赔偿，而不能只是让民间出面了事。在这种情况下，桥本首相表示，届时将发一封道歉信。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政界的右翼势力却急不可待地跳出来，大放厥辞，令桥本大伤脑筋。1996年5月28日，日本自民党参议员板垣正（日本甲级战犯板垣征四郎次子），在自民党总务会会议上胡说什么，"慰安妇"问题"并非历史的真实"。当天，桥本表示遗憾，并说那是事实，是对女性的最大侮辱。

但事情并未了结。以奥野诚亮和板垣正为首，以"终战50周年议员联盟"为基础，于同年6月5日成立了有116名日本国会众参两院议员参加的所谓"光明日本"议员联盟。其宗旨就是为日本侵略历史翻案。他们说得分外露骨："决不赞成同把我国（日本）罪恶地视为侵略国家的自虐自己的历史认识和卑屈的谢罪外交。"奥野把日军的强制行为统统说成"慰安妇是商业行为"；板垣甚至当面对韩国的前受害者追问说："没有拿到钱吗？"气得对方发抖。

他们的用意之一是对桥本进行牵制。因为，此刻桥本正为如何写"道歉信"而发愁。日本政府只想照以往的说法表示一下"道歉和反省"，而不一定用"谢罪"一词，日本政府担心那将再度引起国内对战争性质问题的争论，甚至引起受害者要求日本政府给予"国家补偿"。

桥本前不久刚与金泳三总统在电话中表示要共同主办好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而此刻奥野等人的胡言乱语的确令桥本心乱如麻，他面对记者只好尽量回避："不谈那个吧。"然而，日本《朝日新闻》同年1996年6月6日发表社论称："桥本首相的政治责任重大。亚洲妇女和平基金组织提供的'赔偿金'能否真正体现赔偿的心情，取决于首相如何通过'信件'明确表

述日本这个国家对此问题所负有的责任和感到的歉意。"社论强调：“诚实地对待每一个对战争的善后处理问题，将决定日本能否成为一个可以信赖的国家。目前正在经受考验的，首先是政治的诚意。”桥本执政的座右铭是“诚”与“初衷不可忘”，以及其父的教诲“政治是为了弱者”，所以作为日本首相他必须有一个明确的交待。

（本章根据平涛、新建、梅桑榆的文章、书整理）

第十一章日本总想插手台湾

纵观近百年来的中日关系史，可以发现一直存在着两个基本问题，即台湾问题和侵略战争问题，其他问题大都由此产生。

日本在战前与中国领土台湾省有着特殊的侵略关系，霸占台湾几十年，战后根据《开罗宣言》《雅尔塔协定》《波茨坦公告》，台湾已归还中国，但日本右翼分子总不甘心，多年来勾结台湾当局反对中日建交，破坏中日贸易，与台湾当局搞所谓的“实质关系”，提升日台关系，不时有不利于中日关系的言行出现，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扮演着极不光彩的角色，给日本的对外形象抹黑。

一、日本对台湾的血腥统治——台湾人民不甘心当亡国奴，揭竿而起与日本侵略军殊死抵抗，日本侵略军通过5个月的血腥屠杀，才用枪尖和大炮占领了台湾全岛。……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台湾省的侵略扩张由来已久。16世纪晚期，丰臣秀吉就做开了实现“合三国（中、日、朝）为一”的美梦，第一个点燃了对我领土台湾的吞并野心之火，1592年1596年两次发动侵朝战争，企图以朝鲜为跳板进而侵略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领土，但却以失败告终。

其后，德川幕府接过丰臣秀吉的衣钵，对台湾威胁利诱，1615年派出大批舰船远征，也碰得头破血流。

日本明治维新后，加快向中国侵略的步伐。1874年5月，日本以漂流到台湾的琉球人被杀的借口，派出一支3500人的“征讨军”远征台湾，迫使清政府对日赔偿，承认琉球归属于日本和出兵台湾是“保民义举”。

1894年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挑其中日甲午战争，强迫清政府于1895年4月17日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

台湾人民决不甘心当亡国奴，揭竿而起与日本侵略军殊死抵抗，日本侵略军通过5个月的血腥屠杀，才用枪尖和大炮占领了台湾全岛。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中，日本采取军队、宪兵、警察三位一体的讨伐与统治，稍有不满意就进行血腥镇压，对1930年10月高山族人民举行的雾社起义，日军竟使用飞机投掷毒品弹，对高山族人民进行灭绝人性的屠杀。

日本帝国主义恶毒地在台湾实行奴化和“皇民化运动”，成立同化会，灌输“日台一体”思想，禁止使用中文，强迫中国人改用日本人姓名。

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从台湾掠夺走大量财富，强征台湾同胞充军或服劳役，使3万台湾同胞丧生。激起台湾同胞的广泛反抗，揭竿而启动

上百次起义，终于和大陆同胞一起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结束了殖民地的苦难历史。

A 签订日蒋和约蒋介石集团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赶出中国大陆后，日本当局就在美国支使下，勾结蒋介石集团，炮制"吉田书简"，签订日蒋和约。

台北郊外的草山别墅官邸，山林秀美，流水潺潺，鲜花盛开，鸟语花香，恍如世外桃源。

住在这座别墅里的蒋介石却毫无脱世之感。他不住挂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的总统府，而选中了风景秀丽、宁静宜人的台北草山，又根据他特感兴趣的程朱理学将草山改称阳明山，但岛内外形势却压得他透不过起来。

1950年上半年对蒋介石来说，可谓"风雨欲来愁满楼"：解放军解放舟山群岛的隆隆炮声使他丢魂落魄，杜鲁门关于"现在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台湾局势"的讲话，令他如丧考妣；严重的政治经济军事危机让他如坐针毡！

险恶的岛内外形势逼迫蒋介石于1950年3月1日重新上台，再度行使总统职权。

这是蒋介石第三次下台又复职了。第一次是1927年8月因北伐失利、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武汉方面的压力，被其辞去北伐军总司令职务；第二次是1931年12月为收拾汪精卫等人制造的广东分裂，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及海陆空军总司令本兼各职；第三次是1949年12月，因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惨败，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压力下被迫引退。

为收拾台湾残局，蒋介石绞尽脑汁，1950年3月13日在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振振有词发表演说。

为取得国民党高级干部的信任，蒋介石表示要虚心接受在中国大陆失败的教训，不惜牺牲感情与颜面，要"彻底改造"，他自己将鞠躬尽瘁，争取最后胜利。

国民党高级官员跟随蒋介石几十年，头一次见这个大独裁者当众认错，又共乘危船，同病相怜，不少人被蒋介石这番带感情的话感动得落下两行热泪，真让蒋介石拢络了人心。

接着，蒋介石搞开了土地改革，实行"三七五减租"，就是从佃农的收获中减除25%的肥料等实际费用，其余则由地主与佃农各分37.5%，这使台湾佃农缴纳50%乃至70%的地租大为降低，过去在大陆"二五减租"他死活不干，现在为在台湾混下去，只得断然忍痛实施，却也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使农村经济有了起色。

正在蒋介石极端困难之时，美国发动侵朝战争、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使台湾当局起死回生，蒋介石便极力拉住美国和日本不放。

蒋介石得到英国和苏联打算让新中国参加对日和约的消息，犹如当头遭一闷棍痛击，忙命他的驻美大使顾维钧与美国交涉。

顾维钧来到纽约郊外的成功湖畔，见到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转达蒋介石对对日和约问题的强烈意见称："蒋总统认为，我们参加对日和约的权利绝不容怀疑，只能以平等地位参加，任何含有歧视性的签约条件，均不接受，任何违反上述严正立场而订立之对日和约，不但在法律上、道义上将丧失其力量，即在盟国共同作战之历史上也要留下不可洗涤之错误！"杜勒斯和杜鲁门从心里讨厌蒋介石，将嘴角一撇道："蒋总统言重了吧？"顾维钧

作为中国著名外交家，曾以杰出的外交才能，代表中国出席许多国际会议，谴责日本侵略，维护中国权益，那时激昂慷慨，振振有词，脸上多么荣光，但现在却被美国人蔑视，叹口气硬着头皮奉命而谈：“蒋总统认为美国在对日和约问题上责任之重，影响之大，诚有非他所忍言者--如果签署丧失真实性的对日和约，不但不能使第二次世界大战获得真正的结束，并将加速远东局势之混乱，更会种下世界未来之无穷祸患！”杜勒斯暗骂蒋介石危言耸听，敷衍走顾维钧，就作为新任国务卿飞往伦敦，与英国政府磋商对策。

原来，当时英国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围绕中国参加旧金山对日和约问题上与美国意见对立。1950年2月，英国首相艾德礼访美时，曾向杜鲁门总统建议，在台湾归属中国的大前提下，采取台湾中立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杜鲁门一口拒绝。

在这次1951年6月的美英外长会谈中，杜勒斯软硬兼施，迫使英国外相摩里逊与他达成两项妥协：一是大陆和台湾的任何一方代表都不参加旧金山和约，二是在旧金山对日和约生效之后，由日本选择中国任何一方的政府缔结和约。

6月15日，杜勒斯从伦敦一返回华盛顿，就把顾维钧召来交底说：“此次在伦敦与英国外相等商议对日和约，我对英国主张邀请中共参加坚决反对，而摩里逊对美国主张你们参加签字，亦反对甚力。最后，我提出折衷方案，即由若干国家与日本签订多边条约，另由日本自主决定与何方中国商订大致相同的双边和约，英国已表示同意。”顾维钧头上急出了汗珠，大声悲叹：“这太令人失望了，贵国到底做何打算？”杜勒斯推推金丝眼镜，像大学教授教训不听话的学生：“英美虽然达成过妥协，但美国的想法是早日签订旧金山对日和约，使日本恢复主权，然后加入自由世界，共同反共。如果由于你们执意要参加旧金山会议而签不成和约，人们就会怪罪你们！”顾维钧不相信美国人的话，但又不好当面顶撞，便噘着嘴问：“日本真心要同我们签订和约吗？”杜勒斯眼镜其后面闪出讥讽的光芒，情知日本不愿意和蒋介石签订和约，却张口回答：“日本政府愿意同你们签订和约，反对同中共建立关系，这虽不能完全满足你们的希望，然而十之九成当如蒋总统之意。……”

“陪同接见的副国务卿腊斯克见杜勒斯讲得如此露骨，引起了他的诸多顾虑，赶紧嘱咐顾维钧要严守秘密：“大使阁下，请注意，这一私下协议切不可泄露！”1951年9月4日，片面的对日媾和会议在旧金山歌剧院开幕，对日作战55国中的51国和日本的代表出席会议，中国政府和台湾未被邀请，印度、缅甸、南斯拉夫三国因对和约内容不满拒绝出席。48国于9月8日签署了《旧金山和约》，苏联、波兰、捷克三国拒绝签字。

周恩来外长9月18日发表声明，指出单独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决不承认。美国驻台代办蓝钦告诉台湾外交部长叶公超：“美国已促使日本政府派员，以贸易代表身份来台，洽谈你们之间的双边条约，日本政府业已同意。”蒋介石得报大喜，希望早日签署日蒋和约，最好能赶上1951年的“双十节”，但日本方面不愿同台湾签约，又不敢违抗美国，就找借口拖延。

蒋介石急了，10月25日指示他的驻日代表董显光催促日方签约。董显光会见吉田内阁的官房长官冈崎胜男问道：“贵方是否由于英国方面之干涉，遂对与我方签约的问题，不得不采取审慎的态度？”冈崎胜男冠冕堂皇回答：“不然，日本即将成为自主国家，此后日本的外交政策，必须以我

国本身利益为先决条件。”董显光摇摇头驳道：“我看贵国的态度与国内政治情况有关，例如日本社会党就反对与苏联或中共不友好的外交政策！”冈崎只得实相告：“我国深恐与贵方订立双边和约之后，势将引起大陆中国国民对日本的仇恨。”董显光搜索枯肠无耻造谣说话服对方：“你们太多虑了，事实上除共产党重要人员外，中国国民都反对共产主义，而以百分之百之热忱倾向蒋总统，我看贵国如按照与我方亲善的途径而行，中国国民必然完全赞成，而对日本更形亲善！”冈崎鼓动如簧之舌极力反驳说：“要知道，共产党对政治极为狡猾，他们很可能利用日本与贵方签订双边和约的机会，挑拨全中国人民仇视日本，届时日本就不易忍受了！”董显光火气十足地将矛头指向吉田内阁质问：“贵国领袖对同我方签订和约的观念到底如何？”冈崎胜男以辛辣的讽刺口吻回答说：“我国现在的政策是要慢慢等待时机，以待日本实现独立自主后，研究何时同中国签订和约或选择中国的哪一方问题。日本历来尊重你们的政府，遗憾的是，贵方的领土只限于台湾。”蒋介石为冈崎胜男的回答气歪了嘴，日本首相吉田茂10月30日在参议院答复羽仁五郎质询的话更使蒋介石大发雷霆。吉田说：“日本现在有权选择缔结和约的对象了。关于如何行使此一权利，应考虑客观环境，考虑中国情况及其与日本将来之关系，不拟轻率地决定！”吉田茂的话在美国和台湾掀起轩然大波，蒋介石命外交部长叶公超约见美国驻台代办蓝钦，严词责问道：“吉田的发言已构成对于自由世界的挑衅行为，是美国使日本立于自由阵营，竭力设法使中日早日媾和，但如任吉田茂长此以往干下去，旧金山和约就会完全失败，美国是否别有意图？真令人怀疑！”蓝钦抽口雪茄，不紧不慢回答道：“我不以为华府有任何人故意欺骗贵方，我将把贵方正当的愤慨忠实报告华府，还将把上报给华盛顿的电报转发东京，以供他们参考。”经蒋介石一再催促，蓝钦才于1951年11月5日，把华盛顿的答复报告蒋介石：“美国国务院重申，美国政府反对日本与中共拉拢关系之任何企图，反对日本政府与中共之间交换海外代表。美国对吉田首相的讲话一无所知，实在遗憾！”蒋介石不敢掉以轻心，派张群秘密访日疏通关系，指示驻美大使顾维钧向白宫施加压力，命令孔祥熙出动“蒋介石游说团”四出活动，催促美国给日本施加压力，甚至扬言：“苟再迟延，日方又与中共签约，是则瞻望大局，不寒而栗！美国失却日本在反共大业上的支持，台湾也势必迅速受到影响，美国必将被逐出远东！”

“在蒋介石催逼下，杜鲁门也怕夜长梦多，便在1951年底派杜勒斯到东京督阵。

吉田首相慑于日本各界要求中日友好的强大压力，对签订日蒋和约并无兴趣，但日本一切都卡在美国手里，不敢开罪华盛顿，便巧妙地借助日本舆论把他的主张告诉杜勒斯：“日本对与中共订约暂不予考虑，对台北的承认仍然消极，如果台北当局提出订约要求，日本当视国际情势如何，审慎决定态度。”杜勒斯知道吉田茂在跟他耍滑头，便在会谈中施加压力说：“台湾是远东的军事战略要地，日本政府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进行和约谈判，是最符合日本利益的！”吉田茂老谋深算，哈哈笑着和杜勒斯打开了太极拳：“请美国相信日本。”

日本作为自由阵营的先导，希望扩大同大陆中国的接触。”杜勒斯一听吉田茂这些不着边际的话，不由火冒三丈，阴沉地质问：“我想提醒阁下，日本究竟是不是战败国？”吉田茂脸色骤变回答说：“是战败国。”杜勒斯紧

追不舍：“既承认日本是战败国，就得承认在客观上处于被动地位！”“国务卿言之有理。”“那么，到底什么时候和台北签订和约？”吉田茂嘿嘿笑着不做具体承诺：“要签，要签，只是时间问题！”杜鲁斯见吉田茂软磨硬抗，暗想日本万事都操在美国手里，还怕你耍鬼花腔？便与谋士们草拟了一封吉田茂致杜鲁斯的信交给吉田茂，要日本签字后交还美国，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吉田信件》。

吉田拿过来一看，主要内容有六项：一曰日本政府希望最终同日本的邻邦中国建立全面的和平与通商关系；二曰日本愿意同中华民国签订重建正常关系的条约；三曰在两国间签订的条约中，有关对中华民国的条款，适用于现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控制下的或今后在其控制下的全部领土；四曰中苏友好同盟实际上是针对日本的军事同盟；五曰有迹象表明，中共政权支持企图颠覆日本宪法制度和现政府的日共；六曰鉴于上述情况，可以确认我（吉田）没有同中共缔结两国间条约的意向。

吉田茂看了急得满头大汗，不愿用自己的名义承担责任，便想推脱责任，抬头一看杜鲁斯冷若冰霜的面孔，立刻把到嘴的话缩了回去，又不甘心全盘接受，就讨价还价说：“国务卿阁下，第三条提到的‘今后在其控制下的’一句，是否可以删去？”杜鲁斯严辞拒绝，吉田茂借口拖延，杜鲁斯软硬兼施也未达成协议，回到华盛顿搬出总统杜鲁门向日本施加压力，吉田茂被迫接受，才于1952年1月16日公布了《吉田信件》。

为使英国同意日蒋和约，杜勒斯也耍了花招。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回忆录中谈到《吉田信件》时写道：“我1952年1月访问美国时，杜勒斯同我提起过《吉田信件》，但没有给我看，也没有说过马上要发表这个信件，更没有征求我的同意，但在我离开华盛顿后，美国马上发表了《吉田信件》，为的是给人们一种印象，即我同意了《吉田信件》。”吉田茂只得硬着头皮组团，准备到台北谈判，但谁都不愿意当这个团长。吉田茂愿想派犬养健前往，此人是日本著名政治家犬养毅之子，但他曾任日本驻汪精卫集团大使，蒋介石强烈反对，再找川越茂、日高信六方郎、石射面猪太郎，一个个都敬谢不敏。

吉田茂最后选到了他的表弟、“日华经济协会”副会长河田烈，但河田烈知道这不是好差事，以69岁高龄年迈为由婉辞。吉田茂说河田曾任大藏大臣、内阁书记官长，一定要他出马，河田只得勉为其难。

吉田要求蒋介石派张群挂帅与日方谈判。蒋介石又是一肚子气，他早就对日本派木村四郎七任日本驻台湾外交代表不满，认为木村只是一个领事，不能代表日本政府谈判，张群又跟木村不对等，他只派外交部长叶公超出任团长。

1952年2月17日，河田烈率日本代表团到达台北。就在这一天，吉田首相特意在日本众院预算委员会发表演说：“日本不准备与台北国民政府依照旧金山和约第二十六条所定原则签订和约，因为该政府是台湾的地方政权！”蒋介石一听火冒三尺高，把叶公超唤来大发雷霆：“娘希匹！这个和约不要订了！开他妈的屁会！”叶公超与副代表胡庆育面面相觑，蒋介石却自己转弯子说：“不要硬来，别把事情弄糟！”日蒋和会于1952年2月10日在台北外交部会议室正式揭幕，叶公超一开始就用蒋介石的话讲蒋介石对日本的恩德：“蒋总统说过：‘本人于日本投降未几，就一再声称：中国对日本不采取报复主义，而应采取合理的宽大政策，并谋求对日和约的及早’

达成'！"叶公超又按蒋介石指示质问吉田首相讲话的真意，河田烈先说：“部属不便评论长官的言论”，又敷衍说“吉田首相在议会的谈话不致影响此间的谈判”。

接着，叶公超提出 2 2 条草案，主张以旧金山和约为蓝本签订和约，日本打算“仅为重建外交关系”签订类似日印双边关系的条约，双方还在日蒋和约的适用范围等问题上争得面红耳赤。

叶公超按蒋介石旨意质问：“日本是不是要同中共订约？”河田烈摇动满头银发：“绝无此意！”“日本承认不承认我们在大陆的主权？”“承认。”“承认不承认日本是战败国？”“毫不否认。”“中国是不是盟国之一？”“是的！”“中国是不是战胜国？”“是的”“战败国向战胜国媾和应该订什么条约？”“和平条约。”“那好，请按我们的方案签字！”“我要请示，要考虑，要研究。”蒋介石听了叶公超的汇报气不打一处来，便命叶公超去找蓝钦求援，请美国向日本施加压力。蓝钦听了哈哈大笑道：“你们不要太盛气凌人，逼人太甚嘛！”“日本人太让我们难堪了！”“外交部长阁下，你比河田年轻 20 多岁，对他恭敬一些嘛！我对你们双方的谈判好有一比！”“比作什么？”“好比青年男女谈恋爱，你们在后面追得紧，日本扭扭捏捏，这就要有搞恋爱时的耐心，要讲技巧，要同我们做媒人的美国官员多多商量才好！”蒋介石觉得蓝钦的话很有道理，找张群、陈诚、王世杰、何应钦协商对策。他们发现河田烈受日本外务省亚洲局长倭岛英二指挥，便在倭岛身上下工夫。

发现此人在汪伪时期曾任上海四马路中央警署的政治部主任，和太太都在上海爱尔近路参加过平房学京戏，就投票所好曲意拉拢。倭岛英二答应暗中帮忙，又亲自出马来台北指导，使日蒋会谈气氛顿时改变，形势急转直下。

河田烈对倭岛英二在台北指手划脚大为不满，便把他的亲弟弟染木贞以参观故宫博物院为名请到台北，让他去见大哥吉田，设法召回倭岛英二。

原来吉田茂弟兄仨，吉田是老大，喜欢政治；河田烈为老二，爱搞经济；染木贞系老三，酷爱绘画，后来吉田过继给舅舅家，染木贞送给了姑母家，老三的生活靠两位兄长接济。

吉田首相接到两个弟弟的报告，马上召倭岛英二回东京，又指使国务大臣冈崎胜男在国会发表演说，声称等中共与联合国军结束战争状态，远东形势恢复正常时，日本将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

消息传到台北，双方和谈代表又吵翻了天。蓝钦在中间调解，受够了洋罪。他苦笑着说：“你们的谈判好比胎儿尚未成熟，硬要让他生下来，真是难受无比！”在美国要挟撮合下，日蒋经过 60 多天的紧张讨价还价，终于大体达成妥协。不料吉田茂又突然在国会发表演说，声称“日本政府与国民政府缔结条约，并非承认此政府代表全中国”！还给河田烈下达训令，表示不同意日蒋双方达成的协议。

蒋介石得此消息慌了神儿，忙命中央社封锁消息，但外国通讯社很快将此消息传遍台湾全岛，他只得命令开动台湾宣传工具大肆攻击吉田内阁，又令张群会见河田烈气势汹汹指责说：“日本政府之态度，蒋总统实深失望，而我方朝野人士，尤不胜气愤慨之感，认为日本对我之轻侮，较战前日本以战争凌其中国者，其短见而不可理解，实时异而事同。本人与阁下第一次晤面时，即谈及此次和约协商，如无所成，其后果之恶劣，实较自始即无此谈判为尤甚。依现在之情势，已非条约内容问题，乃为我方朝野人士对日方态

度之恶劣情绪如何挽回的问题。此点实属重要。请阁下将上述情形，详电报告吉田首相，请其熟思为禱！”在美国压力下，经六十七天激烈争斗，日蒋和约终于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前7个半小时，1952年4月28日于台北签字，宣布结束战争状态，蒋帮宣布放弃对日赔偿要求。

日蒋和约虽然签订，但双方感情却恶化到极点。4月30日，河田烈率日本代表团到台北士林官邸晋谒蒋介石。

为修复关系，河田烈向蒋介石表示敬意，对日蒋和约条款表现宽大而致谢，蒋介石故作高姿态说：“这是应该的，中日两国关系与其他国家间不同，中国雅不欲以严厉之条约加诸日本。”河田烈手抚白发表示感谢，并谓归国后即将此意告知日本国民，蒋介石曲意迎合日方说：“中日两国关系特殊，迥与其他盟国与日本之关系不同，故中国虽未能参加旧金山和约，但与日本单独订约，反觉更有意义。河田先生努力之结果，已完成良好之基矗两国关系既极密切，而目前处境又同样困难，今后实应就此基础，精诚合作，努力迈进，然后始能赢得真正之独立与自由。中日两国不能独善，只能共荣。两国均能获得自由与繁荣，然后东亚全局始有和平安定之可言。估计此事非20年不为功，彼此均应具绝大之诚意与毅力，始克达到目的，望将此意转达日本朝野与全国人民。”台湾官员在这次谈判中被碰得鼻青脸肿，哀叹“和约签订了，友好也消失了”。蒋介石心境不佳，询问日本和大陆对日蒋和约的反应。

叶公超告诉他裕仁天皇心境最佳，还写了一首古体诗：八重樱怒放而冬去春来兮，赖我全民悉力始迈越寒冬；庭前群花争放而芳香四散兮，实令余怀念人间；冬尽春来而慈母姿容渺渺兮，惟院内白鸽飞翔宇宙和平！

蒋介石悲叹自己没有这样的心境，又询问大陆的反应，叶公超一言未发，恭恭敬敬递上一份文件，蒋介石一看便怵目惊心：1952年5月5日，周恩来发表声明：“我们坚持一切占领军队必须撤离日本；对于美国所宣布生效的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对于公开侮辱并敌视中国人民的吉田、蒋介石‘和约’，是坚决反对的！”1952年8月，蒋介石派总统府资政为特使，为签订日蒋和约赴日。与吉田首相会谈时，张群按蒋介石指示阻止日本和中国发展贸易关系，希望加强日蒋经济合作。

9月18早日，张群拜会裕仁天皇。天皇给张群的“印象是一位诚笃的学者，谈吐也极为谦和”。谈到双方关系时，裕仁天皇面带愧色说：“虽经阁下长期间的努力，而两国终于兵戎相见，诚属遗憾，深觉无以对阁下！”张群正不知如何回答，裕仁天皇又接着说：“蒋总统在终战时声明以德报怨，此种宽大精神，至今令人感激，由于蒋总统的这种精神，本次的和平条约才赖以完成。”张群认真地回答说：“蒋总统的声明，是深望借战事的结束，能从此解消过去长达数十年的两国间的芥蒂，而重新建立真正亲善互助合作的友谊。声明发表之后，已承贵国人民热烈感谢，现在又蒙陛下亲口言谢，本人自当转达我总统，我总统一定也会觉得欣慰。此次战争的责任，蒋总统早就深知是部分军人之所为，与陛下的意旨及人民的愿望相违，因此开罗会议时，曾强调盟国应该尊重日本皇室。”裕仁暗中惊慌失措，情知自己对发动侵华战争负有重大责任，悚然回答：“吾人对于蒋总统的盛意，真不胜感谢！”为吸引日本投资，奉蒋介石之命，张群和日本经团联会长石川一郎发起，正式组成“日华（台）经济促进委员会”，请日本财界巨头儿玉谦次任会长，关西财阀崛新为副会长。又出席日本皇太子明仁的册立大典，再次以蒋介石

特使的名义庆贺。张群返回台湾前，再次会见重新当选首相的吉田茂，向其辞行。

谈到往事，吉田茂侃侃而谈：“日本过去于合并朝鲜之后，夺取中国东北，进攻华北，酿成两国战争，又扩大而引起太平洋之战争，可谓一贯错误，因此失败。现在日本业已民主化，过去少数野心家蒙蔽人民从事侵略之覆辙，不致再蹈，此点请放心，日本再军备之事断然不干！”张群为给蒋介石带回说得出口的礼物，便问“阁下有何向蒋总统传达之言”，吉田茂早知其意，含笑而言：“蒋总统在战争结束之后，表示对日本宽大，日本军人如冈村宁次等皆安全返国，此种态度，感不能忘，请将此意转达。”蒋介石交给张的任务之一是鼓动日本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张群便适时拉入正题道：“中华民国政府现在暂居台湾，反攻大陆问题不解决，则中国问题不能解决，亚洲亦不能获致安定！”吉田茂暗笑：“我才不上当呢！”哈哈笑着轻轻推脱道：“中国几千年来为和平的民族，不似日本之强盗主义，如何解决，系属时间问题！”张群暗骂吉田茂老奸巨滑，竭力想抓住这个老狐狸，穷追不舍问道：“上次见面时，亦承提及英美与台湾商量和平解决，现在阁下有何具体意见？”吉田茂嘿嘿笑着不上钩：“并无任何具体意见，但我认为此事须要相当长时间才能解决。现在日本与贵方之间，并无一点坏的因素足以妨害其友好关系，希望尽其最大力量，使关系增进，请将此意报告蒋总统。在经济方面并望贵国多派人来日，增进双方关系！”为阻止中日贸易，张群又巧动心思说：“日前与池田大臣晤谈时，池田谈到对中共贸易，除战略物资外，其他仍需交易，并表示请我方中介，本人当即将我政府反共之立场告知池田先生。阁下之意见，日本对中共之贸易，是否可能？”吉田茂不想在此问题上多费唇舌，便一口将大门关死：“本人认为，日本与中共贸易为不可能！”张群这才欢天喜地，离日返台，向蒋介石复命。

二、破坏中日“贸易”

——岸信介指使官房长官爱知揆一发表声明，声称日本政府不允许悬挂中国国旗，从而使中日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成了一纸空文。……蒋介石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签订了日蒋和约，原想给中日关系带来重重障碍，但未料到台湾与日本的关系仍风波四起，恶浪滚滚。

使蒋介石惊奇的是，还在他逃离大陆之前，日本经济界看到中国革命成功的大局已定，日本就冒出了“中日贸易促进会”、“中日贸易促进议员联盟”、“中日贸易会”三个贸易团体。

新中国成立10天后，日本有识之士又召开日中友好协会筹备会议，以强大的社会力量迫使麦克阿瑟的盟军总部同意日本从1949年底开始，与新中国进行贸易活动，其后一个贸易协定接一个协定，搞得红红火火，蒋介石干生气没有办法。

更令蒋介石伤脑筋的是与他关系亲近的日本首相吉田茂1954年底下台，主张改善对华关系的鸠山一郎组阁上台，同意以雷任民为首的中国贸易代表团于1955年3月29日访日，日本掀起了越来越浓的“大陆热”。

蒋介石知道以雷任民为团长的访日代表团来头不小，日本准备给予这个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以官方代表团待遇，就马上命令台湾驻日大使张厉生全力破坏阻挠。

张厉生急忙到外务省交涉，却被敷衍毫无所得，只得派人与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的朋友联系，获悉雷任民签证国籍栏填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得知雷任民将与日方签订包括互设准官方机构的贸易办事处和中日直接结汇的协定，即向蒋介石急电报告。

蒋介石大惊，忙命台湾外交部向日本外务省提出强烈抗议。蒋介石哪里知道，战后日本粮食不足，失业增长，中小企业处境更加困难，又对美国推行冷战政策不满，迫切需要从开辟中国市场寻求出路。鸠山一郎是个头脑敏锐的政治家，他见吉田茂顽固亲美亲蒋被赶下台，便决定了在中日关系上前进进一步的方针，开始中日官方交往。

鸠山一郎把外相重光葵、通产相石桥湛山、经济企划厅长官高崎达之助请来商量方策，商定鸠山首相在东京著名的日本餐馆"八方园"举行宴会，宴请中国贸易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实现中日官方接触。

叶公超得到这个情报，急忙报告蒋介石。

蒋介石大发雷霆骂道：“日本人真不是东西！他们难道忘了，他们的天皇制是我强烈主张保留下来的，9亿美元的对华赔偿是我施恩不要的，两百万在华日本军民是我把他们平安送回国内的！现在竟然恩将仇报，这还了得！”叶公超小心翼翼劝道：“总统息怒，请指示具体对策！”蒋介石咬牙切齿说：“告诉鸠山一郎，他若会见雷任民，我就下令停止签订与日本的商务合同！”蒋介石又把美国驻台湾大使庄莱德请来，请求美国对日本施加压力。

庄莱德请求美国国务院后马上飞往东京，会见鸠山一郎进行露骨的干涉，迫使鸠山一郎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如何答复雷任民不予接见，鸠山一郎伤透了脑筋，最后总算想了个借口，说成“只是由于时间安排上的具体技术问题，未能实现”，却派石桥湛山、高崎达之助和自民党干事长岸信介代替他，设宴招待雷任民，接着又指示高崎达之助和日本商工会议所会长藤山爱一郎1955年4月在亚非会议期间，会见周恩来总理和廖承志，寻找改善中日关系的线索。

蒋介石对鸠山内阁恨之入骨。鸠山1956年12月13日主动提出辞职，蒋介石伙同美国在日本寻找适合于冷战体制的政客出任新首相。当时有资格竞争首相宝座的有石桥湛山、岸信介和石井光次郎。在第一次投票中，石井得票最少，被淘汰下去。池田和岸信介两人中，岸信介曾任东条英机内阁国务大臣主管军需产业，战后初期被定为甲级战犯，在反共反华上与蒋介石气味相投，蒋介石和美国调动在日本的势力，全力支援岸信介，但石桥多几票而当选，不久即因病辞职，岸信介受命组阁，美国和蒋介石终于在1957年2月25日把岸信介捧上了日本首相宝座。

就在这时，蒋介石又遭沉重一击，英国政府摆脱美国控制，宣布取消对中国的禁运措施，日本企业界借此向岸信介政府施加压力，要日本仿效英国扩大对华贸易。蒋介石觉得此事非同小可，忙命他的驻日大使张厉生拜见岸信介，请求制止日本贸易界对中国扩大贸易的行动。

岸信介对老朋友的要求满口答应，借对英国取消禁运措施发表评论的方式向日本工商界施加压力说：“英国在废除对中共出口贸易统制问题上，单方面地采取行动，是令人遗憾的！日本要对得起老朋友！”日本贸易界朋

友冲破岸信介政府的重重压制，开始和中国谈判签订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问题，商定双方互设贸易办事处，可在常驻代表机构建筑物上悬挂国旗。岸信介内阁对此百般刁难，公开破坏。岸信介又指使官房长官爱知揆一发表声明，声称日本政府决不允许悬挂中国国旗，从而使中日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成了一纸空文。

从1957年5月20日起，岸信介访问印巴等东南亚6国。

应蒋介石要求，岸信介到处露骨反华，特别怂恿与中国态度友好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反华。为拉拢岸信介亲台反华，蒋介石邀请岸信介访台。为报答老朋友的“盛情”，岸信介1957年6月2日启程访台，特别发表声明称：“在厘定日本的亚洲政策方面，本首相尊重中华民国的意见，并不承认中共政权！”此话说得蒋介石喜笑眼开，大肆宣传岸信介访台“是中华民国自1912年开国以来第一次接待日本的现任首相”，以最隆重的礼仪欢迎岸信介的到来。

蒋介石和宋美龄把岸信介待为上宾，两人围着岸信介曲意逢迎，热情招待。蒋氏夫妇与岸信介进行三次会谈，均由张群翻译。

身穿白色西服的岸信介得意非凡，装出学者派头侃侃而谈：“日本人对中国之观念，渊源甚深，中国有五千年历史，中日有两千年之关系，故日本人一谈到中国，即有十分亲切之感，初未计及思想问题。因之，日本谈到对中国大陆贸易，尤其以大阪为中心之中小企业，以为原来与大陆有生意往来，只要现在大陆有生意可做，即群趋若鹜，故现在日本在政治上决定不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亦不在联合国内对中共作任何帮助，但对于日本人民断绝与大陆往来，不做贸易，认为在理论上固可有如此说法，而事实上绝不可能，此点希望予以谅解！”蒋介石一听这话心里凉了半截，真想痛骂岸信介不够朋友，但见宋美龄频频送来阻止的秋波，联系到昨天的第一次会谈，蒋介石如鲠在喉，拉长脸说：“昨谈东南亚开发及经济合作问题，是很现实的问题；顷谈日本对大陆贸易，也是现实的问题，我保留置评，但如果日本容许共匪在日设立贸易代表机构，任凭公开活动，则共匪在日有此渗透活动之凭借，阻碍日本反共政策之实行，利害甚大，故我以为贵国对于共匪此种要求，决不能予以许可！”岸信介不悦，手扶漂亮的黑色蝴蝶结，有意讽刺道：“我们毕竟不能闭眼不看目前的现实，总统是在台湾！”蒋介石被打到了痛处，几乎掉下昏黄海的老泪，伤感地说：“中华民国政府在大陆失败，播迁到了台湾，地位较弱，固不容讳言，而在日本除了有远见、有抱负的大政治家仍能了解台湾今日之重要性外，一般的人或已不甚重视。现在而谈中日合作，若仅就此观点而论，我甚感慨然！”岸信介暗想，你承认惨败，还可与你谈下去，就骄横地说：“我对总统阁下具有重视失败的勇气，给以极高的评价！”蒋介石逃到台湾七八年来，来台湾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的一国领导人，只有岸信介一人，对岸信介卖力扮演与中国人民公开为敌的反华急先锋角色，蒋介石真是感激涕零。为报答岸信介对台湾的“厚恩”，蒋介石派张群为总统特使，1957年9月中旬开始访日。日本对张群给予国宾待遇，让他礼节性会见裕仁天皇，同岸信介和日本各界要人进行了会谈。

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张群在和首相岸信介等日本要人会谈时，将重点放在反对中日发展贸易关系上，特别挑拨离间说：“日本和大陆的贸易，乃是给予阴谋赤化日本的中国共产党以可乘之隙，会成为自由世界的祸根。”张群还恳请日方，把这个挑拨性观点体现在1957年10月2日他和岸信

介发表的共同声明之中。

为吸收日本资金，蒋介石派台湾银行董事长张兹闾、台湾水泥公司董事长林伯寿、台日文化经济协会干事长汪公纪等人，随张群访日，同日方研究岸信介访问东南亚时提出的经济开发计划，加强日台经济合作。张群一行在日本各地考查后，认为应设法获得日本的工业设备，完善台湾四年建设计划。

为阻止中日贸易，蒋介石命驻日人员勾结日本右翼分子制造了长期国旗事件。

1958年4月3日，“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在长期百货公司“浜屋”隆重举行，会场悬挂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广大华侨和日本人民对五星红旗尤感亲切，纷纷前往参观，产生了很大影响。

蒋介石得此消息，即命台湾驻日本大使馆和驻长期领事馆，向日本外务省和长期市政府提出抗议。日本外务省屈服于台湾当局的压力，当即通知长期市政府和中日友好协会，不要在展览会悬挂中国国旗。

对此，中日友好协会置之不理，长期市政府也认为外务省和地方政府没有隶属关系，外务省的通知不是命令，而且市政府没有干涉民间团体的权力，便采取拖延观望态度。

台湾驻日人员沉不住气了，勾结日本右翼势力，派两个暴徒冲进展览会会场，公然撕毁五星红旗，造成侮辱中国尊严的政治事件。这是岸信介内阁推行反华政策的必然结果，对两个暴徒仅以损坏他人财物罪名，移送法院处理，就没有了下文。

岸信介政府的反华行径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发表声明，提出严重抗议，提出岸信介竟忘记现在是什么时代，仍旧以一副甲级战犯的面孔，侮辱中国人民，日本进步人士也纷纷发表讲话，主张严惩罪犯，向中国道歉。

中国政府见日本当局采取所谓“见怪不怪”的顽固态度，就断然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废除签字不久的中日钢铁贸易长期协定，原定由鲁迅夫人许广平率领的中国妇女代表团延期访日，为期一年的中日渔业协定不再延长，正在日本访问的中国歌舞团停止演出并提前归国。

1960年6月，岸信介顽固亲美反华、修订“日美安全条约”，激起日本人民声势浩大的统一行动被轰下了台。池田勇人组阁后开始修复对华关系，他形象地对松村谦三说：“我的立场是必须把脸朝向美国，因此，松村君，可否请您成为我对中国的另一副面孔？关于中国的问题，一切委托给您了！”经松村谦三大力帮助，刘宁一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为出席反对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在池田内阁诞生10天之后访问日本。

蒋介石出于本能，敏感地抓住这一动向，与张群密商对策。张群说：“池田勇人搞财经出身，政治意识不强，和我们没有任何渊源关系，对周恩来提出的政府协定、民间契约、个别照顾的贸易三原则，颇有好感，真令人头痛！”蒋介石一听就急了，赶紧指示驻日大使张厉生出面阻挠。

池田首相并不理睬，让内阁官房长官大平正芳专门向记者发表关于中国代表团入境问题的谈话说：“对中共代表团不应在政治上加以妨碍，应该就像长期国旗事件以前那样，做事务性的处理。这是政府内部多数人的意见！”池田首相接着又迈出第二步，于组阁不到百日的1960年10月7日，派内阁大臣高崎达之助率领钢铁、造船、纺织、机械等各界企业家代表团访

华，加深中日官方的理解；又派高崎1962年9月再赴北京，与周总理商定采用渐进的、积累的方式，发展政治、经济关系，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商定以易货交易、综合贸易、延期付款五年方式订立长期合同，发展中日贸易。

蒋介石获此消息，几乎气晕过去，催促美国、日本右翼势力破坏高崎访华。在蒋介石祈求下，美国助理国务卿哈里曼警告池田：日本与中国进行贸易是“危险的”，威胁日本不要为“政治目的所利用”；自民党外交调查会也劝池田“不要搞为共产党国家利用的贸易”。蒋介石指示张厉生恐吓池田，如果以延期付款方式向中共出口化肥，台湾将停止日货进口！

在蒋介石和美国及日本亲台势力猛攻下，池田首相态度发生动摇，声称“台湾和韩国也不同意化肥的延期付款”。

蒋介石刚想松一口气，做梦也没想到高崎达之助、冈崎嘉平太等人劝池田遵守对周总理的诺言不动摇，使池田腰板又硬了起来，派高崎再访北京，1962年11月9日与廖承志签署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达成了1963年~1967年的五年贸易协定，两国政府对贸易合同予以保证，双方互设综合贸易办事处，成为半官方性机构。

蒋介石怎肯善罢干休，严令张厉生向池田施加压力。为缓和日蒋矛盾，池田让亲台分子佐藤荣作和贺屋兴宣同时入阁，给蒋介石以反共政策可能加强的印象，却在此掩盖下，使内阁通过了向中国出口维尼龙工厂成套设备的决定。

蒋介石闻讯震怒异常，他认为这笔买卖规模大，高达2000万美元；条件优惠，竟使用日本国家金融机构担保，立即付款部分仅为500万美元，其余1500万美元分5年分付，年息为6分，不但可被看作超越民间贸易范围的一种“经济援助”，而且维尼龙颇有军事价值，也可以算作军援。

蒋介石想到这里大为震怒，命外交部训令驻日大使张厉生与日本政府严重交涉，又吩咐张群约见日本驻台大使木村，从政治立场出发加以阻止。

张群遵照蒋介石的指示，把木村请到总统府，传达蒋介石的意见，木村根据外务省的指示敷衍解释。张群将脸一沉道：“我并非外交当局，不是交涉的对象，不同你做事物性辩论。蒋总统认为维尼龙事件是政治性事件，因为日本在亚洲反共阵营里处于重要地位，日本对亚洲的安全负有责任，中日之间又有特殊关系。战后蒋总统对日本采取以德报怨政策，原是从大处着眼，希望中日两国从此真诚合作，以确保亚洲之安定。现在日本竟然经援大陆，不但对不其中国，也对不齐亚洲！”蒋介石又命张群向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岸信介和有影响的政治家大野伴睦等发去“情辞恳切”的电报，呼吁他们向池田勇人施加压力，但池田勇人毫不买帐。蒋介石一气之下便召驻日大使张厉生回台，扬言要与日本断交！

常言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维尼龙事件未了，又发生了“池田发言”事件。

1963年10月8日，蒋介石忽然接到他的驻日大使张厉生的一封电报，脸上浮出笑容读道：“台北外交部：（一）大陆访日油压机械代表团团员周鸿庆，于10月7日晨借词散步，逃出旅馆（皇宫大饭店），乘车拟赴我使馆，但因路途不明，转道逃经苏联驻日大使馆要求庇护。日外务省以该员超过居留期限、违反日本出入国管理法为由，向苏联驻日大使馆要求引渡。俄方一度拒绝，但至当晚终表同意，10月8日晨，将访员移交东京警视厅

麻木警察署，现在该署扣押中。”蒋介石情不自禁地大叫：“好极了，可谓天助我也！”又兴高采烈看下去：“（二）周原籍山东，现年44岁，此次来日，系担任译员工作，随该团曾赴大阪、名古屋、福冈、神奈川等地考察，原定10月7日离日，该员即在起程前乘隙逃出者。（三）本馆除嘱山东同乡会馈以果品，对记者要求面会，并向外务省正式要求外，谨先报称监察。”蒋介石大喜，即命张厉生与日方加紧交涉。

于是，海峡两岸双方驻日机构马上开始紧张交涉，斗争长达两个月之久，日方终于在1964年1月9日决定将周鸿庆强制送回大陆。

蒋介石犹如听到晴天霹雳，当即命令台湾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日本政府媚共亲匪的态度，破坏了中日友谊，今后可能产生之后果，日本政府应负完全责任。”池田首相见日本和台湾的矛盾日益尖锐，便决定派自民党副总裁大野伴睦为特使，偕自民党外交调查委员会委员长船田中，到台湾向蒋介石祝寿，借此缓和日台矛盾。

大野伴睦一行1964年10月30日抵达台北，蒋介石不敢慢待，命张群在其私邸热情招待。大野伴睦认为日台间种种“不愉快”，完全“出于误会”，“维尼龙事件并无特殊意义，这是多年悬案，现在由通产大臣福田处理后向内阁会议提出报告，取得谅解，而福田又是大野的直系分子，平日思想纯正，断无袒共之理”。张群奉蒋介石之命指责日本轻视台湾，“若谓维尼龙事件于日本政府无关，纯系事后狡辩之词，殊难令人信服”，但张群头脑冷静，知道大野和船田两人没有谈判重大问题的权限，便发发牢骚，把两个日本政客恭送出台。

1964年2月23日，吉田茂率日本代表团到达台北，蒋介石将此视为他外交上的重大举措，特派张群和何应钦、莫德惠、谷正纲等人前往机场迎接，然后恭送到台湾最漂亮舒适的圆山饭店安歇。

2月24日上午，张群陪吉田茂来到总统府。蒋介石把吉田茂当作与日本打交道的最理想人物，降阶而迎，待如上宾。

吉田茂虽身材矮小，体似短桶，架子却大得出奇，像恩人一样把池田首相的亲笔信送给蒋介石。

蒋介石视作珍宝，仔细看过，在手中反复把玩，满面堆笑，对吉田茂访台表示欣慰，愿意借此机会就日台间的各种问题开诚商谈。

吉田茂不想马上谈日台间的种种敏感问题，忙抽口香烟扭转话题，说明池田首相去年访问东南亚时因日程短促未能访台的原因。

蒋介石暗骂池田根本不想来台而找借口，却装作大度样子说：“只要彼此有信心，访问不过礼貌而已，请勿挂齿！”吉田茂熟谙日台官场内幕，适时表示池田首相对蒋介石“极为尊敬”，又特意提到裕仁天皇命他向蒋介石顺致“感德怀恩的谢意”。蒋介石喜笑眼开，请吉田转致他对日本天皇的问候之意，然后稍加停顿，把话题转到池田内阁的对华政府上说：“我别无所求，唯希望池田首相能听从阁下之言，执行贤明的政策，则我就可以安心了！”蒋介石以祈求的目光看吉田茂一眼，将青筋暴起的右手一挥强调说：“不但希望池田首相如此，其他别人任总理，亦希望能继承阁下之政策与精神，是则非仅有利于中日两国，而且将有益于亚洲。日本之前途，实未可限量！”“总统战后对日本的恩德，永世难忘！”“战后自华遣反日军300万，乃中国对日传统友好精神表现，亦吾人之理想。日本能得复兴，实由于阁下之政策与领导，今后问题之协调合作，亦多有赖于贤劳之规划和指导。阁下复兴日本

之功，实高于明治维新时之伊藤博文，在历史上已留下不朽之业绩，本总统至为钦佩！”吉田茂听着蒋介石的吹捧之词，觉得矮小粗壮的身材仿佛膨胀起来，忙抱拳致谢道：“承蒙夸奖，实在不敢当！”蒋介石暗中骂声“娘希匹”，咳嗽一声把话题拉入正题道：“余认为由丰臣秀吉之侵略大陆政策以至演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失败，日本实应有所警觉。中日两国应平等互助，共同发展。如仅顾日本之经济发达，不顾及中国之复兴，不仅于日本无利，且甚危险。因之中日必须密切合作，共存共荣，然后方能谋求亚洲之安定，否则亚洲问题将永不得解决。”吉田茂听蒋介石绕了这么大弯子，说来说去还是要他支持反攻大陆，推行反华政策，暗自好笑，眯着眼，跷着腿，好像根本没听见对方讲了些什么。蒋介石心中窝火，又不便攻吉田茂，便声色俱厉指责池田内阁的对华政策。

吉田茂身为日本首相，曾访问过许多国家，像这样当面受申斥，还是头一次，但他为完成安抚任务，只得耐着性子听下去，连连说：“池田言词欠妥，希望今后不再有此种情形发生”，他见蒋介石仍余怒未息，就哈哈笑着以经济利诱手段安抚道：“在与台湾的经济合作问题上，日本可以提出优于对大陆的条件！”蒋介石怦然心动，经济引诱力量可谓大矣，但政治问题又马虎不得，便给张群递眼色驳斥。张群对蒋介石的微妙心理洞察明白，便板着面孔插话说：“池田此种行为欠妥，我们认为并非贸易，而是援助，故坚决反对，此乃一原则问题，并非条件优劣之争！”吉田茂不愿多做承诺，只微微点头，未发一言。

2月25日下午4时半，蒋介石在日月潭涵碧楼与吉田茂举行第二次会谈，蒋介石以政治家姿态纵论世界形势，劝日本“转变对大陆的恐怖观念和和平共存的幻想”，吉田仅“以充分了解与诚恳接受”敷衍搪塞。

26日上午，吉田向蒋介石辞行，他拍着胸脯保证：“日本以日台友好关系为外交之基本，希望今后推心置腹，无所不谈，交换意见，密切合作。”吉田茂开完口头支票，就要起身告辞，蒋介石岂肯轻轻放过？忙把和张群密谋的套住吉田茂之计和盘托出。吉田茂离台前，与蒋介石制订出五项《中共对策要纲》。

蒋介石送走吉田茂，怕他不认帐，命张群把上述《中共对策要纲》和与蒋介石的三次谈话记录寄往东京，请吉田茂核查并见复。1964年4月4日，吉田茂给国民党秘书长张群回信一封，表示他对会谈记录和要纲毫无异议；5月30日，吉田茂又给张群修书一封，说他保证今后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不再使用输入银行资金，这便是臭名昭著的《吉田信件》，曾在日本和台湾报刊上大事宣传。蒋介石多次宣称，吉田信件是日蒋和约的“补充文件”。这个密件后来被《产经新闻》记者全文披露，又掀起了轩然大波。

三、阻挠联大驱蒋

——1971年9月21日，26届联大，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优势，通过了阿尔巴尼亚等国共同提出的“恢复中国席位、驱逐国民党政府”的议案，但日本同美国为了阻挠联大驱蒋却向联大提出了一

个"逆重要事项"提案！

台北日月潭涵碧楼，位于园林别墅的突出部位，风光秀丽，静谧幽深。

在此静养的蒋介石心情怎么也安静不下来，他觉得吉田茂访台期间讲了不少好话，但件件难落实处，便催逼张群邀请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访台。池田首相不胜其烦，只得派大平于1964年7月3日访台。

蒋介石觉得大平正芳以日本责任外交负责人身份来台，借此疏通日台关系，是他蒋某人外交的重大成果，因而7月4日在总统府亲自接见，进行会谈。

大平正芳是日本著名政治家，一见面就谨慎地表示他早拟访台，但一再拖延，至今始能实现，首先转达天皇陛下的特别嘱咐，代天皇问候蒋介石。

蒋介石喜笑颜开道：“天皇陛下政躬如何？请代为转达致候之意。”大平正芳彬彬有礼回答：“新潟地震时，承蒙慰问，至为感激，谨代表日本政府及人民致以衷心之谢意。”蒋介石忆起往事，大有感慨万千之态：“想当年，我在高田联队当兵时，周末常去新潟，昔日之长官及友人在该处者甚多，新潟为我之第二故乡，故对它特别关心。”蒋介石陡然把话题一转，大讲东亚问题实际是共产党问题，强调“日本必须与亚洲各国同时共谋上进，不可先冀单谋一国之安定”。在当天下午的会谈中，大平正芳表示：“日本过去的所作所为，容有不为贵方所喜者，但亦有各种不得已之原因，并非故意如此，今后当更注意！”蒋介石心头不悦，当即质问：“贵方对反攻大陆，到底持何态度？”大平正芳被逼无奈，只得回答：“日本在本质上是反共的，对贵方做精神及道义上之支持。”1964年8月12日上午11时，台北机场，天空晴朗，澄清透明，机场上一频繁忙。为落实吉田茂访台成果，蒋介石特意派秘书长张群再访日本，张群在机场发表谈话说：“此次前往日本访问，系以私人身份，答访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先生之访华，并将代表政府对吉田先生授勋，同时与吉田先生及日本朝野人士会晤，就有关亚洲局势及改善中日关系交换意见。”张群在羽田机场受到日本外相椎名悦三郎和各界代表500余人的欢迎，然后到霞关外务省与椎名会谈，张群奉蒋介石之命说：“中日关系上年虽曾一度陷入僵局，但在吉田先生和双方政府及各界领袖之共同努力下，目前已达成正常化，至感欣慰！惟仅仅恢复正常仍感不足，吾人必须继续尽最大之努力，促使双方在反共之大目标下，做更进一步之合作。

“日本为亚洲大国，应具远大眼光，负起对亚洲、对世界之使命，勿过分斤斤计较于目前一时一事之得失，尤应坚持反共之原则与精神。”椎名是一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引用屈原《楚辞》中的“同极异路”意即殊途同归来搪塞，并不承担责任。

接着，张群往访池田首相，赠给他一张蒋介石亲自签名的照片。池田泛泛淡平日台间发生误会的原因是人员往来太少，今后应加强官方和民间人员往来，并对失言事件有所解释；张群代表蒋介石邀请池田访台，举行双方部长级会谈，池田表示愿意考虑。

8月14日下午，张群在台湾驻日本大使馆主持盛大仪式，向吉田茂授予特种大绶卿云勋章一枚，张群代表蒋介石致颂词。

身材短小的吉田茂一挺崭新的白色西服，将大勋章接过佩在胸前，得意洋洋致词称：“此次渥蒙蒋总统授勋，乃毕生之光荣，今天是我长久政治生活中最高兴、最满意的一天，请代向蒋总统致谢！”接着，张群奉蒋介石之命举行酒会，池田首相及日本内阁成员、国会两院领袖相继莅临，更使吉

田茂得意非凡。

更使蒋介石欣喜的是，他极其厌恶的池田首相因病于1964年11月初辞职，他的老朋友佐藤荣作经自民党元老议定、未经竞选就直接登上自民党总裁和内阁首相的宝座。

蒋介石忙命驻日大使魏道明向佐藤荣作祝贺，满以为佐藤和他的胞兄岸信介是山口县人，属于渔民聚集的长州南部地区，破落的武士家庭出身，可算大半个令他崇敬的大陆浪人，他没有想到，佐藤荣作上台后的讲话却使他极其失望。佐藤竟这样说：“虽说日本同国民政府缔结了媾和条约，但蒋总统在战争结束时所表示的好意，并不能约束日本国民的走向，对蒋总统是非常感谢的，可也不能以此感情来处理问题。”蒋介石急忙把张群召进台北市郊外的士林官邸，大骂佐藤荣作“不是东西”，等蒋介石骂够了，张群才轻声劝告：“总统，佐藤是我们的老朋友，不要骂！”“是朋友，怎么还讲那种话！”“他刚上台，不得不这样讲，否则右翼朋友怎么会支持他？”“岳军兄有何高招儿？”“我通过吉田茂、岸信介打通佐藤的关系，定能扭转不利局面，请总统放心！”在蒋介石催促下，张群调动所有关系打通佐藤内阁的关节，果然在10天后，蒋介石听到了“顺耳的话”，佐藤在国会的讲话调子变了：“政府将一面维持迄今同中华民国政府之间的正规外交关系，一面以政经分离的原则，同中国大陆之间继续民间贸易以及其他事实上的接触。”蒋介石脸上这才有了笑容，但还没等他笑出声来，又接到彭真将率中共代表团赴日参加日共第九届代表大会的报告。蒋介石吓了一跳，暗想这是新中国访日的最高级代表团，彭真能力超群，若和佐藤内阁成员接触，就会在池田内阁时期改善中日关系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这可非同小可！

蒋介石马上指示驻日大使会见日本首相佐藤，甚至以断交相威胁，迫使佐藤上台后对新中国做出的第一件事，就是在1964年11月20日决定阻止彭真代表团入境，给中日关系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1965年1月10日，佐藤对美国进行他组阁后的首次访问，美国总统约翰逊要求日本支持台湾，佐藤当即表示日本坚持与台湾保持“正规的外交关系”。

蒋介石连连称佐藤荣作真够朋友，却又接到两个坏消息：大日本纺织公司将向中国出口第二套维尼龙成套设备，日立造船公司与中国签订了出口两艘万吨货轮的合同，两宗贸易都将使用日本输出入银行资金。

蒋介石觉得这两宗贸易都非同小可，害怕维尼龙事件重演，忙命驻日大使魏道明调查真相。蒋介石获悉佐藤刚执政，还没来得及过问这两个问题，就赶快与佐藤内阁交涉，促使佐藤以首相身份在1965年2月宣布，中日贸易要受“吉田信件”的约束，致使向中国出口第二套维尼龙成套设备和两艘万吨货轮的合同都未能履行。

蒋介石趁热打铁，和日本签订了日本提供一亿五千万美元的日元借款合同，派他的外交部长沈昌焕、副总统严家淦先后访问日本，还费尽心机请日本首相佐藤荣作于1967年9月访台。

蒋介石把佐藤访台视为他晚年反共外交的“最大成就”，简直像对待神仙一样供奉，在9月8日的会谈中，将佐藤大加吹捧，最后才扯到他最关心的反共问题上。佐藤荣作也是日本很有城府的政治家，虽极为亲蒋，却不愿公开承担反共义务，就只好自责敷衍道：“日本在世界上曾扮演过丑恶角色，所作所为有诸多错误，今后自不再如此。”蒋介石有话如鲠在喉非吐不

快，但又不便直说佐藤，便转弯抹角谈到中国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然后直抒胸臆说：“吾人此际反共，不必恐惧苏俄之驰援，至少我军收复中国南部，决不致引起苏俄介入。”佐藤听蒋介石谈反攻大陆如听白日梦语，暗自好笑，但出于礼貌不忍点破。

当晚八时，蒋介石在台北市郊外阳明山中山楼举行晚宴，招待佐藤。蒋介石想到自己无力反攻大陆，便幻想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后再度进攻中国，从而达到他火中取栗之目的，因此在佐藤提到日本防卫问题时，接过话茬大发感慨道：“作为国家必须有自我防卫之力量。日本必须注意北方被苏俄侵占之领土（千岛群岛）。苏俄与美国不同，有领土野心，恐甚难放手将四个岛屿交还日本！”佐藤荣作在谈话将结束时说：“9月22日是吉田先生的米寿，应该好好庆祝一番！”“啊，吉田先生八十晋八了，真是可喜可贺”；蒋介石若有所思，旋即做出决定：“拿纸墨笔砚来！”不一时，文房四宝送到。蒋介石挥笔写下龙飞凤舞的“望重寰宇”四字寿轴一幅，感慨万千地说：“吉田先生是日本能持大体，又具有远见的政治家，这四字当之无愧！”蒋介石又想到蒋经国与日本关系较浅，请佐藤以首相身份安排蒋经国访日。佐藤不好推托，两人商定蒋经国两个月后访日。

不久，1967年10月20日，传来了吉田茂因病去世的消息。张群恰好当天到日本参加“中（台）日合作促进会”会议，一到旅馆，岸信介就向他报告了吉田去世的消息，便赶赴东京大矶吉田茂私宅拜祭。当时尚未入殓，见了最后一面。

吉田女儿麻生和子说：“当此家父去世的时候，刚巧阁下来到日本，今天和家父见了最后一面，这可以说是缘份。我想家父在九泉之下，必定满意了。”蒋介石得此消息，立即命张群作为参加吉田茂国葬典礼的特使，又发来唁电说：“吉田先生不仅为贵国复兴之元老，其硕德卓识，又为东亚安危相仗，不可或缺之哲人。一旦丧此老成，实为自由世界不可弥补之损失，岂止为中正私人情谊之哀痛而已。”为拉紧日蒋关系，蒋介石派蒋经国以台湾国防部长身份，应首相佐藤邀请访日。佐藤派外相三木武夫到机场迎接，亲自与蒋经国进行会谈。蒋经国声称“光复大陆的决心不变”，佐藤慑于国内外形势，不敢贸然作出反应。

蒋介石获悉佐藤将于1969年11月中旬访美，立即指示驻美、日人员与驻在国频繁接触，终于取得了令蒋介石高兴的结果。佐藤同尼克松发表的共同声明，特别谈到了台湾问题。声明说，“总统言及美国对中华民国条约上的义务，美国重申遵守这个条约。总理大臣认为，维持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也是日本安全的一个极重要因素。”还没等蒋介石笑出声来，从联合国传来的消息又使他胆战心惊。

原来，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一直被台湾当局非法窃据，随着新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这种局面越来越难以为继。

为阻挠中国恢复联大权益，蒋介石勾结美、日等策划玩弄阴谋手段，从1961年第十六届联大开始，采取把美国提案视为“重要事项”的对抗办法，即非经三分之二多数赞成票，不得改变代表权。但到1971年，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国邀请美国旗乓球队代表访华，尼克松总统派总统特别助理基辛格访问北京，使全世界为之惊愕。蒋介石惊呼形势危急，1971年6月15日发表“庄敬自强”的文告称：“古人常言：‘天下之事，在乎人为，决不可以一时之波澜，遂自毁其志。……’只要大家能够庄敬自强，处变不

惊，慎谋能断，坚持国家及国民独立不挠之精神，那就没有经不起的考验。"为保住在联合国的席位，蒋介石急派张群7月底到日本借参加日台合作策进会议之机加紧活动。

张群一到日本，就听到种种令他头痛的消息：先是新日本制铁、日本航空公司宣布退出日台合作策进会议；接着，丰田自动车贩卖、东洋纺织等亦表示不拟参加。其他不是社长因病住院，便是临时有事出国，经济界人士像避瘟神一样逃避台湾人员的情形显而易见。张群真是伤透了脑筋，四次会见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求救。

佐藤唉声叹气说：“连尼克松也宣布要在1972年5月前适当时机访华，我也无力补天！”张群苦苦相求，佐藤只得为蒋介石出谋划策，出动大批人员到纽约拉票。有的国家的联大代表到厕所内躲避，台湾外交部长周书楷等人竟在厕所外等候，死缠硬磨不放松。

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1971年9月21日隆重开幕，阿尔巴尼亚及阿尔及利亚等国共同提出的“恢复中国席位、驱逐国民党政权”的议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优势，获得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眼看就要恢复了！

蒋介石这下急了眼，忙命周书楷与美、日代表团商量对策。佐藤把日本曾担任过驻联合国首席代表的官员都调到联合国，帮助美、台首席代表布什、周书楷渡过难关。

美日台三方官员绞尽脑汁，终于想出所谓的“反重要事项”议案，也就是把驱逐蒋介石在联合国的代表也作为“重要事项”处理，需要有二分之三的赞成票才能通过；同时让中国参加联合国，拥有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

周书楷一听拚命反对，声称蒋介石决不同意这么办，布什把面孔一拉训斥周书楷道：“你们要明白，这个修正案的要害首先是阻止联大驱逐你们的代表！”日本首席代表中川融老奸巨滑，抢先插嘴说：“我们明知中国政府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却仍要提出这个修正案，是估计如果这一修正案得以成立，中国仍会拒绝参加联合国，结果还会达到阻挠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目的。……”周书楷这才恍然大悟道：“明白了，这个修正案本身就‘两个中国’计谋的产物！”布什、中川融、周书楷这次必定稳操胜券，三方人员倾巢而出，拚命在联合国内外拉票，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为了得到某国的一票，常常在联合国的餐厅门口“探寻迎候”，希望能与该国代表“巧遇”、“谈几句”。台湾代表更是抓住就粘上不放，甚至跟上他国代表进入厕所，摇尾乞怜！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对美日等国的“逆重要事项”提案投票表决，结果以55票赞成、59票反对、15票弃权被否决。这时会场上一片欢腾，台湾代表周书楷垂头丧气，硬着头皮发表有期无力的声明称：“联合国已自行破坏了宪章，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在一片嘘声中，周书楷率台湾代表团走出会堂接着，联合国大会以76票对35票通过了接受中国、驱逐国民党政权的决议案。会场上再次呈现出一片欢腾景象，各国代表热烈欢呼！鼓掌！拥抱！

这个消息刹时间传到北京，周恩来、乔冠华正与尼克松的总统特别助理基辛格进行着有趣的交谈。

乔冠华以愉快的口气问基辛格：“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我国能恢

复席位吗？眼下联大正对此进行表决呢！”基辛格毫不犹豫断言说：“我估计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大。”乔冠华已从周总理那里得到了确实消息，眨眨眼故意请教：“那么，你估计我们什么时候能进去？”基辛格还被蒙在鼓里，以博士派头深沉地扶扶金丝眼镜，稍作思索，尽量友好地放宽条件说：“估计明年差不多了。待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你们就能进去了！”乔冠华是人逢喜事精神爽，他刚获悉林彪折戟沉沙温都尔汗的消息，兴奋地豪饮赋诗：“月黑雁飞高，林彪夜遁逃，无需轻骑逐，大火自焚烧”，现在又得到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喜讯，情不自禁地仰头哈哈大笑，豪爽地反驳道：“我看不见得吧？”基辛格离开中国后才得知事情真相，衷心感谢周恩来待人宽和，若换了赫鲁晓夫，非当面让他下不来台。

与北京喜气洋洋准备出席联大相反，台北充满懊丧气氛，哀叹这是“迁台以来的最大挫折”。蒋介石咬牙切齿咒骂联合国“已向暴力屈服，已成众恶之源”，自我安慰“我们国家的命运不在联合国，而操在我们自己手中”。

为稳住阵脚，蒋介石强打精神，1971年10月26日发表《为联合国通过非法决议告全国同胞书》，挖空心思声称：“无论国际形势发生任何变化，我们将不惜任何牺牲，从事不屈不挠的奋斗，绝对不动摇，不妥协！”蒋介石又召集国民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听取行政院长严家淦的外交报告，听从佐藤等老朋友的建议，操纵全会做出决议，表示决不承认联合国的“非法”决议。

蒋介石请求日本帮助他展开外交活动，奈何比利时、秘鲁、黎巴嫩、墨西哥、厄瓜多尔等国先后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纷纷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蒋介石气急败坏发表1972年元旦文告，声称与中共“势不两立”，绝无任何“妥协余地”。

这地，美国总统尼克松、日本首相佐藤荣作，表示将继续维持对台湾的外交关系，蒋介石才稍稍安下心来。

四、不情愿与台断交

——尼克松访问北京，给了蒋介石当头一棒，也让日本坐卧不安。日本右翼分子公然跳出来反对中日建交，反对田中访华。……1972年2月21日，东京，北风凛冽，地冻天寒，无力的阳光给冰冻的大地送来的一点暖气转瞬即逝，寒冷把人们驱向温暖的居室。

东京都千代田区永田町2丁目3番地一号，首相官邸一楼小客厅，温暖如春，鲜花盛开，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和内阁官房长官竹下登却如坐冰窖，浑身发冷。

原来，他们正在聚精会神看电视。

电视屏幕上，尼克松总统乘坐的专机徐徐降落在北京机场，银白色的机身在初春温暖的阳光映照下闪闪发光，舱门开后，尼克松身穿厚实的大衣走下飞机，拘谨地同周恩来总理握手，主动表示：“I am very happy。”（我非常高兴。）佐藤荣作看着尼克松和周恩来检阅仪仗队的情景，气得太阳穴激烈跳动，脑袋爆炸般痛疼，忽地站起身朝地下室的小餐厅走去。

一帮年轻记者上来询问对此事的感想。佐藤火气十足地说：“他（尼克松）自己不是说了吗？这是本世纪的伟大事业。

他自己说了，别人还说什么！”佐藤说罢甩开记者就走，歪着嘴对竹下登说：“唉，此时此刻，最难受的还是老朋友蒋公！”诚如佐藤所言，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台北市郊外士林官邸密室里，两眼紧盯着尼克松访问北京的电视不放，仔细研究中美上海公报，又把张群请来密商对策。

张群此时只好说：“幸好现在日本仍是老朋友佐藤掌权！”蒋介石叹口气道：“这个老朋友也不可靠了，也在脚踩两只船！”张群搜索枯肠找生路劝道：“佐藤正催《产经新闻》记者赶写《蒋总统秘录——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为总统在日本恢复名誉，还经常派岸信介秘密来台沟通消息，应该说是很不容易了！”蒋经国旗恼地骂道：“佐藤是个老滑头，他也想‘赶搭巴士’凑热闹！”张群冷笑说：“院长所说不错，但依我看，佐藤想‘赶搭巴士’，但周恩来很可能不理睬他！”正在这时，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派他的胞兄岸信介来到台北，蒋介石赶忙请来相见。寒暄过后，就指责“佐藤脚踩两只船，又要北平又要台北，怎么对得起我蒋某人！”岸信介唉声叹气谈到，日本各界人士对周恩来提出的中日复交三原则赞成的人越来越多，对亲台帮人士避之若浼，不得已碰在一起也是“不谈政治，少讲经济，多说文化”，岸信介兄弟只能尽口舌能力之所及，尽量说服有权势人士与台湾保持关系，但也难以取得很大效果。

蒋介石说：“我就不信，荣作还坐在首相宝座上嘛，谁捣蛋，就格杀勿论！”岸信介苦笑着说不能硬来，讲了这么个例子更令人长吁短叹：就在本届国会即将闭幕之时，忽然跳出四条大汉，众人一看，原来是自民党的藤山爱一郎、社会党的胜田间清一、公民党的渡边一郎、民社党的春日一幸，都是在日本政界响当当的人物，立刻引起全场注意。这四个人打着“日中国交恢复促进议员联盟”的旗号，突然向众议院提出恢复日中国交的议案，签署的竟有238人，属于自民党的54人。当时日本众议院总名额为491人，除了议长和空缺的5人，过半数为243人。这就是说，如果再有5人签署“凑热闹”，这个议案就可超过半数，宣告成立！

日本首相佐藤极为震惊和自民党干事长保利茂采取紧急措施，对自民党签名议员分别软硬兼施，迫使30余人宣告退出，又命众议院事务局对此案不予受理，遂使该提案胎死腹中，却使日台关系的阴影越来越浓。

岸信介深鞠一躬说：“首相还让我转告总统，他已命日本驻巴基斯坦大使曾野明，把首相的施政方针演说和福田外相的政府统一见解的抄件，当面交给了中共大使。”蒋介石急得直想跳脚骂人，话到嘴边，对岸信介又客气了几分：“你们怎么这样干，真不够朋友！”岸信介一瞪大眼倔强反驳说：“我们正是够朋友才这么干！”蒋介石大惑不解，翻着白眼问：“这又为何？请道其详！”岸信介叹口气说：“这才叫不得已而为之！尼克松访华和中共加入联合国后，与中共拉关系的国家越来越多，形势逼平日本考虑对北平的关系，谁敢违抗这一趋势，谁就会被赶下台！谁也没有办法！”张群思路敏捷，怕蒋介石再说出一气之下伤人的话，急忙接过话茬儿说：“除了你们弟兄俩，谁对我们也不会有这么好！对此，我们心里有数，请放心！”岸信介道：“首相为总统的私谊，宁愿遭受日本左派的攻击，不以为苦！”

“蒋介石这才明白，让佐藤同时与北京、台北打交道，貌似对他不利，实则偏袒于他，时至今日，只得出此下策。

蒋介石此时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刚送走岸信介，又对尼克松很不放心，担心美国会随时抛其他，紧张得坐卧不安。

尼克松怕蒋介石前来纠缠不休，干脆派美国主管远东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格林，到台北向蒋介石简报尼克松北京之行概况，特别向蒋介石保证：“忠实地履行所有的承诺，仍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础，包括共同防御条约及其他关系。”蒋介石不相信格林的保证，又指示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要求尼克松当面澄清美国对台湾所作保证中的可疑之处，以消除因《上海公报》中未提及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而引起的不安。

尼克松向蒋介石的代表应付道：“我在北京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注目，被称为伟大的历史性事件，会对我们在太平洋地区乃至全世界的朋友产生持续多年的影响，这朋友中自然也包括蒋介石总统。”沈剑虹反驳说：“蒋总统认为，阁下北京之行的最大受害者，正是我们，希望总统一定要对得起老朋友！”尼克松暗骂蒋介石对他苦苦纠缠，为照顾与蒋介石的多年交情，耐着性子解释说：“为照顾台湾利益，我和周恩来在北京围绕台湾问题地行过激烈较量，谈判极其艰难。基辛格把美国从台湾撤军说成是一个目标，乔冠华坚持美国必须无条件撤军。”沈剑虹暗想：“访问北京是你尼克松自己跑去的，又没有强迫你去，谁让你去活受罪！”但他不得罪美国总统，只是好言好语争取对蒋介石更有利的结果。

尼克松故意摆出老朋友的姿态，以诉苦的样子摆龙门阵道：“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形成僵局，我坦率地对周恩来说，如果公报在台湾问题上过于强硬，势必会在美国国内造在困难。

我将受到国内各种各样的亲台湾、反尼克松、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院外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交叉火力的拚命攻击，整个的对华主动行动就有可能成为两党之间争议的问题。到时候，如果我不论是否由于这个具体问题而落选，我的继任者就可能无法继续发展北京与华盛顿的关系！”尼克松告诉沈剑虹，正是由于对蒋介石的多年“友情”，才在中美关系中留下了台湾问题的一个“尾巴”：“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沈剑虹刚想指责美国出卖“老朋友”，尼克松将面孔一拉，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总之，这是我费尽心机为蒋总统争取到的最好结果，此外本总统就无能为力了，再说日本的佐藤政府也正在与周恩来私下接触，蒋总统并无异议，为什么单独限制美利坚合众国的行动呢！”尼克松这一“军”真把沈剑虹“将”住了，一时哑口无言。尼克松趁机做出送客之态：“请转告老朋友蒋介石总统，美国决心遵守对中华民国的承诺，台湾所要求的，正是美国总统的保证。”沈剑虹告别尼克松，第二天就乘飞机回台北向蒋介石汇报，听说蒋介石正在日月潭边休息颐养，又动身赶往南投。

3月的日月潭正是风光秀丽之时，湖的北半部形同日轮，南半部细长，酷如上弦之月。

湖四周翠山环抱，林木茂盛。灿烂的阳光下，堤峰青翠，湖水晶莹，绿波如镜，景色如画。

为排解心中的烦忧，蒋介石坐在静谧的园林别墅石凳上，拿腔作调地

吟诵清代诗人曾作霖写的日月潭诗：山中有水水中山，山自凌空水自闲，谁划玻璃分色界，倒垂金碧浸烟鬟；蓬莱可计乘风到，艤舫知为举火还，别有洞天开海外，人家鸡犬绝尘寰。

趁蒋介石情绪尚高，蒋经国赶快带沈剑虹向蒋介石做了汇报。蒋介石感慨万千，手举拐杖说：“从此以后，我们要比以前更依靠自己。”蒋介石看美国拉不住了，又派张群再次秘密访问东京，很快见到首相佐藤，两人一起高声大骂尼克松不够朋友。佐藤大事渲泄心中的愤懑情绪：“两个大国甚至还没有相互承认，它们的首脑竟能够相会并且坐下来一起谈判，真是越出常规，但它必定会被看成是一件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张群对佐藤的话从鼻孔里冷笑一声，不无讥讽地问道：“阁下在施政演说中声称要和大陆改善关系，贵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曾野明也主动和大陆官员接触，人家就是不理，这又为什么？”佐藤摇摇满头银发，递过一份《人民日报》上刊载的“上海公报”，指给张群看他用红笔密密圈圈划出的部分：“中国方面表示：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对外扩张，坚决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与中立的日本的愿望。”佐藤苦笑着问张群道：“岳公，你说谁是军国主义？说什么日本人民希望独立，什么意思？真叫人头疼！试想，日本一旦中立，首先倒霉的不正是受到苏联威胁的中国吗？”张群不愿谈这个话题，又把话头转了回来：“我不明白，大陆为什么不理解你的主动行为？”佐藤不愧是有见地的政治家，他紧皱眉头，分析他极不痛快的问题说：“在周恩来眼里，我可能已到政权的末期，而一位行将下台的首相对其他国家是一文不值的，大陆不愿同我这个难以对付的老头子谈邦交正常化问题，对我的内阁采取敌视政策，以便给日本各界要求我引退下台的势力助一臂之力，争取同下届内阁谈判邦交正常化问题时，处于有利地位。岳公富有韬略，熟谙纵横捭阖之术，阁下以为如何？”张群紧紧握住佐藤青筋暴突的大手，将白头贴向佐藤的满头银发，启动感情说：“在当前险恶的形势下，首相才是逆风中的劲草，不愧是蒋公和我的好朋友！”佐藤荣作听到张群和蒋介石把他引为知己的话，眼里滚出几滴浑黄海的泪珠：“请蒋总统和岳公放心，我在位一天，就绝对不办对不起老朋友的事！”72岁的佐藤荣作在中国问题上一意孤行，逆历史潮流而动，引起日本各派政治力量的反对，使日本政局开始动摇蒋介石大感惊恐，全力支持佐藤保住首相宝座，但终究不能阻挡历史潮流，佐藤只得于1972年6月17日宣布辞职。

佐藤一宣布下台，自民党为争夺总裁宝座就展开激烈争夺，实力人物三木武夫、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福田赳夫都跃跃欲试，“三角大福”之战拉开战幕。

蒋介石对日本这场总裁争夺战比日本人还要关心，急召蒋经国、张群、台湾驻日大使彭孟缉协商对策，一致商定要全力支持福田赳夫执日本政坛牛耳。

原来这福田赳夫1905年1月生于日本群馬县，与蒋介石渊源极深，是当时日本亲台派的密友。他1941年就随汪精卫伪政府“经济顾问”到中国主持汪伪政权“储蓄券”的发行工作，翌年任汪伪经济顾问，后任大藏省大臣、官房长官、银行局长、计划局长；战争后历任自民党副干事长、干事长和内阁农林、大藏、外务大臣等职，在自民党内是拥有亲台派在内的第二大派，是日本政坛上颇有影响的人物。1976年出任日本首相，1978年主持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对华态度有所改变，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张群出谋划策道：“福田赳夫是日本政坛上官僚派代表人物，为保守本流中的傍流，属岸信介的嫡系大将，在日本一呼百应，只要我们把友好议员和右翼势力动员起来，就可能把亲台派首领福田赳夫拥上日本首相宝座，开创对日关系的新时代！”这番话说得蒋介石来了精气神儿，便亲自出马和佐藤、岸信介兄弟联系，又命彭孟辑回日本会见福田赳夫，动员贺屋兴宣、滩尾弘吉、椎名悦三郎等右翼实力人物，帮助福田赳夫全力以赴投入竞选。1972年7月5日，日本自民党在东京经谷会堂进行总裁选举。彭孟辑动员台湾在日本的所有力量协助福田大战。第一次开票结果，福田仅比田中少得6票，4个人都没有超过半数票。

彭孟辑受蒋介石之命会见福田，祝贺福田取得了相当理想的战果，又全力以赴支援福田与田中角荣决一雌雄。

当天中午田中角荣和福田赳夫展开决战，双方摩拳擦掌，气氛极为紧张。中午12时30分刚过，在一旁观战的台湾驻日本大使彭孟辑看一个虎背熊腰的大汉在台上跳了起来，举起右手用拇指和食指搭成“O”字，大喊大叫发出获胜的信号，赶快一问，才知道此人乃是代表田中派在台上监票的足立笃郎。刹那时，议会厅热闹非凡，掌声和吼叫声震天，田中派和大平派欣喜若狂，福田派垂头丧气，因为开票结果是田中以282票对190票的压倒优势获胜。

彭孟辑赶到福田赳夫家里登门慰问，说他曾多次会见日本右翼团体“大日本爱国党”党魁赤尾敏、“大日本爱国者团体联合时局对策协议会”代表浅沼美智雄。

彭孟辑吹嘘这两个人物在日本具有巨大能量，他们奉日本浪人内田良平为师，以猖狂反华为己任。他俩曾在1958年10月10日在东京新桥火车站前召开“援蒋反共支持台湾国民大会”，在会上叫嚷组织“反共义勇军”援助蒋介石反攻大陆；1960年10月10日派暴徒到东京日比谷公园，杀死主张中日友好的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1971年9月，他俩又率领“犹存社”、“日本青年社”、“忧国青年同盟”、“防共挺身队”等8个右翼团体的首要分子访台，创下日本右翼团体联合访台的先例，受到蒋介石的亲自接见，反华气焰更加嚣张。

彭孟辑告诉福田，他正与赤尾敏、浅沼美智雄相见，共同策划反对中日建交的活动。

彭孟辑感谢福田赳夫和以滩尾弘吉为首的亲台派坚决反对日本与台湾断交，劝福田不要灰心，重整旗鼓夺取日本首相大权，福田赳夫冷笑道：“我们有的是机会，如果田中在处理台湾问题上失败，右翼势力马上就会联合起来，把田中角荣拉下马！”彭孟辑告别福田，又去找浅沼美智雄和赤尾敏密谋反华活动。

浅沼美智雄是日本右翼行动派头目，他气势汹汹叫嚷：“要成立亚洲反共军事同盟，肃清自民党内亲共派，防止日本政府承认中共，全力加强与国府（指台湾）的联系！”赤尾敏挥着拳头请战：“我将率‘反共挺身队’专门对付田中角荣、大平正芳，首先散发反对传单和抗议书，必要时冲进首相官邸，结果田中、大平两个老儿的狗命！”彭孟辑将他这些活动成果兴冲冲报回台北，向蒋介石邀功。

这时候，蒋介石正患肺炎住院治疗。

尼克松访问北京，给蒋介石当头一棒，一下子把这个86岁的反共老

翁打倒了，先做前列腺手术，后转为慢性前列腺炎的宿疾，健康从此一蹶不振走了下坡路。1972年7月，蒋介石又因染感冒而转为肺炎，住进荣总医院治疗。

蒋介石虽然住院，却仍保持着每天早晨按部就班盥洗、唱圣诗、静坐祈祷、写日记、读报纸的习惯。

蒋介石一起床，贴身侍卫就赶快送上印着蓝色线条的纯白色毛巾，侍候他刷牙洗脸，再送上两杯开水，一温一烫供蒋选用。然后随蒋介石到阳台上做柔软体操，唱圣诗，唱到“圣哉、圣哉”时就朝东方脱帽敬礼，之后再回房静坐祈祷，写日记。

等蒋介石利用他一天中精神最好的时间写完日记，贴身侍卫立刻把当天的《中央日报》、《中国时报》、《联合报》呈上。

奇怪，平日蒋介石只看报纸的大标题，对特别感兴趣的才交代给秘书，用红笔勾了在早饭时读给他听，今天则一反常态，痴呆呆盯着一张报纸看个不停，嘴中不停地骂个不停：“娘希匹，娘希匹。……”贴身侍卫大惊，不敢惊动蒋介石，轻手摄脚来到他背后，偷偷一看，见报纸上登着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在第一次内阁会议后对记者的谈话，田中宣称要加快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步伐，大平的谈话更使蒋介石触目惊心：“日台关系的处理与日中邦交正常化，是同等重要的问题。台湾的将来究竟如何，不能妄加评论，但我们希望日台之间的经济、文化关系能够保持稳定。保持这种稳定的关系是政治家的责任。”

随着日中邦交正常化谈判取得进展，尤其到了谈出结果的时候，很难设想日华和平条约还能继续存在。怎么办？这些具体问题现在还不好说。……“突然，蒋介石一声惊天动地的咳嗽，随即瘫倒在软椅里，贴身侍卫急召医生、护士前来抢救，医院里顿时乱作一团。……蒋介石刚缓过起来，就命外交部长沈昌焕召见日本驻台大使宇山厚，谴责田中内阁关于要实现日中关系正常化的表态，是“违背国际信义和应遵守的条约义务的”。又于7月25日命驻日大使彭孟缉会见日外相大平，声称蒋介石坚决反对日本与大陆“国交正常化”。

彭孟缉见大平和田中对其要求置之不理，就私下会见日本右翼元老政治家、亲台派“总司令”滩尾弘吉。他知道滩尾和椎名悦三郎、前尾繁三郎都是蒋介石的老朋友，三人时常聚会交换支持蒋介石的意见，亲台派将其称为“三贤人会”，他们的意见颇受自民党各派重视，日台间一遇难题，总是要推滩尾出面解决。

滩尾弘吉听了彭孟缉的连起诉苦，当即决定派日本右翼“新兴实力人物”、著名的自民党鹰派议员玉置和郎访台，协商保护日台关系的方策。

彭孟缉深知玉置和郎和大陆浪人出身的日本政客，早年曾在山西省陆军军官学校就读，后来在中国经商，战后转入日本政界，曾任自民党社会保障部长、青年对策部长和农林水产盛冲绳开发厅政务次官。他一贯亲台反华，曾受滩尾弘吉之托，率自民党右派议员赴台，与蒋介石、张群密谋阻挠中日建交的方策。

蒋介石在医院六病房接见玉置和郎，稍做寒暄就气鼓鼓地说：“你回去告诉田中角荣，过去双方的关系是战胜国与战败国的关系，吾人不仅没有对300多万侵略过中国的日本军民进行报复，而把他们像朋友一般送回日本，又放弃赔偿权利，帮助日本恢复经济，真是仁至义荆现在中华民国地位

下降了，日本就翻脸不认了，与大陆拉关系。你回去告诉田中，叫他派代表团来，看他怎么向我解释？”蒋介石见日本仍置之不理，便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张宝树在访问韩国归途路过东京，劝说自民党政要改变意图，又命行政院长蒋经国8月8日发表谈话，督促日本政府“反省”。

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在稳步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同时，将日本驻台大使宇山厚召回东京，商量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台湾的应变措施，觉得应派一名政府特使向蒋介石做说服工作。这位特使人选极其特殊，他必须是蒋介石信得过的人，同时也要懂得中日恢复邦交是大势所趋，能够做蒋介石的工作。

田中和大平选来选去，最后选中了椎名悦三郎。

这椎名悦三郎1898年1月16日生于日本岩手县，侵华战争时期曾任伪满国务院总务司统制课长、产业部矿工司长和日本商工省临时物资调整局第五部长、总务局长、军需省总动员局局长、商工省次官、军需省次官；战后任自民党经理局局长、官房长官、通产大臣、外务大臣，与蒋介石、张群私交颇深。

田中请椎名就任自民党副总裁，以特使身份出访台湾。椎名知道这是一份不好干的差事，固辞不就，田中再三以重任相托，椎名才勉为其难。

田中和大平请椎名出席新成立的自民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会议，会长小坂善太郎宣读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基本方针称：“在对待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上，日本政府应注意以下各点：鉴于日本与中华民国的关系颇深，谈判要在千方百计保持原有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小坂会长话音刚落，亲台派议员滩尾弘吉、玉置和郎、中川一郎等纷纷追究责任，指责说只讲保持日台原有关系不成，必须讲“要保持外交关系”。最后，中川一郎气势汹汹说：“大多数人的意见是应该保持包括外交在内的原有一切关系，希望按多数人的意见办。”小坂会长不愿多做纠缠，接受中川的意见道：“那好，把原稿中的‘要’字改为‘应’字，就这样定了。”自民党和日中邦交正常化基本方针一通过，田中和大平就催椎名带着这个方针启程赴台。椎名请示对台交涉方案，田中笑着说：“‘基本方针’都讲到了，请灵活运用。”椎名无奈，只好硬着头皮飞往台湾，不禁暗想，蒋介石将以怎样“险峻的气氛”迎接我呢？《椎名悦回忆录》对蒋介石精心设计的欢迎椎名的场面，有如下精彩描述：“我一跨出飞机舱门，就被几百名赶到机场示威的粗野群众包围起来。写有‘椎名滚回去’的标语牌密密麻麻，口号声、辱骂声犹如雷鸣，石块、鸡蛋朝车子飞来。我们的车子有人吐唾沫，有人用脚踢。有的车子的挡风玻璃被棍棒打碎，停在那里动弹不得。”椎名悦三郎颇感狼狈，但因肩负着倒霉使命，也不好发作，正在混乱之际，幸好张群和外交部长沈昌焕赶来，训斥示威暴徒不得对日本待使无理，把椎名送到迎宾馆，椎名赶快向张群说明：“自民党的决议，对日本政府也有约束力，请岳公帮我渡过难关！”张群慨然相允：“老朋友，请放心，只要有我在，就不会使你太难堪！”因为蒋介石有病住院，张群第二天陪椎名会见行政院长蒋经国。寒暄既毕，蒋经国不客气地质问大平外相关于日台条约可能不复存在的真意。

椎名小心翼翼解释道：“大平外务大臣实际上是这个意思：表达了他的真实心情，即对日中邦交正常化后日华和平条约名存实亡感到惋惜，同时也说出了从逻辑上讲无可奈何的原始想法。”蒋经国想起父亲的交代，正色质问道：“田中首相态度如何？”“田中首相对此说法始终没有表态。”“原有

关系'到底有何含义?"" '原有关系'这个表述非常含蓄,里面有不少文章,甚至包括外交关系在内。会议记录都记得明明白白。田中首相、大平外相过些日子去北京谈判,是要以它为依据的。如果最后谈不拢是不会妥协的,有可能中途回国,等有了协议会同意的新方案之后再去。我们顾问议员团的态度始终很坚决,决心用协议会的结论这把戒尺来要求田中首相,让他按协议会结论的精神办事。"蒋经国将信将疑发问道:"田中首相会按协议会的结论行事吗?"椎名不敢直接回答,寻思半天才绕着弯儿说:"协议会召开成立大会时,首相、外相都出席了,都在会上致词,表示要按协议会的意见办。"蒋经国又按蒋介石的指示将矛头对准大平正芳质问:"大平外相对驻日大使彭孟缉说,日中邦交正常化后,日华和平条约就不再存在了。这如何解释呢?"椎名悦三郎心中不悦,耐着性子解释说:"大平外相到底怎么讲的,没有听见,但记得他在另一个场合讲过'从逻辑上讲不能并存'这个意思。首相至今没有说什么,但表示要尊重和服从协议会的决定。看来,大平大臣只是谈了一下个人看法。"蒋经国对这个解释很不满,转身向陪同接见的台湾外交部长沈昌焕询问究竟。听完沈昌焕对一系列问题的说明,蒋经国扭住不放追问:"总之,那些话是在外务大臣和驻日大使这样两位负责人之间谈的,所以我们不得不把这次谈话看成是代表政府的正式发言。请特使回国后查一下记录,以便让我们了解日本政府究竟作何打算。

在我们看来,这是'断交的预兆'。"椎名知道这是核心问题,忙命日本驻台大使宇山厚说明情况,又圆滑地抹稀泥道:"的确有当时的谈话记录。大平外相的意思似乎是说,'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后,日华和平条约就可能不起作用了',并没有正式表示'出于无奈,只能这样,请转告贵国'这种意思。再说那也不是讲这种话的场合,由于和大使彭孟缉的个人关系很好,所以流露了一些表示担心的情绪,那种场合不可能讲'务必转告'这类的话么。"蒋经国暗骂椎名悦三郎老奸巨滑,老想用绕圈话把他绕进去,就把脸拉长说:"我代表蒋总统和政府严正声明,万一日华条约被毁弃,日本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尽管我们可能遇到种种困难,但我们仍将为了亚洲的和平走我们自己的路,可能将采取一切措施维护这种权利。

椎名看事态严重急眼了,忙保证可以发表声明,宣布"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谈判,是基于自民党的决议,因此,关于台湾问题,包括外交关系在内,原来的各种关系都将维系下去"。

蒋经国立即抓住不放,逼椎名如实照讲发表声明,椎名只好照办。

周恩来看了椎名这个讲话,立即在9月18日深夜召见日本自由民主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会长小坂善太郎等5人,指出椎名在台湾的讲话远远偏离了中日两国关于邦交正常化的路线,倒向了台湾,接着阐述了中国的原则立场,对自民党某些人鼓吹的所谓"不能抛弃台湾"及"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等谬论进行了有力批驳。小坂提到椎名在台北被打的消息,周恩来以嘲讽的口吻说:"这是蒋介石、蒋经国搞的双簧,这也是历史的转变,就是说,谁欢迎田中首相新的对华政策?是七亿中国人民;谁反对田中首相日中邦交正常化政策?是台湾的少数顽固分子,这是很好的现实对照。"小坂访华团中有一些亲台人物,周总理耐心地做工作说:"对于日本在处理邦交正常化之际面临的某些困难,中国方面会予以适当照顾和体谅,但这只能是在日方接受恢复邦交三原则的前提基础上。代表团各位先生来华访问,肩负着光荣的使命,希望能坦率地交换意见,加深相互理解,起到为田中首相访华

铺设轨道的作用。"经周总理细心做工作，不少亲台派议员转变立场，支持田中改善日中关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亦宣称，椎名访台结果对田中访华并无影响。蒋介石见此情况气急败坏，指使彭孟缉勾结日本暴徒设法破坏。

于是，"防共挺身队"暴徒闯入田中首相官邸，提交反对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抗议书、散发反华传单。见田中毫不理睬，"防共挺身队"的暴徒又身带刀子和抗议书，杀气腾腾徘徊于田中官邸周围，扬言要杀害田中、大平，以此阻止田中、大平访华。

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于1972年9月25日动身访华，与周总理、姬鹏飞外长进行多次会议，在9月28日的最后一轮会谈中，大平外相专门谈到了台湾问题，他小心翼翼说：“有4000名日本人在台湾做买卖，开商店，每天大约有上千日本人去台湾旅游。明在就要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同贵国建立外交关系。出现这样大的变化能不能平安无事，我们真是提心吊胆。”大平看周恩来一眼，又谨慎地说：“所以，我想向您说一下。从明天起，现有的外交关系就转到你们这边来了，但现在实际存在的日台关系还是要保持。这是我们的殷切希望。你们对此也许不‘同意’，但是否可以表示‘理解’呢？”周恩来高瞻远瞩，当即表示：“可以理解。”大平一块石头落地，即发电命日本驻台大使宇山厚会见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杨西昆，通报了田中角荣与周恩来马上就要签署的日中共同声明的内容，通知台湾，日本将与大陆建交，大平将在日中共同声明公布后发表关于日台条约即将终止的谈话。

为表示安慰，特别讲明田中首相“感谢蒋总统在战后长时期对于日本的好意”。杨西昆实在无话可说，从桌上拿起早已准备好的蒋介石致田中角荣的信宣读。

9月29日上午9时，日本外务省次官召见台湾驻日大使彭孟缉，提前通告日中联合声明的内容，正式通知他：“台湾和日本的外交关系虽然不能继续下去了，但我们希望今后继续同台湾保持经济和其他方面的业务关系。”同日上午10时，北京一片节日景象，人民大会堂光彩夺目，灯火辉煌，中日联合声明签字仪式隆重举行。大平外相出席完签字仪式，立即动身赶往北京民族饭店，在新闻中心接见记者，专门谈到日台条约说：“联合声明没有涉及这个问题。日本政府的见解是：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可以认为日华和平条约已失去意义，宣告结束。”蒋介石肺都要气炸了，但又对日本无可奈何，为挽回面子，指示台湾外交部9月29日深夜发表对日断交声明。

9月29日，日台双方的大使馆不再升旗。10月28日，彭孟缉乘坐从羽田机场起飞的“中华航空公司”班机离日返台，向蒋介石复命，日台外交关系结束。

五、为蒋介石送终

秋季是台北近郊的阳明山一年四季中最撩人眼目的时节，果实累累，挂满枝头，芦花如雪，曲径寻幽，别具诗情画意。难怪人们一到台北，都以

一游阳明山为快。

蒋介石手扶拐杖，蹒跚跚跚，来到"阳明瀑"旁边的"大屯瀑"。他举目望起，觉得这真是天下奇景：苍劲的古树苔藓斑驳，枝叶茂盛，藤萝相映，确实令人心旷神怡。蒋介石扶杖走上一座平台，凭栏纵目遥望台北盆地，又看到台口一副笔力遒劲的对联，说尽了站在这个平台上的妙趣：笑看星斗樽前落，俯视河山足底生。

85岁的蒋介石性格古怪，喜怒无常，面对阳明山的大好秋光，顿觉江河日下，今不如昔。

他想到尼克松、田中角荣打了他两闷棍，健康就显著恶化了：尼克松访华气得蒋介石前列腺发炎，手术后转为慢性宿疾；田中访华又气得他患感冒而转为肺炎，不得不住院治疗，今天情绪稍好就出来散心。

随行的张群、彭孟緝见蒋介石又提起要命的话题，都提心吊胆大讲阳明山的大好秋光，蒋介石却固执地追问：“尼克松和田中角荣爬长城，谁爬得高？”“自然是田中角荣。”“为什么？什么意思？”“表示日本比美国走得远，尼克松去得早，田中角荣要走得远，爬得高！”“娘希匹！”蒋介石一下喘不过来气，摇摇晃晃要摔倒，张群忙让贴身侍从七手八脚，把蒋介石塞进车送回医院。

这时，岸信介又秘密来到台湾。蒋介石一缓过起来，张群就带岸信介来看蒋介石。

岸信介见蒋介石骨瘦如柴，长脸腊黄海，忙上前把礼物献给蒋总统：“我们将在日本开展感激总统、感谢总统的运动，在各大城市为总统树立铜像，开动宣传机器大讲总统恩惠日本的德政，让《产经新闻》登载《蒋总统秘录》，在日本人中间树立蒋总统的伟大形象！”蒋介石脸色稍好些，仍挥舞拐杖不罢休：“你们要想办法，把田中角荣拉下台。……”1972年9月30日下午1时05分，田中首相、大平外相满载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丰硕成果，回到充满节日气氛的羽田机场举行日本战后独一无二的盛大欢迎仪式，人员级别之高之全可谓空前绝后：不仅有三木临时代理首相、中曾根通产相和自民党椎名副总裁，而且有在野党的社会党成田委员长、公明党竹入委员长、民社党春日委员长等，朝野大员一起出动欢迎田中出访归来，都对田中内阁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给予积极的评价，把中日复交看作日本外交的巨大历史成果。

另一方面，日本右翼团体和亲台势力却暗中应蒋介石的请求，出动大批宣传车，把高音喇叭开到最大限度，吼声震天，呼喊打倒田中内阁的口号。

在自民党内，福田赳夫又重新燃起角福之争的战火，滩尾弘吉为首的亲台派议员个个怒不可遏，对田中首相事先不跟他们打招呼就断然与台湾断绝关系、同中国建交的做法非常恼火，商定要在自民党参众两院议员听取田中首相报告访华情况的全体会议上，对田中进行质问，大举攻击。

在参众两院议员会议上，田中首相神采奕奕发表讲话说：“我肩负日中邦交正常化的重任，遵照党的决定访问了北京，再次感谢党给予的鼓励和合作。”突然，会场上吼声四起，倒彩声冲天。

田中首相扫视会场一周，见亲台派议员个个横眉立目，直着脖子喝倒彩，而到会的500多人中，亲台派占了很多，知道今天是星期六，议员多半回选区去了，暗想今天任务艰巨，额头不禁渗出了汗珠。他掏出手绢擦汗，提高声调朝喝倒彩的方向解释说：“到底是不是不折不扣地遵守了党和

各位给政府的规定呢？我不想违背党给政府的规定去恢复邦交，也许有人认为多少出了点格，不过，我是最后才下的决心，尽了一切力量。许多人长期以来主张日中之间要邦交正常化，但始终未能如愿以偿。这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事情到了最后关头，我考虑再三，终于下了非下不可的决心。”田中首相话音未落，会场上立刻响起雷鸣般的掌声，顿时赞声四起，热气腾腾，与窗外嗖嗖刮过的阵阵秋风，适成强烈的对比。大平外相接着汇报中日联合声明内容，也受到热烈欢迎。

蒋介石听张群讲了日本亲台帮的活动，干枯的脸上有了几丝笑容，1972年10月10日发表文告，强调“力排横逆，自谋自备，再开新局。”蒋介石命张群把日本亲台派“总司令”滩尾弘吉请到台湾，秘密策划成立亲台组织。滩尾回国紧张活动，不久就成立了“日华（台）关系议员恳谈会”，他出马担任会长，利用议员地位为发展日台关系摇旗呐喊。1972年12月促使日本和台湾当局在东京和台北分别成立“交流协会”、“亚东关系协会”，以维持双方的非官方往来。

1973年4月，正是日本樱花盛开的艳丽春光时节，蒋介石在荣民总医院六病房接到廖承志率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访日的消息，不由想起了他和廖家的恩恩怨怨。

想当年，廖仲恺、何香凝夫妇追随孙中山革命，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廖仲恺兼任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长、农民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军需总监、大元帅府秘书长等要职，成为国民党左派的旗帜。

那时候，38岁的蒋介石是广东革命政府军事委员会中的八名委员之一，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黄埔军官学校校长、广州市卫戍司令、长洲要塞司令等职，有日本参谋本部派出的间谍浪人铃木贞一陪伴左右，成为“中国政坛上一颗扶摇直上的新星”，而廖仲恺则成了他向上爬的一大障碍。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被国民党右派集团暗杀身亡，蒋介石闻讯大喜，立即以广州卫戍司令宣布广州戒严，被军委会赋予审查任何个人与党政军机关和全权处置粤局的权利，他趁机软禁政敌胡汉民、许崇智，成为军事方面最有实力的人物，又借军权成了中国第一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见何香凝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日本投降后又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蒋介石为给何香凝点“颜色看”，指使国民党特务暗中枪杀了廖梦醒的爱人李少石，扣压了廖承志。

蒋介石后悔当初没有把廖承志干掉，才使他今天率领中日邦交正常化第一个大规模代表团访日。蒋介石在病房里坐卧不宁，下令对廖承志不能手软！

台湾驻日人员奉蒋介石之命物色暴徒，不少右翼头目在中日复交后都不愿明目张胆反华了，而与暴力活动的老手赤尾敏则一拍即合。

原来这赤尾敏被称为“暴力狂”、“永久的斗士”，早在1937年就伙同侵华特务巨头儿玉誉士夫建立“对支同志会”，大搞侵华特务活动，战后组织“大日本爱国党”对高崎达之助等进步人士展开暴力活动，1960年指使暴徒枪杀了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叫嚷“哪儿有左翼，哪儿就有赤尾敏”。

赤尾敏指使暴徒随廖承志在日本各地活动，不断向“中日友协代表团”乘坐的汽车投掷“抗议”传单，但慑于廖承志在日本的崇高声威，赤尾敏没敢命暴徒下毒手。

廖承志访日促使中日关系健康发展，两国政府根据中日联合声明的规定，着手进行以缔结航空、贸易、海运、渔业等协定为目的的谈判，这就好像用一把锋利的钢刀，一刀一刀割蒋介石的心头肉。

蒋介石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冷笑道：“签订航空协定？没那么容易，搞不好，就让田中角荣滚下台！”蒋介石指使台湾当局气势汹汹发表声明称：如果日本在空运方面不与台湾合作，日本飞机经过台湾上空时，将被视为不明飞行体处理。言外之意，是将对日本飞机开炮轰击！

蒋介石这样牛气十足，是有他的“道理”的。

在中日间诸多协定中，以签订航空协定、实现中日通航尤其困难。这是因为日台间虽断绝外交关系并互撤了使馆，但涂有台湾的所谓国旗的“中华航空”班机仍照飞日本，进出东京羽田国际机场，日本航空公司也继续往返台北，这就违背中日联合声明精神，构成“两个中国”的重大政治原则问题。

蒋介石气哼哼地叫嚷：“田中角荣，你要签定航空协定，看你怎么越过这个障碍？哼，协定签不成，说不定就要了你的老命！”蒋介石调动在日本的所有兵马，勾结日本右翼势力，处处与田中、大平为难。这一段田中内阁连续出事：田中访苏时发表的日苏联合声明漏掉了一段文字；石油冲击，物价飞涨；处理金大中事件不当；田中声望一落千丈，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特别是1973年11月一直在政策上支持田中的大藏相爱知揆一突然去世，田中只得请政敌福田赳夫出任藏相，蒋介石获此消息好不欢喜，指使台湾在日势力，与日本右翼亲台帮相互勾结、沆瀣一气，猖狂抵制中日签署航空协定。

田中、大平抱着必死的决心搞中日航空协定。1974年1月3日大平动身访华，同姬鹏飞外长、周恩来总理多次谈判，毛泽东主席与大平正芳谈笑风生，宛如多年未见的老朋友。最后在日本承认一个大前提，即承认中日是国家间协定、日台乃民间性质的条件下，中方对日方的处境和某些困难予以体谅和照顾，达成处理日台航线的六条协议，由日本政府予以宣布。

大平正芳回到东京，1月16日召开自民党外交调查会、政调会外交和交通两个小组委员会以及航空对策专门委员会的联席会议，把中方照顾日方达成的六条协议高声宣布：（一）根据日中联合声明精神尽快缔结日中航空协定，同时通过缔结民间协议继续维持日台航线；（二）日本会业“日本航空”的班机将不再飞日台航线；（三）日本政府不强求“中华航空”更换公司名称和平帜，但将通过其他途径就其名称和平帜的性质表明日本政府的看法。日本有关部门今后提到“中华航空”时，将称它为“中华航空（台湾）”。

（四）“中华航空”使用羽田国际机常成田机场启用前，中台双方合用羽田机场，但时间上要作必要的调整。

（五）使用大阪机场的“中华航空”班机，将转移到日台双方同意的其他机常（六）“中华航空”常驻日本的营业处、办事处以及其他地面服务设施的业务，将委托代理店或其他业务团体办理。但是，在确保航空安全、安定从业人员的生活方面，将提供必要的方便。

对大平花费心血和中国谈妥的这六条方针，亲台派大叫反对，滩尾弘吉尖声高叫：“这个方案，台湾是不会接受的。日本在国防、经济两方面都和台湾有很深的关系，今天和它一刀两断，要三思而后行，我们坚决反对。”大平正芳只得花费时间说服亲台帮。玉置和郎、中川一郎等“青岚会”干将拚命攻击田中内阁的对华政策，叫嚷同“中华民国断交是莫大的损失”，要求

田中首相、大平外相辞职。

在1974年4月初举行的日本参议院预算委员会和自民党总务会上，玉置和郎等同大平外相展开激烈争论，攻击大平推行“屈膝外交”，赤尾敏还率领“大日本爱国党”暴徒到大平私宅闹事，施加压力。

田中、大平顶着巨大压力发誓：“即使粉身碎骨，也要签订中日航空协定”，终于在1974年5月24日在北京与中国签订了《中日航空运输协定》。大平外相正式发表谈话说：“日本不能承认台湾飞机上的青天白日图案是国旗标志。”躺在病床上的蒋介石得到这个消息，指示蒋经国向日本提出抗议，停止了日台航线的航运业务。

这下可惹怒了亲台派，纷纷出动对田中内阁大加挞伐。为缓和与亲台派议员的矛盾，田中派滩尾弘吉、玉置和郎等“台湾帮”头目赴台，做台湾当局的工作。

蒋经国在病榻前向蒋介石请示处理方针，蒋介石有气无力地回答：“如果日本政府发表谈话，青天白日旗是国旗，航线可以恢复。”滩尾弘吉、玉置和郎接到蒋经国的答复，认为要田中内阁发表蒋介石所要的声明是不可能的，为安慰蒋介石，决定从1974年8月15日起，在《产经新闻》上连载《蒋总统秘录--日中关系八十年之证言》。

滩尾弘吉向蒋介石提出，要在《产经新闻》上连载秘录时，发一个蒋介石的近照，这可难坏了蒋经国。因为蒋介石右手肌肉萎缩的症状已经十分严重，一坐起右手就无法控制而自然下垂，便使蒋总统形象欠佳。

宋美龄听到这个消息，认为是辟谣的大好机会，力主接见日本记者，证明蒋介石还健在，至于隐藏手病的办法，你们去想！

蒋经国难违“母命”，只好和医疗小组召集人王师揆及侍从商量。王师揆说蒋介石心脏停止跳动的现象已几次发生，而且心脏停止跳动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坚决反对蒋介石接见日本记者。

蒋介石的贴身侍从副官翁元突然灵机一动，提出一个方法，就是用透明胶布将蒋介石萎缩的右手手腕“绑”在椅子的把手上，再穿上长袍马褂，从外表上就看不出蒋介石的右手有什么问题了，宋美龄、蒋经国都说这是个好办法，但宋美龄又摇摇头说：“《产经新闻》名气不大，换一家日本大报吧！要不就请他们把照片分发给所有的日本报纸和台湾报纸！”蒋经国皱眉头劝宋美龄说：“母亲不了解情况，日本其他大报都不理我们，只有《产经新闻》愿意干这件事，要是得罪了《产经》，我们在日本连发几十个字的消息都困难，就别说连载二百几十万言的大部头秘录了！”宋美龄只好同意，她到病榻前跟蒋介石一说，蒋介石也不想死，他想看看秘录出版后他的“名誉”得以恢复的情况，对此完全同意，他特别提出摄影要求：不准对他近摄，不准只摄他一个人，要从客厅门口摄起，12名人员排列两旁，蒋介石、宋美龄并排居中而坐，蒋介石的脸色就看不清了。

于是，吸取蒋介石最小的孙子蒋孝勇结婚后向他举行奉茶仪式时的经验，先扶蒋介石坐在椅子上，贴身侍从副官翁元立刻用透明胶布在蒋介石的右手腕上方粘上一圈，直接粘在椅子的右边把手上，然后给蒋介石穿上长袍马褂，再把陪同人员唤进摆好阵势，最后才把日本记者古屋奎二请来采访摄影。

日本记者古屋奎二带着神秘感进入客厅，只见蒋介石、宋美龄夫妇端坐正中，蒋介石身体有些清瘦，精神似乎还满不错，但只要再仔细观察，便

可发现蒋介石双眼眼眶严重下陷，脸孔苍白。

为掩护蒋介石“过关”，蒋经国和宋美龄主动欢迎日本记者古屋奎二访台，蒋介石也偶尔插上几句话，但日本记者古屋奎二已发觉蒋介石的病已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

蒋经国、宋美龄怕这出戏演得太长会露出马脚，忙催日本记者古屋快快摄影，日本记者古屋更怕错过蒋介石还活在世上的良机，举起相机照个不停。

看照得差不多了，蒋经国急忙把日本记者古屋奎二请到侧室设宴招待，王师揆胆几乎被吓破，匆忙招呼医疗小组医生、护士和侍卫人员冲上前来，把蒋介石抬回病床之上，整个士林官邸像打了一场大仗一般忙乱不堪！

随着《蒋总统秘录》在日本《产经新闻》上长期连载，蒋介石从病床上又听到了来自东京对他来说是“特好”的消息：亲台帮藤尾正行、滩尾弘吉等在日台航线问题频频向田中发难，使田中逐渐陷入困境，就田中经济来源问题的追究、对田中金权政治的批评已成为燎原大火。到1974年11月26日，田中四面楚歌，对于继续执政终于丧失信心，向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提出辞职。由椎名裁定的新内阁成员反映了椎名的意图：三木武夫为首相，福田赳夫任副首相，大平正芳当藏相，中曾根康弘登上自民党干事长的宝座。

蒋介石得意地呼唤侍从副官：“来，拿酒来，为田中老儿从权力宝座上摔下来，干杯！”

“这也许是蒋介石的回光返照，就在1974年12月，台湾发生流行性感冒，蒋介石受感染发展成肺炎，到1975年1月9日晚睡眠中出现心肌缺氧症，虽经急救脱离险境，但却肺部疼痛，不时发烧，痰涌于喉，不能出之于口。为防止感染，病床安上了玻璃罩，鼻孔插上了氧气管。蒋介石自觉病势加重，明白时日不长，油将尽灯欲灭，源已断而水枯，应该考虑后事了。宋美龄、蒋经国见蒋介石形销骨立，头似骷髅，双目无神，形将就木，拖得差不多了，便在1975年3月29日合搞了遗嘱。

拖到1975年4月5日清明节，蒋介石病情突然恶化，士林官邸忙作一团。

这时，台北市雷声隆隆，大雨倾盆，蒋介石在大雨滂沱中，于11时50分一命归天。

蒋经国在日记中吹嘘乃父之死使“风云异色，天地同哀”，享年89岁。

蒋介石死后两小时，台湾政府新闻局发表蒋介石的死亡公报，宣布从4月6日起一个月为“国丧期”，把蒋介石的遗体停在台北市的“国父（孙中山）纪念馆”5天，供人们瞻仰。

美国总统福特对蒋介石之死反应冷淡，只拟派农业部长去台北敷衍，经蒋经国苦苦哀求，才改派副总统洛克菲勒应付了事。

日本亲台派议员催促日本政府派代表到台北吊唁，三木首相考虑到中日关系，仅以自民党总裁的名义发了唁电，佐藤荣作、岸信介、滩尾弘吉赴台参加蒋介石的葬礼，花圈上连自民党的名义都没有用，仅称友人代表。

台湾当局却给佐藤三人以准国宾的待遇，在佐藤三人所住旅馆及专车上都悬以太阳旗，自1972年日台断交以来，在台湾还是第一次出现太阳旗，不少人见了都觉得颇有讽刺意味。

对蒋介石梦断草山，未见中国领导人在公开场合有重要讲话，只在日

本记者永野信利所著《天皇与邓小平握手--实录·日中交涉秘史》一书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1975年接见以福田利光为团长的西日本新闻友好访问团成员，谈到自民党对蒋介石去世的反应时，言辞激烈地说过这么一段话：“蒋介石死了，他是个窃国大盗，人民公敌，死有余辜。”

然而，听说在日本还有人和蒋介石藕断丝连，甚至党的总裁还指派自民党要人专程去台湾奔丧。如果这是真的，中国人民理所当然感到愤慨。”

六、与台湾发展“实务关系”

日本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后，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日本当局与台湾发展实务关系，使日台交流出现从民间向“官方”升格的倾向。

近年来，日台之间的高层交往越来越频繁。日本亲台势力利用所谓“学术交流”、“经济贸易”等名义，为日台高层互访牵线搭桥。允许台湾当局利用日本《产经新闻》为台大造舆论，让日本著名作家司马辽太郎等访台开展对台名人交往。特别是竟先于美国松动对台政策，在1994年广岛亚运会期间，不顾中方的一再交涉，竟同意台湾“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进入日本，同日本文部大臣与谢野馨等人共进晚餐，台湾当局借此宣传徐立德“访日打开了（日台关系）正常化的大门”。

1995年5月21日美国宣布李登辉访美后，日本亲台势力借机大肆活动，前文部大臣藤尾正行以117人组成的“日华议员恳谈会”会长的身份，紧急召开亲台头目会议，决定促使日本政府向美国政府看齐，也邀请李登辉访日，出席京都大学同窗会，并作为“经济大国台湾”的首脑，参加大陆亚太经合组织（APEC）非正式首脑会议。

目前，日本右翼势力还在为阻止台湾回归祖国搞阴谋活动，小泽一郎任会长、永野茂门任理事长的日本战略研究中心1994年悍然宣称：中国统一问题“最好是固定现状”，因为统一将使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影响力扩大”，所以主张日本“以半永久性地维持现状为前提，与环太平洋各大国合作”，“支持或请求美国采取行动，在区域内各国筑起防波堤”。

第十二章自私的对外援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对东南亚和中国的经济援助，虽不同于二次大战前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但也带有浓厚的自私色彩，常常附加一些条件，明显地要达到开辟商品市场取得工业原料等目的，因而被称为“经济动物”、“石油外交”，招致亚洲国家的强烈不满。

一、通过“赔偿外交”打进东南亚——原日本外相冈崎胜男称：要把赔偿当作政治问题来解决，规定必须用日本的赔偿金购买日本的产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由于发动侵略战争成为世界的孤儿，1956年加入联合国后才重新步入国际社会。为打开局面，1957年提出“赔偿外交”的口

号。

那时，日本在东南亚的形象很不好，为缓和东南亚人民的反日感情，日本只得推行"赔偿外交"，从1955年到1959年，日本先后同缅甸、菲律宾、印尼、南越等国分别签订了5-20年的赔偿协定和经济合作协定。

1956年日本与菲律宾签署了赔偿协定和关于贷款交换文件，规定赔偿总额为5.5亿美元，分20年支付，另有2000万美元的劳务赔偿、2.5亿美元的长期贷款。

1958年日本与印尼达成赔偿协议，赔偿2.23亿美元，另外提供4亿美元的私人贷款和投资。

与此同时，日本向泰国提供准赔偿2670万美元，向新加坡提供准赔偿816万美元，向马来西亚提供准赔偿816万美元。

当时的日本外相冈崎胜男说，要把赔偿当作政治问题来解决，规定必须用日本的赔偿金购买日本的产品，就使日本产品打入了东南亚市场，成为日本打入东南亚的主要手段，被称为日本经济重返东南亚的一块基石，日本人骄傲地说这是“一石二鸟”之策，既开辟了市场，又取得了日本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但未彻底缓和东南亚人民的反日感情。

二、推行石油外交

日本是个石油等资源极端缺乏的国家，保证石油等的进口便成为日本外交的重要任务，于是，日本在50年代中期，当日本经济完全恢复过来以后，日本政府便推行"高投资、高输出"的政策。即用廉价输入原料，制成商品，然后高价出售商品的办法，从中牟取暴利。

例如，进口一吨原料花43美元，而出口一吨商品则为395美元（9倍利润）。从1955年至1972年间，日本的对外贸易额增加了1.1倍半。这种高利润的对外贸易的扩大，也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

当时，日本进口的数量虽大，但价格极低，以石油为例，在日本经济恢复和发展时期，它们长期从中东得到廉价的石油供应。在1973年石油涨价以前每桶石油长期在2美元以下，当时日本每年进口101亿桶原油，只用了202亿美元，如按提价后价格计算（1974年至1975年每桶石油提到11.5美元），则日本至少得付950亿美元。这一点连日本官方人士也承认：“日本从1960年到1970年的十年间，依靠廉价的石油，实现了经济的高速成长。”“日本经济的发展基础，是靠阿拉伯的石油。”又如，日本使用的棉花主要是从东南亚等地进口的。该地区棉花价格1972年比1966年上涨了28%，而同期日本的棉织评价格却上涨了114%；1969年到1972年；由东南亚进口铁矿砂，每吨价格由11.7美元下降到11.5美元，而同时日本向该地区出口的钢铁平均每吨价格由60.5美元上升为87.8美元。日本这种对外贸易的结果，必然造成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对日本贸易的大量逆差。日本除大量输出商品外，还以私人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大搞资本输出，投资的重点放在与资源有关的行业。通过直接海外投资和其他形式的资本输出，不仅直接掠夺资源和使用廉价劳

动力，又能越过关税壁垒，攫取高额利润，而且还能转移国内的工业污染。总之，对外贸易的急剧发展，为日本垄断资本提供了丰富的原料和商品投资市场，捞取大量外汇资金，增强了国际支付能力，因此，也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

1973年10月4日第四次中东战争一声炮响，使日本面临“油断”的危境。10月17日，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举将石油价格提高70%，阿拉伯产油国又使用“石油武器”，宣布削减产量，对亲以色列的西方国家实行禁运。当时，大部分西欧国家在中东的利益与美国有所不同，特别是欧洲共同体长期在外交上同美国闹独立性，因此对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战略在11月初便迅速地作出反应，发表了要求以色列从占领区撤退的声明。其结果，阿拉伯产油国同意将英法列为友好国家，决定对除荷兰以外的欧洲共同体各国不削减石油供应。

日本怎么办？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一向追随美国的全球战略，在中东问题上也是执行亲以色列的外交政策，面对第四次中东战争所引起的石油危机，日本不得不重新考虑它的中东政策。要同美国的中东战略背道而驰，自然将冒很大风险，但如坚持亲以色列路线，必将因受石油禁运而在经济上遭到无法承受的打击。日本经过慎重考虑，最后决定修改亲以色列路线，执行亲阿拉伯外交，以确保石油供应。

1973年11月22日，日本政府以内阁官房长官发表谈话的方式，宣布了对中东政策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要求以色列从全部占领土地上撤退；重新考虑对以色列的政策。12月，日本副总理三木武夫以特使身份出访中东8国，重申支持阿拉伯、反对以色列的立场。于是，阿拉伯产油国家才决定把日本列为友好国家，不削减对日本的石油供应量。为了巩固这种关系，日本从政治、经济两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从1974年起，日本的木村外相、中曾根通产相接连对中东进行友好访问。1974年和1976年，日本两次给伊拉克共计20亿美元的长期贷款，并与伊朗就建造石油化学联合企业工程进行合作。1977年2月，日本在西方主要工业国中，第一个同意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东京设立办事处；1978年9月，福田赳夫作为第一位前往中东的日本首相访问了对日本石油供应量最多的伊朗、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卡塔尔4国；1981年10月，日本又在西方国家中第一个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以准国宾身份访日。

通过这一系列的经济外交，不仅使日本从中东的石油进口得到了保障，也使日本与中东的贸易得到迅速发展。1977年，日本从中东的进口比1970年增加了7.4倍，日本对中东的出口则猛增16.4倍，其中成套设备的出口竟增加了60倍。

日本的石油虽得到满足，但却引起中东各国对日本的不满，指责“日本外交石油气太浓”，批评日本太不关心中东问题的和平解决，日本人在中东各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仍然不好。

三、日对华援助有自私的色彩

——日本是“六·四”政治风波后追随西方国家对 中国实行经济制裁的唯一一个亚洲国家。

中日建交后，日本已向中国提供了三批日元贷款共计 1 6 1 0 0 余亿日元（约 7 6 亿美元），两批能源贷款 1 0 0 亿日元（4 4 亿美元）。

A 对华经济援助具有政治色彩日本对天安门事件的最初反应反映出日本两大外交目标：通过强烈批评北京动用军队的决定，与西方民主国家保持一致，但与此同时，又力争保持自从 7 0 年代初期发展起来的中日合作关系。

……日本是“六·四”政治风波后追随西方工业化国家对北京实行经济制裁的唯一一个亚洲国家。日本采取的一个措施，就是冻结预期在 1 9 9 0 年 4 月提供的 8 1 0 亿日元的第三期政府贷款。其他措施包括中止高层政府间的接触，和中止举办计划中举行的几次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会议，包括一个对华投资促进组织的成立大会，和一次中日间高级技术转让的会议。

美国亚美利坚大学国际学院副教授、哈费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赵全胜指出，日本的态度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还是有区别的：尽管日本不愿提供贷款，但日本政府谨慎地避免把中国推向更加孤立的境地。一些日本官员私下认为，制裁很可能加强中国国内主张强硬路线者的地位，并增加其民族主义的反应，而大陆的政治上的不稳定和经济上的停滞，会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

在天安门事件之后，外务省强调：“政府所考虑的最为重要的事情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日中关系当然不同于美中关系（亦即考虑到二次大战期间，日本在华的军事侵略行为）。外务省还警告，日本必须小心谨慎，因为北京可能为转移动乱后的国内注意力，而发动一场对东京所实行的经济制裁的尖锐批判。政府的观点受到许多工商界领袖的支持。例如，在北京发生天安门事件之后，日本银行行长住田倡导一种“静观其变的姿态”。

赵全胜做一番研究之后，得出结论说：这种双重态度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外交困境，造成混乱的对华政策，迫使东京要在各种选择中间寻求一种平衡，试图既向西方也向中国表明：（1）日本将继续同西方保持一致；（2）日本将防止进一步孤立中国。因此，日本需要在天安门事件后的对华政策方面的两条不同的外交战线上——中国和西方同时工作。

1 9 9 6 年 3 月 8 日，中国开始在台湾海峡实施导弹试射演习，日本政府决定推迟原定于 3 月举行的第四批日元贷款第一年 1 8 0 0 亿日元贷款的磋商，借此向中国施加压力。此前，对中国进行核试验，日本也以停止对华援助施加压力。

A 对华援助明显地考虑日本的经济因素领域。

赵全胜指出，日本对华援助项目的选择，明显地由日本的经济利益决定，他举例说明：从第一批长期贷款开始（1 9 8 0 年），日本同意向 8 个基建工程中的 6 项提供政府贷款，日本选择了铁路干线和海港工程。两个水电站工程则落选了。这一选择清楚地反映出日本的经济利益。对日本来讲，石臼所和秦皇岛这两个港口是能源供应（特别是煤）的重要出口港。三条铁路干线中的两条，兖州至石臼所铁路和北京至秦皇岛铁路直接连接两个港口。日本分别对这两条铁路，提供了所要求贷款额的 6 2 % 和 1 0 0 %。另一方面，第三条铁路干线，衡阳至广州的铁路与日本的能源供应丝毫不相干，因此只给予中国所要求的 1 6 % 的贷款额。日本人拒绝了两个水电站工程（龙潭和水口），因为与日本的经济利益相冲突。龙潭水电站将具有给一家大的

炼铝厂提供电力的能力，这家炼铝厂每年的生产能力是60万吨。

这同日本在印尼和巴西合作投资进行铝生产的利益相矛盾。这些例子证实了这样一点，对所要求的工程的实际选择，反映了“投资者而不是接受者的需要，也就是说，这种选择首先迎合了日本的，而不是中国的优先需要。

日本的援助外交，对日本和中国的经济利益是很明显的。日本不仅保证了自己能得到长期的原材料的供应（特别是能源），而且也广泛而深入地加强了它在中国市场上的地位。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能与日本涉入中国经济事务的程度相比拟。大规模的援助计划，也加强了日本作为一个位于前列的提供外援国家在世界上的声誉。从中国方面来看，日本的政府发展援助计划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为中国的大规模基础建设工程，提供了比私人银行更为优惠的资本。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将成为一种长期的现象。

虽然日本的援助计划取得了相对的成功，但也不是没有失误的。相反，人们可以听到对日本发展援助的批评意见，认为它带有官僚主义的繁杂、拖拉的公事程序和向受援国提出的强硬条件。日本国内外的许多人都抱怨缺少“一项总体计划”。日本的政府发展援助严格意义上讲不是援助，而更像是经济合作。因此，日本的援助不可避免地比西方的援助更为商业化。日本在天安门事件之后的决策证实，日本的援助决定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影响，对华经济制裁应什么时间和怎样取消，以及哪类援助工程能继续下去，这些有争议的问题上的决策一直动摇不定。

赵全胜以详细而有说服力的材料，说明日本对中国提供贷款，首先是出于日本的经济利益，他一针见血地道出问题的实质：东京渴望加强同北京的密切的政治关系，也是因为经济上的考虑。由于外交关系的正常化，中国在经济方面对日本的重要性显著增加。在1973年的石油冲击之后，日本意识到中东政治不稳定，可能危害日本的能源供应。（日本进口的石油中75%来自中东。）中国具有煤、石油这些自然资源，以及更为安全、廉价和更近距离的交通线，是日本理想的进口能源的产地。因此，同北京保持密切的关系，既符合日本的全方位外交政策，也是日本能源政策的优先选择之一。

天安门事件之后，日本小心地尽可能维持存在于两国之间的友善气氛。东京利用每一个机会向北京作出友好态度。例如，尽管日本拒绝发放新的贷款，但于1989年8月取消了对正在进行项目的援助的冻结令。1989年10月，世界银行开始恢复对中国人道主义援助的贷款，包括一项3,000万美元的地震救援贷款（1989年10月）和一项6,000万美元的农业计划信用贷款（1990年2月）。在世界银行带动下，日本政府在天安门事件后，于1989年12月第一次发放了一笔新的3500万美元的赠款援助，以改善北京电视广视站的设备和一家上海医院的设备。

日本首相海部俊树1991年8月正式访问北京，这是天安门事件后第一位来自主要工业国的领导人的访问。在访问期间，经济关系包括日本援助问题是一个主要的话题，而且海部还保证于1991年向中国提供9.4亿美元的政府发展援助贷款。所有这些努力，都进一步增强了中国领导人的信念，即日本的对华态度不同于西方工业化国家。

赵全胜还指出，日本对华提供援助是为了与美、英等西方国家竞争中国市场，而且中国领导人也适当照顾了日本的利益，使日本在中国处于比美、英等西方国家更有利的地位，日本并不吃亏，他写道：日本的援助外交和“

赢得中国人心"的努力是有成果的。日本人比其他西方领导人和外交家能更好地保持与中国高级领导人的接触。中日双方间的社会网络活动,对培育政治关系是有帮助的。例如,1984年,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邀请在华访问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参加一次难得的私人家庭晚宴。1985年,胡耀邦一周内同日本驻华大使中江要介三次共同进餐,而同一时期的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在整个四年的任期内只见到胡一次。

还有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例子。在签署了于1997年把香港主权交给中国的联合声明之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自豪地宣布,中国政府同意接待一个大型英国贸易代表团。但是,当十位英国高级工业家组成的代表团于1985年2月来到北京时,发现一个由100人组成的日本商会的访问团级别超过了他们。日本代表团见到了邓小平,而英国代表团则没有。一位西方记者由此得出结论:"在中国接触方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与日本相比"。这种与中国领导人颇为密切的接触,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除了文化方面之外)东京长期以来对北京所进行的网络活动的结果。

政府发展援助也用来减少两国间的摩擦。1972年正常化之后,中日间基本上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但在此期间,中日关系经历了摩擦。最引人注意的是所谓的日本军国主义复活问题。1982年和1985-1986年,北京和其他主要城市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日示威游行,这些游行都是由大学生领导的。北京对日本政府在教科书上对日本过去的战争行为加以修改,以及首相中曾根康弘以官方身分到靖国神社去祭奠战争的死难军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其他问题包括钓鱼岛(日语称作"尖阁群岛")问题,中国大陆与台湾关系一所京都大学生宿舍"光华寮"的所有权问题的争执,以及日本法院对此做出的有利于台方的裁决。在发生这些摩擦期间,日本政治领袖保证向中国提供数额巨大的货币贷款。尽管争端与贷款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日本使用政府贷款以显示其友好的姿态,以平息摩擦并促进同中方的友好往来。

四、日中贸易不平衡问题

——日本对中国设制贸易壁垒、阻碍中国商品进入日本市场,以卫生检疫、标准等问题为理由,对中国的偶蹄类食肉(活猪等)及水果等动植物商品,长期不允许进口,没有给中国商品与其他国家的商品同等条件对待。

自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以来,两国贸易不断增长,两国贸易的规模已达到两国开始贸易时的1.4倍。1989年两国贸易额为196亿美元,为历史最高水平。然而,中日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3%,而日中贸易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仅为4%,两国贸易存在着日本出超、贸易不平衡问题。

中日贸易于1956年超过1亿美元,1966年超过5亿美元,1972年超过10亿美元,1978年超过50亿美元,1981年超过100亿美元,1985年达到186亿美元,1988年达到193亿美元(以上按日本通关统计),1989年则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的196亿美元,

1990年下降为165.8亿美元,1993年为390亿美元。

70年代,除1976年因特殊情况出现下降之外,中日贸易总额每年都以两位数高速发展。每年均为日方对中方的出超,10年合计超出额为46亿美元。进入80年代前半期,因中国调整国民经济,压缩基本建设,控制进口,贸易额一度下降。

1981年至1983年,暂时出现日方入超,三年合计入超额为22亿美元。但是1984年再次转为日方出超12亿美元,1985年则近达6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中国对日本出口总额。由于双方的努力,以及中国扩大出口的措施,1986年、1987年开始缓解,1988年转为日方入超3.7亿美元。1990年,中日贸易出现缩小中的不平衡状况,两国贸易额比1989年减少13.9%,中国对日出口89.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5%,中国从日本进口75.9亿美元,比上年减少27.9%,中国顺差14.1亿美元(日方统计为日本逆差59.2亿美元)。

从中国对外经贸部的业务统计来看,1972~1987年的15年间,中方逆差占14年,累计为215.7亿美元。

多年来曾经是中日关系中一个突出问题的中日贸易不平衡问题--中国方面严重逆差的局面,近两年来有所改善,总的来说正在趋向平衡,期待在贸易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实现积极的平衡。

造成中日贸易长期不平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进出口商品结构来看,中国对日出口商品以初级产品为主,附加价值低。70年代对日出口额的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来自石油价格的上涨,在初级产品国际价格疲软、原油供过于求而暴跌时,中国出口额就受到影响。日本对中国出口的商品则以工业制成品为主,附加价值高,国际竞争力强。显然,这种贸易结构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垂直分工类型的关系,阻碍着中日贸易的进一步扩大。

日本方面仍存在部分贸易壁垒,阻碍着中国商品进入日本市场。日本以卫生检疫、标准等问题为理由,对中国的偶蹄类食肉(活猪等)及水果等动植物商品,长期以来不允许进口,没有给中国商品与对其他国家、地区的商品同等条件对待。

正如许多经济学家、学者所指出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不能采取消极其衡的办法去解决,应该通过积极其衡的方法去解决,在扩大贸易中求得基本平衡。

1990年9月至1991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研究人员对上海、大连、青岛、北京等地的对外经贸委员会及近20家中日合资企业进行深入调查,然后指出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一)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首先,某些合资企业经营者有短期行为。据调查,中日合资企业无论中方经理还是日方经理都变动频繁。中方经理一般四年一换,而日方经理则两年一换。中方经理认为,日方来的人员都是临时观点,第一年努力,但是需有一个熟悉过程;第二年"保"摊子,只求不出事,干劲不足。频繁的人事变动使得企业更多地以获取近期利润为目标,缺乏长远观点。

其次,日方人员的合作态度与协调能力也有问题。中日双方能否真诚合作是合资企业能否办好的关键之一。由于双方管理人员来自不同国度,经历过不同的社会制度,习惯、观念、考虑问题方法不同,加上双方所代表的投资方利益不同,难免出现分歧,尤其是在一些重大问题,如实物投资的估价问题、出口价格问题、职工的解雇等问题上,出现分歧难免,处理好关系

的关键在于真诚合作。

在这一问题上，被调查的企业中有不少企业对日方的合作诚意是给以肯定性评价的，但是也有企业认为日方只想赚钱，不考虑中方利益。这种反映在委托加工型企业比较突出。

第三，外汇平衡问题。由于中国外汇不足，政府对合资企业提出了外汇平衡要求。调查表明，一般说来，轻纺工业、资源加工型工业的合资企业外汇平衡没有问题，但是在被调查的9家机电行业的合资企业中，竟有1/3的企业外汇平衡存在困难。就日方原因而言，主要在于日方合资目的是扩大中国的国内市场而不是建立水平分工型国际分工企业。另一个原因是日方在为合资企业产品开拓国外市场及市场多元化方面不够努力。

目前一些合资企业解决外汇平衡问题采取的措施，一是产品作为替代进口产品向国内销售时以美元计价；二是生产其它产品出口（例如，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公司生产工作服向日本松下出口等）。但是这些不是根本性措施，为了解决外汇平衡问题，中方经理们希望日方对上述不足之处加以改进。

第四，销售价格和渠道问题。合资企业从销售途径看可分为出口型企业和进口替代型企业，前者产品以出口为主，后者则主要面向国内。据调查，出口型企业由于销售主要由日方负责，存在以下一些问题：有的企业出口价格完全受日方控制，中方无权。而且有的企业规定，出口价格为一次签约后相对固定，使得国内原料价格上涨，引进的生产成本上升，无法转到出口价格上，影响企业的利润，但因出口渠道为日方垄断，令中方感到为难。

第五，资金方面的问题。资金不足在小企业反映非常突出，这一问题涉及到日方的是日方管理员工资待遇过高，使小企业负担过重的问题。据调查，大中型合资企业日方管理员工资一般按日本国内相应的待遇，小企业这么做负担过重，难以发展，日方经理每月若发60万日元工资，比一个50人左右的小企业全部中方职工工资总额还高，这对企业是一个相当大的负担。

第六，重复投资问题。在调查中，有的企业反映，日方利用中国体制上的不完善，在中国国内重复投资，在中国国内搞竞争。这种做法使得一些合资企业产品滞销，尤其是中国出现市场疲软条件下，同一产品重复投资加剧了产品销售的困难，引起中方不满。

第七，其它问题，诸如“零利润”企业的逃税问题（独资企业）；变相劳务输出企业的逃税问题（软件公司）等。

（二）劳资关系方面的问题调查表明，总的说来，中日合资企业劳资关系方面问题不大，但也存在着工人辞职的情况，有的企业大批工人辞职导致人员不足成为主要问题，其原因主要是：首先，合资企业劳动强度远比国有企业高，而工资并不比国有企业高太多。据调查，合资企业的劳动强度大大高于国有企业。工人劳动定额高，纪律要求严，对产品质量要求亦很严格，但是，相比之下，工资虽比国有企业高，但并不高很多，这是个别合资企业工人大量辞职的重要原因。这种矛盾还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即企业职工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其次，住房问题。在我国低工资制度下，住房由企业分配已成为必要的福利。合资企业中的大中企业及老企业改造的“一厂两制”企业这方面的问题不大（一般采取把工资的一部分作为住房基金用于买房以解决工人住房问题）。但是，合资企业中的小企业这方面困难大，工人对这一问题有意见。

也有因住房问题而辞职或不愿去合资企业的。有的独资企业明确规定，企业不解决住房，但是提供给工人的工资与合资企业差不多，并不足以解决个人购房问题，因此，工人缺乏长期工作的思想，往往一结婚即离开企业。调查中发现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是，一些独资甚至合资企业大批招收的是农民工。

第三，其他方面的原因，诸如各种有关劳动条件方面的原因（离大城市远近、交通状况、孩子上学条件等）；人事关系上的原因（被调查的企业中，有的企业工人辞职是由于与日方管理人员间关系紧张）。

据笔者本人了解，日本企业认为，在对华投资及在华合办企业方面，中方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需要解决：（一）在谈判、合同审批阶段存在的问题首先，日方在立项过程中感到最不满意的是中方提供的信息、资料不够详细，不利于日本企业进行可行性研究及投资决策。

日本企业采取由下而上的决策方式，在中国合办企业之前首先要由下属就事业开展的可行性进行调查，并就今后的前景提出详细的资料，然后将这些讨论是否应该投资的材料提交给上一级。公司的课长、部长等根据项目负责人提供的资料进行协商、裁决，最后交由董事会决定。这就是所谓的“禀议制度”。这种决策方式对企业来说保险系数高，但费时较长，所以有时中方会觉得日方决策迟缓，过于慎重。而日方则认为中方提供的可行性研究的资料不全，某些基本资料和数据也没有。例如，日本企业想了解有关地区的投资环境方面的信息，但中方提供的材料中宣传性内容多，而与企业投资决策相关的可用性材料少。另外，在当地采购原材料的价格体系也不合理，有许多不确定因素，有关方面的资料也难以得到。与沿海相比，日本企业对中国内地的了解更少。

所以不少企业是在这些情况不明的情形下被迫下决断的，所以往往是投石问路，先试验性地进行少量投资或从办中小企业开始，以减少企业风险。因此，日方希望中方向日本企业提供他们最关心的信息，其中包括当地劳动力成本、地价、供水供电情况及水电费、土地使用期、内销比重、基础设施等，并最好能通过国际或国内的横向比较，反映本地区投资环境的特色、优越性及发展潜力。各地可建立一些内行的企业信息咨询机构，提高信息服务水平。

其次，在与中方谈判过程中，日方感到还有以下问题：中国行政部门对法律有较大的解释权，有时说法不一，办事不依法，而是讲关系、靠“路子”，审批程序缺乏透明度；谈判对象常有变化，而每变一次都得从头开始重新谈判，导致谈判时间拖长，经费增大，而且夜长梦多，难得谈妥的项目还可能因中方政策突变而作废。日方希中方进一步完善法规，严格依法办事，增加有关政策与审批过程的透明度。

（二）在实施立项、开工阶段存在的问题首先，日方感到中方在以实物出资的情况下，往往是根据外资投入的资金、设备的评价额来确定中方土地及建筑的价额，中方有时倾向于将外资设备、技术专利低估，而对中方实物出资高估，以此作为谈判保持有利地位的手段。

日方希望了解中方资产品估的依据，方法及其估的公平性，对土地估价也要有比较客观的标准和公开的地价制度，不应将完善基础设施的费用也以“土地开发费”为名摊派在日本企业头上。

其次，上马企业筹措资金困难。每当中国加强金融管理和宏观调控，

中国旗业便出现资金短缺或筹资困难，结果不得不让日方合作对象承担筹资的责任。

第三，原材料、零部件的质量及标准化跟不上。原材料中有杂质，经常出现低质原料混入现象。中国要求提高国产化比率，但国内零部件质量不过关反而容易降低出口创汇的竞争力。

第四，基础设施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停电及电压不稳，严重影响生产。除了硬件以外，最重要的是人才。中国应尽量普及高中教育，提高职工素质，重视培养既懂外语又懂专业的合资企业管理人才。日本企业重视人员吃苦耐劳与相对稳定。目前，日本企业对中国农村地带的就业职工反映较好，而对上海等大城市的职工反映较差。这主要是因为城市职工经常受到各种机遇的诱惑，时而“跳槽”，城市职工有主见，不易管理。

第五，中国通货膨胀导致企业工资成本上扬。合资企业现场工人月工资相当于同类地区、同行业、同工程的中国国有企业的120-150%，外加住房补贴、交通费、社会保险等，劳动力成本比起其他发展中国家并不便宜多少。中方在合资企业的干部要求与外方企业干部同工同酬，这方面需制定与双方国内工资水平相适宜的工资体系。

第六，政府对合资企业的干预及影响。靠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合资企业，容易受到中国政府外汇管理的影响。有时造成难以按原计划采购零部件而打乱生产计划的情况。中方企业有时还以政府的要求或指示为由，在签订合同后又要求重新制定出口比率、工资、土地使用费及人事安排等。希望能根据国际惯例及法规处理类似问题。

第七，中国对合资企业要求实现外汇平衡，但刚起步的企业难以拥有大量出口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产品。所以在此之前，希望采取一定措施，优先给予合资企业必要的外汇配额。

第八，中国投资环境具有很大的多变性。中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投资制度和税制等经常变动。另外，中国各地虽已建立起外汇调剂中心，在外资企业之间可进行外汇调剂，但有时买卖双方的调剂并不顺利。一旦出现供求失衡，又可能出现外汇黑市交易。

上述日本企业的看法并不一定完全准确，但仍应引起我们的重视。从日本来华投资的各种因素看，今后只要中国通货膨胀率低于日元升值率，只要中国政治社会稳定，日资投入中国的形势就将继续看好。

五、日对华技术转让方面的问题

——多年来日本对华存在技术转让保守问题，引进技术过时，国产化难，而高科技投资很少，投资的技术又不愿承担有关责任。

在中日经贸关系向纵深发展的90年代，技术转让领域也取得了新的进展，但中日双方从各自不同立场出发均认为存在不少需要解决的问题。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研究人员1991年对中国各地经贸委及20几家合资企业的抽样调查，中方认为日方在技术转让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首先，高技术领域的投资少是普遍反映。在这方面，日

本不及美国、德国。这是对上海、北京、青岛、天津等地经贸委调查总的印象。

其次，据调查有 1 / 3 的企业认为引进的是先进技术，但也有 2 / 3 的企业认为引进的只是一般技术（包括部分高技术或诀窍），对日本提供不先进的技术不满的现象确实存在。

例如，有一合资企业以人民币几十万元购买了日方 2 0 0 多种技术，该合资企业成立不到 5 年，只用了其中一半的技术，其余的就已过时，又需要重新购买。

第三，日本企业技术转让保守。在对中日合资企业调查关于引进技术的困难问题时，有 2 6 . 7 % 的企业认为是日方保守，有 2 6 . 7 % 的企业认为是企业外部环境不配套，6 . 7 % 的企业认为是因外汇困难。关于日方保守问题，表现在：日方技术人员对中国工人讲授技术时，只讲操作，不讲性能；中方技术人员派往日本进修，往往从基本原理讲起，不讲诀窍。

第四，日本技术国产化难的问题。调查表明，日本技术国产化方面的情况不大理想。被调查的 1 1 家机电、化工企业中，日本技术完全国产化的只占 9 . 1 %，而且是引进一般技术。有 9 . 1 % 的企业完全没有国产化，4 5 . 5 % 的企业部分国产化。关于日本技术国产化困难的原因，1 / 3 的企业认为是原材料不配套，1 / 3 企业认为是由于技术管理水平差距，1 / 3 企业认为上述两种原因兼而有之。因此，提高原材料，零部件配套和技术管理水平，是促使原材料国产化最重要的课题。

第五，日本企业在技术转让上不愿意承担侵权责任问题。

这是与日本企业合资或合作中技术引进项目谈判中一大难题。

日本学者横田高明指出，在技术转让方面，中方存在的问题是：首先，中方对日方技术评价偏低。尤其是日本最拿手的操作诀窍难以得到评价。中方对未登记注册的技术往往缺乏理解。中方重视硬件而总想不花钱或少花钱购买软件。在技术转让时一些无形的贡献也被忽视。例如在教会中方操作之前，日方举办的授课、训练等，大多也是由日方负担经费。欧美则不是这样，只要成套设备运转指导期合同届满，欧美企业就不再负责。

其次，传授给中方的技术得不到广泛传播。赴日技术研修生有不少人专业根本不对口或缺乏有关方面的专业知识，令人怀疑他们究竟是不是来学技术的。研修回国的人又往往将学到的技术把住不放，不愿向别人传授。

第三，中方技术引进项目的计划不明确，使有关谈判难以顺利进行。合同谈判的当事人涉及进出口公司、用户、审批机关等诸多方面，联系不畅也容易造成混乱。经常出现参加谈判的中方干部不了解现场实际，使谈判很难谈得拢。

第四，中方有时往往引进一些脱离国情的先进技术，结果消化不了。电力、用水、原材料供给不稳定是瓶颈，造成不少进口设备闲置。中方片面追求最尖端的先进技术的倾向，将导致国内技术体系的"两极分化"现象，引进的先进技术与一般技术中间不衔接配套。一些脱离本国实际的高技术设备的引进，只能造成中间产品及原材料对国外的进口依赖。另外，在中国还常见到一些拥有世界一流机械设备的工厂，是在与其很不相称的运转技术和工程管理下运行的。因此，中方应根据本国国情搞技术引进，通过对原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提高生产率，在今后钢铁厂立项时也要接受宝钢的教训，根据本国资源、燃料情况，选择效率最高的高炉。

第五，中国法规方面有关规定不利于促进技术转让。例如，国务院关于技术引进管理条例第六条等规定，技术提供者必须保证引进技术发挥效益达到最初的引进目的。但能否达到原定技术目标，还将受到引进一方的能力、原材料、基础设施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所以应在双方合同中明确一条：在何种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保证到何种程度。否则，无条件地过分强调技术保证，将使提供一方裹足不前。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公布的有关实施细则规定，由于引进技术而产生对第三者的侵权纠纷，由提供技术一方负责处理，在国际上，技术提供者很难事先完全调查清楚是否与第三者利益相抵触，所以一般不要求做此项保证。日本过去从欧美引进技术时也未做此规定，旨在促进国外技术转让。

第十三章加快政治大国化步伐

进入90年代以来，日本在国际局势急剧变化的情况下，认为形势对自己有利，民族优越感及民族主义、大国主义意识急剧增长，加快了政治大国化的步伐，甚至急不可待地谋取政治大国地位，但由于基本态度问题未解决，过于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结果引致人们的反感，欲速则不达，成效不太明显。

一、竭力争当政治大国日本政界经过70年代以来的酝酿讨论，日本统治集团确定把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过渡，作为日本走向21世纪的国家目标，80年代初正式将其提出，冷战后更加速了争当政治大国的步伐。其作法如下：A 以金钱铺路，换取政治大国地位如今的日本人财大平粗，已经成为经济大国，国际地位有所提高。

二次大战后，日本把发展经济作为头等重要任务，经济发展很快，1955年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1967年赶上英、法，1969年超过西德，现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经济强国”，1994年日本实行国内生产总值（GDP）按美元计算的日本GDP达4020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4%以上，人均GDP为33764美元，居世界第一位。出现了“日元升值带动型”高速增长。1994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为0.6%，而日本的GDP则高达4.2万亿美元，相当于1985年美国的水平，人均GDP约达3.4万美元，堪称世界首富。

日本已成为国际上经常收支盈余最大的国家。由于贸易出超不断大量增加，其经常收支已由1985年的550亿美元猛增至1986年的860亿美元，约占GNP的4.4%，大大超过了1947年美国制订欧洲马歇尔计划时期的3.8%水平。

日本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之一。直接投资到2000年增至3000亿美元，即为1984年美国直接投资的1.3倍。

日本已成为最大的债权国。1985年日本的对外纯资产为1298亿美元，1987年末达到2898亿美元，估计1990年可能达到4473亿美元，而美国已于1985年沦为债务国。

著名日本问题专家吴学文认为这些数据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

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绝对优势已消失，而日本则以出人意料的速度追赶上来。其结果，日、美在GNP上的差距也有明显的变化。1950年，日本的GNP仅为美国的3.8%，到了1970年，日本的GNP已为美国的20%，1980年追到了39.5%，1985年则追到50%。如果以人均GNP计算，1986年已超过美国。

据大藏省统计，1994年度日本对世界出口3965亿美元，进口2515亿美元，贸易盈余达1450亿美元。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估计，90年代日本出口年均增长率为6.7%，进口增长率为8.7%。这样到2000年日本对外贸易总额将达10628亿美元，出口5557亿美元，进口5071亿美元。日本在世界贸易进出口中所占比重将分别为7.9%和8.3%。

日本对外资本输出包括政府和民间对国外的借贷和投资。1989年，日本便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政府对外开发援助国”。政府开发援助（ODA）主要是发达国家政府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低息贷款、无偿援助及技术合作等。联合国大会曾在1970年和1980年通过决议，要求发达国家将ODA占本国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重提高到0.7%以上。日本接受了这一要求，但到1991年仅达到0.32%。当年日本向世界提供的ODA为110亿美元，其中80%以上是双边援助，并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日本若有诚意在2000年实现联合国所提出的目标，其每年向世界提供的ODA总额将达470亿美元以上。

日本在发达国家中对外直接投资增速最快。1994年度日本对外直接投资410.5亿美元，北美占42%、亚洲占24%、欧洲占15%。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预测，90年代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为13%，2000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将达8023亿美元，仅次于美国的8869亿美元，居世界第二，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的17.8%。2000年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将达1534亿美元，其中18%投向亚洲，25%投向欧洲，46%投向北美。在投资结构上，不动产及商业将有所发展，分别占日本海外投资的23.4%和16.3%，制造业中最多的还是电器和汽车业，分别占9.3%和3.8%。日本对海外证券投资数量更大，1993年累计已达6960亿美元。

从以上日本对外债权中减去国外对日本的贷款及投资等负债便是日本的净资产。1993年日本净资产额达6108亿美元，比上年增加18.4%，比1989年翻了一番，创有史以来最高记录。其中民间净资产为4488亿美元，政府净资产为1620亿美元。日本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而美国则成为世界头号债务大国，1993年美国净债务为5077亿美元。随着日本对外资本借贷和投资的增加，其债权大国地位将更加巩固。按过去5年的速度发展，2000年日本的海外净资产将达1万亿美元以上。伴随着日本金融实力地位的提高和日元不断升值，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将受到冲击，日元有可能成为未来新体系的一大支柱。

再从金融实力看，不要等到本世纪末，现在日本已经超过美国。日、美银行在全世界的地位，有显著变化。按银行存款额大小排列，在全世界头500家商业和储蓄银行中，1985年美国有110家，日本比美国少14家。1986年美国减少了8家，日本却增加了12家，达108家，比美国多6家，占500家的1/5强。在头25家银行中，1966年美国

有10家，1986年只剩下花旗银行一家，居第17位，而美洲银行则从长期占居的第一位降至第29位。与此相反，日本则从1966年的4家猛增至1986年的16家，占头25家总数的2/5。在头10家银行中，1985年美国还有一家花旗银行，居第8位，前7名都是日本银行。到了1986年，美国的银行已经全部被挤出10名以外，日本继续保持前7名的地位。另外3家中，有2家法国银行和1家西德银行。

再按银行的资产额大小排列，在全世界500家商业和储蓄银行中，1985年美国有114家，日本有93家。1986年美国增加了1家，日本增加了5家，达98家，但仍比美国少17家，占500家总数的1/5。在头25家中，1985年美国还有3家，到1986年只剩下花旗银行，日本则从1985年的13家增至1986年的16家，占头25家总数的2/3弱。在头10家银行中，1985年和1986年美国只有花旗银行一家，而且名次已从第5位降至第9位，而日本在1985年已有6家，1986年又增至7家，并且占据了前7名。另外两家是法国银行。

日、美银行的实力相差悬殊。按银行存款额，在全世界头500家银行的存款总额中，1985年日本占31%，为21786亿美元；美国的存款占14.4%，为10139亿美元，还不及日本的一半。1986年日本的银行存款总额比1985年增加53.8%，达33499亿美元，其所占比重升至36.3%，超过了500家银行存款总额的1/3；美国的银行存款总额仅比1985年增加3.6%，为10512亿美元，占11.4%，还不及日本银行所占比重的1/3。

再从银行的资产总额看，在全世界头500家银行的资产总额中，1985年日本占29.7%，为25800亿美元；美国占16.1%，为13902亿美元。1986年日本的银行资产总额比1985年增加53.1%，达39500亿美元，所占比重升至34.5%，也超过了1/3；美国的银行资产总额仅比1985年增加8.6%，为15091亿美元，占13.3%，为日本的银行所占比重的1/3强。

以上情况说明，日本在金融领域赶超美国的速度，大大快于其他经济领域，而且是在近两年内决定胜负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利用美国出现巨额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的弱点和日元大幅度升值的强点，对美国的金融市场展开强大攻势。1986年，日本购买外国债券达670亿美元，其中600亿是购买美国债券，致使美国财政赤字的1/3靠日本资金来弥补。这就预示一种可能：在国际经济这个战场上，如果过去日本是以汽车、彩色电视机、半导体等商品为武器战胜了欧美等国的话，今后它将以金融为武器来取得新的战果。也可以说，过去日本是靠“硬件”进攻取胜，今后它将以“软件”进攻或软、硬兼施地进攻取胜。

日本在国际经济社会的地位将升至更高的层次，使迄今惯于摆布人的美国，逐渐在一些领域受到日本的摆布。

日本以其雄厚的实力为基础，以金钱铺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百般拉拢，表示友好，但却被指责为只搞“石油外交”，讥讽为经济动物。

二、争当亚洲代表

日本认为亚洲的稳定对日本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中曾根任首相时反复宣称：“欲登世界舞台，需以亚洲为选区”，因此积极与中国、韩国、东南亚国家发展经济关系。

日本和中国1972年邦交正常化后，经济贸易关系不断发展，把日中关系当作日本外交的一大支柱，1993年中日贸易达390亿美元，比1972年增加了36倍，中国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对象国；截至1992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1595项，共45亿美元。

日本与韩国1965年签订了《日韩基本条约》，缔结了关于渔业、请求权和经济合作等协定，从1965年至1992年日本对韩国直接投资1923项，共46亿美元。日本很想与韩国建立面向未来的关系，甩掉包袱，不让韩国拉后腿，但由于日本首相和阁僚在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和殖民统治表示“反省”和“道歉”问题上频频“失言”，日本与韩国的关系也不太和睦。

日本视东南亚为发展经济之生命线，向东盟国家提供大批援助，占日本对亚洲投资的70%。冷战结束后，日本改变了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谨慎态度，极力推动建立亚太安全机制，以增大日本在亚太安全机制问题上的发言权，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经济圈，日本首相桥本指出：“与各国发展双边友好关系是外交的基本点。我国虽把日美关系视为基轴，但要以在地理和经济上关系密切的亚太地区各国为核心，不把文明和文化上的差异看作障碍，开展心心相印的外交，以求实现共存。”关于朝鲜半岛政策，桥本主张：“继续把发展同韩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作为基本点。关于日朝关系，基于有利于实现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观点，在与韩国等国保持密切联系的情况下加以发展。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朝鲜）研制核武器问题，今后要与以美国和韩国为首的各国一起对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提供积极合作，以便切实实施美朝框架协议。”桥本内阁一方面支持美韩提出的朝鲜半岛双方加中美的“四方会谈”，同时也在争取重开日朝关系正常化谈判。

桥本认为，亚太地区无论对日本，还是对世界经济，其重要性都在逐年增加，日本将进一步加强与该地区的合作关系。1995年11月，日本主办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大阪会议，通过了旨在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推进经济和技术合作的“行动议程”，亚太经合组织正在从“设想”阶段向着“行动”阶段转变。对亚太合作来说，1996年是经受考验的重要的一年。日本将制定一个增强这种合作凝聚力、内容充实的“行动计划”，为该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发挥更大作用。关于马来西亚提出的“东亚经济核心会议”（EAEC）的倡议，桥本主张最好能包括澳大利亚在内，否则日本很难公开支持。在安全保障方面，桥本表示：日本“将积极参与东盟地区论坛（ARE）举行的各种政治和安全保障对话，为增进地区内的信任作出贡献”。

日本不仅要同亚太地区各国，而且应该同世界各个地区的国家积极发展合作关系。桥本特别强调：“欧洲因欧盟的扩大和深化增强了一体性，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日益提高，维持和发展同欧洲之间广泛的合作关系也是一个重要课题。”在1996年6月27日里昂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桥本首相提出通过国际机构的行政改革，促进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回流，主张在日本举行有关环境问题的国际会议，增加对非洲的援助。

但却引起东南亚人民的不安，对日本仍存在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成

为日本在亚洲发挥领导作用的重大障碍，使日本很难充当亚洲代表。

三、扩充军备、修改法律向海外派兵

海湾战争的爆发，为日本当局向海外派兵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1990年4月，美国总统布什向海部首相提出，希望日本派遣扫雷艇参加多国部队的行动。1991年4月24日，日本政府绕开国会，以政令形式决定向海湾派遣扫雷艇，协助多国部队作业。这虽然不是参加战争，但实际上是日本战后第一次向海外派兵。

日本于1992年6月5日和15日分别在众参两院强行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案"（简称PKO法案）。根据这项法案日本自卫队可以以自卫队员的身分，携带武器装备以部队的形式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而且在人身生命受到威胁时可以用武器进行自卫。日本共产党等认为，PKO法案与日本宪法第九条存在着根本矛盾和严重对立。可以说，PKO法案是对日本宪法第九条的实质性修改。

在日本，对待现行日本宪法的态度，大体可以划分两个大阵营，即主张护宪的鸽派和主张修宪的鹰派。日本舆论认为，桥本在内心深处属于后者，但又表现得不十分激进。

现在，日本在人员方面作"国际贡献"的内容是：派自卫队出国，甚至要带必要的武器，与联合国多国部队一起参与解决地区纠纷。目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持有武器的自卫队被派往海外，是否被认做是武装集团的行动，这是否属于日本宪法所禁止的。

"PKO法案"1992年8月10日生效，日本迫不及待地于同年9月23日向柬埔寨首次派出自卫队。日本自卫队在柬期间完成了修路、架桥等任务，于1993年4月10日撤出回国。

同年5月11日，日本又向莫桑比克派出一个运输中队的"国际和平合作队"。以此为开端，日本自卫队今后将不断介入联合国的维持和平活动。日本《防卫白皮书》1993年版第三章专以《国际贡献与自卫队》为题宣称：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是日本的"国际责任"。这标志着日本战后以来的防卫政策框架已被扩大了。日本将越来越大胆地在国际军事领域充当参与者。

四、急于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日本早就盯上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认为那是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重要标志。

日本于80年代初正式提出了成为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并逐步具体化为争取成为西方世界平等的一员、亚洲的领导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毫无疑问，这是雄心勃勃的战略目标。但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步履却十分艰难。

日本于60年末成为经济实力超过英国、法国、德国而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经济强国，于80年代中期又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日本也是科技强国。在国际关系趋于缓和、经济和科技因素的作用与影响日益突出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日本是有实力成为政治大国并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的。

为了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日本于80年代初期以来外交活动都围绕它进行，日本以经济实力为后盾，打破了战后长期的沉寂，积极地创造各种条件，特别积极插手世界热点问题。在阿富汗问题上，参与对苏联的制裁；在两伊战争问题、巴勒斯坦问题、南北朝鲜问题中，积极充当调解人；民主柬埔寨政府成立后，立即宣布承认，并帮助其实现自由选举，为联合国驻柬机构提供经费，支援和参与柬埔寨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在海湾危机中，积极支持海湾战争，为多国部队提供经费130亿美元，战后又派出海上自卫队和扫雷舰艇参与海湾地区的排雷活动。与此同时日本还积极主张建立世界新秩序。尤其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积极推动建立冷战后的世界新秩序，并表示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此，积极发展全方位的外交。80年代以来，日本领导人出访次数明显增多，仅海部首相就出国10多次，先后访问了30多个国家。

五、桥本龙太郎标榜自立外交

这种所谓"自立"外交并不意味着日本要摆脱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走中国式的独立自主外交道路。其实质是要在维持日美同盟关系的基础上，使日本在全球拥有更大发言权，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过程中，使日本成为政治大国。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一些人不仅主张应对美国采取相对独立的外交立场，而且对中国也应采取更加强调本国意志、增大本国影响、贯彻本国意图的外交。

桥本指出，如今日本不应像过去那样，只是以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为前提而采取行动，而应该比以往所作的国际贡献更进一步，确立一种国际社会能够接受的理念，成为世界稳定与发展发挥主导作用的国家，他确信，这是在国际上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加强的形势下，为确保日本的安全与繁荣所选择的最佳道路。

在全球问题上，日本首先要努力推进联合国改革。1996年是日本加入联合国40周年。日本将同联合国其他成员国合作，继续作出努力，以便使联合国在财政改革以及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和安理会改革等方面尽可能地取得具体成果。

关于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问题，桥本强调，日本“将根据联合国改革的进展情况以及亚洲邻近国家等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国民的进一步理解加以对待”。

其次，日本还要为解决地区争端而努力，桥本认为，“地区争端是对冷

战结束后世界和平构成的一种威胁。地区争端不仅是该地区的问题，也是影响到确立整个国际社会框架结构的一种全球性问题。为了预防和解决这种争端，我国正在作出外交努力，并且提供人道和复兴援助，与此同时，还在人力和财政方面对联合国诸如维护和平行动等活动作出积极的贡献。"在前南斯拉夫争端问题上，为了使一揽子和平协议取得的巨大进展能够导致实现永久和平，日本继续参与国际社会为和平与复兴所作的努力。在中东和平问题上，1995年拉宾总理遇刺，给日本造成了巨大冲击。日本为了协助巴勒斯坦民主权利机构选举，派员参加了国际监督团，并提供了物资。1996年2月日本还派遣自卫队部队参加部署于戈兰高地的联合国脱离武力接触监督部队。

日本还积极致力于裁军和核武器不扩散。桥本强调：“我国作为唯一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为最终销毁核武器，向一切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呼吁要认真地全力对待裁减核军备”。

199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日本提出的裁减核军备决议和停止核试验决议。桥本执政后强烈要求停止核试验，并敦促《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能在1996年秋签署，年内生效。

尽管日本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但日本距离政治大国的目标还很远，而且阻力很大，特别是对于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的增大，世界各国的反映始终比较冷淡和谨慎，赞同者不算多，抱有戒心者却不少。尤其是对于日本在军事方面的作用和影响的增大，世界各国格外关注。日本国会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日本军事力量参与海湾排雷活动和加入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在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国家中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的表示保留，有的表示不悦。

新加坡总理吴作栋1991年5月在欢迎海部首相的宴会上告诫说：“有的国家对日本如何行使力量感到担忧”。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也指出，许多亚洲国家都不愿意看到日本向海外派兵。提醒日本，从朝鲜半岛到东南亚，人们对日本在亚洲的意图私下感到不安。菲律宾外交部的一份文件则称日本派遣扫雷艇去海湾是为了炫耀军事实力。韩国总统卢泰愚1992年1日在同宫泽首相会谈时也指出：“综观亚洲各国的想法，我认为大家都希望日本在经济方面而不是在军事方面对国际社会的和平安定做出贡献。”（日本《实事解说》杂志1992年1月26日）中国总理李鹏也郑重地指出：日本自卫队去国外活动，这在中国尤其是一个敏感问题，希望日本方面更为慎重地处理这个问题。“对于日本谋求通过经济影响使自己成为亚洲的“领导国”或“代言人”的愿望，亚洲国家也并没有予以认可。虽然日本关于建立以日本为核心的“亚太经济合作”、“亚太经济共同体”、“环日本海经济圈”等的呼声甚高，日本又是亚洲的第一经济强国，但和者盖寡。至于日本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愿望，也没有赢来多少赞同的声音。英国、法国称联合国成立以来，其机构运转良好，目前尚无改变之必要，这无异于对日本的愿望公开表示反对。据日本《每日新闻》1990年11月对驻东京的108个国家大使进行的通信调查，赞成日本成为拥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只有4个国家。

日本为了跻身政治大国可以说是不遗余力的，该花钱的时候大把花钱，但却距目标十万八千里，其原因很值得深思。

六、企图遏制中国

日本右翼势力一直对中国包藏祸心，处心积虑地抵制中国的巨大影响，不断制造"中国威胁论"，实际上把矛头对准中国。

日本的"中国威胁论"始作俑者是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友秀，他在1990年5月号的日本《诸君》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大国，认为80年代后中国的国防战略开始发生大的变化，不顾事实说"中国正计划同美苏一样，建立一支专业化和机械化军队，进而推断中国要称霸：中国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战国时代的模式"，即有力量者将成为霸主和统治世界。因此，邓小平领导下的当今中国希望通过实现四个现代化重新登上世界政治大舞台，成为21世纪的世界大国。其国家领导人总是在努力创造可以成为霸主的条件，他们绝对不允许放弃作为霸主的条件。

村井友秀对地理政治学的理论推崇备至，他在分析日本和中国的地理环境和国力后得到一个结论：日本和中国都是东亚地区的大国，具有给邻国施加影响的能力，它们正在摆脱对美苏力量的依赖，转而进行面对面的接触并明确双方的上下位置关系，因此日本和中国若同时对第三者施加影响，就很可能发生冲突。中国对已在走向政治大国的日本是一个潜在的大威胁。

村井友秀的文章说出了日本右翼分子心里的话，纷纷吹捧他的文章，不惜歪曲事实，造谣污蔑，千方百计设法寻找"中国威胁论"的证据，有的甚至采取偷梁换柱的手法，制造证据、力图掀起鼓吹"中国威胁论"的狂潮。1992年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纪念日，日本各大报纸便纷纷发表文章，更为起劲地兜售"中国威胁论"。

事实胜于雄辩，村井友秀之流自己也觉无趣，逐渐消声匿迹。1996年初又有人就此大做文章，声嘶力竭地叫嚷、宣传"中国威胁论"，引起一些日中友好人士的关注，他们纷纷在日本报刊上发表文章，批驳这一谬论。

现任日中经济贸易中心会长和国际石油公司社长的木村一三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的办公室内挂满了他与中国领导人的合影，最突出的是身患重病的周恩来总理在医院与他握手的照片。木村先生不顾年近80高龄和繁忙事务，连续向日本有影响的杂志《财界》投稿，批驳"中国威胁论"的谬论，畅谈发展中日友好之重要，最近他又约中国驻日记者陈志江座谈。

对于日本的"中国威胁论"产生的背景，木村认为这是因为日本一味追随美国对华政策的结果。苏联解体后，世界上只剩下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中国改革开放十数年内经济一直高速增长，还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中国的经济实力有可能追上或超过日本、美国。因此引起一些人对中国的恐惧，千方百计想抑制中国发展，日美两国重新审定日美安保条约和散布“中国威胁论”其原因盖出于此。

木村先生指出，世界进入了和平与竞争共存的新时代，人类社会从军事竞争转变为经济竞争。苏联已经解体，美国也从超级大国向普通大国过渡，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大转换时期，整个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虽然不安定因素和局部战争依然存在，但世界发展的主流是和平。正

如一位美国军事专家所说，中国在遥远的将来也不会对美构成威胁，同样也不会对日本和周围诸国构成威胁。日美应积极扩大同中国的对话，这样就能避免对立。中国真心希望同美日友好，以保证中国全力以赴地进行经济建设，维护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美国一直没有稳定、连续的对华和亚洲政策。美国1992年提出一个重视经济的新太平洋共同体构想，一年后又进行了政策大调整，改重视经济为重视安全保障。中美建交时，美国作出了只承认一个中国，不接受台湾要人访美的承诺，但去年美国却违背诺言，接受李登辉访美。今年，美日签定联合声明，把以苏联为假想敌的防卫型日美安保体制转向对付威胁型的地区安全保障型体制。日美联合行动范围也从维护日美安全扩大到整个亚太地区。这一切当然要引起中国的警惕与反对。

木村批评日本不应一味追随美国对华政策，美国自己也正在不断地积极修补对华关系。

日本应作为美中粘接剂，起促进政治对话的桥梁作用。日本历史上给中、韩等亚洲国家造成的战争创伤还没有完全愈合，因此日本发挥上述作用，从起码的道德角度讲也是非常重要的。

木村先生对中美关系前景表示乐观，认为21世纪中美将迎来相互竞争、共生共存的从未有过的亲密时代。现在中美之间虽不断出现矛盾，但每到关键时刻，双方都必然作出妥协和让步，因为中美都知道，只有相互妥协才对双方有利。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很强的互补性，相互的合作强度也很大。中国经济越发展，这种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另外，美国在日本侵略中国时还从物质和道义上支援过中国，这些都给中国人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目前仅中国在美国的公费留学生就多达4.5万人，为在日留学生的两倍。日本如果看不到这一点，盲目地跟在美国的对华政策后面，到头来吃亏的只能是日本自己。

木村先生严厉批评了日本的防卫政策。日本在不为日本国民觉察的情况下发展为世界军事大国。正当美、法等国因冷战结束而大幅度削减军费的时候，日本非但没有在裁军问题上提出任何具体目标，反而不经国会审议，把防卫作为神圣领域而增加军费，提出了“防卫新时代”扩军计划。照此发展，日本的前途和令人担忧。

木村先生说，日本因侵略过中国，对台湾有长达数十年殖民统治，所以日本在处理台湾和参拜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时一定要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他强调，中国人民对被列强侵略、欺辱的历史，一直怀有强烈的民族激愤。但从历史看，中国人历来就富有国际主义精神，从不排外。

木村先生说，他长期同中国人打交道，得出一条经验，即一定要持有坦诚和谦虚的态度。他最崇拜高碕达之助先生和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总理的得力助手廖承志副委员长曾指点他，“中国人是一个民族自尊心很强的民族，要办好事情一定要注意这一点。”高碕达之助坦诚、谦虚，有卓越见识和宽大胸怀，所以他与周恩来总理成了亲密朋友。两人的友谊应成为今天日本政治家处理对华关系时学习的典范。

第十四章 日本右翼为何不认帐

无数事实证明，日本右翼是日本社会中能量极大的一股势力，人数虽不多，但却极其顽固。自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一直在日本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恶劣的作用，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在日本战后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中，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找到他们的影响。

一、何为日本右翼？——战后不久，随着美国占领日本后政策的变化，特别是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和政治大国等形势的发展，日本旧的右翼开始恢复，新的右翼也不断出现，并逐渐对日本政治生活产生着影响。……右翼这个政治名词，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公会（1792~1795）。当时，从主席台看去，坐在右翼席位的是保守派的吉伦特党，坐在中间席位的是中间派的平原党、沼泽党，坐在左翼席位的是急进派的山岳党。从此，凡属反对社会进步、反对共产党、反对民主自由的党派以及超国家主义的党派，均称之为右翼。为实现这些政治理念而进行的运动，统称之为右翼运动。

右翼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横行于许多国家，尤以德国的纳粹运动、意大利的法西斯运动和日本的右翼运动最为猖獗。

日本的右翼运动始于1879年的向阳社和1881年的玄洋社以及其后的黑龙会，它们以“大亚细亚主义”为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受到民主主义潮流的影响，社会运动日益盛行，右翼运动的重心便从对外转为对内，在“保存国粹”的名义下，展开了反劳工、反社会主义的运动。它们有浓厚的封建性，以天皇主义为中心，大搞恐怖活动，多次策划军事政变。

30年代，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扩张政策，右翼运动与军阀、财阀的结合日益紧密，其重心又从国内转向国外。在吞并朝鲜、“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以及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右翼都充当过军国主义的走卒或先锋。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可以明显地看到右翼运动的“业绩”。总的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日本右翼，在精神上和理念上是维护国体、天皇中心主义；在政治上和物质上是依靠军阀和财阀；在行动上虽然是分散的，但目标是集中的。

第二次大战结束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被战败，天皇制发生了动摇，军阀崩溃，财阀解体，日本右翼的精神支柱和物质支柱都为之撼动。在美军占领日本初期，大多数右翼头目被整肃，团体被解散。然而作为从几十年前开始的右翼运动，并未因日本战败而终结。实际上，在战后不久，旧的右翼开始恢复，新的右翼也不断出现。特别是随着美国占领日本政策的变化、旧金山单独媾和、岸信介上台、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和走向政治大国等形势的发展，日本右翼运动呈死灰复燃之势，并逐渐地对日本政治生活产生若干影响。

那么，日本右翼分子为什么那样顽固，对侵略战争的帐为什么拒绝承认呢？这其中有许多复杂的原因。

二、“皇国史观”根深蒂固

“皇国史观”使日本的右翼势力视侵略和扩张为天经地义的事情。普天之

下，莫非（天）皇土，普天之下，莫非（天）皇民；天皇是至高无上的君主，大和是至尊无上的民族何谓“皇国史观”？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的分析，日本右翼的侵略扩张思想由来已久，其对外侵略思想是从首代天皇开始，明治维新后加以贯彻和发展。该书称：“据日本历史学家说，传当时（按：指建国时）曾由初代天皇的神武天皇发布过一项‘诏敕’。在这个文件中，出现了两句古典的成语”，“第一句是所谓‘八纮一字’，它的意义是把全世界各地结合起来置于一人的统治之下”。“而这就是所谓‘帝国建国的理想’”，“行为第二原则，是所谓‘皇道’的原理”。

“这两项观念在明治维新后又与皇室相结合起来了。明治天皇在1871年发布的‘敕语’中就是宣述这些观念。当时这些观念被表现为国家组织的核心及对于日本国民爱国心的号召”。

还有《明治宪法》中明确规定：“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军部也可以不通过帝国议会直接上奏天皇决定事宜”，“内阁也只对天皇负责，不对帝国议会负责”，这也为军部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开了绿灯，该书还指出右翼及军阀就是“以这两项观念为理由而主张扩张领土”。1889年底，山县有朋任首相后，在其“外交政略论”中提出“主权线”与“利益线”的主张，并把“利益线”的焦点设在朝鲜。1931年，晋升为少将的田中义一在其“滞满所感”一文中说：“为国家生存，民族发展，实非经营大陆不可”，“首先当开发在我势力圈内的资源宝库满蒙”。接着，在1924年又有右翼头目大川周明在其著书中将田中侵略蓝图加以发挥，大川在书中称：“因为日本是大地上最初成立的国家，所以统治万国国民是日本的天命”，主张日本要“占领西伯利亚和南洋群岛”。大川的主张为日本陆军当局所响应。

其后，日本对外扩张基本上是按照田中义一和大川周明等所策划的路线进行的。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占了我东北三剩1937年7月7日全面进攻中国。1940年9月27日，日本同德意法西斯签订三国条约，规定日本承认尊重德意两国的领导地位，德意两国承认尊重日本在“大东亚新秩序”的领导地位，日本所谓的“大东亚新秩序”的范围是以日‘满华’”为骨干，包括东南亚诸国为第一目标，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为第二步目标，图谋获取东亚和澳洲的资源 and 统治整个东亚和澳洲。为达到大扩张的目的，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的珍珠港，从而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日军向东南亚、南亚、澳洲发起了全面进攻，占领了大平地区，直到1945年8月战败投降为止。

这就是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统治阶级奉为全民族纲领的是“皇国史观”。即：大和民族是由神选定的民族，都是天照大神的子孙；天皇是现实人间的神，是国家一切的中心；八纮一字是最高理想，以天皇的名义统一世界，是走向人类恒久和平的大道；日本民族所进行的战争，是为完成历史的使命而进行的圣战。

战后的日本右翼，继承了他们前辈的“皇国史观”，并在行动上维护这种史观。从1945年到1990年45年里，日本共发生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右翼事件150多起，虽然事件的原因千奇百怪，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要恢复皇统。谁不以天皇为中心或不奉为至尊无上，他们就攻击谁。“本岛事件”便是典型事例。

1988年，在昭和天皇病危时期，日本社会各阶层人士就天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争责任问题议论纷纷。1988年12月7日，在长期

市议会召开的例会上，共产党市议员柴田朴向本岛市长提出质询：在昭和20年2月，即日本投降的半年前，当时的首相近卫文麿为终止战争曾上奏天皇，“如果采纳了，就不会有冲绳之战、广岛和长期被原子弹轰炸。对于天皇的战争责任，不应含糊其词。作为被原子弹轰炸的城市的市长，你意见如何？”本岛市长当即回答：“战后经过了43年，关于为什么发生那场战争，已充分进行了反省”，“我曾在日本军队中干过，特别是从事过军队的教育工作，从这方面看，我认为天皇是有战争责任的。”本岛是在日本地方官僚中第一位明确言及天皇的战争责任的市长，受到了社会舆论的高度重视。日本各大报均在显著地位报道了本岛的这段讲话，但同时也受到了日本右翼的猛烈攻击。长期市议会中的保守派议员要求本岛撤回他的讲话；自民党长期县委员会解除了本岛的县委顾问职务，并扬言不再给本岛市长以合作；右翼团体则立即对本岛市长展开了进攻。一时，日本全国各地的右翼都向长期市集结，他们的高音喇叭宣传车，在市内横冲直撞，在市政府门前辱骂本岛市长是“国贼”，“应天诛地灭”，要求他“立即辞职”。他们给本岛寄去的恫吓信里装着手枪子弹，并向市政府的建筑物开枪。在国会里，自民党议员松田九郎对本岛市长大兴问罪之师。

但是，本岛市长未向这股右的势力低头。他拒绝撤回自己的讲话。1989年1月14日，本岛在法政和平大学的一次座谈会上以“天皇问题的思考”为题发表谈话，说“关于我的发言，报纸以显著地位加以报道，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和西日本新闻等报社还专门发表了社论，甚为感谢。可是这些报纸都是从言论自由的角度发表评论的。我记得，在战后初期的报刊上，有关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是比较能够自由发表言论的，而这一次的社论没有论及（天皇的战争责任）这一点，令人遗憾。……”本岛在这里提醒社会舆论，他发言的中心不是为了争取言论自由，而是为了明确天皇的战争责任。

1990年1月18日，右翼团体“正气塾”的田尻和美用手枪击中了本岛市长的胸部，伤情严重。这就向日本国内外说明了一个动向：日本右翼不准任何人发表有伤皇统的言论。

右翼枪击本岛的事件，使人想起了30年代发生的“美浓部事件”。1935年，日本贵族院议员美浓部达吉发表的《天皇机关论》（坚持宪政，反对治安维持法和军部），受到了右翼的攻击，说他的主张是“反对日本国体”。在贵族院的会议上，菊池议员对美浓部进行了批判。随后，美浓部的有关著作《宪法撮要》被当局禁止发行和贩卖，进而将美浓部赶出贵族院。在学术界，上杉的《天皇主权论》受到了统治阶级的支持，并以此主张为依据，众议院通过了“国体明征决议案”，宣布了美浓部主张的非法。这是对美浓部的政治袭击，使他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虽然他的学生多人身居政界要职，却未对他伸出支援之手。相反，正是他的学生“检举”了他。1936年2月21日，“大统社”成员小田十壮闯进美浓部教授的私宅，用手枪射穿了教授的右腿，造成重伤。小田枪击这位教授的理由是“美浓部对天皇不敬，乃大逆之徒，应天诛地灭”。

“本岛事件”与“美浓部事件”相距半个多世纪，但根源都是相同的。那就是日本右翼用枪弹向社会喊话：不准违反皇统，否则必遭“天诛”。而且，事件的过程也几乎是一致的。

在美浓部和本岛受到右翼枪击之前，美浓部被赶出贵族院，本岛被解除自民党长期县委顾问之职；美浓部在贵族院受到菊池的批判，本岛在众议

院受到松田的斥责。

而且，还有一个引人注意的动向，就在本岛市长被右翼用手枪击中胸部的当天，日本最高法院以未执行《学习指导要领》为由宣判福冈县柳川市立传习馆高级中学教师丰田隆夫和山口重人“有罪”，即所谓的“传习馆诉讼”的终审判决。这一案件始于1970年6月，神冈县教育局认为日本史和地理教师丰田，伦理社会和政治经济教师山口二人，在教学过程中脱离文部省颁发的《学习指导要领》，给予免职处分。两位教师对此处分不服，因为《要领》内容抽象，只能作参考，并无法律约束力，县教育局的处分侵犯了教育自由，是违反宪法的。于是在同年12月上诉福冈地方法院。

1978年7月地方法院在一审中宣判免于处分，两位教师胜诉。1983年福冈高等法院审理此案，维持一审判决。1989年1月，日本文部省对《学习指导要领》进行了战后最大规模的修改，其中重要之点有规定小学、中学、高中在举行入学、毕业等重要仪式时，要像战前那样升“日之丸”旗，唱“君之代”歌；在教产书中编入日俄战争时的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和海军军歌等。对这些规定如有违反，将受到处分，而这些在1970年时并未明文规定。最高法院对20年前的诉讼案用最新修改的《要领》作为依据改判两位教师有罪，显然是鉴于一种政治目的，那就是要恢复战前的以“皇国史观”为“日本国民之基本”的教育。

“传习馆诉讼”的终审判决，又使人想起一件类似的史实。

1890年10月30日，明治天皇颁发《教育勅语》，当时日本全国各个学校都举行了隆重仪式。在仪式上，每个教师都要站到勅语前面行90度鞠躬的最敬礼。东京第一高等中学的教师内村鉴三在行最敬礼时有些踌躇，他想：在我心中，只有对神才行礼拜，除神之外是否应行最敬礼？！这样想着，他没有像别人那样鞠躬90度。就是为了这个行礼的姿式，内村被视为对勅语的不敬，打上了“国贼”的烙印，给赶出了学校，过着流浪的生活。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天皇的地位变了，《教育勅语》也于1948年6月由日本国会通过决议宣布失效。

1951年，内村鉴三作为日本文化的代表人物，以他的肖像制成8分邮票的图案。日本人民用此来纪念内村，抹去军国主义的“皇国史观”给他打上的烙印可是谁能想到，在快要经过一百个春秋之后，内村的晚辈教师们，却又基于同一根源而横遭罪责。

“本岛事件”和“美浓部事件”说明右翼为维护“皇国史观”而采取的行动，“传习馆诉讼”与“内村事件”反映了统治集团在有关“皇统、国体”问题上的意见，而这两者是有着内在联系的。1990年1月19日，《朝日新闻》在第一版的右方刊载了右翼枪击本岛市长的重大新闻，左方刊载了最高法院宣判两位教师有罪的重要消息，乍看来似乎是偶然的相遇，但就其本质来说，都是与“皇国史观”有关，这两件事使右翼受到鼓舞。

这些右翼分子的前辈即战前的老右翼，是日本法西斯军部的帮凶，他们与军阀、财阀相互勾结向外侵略扩张，右翼团体则充当了军国主义的走卒或急先锋。战后初期，虽然大多数右翼头目被整肃、团体被解散，但是战后不久右翼就开始恢复，而且还不断出现一些新的右翼，他们逐渐对日本政治产生影响，无论战前或战后的右翼都是继承了他们先辈的“皇国史观”，谁不以天皇为中心或不奉为至高无上，他们就攻击谁。

由此可见，日本右翼势力就是当年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负有发

动侵略战争的责任，也应被中国和世界人民押上正义的审判台予以审判。这些侥幸而逃脱惩罚的家伙不思悔改，变本加厉进行右翼活动，他们的后代继承了他们的"皇国史观"，要翻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的案，要为战争罪犯们鸣屈叫冤，要篡改记叙日本军阀侵略中国、朝鲜和亚洲的历史，不是很好理解了吗？

三、战犯未被镇压反受重用

二次大战后，美国出于冷战政策的需要，改变了战后初期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惩罚整肃政策，转而采取保护日本战争罪犯的方针，种下了日本产生许多怪现象的祸根。

据报道，在中国、苏联和世界反法西斯人民多年浴血奋战之下，意大利法西斯早已投降，德国法西斯已灭亡之后，各国人民正集中力量对付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军队时，美国右翼势力就在策划包庇、纵容日本右翼和战犯的阴谋。

在波茨坦会议前后，美国副国务卿格鲁和海军部发言人查贾里瑞斯，就曾对日本提出所谓"软性"的和平条件，答应如果日本在苏联参战以前投降，可不摧毁日本的工业基矗《波茨坦宣言》中没有明确规定天皇制的取消，也是美国对日"宽大"的表现。日本投降后，尽管日本人民和同盟国要追究和审判天皇，而美国却背道而驰。驻日美军总部保全和尊重日皇，并通过日本天皇、政府机构和官员来实行占领政策，其目的就是想通过占领政策把曾经是自己敌人的国家日本变成支持自己的忠实属国，作为在远东的反苏前哨基地。1945年9月22日，华盛顿公布的《美国占领日本初期的基本政策》即以表明了上述的目的。"基本政策"文中说：占领日本的"最终目的"是：“保证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最终建立起一个尊重其他国家的权利，并支持反映在联合国宪章的理想和原则之中的美国的目标的和平和负责的政府"。

驻日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按照政府的指示，在同年9月27日同天皇进行了第一次会谈以后，便已拿定主意：“为了顺利实行占领统治，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天皇，不将天皇作为战犯起诉。”麦克阿瑟在发给华盛顿关于免究天皇责任的电报中说：“给我印象至深的是，在停战前天皇虽处理国事，但其责任基本上都应自动归属大臣以及枢密顾问官们。”“如果将天皇作为战犯进行起诉，那么，就有必要对占领计划进行重要的修改；为了对付日本方面的游击活动，起码需要100万军队和几十万行政官员，还需建立战时补给体制”。1945年12月，美国派驻日本的检查官基南，在麦克阿瑟的影响下，“从一开始便按照免究天皇责任的路子进行活动”，“从检查局里提交给麦克阿瑟的被告名单上除掉了天皇的名字”。

美国为达到其"软化"和"扶植"日本的目的，对占领日本采取了排他的作法，实行单独占领，从而使日本既保留了天皇的地位，也未对日本的军国主义进行应有的审判和清算。

更令人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天皇也在投降"诏书"中埋下伏笔。日本投降前，即为保留天皇地位与盟国经过讨价还价，最后感到要想保留天皇的绝对

权威是无法办到的，便退而争取保留天皇地位而投降的。同时，日本天皇在发表《结束大东亚战争的诏书》中又作了手脚，强调日本发动对外战争是“始终是为了解放东亚殖民地”，日本对美英宣战是为了“日本的政治和经济的自立及东亚的安定”、“并无侵害他国主权和侵犯他国领土”之意，“由于敌人使用新的残暴的原子弹，杀伤众多无辜的非战斗员”、“如果战争继续下去，日本民族即将灭亡”，为了“确保日本国民之安定”才不得不投降的，并称“朕兹能获得国体，深慰于忠良之亿民之赤诚”。这些伏笔就是日本右翼势力和某些政要美化侵略战争依据。投降后，日本天皇又选任皇族兼军阀的东久弥稔彦出任战后日本的首任内阁首相，目的亦是为维持和巩固以天皇为中心的政治体制。驻日美军总部，在主持修改日本宪法时，虽然删去了天皇拥有的“神圣不可侵犯”、“总揽统治权”等的绝对权威，但却满足了保留天皇制的要求，规定天皇为“国家的象征”、“日本国民的象征”。

保留了日本统治机构和重要官员，使日本保守政党得到许多战犯。就这样，在美国包庇下，美军进驻日本，虽然撤销了日本内阁中的直接与军事有关的陆军盛海军盛军需盛大东亚盛内阁情报局等部门，同时进行了大整肃，把极右翼分子及与军国主义有牵连的人员从政府中整肃出去，但原统治机构仍然保持着和过去一样作为中央政权的统一，在占领军之下继续作为日本政府实行统治。同时任用一部分官僚政客为政府的领导者，对大部分被整肃的官员也陆续解除，并对左翼人士进行镇压，这一反复使战前的部分官僚政客又重新回到统治的地位。如占领时期的5任内阁首相，除片山哲外，其余的4人东久弥稔彦，币原重郎、吉田茂就是由驻日美军一手扶植起来的保守势力代表人物。吉田根据当时日本所处的国内外经济和政治环境，制定了“重经济、轻军备”的“政治路线”、即后来统称的“吉田政治”路线，“吉田政治”是极力回避谈对过去侵略战争的责任问题，而是强调借助美国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经济，为重新走向政治大国奠定基矗吉田认为“如果由于振兴科学、引进美国资本重新恢复财界，最终进一步发挥帝国的真髓，那么战败不一定坏，雨后的天地更有佳处”，要“于狂澜既倒之后考虑浮上来的方案”。吉田之后的历任内阁首相或重要阁僚，大都为与吉田同代的官僚政客或吉田培植的亲信，所以“吉田政治”为吉田之后的各届内阁所继承，在经济实力增强之后日本走向政治大国、增强军事实力和为过去的侵略战争翻案的主张便相继提出，而且还有发展的趋势，其后岸信介上台执政使事情更为复杂。

1957年初，岸信介内阁的诞生，使右翼团体受到了鼓舞。

岸信介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利用了左翼势力；右翼也仰仗岸信介的支持和庇护扩大势力。他们相互勾结、镇压和破坏日本人民的正义斗争。

日本著名政治家石桥湛山组阁后仅三个月就病倒不能视事，首相之职便于1957年2月25日落到了甲级战犯岸信介的手里。

岸信介1920年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系毕业后，入农商务省任职。从此走上宦途。1936至1939年先后任伪满洲国实业部总务厅长次长、产业部次长、商工部次长，是主宰伪满洲国经济命脉的重要人物。1939年回国后任阿部信行内阁、米内光政内阁、近卫文麿内阁的商工省政务次官。

1941年起任东条英机内阁的商工省大臣、国务大臣兼军需省政务次官。

1942年在法西斯团体“大政翼赞会”的支持下，当选为众议员。岸信介因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中作恶多端，日本投降后被定为甲级战犯，关进巢鸭监狱坐牢三年。出狱后，又伙同右翼政客组建“箕山社”。1952年，

恢复公职后又建立了"日本重建联盟",自任会长。他提出的政策纲领强调排除共产主义,加强日美经济合作,修改宪法,健全作为独立国家的体制。

1955年任自由民主党干事长,1957年终于登上了日本权力的顶峰,出任内阁总理大臣。

一个甲级战犯竟能登上日本首相的宝座,这在战后世界政治史上是个独特的现象,大大超出广大日本人民和世界政治家们的预料。其重要一条是,岸信介凭借了日本极右势力。

岸信介与日本右翼的关系深而密,两者相互勾结,相互利用。

据日本报刊透露,大选时,右翼团体不仅向岸信介提供了大量政治资金,而且还直接派人参加竞选活动,逼迫选民投岸信介的票,为扶岸信介上台立下汗马功劳。

岸信介上台后,也极力扶植右翼势力,怂恿右翼分子的活动,使得一批右翼团体应运而生。从1960年前后起,相继出现了"三曜会"、"全日本爱国者团体会议"、"青年思想研究会"、"大日本爱国团体联合时局对策协议会"、"日本国民会议"等较大的联合团体,还出现了"大日本菊水会"、"日乃丸青年队"、"日本国粹会"等五十多个独立团体。不少右翼团体中有政界、财界的头面人物参加,并任要职。其中,比较典型的两个团体是"新日本协议会"和"自由国民联合"。

这些右翼分子与日本黑社会势力相勾结,以暴力行为阻挠日本进步人士宣传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真相。

日本一些右派人物不遗余力地宣传"皇国史观",硬是颠倒黑白地把对外侵略说成是"自卫战争"和"解放战争",并危言耸听地说:"我国从战败的废墟中站起来,经过辛劳和不断的努力,得来了今天的繁荣与和平。这期间,我国曾置于战胜国的占领下,失去主权,并有许多被称为战犯的将士被夺去生命、逮捕、扣留、强行劳役。后来通过缔结和约,我国支付了巨额赔偿和无偿援助后才终于恢复了主权。今天我国作为独立主权国家存在这一事实便可完全表明上次大战的赔偿及战争谢罪已经结束。如果现在这个时候还搞'谢罪',只能是践踏先人的努力和名誉,让我们扣着残暴不仁道的民族这顶帽子万劫不复"。还说"支付赔偿金将给国民带来很大负担"。

四、大国主义思潮抬头

随着日本成为经济大国,日本右翼分子的民族主义思想恶性膨胀,公开站出来"不"了,先是对美国,又对中国,猖狂之极,石原慎太郎便是其中的代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事实上单独占领了日本,同日本结成了特殊的关系--军事同盟关系。日本在美国的军事保护下,即充当其军事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美国的侵朝战争、侵越战争服务,同时,日本又利用了当时的有利条件,不声不响地全力发展自身的经济力量。经过四十来年的变迁,如今日本已成了世界上财大平粗的经济、科技大国,连美国都有点怕它三分了,而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则还向它提出了援助的要求。正是在这

种情况下，日本的右翼民族主义抬头了，其矛头所向，已由单一的反苏反共，转向曾经是占领日本的太上皇美国。他们要求和美国平起平坐，而第一步则是要敢对美国说：“不！”日本政界的少壮派、自民党议员石原慎太郎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与清水几太郎的论调相比，石原是个年轻人，他的主张更符合日本年轻人的口味，更带未来性的特色。因此，也为战后日本右翼开拓了一个新领域。

战后日本右翼在很长时期里没有多少市场的。正如日本《东洋经济》周刊所说：“战前的右翼运动反权力、反体制（官方），站在民众的一边，而战后反倒是靠拢体制方面的。

1960年的反对安全条约斗争，本来应该是由民族派进行的民族主义的运动，因此应该是由右翼来进行的。至于反对越南战争的斗争，如果从民族自决的逻辑来说，这也应该是由右翼来搞的。但是，这两个斗争都被左翼所掌握了。因此，右翼不可能得到民众的支持。”“战后，右翼亲美反共，为当权者所利用，它就是从这儿起家的。因此，国民怀疑右翼在背后是同权力勾结在一起的，所以不能得到国民的支持。”“……开着黑色车、装甲车一样的街头宣传车，车身上写着反共救国的标语，播放着军歌，……这就是右翼吗？现在已经不是欢迎这些的时代了。如果不从承认民族本来面貌这一点出发，右翼就不能成立。

“在这种情况下，石原慎太郎以他的主张为战后日本的右翼理论增添了一幅新的面孔。

石原慎太郎的主张集中地体现在1989年1月出版的《敢说“不”的日本》一书中。这本书的观点鲜明，措词明确，迄今已在日本国内发行了100万册，博得了一部分年轻人的喝彩。不妨说在一定意义上石原说出了长期被美国压在头上的日本人的心情，同时也表露了潜伏在人们心中的民族情绪。而石原等人则是利用这种心情与情绪来扩大平右翼影响。

下面是石原慎太郎在《敢说“不”的日本》一书中的论述摘要：（1）宣扬“日本民族优秀论”。

“日本人是拥有丰富的创造性的民族。这种能力不仅仅为一些精英所拥有，而且在一般群众、一般国民中间也可以广泛地看到。”“日本的技术力量已经达到掌握世界的军事力量的心脏部分的程度，其根源就在于这种创造性的积累。”“日本人技术能力的优秀，最典型地表现在产品的残次率低。其关键就在于一般从业员优秀的程度高。”“除了金钱以外，日本人还拥有足以向全世界夸耀的传统和文化，拥有以这种传统和文化为基础的富有创造性的能力，而且拥有美苏决不能无视的高技术。我认为，即使为了让世界了解这些事实，日本也应该在一定的场合，彻底地运用（对美国说）‘不’的逻辑。”

（2）主张日本充分打“高技术”这张牌来挟持美国。

“日本的技术力量对日本说是最高最大的重要财产，是一张王牌。可是，日本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却不知为什么，没有有效地使用这种力量、这张王牌。”“技术越是进步，美国人也好，俄国人也好，就越是不得不依赖日本人在技术的主动权。”“美国就抱有这样一种危机感：为保持军事力量的优势而绝对需要的半导体技术，也许会从日本流向苏联，为此，美国会变得异常得很的歇斯底里。”“如果日本说把半导体卖给苏联，不卖给美国，仅仅这么做，军事力量的平衡就会安全改变样子。”“日本人应该知道，自己现在已成为使美国要拚命地保护本身的存在的力量了。反倒是美国人已经懂得了这一点，

这是今天的日美关系的现状。”“日本外交并没有使用这张牌（技术高超，掌握着美军的军事力量的心脏部），能够说‘不’却没有行使这种权利。”（3）鼓吹“日本不要屈服于美国的恫吓”。

“我认为，日本虽然拥有如此大的国力，却在外交上完全没有使用这张牌，在半导体问题上发生纠纷，其起因就在于我们日本人在至关重要的时刻没有说‘不’。”“能说‘不’而说不说，对方非但不感谢，反而会得寸进尺，进行新的恫吓。”“现在正需要不屈辱的、对等的日美关系。因此，应该说‘不’的时候就应该说。该说‘不’的时候不说的外交，绝对无益于日本。日本的确已经具备足以说‘不’的条件。我们只要有效地使用自己握有的牌就行了。”“我想，如果美国把无理的东西强加给日本，那么，日本只要暗示一下这样的可能性就行了；这个可能性就是，日本要确定自己在世界当中的座标，作出果断的选择。”“美国有人要想日本分担一些防务，已经这么说了。不妨倾听这种意见。但是，在这种场合，我想，即使不完全割断同美国的关系，也应该考虑建立新的防卫体制。日本可以把三军完全改造成为完全是日本自己的，成为一支更有效率的、运用高技术的威慑力量，明显地采取这样的战略战术，如果谁攻击日本，谁就会倒霉。”（4）声言日本“自我充实防卫力量”进入大世界。

“我个人计算过，如果日本自己来充实日本的防卫力量，即使在预算方面，也要比现在这样消费得少。”“我以为，日本用不着美国来保卫，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应该明确地说要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单独地干的时候了。

当然，必须要有与这么干相适应的精神准备。只要国民意识一致，那么，马上就可以办到。不过，我想在政治上还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在技术上，财政上是能够建立起充足的、自主的专守防卫体制的。事实上，要立即取消《日美安全条约》之类的事情是不行的。但是，我想，把这种选择的可能性从头脑中排除掉，就等于一开头就放弃了外交上一张重要的牌。到如今，日本未必需要《日美安全条约》，并且，如果是目前这种程度的安全，那么，日本自己也拥有充足的、能够单独承担防卫的力量，这是事实。不用多久，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的时代就会来到。”日本右翼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清水几太郎在日本的右翼中，对于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作用和发展方向，一般很少有成套的、系统的主张。但清水几太郎教授的主张与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的“战后政治总决算”论可谓相辅相承。

关于日本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清水教授认为：“战败后，丧失了国家的本质的日本，无可奈何，把自己称为‘和平国家’或者‘文化国家’。非国家的日本现在又被称为‘福利国家’。我认为，一言以蔽之，日本已经不再是‘国家’，而变成了‘社会’。以军事力量为本质的国家停止了，变成了以经济活动为内容的‘社会’。

“由于闯过了国内外的难关，经济得以连续增长，日本成了一个名为‘经济大国’的‘社会’。而在‘经济大国’这个称谓中，也回响着与‘和平国家’、‘文化国家’相似的某种自嘲的声音。但是，在东西各方中，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美国的现在的日本被称为经济大国，又有什么坏处呢？这不是日本民族的能力、创造性和勤劳所造就的伟大的成果吗？与此同时，我想，也不可忘记存在着好的条件，即混合经济，或曰市场机构与政府计划恰如其分地掺合。

“向全世界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的日本，其国民的大多数已有了中产阶级意识，虽然没有必要如此趾高气扬，但是，难道不应该更如实地怀有经济

大国的意识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美、苏、英、法、中）都已经实行了核武装。国际政治中的力量，主要是由军事力量决定的。与军事力量作比较，经济力量所具有的意义是非常之小的。但是，当军事力量成了战后日本的禁忌，因而使政治力量不易发挥作用时，‘经济大国’这一词语听起来是何等地空虚，是不言而喻的。

“日本这个‘经济大国’，资源、能源、粮食都要从遥远的外国运进来，产品也一样要出口到遥远的外国去，否则便活不下去。

“我想这一点具有比一般人所考虑的更大的意义。一方面，虽然缺乏资源、能源，却达到了今天的地位，这完全是靠了日本人的能力和勤劳。日本只有日本人这一种资源。我们不妨向全世界夸耀这个人的资源。但是，另一方面，万一漫长的海上运输线的安全受到威胁，‘经济大国’就会顷刻之间崩溃。尽管如此，日本却并不是依靠日本自身的军事力量来确保海上运输线的安全的，而是漠然地依靠着别人。如果考虑到这一点，那么，无论是谁，当他刚刚要讲‘经济大国’时，嘴巴都会丑陋地歪起来。

“现在，美国的军事力量在相对地减弱，如果日本不想要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来确保海上运输线的安全，也就是日本不想主动成为‘国家’，那么，连日本这个‘社会’也将受到危害。

“日本即使为了成其为社会，也必须是一个国家，既非国家，又非社会，那么，日本必将灭亡。”清水教授认为，日本要成为和美苏平起平坐的大国，必须经济力量、军事力量一起都发展。他写道：“等到打破战后的幻想和禁忌，日本拥有与其经济力量相称的军事力量时，其相当的政治力量便会自然地从中产生。在与以美苏为首的许多国家的关系上，将有种种程度、意义上放手处理的权力。归根到底，哪怕孤独也罢，只要政治力量得以明智地行使，尊敬你的朋友就会增加，也会结识到不惜给以帮助的朋友。只要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都齐备了，那么，日本不就是堂堂正正的大国了吗？而如今，尽管充分具备足以成为大国的素质，却不知是惰性的缘故，还是自卑的缘故，日本在世界上故意地装出一副残废人的样子。”清水认为，到那时，日本必将在国际社会享有重要的地位，因为日本那时是“国际社会的若干重要的变数之一”，即可以左右国际社会的因素之一。他写道：“国际社会这个东西，是由诸国家这个变数构成的体系，不管人们愿不愿意，日本是若干个重要的变数之一。这个变数，按能力和努力，能够使整个体系产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它，应该自觉地认识到‘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别人的力量’。

“为了达到上述目标，清水教授尤其强调日本首先必须建议一支“国军”，以便保护日本的安全，使之不受威胁。他写道：“在一切‘福利’之中，安全及和平是最大的福利，它是其他一切‘福利’赖以存在的基矗一旦日本的安全受到威胁，发生‘紧急状态’，那么，我们目前所享受的‘福利’便将瞬间消失。作为人的能力和努力的成果的‘幸福’，以及作为政府提供的服务的‘福利’，都将立即崩溃丧失。建设一支与‘普通的国家’日本相适应的国军，非但不与‘福利’有矛盾，而且它是一切‘福利’的保证。”但是，如果日本人民不理解、不认识、不支持，便将一事无成。因此，清水教授拿起了他所谓的“爱国心”这个“法宝”，而这一点，也正是许多右翼头面人物所鼓吹的。爱国心，任何国家的人民都需要，问题在于把爱国心用于什么目的？清水教授写道：“军事防御和公民参加非军事性质的国家防卫，构成军事的两个轮子。公民参加国家防卫这一点要实现，首先每一个公民必须要有爱国心，有立功保卫国家

的决心。但是，只靠决心是不能保卫国家的。其次，必须制定具体的目标，以便齐心协力从事保卫国家的工作。

“国民参加国家防卫，依靠每一个国民保卫国家的气概，也就是志气和信念。”综上所述，人们从清水几太郎教授的有代表性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日本右翼为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作用发展方向所描绘的一个总的轮廓，那就是：日本必须以经济实力为基础发展强大的军事力量，而强大的军事力量与强大的经济力量之结合，便会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日本必须凭借这三种强大的力量，在世界上成为与美苏平起平坐的强大的国家。

不妨说，其目标、其野心，不亚于战前的日本帝国。一家英国报纸曾尖锐地指出，日本是要成为“太阳旗帝国”，让太阳旗气扬于全世界。

第十五章对日本的忠告

在本书即将结束之际，作者从维护中日友好和远东及世界和平的大局出发，特别是为了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相处，愿向日本执政者和日本人民发出衷心的忠告。

一、忠言逆耳利于行一提到日本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亚洲人；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会不约而同地承认日本人聪明、勤劳、有闯劲。日本投降后50年，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二战的废墟上创造了令人惊叹的物质文明，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戴有世界最大债权国、经常收支盈余最大国、最大政府开发援助国等等桂冠，人们虽对此表示钦佩，但对整个日本人的评价仍不高，可见单纯钱多并不能赢得人们的尊敬。像一个人一样，尽管腰缠万贯，并不能得到人们的信任，只有期德既好，又有丰富的物质财富的人，才能在人们的心目中树立崇高的形象。

现在，日本人有了钱，但仍被别国人瞧不起，根子在哪里？归根结底，日本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向中国和亚洲及英、美诸国开战，欠下了中国、亚洲和世界人民的血泪债，至今仍没有像样的认罪态度。相反，日本某些人，包括日本政界某些执政者仍在固执地否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灭绝人性的侵略战争的性质，为侵略历史和战争罪犯翻案，极大地刺伤了中国和亚洲及世界人民的思想感情，当然得不到世界各国和绝大多数人的信任和理解，根子就在这里。

造成这一事实的罪魁祸首是谁？是日本右翼分子。

日本右翼势力的政策主张可用4个字高度概括，那就是侵略扩张。

日本的右翼，尽管组织很多，却有着几乎完全一致的思想、心态、目标和要求。换言之，他们有着几乎完全相同的价值观、道德观、世界观；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着几乎完全一样的政治主张，而这些政治主张所赖以提出的依据则是具有特性的理论，即右翼理论。

这种右翼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很系统，很明确，很完整，如著名右翼理论家北一辉所著《日本改造法案》。战后，迄今似乎没有成套的右翼理论提出，也没有为社会公认的右翼理论家崭露头角，而且，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右翼的不同组织之间，还存在着意见分歧。这种情况的

出现，当然与战后国际形势、日本国内形势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一言以蔽之，时代不同了。

在此，我愿向日本执政者发出忠告，历史事实是掩盖不住，也篡改不了的，事实终究是事实；历史终究是历史，是非曲直，自有公论。

就拿1995年日本国会通过的不战决议来说吧，日本执政者扭扭怩怩不痛快地承认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战争的侵略性质，拿似是而非的决议来蒙混过关，殊不知世界舆论是最严格而公正的老师，它给日本打了个不及格的分数，倒头来还是过不了关，反而遭到中国和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日本进步人士、东亚诸国批评日本众议院的这个决议缺乏诚意，继续遮掩二次大战中的侵略罪行，既未对过去的侵略罪责表示谢罪，也没有表示不再发动侵略战争的决心，一句话：通不过。

那么，且不说中国的反应，再看看东南亚的看法吧。

日本当局大概没有想到，东南亚人民的反应也很强烈：据青年学者袁喜清的文章称，东南亚各国政府和舆论纷纷发表谈话，严厉批评日本政府对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顽固立场，并认为日本再次错过了与亚洲人民和解的有利时机。

日本《决议》通过以后，新加坡《联合早报》接连发表署名文章，对此决议进行评述。

这些文章分别从日本通过这一决议的原因、对亚洲国家与日本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分析和阐述。

6月11日，《联合早报》发表了署名黄海彬华的文章《只有“反省”，没有“道歉”》。这篇文章在详细介绍日本通过这一决议的过程和内幕之后指出，这一决议“只见妥协的痕迹，战争的遮掩，却不见直接承认日本的战争责任，反而大耍文字游戏，既没有‘不战’的字眼，也没有‘谢罪’的表示。”文章藉此反问道：“这是什么‘不战决议’？”这篇文章还指出，如何对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责任问题决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历史观之争，而是日本人如何接受历史的深刻教训，认识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的实质性问题。而日本人在这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上却大玩文字游，将“侵略战争”改为“侵略行为”，将“深刻反省”及“谢罪道歉”从决议中删除。这种缺乏真诚道歉的态度确实需要人们对日本另眼相看。文章最后说：“日本通过这样的国会决议，看来会适得其反，不仅得不到亚洲人的信任，反而会引起更大的反感。”6月14日，《联合早报》又发表了著名学者卓南生博士的文章《日本国会何必多此一举——“不战决议”面面观》。文章指出，自战后以来，日本官方（包括日皇、日相与不少的日本政治家）对战争问题一直采取回避与不肯正面承认错误的态度，加之日本教科书不向年轻一代真实地介绍历史真相，日本与亚洲各国的“史观摩擦”从未平息。日本国会通过《决议》，原来是要借战争结束50周年的良机向世人阐明其“反省”与“道歉”之意，不料最后通过的《决议》效果却适得其反。这份《决议》的内容与历代首相的讲话相比实际不是前进，而是后退。

6月16日，《联合早报》又发表了署名郑赤琰的文章《日本开始用法律开脱其侵略罪行》，进一步从法律角度对日本国会这次通过的《决议》进行深刻分析。文章指出，日本玩弄文字游戏的经验十足，他们这次又要在不道歉、不承认战争罪行之余，进一步从法律上去否定“东京大审判”的裁决，进一步从法律上开脱日本的“侵略”罪行。这次日本国会通过《决议》实际上

是用法律的形式明确写下可以解释为"非侵略"的条文，从而把问题越扯越远，最后变成无法界的条文，从而达到他们为日本侵略行为彻底翻案的目的。

马来西亚舆论对日本国会讨论"不战决议"的过程一直给予了极大的关注。6月9日的《决议》通过以后，《南洋商报》即发表了一篇题为《日本对战罪反省不足》的社论，对这一决议进行了分析和批判。这篇社论指出，为了配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日本政府准备提出"不战决议"议案，以表示日本不再对邻国用武，不再侵略别国主权和杀害无辜百姓，是有一定政治意义的。然而最后通过的决议只对战争罪行表示"懊悔"，而不向受害国表示"道歉"和"谢罪"，反映它对皇军过去进行的殖民统治和侵略行为反省不够，欠缺这种道义意识和政治诚信。

社论指出，正当开明的日本人愿意为侵略战争进行反省，为和平作出努力之际，仍有许多日本政要却为军国主义涂脂抹粉，企图为历史翻案。其实有关日本侵略亚洲的历史事实早已为世间所公认。史实昭然，不容狡辩。日本如果不想重蹈军国主义的覆辙，就必须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别再自欺欺人。

社论还指出，目前日本正挟持其雄厚的经济实力而欲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扮演一个"政治大国"的角色，而且准备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要想争取亚洲国家的支持，首先必须证明其和平诚意，勇于承担历史咎责，并作出必要的弥补措施，以赢回有关国家的信心。如果日本对历史有个诚恳的交待便不难获得亚洲人民的谅解与合作。

泰国舆论同样对日本最终通过的这一《决议》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就在《决议》通过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10日，泰国《曼谷邮报》便发表了题为《道歉可以接受，现在应该放眼未来》的社论，对《决议》进行了分析与其论。

社论在分析亚洲各国对日本通过这一决议的感受时指出，亚洲各国人民虽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印象变成越来越遥远而且模糊，但各国领导人却对日本通过"大东亚共荣圈"而操纵亚太地区经济主导权特别敏感，他们认为日本不愿意承认在二次世界大战的侵略行为，实际上反映了日本人至今仍然希望通过经济手段控制亚洲各国。如果日本不愿意用坦诚、开明的态度来认识二战给亚洲各国带来的影响，亚洲各国便不可能改变对日本的想法。

这篇社论也认为，亚洲各国应该承认村山富市政府为通过这个决议所作的真诚努力，同时也应该着眼点更多地放在未来。对日本人来说，更应该理解亚洲各国人民的心情，不要再在这个问题玩弄文字游戏了。

这篇社论最后指出，日本政府永远记住，向亚洲各国人民道歉并不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而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日本人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向亚洲各国及世界人民展现自己道义感和责任心，这是很重要的。

在日本国会通过《决议》的前后几天，印尼报纸也不断发表了亚洲各国对这一问题的反映以及一些专家学者的评价，但和新加坡及马来西亚舆论相比，印尼报刊的言论相对来说要平和一些。6月22日，印尼《雅加达邮报》发表了署名S.P.希斯的文章《日本的道歉很有必要》。这篇文章用很大篇幅详细分析了日本人为什么不愿意在战争罪行这个问题上道歉的原因之后指出，日本人不应该将自己遭受美国原子弹之苦与日本侵略亚洲给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相提并论。

对于亚洲各国人民来说，他们并没有给日本带来任何伤害，相反，正

是日本人给他们的祖辈们带来了难以言喻的创伤。日本人应该明白，亚洲各国并不认为日本人当年发动的那场战争是将他们从西方殖民者手中解放出来，相反，他们觉得日本在这方面与西方殖民者有过之而无不及。文章还指出，日本要在亚洲乃至世界上充当政治大国的角色，他们就必须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罪行有一个清楚的交待，这就是向亚洲各国人民作出深刻的反省和真诚的道歉。

二、日本应向德国学习日本和德国，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也是战败者，但是，战后两国政府对战争责任问题却采取两种不同态度：德国政府正视历史，向受害国认罪进行赔偿，还将那段历史如实写入教科书，用以教育下一代。70年代初，前总理勃兰特还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谢罪，结果并不丢人，反而搏得波兰人民以及国际社会的广泛赞扬。1995年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时，德国领导人重申：要牢记历史教训，以免重蹈复辙。

日本政府则与德国政府相反，自战后起至1993年8月结束自民党一党执政之前，历届政府对侵略罪行采取回避、推诿及暧昧态度。1993年8月新的联合政权成立后，内阁首相细川护熙明确表示：日本对外战争是侵略战争，立即遭到右翼政要的攻击，细川不得不在“施政演说”中将侵略战争改为侵略行为。1995年8月15日，联合政权村山富市首相就日本战败50周年发表谈话时，谈到“我国在并不遥远的过去一段时期，国策有错误，走了战争道路，使国民陷入存亡危机”，“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我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这几句话也受到右翼政要攻击和批评。

由此观之，作为日本为政者，还不如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低头认罪，才能取得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谅解和信任。否则，就会极大地伤害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感情。因为，日本发动的疯狂的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和牺牲，其手段之残暴在人类文明史上绝无仅有。日本在侵略战争中杀害了2000多万亚洲人民。中国抗战8年牺牲的人数就达1000万人以上。如同新加坡舆论指出的那样：“日本侵略邻国，造成2000万以上的人命平白的牺牲。这个数字之大，如跟夺走5500条人命的阪神大地震相比，前者等于后者的3600倍左右，即使每天发生如此大地震和造成如此惨重伤亡，也要10年左右才能达到2000万。”在这个问题上，日本为政者自觉地早承认早主动；不承认，永远被动。日本曾把1995年视为入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绝好机会，但中国、朝鲜、韩国等亚洲国家都认为，日本不承认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就没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资格，日本不配当。村山首相1995年10月23日在第50届联大的讲话对此不敢再提，大概也是自惭形秽，自己也感到在历史认识方面形象欠佳。因此，我们忠告日本当政者，决不能听任右翼分子去否定侵略战争性质，应痛痛快快地认罪，争取被侵略国家和人民的谅解和信任。

三、对日本的再次忠告常言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虽不掌握国家大权，但也对国家大事负有一定责任。特别是日本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日本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决不能任平日本右翼分子牵着政客鼻子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而应当明事理，辨是非，造正确的社会舆论。

还要考虑日本的选举制度和组阁规则，因为日本是通过选民对各党国会议员候选人直接投票选举国会议员的，就是说，国会议员是你们投票选举出来的，再由获国会众议院多数议席的政党执政，而在选举中各党都不过半数的情况下，可由联合起来过半数的几个党联合执政；各省大臣不是全由首相决定，而是根据议席数目分配的。因此，你们的选举投票就要慎重行事，千万不能选那些公开为侵略历史翻案的人当议员。令人感到不解的是，一些鹰派议员往往为了迎合“遗族会”的意见而去参拜靖国神社。如果选民的是非观念分明，不投这些逆历史潮流而动者的票，就会对他们的行动有所约束。

在这种意义上说，作者同意日本著名历史学家、爱知大学法学部部长江口圭一教授的意见。

江口认为，除了天皇为首的战争指导外，日本国民也不能逃避战争责任。他们虽然身受国家利己主义之害，但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压倒多数的国民支持了战争，有时甚至达到狂热的程度。究其原因，在于长期教育形成的把天皇和国家绝对化的信念，进而产生顽固的军国主义的排外思想；在于严厉的新闻管制下只能获得错误的信息；在于那种不许批判和反对天皇、国家、军队乃至战争的严厉的镇压机构。导致对侵略战争错误认识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日本国民未能放弃以“己”为中心的认识观。往往只把自己看成战争受害者，而很少想到自己是加害者，这使得他们很难认识到自己的战争责任。这种以己为中心的认识观是由下述原因造成的：昭和天皇没有根据其应负的责任作出进退选择；战后日本政府会在以天皇为首的日本战争责任问题上一直态度暧昧；教科书审定故意掩盖日本的侵略、战争犯罪及暴行等学校教育上的问题等等。

最后向遗族会成员进一言。不要只看到自己的亲属中的战死者，而应想到他们为什么而死，更要想到他们参加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不义之举，分清加害者与受害者的是非问题。

能逃避战争责任。他们虽然身受国家利己主义之害，但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压倒多数的国民支持了战争，有时甚至达到狂热的程度。究其原因，在于长期教育形成的把天皇和国家绝对化的信念，进而产生顽固的军国主义的排外思想；在于严厉的新闻管制下只能获得错误的信息；在于那种不许批判和反对天皇、国家、军队乃至战争的严厉的镇压机构。导致对侵略战争错误认识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日本国民未能放弃以“己”为中心的认识观。往往只把自己看成战争受害者，而很少想到自己是加害者，这使得他们很难认识到自己的战争责任。

这种以己为中心的认识观是由下述原因造成的：昭和天皇没有根据其应负的责任作出进退选择；战后日本政府会在以天皇为首的日本战争责任问题上一直态度暧昧；教科书审定故意掩盖日本的侵略、战争犯罪及暴行等学校教育上的问题等等。

最后向遗族会成员进一言。不要只看到自己的亲属中的战死者，而应想到他们为什么而死，更要想到他们参加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不义之举，分清加害者与受害者的是非问题。

